

黨史筆記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增訂版

何方



黨史筆記

編　　輯　陳明慧
實習編輯　何穎珊（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四年級）
書籍設計　蕭慧敏
排　　版　蘇少嫻
Création 城大創意製作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402-0

出　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Zun'yi Conference t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402-0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黨史筆記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增訂版

何方





目　錄

詳細目錄

增訂版序一

資中筠

宋人周密著《齊東野語》的序言中有一句話：「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這句話很精闢。正如顧準說過的：「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正史基本上是官史。一部《資治通鑒》很明確，就是給皇帝看的，從中吸取治國的經驗教訓。不過另一方面，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太史簡」，「董狐筆」，史官以寫真實為天職，不受君主約束。春秋時的齊國太史三兄弟都以堅持寫真實而以身殉。所以我說過，有殉情、殉道、殉職、殉國的，而「殉史」恐怕是中國特色。不過這一優良傳統在相當長的歷史中還是傳下來了。

相對說來，古史的可信度比近代以來還高一些。史官還是有一定的職業道德，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為迎合當權者而胡編亂造。而在唐太宗破例之前，皇帝不能看自己的「起居注」，即使在那之後，直到清朝大興文字獄，乾隆粗暴刪改《四庫全書》之前，皇權沒有進入歷史寫作，所以前人留下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還有一定可信度。另外還有各種民間寫作的野史，並不被禁，可以流傳。當然野史不一定都是信史，但可以起鉤沉補闕之效。究其原因，古代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統，基本制度不變，所以作為主線的是非標準變化較小。

再者，古人治史不是對民眾做宣傳。一般改朝換代之前總有一個亂世，人心思定，誰能實現安定，統一天下，就是「奉天承運」，老百姓就擁護。皇朝興替，成王敗寇，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是公認合法的，無須掩飾。一般治史都是寫前朝事，客觀描述前朝的功過與現實的民心歸附無關，反而能為當前的當政者借鑒。

而近代的革命是從道統到制度全盤顛覆，必須完全否定前朝，才有本朝的合法性。君主制被否定，名義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復辟帝制，承認江山私有。理論與實踐脱節，「道統」與「法統」在邏輯上難以理順，對相關的歷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蓋。寫歷史與當代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息息相關。加之教育普及，關心國事的民眾越來越廣，於是歷史的敍述與政治宣傳合二為一，不僅對近代史，連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運動就修改一次歷史，這才應了周密所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連對孔夫子也「是非凡幾易」。不僅是筆底褒貶問題，事實的陳述也都須服從當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須遮蔽。所以近當代的官史可信度還不如古代史。教科書還在繼續誤人子弟。

中共黨史更加不能碰，1951年胡喬木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曾經在短時間內為欽定黨史，然而1989年胡喬木訪美時，自己都認為那本《三十年》已經過時，不能算學術著作，不同意放入其履歷中。至今南京二檔館民國史的檔案可以開放，而中央檔案館中共的檔案是不能開放的。不過近年來出現了許多親身經歷者的回憶錄，可以算是野史，很有價值。何方老的這部《黨史筆記》就是一部珍貴的力作。

何方老少年即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近八十年，歷盡滄桑起伏。可貴之處在於始終保持赤子之心和耿直的品格，有識見，有勇氣不斷接受新事物，不斷反思，正視現實，越到晚年越清醒，越深刻，以對歷史、對民族高度的責任感，把親身經歷的重大事實公諸於眾，提供一份「信史」。這也是繼承了「董狐筆」的傳統。在當前的言論環境中，雖然沒有到以身「殉史」的地步，但還是付出一定的代價，受到許多壓力和不公平的對待，不但這本書，連同他的其他著作也不能在內地出版。他當然於心不甘，常有憤懣之情。但是另一方面，還存在這樣一個空間和有眼光的出版者，使他在有生之年能夠將寶貴經歷、思想文字得見天日，立此存照，嘉惠後世，亦足欣慰。在互聯網時代，真相的流傳是阻擋不住的。

斯人已逝，我是晚輩，與何老誼在師友之間，不敢言「序」，謹以此小文表達對本書和作者的敬佩之情。

2018歲末



增訂版序二

「古典」共產黨人的探索與反思

雷頤

二十年前，何方先生以近八十高齡開始思考、研究中共黨史，逐篇寫出「黨史學習筆記」。他以「外行」自居，所以每完成一篇就打印多份，虛心請友人、專家閱改。這樣，每寫出一篇，還未正式發表，因其往往有新史料，更因其見解新穎、深刻，眾人競相傳閱，越傳越廣。幾年後，在這些單篇文章的基礎上寫成了《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於2005年正式出版。從開始研究到此書出版，不過六年時間，他竟寫了五十多萬字，厚厚兩冊，足見思考之深、用功之勤。那些單篇文章本就大有影響，又經過仔細修改整訂，萃成一書，更加系統，影響更大。何方先生也因此成為黨史研究的專家、權威。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與何老相識。當時他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創始所長」任上卸職，轉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思考、研究的重點仍是當前國際形勢、國際關係及中國外交的現實問題。我與他，只是認識，並不熟悉。幾年後，也就是1999年他開始思考、研究中共黨史後，漸漸熟稔。何老性情幽默，經常與我開玩笑，我也經常沒大沒小地「幽他一默」。時不時，他會道出一些不是「不足」而是「不能」為外人道的黨史上的人與事，這些文本之外的故實，不僅生動、有趣，往往更能窺探文本之後的真實。與何老經常往來，獲益良多，對他的經歷、思想的發展，也所知漸多。

何老已於2017年仲秋去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決定重版《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足見此書影響之長久。宋老師囑我

為新版寫序，以我的才學見識之淺陋，為何老大作寫序，誠惶誠恐，實不敢當。但恭敬不如從命，只得不揣冒昧，忝為冠序。

一

何老1998年離休，1999年開始研究黨史時，已經七十有七。為何在耄耋之年要開始一個對自己來說是全新領域的研究？當然有深刻的原因，確切說，來自他的親身經歷。

何老1922年出生，出於對共產黨提倡的決心抗日和民主自由平等理想，年僅十五，就決心奔赴心中的聖地延安。他兩次衝破家庭的阻力，幾乎與富農父親決裂；曾被國民黨抓捕，關在一所中學，他翻牆逃出，奔向延安。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一定要去延安，投奔共產黨。

1938年，他終於來到延安，進入培養幹部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革命理論，不到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學習優秀，1940年即擔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助教，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久，又被調中央軍委延安外語學院俄文專業培訓、學習。在延安幾年，他經歷了從1941年春到1945年春整整四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全過程。由於15歲奔赴延安時曾被國民黨抓捕、關押，他被誣為「國民黨特務」，受到嚴厲審訊。在一連一周不讓睡覺的情況下，他不得不無中生有地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還不得不無中生有地供出另一人。在睡了一大覺後他用了一周的時間寫出材料為自己翻案。接着在一年多裏又受到更加嚴厲的審查。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再怎樣叫他坦白、承認自己是特務，他都不幹了。對自己在「搶救運動」中的經歷，當時他有委曲，對黨卻無懷疑，仍是一如既往地無比相信、無限忠誠。特別是經過整風，他反而與全黨多數人一樣，產生了對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曰個人迷信。

1945年，何老從延安外語學校畢業，正逢日本投降，中共派出大量軍隊、幹部搶佔東北，他也緊急被派往東北。在東北的實際工作後期，他深受到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的器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張聞天擔任駐蘇大使，他擔任駐蘇使館研究室主任。張聞天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他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專員、辦公廳副主任、部黨組秘書。

1959年廬山會議，張聞天因支持彭德懷、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提出不同意見受到迫害，何老在「反右傾」中也受到嚴厲批判和錯誤處理。與延安整風、審幹一樣，雖然他先後受到留黨察看、撤職、降級處分，自己頗有些委曲，但因為並不了解農村實際情況，對黨、對黨的領袖毛澤東、對「三面紅旗」仍無懷疑，甚至認為張聞天確有錯誤，自己也確實跟着犯了錯誤。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六安農村勞動改造一年。雖只一年，但這一年卻是他思想歷程中關鍵的一年，是他對黨的領袖由「信」到「疑」的開始。在農村他親眼見到「三面紅旗」造成的慘烈後果，大量農民被餓死，甚至他自己都險些餓斃，這才開始對毛澤東、對「三面紅旗」產生懷疑。「文革」一開始，他就被劃入「牛鬼蛇神」而被批鬥，1969年又被押送到外交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在幹校勞改時間長達九年之久，並且，在1971年被開除出他不到17歲就加入、決心為之奉獻一切、乃至生命的黨。

「三年大饑荒」和「十年浩劫」，使他不能不反思、追問，自己在15歲時滿心嚮往的代表着自由、民主理想的政治組織，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會和它當年的追求截然相反？

這種疑問、追問，在中共黨內有相當的代表性。經過幾十年風雲劇變之後，一大批當年懷抱自由、民主理想與熱情、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入黨的共產黨人，開始反思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有各種各樣

的「運動」、造成「三年大饑荒」，最後造成給民族、國家、包括共產黨本身帶來深重災難的「十年浩劫」？他們的經歷不完全相同，觀點也不盡一致，開始了角度各不相同、但「問題」卻非常一致的反思。我認識的李鋭先生曾任毛澤東秘書，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研究與思考。李慎之先生開始思考、提倡自由主義。長期從事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曾彥修先生開始研究、解構有蘇共意識形態「沙皇」之稱、對中共意識形態影響極大的日丹諾夫……何老的反思、追問，則選擇從黨史這個角度切入，聚焦「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段。他的黨史研究別開生面，既有「親歷者」的生動和沉痛，又有研究者的冷靜，委實精彩。

二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實是中共歷史的轉捩點，黨史的官方說法是從此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後來稍有修改，改為「事實上」或「實際上」或「初步」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何著則以大量史料證明，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雖然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領導核心，但「事實上」、「實際上」政治、軍事的全面領導仍是張聞天。在軍事方面，毛澤東仍是周恩來的助手，恰恰是張聞天欣賞、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1935年9月，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的地位反轉，由毛為周的助手變為周為毛的助手。仍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直到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從六屆六中全會起，張、毛地位反轉，毛澤東不僅成為全軍、也成為全黨的領袖，張聞天則漸成「配角」。從延安整風開始，張是「被整」對象，連「配角」都不是了。

釐清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到1938年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前無論「名」與「實」，張聞天都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段史實，意義殊深。因為在中共黨史的經典論述中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關鍵點，是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935年初到1938年秋這近四年的時間，也是中共在面對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戰略轉變的重要時期。何老著作證明，這些重大轉變主要是在張聞天為首的總書記領導下完成、實現的。

「延安整風」是何老著作的重點，他以詳細的資料和細緻的分析，步步深入地論證了正是「延安整風」建立了個人崇拜的思想意識與個人專斷的政治機制。他認為：「延安整風實際上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一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這也許是《整風文獻》根本不收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整風演習中不強調學馬、恩著作，而以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為中心演習材料的原因之一。」本書以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論證了「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是個人崇拜的重要標誌」，「延安整風開創了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見，並進而造成對一切知識的輕視」。「延安整風確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黨專政和書記獨裁(個人說了算)法制化」，這種一元化領導和人治是個人崇拜的重要標誌，「個人崇拜不僅絕對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只能限於口頭。因為個人崇拜歸根結底表現為體制問題，實即政治上的封建皇權專制主義；朕即黨、朕即國家。作為黨國領袖，可以獨斷專行，讓整個社會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轉。」延安整風「創立了壟斷與管理意識形態的體制及其表現形式延安文風」；「個人崇拜是崇拜者和崇拜對象的合力的結果，最後形成為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崇拜者情感寄託和權利讓渡的過程，使崇拜對象越來越具有絕對權威，崇拜者越來越只能服從」。延安整風中領導層決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領導人「讓出了自己在領導集體成員中的平等權利，退居幕僚地位，把黨組織中的同志關係引向封建社會成員中的君臣關係」。「被

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就要把崇拜對象宣傳得一貫正確、無比英明偉大，還要為他隱惡揚善，偽造歷史，貪他人之功、諉他人以過、拔高領袖、矮化他人，等等」……總之，他認為「如果按照建黨原則和黨章規定，延安整風是不合法的，只是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為中國黨的獨斷專行、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奠定了基礎。」(2005年版，下，第489－495頁、504、534頁；上，第235、236、237頁)同時，他反復指出這種與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的思想意識與政治機制已經形成一種影響深遠、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黨文化」。

三

如前所述，何老有關黨史研究的文章發表、流傳已經二十年，此書初版面世也近十五年，有關此書的研究、評論多而又多，這些見解深刻的研究、評論與介紹大多又集中於「延安整風」論述，其基本觀點與貢獻已為人熟知，無需筆者在此贅敍。但筆者在此想強調本書以往為人重視不夠之處，即有一小節專門論述「延安整風的主要收穫和成就」(2005年版，上，第228－235頁)。此節雖短，卻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另一面，他的思想的矛盾性、複雜性。

之所以要有此一節，因為他認為：「延安整風一直被說成不僅是中共黨史上的創舉，也是國際共運有史以來的創舉，對黨的建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這些說法雖然帶有一定的誇張，但基本是正確的」，自己「有意反駁那些完全否定整風和把整風只看作幾個人爭權奪利的言論」。

他認為收穫與成就的第一項就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正是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才被歸納為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和正式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實際上成為當時擁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影響範圍還得到不斷擴大。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一件大事。因為自從外國列強的侵略使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後，中國就面臨實現國家獨立和統一的神聖任務。中國人民也為此奮鬥了近百年，都因為缺少一個既適應時代潮流又符合中國實際的指導思想和在這一思想引導下的革命運動，因而統統失敗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長期奮鬥和集體努力，才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之交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加上遇到極為有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全國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思想使中國革命「有別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並決定了這一理論和政策能夠取得最後勝利。」「延安整風正處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時期。適應這一形勢的毛澤東思想得到全黨的認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是很自然的。因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和方法的正確和行之有效。」

收穫與成就的第二項是「牢固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整風從解決思想方法入手，達到組織上出現這樣的結局，恐怕是事先難以預料的。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出現這樣的結局卻是經過多年準備、意料之中的事。」「這個問題的明確解決，就使整個黨政軍民的最高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人之手，而且各級領導也都實行了嚴格的一元化領導，保證了上面意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抗戰勝利後，解放區已壯大到必須全國一盤棋(抗戰時期各根據地還多是各自為戰，中央軍委一般不直接進行軍事指揮)，無論政治、軍事，都更需要高度集中、統一指揮、令行禁止。毛澤東以其中國曠古少有的軍事天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放了除台灣外的全中國。凡是參加過解放戰爭時期工作的人都會體會到，當時確實做到了全黨一心、全軍一心、全民一心。無論是在哪個解放區，只要聽到延安(陝北)電台的評論和號召，都會堅信不疑和堅決執行，更不用說內部發出的指示電報和文件了。如果沒有延安整風確立起來的毛

澤東的崇高威望和統一指揮，解放戰爭也可能還要多花一些時間，不會那樣乾脆利索。」「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才完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任務，實現了對外的民族獨立和對內的政治統一。而毛澤東正是這個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

收穫與成就的第三項是「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第四項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一定成效」。「由於整風以來的歷次思想改造對知識分子傷害太大，『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人們不再多提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已經變成了貶義詞。但以前並非如此，參加革命後，人們還是自覺自願接受改造的，希望用無產階級思想感情代替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因而對毛澤東貶低知識和挖苦知識分子的話（如說讀書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等），也聽得進去，並無反感。其實，毛澤東所講的知識分子的缺點，總的來說，都確實存在，如驕傲自大，個人英雄主義，對工農兵有所輕視，不大瞭解中國實際特別是農村情況，極端民主化傾向，組織紀律性較差，表現軟弱和容易動搖等。經過整風，「即便在整風搶救中受到很大委屈的許多人，也能以『馴服工具』和『螺絲釘』要求自己，表示要接受考驗。」「思想改造更加明顯地表現在知識分子同工農結合上，文藝界的變化就特別引人注意。」所以，「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需要『一分為二』。」

在此節，何老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思想，但立即又對這一論斷做出某種限定，如「它是在強烈濃厚的中國傳統上吸收融合的列寧斯大林理論，而不是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吸收、繼承的」。「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背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的戰爭與革命時代，五十年代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後就基本過時了」，「毛澤東思想勝利地完成了它偉大的歷史使命」，「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但一些人說的中國人民將因此（指如果沒有毛澤東——雷按）長期在黑暗中摸索，則是受個人崇拜影響的過分誇大」。這種讚揚與限定的矛盾，進一步說，這只有

7頁的短短一節，與多達706頁全書的基調、基本觀點、指向明顯矛盾。這種矛盾，源自他思想深處、內心世界的共產黨員底色。另外，我頗為驚訝地注意到，久違的「中國黨」一詞在本書俯拾皆是，這是提到中國共產黨時何老的習慣用法。「中國黨」是相對於「蘇聯黨」、「朝鮮黨」、「古巴黨」、「法國黨」、「日本黨」……各國共產黨而言，是「共產國際」、「國際共運」、「社會主義陣營」時期的標準詞語。現在官方黨史書中，此詞已不多見，何老卻依舊自然而然、下意識、無意識地使用這一已然「過時」的「話語」，說到底，他本質上是一位今已不多的「古典」共產黨人。

四

「黨史筆記」從個案、微觀入手，漸成體系，何老不能不對官方的中共黨史體系提出質疑。全書初版最後兩章即為「延安整風創建了中共黨史編纂學」，分為上、下兩篇，七十餘頁。

作為「古典」共產黨人，何老對馬克思、恩格斯真心服膺，對列寧則有不贊同處，對斯大林則基本不贊同、甚至認為他背離了馬、恩的思想、理論。所以，他在本書再三再四強調「延安整風學的是斯大林理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並以專門一篇、30頁的篇幅論證此點。此篇標題就是「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認為延安整風是「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提法與實際不符」，具體論述了「整風中斷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熱潮和延安的理論繁榮時期」，「延安整風使學習馬克思主義之風日下，反而增加不少扭曲和誤解」，「中共自身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優良傳統也遭到損害」。

他認為「延安整風不能稱為也確實不是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因為普遍整風的學習材料中，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著作，還特別是由於把斯大林的理論誤認成發展了馬

克思主義，所以整風學習，毛澤東明確規定，『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因為照他說，『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延安整風「不但學習內容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理論，而且整風中特別是整風後期實際上執行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的原則」（上，第274、275頁）。

毛澤東所說的「聯共黨史」，全名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著、經聯共（布）中央審定了黨史正式課本，斯大林親自撰寫了其中一節，於1938年在莫斯科出版。此書主要內容是對1883－1937年聯共（布）建黨、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三階段作了全面總結。其背景是列寧逝世後，俄共（布）黨內高層爆發持續鬥爭，斯大林逐一擊敗他的對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取得了黨內最高權力。托、季、加、布等都是「老布爾什維克」，威望甚高，斯大林通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建構一套嚴密的黨史話語體系，使全黨統一認識，在聯共（布）黨內，始終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只有斯大林作為列寧最忠實的學生，繼承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道路和路線，同形形色色的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分子在黨內的代理人做了堅決鬥爭，最後取得勝利。斯大林與他們的鬥爭，並非權力之爭，而是關係到聯共（布）生死存亡的階級、道路、路線鬥爭。從道義上、意識形態上剝奪了對手的正當性，真正確立了自己的正當性。

眾所公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傳到延安後毛澤東如獲至寶，他曾對幹部們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解放軍報》1978年12月28日）因此，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收集資料編輯《六大以來》起，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整風一直貫穿着中共黨史論述。

何老認為：「《歷史決議》不僅為研究中共黨史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而且也為黨史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了基本框架，使黨史研究有所遵循和制約，成為官方黨史學的經典。」在這兩章中，他以充分的資料說明「《歷史決議》並不是單為開創一門學科而作。它主要的還是給三年多的延安整風作總結，體現出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應該說，六屆七中全會和它通過的《歷史決議》，完成了它們的重要歷史任務，實現了全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延安整風所取得的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當然也適用對於黨史的認識和研究。因此，有了《歷史決議》，作為一門正式的亦即官方的黨史學就已呼之欲出了。」（下，642頁）

他強調，黨史研究的生命力在於「求真」，希望黨史成為一個開放體系。

這部「黨史筆記」，是何老在生命晚年的反思、探索，也是他矛盾、複雜、豐富的心路歷程的展現。他是大時代中的弄潮兒，無論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如何劇烈，但終其一生，他的內心深處，一直堅守着十五六歲時懷抱的理想、信念：救亡愛國、民主自由平等。他始終不渝地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人聯合體和人道主義思想，所以越來越堅定地主張民主自由，因此無比懷念中國共產黨曾鮮明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理想。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是位「古典」共產黨人。



代前言

何方談他的黨史研究

【宋以敏注】何方去世前近二十年接受的各種訪談，絕大多數都以中共黨史為主題。在下面的兩篇訪談中，他說明了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原委，張聞天作為總書記在黨史中的真實地位和作用，關於延安整風所確立的毛澤東個人迷信對國家發展的深遠影響，以及在共和國佔主流地位的「黨史編纂學」特徵。

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2月對何方的訪談*

違心揭發批判張聞天的負罪感

問：您在《談史憶人》這本書中說「廬山會議後違心批判張聞天，想以研究張聞天為自己贖罪補過」。當時您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如何批判張聞天的，為何有如此大的歷史負罪感？

何方：我今生犯了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一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不管是什麼場合，人應該說真話，不能說假話。不能把好人說成壞人。但是在當時，你是站在毛主席那邊，還是站在張聞天這邊，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後來發現毛主席也不一定正確，他的

* 本文是2010年12月16日由何方改定的訪談稿，該報最終未能發表。曾收入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的何方著《黨史真相》一書中。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已於2017年結業。

錯誤也很多，我這才認識到自己當時的錯誤是多麼嚴重。所以也不能完全說我是被逼迫的。

我從1949年開始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十年。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和自己設法過關的私心雜念，對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

在那次外事會議上，我的思想展開了激烈鬥爭。首先必須硬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按：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全面情況我們並不了解。以偏概全，顯然是錯了。但是對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雖然有些和我關係較好的老同志如姚仲明等給我講過去的歷史，可我在十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着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特別怕開除黨籍。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所以經過三四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堅決跟着毛主席和黨中央走，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對於揭發的內容和尺度，我內心定了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既不是大家追逼的重點，也怕說不清楚；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知道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了不得，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嗡，比例失調如何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等。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出了這些私下談話、

多是我們一起散步時的議論，還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着幹。

我是同張聞天關係最親近的人之一，我揭發和別人不一樣。別人都是周邊的，我卻被看作張聞天的親信。所以等我一發言，主持會議的陳毅就接着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可見我發言的份量之重，所以我確確實實犯了嚴重錯誤。

問：您對遵義會議所確立的黨中央領導提出了不同看法，依據是什麼？

何方：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隨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敍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後，緊接着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

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使他從

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

恢復了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貢獻

問：您主張恢復張聞天長期被埋沒和抹殺的歷史貢獻，具體是怎樣的「貢獻」？

何方：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

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裏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在紀念張聞天85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

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要承認，這一時期，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一直有一種說法，毛澤東雖然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實際上是新領導的核心，因為一切重大問題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後定下來的。如果

是指某些具體軍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如指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情況卻並非如此。這只要對《張聞天文集》和《毛澤東文集》這個時期的文稿以及兩人同一時期的《年譜》作一對照，就可明顯看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張聞天，而不是毛澤東。

主流派黨史研究重「實用」輕「求真」

問：為什麼您在進入耄耋之年，還要放棄從事過50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而改行研究黨史？

何方：我在「揭發批判」張聞天後，一直感到內疚，認為是個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錯誤。1979年我隨張聞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着要設法贖罪補過。並逐漸形成一個想法，要在離開工作崗位後投入對張聞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辦了離休手續，隨即完全改行，一面學習，一面也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由於張聞天是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研究張聞天不能不學習黨史。

問：中共黨史研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何方：現在所說的中共黨史研究，一般都是從延安整風開始的。中共黨史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中共黨史作為一門學科，無論是它的創建還是發展，可以說都是和胡喬木分不開的。我和胡喬木很少接觸，又沒研究，所以談不上對他的什麼評論。但是由於要談黨史，就不能繞開他。胡喬木是創建中共黨史主流學派的主要當事人。在我們國家和我們黨領導的現行體制下，意識形態是由黨直接和統一管理的，政治性特別強的黨史研究就更是如此。所以嚴格地講，黨史研究在國內也就只有一個學派，即胡喬木學派。

首先，胡喬木使中共黨史成為一門完整的獨立學科。第二，胡喬木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貴史料。第三，胡喬木在不少黨史問題上揭開了蓋子，這就比提供資料的意義更為重大。此外，作為中共黨史學官方學派的領袖，在胡喬木的指導和影響下，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黨史專業隊伍，把中共黨史這門學科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但是，黨史從延安整風起就一直貫穿着個人崇拜精神，至今不衰。這既是整風當時所要達到的目的——樹立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神聖地位，也是後來保持黨的領導地位的需要——維護政權的道統和法統，即意識形態的壟斷和行使權力的合法性。

其次，黨史研究存在重「實用」而輕「求真」。古今中外的史學家都強調史學求真實錄的原則和經世致用的功能。我們的黨史學卻在這方面由於受到限制而有意、無意地犯「曲筆」、「失真」的毛病，從而妨礙正確汲取經驗教訓，使不少錯誤一再重演。而且我們特別重視的「實用」和社會功能，除考慮到當前的實際利益，更多地還是為了維護黨的偉大光榮及其領導人一貫正確的形象。採取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捂蓋子，凡是不利的史實、資料就加以掩蓋、保密甚至銷毀，使你無法「求真」。

還有，就是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延安整風以後，我們黨一直實行的是人治，也就是領導說了算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人治會滲透到各個方面，特別是「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黨史更不例外。延安整風中對一些重大黨史問題的定性和重要人物的臧否，最後都是毛澤東說了算，寫《歷史決議》和後來寫黨史，也只能以此為準，不得超越。

對黨史研究的人治，就使研究者不是先去求真、了解實際情況，而是先查說了算的領導言論；不是從史實研究得出結論，而是先有結論，然後找材料編理由進行說明和闡釋。所以我們的黨史研究總是先

出了個什麼「論」，比如論斷、論點、理論；然後就是大批論述、發揮這個「論」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而不許有研究這個「論」能否站住和合不合乎實際的課題。這不但是所謂史從論出，而且勢必導致黨史研究的僵化，變成八股。

此外，還有黨史中的公式化和片面性。一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公式。創造和使用此公式的用意，就是不管定量、不談實際，都要肯定成績是主要的，政策是正確的。二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的公式。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用量化的說法，是不科學也毫無道理的，對某些人用此公式，目的就是企圖以功掩過，逃避歷史批判。各人應功過分明，功是功，過是過，但不應功過相抵，因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三是人皆「完人」。黨史對人物的處理就是「好人全面好，一輩子好；壞人完全壞，生來就壞」。為領導人立傳和寫回憶錄，寫到誰，誰就是完人。

問：造成以上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何方：在現行體制下很難成為良史。中國的黨史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機關幹部，都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有關決議和堅決執行領導上過去和現在的指示，這就失去獨立思考的條件。而且所有重要檔案資料都由專門機關壟斷，想獨立研究只能依靠專業機關和專業人員寫出的成果，以及現代人編寫的各種領導人傳記和回憶錄。

但是，對黨史工作者也不能一概而論。黨史工作者不能寫出求真務實、秉筆直書的良史，有不同的情況。一些人屬於思想認識問題，雖覺得不夠「實事求是」，但還認為不完全錯，因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個人崇拜或維持專制統治。對大部分史學工作者來說，只是隨大溜，按時上班，照章辦事，從事組織上分配的工作。對於事情的真相，有些清楚，有些也許不清楚，但並不深究，不想有什麼創新和突破，只滿足於完成任務。這是做工作，有別於做學問。還

有不少人，確有自己的看法，也明知歷史的真假，但是在官不由己，不能不按官定的路數編撰史傳，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準備一旦有條件時再說。不過也有些人到後來已近乎大徹大悟，談了許多歷史真相和新的認識，卻不願意落筆成文，即使別人幫他整理出來，他也會刪掉不發，原因就是愛惜羽毛，要保護他一生完整的形象。

問：黨史研究未來該怎麼走？

何方：要使黨史有可能成為「信史」，有兩個客觀條件是需要的。一是實現公開性，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應當讓黨的活動和各級領導人的情況都盡可能為黨內外群眾所了解，黨的歷史檔案也定期公佈，使研究黨史的人有條件去求真務實。像我們這樣，紅軍時代和延安時期的黨史資料，都一直作為絕密材料保存，恐怕不能說是正常的。二是做到言論自由，解除對黨史研究和解釋權的壟斷，以便在自由討論、百家爭鳴中接近和求得真理。而這兩個前提條件，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有可能實現，所以必然會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

要出「信史」，單有客觀條件是不夠的，主觀因素也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在封建專制時代也會出「良史」和「信史」。可見，史學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境界和學術操守，也是極為重要的。當代的許多學者也常講到，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或者要有史學良知，即使不能完全說真話，但也決不說假話。這些看來簡單，但完全做到也很不容易。我自己在延安搶救運動和1959年反右傾兩次政治運動中，就沒能守住這道防線，成為終生之恥。

但是應該相信歷史的進步，無論經過多少困難和曲折，我們的黨史終能成為信史，許多問題也終會大白於天下。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維江 2008 年 6 月 7 日陪同漢堡大學漢學系的舒秦玉鳳（Yvonne Schulz-Zinda）和柏林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陶阿美（Marie-Theres Strauss）來何方家訪談

關於延安整風

問：看了您的文章《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能談談延安時期的個人崇拜之風對當時的學術研究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何方：起到了樹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作用，實現了統一思想和輿論一律，也限制了獨立思想和個人自由。而且延安整風還確定了中國的發展模式，政治也好，經濟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這些方面都基本固定下來了。當時參加延安整風的人雖然不多，但他們在共和國成立後成為各條戰線上的工作骨幹，這套東西一下子就搬用到了全國。我有一個估計，延安整風對中國的影響會起碼持續一百年。有些人不太同意，說一百年太長。我看一點也不長。延安整風從1942年開始，到現在已經快七十年了，影響再延續二三十年大概沒問題。延安整風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超過了辛亥革命、超過了五四運動。辛亥革命只是推翻幾千年的帝制，把溥儀從皇宮趕出來了，別的變動不大，對中國社會發展影響不大。五四運動是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還是一個愛國運動，影響大一些。西學東

* 訪談稿由何方改定。曾收入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的何方著《黨史真相》一書中。

漸，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軍閥。那時啟蒙和救亡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沒有深入到社會底層。一個革命，一個運動，對中國的社會進步都有推動作用，但不持久，更不徹底，成果都有限。因此中國直到現在也還需要補啟蒙的課。

問：回過頭來再看延安整風運動，您有什麼樣的感想？

何方：我是參加共產黨已經70年的黨員，黨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並不是我和同我一樣的人當年追求的理想。毛澤東有他的功勞，但在我看來，他對中國的發展，起了相當不好的作用。發動延安整風，固然有助於奪取政權，但也留下負面影響，就是大搞個人崇拜和確立專制體制，國家不民主，個人沒自由。這當然阻礙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至今中國人民仍然享受不到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連我寫的屬於體制內的書都出不來，只得拿到香港去出版。這都是從延安整風開始一直搞下來的。五四運動和軍閥混戰的時候，中國的言論還是有點開放的，還有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不管是哪一個軍閥，都管得不緊，甚至可以罵他們。當然，罵得太厲害，他也可能把你暗殺了。(笑)但整個來說，是比較隨便的。後來不行了，國民黨就開始緊了。但我們比國民黨還要緊。國民黨專制，我們比它更進一步。毛主席說，魯迅要是還活着的話，如果不想坐監獄，就只有保持沉默。所以從延安整風開始搞的這一套，是個人崇拜的人治和一黨專政的專制。

問：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的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從蘇聯斯大林那裏學來的？

何方：搞運動的形式倒不是從蘇聯搬來的，主要還是毛主席的發明創造。但使用手段，也就是理論武器卻是從斯大林那裏學來的。現在中國對延安整風運動有爭論。中國黨史的正統學派，即主管黨史和文獻的兩大部門，特別是宣傳和教育系統，他們認為整風運動是整斯大林的風、整共產國際的風、整蘇聯的風。我認為根本不是這樣，而是使用蘇聯的那一套辦法整自己黨內的人。當時我們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主要是《聯共黨史》和斯大林的文章。毛主席明確宣佈，整風要以《聯共黨史》作為主要材料。當時我自己學，後來也給人家講《聯共黨史》。

問：您在延安的時候就開始講《聯共黨史》？

何方：我一直講到解放以後，不信您問她。

宋以敏（何方夫人）：他是老革命。我參加革命晚，是新革命。(笑)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外交部的時候，他給我們上過大課，講《聯共黨史》，還講如何欣賞《紅樓夢》。那時他當了外交部的學習委員會委員，我是外交部新聞司的工作人員。

何方：不能說整風運動是反對斯大林，而是用斯大林的那套東西來整不同意見者，整黨內的不同意見者。有些人不見得有不同的意見，但也要把他們整服，這樣大家就都得服從毛主席了。

問：整風運動不是針對知識分子，而是針對黨內不同意見者嗎？

何方：當然也整知識分子。不過一般知識分子只是在普遍整風中，特別是在抓特務的搶救運動中挨整。被整成「特務」的往往佔一大半。不但延安整風，而且此後多次運動都在整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思想活躍，容易有意見，社會關係也較為複雜，所以毛澤東一生都敵視知識分子，總要想方設法整他們。整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們改變思想，都信仰毛澤東思想、成為毛澤東的馴服工具。但延安整風主要還是整那些曾經不服和以後可能不服毛澤東的當權人物，如像周恩來、彭德懷等，說他們是經驗主義；還有被說成教條主義的張聞天、博古等人。整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他們聽話，服服帖帖，指東打東，指西打西。

問：王明？

何方：整風也整到王明頭上。但整風一開始，首當其衝的是張聞天，有很長時間沒有以王明為主要對象。王明實際上沒權。共和國成立後提出有王明路線和王明宗派，其實是歷史上的假說。中國黨的歷史上有過「左」傾路線，但是不存在王明路線。王明路線是後來才編出來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誰也沒聽說過王明路線。1952年開始出《毛選》的時候，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毛選》第二卷的附錄，這時候毛澤東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提出有個王明路線，沒人反對，於是就定下來了。

1931年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當上了政治局委員，沒有當成常委。本來共產國際派了米夫(編按：Pavel Mif，1925年起歷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校長，1927年起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來，是想把他弄成常委，但是被周恩來反對掉了，所以他連候補常委也不是，在那個時候不可能起太大作用。當時他的職務是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書記。幹了什麼事呢？就是把上海一些區委書記給換掉了，換成他的人。那時共產黨的真正力量在蘇區。蘇區的工作分工歸周恩來管。四中全會以後，中央真正管工作的是周恩來。王明當政治局委員當了大概三四個月，就到蘇聯去了。後來呢，他一直在莫斯科，連紅軍長征的情況他都不知道。因為共產國際批准了中國紅軍可以離開中央蘇區。後來，電訊就中斷了。遵義會議也好，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好，詳細情況，王明和莫斯科都不知道。

紅軍長征以後，和共產國際的聯繫斷了。恢復聯繫，已是紅軍到達陝北的時候。林彪的堂兄張浩是工人運動的領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成員。他打扮成商人，從莫斯科出發，穿過蒙古到了陝北，這樣才聯繫上。和共產國際一段時間斷了聯繫的好處是，中國共產黨可以自己說了算。開遵義會議，選舉中共新領導人，共產國際當時不知道。遵義會議把毛澤東提成常委，但還不是領袖。會議以後，軍事上的最高領袖是周恩來，政治上的集體領導的核心是張聞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總書記，共產國際就不知道。共產國際一直不支持張聞天，他們支持的是毛澤東。等恢復聯繫後，張聞天就當不成總書記了。

在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沒權。遵義會議以後，他有發言權了。因為他是常委，可以發表意見。現在說遵義會議後一切事情都是他管了，那是假話。你現在翻開毛澤東的選集也好，毛澤東的文集也好，1935年，甚至還有1936年，他並沒有決策性的文章留下來。這兩年，黨的路線從內戰轉變到抗戰，轉變到和國民黨合作抗日，這些大事，留下一些文件，沒有他的份。這些文件都是張聞天起草或主持起草的。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這也是造假，根本不可能。因為全軍他領導不了，有周恩來在。而且周恩來也只能管一方面軍。四方面軍，是張國燾在管。連陝北有沒有紅軍，中央都不清楚，當然更談不上領導。那時，和中央根據地的項英、陳毅他們也已經斷了聯繫。

問：那麼，在您看來，整風運動只有一個目的？

何方：這個目的，照現在的說法，就是樹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確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作用。就這麼一個目的。為了這個目的，一個就是把反對他的或是不同意他的力量、或者是看不起他的力量壓下去。另一個是降服知識分子。

問：整兩批人，為的是一個目的，都是因為這些人具有獨立思考精神？

何方：那倒不一定。不過被整的一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很多人確實對自由、平等、博愛有所追求，都重視人權。整風時把這些說成是資產階級的迷信，知識分子也被劃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經過整風的知識分子就不信這些，只信毛澤東思想了。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一篇講話——《改造我們的學習》，說知識連狗糞都不如，

知識分子更不如工農了。他看不起知識，看不起知識分子。他對中國的歷史和典籍非常熟，對外國了解不夠。他既很少讀外國的書，也不想多了解外國的實際情況。

問：在延安您已經認識張聞天了？

何方：認識是認識的，但談不到有什麼關係。因為我那時候很小，延安整風的時候才20歲，在抗大教人家馬列主義，一邊學習，一邊教書。

問：抗大是怎麼整風的？

何方：整風可厲害啦，一開始叫作一半時間整風、一半時間工作或者學習業務如俄文。上午工作，下午學習。後來由於整風重要，工作可以不幹。那時陝甘邊區不到150萬人，脱產幹部有三萬多人，還不算駐軍，因此老百姓負擔不起。毛澤東一看這樣下去不行，所以才有大生產運動。實際上這也花不了多少時間。那麼，大部分時間就用來整風了。我在延安吃了點小虧，但是也佔了大便宜，(笑)有時間學了點知識和文化。

問：當時延安的文教學術機構有多少？

何方：有很多。有幾個系統，軍委系統的是抗大，後來改成軍事學院；馬列學院歸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下面有宣傳部，管一些藝術學院；還有行政學院，培養區級幹部；還有青年幹校，培養青年幹部。

問：這些學院的整風方式方法有沒有差異？

何方：基本上沒有區別。一開始是「四三決定」。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有一個決定，決定進行整風學習，學習毛澤東的報告、康生的報告、斯大林的一些文章。當時學習，規定以《聯共黨史》為主要材料。

問：是不是還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何方：那個根本談不上。因為學不懂。整風學的東西很有限，文件也有限。普遍整風的學習材料中，沒有一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分兩部分，一部分跟國民黨，一部分跟共產黨。到共產黨這邊的，一部分到新四軍裏去了，上海一帶和華南的一些知識分子參加了新四軍。其他大部分到了延安和華北敵後根據地。那時我們開玩笑説，參加革命是要自己花錢的，因為路費要自己出，衣服、被子要自己帶。我們是扛着自己的行李去參加革命的。

問：除了聽報告，整風還有哪些方式方法？

何方：延安整風有兩套。一套是上層整風，名稱叫兩條路線的鬥爭。上層整風在方式上是開會，批判，揭發，自己交待。毛澤東被説成有一條正確路線。別的都是錯誤路線。誰當年跟了錯誤路線，就要自己做檢討。這就整到了張聞天、整到了博古、整到了王明、整到了王稼祥、整到了周恩來、整到了彭德懷等等。整得相當厲害。本來你幹得正確的事，也説成是錯誤，老挑你的毛病。當時的説法是，成績、功勞放在那兒跑不了；缺點一定要挖出來。

還要寫檢查，口頭檢查之外，還得寫出書面檢查。毛澤東説自己也得寫一點，實際上他沒寫。張聞天寫了很多。王明裝病(不是裝病，實際上是真病，只是病重病輕不好説，多少有點賴賬吧)。因為現在都保密，這些檢查看不到。規定都得寫，這是毛主席的原話。是鐵的紀律，一次寫不好，寫第二次，直到上面滿意為止。往往是檢討得過了頭，把自己説得越壞，別人越認為態度好。

下層怎麼整法呢？和上層就不一樣了，主要內容是搶救運動。先是半天學習，還有勞動，大概搞了兩三個月之後，學習就停止了。

除了不能耽誤農時種莊稼之外，一天到晚就是整風。寫檢查，查你的過去，這一查，就變成了搶救運動。事情說不清楚的，經歷沒人證明的，都成了問題。有些人只好承認自己是特務。這樣做的結果，就把人的思想搞亂了，把你以前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搞亂了。當然也可以說沒有搞亂，那就是，你更相信也只相信毛澤東思想了。

問：那個時候敢不敢懷疑這種做法？

何方：敢懷疑，但不敢說。當然，各種想法都有。例如整到自己，明明知道是整錯的，但是相信將來一定會搞清楚；黨是偉大的，是有壞人在起作用；毛主席不清楚，聽信了壞人的話，等他弄清楚之後，就會給我們平反；現在只是受點委屈，對於不實之詞，先承認算了。搶救運動完全是胡來。長年累月整風，人都皮了，整風文件也懶得學了。一年到頭就學那幾篇文章，背都背得下來了。大家就看小說，中國小說看完了，就看外國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或者塞凡提斯的作品，或者什麼亂七八糟的，都看。大家開始比賽誰看小說看得多。我們就是這麼幹的。很難說有正氣，情緒也不高。搶救運動後來進行到甄別階段。正在這個時候，日本人投降了。這是絕對沒想到的事，起碼我們這些在延安的中國人沒意料到。因為我們對蘇聯出兵，美國人搞原子彈，都不清楚。日本人投降以後，大家一下子都解放了。我們可以離開延安到地方上去革命，都很高興。延安整風的種子也就這樣隨着這些人撒到了全國。之後，整人還是用那一套辦法。後來的肅反、抓「五一六」分子，都是用延安那一套辦法：唬人，你是特務、反革命，我這兒有你的材料。實際上是假的。毛主席這個人的缺陷，是看不起知識，敵視知識分子。他提出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這個口號是錯的。他要知識分子向貧下中農看齊。是要變成一字不識才對嗎？按照我的看法，毛澤東的這套做法，使中國起碼落後了30年到50年。因為在1955年，我們中國的GDP，在全世界

的國內生產總值裏邊佔4.7%。到了1980年，折騰得剩下了2.5%；而日本，1955年是2.5%，到了1980年，變成了10%，一下子超過了我們。我們變成他的四分之一。

問：延安整風對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學界的一些運動有沒有關聯，比如說1954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評？

何方：這倒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延安整風的最大後果是把人的思想束縛起來，不能自由思想。必須按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辦。作品只能寫正面，不能寫陰暗面；只能寫工農兵，不能寫知識分子自己。所以，延安整風的一個最大缺陷，或者缺陷之一，是使中國的知識單一化。我們把蘇聯的那一套搬來，抹殺了人們的創造性。結果在共和國成立以後再也培養不出來幾個新的大師級人物，有些原來的大師級人物後來也寫不出大師水準的東西了。比如說曹禺，23歲寫出來《雷雨》，後來又有《日出》、《北京人》。他解放以後寫出的東西都沒法和這些作品比。他臨死前，吳祖光去看他，指出他的問題就在於太聽話。曹禺很後悔。吳祖光自己倒是不聽話，但變成了右派。而他24歲的時候就寫出了《風雪夜歸人》這樣的名劇。田漢也是這樣，解放以後只寫了《關漢卿》和《白蛇傳》。到「文革」時，這樣一些有才幹的人，更被打成了「叛徒」、「內奸」、「反革命」。文學凋零，一直到現在都起不來。延安整風對中國的文學影響很大。

問：您在蘇聯做大使館的研究室主任，對蘇聯的印象如何？

何方：我在研究室，有兩段時期，第一段是斯大林時代末期。我是1951年去的，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在斯大林時代，我們一切都學蘇聯。連文學也是以蘇聯文學為楷模，包括《士敏土》、《日日夜夜》、《鐵流》這些在蘇聯都不算最高水準的文學創作。解放後，劉賓雁給蘇聯的報告文學專家做翻譯，自己也成了報告文學作家。

問：您在研究室研究什麼問題？

何方：研究蘇聯的內政外交和國際問題，如朝鮮戰爭。

問：您在蘇聯的第二段呢？

何方：第二段是赫魯曉夫(編按：Nikita Khrushchev，1953–1964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時期。他把以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否定了，把斯大林推倒了。斯大林死後不久，我們就發現蘇聯突然反對起對沙皇俄國時期帝王將相的個人崇拜，不久又發現蘇聯領導人的掛像數量和排列發生變化，報刊上長篇累牘地出現反對個人崇拜的文章，等等。一時間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俄文，準確譯法應是個人迷信) 成為研究室和使館其他部門同事們的中心話題。我們就此寫出的十幾篇研究報告，是最早介紹反對個人崇拜問題的。這些報告當時就引起中央和毛澤東的極大重視。

斯大林那一段對我們的危害極大。我們一切照搬蘇聯。比如大學體制，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就是學蘇聯的。把清華大學變成了工科大學，在北京剩下的唯一綜合性大學只有北大了。跟蘇聯太緊的另一面，就是打倒美帝。教育上也是如此。我們就是把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乾脆取消了。其實很多真正的革命者是燕大出來的，比如黃華、韓敍、李慎之，都是燕大的。燕京奉行的是自由主義。不管你是誰，只要是它的學生，就都受到保護。國民黨特務去抓人，他們進不去校門，所以共產黨在那裏可以活動。有人統計，在大學生裏出的革命者，燕京大學一時超過清華，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一時超過復旦。1952年院系調整的結果就是這樣，要打掉美國的影響，學習蘇聯「先進經驗」。

剛剛談到共和國成立後出不了大師，除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和專制的嚴格約束外，大學體制的變化也是其中之一。一直在大學當教授的馮友蘭先生算得上一位大師。他到了晚年才恢復自我。他本來有自我，但解放後失去了自我。我原來就沒有自我，沒有失去自我的問題，也就沒有恢復自我的問題。但是我起碼要把過去走過的道路梳理梳理。你們看我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就是梳理的結果。

赫魯曉夫把斯大林推翻了，中國一開始不太願意承認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尊重斯大林。毛主席認為斯大林是一把刀，列寧是另一把刀，一共兩把刀。這兩把刀是專政的武器，不能隨便丟，所以斯大林時代的事情就不能揭露。其實，赫魯曉夫自己也沒有把斯大林時代的全部問題，尤其是體制方面的問題，都揭露出來。我們只看到了斯大林製造冤假錯案這一條。我們在使館的時候，在斯大林去世後不久，曾在一家醫院遇到一些犯人，他們是剛放出來的院士或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瘋瘋癲癲的。有位朋友告訴我們，這都是一些被押到監獄裏的高級知識分子，斯大林一死，放出來了。我們了解到蘇聯在斯大林時代的缺陷，就是隨便抓人，隨便殺人，肅反擴大化。其實不止這些。毛主席不懂，還是斯大林那老一套，有許多就支撐到現在。

問：你們在蘇聯的那些年，跟蘇聯學術界有沒有來往？

何方：有來往，但是不敢亂説。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以後，蘇聯整個的國家機器沒變，一切都還是照舊。克格勃（編按：蘇聯秘密警察KGB）還存在，他們學術界説話相當謹慎。後來我當了中蘇友協的副會長，率領代表團去訪問蘇聯，這個時候才發現他們可以隨便講話了，這已經到了1984年。我看到列寧格勒改成了聖彼得堡，覺得很奇怪，對他們説，這可是一個英雄城市，列寧格勒圍城很有名。可一位蘇聯學者説，列寧格勒所有最好的建築都是沙皇時代造出來的，名字應該改回來。還有人説，要是不成立蘇聯，説不定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問：1955年回來以後，您就到了外交部，做張聞天的秘書？

何方：不是秘書。我跟張聞天工作有十多年，他當省委書記，我當省青委副書記，那個時候還沒有青年團，叫青年工作委員會。他當大使，我當研究室主任。他當外交部副部長，我當辦公廳副主任，實際上帶有助手的味道，但從來沒當過他的秘書。

問：他是否常跟您談對時局的看法？

何方：談國際問題。中央的事情，絕口不談。中國領導人有這麼兩條——這是王稼祥夫人在書上寫的——中央過去的事情一概不談，中央當前的大事也一概不談。

問：那你1955年回來以後，正好趕上批胡風，您要參與批判嗎？

何方：那是知識界的事。我當時以為確有其事。到底胡風犯了什麼事情，我不清楚。毛主席說他是反革命，我沒有根據說他不是。我自己沒有被捲進去，就不錯了。當時就是這麼想的。我沒有批過人，沒整過人。一碰到運動，我就躲得遠遠的。張聞天對我參加運動也沒有要求，他自己都懶得去管那些運動，所以運動來時我還是抓業務。我雖然不是他的秘書，卻比秘書還要高一級。一直到現在，我敢吹牛，全世界了解張聞天外交思想的，我是第一人。我寫的文章他可以一個字不改發表出去。他在布拉格使節會議上的講話，我寫出來幾頁，他就拿到會上去念幾頁，思想合拍到這種程度。所以人家要說我是他的秘書，秘書就秘書吧，無所謂。（笑）

問：您感覺那個時候張聞天痛苦不痛苦？

何方：那當然痛苦，毛澤東是有意侮辱他。所謂當大使，那是外放。張聞天是政治局委員。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由現任政治局委員當大使，回國後又只當了個副部長，這種事情，以前沒有，今後也不會

有，所以我稱作空前絕後。這是對張聞天的一種處理辦法。1951年劉少奇帶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代表團成員裏沒有張聞天，這也是空前絕後。一個駐蘇聯大使，又是政治局委員，卻不能參加專門到蘇聯參加他們黨代會的中國代表團。這種事沒他的份兒，那他心裏的感受可想而知。

問：您跟胡喬木、胡繩這樣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人有交往嗎？

何方：有過來往，但不多。我在蘇聯的時候。胡喬木正好在蘇聯養病。當時不是一切要學習蘇聯嗎？他也學得非常細。比如找我去談過這樣一個問題：五一節和國慶日，滿街都是人，上廁所他們是怎麼解決的？又如，他曾寫過一封信給我，裏面說到，什麼時候中國能出個《契訶夫全集》就好了。我跟胡繩的接觸多一些，有時還和他開個玩笑。比如我對他說，我們一方面正在西化，因為實際上西化就是文明化；另一方面又反對西化。我跟他開玩笑說，十六兩一斤，你現在取消了斤，變成了公斤，五百克一斤。老太太能知道一毫克嗎？你改革這些幹什麼？可是這方面的西化又快得很。

問：跟胡喬木談過意識形態上的事嗎？

何方：那他不會，他不會跟人隨便談這些。他要講都是正面的，你也不敢反駁。人家是大官，咱是小小老百姓。

問：那您跟胡繩談些什麼？

何方：跟胡繩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後來胡繩的思想有很大的變化。他說他最後清醒了，我說他沒有，最後也還是糊塗。我說過，中國的黨史研究由胡喬木胡繩學派控制着，說假話，編造。明明毛澤東的奢侈程度超過了全世界的總統和皇帝，哪個皇帝全國有三五十處別墅？你看看正式出版的《毛澤東生活檔案》。在困難時期，他的西餐

菜譜就有七八十種菜。說他艱苦樸素，穿舊衣服，破破爛爛的。其實有些人就喜歡這樣。到美國去搞學術交流，看到一些教授就是這樣，穿個破背心，就上台發言了，根本不講究。

2005年版前言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我六年來學習中共黨史的一束筆記，也算門外史談。至於我為什麼在進入耄耋之年，還要放棄從事過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而改行學習黨史，其中緣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個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過關的私心雜念，對於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事後一直感到內疚，認為是個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錯誤。1979年我隨張聞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着要設法贖罪補過。此後同張聞天夫人劉英以百次計的接觸拜訪中，更加深了我對他們夫婦高尚品德的了解，也增加了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想法，就是在離開工作崗位後要投入對張聞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辦了離休手續，隨即完全改行，一面學習，一面也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由於張聞天是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研究張聞天不能不學習黨史。而學習黨史卻又加劇了也許是老年人共有的現象：對以往的反思和懷念。特別是回想起初參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萬分！

我是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那時確實十分單純，抱着為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決心，真有點不惜犧牲一切，被國民黨扣留關押後仍逃跑出來奔赴延安。進入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也確實看見一派新氣象，開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當時大家雖然生活清貧，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學為樂，以苦為榮。平日所學和所談，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國家前途，自由討論，很少顧忌，還經常引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現譯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可是三四年後，開始了延安整風，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確立毛

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把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風當作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表現給基本上整掉了。我們當時也確實自覺地進行改造，力爭使自己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加之整風中又來了一場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思想有點麻木，頭腦也更加簡單。從此就一直跟着毛主席幹革命了。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近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群眾了。究竟是誰在專誰的政？尋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風。因為延安整風不僅如李維漢所説，教育了「老長征」和「三八式」整整兩代人，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更重要的還是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它既有助於革命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也導致了共和國成立後三十年的經濟文化落後和不斷的政治運動及其帶來的各種災難。例如胡喬木就説，「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風正是學斯大林理論，照搬蘇聯一切，並有自己的很大發展。現在我們雖然實行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卻仍然嚴格堅持延安整風定下的模式，使我們在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條腿(還不完全)走路。這恐怕絕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而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實在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其影響之大之久，恐怕要超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在學習黨史中，重點從張聞天轉向延安整風的原因。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熱愛革命、熱愛黨和熱愛祖國的初衷，本着「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來就是敬候批評了。

還有幾點需要説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書內的只是一批學習筆記，各自成篇，沒求系統，因此不完全連貫，在引語和舉例上也就難免重複。第二，本書所用資料均為公開文獻和別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閱檔案，也無力跑圖書館，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書和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書刊，幾乎完全是一個人閉門造車，錯情必定不少。第三，本書每篇成文後曾分別送請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學閱提意見。例如頭兩篇（也只是這兩篇）就曾送劉英同志審閱並得到她的認可。還有幾位老朋友對每篇都經過認真閱讀，提出寶貴意見。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我內心的感謝。

何方
2004年12月30日



第一章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 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2] 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

* 本章原發表於《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1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譜）》[3] 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敍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後，緊接着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卻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4]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裏就有這樣

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

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共六任領袖新視面》，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頁。

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緊接着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充說，「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要求。」[5]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的種種困難。」[6]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像或延安整風後才有的提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權限也沒有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掛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說：都得這樣寫。

5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頁。

6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71頁。

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或回憶為準，那1959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紙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是並不兑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懷疑，即：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7]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不可靠。

7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頁。

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些辨析。

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征到達哈達鋪，中央才了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8]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

8 《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9]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10]毛澤東也只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週至少開會一次。[11]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長征史概述〉、〈第一方面軍長征史〉，《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24頁。

11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24頁。

只是組員之一。[12]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13] 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14]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15] 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

12 《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頁。

13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4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5 此乃原件標題，日期署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義會議文獻》摘錄發表時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此後即被通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16]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

16 關於總書記問題擬另外討論。這裏先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第一，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恐無問題，因為包括毛澤東在內許多中央領導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這樣稱呼，張自己在《反省筆記》中也多次提到出讓總書記的問題，連劉英1937年去蘇聯治病也是用總書記夫人身份；第二，張任總書記是遵義會議上大家的推舉，因他一再謙辭，才拖延到後來行軍路上交接，這與會後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助手不同；第三，六屆五中全會設書記處當是事實，因為會後不久就不斷以書記處名義發指示和向國際報告，長征中和到陝北後仍然如此。因此，陳雲多年後說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中央都沒設書記處或常委顯然是記憶的錯誤。

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17] 何況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後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18] 而「左」傾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准，還力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

17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92頁。

1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天，中共代表團也來信說，「莫斯科很不滿意」，還一再通報國際對毛澤東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極為重視，說「國際已將毛同志作為中共和蘇區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傳和肯定了」。[19] 其實，在這之前國際對毛澤東的宣傳就很多，而無論以前還是以後對張聞天都沒有什麼宣傳。

至於說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並非出於多數人的意願，「大家都擁護毛主席出來領導」，「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但是毛澤東說服了大家，「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20] 這種說法大約只會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碼也是延安整風以後，在遵義會議時是幾乎不可想像的。而且事實上，所有這些，在延安整風中專門清算歷史問題時都沒有特別涉及，可見這些說法只是出於一些人事後的認識或某種需要。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卻是當時各種具體條件決定的，帶有很大的歷史必然性。

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裏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按照毛澤東的定義，「為首」就是召開會議。[21] 可是遵義會議後的幾年裏，毛澤東並沒有召開和主持過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各種大小會議。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經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說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只是延安整風後一些人使用的一種抽象說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

19 趙蔚：〈共產國際與遵義會議〉，載《國際共運》，1985年第4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頁。

20 《遵義會議文獻》，第68頁。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頁。其中講到「為首」問題時說，「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即使黨的一個小組，如果不舉出一個小組長，那麼這個小組就開不成會……為首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

指導下舉行的，也許還說得過去，但談不上領導，因為他既未召開和主持，也未做報告和結論。至於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則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據張培森同志統計，前後多達137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22]王雲、[23]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2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於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中央會議有較嚴格的區分，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後則一律用「主持」。這是講求分寸和實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寫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25]正是這一例外恰恰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後形成的慣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會議（政治局和常委）都由總書記張聞天召開和主持，如無特殊情況，毛澤東是不會違背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會議的。而且當時擔任政治局會議記錄住在張聞天隔壁的李華生、也與張聞天為鄰並列席這次會議的郭洪濤、開會時在場並作了簡單發言的張聞天夫人劉英，都一再證明和堅持認為，13日會是由張聞天主持並在他的住處舉行的。[26]

22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鄧力群紀念張聞天文章上的批語。

23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2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頁。

25 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郭洪濤：〈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均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幾次訪問劉英的談話錄音和1999年3月2日訪問郭洪濤的談話。

26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81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8–539頁。

1938年以前，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的會議，還不像六屆六中全會後實際上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樣，「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而是認真準備，確定會議議程和報告人，最後往往還要作總結發言，實為會議結論。因為自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後，就竭力發揚民主，推行集體領導，摒棄博古時期那種個人包辦和獨斷專行，所以不但開會多（同外地領導人磋商的電函也多），重要問題會議上定，而且還按所討論的問題由分工主管的人對某項議題提出報告和在討論後作結論。這樣，作為會議主持人，他的最後講話就被稱為「總結發言」。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只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只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後，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裏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紅軍渡河回陝前，毛澤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4月28日致電張聞天，內稱：「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聯的問題。」可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張聞天的職責，毛澤東只可提出建議而無權自行決定。

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係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多通過中共代表團），進行請示彙報、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國黨組織，如向各路紅軍和各中央局傳達中央重要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瓦窯堡

會議等)。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後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1935年2月4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音，也不對全國佈置總方針。」[27]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後，就很快開會討論，作了答覆，隨後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佈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提出建議、交待任務、接受彙報、保持聯繫等)，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陜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陜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陜甘特委為陜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陜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後，「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楊尚昆語。見他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陜北後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毛澤東並沒有管中央和全黨的組織工作，仍然像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所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28]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在其位。這和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情況明顯不同，更不用說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後的情況了。

27 《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第10–12頁。

28 《周恩來傳》(一)，第315頁。

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

遵義會議後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後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種說法，毛澤東雖然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實際上是新領導的核心，因為一切重大問題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後定下來的。如果是指某些具體軍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如指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情況卻並非如此。這只要對《張聞天文集》和《毛澤東文集》(均包括《選集》)這個時期的文稿以及兩人同一時期的《年譜》作一對照，就可明顯看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個形勢和黨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極多，但毛澤東卻幾為空白。有兩件在戰略轉變上有重大意義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卻是張聞天代為起草和發佈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包括十大綱領)，毛澤東從前方覆信給張聞天說，「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即發。」第二件是《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見。[29]如按胡喬木說的辦法，「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30]那麼把六中全會以前和以後的毛澤東文稿一對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了。

29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5、46、5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3–494頁。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頁。

下面再從幾次重要會議中看這一時期張聞天在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代表正確路線一方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現在已得到公認。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減弱張聞天的作用，提出《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的。這一說法的缺乏根據和於理不通是很明顯的。對此，將另有專文論述。

遵義會議後長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軍的會合與確定北上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軍會合後，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幾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如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等，在會上分別作政治報告或結論，並先後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和《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31] 在兩河口會議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前幾天，張聞天就發表了一篇〈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32] 的署名文章，成為最早系統闡述北上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文獻，這就不能說決定和決議的起草是根據別人的發言和意見了(但有些史書上仍說是張聞天支持了「毛澤東的北上方針」，不知有何根據)。此後由於張國燾違背上述決議和對抗中央，張聞天又主持了反國燾路線的鬥爭。直到延安後，有關批判張國燾的報告和決議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陝北，當然是領導集體決定，但肯定有張聞天的重要貢獻。因為從現存文獻看，首先透露出這個意思的就是張聞天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33] 說明他注意這個問題，早有這個意向。其他各種說法，如毛澤東看到《大公報》才知道有陝北紅軍等，可能都有，但卻於文獻無據，仍屬傳說。

3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頁；《張聞天文集》(一)。

32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頁，《張聞天文集》(一)。

3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31頁，《張聞天文集》(一)。

標誌着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後的又一極為重要的會議，準備工作是完全在張聞天主持下，而毛澤東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其實，中央到達陝北後，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就首先提出了戰略轉變問題)。當時由張聞天主持，同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根據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討論確定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相關的策略，然後寫信徵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前方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很快覆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對改變富農策略「基本同意」。當毛澤東回到瓦窯堡三天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召開，張聞天作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報告，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通稱《瓦窯堡會議決議》)。[34] 延安整風以後，一些黨史著作和回憶錄，為了突出毛澤東，往往不提會議的政治決議或者一筆帶過，而大講特講會後毛澤東的傳達報告，[35] 自然是不確切也不妥當的。

頗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12月13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依慣例由分工管軍事和統戰的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由於事出突然，一時發生意見分歧和某種感情用事也在所難免。毛澤東就在肯定事變的積極意義和強調抗日的同時，提出了兩條互有關聯的主張：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二是「除蔣」、「審蔣」(兩天後毛澤東領銜的紅軍將領通電中還公開提出「審

3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會議詳情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86–29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3–494、499頁；張兆憲：〈張聞天對瓦窯堡會議的貢獻〉，程中原：〈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勳〉，分別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第二集。

35 如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等。

蔣」)。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後來的事變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於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還批評了「審蔣」的意見，説「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一個多月後的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也提到「審蔣」的口號不對。這期間留在後方主持大計的中央常委只有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他們密切合作，指導全局，分頭或以「洛、毛」聯名發出了大量電報。張聞天還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徵着黨中央一時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員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運籌帷幄(19日政治局會議舉行的當天就起草和發出14份電報)，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36]只是由於長期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論及西安事變的書籍以及文藝作品仍然不承認他的領導作用，甚至忽視他的存在。

其他一些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如1936年3月的晉西會議，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澤東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問題的報告。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四年間，除以上列舉，黨中央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政治決議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張聞天起草的，更沒有證據説明哪些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

36 以上有關處理西安事變的情況，分別見《毛澤東傳》和《張聞天傳》、《張聞天年譜》和《毛澤東年譜1893–1949》的有關章節，以及《張聞天研究文集》中的〈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等。

這一時期還有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和工作轉變，也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實現的。例如白區工作的轉變就是在他的領導(出主意，用幹部)下進行的，見之於他同劉少奇的通訊和在白區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等。改變青年運動的工作方向和組織形式，取消共青團(少共)的決定，也是張聞天做出的。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如張聞天是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創者。據李維漢説，「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陝北以後，從組成西北工作委員會開始的。」當時張聞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員會，任書記。委員會提供的關於蒙古和回民工作兩個報告的實施，「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37]又如據李華生説，張聞天在抓黨內學習、指導編《黨員課本》時還在中國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38]

從以上列舉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還不能説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是張聞天在履行着名副其實的總書記的職責，並不是什麼「名義的領袖」。

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後，新的領導集體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當時得到公認的，也包括毛澤東本人。下面數例就足以説明。

一、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打交道。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電報，通過中共代表團向國際報告中央到達陝北後黨和紅軍的全面情況。其中談到黨的領導機構説，「現在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

37 轉引自《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170頁。

38 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發、凱豐、稼祥、仲丹(即張浩)、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還要求國際提供經濟援助。國際派回國的代表張浩，也是先向張聞天傳達和彙報，共同商討貫徹國際七大精神和籌備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後來張浩又以駐國際代表名義協助代表黨中央的張聞天，共同處理中央同四方面軍的關係。[39]

二、全國的黨組織都承認張聞天的為首地位。例如1936年9月26日，張國燾等給張浩、洛甫等的電報就說，「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同日任弼時等的電報中也說，「你們提議以洛甫等用中央名義統一黨和軍事方針之領導，……我們認為是最適當的建議。」[40]至於地方黨組織如北方局的劉少奇、上海的潘漢年和馮雪峰，也都是向張聞天請示彙報的。著名的北平草嵐子監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案就是張聞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還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總書記，他的批復，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41]各地來到中央的領導幹部，多按組織關係向張聞天報到和談工作問題(一度在張住延安鳳凰山麓時，有些人還開玩笑說成是進「皇宮」)。如潘漢年、張浩等初次回來還臨時住在張的家裏。潘漢年從莫斯科回來就是由張聞天領他去見了一次毛澤東，其餘都是張了解情況、佈置工作，親自談的。[42]但是至今還有些材料和文學作品(如許多電視劇)描寫當時某些黨的活動家回到中央只見毛澤東不見張聞天，或以見毛為主，見張陪襯。這只能是：或者由於不了解情況，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澤東。

39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6–97頁。

40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36–138頁。

41 《劉少奇傳》(上)，第229頁。

42 幾次訪問劉英的談話記錄，如1999年3月4日，2000年5月16日、18日等。

三、張聞天在哪裏就意味着黨中央在哪裏。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央兵分兩路，兩個常委毛澤東、周恩來去前方指揮打仗，兩個常委張聞天和博古到瓦窯堡安家。在此期間，只能說中央在瓦窯堡，而且不論人數多少，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隨軍行動」，實際上就是指張聞天隨軍行動(有人戲稱為「御駕親征」)。雖然有半數常委(周恩來和博古)留在後方，但卻只能成立中央局。晉西會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於是張聞天就回到了瓦窯堡，中央局也隨之取消。[43]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東征紅軍西渡回陝，並建議在延長舉行政治局會議。張聞天覆電同意，《毛澤東傳1893–1949》就說成是「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和「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44]

四、名次排列多為張先毛後。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順序不很嚴格，特別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紀錄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員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數場合還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後，一般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極少以毛打頭的。要是以常委聯署發電報，大都是「洛、恩、博、澤」，如1936年8月25日致駐國際代表王明電，8月9日致張學良電，多次致朱德、張國燾電等。[45]由於到陝北後毛澤東已成為中央紅軍的統帥，作為黨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澤東緊密合作，所以這一時期他們兩人聯

4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37–50、58、73–74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383頁。

44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81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見第383－384頁)的寫法是：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向中共中央提出……決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又說，「毛澤東、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前方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

45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19、125頁。

名發的電報也最多。據統計，從1935年10月長征結束到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簽署或同別人聯署的電報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聯署的為286份，佔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兩年發的。[46]另據張培森編輯《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後抄送來的材料，這期間署名「洛毛」的電報有220封；署名「毛洛」的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會議以後。1938年二人聯署電報已大為減少，其中署「洛毛」的只有1/3。六屆六中全會後聯署電報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領銜。[47]當然，這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某些傳統做法，如聯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後面，或者非起草者審閱簽署時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的聯署自然會有這種情況。但是第一，會議記錄總不是他們兩人出於謙讓而有意安排的，看來還是有某種慣例。至於少數脱離常規的做法，則可能是記錄者以到會先後為序。第二，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位期間的決議和文件多為他起草，大概不會把絕大多數聯署電報的起草推給毛澤東。而毛的性格也不是總喜歡位列人後。張聞天本人簽發給駐國際代表報告中央組織情況的電報，就以洛、恩、博、澤為序。1938年後的電報則多以毛打頭。這都説明署名先後那時也還是有些規矩的。從這些情況中也可看出領導地位的變動，同時證明1938年前在黨中央為首或處於領導地位的確是張聞天。從延安整風到現在，許多黨史著作，不管什麼場合，都把毛澤東放到第一位，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連寫到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時，明明組長是周恩來，也要寫成毛周王，有的乾脆説成「以毛澤東為首」(如被定為《遵義會議文獻》的伍修權的回憶文章[48])。這就不能説是歷史主義的了。

46 《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頁。

47 張培森1998年3月9日給何方的信。

48 《遵義會議文獻》，第119頁。

五、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遵守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維護會後形成的領導體制。張聞天是個一貫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辦事的人。他在堅持集體領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別認真，可以説在中共黨史上開了一代風氣。他又十分尊重毛澤東，注意徵求和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以致王稼祥譏笑他是個「泥菩薩」，[49]他則以「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相回敬。但在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1937年12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負總責)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1938年，還為反映許多幹部的意見寫信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50]沒有讓毛澤東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曾是張聞天後來在整風中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筆記》中就説，「我還不了解使毛澤東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最近兩年來(按：指六中全會後)所做的那樣。」還檢討他在行使總書記職權中的一些錯誤，包括在「用幹部」上的信任羅邁讓他當中組部長、重用郭洪濤讓他先後任中組部副部長、陝北省委和山東分局的書記等。可見張聞天當時還是有實權真管事的，不像後來那樣「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抹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的作用，或説他只是名義上和形式上的領袖，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毛澤東的性格雖然不願聽命於人，但那時還是遵守紀律的，並無明顯僭越之舉。他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從不自行召開中央會議，也從不自行代表中央發佈政策性指示或談話，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幹部，對這類問題有意見也只是向張提出。直羅鎮戰役後的報捷電報

49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50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頁。

開頭就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51] 在向朱德、張國燾等的通報中也説,「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52] 有些前方來的電報還標題為:「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電報就是「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和國際駐中共代表李德」)。毛澤東要求中央開會討論什麼問題,或建議中央辦什麼事情,一般都向張聞天提出。

這裏只談一下被長期誤傳的關於釋放劉志丹的問題,説明毛澤東還沒有越權行事和獨斷專行。因為這可能又是一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為了突出毛澤東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長征到達陝北後,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釋放劉志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中寫道:「我們到陝北後,我即看出……肅反是過左的,所以很快就釋放了當時被誣陷的許多同志。」但是長期以來,卻被説成是毛澤東。各種史書和回憶錄都説是毛澤東聽了彙報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還有更生動地描述為下令「刀下留人」),釋放了劉志丹等,幾乎從無人提到張聞天。《毛澤東年譜1893–1949》還説成是毛在聽彙報前就已「當即下令」。[53] 在未作調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斷定是冤假錯案而貿然「下令」,這既不合乎毛當時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肅反問題上的一貫作法。而且這時還在派人尋找陝北紅軍,和陝北黨政軍領導機關還未取得聯繫,又向誰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據原始記錄,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風後的「回憶」,就有可能是以訛傳訛了。直到1985年,郭洪濤才在〈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一文中提出,「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他派王首

51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4頁。

5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4頁。

5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4頁。

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一個處理肅反問題,一個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我當時深感張聞天同志開頭這兩炮放得挺好,對他十分敬佩。」[54] 應該説郭洪濤的説法是比較可靠的。因為他是當時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作有關肅反情況的彙報,然後又參加五人小組,特別是還長期為陝北肅反問題受到冤枉,一直申訴了幾十年(他是反對説劉志丹等為反革命的,但卻被定為搞亂捕亂殺的領導人,並寫進了《毛選》1951年版注釋,直到「文革」後中央專為陝北錯誤肅反的責任問題開了座談會、發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選》也作了改正[55])。後來出的《周恩來傳》上也説,「中共中央在聽取郭洪濤、聶洪鈞彙報時就覺察到有問題,決定成立一個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負責處理。他們在洛甫領導下迅速查清了問題,在當月釋放了被錯捕的劉志丹等。」[56] 但應指出,多數史書至今仍沿襲舊説。事實上劉志丹等人是被關押在後方的瓦窯堡的,常委在下寺灣聽取彙報後即分成兩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處理此事。而是到後方的張聞天在查清後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並親自主持了為劉志丹等平反的大會,還代表中央講了話,徹底解決了問題。[57] 毛澤東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從前方致電張聞天、博古,建議詳細考察肅

54 《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頁。

55 1999年3月2日訪問郭洪濤的談話。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372頁)也説,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着爭論。最近,在黨中央領導下,經過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組同原陝北、陝甘邊有代表性的老幹部反復研究、商討,取得了一致意見,……(詳見198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十八號文件)。」

56 《周恩來傳》(一),第370頁。

57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7頁。

反中的問題，説「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58]這都説明，毛澤東在下寺灣會議和出任西北軍委主席後，還沒有以領導自居，越過張聞天從直羅鎮前線下令放人。

其實，當時的張聞天和毛澤東，一個作為總書記，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們的關係也是合乎原則的。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在會上當面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時，他還在書面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窯堡會議上關於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也是決議)中的一個提法，説「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59]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止一次。從毛澤東方面來説，還是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的，而且當時對張聞天的領導也是滿意的，並一再向人談及。如到陝北後常對人説，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作「開明君主」(有時也説成「有道明君」或「明君」)。[60]因而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於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志和熟人的圈子裏稱呼了一陣。直到最近(2000年3月)，劉英還對問及的人談到這個問題，以説明當時同志中親密無間和生動愉快的情況。[61]

5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8頁。

59 《張聞天在1938–1938(年譜)》，第61頁。

60 《毛澤東的人際世界》(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61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

這裏只舉以下幾個例證。

一是同王明的關係問題。由於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中央領導人須由國際決定和批准，因此國際派王明回國就容易被人誤以為是要他來當領袖(事實上，許多國家黨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後被派回國的)。加之王明以欽差大臣、國際代表自居的表現，也確實迷惑了一些人。當時説，王明是斯大林派專機送回國的，行蹤很神秘，停留蘭州時不露面，連對路過此地的蔡樹藩、鍾赤兵、劉英、賀子珍一些高級幹部都保密，同為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反而成了護送人，出面安排飛延安的安全措施。[62]到延安後又受到熱烈歡迎，被毛澤東喻為昆侖山下來的神仙。在隨之召開的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數與會者紛紛進行檢討。連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見」，承認過去黨在實際工作中確有狹隘和不夠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書上説的那樣，毛成功地「頂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傾主張)。這時的政治局大多數，也許對王明還有點迷惑不解，雖不一定真心支持他當領袖，但沒有支持毛澤東和沒有承認他的領導地位，卻是實在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説，十二月會議上他是孤立的，會後半年還對李維漢説，「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63]會議也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在組織上，可能是由於臨行前季米特洛夫(編按：Georgi Dimitrov，1935–1943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的交代，或者是為了拿下張聞天的總書記，王明才提議毛澤東出任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但與會者仍推舉王明為委員會書記。而且政治局委員對通過這一議案還依次簽名，以示鄭重，成為中共黨史上空前絕後之舉。這大概也是王明後來在武漢敢於同中央分庭抗禮的一點誘因。

62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6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的建議，但表決結果卻是多數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個月即回來」。不但中央內部如此，有時對外也表現出雙峰並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來去見蔣介石就是帶着毛澤東和王明兩人的親筆簽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關於「在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指示後，才迅速在中共領導人中掀起擁護毛澤東當領袖的熱潮。所以毛澤東後來在七大會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雖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澤東還是一直說，「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抗日戰爭中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64]

二是黨的其他領導人在延安整風前或起碼在六中全會前，都沒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言論和舉措。一些「擁護毛主席的領導」等說法，基本上都是整風以後才有的。與此有關的是，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證毛澤東，但卻經常引證馬、恩、列、斯(編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即以較早宣傳毛澤東的劉少奇而論，他在1939年所寫被列為「整風文獻」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只是在1962年修訂時才有了大量引證。他在1941年寫的《論黨內鬥爭》，1943年回到延安後又作了校正，也都沒有引證毛澤東。陳雲在1939年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有三處引證毛澤東的報告《論新階段》，但卻不提毛澤東的名字，而說成六中全會的決議。[65]其他如周恩來、朱德等，在延安整風前發表的文章中，都沒有看到有引證毛澤東的地方。整風開始後情況才逐漸發生變化。根本變化是1943年。從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領導人都在文章中擁

64 以上均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65 《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護和歌頌毛澤東的領導，開始把引證毛澤東變為寫文章、做報告的常規，反而很少再引證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黨的組織和領導並沒有注意宣傳毛澤東，毛澤東的文章和言論也沒有引起特別重視。例如長江局就集體決定不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事例，就是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文化發展方向上發生的分歧所持的態度。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代會上，張聞天先做報告，提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天後毛澤東也到會做了報告(後來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卻只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不要「民主的」，顯然是個原則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一年多之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卻只引用張聞天，隻字不提《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什麼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呢？洛甫同志說……」，接着引證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釋。[66]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

四是當時在群眾心目中，毛澤東也並不突出，是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戰初期流行的一個歌子中就唱道，「城頭上站立着兩位大將軍，威風凜凜是哪個？朱德、毛澤東。」而且那時對「領袖」的理解也與後來不同，使用很廣泛，沒有嚴格限制，凡是群眾中帶頭的人都可稱領袖。黨的領袖也並不是只指一個人，根據當時通行的稱謂，大概書記處成員都可稱領袖。給人印象特深的是，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對前來做報告的領導人的介紹，如果是毛澤東，就說，「現在，請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講話。」受到「領袖之一」稱呼的，記得還有張聞天、周恩來、王明等人。這種提法一直延續到1939年。雖然六中全會上已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發言，但在公開場合和群眾中間，還沒有見到單稱毛澤東為領袖的，更沒有聽到喊萬

66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版，第24頁。

歲。連長期在馬列學院和政治研究室這兩個中央機關工作的鄧力群都說，在1942年以前，沒有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67]在群眾場合人們第一次聽到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說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約才開完國民參政會從重慶回到延安來抗大總校做報告。當有人遞條子提問，「為什麼參政會我方七位參政員只有毛澤東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說，「你們下過象棋沒有？兩邊的將帥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不是就要將起軍來了。」不管這一答覆是否妥當，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卻是無疑的。但這已是六中全會以後，也不是直接稱毛澤東為全黨領袖。可見，在延安整風前，起碼在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的四年間，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是沒有得到公認的。

「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來也談到我們黨的五任領袖，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只有八年）。總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澤東之間有個第五代，這是得到全黨和史學界公認的，還從未見到過否認「五朝領袖」說的意見。既然如此，怎麼能無視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說是緊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後來的許多黨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實際上」或「事實上」的副詞，說「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

67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或者「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據和事實，似乎是由於說得久說得多，就不成問題了。而上面列舉的大量事實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說明加個副詞並不解決問題。

有些否認存在「第五朝領袖」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經談過的，說張聞天只是名義領袖，實際領袖還是毛澤東。這是在個人崇拜影響下的說法，並非歷史的真實。事實上無論從組織領導還是從政治決策看，張聞天都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根本不能同向忠發相提並論，也不同於「文革」後鄧小平作為領導核心已經形成並在黨內外得到明確承認的條件下的總書記。二是說張聞天負總責只是從開始確立到正式確定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過渡。這是意在抹殺張聞天主持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偉大戰略轉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實，道理上也說不通。因為在「五朝領袖」換代時都沒有什麼過渡，為什麼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時要有那麼長的一個過渡？而且也不能把張聞天比之於華國鋒。因為鄧小平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談不上一代，就是『兩個凡是』也是繼承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方略。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68]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完備，都不適用於張聞天。因為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以前和以後卻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摒棄錯誤路線和制定正確路線的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當然不能說只是張聞天，但他作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總是不能否認的。三是說張聞天負總責的時間比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這更不成其為理由，因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時間更短。就是江澤民總書記，也是一接任就被稱為一代領導核心的。

68 轉引自《黨史博覽》，1999年第2期，第7頁。

原有論斷既違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損於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

最後要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僅有悖歷史事實，還違背黨章規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有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形象。因為這等於說，黨是老早就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名義上和實際上是兩套，會上的選舉和作出的決定都是表面文章，內幕則是個人獨斷或幾個人的密謀。也等於說毛澤東一開始就居於黨組織之上，不遵守黨的紀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權術，而張聞天則甘做「阿斗」，其他領導人也成了一群「馴服工具」。如果說，遵義會議推舉張聞天當總書記，並不是出於多數人的志願，而只是出於毛澤東的個人安排，那不等於說遵義會議時已經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會議的兩大歷史性決定：改變領導是在他幕後操縱下實現的，「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改變路線的決議又是根據他的發言起草的，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時的做法一樣了嗎？由此可見，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影響是並不好的，只能加深個人崇拜，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看似照顧大局，實則遺患無窮。

根據以上八個方面看來，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既然如此，為什麼經過延安整風會形成這樣一個眾口一詞的結論，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擺脱多年來個人崇拜的束縛，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做到去偽存真，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大家都承認，歷史應該真實（如上引王震的話）。因此，黨史中的各種疑難問題，一切不實之詞，必須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決。但是也要看到，倡導了幾十年的實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實並不容易。

第二章

再談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三個問題



《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嗎？*

《遵義會議決議》[1]是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對中國革命戰爭中形成的正確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思想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它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認的。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誰，甚至曾被誤傳為毛澤東，據說還曾收入1948年有的地方上自行編的《毛澤東選集》。[2]但在共和國成立後正式編《毛澤東選集》時，有人提出將此文收入，遭到毛澤東本人的反對，說那是張聞天起草的。可此說一直沒有向外公佈。第一次公佈《決議》是張聞天起草這一重要史實的，是1979年8月25日在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詞》。《悼詞》中同時還指出，這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3]原由曾彥修、徐達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沒有這些內容。據張聞天夫人劉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重要內容是送審中胡喬木加上的。她說，「胡喬木對悼詞作了修改，增加了這樣一些重要的話：張聞天同志『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他是我黨歷史上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胡喬木的修改得到了鄧小平的批准。」[4]事實上，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選為總書記」1982年根據陳雲意見改為常委分工「負總責」外，起草決議等各點後來就成為黨史研究中的定論，有關黨史的著述和許多領導人的回憶錄都一律遵守這些口徑，同時也都將「總書記」改為「負總責」。

關於《決議》為張聞天起草，已被此後發現的陳雲在遵義會議開過不久的被稱為《傳達提綱》[5]所證實，並為史學界公認，已經沒有爭議。但是《決議》的起草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卻由於缺乏證據仍然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編輯《張聞天選集》，在為收入《決議》作題解時我就曾提出不同意見，但未被採納，而得到的解釋是：第一，張聞天不懂軍事，自認外行；第二，《決議》反映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有關題解中就作了這樣的處理：「受會議委託，在會議討論的基礎上，特別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起草了這個決議。」[6]同悼詞稍為不同的是，這裏加上了「在會議討論的基礎上」這句話。

對悼詞的提法後來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變為「根據毛澤東發言」。例如伍修權1982年在〈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一文中的說法就是：「會議後期，委託張聞天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精神，起草了……。」[7]如果說，個人的回憶錄不足為憑，可以不論，但後來出版的權威史書也竟然採用此說。例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就更加以具體化，分

* 分別發表於《炎黃春秋》2000年第九期、《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均有刪節。

1 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孫彥釗：〈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後〉，載《〈炎黃春秋〉精品書系》，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頁。

3 載《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4 錢江：〈張聞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縱橫》，2001年第2期。本文作者同劉英就此曾有多次談話。

5 收錄了《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一文件是否為陳雲向紅軍的「傳達提綱」，疑點很多，還很值得討論。

6 《張聞天選集》，第37頁。

7 《遵義會議文獻》，第119頁。

別定為：「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8]「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9]這就是說，決議的起草不但是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而且這樣做還是會議的「決定」。再後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也進一步發揮了原先的觀點，說成是「張聞天同志根據毛主席發言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10]可能是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和規矩，其他許多談到這個問題的文章和書籍，大多要加上《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意見或發言起草的話。這幾乎成了一種公式，而且說法一樣，一般都是只下結論，不講根據，所以很難令人信服。其實，只要細加考究，就會發現這一說法存在很多問題，實在說不大通。

首先，這一說法是前後自相矛盾的。《毛澤東傳》在做出「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的結論之前，對會前準備就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認真準備發言。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會上「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11]這一敍述看來可能比較合乎實際，證之以後的陳雲《傳達提綱》，其中提到「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12]按照文意順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綱和毛王的意見。楊尚昆回憶的描述就更具體：「我清楚地記得，遵義會議上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他

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頁。

9 《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頁。

11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41頁。

12 《遵義會議文獻》，第43頁。

做報告時手裏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着提綱講的。」[13](這也確實是張聞天保持了一輩子的習慣做法：重要發言和報告都有一個詳細的書面提綱)。既然如此，張聞天受委託起草會議決議，為什麼要撇開「經過共同討論」、代表三人「聯合發言」、且為與會者「完全同意」的「報告提綱」，而只「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呢？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且陳雲的《傳達提綱》也只是說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並沒有說會議「決定」要「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如果會議真有這個意向，那為什麼不指定毛澤東自己起草呢？這在遵義會議後和延安整風前也並不是少見的。總之，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之說，顯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實。還是《張聞天傳》中的說法比較合理，顯得真實：「在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是以他作『反報告』的提綱為基礎，依據會議討論中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志的發言形成的意見，在行軍路上，寫成《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的。」[14]但是也有些黨史研究者，一方面從張聞天當時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論水平等的論證得出結論說，會議委託他起草決議並非偶然，他也完全勝任；另一方面卻又要勉強加上根據毛澤東意見或發言的話，自覺不自覺地落進前後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長征一開始，張聞天就同毛澤東接近起來，一路行軍又走在一起，不但經常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而且如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所說，還「在政治局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15]周恩來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

13 〈堅持真理 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14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

15 《遵義會議文獻》，第79頁。

線，一路開會爭論。」[16] 可見，毛澤東的意見，會前已多次討論和交換過，張聞天也早已了解，無須只等這次會議上的發言。而且根據張聞天的習慣和他們之間的一貫做法，張聞天根據「經過共同討論」寫出的「反報告」提綱，必定給毛王看過，他們有什麼意見也一定會提出，並且作了反復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後才能成為代表三個人的「聯合發言」。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張聞天作了「反報告」(也是他們的「聯合發言」)之後的發言，既不會同張相互重複，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後作些補充，或對某些問題加以強調、發揮和提高。根據這樣一個發言是無法起草出會議決議的，而且會議也不會做出根據一個人的發言起草決議的「決定」。如果現在通行的這種說法屬實，而毛澤東的發言又確像一些人描寫的那樣全面系統，甚至說成「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7] 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報告》基本重複；或者毛在事前醞釀中沒有把大部分意見和盤托出而要留作自己發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這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因此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還應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後審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的同時，還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佈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據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證，這個《決議大綱》可能就是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那個提綱，經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為傳達和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中央書記處文件，和《決議》的內容只是詳簡之分，而不是另起爐灶。[18] 何況反報告提綱是在會上得到「完全同意」的，從法理和情理講，起草決議都只能以它為藍本，再吸收會上毛王周等人發言中的一些意見。而對於起草者張聞

16 《遵義會議文獻》，第64頁。

17 陳雲在1977年8月23日的談話，見《遵義會議文獻》，第130頁。

18 例如《長征大事典》的綜述，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9頁。

天來說，這樣做不但是順理成章和執行會上的決定，而且也比較容易完成任務。因為從遵義會議結束到決議的寫成和通過，緊打滿算只有二十天左右。這期間，紅軍一直處於行軍作戰的流動狀態，張聞天除必須隨軍行動外，還得經常(幾乎每天)參加和後來主持中央的會議、為書記處起草和簽發一些重要的文件電報，而《決議》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對有關資料和文件(如國際指示和一些人過去的文章或發言等)。環境動亂和時間緊迫，更要求起草決議盡量省事。而以自己的報告提綱為基礎和框架進行加工，自然比較得心應手一些。根據會上一個發言起草，就要另起爐灶、有更多磋商，在內容和結構沒有根本不同又沒硬性規定的情況下，大概是不會有人找這個麻煩的。

另外，張聞天終其一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堅持獨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喬木自己在〈回憶張聞天同志〉一文中就說，「綜觀張聞天同志一生，我覺得，敢於獨立思想，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這是他的品質高尚之處。」[19] 張聞天幾十年的經歷表明，他所寫的文章和發表的意見，總要出於自己認為成熟的考慮(被迫的交代和檢討、反省除外)，即使貫徹上面指示或汲取別人意見，也要自己融會貫通，決不生吞活剝。例如他無論在東北做地方工作還是進入外交戰線，在向下面傳達中央會議時，都是要綜合會議精神並結合所在地區或單位的實際進行傳達，如同佈置工作一樣，從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幾個領導人的講話記錄。這也是我跟隨他工作十多年的親身體會。為此，下面曾提過不少意見，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領導同志特別是毛主席具體說了些什麼，要求很強烈，他這才接受大家意見。大約從1958年起開始宣讀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但往往還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種傳達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項內容，作為反對毛主席的證明)。

19 《回憶張聞天》，第21頁。

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尚且如此，何況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才被大家推舉為政治局常委，地位還在原有常委張聞天自己和周恩來之後。要張聞天不依大家同意的報告提綱而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決議，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而且，張聞天受委託起草決議，主要還是由於他本身的條件，即不僅因為他當時在中央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認的思想理論水平，更重要的還是他作的「反報告」和提出的提綱為會議定下了基調，得到會議「完全同意」，可以作為起草決議的基礎，也表明他已和「左」傾中央及其路線宣告決裂，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據研究張聞天的專家張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證，[20]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轉變、能夠站出來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礎。張聞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們的思想觀點有差別，進入蘇區參加實際工作後又逐漸覺悟，越來越多地批評一些極左政策。特別是福建事變和廣昌戰役後，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直接進行鬥爭了。進蘇區兩年，一直處於戰爭環境，整天接觸和談論的都是軍隊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委員，要經常參加軍事問題的討論。形勢也在迫使他對軍事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說張聞天完全不懂軍事。長征前寫的一些文章就是證明。如《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等，都直接談到軍事問題，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幾種表現，提出了若干正確思想觀點。《遵義會議決議》不但反映了這些觀點，還採用了很多表達這些觀點的用語。這也證明，張聞天起草決議是以他的「反報告」提綱為基礎的。

再說，會議「決定」讓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起草決議，也和他們兩個人的身份太不相稱。即使按好久以後才形成的做

20 張培森：〈張聞天與遵義會議〉，《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程中原：《張聞天傳》，第213頁。

法，根據領導意圖(更不用說一個人的意見或發言了)起草會議決議，那也是秘書(或寫作班子)的事，總不致讓才推舉出來擔任第一把手的張聞天起秘書的作用。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至今還沒見到毛澤東、張聞天等直接當事人的說法。如果決議確是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那麼基於決議在黨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共和國成立後編《毛選》時大概是會收進去的，毛澤東也不一定會反對。收入《毛選》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別人起草的，例如《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有其他人參與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節即由張聞天執筆，[21]而且文章的主要內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學校講授，還油印過講義，至於作為附錄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更不用說了。另外，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寫的。[22](這種情況其他人也有。例如張聞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即著名的「陳高洛電報」，當陳雲在世時的1983年就已收入《陳雲文選》，[23]而張聞天親手起草的原稿檔案尚在。)張聞天是從不講他個人的功勞和貢獻的，在延安整風期間還竭力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因此決議如果確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按理他是會在《反省筆記》或其他談到遵義會議的發言中作點說明的，但事實上卻隻字未提。周恩來、陳雲，也都沒講過決議的起草問題，如果會議真有根據毛發言起草的「決定」，他們理應是會提到的。胡喬木雖然是黨

2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載本文的題解，1991年版，第621頁。本文注明寫作時間為1939年12月，而1938和1939年(以前情況不了解)在抗大學習時聽講的課程如〈中國問題〉或〈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就已包括了本文的大部分內容。另見《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24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6頁。

23 《陳雲文選(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4頁。在編《陳雲文選》時，我們(張聞天文集編輯組)曾依據檔案提過意見，結果仍決定收入，只是加了個「陳雲同志主持起草」的注。

史方面的主要權威，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24]在黨史問題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終究不是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而且一大半為後人整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在談到決議的起草問題時也是只下結論，並不提供任何出處和根據。所有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撥亂反正和批判「兩個凡是」以後，不是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嗎？這當然也適用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總不能說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等人的貢獻。那為什麼在初步總結第二次國內戰爭經驗的時候，已經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的張聞天就不能有點貢獻，起草決議竟沒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據毛澤東發言」？在這裏，歷史和邏輯不是又分家了？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為，關於《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說法，大概是以訛傳訛。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既非事實又悖邏輯的問題呢？看來，最初提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權威；而人們後來的附和，則是黨史研究中一種一貫立足於個人崇拜的表現。「文化大革命」以後，要撥亂反正、改變方針，就必須批判「兩個凡是」及個人崇拜，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又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強調毛澤東的作用和貢獻，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前的功績，而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當然更是一項重要內容。也許是由於這種歷史背景，一方面公佈了《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起草，另一方面又說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瓦窯堡會議實行戰略轉變的決定，歸功於毛澤東，更是為了突出毛而掠人之美。後來陳雲建議在《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24　見2000年5月22日刊登於《光明日報》上李鐵映在《喬木文叢》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要加寫一節《關於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顯然出於同樣考慮。實質上這都是在繼續堅持個人崇拜的思想。

關於瓦窯堡會議，上篇也已說過，這裏再特別談一下毛澤東的會後傳達報告。[25]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和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26]中仍大講特講的這個報告，其實存在着不少疑問，例如：第一，當時在全黨傳達和貫徹執行的是會議通過的決議還是毛澤東的傳達報告？大約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第二，這個報告發表在什麼地方，是以什麼形式傳播的。根據共和國成立前的一些《毛選》版本，包括晚在1948年的東北書店版，都沒有收這篇報告，可見傳佈範圍不廣，因而影響也會很有限。第三，1951年收進《毛選》時採用的是什麼版本，手寫的還是油印的或鉛印的(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樣重要的著作，直到1941年前還只有少數油印本而無鉛印本)，[27]如果不是刊登在某種書刊上，鉛印的可能也不大。第四，收進《毛選》時的修改情況。因為毛著中的幾乎所有文章都經過重大修改，有些還經過多次修改。至於這篇傳達報告的修改以至重寫，是根據會議記錄還是臨時草擬的簡要提綱，都未作說明。總之，用多年後修改甚至重寫的東西印證或評價當時所起作用，顯然是不會確切的。而且無論如何，一個小範圍的報告，作用和影響總是不會超過向全黨傳達的會議決議的。因此，胡喬木等把報告放在決議之上，而且提得那麼高，就只能是為了突出個人，談不上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了。

25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42–169頁。

26　1941年2月23日為該文的鉛印出版寫的著者識，見《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585頁。

27　1941年2月23日為該文的鉛印出版寫的著者識，見《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585頁。

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載的談話中批評《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過分突出。雖然以他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28]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在刻意突出毛澤東和抹殺其他一些領導人的問題上，恐怕要比《決議》「過分」得多了。例如全文對於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中共中央的所有重要會議，一概不提主持人、報告人和決議起草人，重大決策也一律或明或暗地歸之於毛澤東的主張和領導；對這一重要戰略轉變時期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更是完全不提。後來在1985年寫的〈回憶張聞天同志〉[29] 一文中，胡喬木自己也説，「現在回想起來，整風運動中對他的批評也有些過頭的地方……至於他在遵義會議前後在黨的歷史上所做的重要貢獻之受到抹殺，就更加不公正了。」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一些敍述和評論是否應作點實事求是的改變呢？

《遵義會議決議》是否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以及上述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窯堡會議兩例，都反映了一個長期存在的情況和風氣，就是黨史研究中貫徹執行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還很不夠，並且形成了一個傳統和規矩，就是黨史上的「人治」，凡事只要權威人士一經提出就成了定論，此後的研究和論述，只要重複結論，可以不談所以然的理由。這恐怕就很難説是科學研究了。

遵義會議為什麼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中央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了中央領導，但卻沒有提出政治路線的錯誤問題。《遵義會議決議》反而確認「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而且講得有根有據，連路線

28 見該書第67–68頁。

29 載《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388頁。

錯誤的暗示都沒有。[30] 也至今尚未看到有文獻證明，會上和會後很長時間有人提過路線錯誤（延安整風後特別是「文革」後的某些回憶錄不足為憑）。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當時是沒有人認識到，還是故意不提出？

對於遵義會議及其以後很長時間沒有提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的路線錯誤問題，延安整風中作的解釋是出於黨內鬥爭中的策略考慮。意思是，因為當時多數人尚未認識到是路線錯誤，如果提出來就無法團結大多數，特別是不會為「左」傾中央分化出來的人所接受，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當時緊迫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而且還可能導致黨和紅軍的分裂。這一説法起於毛澤東，然後大家也就都跟着講。毛澤東説，「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如果當時提政治路線，三人團便會分化。」[31] 張聞天後來在《反省筆記》中也説，「在遵義會議上不提路線錯誤，反而肯定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一個示範來看。」[32] 陸定一1944年在《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報告》中講得更直接，對於當時是否認識到是路線錯誤，回答説，「當時毛主席是懂得的，是有意識地不提出來，因為當時主要的問題是戰爭，自己沒有根據地，處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戰爭是大家明白看到性命交關的問題，路線的錯誤還不是大家所了解，當時提出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對當時打仗的問題並沒有直接的幫助。路線並非馬上要命的問題，可以慢慢講。」[33]

30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後稱〈遵義會議決議〉），見《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頁。

32 1943年12月16日〈反省筆記〉，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33 《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整風後，這種出於黨內鬥爭策略考慮的解釋就正式固定了下來，幾乎一切黨史著作和領導人的回憶錄在提到這個問題時都完全遵守這一口徑，而且還越講越生動具體。例如伍修權在1982年所寫〈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一文中就有這樣的描寫：「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會後曾有同志問毛澤東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也早在反對他，為什麼當時不豎起旗幟同他幹，反而讓王明的錯誤統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澤東同志說，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發動鬥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反而不利於對敵鬥爭。」[34]這裏顯然存在一些問題，如「有人」和「有同志」都沒有指明是誰，而且既然是在會上提出，為什麼其他與會者就沒有聽到？不是會議主持者的毛澤東又是怎樣制止的？至於會後關於王明錯誤的問答，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因為會上批評的是博古、李德，提王明的「左」傾已是1943年九月會議後期的事。而且在這之前，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對第三次「左」傾還只算三年零四個月，伍修權卻已在十三年前定為「四年之久」。可見，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以後來的認識編寫當年故事的例證。但是黨史界寫史傳卻最喜歡引證這類「回憶錄」，以使許多事後說法成為人們「所需」的證據甚至定論。

只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出，黨史研究和史料發掘才有一些突破，其中就有對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的傳統解釋的質疑和否定，認為那種出於策略考慮的提法並不真實，而是主要由於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對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一時難於分清。

34 《遵義會議文獻》，第120頁。

談論遵義會議沒提政治問題的文章不少，但比較權威的應當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中說，在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時，毛主席雖然受到「左」傾機會主義的打擊和排擠，「但那時毛主席並沒有認識到臨時中央領導者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在長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紅軍失敗的原因，得出了臨時中央領導在軍事領導上存在着一條錯誤路線的結論，但對其政治路線還沒有明確提出疑義。」[35]直到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才提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表明毛主席對這次『左』傾錯誤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但「這裏的認識，依然是不完整的」。[36]所以1941年九月會議後，毛主席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還認為「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方面」應該肯定，並得出結論說，「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並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37]毛主席在同一時期寫的「九篇文章」，用的標題也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還沒提王明路線。[38]胡喬木還說，「從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路線怎麼樣。毛主席寫的《農村調查》的《跋》(1941年4月19日)講到，那時執行的許多政策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當時也是錯誤的。這是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39]即使單從胡喬木的正面解釋看，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也並不是什麼策略考慮，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而是連毛澤東也沒有認識到。那些事後諸葛亮的說法顯然是缺乏根據的。

3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5頁。

3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6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3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

而且，這也是遵義會議後的許多事實所證明了的。例如直到1936年秋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不但沒有提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還把軍事上的錯誤歸之於右傾，說，「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40]（書中上一節說的「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則是以前各種版本所沒有而為1951年出版《毛選》時加上的）。其實，第一個比較含糊並且只限於白區工作提出四中全會以後有路線錯誤的例子，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這就是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引起的一場爭論。劉少奇在報告中批判長期存在的「左」的惡劣傳統，認為四中全會以後，黨在實際工作中還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線（他隨後也解釋說，「我覺得我們的錯誤……好像是路線的樣子」）。[41]這就立即遭到多數與會者的不滿和批評，政治局不得不開會討論白區工作路線問題。不但時任總書記和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劉少奇的提法「忽視黨的歷史發展」，「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毛澤東，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也批評劉少奇「擴大化」，是「非辯證法的發展觀」，說黨「只有幾個極短時期犯過總路線的錯誤，在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大革命末期與立三時期）」，其他時期只是在若干問題上犯過原則性的錯誤。這就是說，王明博古時期也不是路線錯誤了。最後，劉少奇不得不進行檢討，承認自己認識有片面性，把問題擴大化了，「至於黨的路線的正確，我是不否認的」。[42]

如果說，這個時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還有策略的考慮，那麼在黨史上被說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屆六中全會總可以少一點顧

40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頁。

41 《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頁。

42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頁；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頁。

忌了吧，但事實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的提法是，「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其「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就是說，這次錯誤只限於反五次「圍剿」中的軍事方面。接着還直截了當地表明，「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的嚴重的原則錯誤。」[43]

其實，也不僅六中全會，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好久，認識仍比較模糊，還一再發生變化。這從上引胡喬木的敘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實際上是，直到1945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把路線錯誤的性質最後確定下來。共和國成立後，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後來更進一步演變成王明路線，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44]

由此可見，對於王明路線的提出，無論對全黨還是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有個過程，是隨着情況的變化和政治的需要，經過不斷變化才逐漸明確起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清、提得準。這首先是由於毛澤東在學習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並逐漸掌握了路線問題在黨內鬥爭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線錯誤置政敵於「死地」，令其「徹底繳械」。所以延安整風一開始就提路線問題（上層），而且越來越強調。但也不是一開始就拿着帽子亂戴，總還有個了解情況和演變的過程。這也合乎當年毛澤東特別強調的，一切結論只能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對四中全會後黨的歷史的調查研究，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4頁。

44 詳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初擬稿」（十一），〈黨的歷史決議〉。

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編輯《六大以來》才正式開展起來。在這之前，特別是內戰時期，長期處於殘酷的戰爭環境，居無定所，又缺乏資料，也沒有時間和條件來全面研究黨的歷史和政治路線。而且從主觀上講，當時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澤東對軍事問題了解得透，思想比較成熟，對政治路線還了解不多，研究不夠，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形成獨特的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當時的地位和處境，也使毛澤東不大容易了解中央的整個路線問題。所以胡喬木說，「一編《六大以來》，就發現了過去存在的許多問題。過去沒有時間，沒有機會研究四中全會的決議有什麼問題。在三十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發表這些文件的時候，毛主席對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觸。」[45]這就是說，毛澤東對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也是在延安整風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認識的，並不像一些人事後所猜想的那樣，把毛澤東說成「先知先覺」。例如研究黨史很有見地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上面也說，在遵義會議上，「依據他(毛澤東)當時的認識水平，肯定知道『左』傾領導人犯了政治路線錯誤」。這種猜測就太不實事求是了。其實，如果再深一層看，就不應忽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風過程中路線鬥爭的變化。一開始清算的「左」傾錯誤被稱為「博古路線」，還不是「王明路線」，時間也是從博古臨時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後算起，說王明出頭的四中全會，根本方面還是「正確的」。但由於王明不但不檢討，反而倒打一耙，批評抗戰時期黨的路線了，加上康生、劉少奇、周恩來等對四中全會特別是王明所寫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揭發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才在整風後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還只限於上層)，時間也從四中全會算起了。

遵義會議上沒有提出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還因為那時政治上的分歧不像軍事上的分歧那樣明顯。軍事上，李德、博古的單純防禦路線和瞎指揮成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特別是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一對比，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思想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處於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原來犯「左」傾錯誤的張聞天、王稼祥，也早在長征前就已認識到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並起來進行鬥爭了。當時黨內鬥爭也主要表現在軍事方面，對毛澤東的打擊和排擠，首先就是剝奪他的軍事指揮權。至於在政治領域，兩條路線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晰，不像軍事路線那樣涇渭分明。例如毛澤東雖然曾被批為執行「富農路線」，但整個說來他在富農問題上還是「左」了。對臨時中央提出的「左」的土地政策，沒有見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項英署名發佈的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中，實際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內容。[46]特別在肅反問題上，還在四中全會前，毛澤東直接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江西蘇區就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嚴重擴大化(其實多是無中生有，連擴大化都談不上，因為實際上紅軍和根據地中並沒有什麼「AB團」)，反而是此後產生的「左」傾中央派人去糾偏(特別是後來進入蘇區的周恩來)。據《蕭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中說，「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裏，在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內，就打了4,400個AB團，」「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了AB團」。[47](1930年12月20 日毛澤東寫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也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四萬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分子。)還有因錯誤肅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變，也發生在四中全會前，

45 詳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初擬稿」(十一)．〈黨的歷史決議〉．第47–48頁。

46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13–314頁。

47 《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同樣是毛澤東親自領導處理的。[48]這些就都不能歸罪於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了。至於搞過火的階級鬥爭，以鬥爭推動工作，用強迫命令以至肅反的手段進行擴紅等，在中央蘇區甚至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前後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澤東指示那樣做的。

即使從現存文獻看，也很難理出當時一條同第三期「左」傾路線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和比較系統完整的正確路線來。甚至在以清算「左」傾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中，也是着重以後來的認識揭發和批判「左」傾中央的錯誤，而很少舉出當時在政治路線上與之相對抗的文獻。所以正確路線和錯誤只能豎比(前後)，無法橫比(同時)。這就是胡喬木說的編輯《六大以來》所起的作用：「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中央存在着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樣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49]這「前後一對比」，可能是指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後的領導(也就是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檢討的，「我還不了解使毛澤東同志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同近兩年來所做的那樣」)和遵義會議前「左」傾中央領導的對比。這也說明那時政治上的正確路線並不是很清楚，可能實際上並沒形成一條路線，因此只能進行前後對比，而無法排列出雙方同一時期在方針路線上針鋒相對的文獻。

48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按：富田事變是一方面軍總前委派李韶九、古柏去紅20軍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的事變。毛澤東和總前委將其定為反革命暴動，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並由毛親擬討逆通告；項英和中央局認為「是由黨內無原則糾紛演進而成」，因此採取開會解決的辦法。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及其派赴中央蘇區以任弼時為首的三人團卻支持總前委，責備中央局，並以毛澤東取代了項英的中央局書記職務。富田事變的處理結果是，20軍副排以上幹部和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負責幹部幾乎全被處決，其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A B團，20軍也不再存在。

4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

也許是由於有些錯誤，特別是肅反問題上的極左錯誤是大家都犯的，不能只歸於第三期「左」傾路線，所以在延安整風中就沒有得到清算，因而不曾認真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遂使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大量製造冤假錯案的極左政策成了長期不治的頑症，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嚴重後果。正是在延安整風期間發動的搶救運動，就幾乎完全是打AB團時的認識和做法的翻版。而且事後還是不加清算，反而至今仍然肯定「九條指示」的正確。[50]這不能不說是同後來在肅反問題上繼續不斷犯類似錯誤有關。反之，如果對肅反問題上的極左思想和做法也能像對「左」傾教條主義那樣批深批透，對歷次運動中有過嚴重過火行為和犯極左錯誤的積極分子，特別是搞投機、充打手的，不一律採取保護政策，也許會避免或減少後來歷次運動中製造那麼多的冤假錯案和傷害那麼多的好人。這方面的教訓太沉痛了，但是至今還沒有徹底清算。

既然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是由於「認識方面的原因」，那麼為什麼要說成是出於策略考慮呢？胡喬木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常說遵義會議當時有意講軍事問題，避開政治問題，但是實際上當時緊張的戰爭環境不可能談政治問題，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那麼多。歷史是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發展的。這裏面也可能有某種考慮的因素。毛主席有時也這樣說，但不必一定強調這個。」[51]這當然沒有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但提出「不必一定強調」毛澤東從前的說法，可能是擔心暴露毛澤東本人的自相矛盾和違背實事求是精神。

其實，像這類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前和以後對歷史問題做出的極不確切的結論，又一直被肯定而需要根據事實進行撥亂反正和重新

50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89–96頁。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4頁。

認識的問題，實在不少。這裏只舉一個被塵封了半個世紀的大冤案西路軍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既明顯又典型，所以打算多講幾句，看看黨史上一些事情被顛倒成了什麼樣子，也有助於理解遵義會議上沒提政治問題是策略之說的不可靠。

所謂西路軍問題，就是1936年紅軍會師統一指揮後，由於戰略指導錯誤和統得太死，使原屬四方面軍的兩萬多部隊(按：一方面軍到達陝北時只剩下幾千人)，在河西走廊遭到幾近全軍覆沒的慘敗(全軍21,800人，戰死7,000多，被俘9,000多，俘後被殺害5,600多，回家鄉2,000多，流落西北各地的2,000多，營救回到延安的4,000多)，還被說成是張國燾路線造就的惡果，使生者和死者長期受到屈辱。而實際上，西路軍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主席毛澤東)直接指揮的。1937年3月，當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央和軍委在電報中已對這次失敗「蓋棺論定」，同張國燾以前的南下和另立中央相提並論，嚴厲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所謂「機會主義路線」和「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的行為。在嚴厲指責西路軍領導人的同時，延安也正開展對國燾路線的大批判。結果，西路軍失敗是「國燾路線的犧牲品」這一根本違背事實的錯誤結論，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沒有人敢提出質疑，連當年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不得不說些違心話。直到毛澤東去世五年後，作為西路軍工作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陳雲，才敢仗義執言，於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兩次同李先念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1982年，李先念根據陳雲的建議和鄧小平的批示，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第二年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的軍事行動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1983年8月2日，鄧小平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至此，長期被扭曲和誣陷的西路軍問題總算在中央領導層得到了解決和澄清。徐向前才可以根據這個精神寫他的《歷史的回顧》了。[52]但是此後的官方黨史著作，雖然已改而肯定西路軍是中央決定組成，進行了英勇悲壯的戰鬥，但卻對失敗責任和長期蒙冤或隻字不提，或繼續貫徹「為尊者諱」等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編纂學原則。[53]

西路軍的冤案在毛澤東本人的文獻中可以看得更清楚。還在西路軍浴血奮戰時，他已把西路軍和「國燾路線」聯繫起來，說：「為敵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54](按：西路軍是1937年3月失敗的，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毛澤東在1941年2月23日為軍政雜誌社第一次鉛印出版寫的「著者識」中注明為「1936年秋」。1951年出《毛選》一卷時才改為「1936年12月」。但不管是哪個日期，都在西路軍失敗之前，按理是不可能得出這一結論的。這句話顯然是事後增加或改寫的。而據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的談話說，「收入《毛選》的文章，幾乎都修改過」。見該書第58頁。)但是正如徐向前所說，實際上，「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事的。」[55]而且文電俱在，說明與張國燾關係不大。因此《毛選》的有關注釋，新舊版本就完全不同了。1951年的版本說

52　以上材料見：陳鐵健：〈塵封了半個世紀的禁區—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澄清〉，《北京日報》2002年12月2日(2003年1月6日《報刊文摘》)；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四章〈血戰河西走廊〉，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93頁；《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3頁；李樵：《徐以新傳》，世界知識出版社版1990年版，第222–240頁。

53　如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和2002年的修訂本；《毛澤東傳》等。

54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98頁。

55　《歷史的回顧》，第372頁。

是：「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1963年12月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56] 1991年版的《毛選》注釋已改寫為：「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57]只是由於這時毛澤東已去世，對《毛選》所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文不便再改，就只好讓這個「硬傷」繼續存在着。

為什麼會有諸如此類不切實際的論斷呢？過去有一種解釋，說是為了革命需要。一些人明知不合乎事實卻加以附和甚至還要發揮一下，也說是為了顧全大局。在西路軍問題上，四方面軍許多同志就一直不服，但長期以來都沒有人敢講。

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出於策略考慮。這類事後諸葛亮的話，在黨史上實在太多。原因就是為了突出個人、證明一貫正確，為此可以不顧事實、偽造歷史。

56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1年版，第240頁。

57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241頁。

張聞天是遵義會議當選總書記還是會後分工「負總責」？*

從《遵義會議文獻》談起

遵義會議雖在事過不久的延安整風中就進行過清算，並留有大量文獻和檔案，但有關這次會議存在的疑難問題和矛盾說法卻實在不少。四十年後把會上當選總書記的張聞天改成會後常委分工負總的責任，就是其中之一。對此，還得從中央有關單位的專門調查談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鑒於「對這次會議的一些重要情況長期未弄清楚，以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的原則和目的，專門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於1984年9月提出「調查報告」，並會同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58]這時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雲、鄧小平、楊尚昆、聶榮臻、伍修權、李卓然等都還健在（只有劉伯承已喪失思維），聽過會後傳達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還有大量檔案和各種資料。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穫，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並非如此，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由於先就有了不可更動的結論（如肯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又帶着只准證實其是的檔案資料（即陳雲的所謂

* 原文發表在《隨筆》2001年第一期，《炎黃春秋》同年第一期和《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發表時均有刪節。

58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裏的引證，以及此後簡稱的《文獻》均指此書。

《傳達提綱》），而沒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按照「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的原則，所以不但沒能弄清和解決一些重要情況和問題（如會議是怎樣把會後才分工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確立為全黨全軍領袖的等等），反而還把一些問題弄得更亂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據《調查報告》和幾個人幾十年後的個人回憶，在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發言」，而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如果這屬實，那張聞天的「反報告」以及為會議「完全同意」的「提綱」就都沒有了。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覆》上說，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就更是自相矛盾，因為他的所謂《傳達提綱》上說的遵義會議「最後作出」的四條決定中竟有三條提到常委，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被選為常委」。再說，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稱負總責、書記還是總書記）的更換，恐怕不會只是個常委分工問題。對於當時有無書記處，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時已說得很清楚：「在中央蘇區時，書記處在政治局之上，實際上等於政治局常委，不合適。」[59] 另外，《調查報告》還斷言「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職稱，洛甫和博古也未用總書記名義」，那張聞天多次讓出總書記又怎麼解釋？陳雲和康生在遵義會議後三年半的六中全會上提議選毛澤東為總書記又有何根據？類似問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列舉。

不過，這裏又牽出來了兩個不小的問題。

一是陳雲的《傳達提綱》手稿形成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內容的詮釋，都還值得作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獻》的考證所注，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那為什麼沒有保存在中國？聽傳達的人自應不少，怎麼一直沒人憶及？使陳雲的「傳達」除自己認定外，得不到其他旁證。行軍途中寫的手稿經過什麼途徑（陳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3頁。

雲在長征途中奉派化裝去上海，既無必要，更無可能帶在身上）帶到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的檔案（中辦於1956年接收來，直到1982年才得到確認[60]）？而且原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無「傳達提綱」字樣，為什麼又不公佈（或沒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這是否是陳雲去莫斯科時在那裏向國際寫的彙報提綱？因為不少內容，如點那麼多人的名字和一些機密，在當時是不能向下傳達的。（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並作過論證，但陳雲堅持他在蘇聯沒寫過這個東西，肯定是他長征途中所寫。[61] 於是，在「只惟上」的潛規下，這方面的研究論證只好作罷。）若果真如此，由於時間已過去大半年（陳雲是1935年8月同陳潭秋、楊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無多少旁證資料可供查考，單憑記憶能寫得如此詳盡已屬大不易，在某些問題上出現遺漏、不確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對此問題，個人既無材料，也無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列。但希望有關機構和專家能夠堅持「不惟上，只惟實」的原則繼續深入考查，提出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說明。不回答上面以及有關的許多問題，這個材料恐怕是很難稱為《傳達提綱》、現在史學界也很難以此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出定論的。

二是個人的回憶能否作為歷史「文獻」看待。對此擬另文論述。這裏只以《遵義會議文獻》中採用的幾篇四五十年以後回憶中的問題為例提點疑問。根據現在的分析估計，一些回憶錄的有關提法是當時不大可能發生的。如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伍修權）；「我和王稼祥……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

60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

61 見《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頁「注4」。

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周恩來)，等等。另外，有些說法已證明不合乎事實，如：關於正副報告後的發言順序，先是毛澤東，接着是王稼祥，再接着是張聞天和朱德明確表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伍修權)；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被增選(注：顯然不是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陳雲)；等等。

這裏並無意討論這本《文獻》的內容或對它作評價，只是想說明，遵義會議的研究並未因此畫上句號，甚至可以說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沒弄清。這裏專就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對《文獻》的說法作點辨析。

要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職務，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會議前後中央有沒有書記處。否則，博古和張聞天不但不能稱為總書記，而且說他們是書記都不可以。

1982年12月28日陳雲寫的《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幾個問題的答覆》[62]中，有不少說法是不確切甚至互相矛盾的。這可能是由於不但事過50年，而且陳雲年事已高，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後黨史界關於遵義會議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這次《調查報告》和《答覆》以及陳雲1935年那份現在才定名為《傳達提綱》的文件奉為圭臬。這本身就違背陳雲提倡的「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精神。

例如《答覆》中說，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這同歷史事實就大有出入。幾乎一切有關的黨史資料和論著都提到，自五大以後，中央就一直設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

62 《遵義會議文獻》，第73–75頁。

我沒有去查)。五大後的常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八七會議選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六大後的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項英、蔡和森，向忠發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說會後不久又補上王明，[63]並無根據)，還決定改常委會主席為總書記，仍由向忠發擔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都一直稱向忠發至死的職務為主席，大概不是事實，而是為了圓「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之說。但卻既未提供證據，也解釋不了常委們鑒於盧福坦覬覦總書記，故決定臨時中央暫不設總書記的事件。而對此，王明、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有正式說明)。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後的聯席會議上，博古被推舉為總書記。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並選出書記處，博古繼續任總書記(書記處稱作常委時，博古只稱書記)。這都是報經共產國際批准過的。

對《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以及《文獻》其他內容，還可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遵義會議後不到八年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專門清算十年內戰時期黨的領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的。當時主要當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強，又時隔不久，記憶猶新，留下了大量書面材料，怎麼可能連有無書記處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舉，起碼從五大算起就一直設有常委，怎麼到六屆五中全會竟無緣無故地給取消了？既然沒有常委，毛澤東又怎麼會「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是會後一個多月寫的《傳達提綱》(即使寫於到莫斯科後，也只半年多)可靠，還是事隔四十八年後寫的《答覆》可靠？

63 見《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頁。

第三，既然沒有書記處或常委會，怎麼能長期以書記處的名義號令全黨並和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聯繫？六屆五中全會後不到一年做出的《遵義會議決議》又怎麼會多處提到並不存在的書記處？有案可查的常委會及其擴大會的召開和做出的決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1937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和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又從何說起？一個走向成熟的黨，連領導核心的名稱還「不那麼固定，不那麼嚴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這可能嗎？

第四，「為了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檔案（如各種會議記錄）重要呢？還是個人多年後的回憶重要？而《遵義會議文獻》的編排順序，是看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參考價值，還是看後來的官職大小？難道會議主持人秦邦憲會後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還不如被「擴大」進來參加會的聶榮臻四五十年後的回憶重要？無論什麼時間和場合，毛澤東都名列第一，這種規矩是怎麼立下來的，合乎歷史主義嗎？

第五，《文獻》選材的標準又是什麼？是為了「把黨史資料立準確」，還是只為證實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覆》以及1984年9月《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張聞天任總書記問題上，為什麼一概不用許多不同於陳雲的說法，如中央關於「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悼詞》、《彭德懷自述》等？對挑選的人又為什麼有斷章取義，只摘一方面的說法而不用或刪去另方面的說法？如為什麼對周恩來多次談到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話不用（包括「文革」期間說的「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64]），偏要用「聽毛主席的話」這類屬「文革」時的語言？為什麼伍修權兩次提到的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的話被刪去，[65] 卻選用大可懷疑的《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

64　周恩來在1967年7月12日接見外交系統幹部和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

65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頁。

毛澤東發言起草和根本不可能提「王明那一套」的談論？根據這樣鮮明的傾向性選材能「準確」嗎？

類似的問題還可再提許多，要在說明1984年的《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並沒有解決遵義會議的一些主要問題，對「歷史情況」的敘述也並不「準確」。它們本身和被《文獻》採用的某些材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而不能「以此為準」和「到此為止」。

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史實確鑿毋庸置疑

在討論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問題前，還得先弄清向忠發和博古是否當過總書記。

由於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也就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主席變成了總書記，[66] 因而才發生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不要再設總書記的問題。這是所有當事人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一再說過的。所以胡繩主編和黨史研究室所著黨史中關於向忠發被捕前為主席的說法，[67] 顯然與史實不符。有的書更是自相矛盾，如2000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書叫作《延安整風實錄》第5頁上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雖仍由向忠發擔任」，但第10頁卻說，「1931年6月，黨的總書記被捕。」很明顯，兩者只能有一個是對的，而沒有根據的說法又只能是第一個。

再看博古。根據上述，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局不設總書記，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發言中所說，「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

66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129、162頁。

67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解放軍出版社重印1991年版，第295頁。

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注意，沒有像現在黨史書上沒有根據地說王明「指定」)，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蘇區後，兩個中央局合併的會上要推舉一位中央領導人，竟然只稱為負總責，就有點於理不通了。特別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了書記處，卻仍然設一個負總責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大家都一直稱呼博古為總書記，這是延安整風期間也無人否認過的。至今一些老同志還是這樣說。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列席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劉英，最近就多次談到。當時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事後不到九年書寫下來的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寫的《反省筆記》中是這樣說的:「博古到後(指到中央蘇區)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雲、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於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此說如非事實，當事人的毛、劉、任、陳雲等怎麼能不糾正，反而會認為「寫得很好」?)「我當時想，我們原來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時，曾經申明中央無總書記，一到中央蘇區，他卻弄起總書記來了。這當然使我不滿意。」此外，他談到博古當總書記的地方還有數處，茲不一一列舉。張聞天的這份《反省筆記》，整風中曾得到大家稱讚。劉英說，「毛主席看後立即到我們窯洞裏來，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68] 總之，總書記從來沒人加以否認，怎麼事過四十年後這總書記就一下和一律變成「負總責」了?難道那時對博古不是稱總書記同志，而是稱負總責同志?這能叫上口嗎?

在大體弄清向忠發死前和博古進蘇區後的任職後，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及其稱謂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這方面文獻資料又極多，為節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舉數件。

68 《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是有黨的正式文件可證的。遠的不說，只說平反後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說，「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69] 主持這次追悼會的就是陳雲，並且由於他的堅持，會期推遲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答應讓主持會或致悼詞都行，悼詞也事先送他審閱過。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復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70]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一再説過他是總書記。例如毛澤東，正面的說法是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封他一個「明君」的雅號，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說法有如李銳所述，「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李銳評曰:「這當然是對的。」卻值得考慮)[71]

其他領導同志提到張聞天是總書記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權兩次提到總書記的話:「會後解除了博古同志的總書記職務……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爾後他又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鍥而不捨——懷念張聞天同志》)。[72] 楊尚昆:「大家習慣稱他總書記」;[73]「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74]。彭德懷:「會議結束

69 《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70 《劉少奇傳》(上)，第229頁。

71 《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的一次發言。

72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頁。

73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人民日報》，1990年8月30日。

74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任……」[75]黃克誠：「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志」。[76]其他就不再引證了。

不但黨內，就是知情的黨外甚至外國人，也都知道張聞天是總書記。例如那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黨的總書記。」[77]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寫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張聞天的談話，一開頭就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78]不過也應承認，無論是在國內外還是在蘇區和紅軍中，朱德、毛澤東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連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長時還不知道王明。[79]可見，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線後才出名的；博古、張聞天出任過總書記一事能夠被長期埋沒和不被承認，也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

至於張聞天本人，平時閉口不談過去歷史，但在整風中的多次發言和書面材料中，卻一再提到總書記。在《反省筆記》中除上引談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談到書記處和自己的職務。如談到六屆五中全會時說，「政治局與書記處名單，曾經得到過國際的批准。」關於書記處名單，「國際回電，曾經不贊成洛甫、陳雲參加，而建議補上張國燾、王明（似乎還有康生？）。但後來博古又去電解釋了一下，說是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陳雲補上了。」談到遵義會議，說，「我不但

75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頁。

76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解放軍報》，1981年4月10日。

77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29頁；另見《長征大事典》（下冊），第2577頁。

78 斯諾1957年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中，有〈洛甫論黨的問題〉一節。

79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

未受處罰，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後邊又講到，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並檢討六中全會時「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確曾向毛澤東同志提過，當時他不主張提這個問題。」「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證，就已可看出，張聞天確實當過總書記。不然他一再讓的是什麼「位」呢？他始終說的是讓出總書記，沒有說讓的是「負總責」。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在自我批評和頌揚毛澤東的問題上頗多過頭之處（但多為空洞的上綱上線的話）外，而對黨史事實的敘述，在延安整風中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例如關於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的合法與否就是據它確定的。毛澤東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這是對幾個重大歷史問題所定的基調）中就說，「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80]

還應說明的是，張聞天《反省筆記》中敘述的一些史實之所以可靠，不只因為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讚揚和引證，還因為他的敘述不像一些人那樣只憑多年後的記憶和根據新觀點的聯想寫《回憶錄》之類，而是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整風時還保存有進入中央蘇區的全部日記、工作筆記等資料。此外又據胡喬木說，「他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期的耳聞目睹，寫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其中記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從這裏得知的。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出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

80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頁。

很高的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時的喪失「是一個極可痛惜而無法彌補的損失」。[81] 可見，張聞天在這時和在這種基礎上寫出的《反省筆記》史料，大概總比陳雲等人四十多年後的一些「回憶」和論證要更可靠得多。

對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情況最了解現在仍健在的要算張聞天夫人劉英。她雖已96歲，但仍頭腦清楚，記憶力極強(她說是由於受過收發報密碼訓練和多年做組織幹部工作的緣故)。她不但在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同中央領導多有接觸，而且遵義會議後接替了鄧小平中央隊秘書長的職務，專為政治局和書記處(常委)服務，如照顧中央領導行軍中的生活、安排開會、擔任記錄、進行聯絡等。中央到達陝北後又和張聞天結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幾乎每次都在他們家開，她多在場。派出或回來的負責幹部向中央請示彙報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澤東的關係又特別好，至今保持着對毛主席的親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1937年11月去蘇聯，在這以前三年的中央內部情況，她是了解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說，在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後則是唯一的一位了。為了了解張聞天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情況，從1999年起我已拜訪了她數十次。對於博古特別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講了許多生動細節以資證明，這裏無須複述了。她在張聞天平反後寫的懷念文章，還是講「聞天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82] 但1982年以後，由於陳雲提出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她為了尊重陳雲、並在鄧力群竭力勸說下，此後寫的回憶錄中才把總書記改為負總責，只加一句「習慣上稱為總書記」的話。但在多次談話中，她仍堅持張聞天那幾年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掌握全局；毛主席則主

81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82 〈深切悼念張聞天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要管軍事，自封「大帥」，稱張聞天為「明君」。她還幾次談到，1937年11月去蘇聯治病，共產國際和蘇方都是以總書記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別墅。王稼祥領她去見季米特洛夫時就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單獨密告她，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實行集體領導，洛甫還是書記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會議等。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時，中央的會議已不在他們家而改到毛主席處去開了。[83]

綜上所述，張聞天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證材料可資證明的，而「負總責」之說似乎只有陳雲1982年證實的所謂《傳達提綱》和一篇書面《答覆》了。(因為《文獻》摘錄周恩來「文革」期中的一次講話，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沒說什麼「聲明」；還說「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也都沒提到「負總責」。)

據個人學習這段黨史的心得，張聞天出任總書記的情況可能有如下述。

六屆四中全會確有改「主席」為「總書記」的決定。這是否有降低向忠發掛名的含義(中國更重視「主席」。毛澤東就不願當「總書記」)，沒有研究，不敢妄斷。向忠發叛變後，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王明已無法繼續留在上海，決定分別去江西和蘇聯，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並同周、王等研究，為避免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糾纏，決定先不設總書記，但指定博古負責，「多管一點事」，並舉薦博古、洛甫、陳雲、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經共產國際批准。批准電報是博古在大多數委員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

83 訪問劉英時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如1999年1月18日、3月4日、6月10日、9月7日、12月30日、2000年2月7日、5月16日、18日、6月27日、8月16日等，大多有錄音。

議上宣佈的。再後又成立了包括盧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陳雲組成的常委。1933年臨時中央根據國際指示遷往中央蘇區，如上所述，在雙方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八人的聯席會上，大家推舉博古為總書記。一年後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自然「率由舊章」，博古繼續擔任總書記。同時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會上還選出書記處。以上均經共產國際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雖對四、五兩次中央全會和臨時中央極其不滿，但還是不能不承認其合法。

至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問題，除本人和其他當事人的敘述外，楊尚昆晚年談得更具體可信。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84]說是由於毛澤東謙虛，讓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據當時情況，這是不大可能的，也與毛的性格不合。他說過：「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85]可見，一位黨的總書記(就算負總責吧)，不是政治局會議推舉(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而由常委分工決定(實際上只是兩個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張聞天的總書記實際任職只到1937年底，多說也是1938年六中全會。在王明、陳雲、康生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

84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85 如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等。

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根據有關資料，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更重視毛澤東，一直在宣傳毛澤東，卻從未宣傳過博古、洛甫、甚至王明[86])，改組書記處，增補上述三人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仍由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張聞天不爭權和不願多出頭的品德，他並不計較，還按王明等人的意見，於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決定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為書記處會議，但張聞天早已決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以後乾脆連這個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工作也交給了任弼時，自己離開中央去進行農村調查了。

為什麼要將總書記改成「負總責」

由此可見，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前後情況和線條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搞得異常混亂，最後竟被完全否認，變成了以前並未聽說過的負總責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於要使黨史跟着政治走，為當前現實服務。因此形勢變了，黨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張聞天的總書記只是一個例子。

從遵義會議到1938年六中全會，中國革命尚未形成權威的領袖，因此客觀上需要一個作風民主、善於集中大家意見、堅持集體領導、不獨斷專行、能把大家團結起來的為首的人(即核心)。張聞天多方面的條件都適合此任。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確實幹得不錯，因此獲得「明君」之稱。總書記是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既擁有實權又具象徵意義。所以在同張國燾做鬥爭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寧可讓出全軍的最高領導，也不同意張聞天讓出這個可以代表中央號令全黨、召集和主持中央會議的總書記。在這三年中，中央多數領導同志擁護以張聞

86 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章，特別是5、6兩節。

天為首，人們也都稱他為總書記。「十二月會議」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使總書記稱號已失去實際意義，且張聞天排名也失去首位，排在毛澤東、王明之後，所以從此大家只稱他洛甫同志（這時除毛主席、朱總司令外，其他中央領導多以同志稱之），他在群眾場合被介紹時還是使用「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的名義。整風期間，上下界限分得極嚴，中央情況下面幹部很少了解，只知張聞天和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很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但整風中並無人否認過他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陳雲也沒提出他的「負總責」之說，卻是事實。

整風後期和七大後，張聞天實際上已被排出中央領導核心，只能做一點調研以及後來的小範圍地方工作和「授權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於過去的地位、名義和貢獻，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沒和封殺。例如被喻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頌毛澤東，對於所謂「第五朝領袖」、在實現從內戰向抗戰的戰略轉變中掌舵的張聞天隻字未提，甚至把張聞天的某些重大貢獻也輕輕歸於毛澤東名下（如上述的瓦窯堡會議和處理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後，知道張聞天的人已經很少，更沒幾個人知道他當過總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員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對他進行大規模的錯誤批判時，無論上下，還都說他當過總書記，也沒聽說過「負總責」這個詞）。此後，他就完全在備受無情打擊和殘酷折磨中銷聲匿跡了。

在張聞天被迫害致死後，沒想到很快就否極泰來，粉碎了「四人幫」，中央提出撥亂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而1959年廬山會議之完全錯誤及其嚴重惡果，幾乎是人人皆知無須多查的。於是張聞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佈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而且在這之前中央所批「六十一人案」的報告中也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總之，在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張聞天在黨史中的總書記地位也得到了恢復，報刊上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對此加以論證。連1980年出版的《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張聞天》條中也說，「1935年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共和國成立前「歷史的回顧」。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87]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說幹得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取得了勝利，「以長補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維護毛澤東，說到底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陳雲同志講，一定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88]在這種號召下，一些老同志寫共和國成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的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關的研究，就空前繁榮起來（回憶共和國成立後的卻很少）。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他也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覆》。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遵照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只惟上」的不成文規定和「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紀律，史學界照例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

8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頁。

8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頁。

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志的回憶錄，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並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審查和出版機關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

現在書報上稱張聞天為一代總書記的雖多了起來，但卻顯得不夠理直氣壯，還要一再提「負總責」以表白。例如那本書，名叫《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內容卻一再說是「負總責」，只是「實際上相當於擔任黨的總書記」。不過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歷史的真相總會逐漸顯露出來。在紀念張聞天誕辰100周年以後，大概就會有更多的人稱他為一代總書記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擔任什麼職務，這是客觀存在，終究掩蓋不了，更抹殺不了。但為什麼會時隱時現和變來變去，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從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教訓？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這裏只舉一個小例子，看一看說的和做的是怎樣對不上號。

日前有位朋友來信談到黨史研究說，「雖然都在講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卻真難，談所謂『過於敏感』的問題，總是心有餘悸。」其實，許多違背事實的論斷和做法反而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下進行的。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惟實」、只「惟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甚至在拍一部張聞天文獻片上也體現出「權大於史」、和黨史中「人治」的例子。張聞天百年誕辰，中央批准拍攝他的文獻片。製成後，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重大題材審查小組、劉英本人等有關各方審查通過。不期在放映的頭一天，審查小組副組長張振東卻強令剪下郭洪濤談西安事變後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上意見還不一致的幾句話，否則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談話畫面，再不然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了問題。攝製組無奈，只好刪掉幾句話。結果放出來，不但畫面上郭洪濤語言不連，而且改變了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的

事實，變成了政治局在事變後的第一次會上就已認識一致，決定和平解決和派周恩來去西安等等，使好幾次會議和會下的磋商在一次會上完成了。這不是又一次說明，有權就可以改寫歷史，黨史比胡適說的「小姑娘」更可以隨便打扮了嗎？



第三章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 *

為了進一步了解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有必要先簡單談一下張聞天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每段又可細分成兩個時期，這就是：張聞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進入中央蘇區後，是他犯「左」傾錯誤和毛澤東受壓的三年多；長征開始到延安整風的六年，是兩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較好的時期，只是頭三年中央領導以張聞天為首，後三年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整風後是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做點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約各為一半的三十年。

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

張聞天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但兩人的相知卻要早得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們就都已參加了中國少年學會。[1] 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此後他們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又時有披露。因此，作為會友，他們不但互相知道，還會讀到對方有關的材料。不過由於毛澤東只是「少年中國」的一員，沒有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和有什麼出色表現，所以毛澤東本人和官方黨史編纂學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國」的關係，而喜歡大講毛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當然，在張毛關係上，真正有點影響還是1931年張聞天回國參加中央工作後（先任宣傳部長列席常委會，從臨時中央成立起即出任

* 原文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1 張聞天1919年12月在南京參加該會，此後又常在該會辦的《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上發表文章。毛澤東於1920年入會。

常委）。在此期間，兩人並不相識，也無成見，但卻發生了一些相互有關的事情，主要就是張聞天由於執行「左」傾路線，曾參與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壓制。例如張多次批評中央蘇區領導的「右傾」、「狹隘經驗論」，這當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澤東。（不過也有批評得並不錯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會上批評過去中央蘇區「以AB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2] 這也都直接與毛澤東有關。）同年10月6日的常委會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評毛的「保守、退卻」和「分散工作的觀點」，還提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3] 不過由於沒有成見，所以張聞天另一方面的意見又起了有利於毛澤東的作用，如反對向忠發兼任中華蘇維埃中央主席而促成了毛澤東出任此職。[4] 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張聞天才同毛澤東見面並一起工作。而他下車伊始又參與了博古提出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寫文章、做報告，一時表現得異常積極。不過後來他在整風中反省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5] 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鄧、毛、謝、古」，他也主要是上綱上線寫文章，照他在《反省筆記》中所說，追查「江西小組織系統」、「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羅邁。雖然如此，這次積極參加，終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並在毛澤東心中記下一筆賬，幾乎講了一輩子。

不過平心而論，張聞天除參與反「羅明路線」外，總的看來，在蘇區近兩年，他同毛的關係還算不錯，接觸也較多，並促成了他們

2 《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第161頁。

3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81頁。

4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4期。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關係的靠攏。張聞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乾脆被調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毛仍為蘇維埃主席），不但工作關係密切，還比鄰而居，來往頻繁，不時見面。張聞天接觸實際後，政策思想逐漸擺脱「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趨於激化，其中受毛澤東的影響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軍事問題上。對於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他就對人説，「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呵。」（指開調查會等。）對兩人在蘇區的關係，包括張對毛生病的關心、支持共產國際不同意讓毛到蘇聯養病等，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曾有較詳細的回憶。如説，他們「通過相互接觸，達到相互了解，逐漸走向接近。可以説，張聞天同志後來在遵義會議的轉變，也是與他這一段時間受到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有關的」。[6]

可是有些黨史著作卻喜歡強調張聞天來到瑞金以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了解。[7]其實這是對張聞天《反省筆記》中幾句話的誤解，屬望文生義。因為就全文的精神看，張聞天檢討的對毛不了解也沒想了解，是指自己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應當成為黨的領袖人物。被誤解的原話是：「同他（指毛）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又如另一地方談到自己「從來沒有想搶着當總書記」，然而對博古當總書記，

6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頁。

7 如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見該書第40頁和封底等數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書中與此類似的一些誤解還有一些，如第118–119頁提到，康生講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就是如果不搞整風，「毛澤東幾乎不敢來黨校做報告」。這倒真使我等當時的「一般黨員幹部」感到有點「匪夷所思」，因為這是「千真萬確」不可能的。即使毛澤東喜歡講極而言之的話，也是「不敢去作整風報告」（就是「不敢」發動整風），而不是什麼報告都「不敢做」。這類誤解常被一些人抄來抄去，所以特為在此一提。

「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至於爬在別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等的頭上『配不配』，我當然沒有想）。」這裏又特意提到毛，可見上面談的「了解」、「本領」等，都是指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和領導，並不是真的相處一年半竟「毫不了解」。當然，正如張聞天檢討長征出發前他能和毛澤東合作的原因之一時説的，「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理，也是事實。」[8]因此可以説，張對毛確無成見，進入蘇區後也沒有反對過毛（他認為反對「羅明路線」不是反毛），但卻並不十分尊重，甚至有點看不大起，認為他理論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從毛澤東這方面來説，在張聞天到來前，任弼時、項英等已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剝奪了他的黨權和軍權，早已使他處於半靠邊站狀態。這時直接壓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張聞天則無直接的重大衝突，因此關係「還平常」。並且隨着張聞天思想的轉變，兩人相互了解的進一步加深，還使得後來發展到坦誠相見，相互傾訴對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團」的不滿，並準備同他們進行鬥爭。沒有這個基礎，遵義會議是開不成的，當然也談不上此後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澤東同張聞天的關係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所説，「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9]只有那些受個人崇拜影響較深和不了解領導人之間關係的黨史工作者才會説「毛澤東是不記個人恩怨的」。[10]所以他在蘇區對張聞天的態度還有影響深遠的以下幾點。第一，張聞天是批評和壓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經參與批評過他，特別是反「鄧毛謝

8 以上均見張聞天：《反省筆記》。

9 《中華兒女》1999年第9期。

10 如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9頁。

古」。這是他長期耿耿於懷，有適當機會總要算賬的。第二，對於張聞天這種初出茅廬，不憑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發號施令，他從心底裏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對張聞天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寫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即使在同張聞天合作中也難免時有顯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造成張聞天後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張毛關係

自從長征出發前張聞天把對博古和最高「三人團」不滿完全向毛澤東坦白起，他們的關係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相互間不但有了較深的了解（否則不會談及如此重要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有了黨內鬥爭的共同目標（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和專斷作風）。這就更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並終於形成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所謂「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的話說，就是「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11]

長征後，兩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見的相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從大的方面或長遠講，兩人都是獻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澤東在整風時說的，在反對蔣介石等問題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從當時情況或近期目標說，他們需要攜手進行共同鬥爭，以改變李德、博古的指揮和領導，從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革命。這是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其他一切問題（如毛的個人恩怨和雙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暫時拋開或加以擱置，而必須集中力量抓這一當務之急。主客觀條件還使他們在這一革命形勢和戰略大轉變時期必須成為主要的一對合作者。

11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毛澤東無疑是正確軍事路線的代表和反對「左」傾中央的靈魂，但卻不便和很難直接出面領導這場鬥爭。這是因為：第一，他雖經共產國際干預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但卻不是常委（或稱書記），而且實際上還處於無權地位；第二，從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被剝奪黨權軍權後，他同軍隊的指揮關係和直接聯繫中斷兩三年，號召力已大為削弱，何況老蘇區的軍政幹部還調換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黃克誠所說，毛在肅反問題上傷害人太多和組織路線上的偏聽偏信等 ，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12]第四，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幾年來批評他「右傾」、「狹隘經驗論」等，也有損於他的威信。因此，毛澤東知道，要反「左」就必須首先依靠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並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張聞天。雖然他對張聞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也為了共同事業，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隱忍着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因為「張聞天在中央、在相當一部分人中間是頗有影響的人物，不只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個人的為人和修養」。「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13]師哲的回憶錄不確切的地方頗多，但這段描述卻比較接近實際，證之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4]可見，毛的接近和依靠張，是當時的客觀需要，是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個人回憶錄，把毛澤東描述成眾望所歸，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大半是多年以後的認識，也是延安整風為黨史學定下的統一口徑，有些領導同志這樣寫回憶錄則是為了突出自己。其實，會後的許多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威信當時並未達到眾望所歸的

12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00、101頁。

13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6頁。

14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程度，而是逐漸樹立起來的，其中就有張聞天的幫助。如在會理會議上，作為新上任的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批評林彪等人，其作用是無人能代替的。

從張聞天這方面來說，在廣昌戰役後已同博古決裂，再經過反五次「圍剿」失敗和倉皇長征，他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更完全失去信心。由於性格比較孤僻和不善交際，他同蘇區領導人的來往、交談都不多，對最高「三人團」和羅邁更為不滿，所以有意見就比較自然地對向無成見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澤東「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於是一拍即合。加之長征後兩人都處於半靠邊狀態，所以就經常交談和議論起來。張聞天雖進蘇區近兩年，還參加軍委，經常討論打仗，但終究是個文人，除戰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認識外，對打仗的具體問題並不熟悉。因此這方面就聽信毛澤東講的，對毛也更加佩服。由於長征途中爭論越來越尖銳，張聞天更進而萌發改變領導的念頭，並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開了對博古、李德的鬥爭。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出於思想覺悟，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風時說的，並不是想爭當總書記。事實上，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他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他還是再三推辭，拖了二十來天實在推不掉才接任。[15]

當然，遵義會議能開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張聞天覺醒得還要早，跟人醞釀交談的也更多，但說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卻是言過其實。因為第一，他是在長征前的五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在中央的地位與鄧發、凱豐等相當，其態度

15 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會見劉英（陪見的有程中原、張培森等）時的談話，見《百年潮》1998年第6 期；另見該刊2001年第10期張培森：〈毛澤東為何看重張聞天〉。這是楊尚昆在世時審改過發表的。《楊尚昆回憶錄》是他去世三年多後別人整理，故說法不同。按理當以他的原話（而非別人所編）為准。

不可能起決定作用；第二，他因負傷，所擔任的軍委副主席和總政主任，在長征出發前就已分別由項英、李富春代替，遵義會議前他既無實職也無實權；第三，他從未進過中央領導核心，在軍隊中並無太大影響；第四，遵義會議上除博古、凱豐二人外，絕大多數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已形成共識；並不是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關鍵的一票」。由此可見，許多黨史著作一直重複毛澤東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貶低張聞天這一論斷，還是受着「兩個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傳統影響。如果一定要講「關鍵的一票」，倒應該指周恩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起的作用最大。因為他作了「反報告」，為會議定下基調，又受委託起草決議，最後還當選為總書記。但實則不然。當時是最高「三人團」專政，他雖排名博古之後，卻並無實權。加之一直處於行軍打仗狀態，軍事第一，他在軍中又沒多大影響。周恩來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團」成員，而且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的統帥，威信高，影響大，對於改變「左」傾方針和領導，真正起着關鍵作用。試想，如果周恩來不從「三人團」中分化出來，將會是什麼情況。事實證明，他一站出來，博古、李德就沒轍了。所以，陳雲在所謂《傳達提綱》中要特別標出他，說是「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還決定他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他「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6]這都可看出他當時舉足輕重的作用。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其重要特點之一是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後一開始就着重抓兩件事。一是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他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獨斷專行，所以在他主持下開會較多，特別是開始時。這就是毛澤東

16 《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後來批評的，「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17]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後會已減少，但重要問題仍要集體討論決定，絕不搞一言堂。毛澤東雖然不喜歡開會，但在成為領袖前還是要求適當多開會，[18]使他的意見有發表機會並被採納。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9]因為從長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我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20]隨後他又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軍事小組」。長征途中，先後經過沙窩會議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後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和出任紅軍縮編後的陝甘支隊政委。[21]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中的地位就完全調了個個兒，由毛為周的助手變成了周為毛的助手。還應指出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後，在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1935年11月3日），又經他提議和會議通過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稱西北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最後，還是在他主持下召開的洛川會議上（1937年8月），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22]

17 《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

18 例如1935年8月19日的沙窩會議上，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做出決定：「常委會每週至少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引自《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60頁。

19 楊尚昆：為劉英著《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所寫的〈序〉，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2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1 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73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4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60、266頁。

2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90頁。

單從上列的軍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和范偉國的下述論斷之真實可信：「翔實可靠的資料證明，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的三年多時間裏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一步步將毛澤東推向黨的領袖的崗位，並且『扶上馬，送一程。』」[23]

不但軍事問題，而且在整個黨對各條戰線的領導上，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作為紅軍統帥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做到了珠聯璧合的。在他們的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勝利完成長征，把陝北變成領導全國革命的聖地，特別是實現了從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他們合作之密切，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從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會，單是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有檔案可查的即達286件。[24]對他們來說，一生中兩年內與人聯署發電可能沒有比這再多的了。毛澤東雖然分工主管軍事（後來加上外交，即統戰），但有關方針政策和其他重大問題，張聞天也總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徵求和尊重他的意見。標誌着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了的。而且會後由毛澤東傳達決議精神報告（後來標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積極分子會議，也是由總書記張聞天親自主持的。

兩人在重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緊密配合，還能做到放棄自己原來的不成熟意見，接受對方的正確建議，體現了領導集體內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風。如處理西安事變，毛澤東就很快改變了他審蔣除蔣的一時想法（後來還作了檢討），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

23 錢江、范偉國：〈是非功過張聞天〉，載《中華兒女》（國內版）2000年第8期。

24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頁。

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案。[25]因為正像日本學者安藤正士所說，張聞天一開始就解決了如何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兩個難題，為「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定下了基調」。[26]而在紅軍東征問題上，則是張聞天放棄了他原先主張「北上寧夏」的方案，轉而支持毛澤東東征山西的建議。當時一些人對渡河東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對，彭德懷猶豫，林彪不久前還提出把重點放到陝南。但張聞天堅決支持東征，不計較一些人的閒話（如王稼祥說他沒主見，是跟毛澤東跑的「泥菩薩」），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紅軍中去」，並代表常委宣佈：「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後方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局，顯示了總書記親自出征的決心。[27]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但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毛澤東除分工所管外，對其他問題如有意見總是向張聞天提出或建議開會討論解決，而不越俎代庖和隨意插手黨務、組織、宣傳等其他部門的具體事務。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歷史事實。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學，為了突出毛澤東，總要把事情說成是：雖然從組織上講張聞天是總書記（1982年起還按陳雲一個人的意見改成負總責），但出主意的還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有的甚而說，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保證了毛澤東的方

25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9、162–163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46頁；另見〈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26 程慎元：〈日本學者評價張聞天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貢獻〉，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集，第595–598頁。

27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程中原：《張聞天傳》，第330–332頁；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頁；《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90頁、296–297頁；《毛澤東年譜》上卷，第493頁。

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其實這些既無事實根據，道理上也講不通，只是人云亦云。這主要還是由於這些黨史學家嚴守延安整風定下的框架，只顧重複已有結論，而不顧歷史事實。其實，張聞天本人在延安整風時那種強大壓力下寫的《反省筆記》，也只是說能開好遵義會議他「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28]其他更多說的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即以我們上面列舉的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窯堡會議這兩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而論，張聞天顯然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絕對不能視為「配角」。至於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我在第一章中就已作過論述，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也必須指出，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主持日常黨務工作的書記同正在形成中的全黨全軍領袖之間的合作。從此，在毛張關係上才可說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着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這大概是與會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29]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衷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三年多名副其實的總書記，在歷史賦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楊尚昆就說，「自從他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

28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29 如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回憶張聞天》、《張聞天研究文集》等書。

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30]現在，這一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並得到上(共產國際)下(黨內幹部)認同的領袖已被「扶上馬」。面對這一新的形勢，他不戀棧、不消沉、急流勇退、甘當配角，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這一變化也反映在聯署電報上。1938年毛張聯名發報已大為減少，且署名順序毛在前的為多，不像以前絕大多數為「洛、毛」。六中全會後，他們的聯署電報已基本上沒有了[31])。除做好按分工擔負的份內工作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兩個問題上對毛澤東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澤東對王明及其他反對意見進行鬥爭。「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雖已排名首位，但處境卻有點孤立。這是因為：一來王明有點鬧獨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漢，不願延安使用中央名義；二來領導上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未取得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總是同毛澤東站在一起，根據不同對象和不同問題，有時用領導人聯署形式如毛、洛、胡(劉少奇)等，有時用書記處名義，發出指示或答覆問題，保證了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毛澤東方針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提出要把總書記職位讓給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來。他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32]既然張聞天這時還保留着總書記(起碼是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那麼毛澤東要和武漢的王明進行鬥爭，沒有張的同意或簽署，怎麼可以用書記處名義或代表中央意見呢？可見在毛澤東成為實際上黨的領袖後，張聞天的支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30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載《紀念張聞天》，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31 據《張聞天年譜》。

32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555頁。

二是在理論問題上張聞天也對毛澤東有不少幫助。延安時期是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理論創作的鼎盛時期。在這方面，他得到張聞天一些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也就是説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過不小貢獻。中央到陝北後，張聞天長期主管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他重視理論，組織學習，對毛澤東鑽研理論從正反兩方面都起了推動作用，包括書籍供應、研究空氣、無形壓力等。直接貢獻那就更多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問題都可找到他的蹤跡，一些名詞也是他在黨內首先使用而為毛澤東所沿用的，如「黨八股」、「文化人」等。這裏只舉兩個理論上的例子，以見一斑。一是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論述。張聞天留學蘇聯回國不久即參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起作用，有如參加論戰的一位積極分子薛暮橋所説，「張聞天同志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勝利的奠基人。」[33]此後，他先後在江西共大和陝北紅大，親自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內容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時已編成講義，連同他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成為一門必修課。後來《毛選》所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而且其中有的章節張聞天還分工參與起草。[34]又如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第一次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全面系統總結。而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的持久戰問題，他從1935年11月起草《瓦窯堡會議決議》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他關於抗日戰爭戰略是持久戰的論述更引起熱烈討論，會上毛澤東也作了精闢的概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逐漸形成全黨共識，「由毛澤東充實、發展並構建為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於1938年寫出了《論持久戰》。[35]

33 薛暮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34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24頁。

35 參閱程中原：〈洛川會議前後〉第一節，載《張聞天傳》第十三章。

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要比這多得多)只是要說明，在張聞天和毛澤東合作的過程中是一種互助的關係，而且很難說誰對誰幫助更大些。過去那種毛澤東是教育者和張聞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說法(包括張的檢討和毛的認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

但是，最後必須指出，在兩人合作得很好的這幾年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有隔閡，雖然不佔主導地位，但對日後卻有重大影響，所以先要簡單一提。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着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36]同張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着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他還恩將仇報，使張聞天長期受壓，直到被徹底打倒。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來。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着來的人(像康生之類)，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總之，由於雙方存在諸如此類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誠相見。

36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75頁。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1941年就結束了。因為標誌着上層整風開始的「九月會議」，毛澤東是拿張聞天開刀的，並使他作了過頭的檢討(所謂「徹底繳械」)。加之毛澤東一再放風，說張聞天佔着位子不做事，也不會做事，迫使張聞天離開延安去晉西北做農村調查。從此他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延安整風後的張毛關係

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檢討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着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有關這期間的情況，後面將有一章專門談到，這裏暫付闕如。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37]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和自己深入實際，就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38]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歷史，先是變成一種間接的(即中間隔了幾層)領導和被領導關係，1959年後，連這種關係也告中斷，完全被毛澤東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張聞天一起到東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在我看來，張聞天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是他擔任總書記那

37 〈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同志〉，載《世紀風采》，2000年第8期。

3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5)，第279頁。

幾年，主持中央工作，為實現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新局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期間。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39]

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面，大概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因為那時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揮解放戰爭上，而張卻是完全從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對毛澤東有報告和建議一般也要經過東北局。但張聞天的大體情況和重要意見，毛澤東還是有所了解的。例如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盈利分紅問題張同劉少奇的爭論，後來他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40]應該說，張聞天在東北的四年地方工作還確實顯示出了他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後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頂住了。還有些重大的理論與政策問題意見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吸收採納，如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構成等。當然也有些好的意見沒能引起應有的注意，如共和國成立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對發展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農業合作化不能操之過急等。對這後一點，薄一波曾嘆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視」而造成農村工作的損失。[41]當然，這些都與張毛關係無直接聯繫，只是說明延安整風後兩人地位的根本變化和張雖仍持積極入世態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39 見《張聞天在遼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頁。

40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2頁，但某些情節和時間有誤。張給毛由東北局轉的三份電報是1949年5月寫的（見《張聞天選集》第447–454頁；程中原：《張聞天傳》增訂版，第635–640頁）。1950年2月他已調來北京。至於張劉爭論和毛當面表態的時間，則不知其詳。

41 薄一波：《關於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08頁。

正當張聞天興致盎然和得心應手地從事地方工作之際，1950年他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先是劉少奇等提議由章漢夫出任此職，並請示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毛同周恩來商議後覆電改派張聞天。[42]這一調動除表明當時對外交工作還不熟悉和對聯合國工作的重視外，從張毛關係的角度看，也從工作性質、國際慣例、實際情況看，更不排除有「貶官」、「外放」之意，而不是過去人們說的表現了毛對張的器重。這樣考慮的根據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駐外使節只是執行政府指示、承辦些國內委託的事務性工作、參加日常交際活動、反映情況等，且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43]第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社會主義國家常對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國工作，含有「外放」、「貶謫」之意，如蘇聯1933年派反布哈林（編按：Nikolai Bukharin，1924–1929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鬥爭中被撤去教育部長職務的盧那恰爾斯基任駐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的莫洛托夫任駐蒙古大使，1953年維辛斯基由外交部長降為副部長、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黨在共和國成立後派定為「教條宗派」並因對整風有點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落選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毛澤東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狀，一次還當面指王十年內戰時整他[44]）等；第四，張聞天從未做過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時就從事外交（外國和國民黨）工作的重要領導幹部並不少，如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第五，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張聞天在駐蘇大使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第242頁；《張聞天年譜》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第900–901頁。

4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7頁。

4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451頁。

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45]第七，1952年蘇共十九大，中國黨派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然而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其政治歧視太過明顯，即使不論黨內地位，也不合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慣例，當時一些外國人就覺得奇怪。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樂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後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據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員，因是長期流亡蘇聯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不久即死於任所)。在大使任內，他同毛澤東既無直接工作關係，也無直接個人聯繫。與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經常積極通過外交部向毛澤東並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建議，但很少聽到有什麼回音。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這又開創了共產黨執政國家一個政治局委員當副部長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特例。1956年，時隔十一年(七大黨章規定為三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作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作個發言。[46]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

45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40頁。

46 見《張聞天文集》(四)，第216–242頁。

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了。[47]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1955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同毛澤東的關係，一般說來也還是正常的。毛澤東絕不會重用張，張自己也明白，並已安心於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做到了盡心盡責，而且建樹不少。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議報送毛、周；對外交業務和內部建設更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憂國憂民、一直注視和考慮全局問題，有時也向毛寫信報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毛澤東定下的方針路線以及各項政策與做法，他都貫徹執行，照章辦事。他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關於美國經濟危機》，在《紅旗》創刊號發表時，最後引毛澤東的話作結束，就是陳伯達給加上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託。據我幾次目睹，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總之，使人感覺到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存在着無形的隔閡。

在毛澤東方面，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後就更不在話下了。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他並不以為然。有些他認為正確

47 因稿件是我起草，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送呈總理，以便有指示時回來修改。總理未看就說不用了。可見是早已商定的。另見蔣洪斌：《陳毅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1頁；《陳毅年譜》下卷，第712頁。

的意見而加以採納，也只是視為「從群眾中來」，並不認張的賬，如關於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張的一些報告，他至多是批給大家看。如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時，對張報上來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總結發言《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曾批示：「印發各同志，很可以一看。」[48]也就如此而已。實際上，共和國成立後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着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了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着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張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日寫信向毛澤東彙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後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讚揚。毛看後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月8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着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49]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

4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147頁。

49 說張聞天有「大少爺氣」，可謂毫無根據地信手拈來。

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50]轉錄這麼多，不但是為了說明毛喜歡報喜不報憂，也為了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毛的「帝王」氣魄，對張聞天這個「臣下」已毫無平等可言，同時還暴露他對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騙（所以康生「值得信賴」）。因為不久後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而且真正脫離群眾、「不大懂實際」的也不是張聞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否則中國的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不會遭到那樣嚴重的破壞，不會有三年困難和餓死三四千萬人。從發展軌跡看，進城後兩人的思想就漸行漸遠，距離越來越大，個人關係也日益變得貌合神離。張對毛是敬而遠之，毛對張是厭惡、歧視以至侮辱。特別是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並終於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而其結局又說明，延安整風立下的以毛劃線已發展成鐵的紀律，個人完全凌駕於一切黨規國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再經歷二十多年的苦難（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張聞天一直忠於馬克思主義。廬山會議後他雖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馬列理論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寫出了大量筆記和文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但由於當時的處境，他不得不採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即送請毛澤東審閱指正的文稿，都是較虛的理論問題和反修（編按：反對蘇聯共產黨修正主義路線）、頌毛的學習筆記。另外一些確有見解、雖盡量含蓄但仍顧慮有犯忌內容的材料，就沒有上報。例如《張聞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廬山會議後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關於集市貿易問題給毛並中央的報告、一篇談純理論的〈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

5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12頁；《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0頁。

外，其餘二十八篇都沒有報送過毛。其實，就是報送毛的許多讀書筆記和報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據説連那篇談集市貿易的報告都沒看，還是從康生嘴裏聽到的。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康生進讒言説，張聞天現在和孫冶方又在搞利別爾曼[51]一套。毛説，好啊，讓他們去上街（指鬧事）。那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也就成了張聞天的翻案活動和一項新的重大「罪行」。

張聞天雖然對廬山會議以來的批判內心並未服氣，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承認的：1962年1月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使我覺得我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觀點是沒有多大錯誤的，會上的反右鬥爭是過火的。[52]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共給毛澤東寫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後少）。[53]內容主要是順着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彙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鬥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廬山會議後對他的認罪信，毛有「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54]的批示，並曾送給他看過，此後他再沒得到過任何回信。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僅1960到1962年，張給毛就寫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給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傳閱和存檔。另兩封有些內容。一封是參加八屆九中全會後致函毛，表示擁護毛的講話，並懇切申明「裏通外國」是「實屬莫須有的事情」，但仍決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調研工作，「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盡的責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過批道：「已電話告張聞天同志，信已收到，看過，同意他對問題所取態度。」[55]另一封是參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給毛的信，表示擁護劉少奇的報告和毛的講話，並附送〈關於蘇共危機的感想〉一文。毛於2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説，「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一件，請考慮印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説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56]此信也從側面説明，毛對「七千人大會」和劉少奇報告不盡如人意。1962年後，毛對張的來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對來信中的兩封批示傳閱存檔。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諸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和一些有意為毛澤東開脱的説法（如胡喬木所説，在「文革」中毛對彭德懷、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在什麼地方、受什麼虐待等情況都不知道[57]）相反，毛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和遊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是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關注着，無人可擅自做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蘇修（編按：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即打着社會主義旗幟的帝國主義）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4月12日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58]1968年5月17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

51 葉•格•利別爾曼（1897–1983），烏克蘭人，經濟學家，1962年9月著文提倡在蘇聯搞點經濟改革，如擴大企業權限，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刺激等，被我國當時輿論視為經濟學界現代修正主義代表人物。

52 張聞天在1968年8月28日所寫材料。

53 2001年10月28日張培森查告何方。

5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461頁。

55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167–1168頁。

56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182–1183頁。

5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頁；《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頁。

5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268頁。

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年10月20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佈：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59]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覆：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60]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生前聯繫也就自然中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毛二人談不上有什麼私交和個人友誼，也沒有多少學術交流和學問磋商，連聊天的共同語言都不多，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結合。那麼從政治着眼，也就是過去強調的提到路線[61]的高度看，張毛關係的這三大階段大概可歸納如下：第一階段，即長征前，基本上是張聞天錯誤和毛澤東正確。說基本上，是因為張也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文藝界的關門主義和在蘇區同博古的鬥爭等；毛也有錯誤的地方，如肅反中錯殺幾千幹部戰士和逼出「富田事變」又錯誤處理等。這個時期雖然還不能說毛有一條完整的正確路線，但當時是軍事第一，而毛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略戰術等根本問題上還是正確的。第二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這期間，雖然中間夾了個延安整風，雙方地

59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287、1290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312、1316頁。

61 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一般不再提路線鬥爭，只是對以前的路線錯誤還用機會主義、冒險主義之類的稱呼。共和國成立後的黨史已沒有這些帽子了，但像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不算路線錯誤算什麼？也可以「宜粗」掉了？

位有極大變化，但政治路線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確。第三階段是共和國成立後的二十多年。在這個長時期裏，毛澤東也有一些建樹，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張聞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澤東走的，但在許多問題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歷史證明，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因此總的看來，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基本上是錯的，張聞天基本上是對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動上還得執行毛澤東的)。這三個階段，還可用張聞天自己檢討的話說，就是：遵義會議前，「當時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62]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還有點分庭抗禮的味道」，整風後開始信服，只是對審幹有過意見；[63]「對主席過去革命時期的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是相信的(革命勝利也已證明)，但對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辦法，是否行，有懷疑。」[64]

最後就相互態度來說，則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遵義會議前，張對毛是輕視與忽視；毛對張是內心看不起，表面還得應付。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前，張對毛是尊重與崇敬；毛對張是表面尊重，實際上仍看不起。從整風起直到「文革」，張對毛是既有個人崇拜，又有不滿和意見，而且天平逐漸後傾；毛對張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壓制，人格不尊重，從批評的諷刺挖苦到藉口打倒，使張聞天過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張聞天來說，他始終忠於毛澤東，如同在廬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國外事會議作檢討時所說，他的動機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儘早認識與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絕無意要反對毛主席，更談不到打倒了。他說，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就是誰想打也打不倒。這確是他至死未變的想法和態度，因而對他後來的遭

62 1959年8月9日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的檢討發言。

63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64 1962年8月17日在十中全會西南小組會上的發言。

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論，遵義會議後，張聞天確實對毛澤東只有合作、擁戴，而沒有一絲一毫對不起的地方。

關於張毛關係就寫到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張毛的關係悠久而曲折，一本書也說不完，所以只能掛一漏萬地做點簡單回顧；第二，我是有意識地在這些敍述中盡量排除主觀的猜測和設想，甚至連我同張聞天十多年的接觸與談話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說主觀的估計和判斷了。對雙方關係力求做到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差異和比較

談過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就容易聯想到他們的差異和比較。但這個題目更大，單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論問題，都是須有專門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無研究，現在又來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個人的了解作點簡單敍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樣做，正像有的黨史專家所說，「把張聞天和毛澤東放在一起比較，並不是要抬誰貶誰」。[65] 在我，只是想從各人思想、素質等方面的差異來了解他們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以及這些差異對延安整風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並不同意「因為歷史早為他們各自做出最為公正的結論」[66]之說。實際上，即使比較公正的結論，現在還沒有做出，看來今後一個相當時期也很難做出。這正是要對他們兩人做點比較的原因之一。而這個比較之所以着重講差異，並不是由於相同點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為太多太廣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

65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01頁。

66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01頁。

的政治基礎、相當時期的並肩戰鬥、勤奮好學、知識淵博、有文學天賦（如另走條路，毛可成為多產的大詩人，張可成為著名的作家）等等。這些，人們都較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異的對比，則可以從不同側面看出各人的素質、特性、優點缺點、發展變化等。只是對此未能找到什麼參考材料和立論依據，只好按自己的了解與判斷，不分輕重和不講邏輯地作點舉一反三的說明。

領導才能

歷史證明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有高超的領導才能。如上所述，張聞天在做總書記時期就已表現出他善於總結經驗、堅持集體領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變。後來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卻又失掉機會，無以展才。在工作上，機遇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方面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人數不到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帥。二、四方面軍只各出了一個元帥，不能說與此絲毫無關。因為無論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給你機會，不讓你「錐處囊中」，再大的本領也是無法和無處顯露出來的。而張聞天在延安整風後的處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實證明，在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跟上時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問題等方面，張聞天要遠勝過毛澤東。這也是共和國成立後兩人思想以至關係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但總的說來，論領導能力，毛澤東終究要比他高出許多。當他還埋頭於文學和只注重書本的時候，毛澤東就已領導過工農兵學運動，有了廣泛的社會經歷和深厚的生活基礎，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參與了黨的締造，擔任過國共兩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能夠做到多謀善斷，隨機應變，運籌帷幄，幹群用命。他還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精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軍隊、地方、黨內外都有廣泛影響。張聞天則沒有指揮過軍隊，在幹群中影響小得多，更不用說在全國了。就是在做人處事上，毛澤東也早已深沉老練，張聞天卻始終帶有書生氣。例如徐向前說到西路軍失敗後他回

到延安時的情況：「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説，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67]這可能寫的有些過分，但還是可以多少説明毛張在待人上的差異。又如劉英説，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一次關向應有事找他。他正在寫東西，請關坐下等一會兒。關等了約半小時，看他連頭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劉英告訴他後，他抬頭一看，關已去遠。所以劉英説，他真是個書呆子。此外，張聞天還顯得有點只講原則，不夠靈活，批評人不大講情面，雖然並不整人，但卻得罪人不少。黨的八大選舉，他得的票數竟在劉曉之下，外交部黨組會上就曾議論過。最後應説明的是，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更進一步登上神壇，張聞天則從不斷下滑直到長期淪為階下囚，兩人的領導才能已無法可比了。

政策思想

毛澤東有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張聞天卻沒有一套顯示於世的完全屬他自己的體系。在民主革命階段，張聞天確有不少光輝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屬對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貢獻，被納入毛澤東思想的範圍，何況在1935年以前還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當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68]它的核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想出來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69]在他提出「上山」和「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黨的領導

6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頁。

6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69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選集》，1979年版，第487、492頁。

人和地方幹部也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例如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在「八七會議」前就已到各地督促執行武裝暴動計劃，主張上山「當大王」。[70]「八七會議」後，各地的起義、暴動更是遍地開花，而大多數根據地也是在瞿秋白領導時期創建的。但是能夠堅持實踐和總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和政策，並取得最後勝利的還是毛澤東。這也是他成為共和國主要締造者和一代偉人的原因所在。在這方面，張聞天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只是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思想政策上頻頻失誤，犯了一系列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人們説的，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時間很長）錯誤區別開來。張聞天在共和國成立後並無機會提出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澤東卻有原則的分歧。這裏只舉數例以作説明。張聞天主張共和國成立後黨的工作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要搞一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並在取得政權後即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張聞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設，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則致力於反帝和搞世界革命，並爭着當頭。張聞天一貫強調民主，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反對突出個人（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和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一貫強調高度集中，實行獨斷專行，以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大搞個人崇拜。張聞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倡獨立思考和兼容並蓄，總是盡其所能幫助和保護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屬資產階級範圍，必須經常敲打，摧殘了大批專家學者和優秀人才，推行文化專制和「輿論一律」，嚴格限制言論自由。張聞天反對經濟建設中搞群眾運動，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對歷次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毛澤東熱衷於搞群眾運動，用鬥爭和運動推動各項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舉只是開個頭，有些

70 潘心源：《湘東各縣綜合性的工作報告》（1927年7月2日）；見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17頁。

問題下面還將進一步展開討論。其中許多問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歷史做出結論又是，「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並不是毛澤東説的「是一場階級鬥爭」，[71] 更準確些，應説成兩條路線的鬥爭。至於誰對誰錯，大約不會再有什麼爭論了。

理論與實際

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張聞天始終熱衷於鑽研理論，「在黨內是以理論家聞名的」；[72] 毛澤東更重視實踐，被稱為「實幹家」，[73] 相對説來對鑽研馬列興趣不濃，也沒下過功夫。二是兩人的發展軌跡有點背道而馳：張聞天從開始的教條主義逐漸變為能夠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得出較正確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毛澤東，在進入建設時期，卻變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脱離實際和脱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74] 平心而論，單就馬列理論的水平而言，張聞天要比毛澤東高得多，讀的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的《資本論》，據我所知，張聞天就至少精讀過四五遍。[75] 而「毛大概沒有讀過《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沒有下過大功夫」，「喜歡讀古書，……曾經認為『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了』，説經典著作讀起來沒

7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451頁。

72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載《人民日報》1990年8月30日。

73 如《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四節標題及其他有關資料。

7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75 張聞天在留蘇學習和教學期間就讀過幾遍。在延安主持《資本論》學習小組，逐章逐段討論，我還旁聽過。被打倒後在經濟所又一再精讀，還留下大量批註和讀書筆記，如〈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見《張聞天文集》四)就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味道」。[76] 至於説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張聞天提的不比毛澤東晚。同樣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中就提到，「要認真地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個説來，即使以現在的認識來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提綱)並沒大錯，既非整風中有人説的主觀主義的典型，也不是黨八股的代表作(因是提綱，所以被諷為「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水平決不在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之下。在任總書記時期，他開拓和執行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在解放戰爭期間做地方工作，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就更深了一層。但是歷史地看，張聞天對中國實際的了解和認識的深度確比毛澤東要差些。這是因為照我的理解，所謂「中國實際」，應包括現實中國和傳統中國兩個方面。這就是從過去到現在，當然還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毛澤東由於太熟悉傳統，因而多少受其束縛，對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和面向現代化就重視不夠。這大約是他「晚年」脱離實際和脱離群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舉個易

76 李鋭：《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頁。有關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的説法，長期以來流傳就較為廣泛。不久前(2002年11月22日)的一次會上，曾彥修還提到，田家英告訴他毛主席沒讀過《資本論》。于光遠在旁加以證實説，他可算「權威」，因為他在延安時是圖書館主任。除人們傳説外，毛在文章中也確未直接引證過《資本論》。《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書中提到「1954年，毛澤東又一次閱讀《資本論》」，似乎不足信。因為插圖的《資本論》只是寫了個出版年代，難以證明讀過。毛讀書有作批註的習慣，更何況讀《資本論》，但人們沒見到過批註。和插圖中的版本極相似的一本(可能就是這本)曾在毛中南海故居展覽過，我參觀時翻了翻，未找到批註。現在公開出售的毛澤東讀書批註極多，大部是古籍，但也有《毛澤東哲學批註集》和內部出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如果《資本論》讀了幾遍（1954年是「又一次閱讀」），那一定會有大量批註可供整理出版。而且像《資本論》這樣大部頭的書(加上《剩餘價值理論》共六大本)，毛恐怕不但沒興趣(「沒味道」)，而且也沒時間讀。在延安整風前學理論高潮期間，他鑽研的是哲學，沒參加《資本論》學習小組。此後大概更不容易抽出閱讀的時間了。另據莫洛托夫回憶，毛向他承認，自己沒讀過《資本論》。見(蘇)丘耶夫：《莫洛托夫訪談錄》中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頁。

為人們忽視的例子。號稱以農民運動起家和最了解農民的毛澤東，進城後卻用斯大林的辦法剝奪農民搞工業化，實行城鄉二元結構，把農民變成二等公民(梁漱溟因説「農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77]用戶口制妨礙城市化和消滅城鄉差別，致使至今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總不能説合乎中國實際和時代潮流。要説是理論聯繫實際，那理論也是斯大林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至於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窮過渡，製造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發動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掀起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沒有根據地強調和人為地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都越來越嚴重地脱離實際和脱離群眾，但卻能夠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當然都與中國的傳統有關，即幾千年的皇權和專制主義影響，再加上延安整風造成的一套體制、規則和不斷加溫的造神運動(個人崇拜)，也使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毛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學活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張聞天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張常説主席對中國歷史熟，會用權術。1962年9月17日張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被迫檢討交代時就再次承認，「説了主席的壞話，如説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78]廬山會議曾使許多人感到痛心：中共中央的全會(還有所擴大)，聚集了當代中國的偉人和精英，可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堅持實事求是、説句真話！連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等也痛斥自己、擁護《決議》。估計多數人是心口不一，是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領袖威信」而這樣做的，但也不能忽略黨內長期威懾所起的作用。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可見傳統影響之大，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兮，天王

7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8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還有「在這個問題上要為毛主席説幾句公道話」這樣不講理的言論！

7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215頁。

聖明」的封建思想意識在作怪。傳統在「實際」中的地位並不限於此。毛澤東思想之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這「實際」中重要一部分就屬傳統。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更多的就不是來源於馬列主義，而主要是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佔山為王等經驗的繼承和發展。經過廬山會議，張聞天也更悟出了學中國歷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懷不約而同地讀起了《資治通鑒》。總之，除了1935前的十年，就整個一生而言，把張聞天目為「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實的。把毛澤東稱為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也只適用於民主革命中的一個時期，共和國成立後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教條主義(自己的和照搬蘇聯的，還有對馬列的片面和機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資產階級法權等)，則要比張聞天嚴重得多。

國際與外交[79]

專門提出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張聞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這個問題比較重要，過去還沒討論過；由於工作關係[80]這一時期的情況我也有些了解。但這方面問題涉及面太廣，我還計劃寫一本有關新中國頭十年外交中若干問題的書，所以這裏不擬詳細討論，只擇以下幾點為例做些簡單説明。

79 有關張毛兩人的觀點和主張，這裏的論述只涉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從事外交工作時期。材料來源可參閱《張聞天文集》(四)和《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集)、《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5-9)中的有關文章或段落。除較為重要者，不一一加注。

80 1950年我跟張聞天進外交部，先後任駐蘇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副主任兼綜合組組長，主要從事調研和文件起草工作，實際上(沒名義)還是張聞天的兼職政治秘書，直到1959年。

一、關於和戰問題

張聞天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趨勢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兩」，「不僅要爭取持久和平，而且要爭取永久和平」。促進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有利於我國經濟建設。他也從不把戰爭與革命聯繫在一起，而是強調和平競賽，「因此，和平共處原則就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方針」。[81] 毛澤東同樣主張爭取世界和平，但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常強調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問題只在於「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而且「現在是帝國主義怕我們的時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打上十年吧」，人類「可能損失一半」，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完了仗再建設」。他後來提出的口號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保衛祖國，準備打仗」，甚至乾脆主張「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觀察和估量國際形勢，也是認為緊張更不利於帝國主義，因此還要主動製造點緊張，使他們不得安寧。[82]

二、對世界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看法

張聞天認為，二戰後世界出現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當時期內都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形勢，資本主義還有較強的生命力。民族獨立運動一般是資產階級領導，建立的也是民族主義國家，但都具有歷史進步性。[83] 1955年還明確提出，戰後形勢已改變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的論斷。他一再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對民族主義國家，「要向

81 《張聞天文集》（四）中的〈論和平共處〉、〈戰爭是可能避免的〉；倪立羽等：〈張聞天與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82 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的有關章節。

83 見〈對亞洲形勢中若干問題的看法〉等，載《張聞天文集》（四）。

它們證明，我們並不想挖它們的牆角」。「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腫臉充胖子」。毛澤東則趨向於推進世界革命，要充當世界反帝的頭（「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1958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正，[84] 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個陣營中可能採取中間立場的問題，仍堅持這些國家要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過渡，把當權的資產階級列為「帝、修、反」中的「反」，號召和支援（按情況給予政治、經濟以至軍事援助）各國人民起來推翻它們。進而得出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成為一些國家所謂「毛派」游擊隊的理論基礎。

三、在對外關係上，張聞天主張面向世界，爭取早日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曾專門寫報告建議同英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發展商貿關係，推進文化交流，引進外國的資金，特別是技術

他在共和國成立前所寫東北經濟構成的報告中即提出六種經濟，內包括「秋林經濟」（當時蘇聯在哈爾濱辦了個秋林公司。張以此名詞代表利用外資）一項，[85] 後被毛澤東、劉少奇修改時刪去，剩下五種。毛澤東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實際上執行的是閉關自守政策。先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後發展為「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86] 認為同美英等西方國家遲點建交好，美國越搞經濟封鎖對我越有利，也不急於參加聯合國（五十年代還曾提出，要參加得滿足先決條件：撤銷宣佈中朝為侵略者的決議，

84 〈新民主主義論〉注（1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10頁。

85 〈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基本建設方針的提綱〉，《張聞天文集》（四），第27頁。

86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8頁。

通過美國為侵略者的決議，修改聯合國憲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蘇加諾(編按：Sukarno，印尼建國首任總統，任期為1945–1967年)籌組「新興力量國家」的聯合國)。所以鄧小平在談及對外開放時曾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87]

四、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提倡勤儉辦外交，但張的要求更高，處處強調節儉，並且身體力行

毛卻喜歡講點排場，特別是總想出頭，以大國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張曾先後建議對國家慶典和外交禮賓應根據樸素大方原則和國際慣例進行改革或重新規定。如一年兩次(五一和十一)檢閱遊行、國際和外交事件幾十萬人上街(慶賀、聲援、夾道歡迎等)應予精簡。外援要量力而行，適當減少。對外關係中的禮賓工作也須改革和簡化，反對鋪張浪費、弄虛作假、講排場、擺闊氣。但必須照顧國際法、遵守國際慣例，不能為所欲為。他的意見，有些被採納了如五一慶典等，但禮賓改革卻遭到反對，沒能行得通。因為毛澤東實際上還是喜歡規模聲勢大些，特別是以個人好惡任意行事。如對伏羅希洛夫(編按：Kliment Voroshilov，1953–1960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接待就故意弄得過分盛大(夾道歡迎等)，對赫魯曉夫則很不禮貌，一次在赫剛到北京下榻處，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見。對一些國家或政黨，高興時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不高興時不惜斷絕關係(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願受約束，認為可以「無法無天」，藐視國際慣例，實行以我劃線。例如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蘇(「修」)關係好、不接

8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8頁，另參閱第90頁。

受毛澤東思想的，就一律歸到「帝修反」(編按：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及各民族主義國家的當權派)一邊。結果只是孤立了自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別是蘇「修」，對外援助也不斷加碼。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國家外，對一些當時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許多的國家如馬耳他、敍利亞(還是主動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達到頂峰的1973年竟佔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後的1993年降為0.36%)。但張聞天在外交禮賓和節儉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對交際活動如接見外賓、送往迎來等有些厭煩，不願多交際，更少同外國人交朋友，原因除個人性格外，也可能是為了珍惜時間和避(裏通外國)嫌。二是過分節儉，影響外交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駐蘇使館工作四年，張聞天沒有一次派人或組織去外地參觀訪問，大家幾乎都沒有離開過使館。一次幾個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旅程食宿還是自費，實在顯得有點寒磣。

下面特別提出兩個黨內生活問題討論，是因為它們比較重要，而兩人在這上面的差異也顯得突出，表現為各執一端，至死不改。

民主與集中

張聞天強調民主，不但理論上提倡，而且身體力行。這也許與他五四運動後接受西方文化較多、而中國傳統觀念較弱有關。毛澤東更強調集中。延安整風為他的集中領導奠定了基礎，共和國成立後更逐漸發展到個人專斷、淩駕於黨之上、破壞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88]而且這也是由來者漸，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時，張毛兩人在同一會上講中國新文化的方向，張先提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毛澤東後提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

8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2頁。

去掉「民主的」一項，就已顯示了原則的區別。從兩人對民主的論述中更可看出這種差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民主是手段。[89]他在談到民主時，幾乎不提選舉權和罷免權，多是強調發揚民主以提高下級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總是講，要讓大家說話，領導者要硬着頭皮聽，頂多是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以在延安同黃炎培的著名談話而言，也是籠統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監督政府，而沒有強調群眾當家做主，可以起來罷免和改換政府領導人員。張聞天沒見到講過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話，但從他一再提「為自由民主奮鬥」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還是目的。講到民主時，他從蘇區起就一直強調選舉權與召回(罷免)權，在東北做地方工作時更是付諸實踐，有時做得還有些超出黨章的規定。如在開闢新區和進行土改時，對發展黨一時採取過「自報公議黨批准」的作法(因那裏沒黨員，想入黨的找不到介紹人，於是就用經群眾公議認可後報黨組織批准並幫其找介紹人的辦法)。對於實行集體領導，張聞天更是終生不逾，稍為重要一點的問題都要在相關的會議上解決，而避免個人拍板。因此他的領導就顯得會議特多。他也能做到從諫如流。毛澤東批評他遵義會議後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90]他當即接受毛的建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但他還是堅持重要問題會議解決，因而還是會多。當總書記，中央的會多；當省委書記，省委的會多；當大使，館務會多；主持外交部常務，部領導每天開碰頭會；[91]直到被打倒後無權再召開任何會議。相反，整風後毛澤東是逐漸取消集體領導，黨章有關各種會期的規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隨意拖延不按時召開，就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也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時間隨

89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8頁。

90 《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

91 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因部黨組書記是周恩來，他以副書記身份不便召開黨組會，故名之曰部領導碰頭會。

便定，出席的人也沒定規，致使身為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在七大過了七八年後還有一次問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員？」(因林伯渠給蘇聯《真理報》寫了文件，對方要問身份)。我說，「你們不是常在一起開會，怎麼還不知道？」他說，「政治局不大開會。」既如此，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或駐外大使，他又怎樣能發揮政治局委員的作用呢？至於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延安整風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已逐漸演變成大家服從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數從不同意轉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

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

這兩者雖有聯繫，但並不是一回事。而且群眾運動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運動中還套多少不一的小運動。以前的情況不很清楚，從延安時期起就已經常大搞群眾運動。我趕上參加的就有生產運動、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搶救運動等等。共和國成立後更是運動不斷。張聞天對共和國成立後的群眾運動，態度大致分兩種。他明確反對用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因為他精通經濟學，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曾是後來受批判的重點之一。對於政治運動，他未敢明確反對，但多持消極態度。運動來了，他不能不應付，照例作動員和總結報告。但在運動中我看他的重點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為例。他先是在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遲遲不歸，直到周恩來一再電催才回來，這時已劃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後，面對「積極分子」的熱情幹勁和對他的壓力，但他還是強調慎重，提出能不劃就不劃。各單位提出要劃的對象後，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甚至找點藉口保護著名知識分子。如著名學者老黨員陳翰笙，下面一定要劃，他拖不過去時，就提個理由說，鑒於陳過去的歷史和貢獻，就把他看作「黨內

的民主人士」吧，劃成嚴重右傾也可以了。結果，外交部前後只劃了二三十人，不到全體幹部的百分之一(連駐外使館約三四千人)。而有的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劃的卻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後處理，他也盡量設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調去研究所或搞翻譯，而不是送往邊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外事會議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護右派。毛澤東則完全相反。他幾乎可稱為製造群眾運動的專家，延安整風後就更加熱衷於群眾運動了。其實過去的許多群眾運動並非群眾自願或自發地起來參加，而是運動群眾，如延安的搶救運動、共和國成立後的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這方面情況人們盡知，無須多談。

再看被列為毛澤東思想基本特徵之一的群眾路線問題。這是毛澤東的創造，表面上看，張毛兩人的說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細考究起來，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根源就在對民主的理解上。張聞天做遼東省委書記時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幹部大會上作群眾路線的報告，要我記錄整理以便發表。[92] 他的觀點主要為：「人民群眾是主人」。他說，人民是新社會的主人，是最高統治者，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選舉出來為自己服務的，服務不好，可以隨時撤換。他認為這種民主制度現在有些地方還沒做到，是因為一方面某些領導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務員的關係顛倒了過來，一方面群眾也把黨政領導當成官老爺，順着來，不敢得罪他們。張聞天不僅堅持這種民主思想和作風，而且在可能的條件下也照此實踐，如在東北做地方工作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只是一種好的領導方法。他提出為人民服務和依靠人民，聽取群眾意見，一再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特別是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質上，所有這些都並不意味着真的

92 此件整理好經他審改，以省委宣傳部名義在《遼東大眾》日報上連載，後來還出了單行本，《張聞天文集》(四)選用了一部分，見第123–128頁。

要人民當家做主，而是為了使領導不要脱離群眾。所以在毛澤東的言論和實踐中，不但從不強調群眾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也不重視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也是為什麼群眾路線講了幾十年，中國不但見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來越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許多事情不讓群眾知道，甚至不准議論。至於「從群眾來，到群眾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領導(統治者)和被領導分開來的。甚至可以說，連封建專制時代少數開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會一些時期的「采風」制度等。總之，張聞天的群眾路線是「由民作主」，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是「為民做主」，兩者有質的區別。

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是馬列主義建黨學説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提倡的三大作風之一。可就在這個問題上，張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極端。如上所述，張聞天對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幹部，對小幹部和群眾則不然)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批評顯得非常嚴厲，不大講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劉英近來還多次談到這點，説他是書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無整人之心，也絕不會抓住幹部的辮子不放。對自我批評，他也主動做，但不像周恩來那樣經常。只有在強大的壓力下，他才是來者不拒，無限上綱，包括不少違心之論。事後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務似的。延安整風時的口頭和書面檢討就是這樣。廬山會議和「文革」中也是這樣。對此下面還要專門討論，此處不贅。毛澤東則相反，批評往往因人而異和看機行事。對一些人，有意見平時也不説，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不但算總賬，還常有許多偏激過頭之處。對另一些人則不時敲打，大小問題(不一定錯)概不放過。對有些人又是不批則已，一批就要打倒。對多數人，平時很少批評，更多安撫。而且批評還有遠近親疏之別。被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對江青及「四人幫」的批評就祥和得多，還顯得頗為親昵。如説，「江青同志，你要

注意呢！」「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説「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93]而且與此同時還着重表揚了江青等人，説他們反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問題要講明。」[94]對他的許多老戰友，如功勳卓著、誓死保衛他的彭德懷和對他「扶上馬、送一程」的張聞天，就只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諷刺挖苦、無限上綱，更不會有那麼多親昵的「呢」和表揚什麼功。至於對自己，正如本人所説，「我是不作自我批評的。」他還對毛遠新説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的」，「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95]例如在延安整風中，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反省筆記，「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96]實際情況是，別人必須寫，因為這是「鐵的紀律」，他卻並沒寫。至於延安整風以後，被官方黨史學家和個人崇拜者交口稱道和竭力誇張的自我批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發動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後向被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説，「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97]一次是在「人禍」造成三年困難、餓死三四千萬人和大量群眾罹患浮腫之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説的，原話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98]這哪裏像自我批評！對於造成那樣嚴重後果的問題這樣輕描淡寫，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風時強調的一定要列出具體事實和造成的後果，分析錯誤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們批評有些人的所

9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第394頁。

94 見《百年潮》，2001年第8期，第76頁。

95 轉引自沙葉新〈「檢討」文化〉，《隨筆》，2001年第6期。

96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6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9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281頁。

98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22頁。

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因為他講話中間任何帽子（如主觀主義、唯意志論、不實事求是或脱離實際脱離群眾等）都沒有。像這樣的自我批評，任何領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換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無法通過和過不了關的。所以廖蓋隆認為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99]田家英也説，毛「聽不得批評」。[100]這都説明，毛不作自我批評又聽不得批評的一貫作風和表現是盡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是要求別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文化人」與「山大王」

用這兩個稱號毫無貶義。一則他們都曾自稱過。二則一些崇敬他們的人也這樣講。例如馮雪峰1934年在中央蘇區説，「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聽後不禁開懷大笑。」[101]關於「文化人」，張聞天自己就説，「我同沈澤民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102]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在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張聞天。後來，毛澤東採用了張聞天的提法。」[103]1940年10月10日張聞天起草下發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104]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寫作自由、幫助和團結他們等。繼承和發揚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如熱愛祖國、忠於信仰、憂國憂民、

99 廖蓋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7頁。

100 轉引自李鋭：《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125頁。

101 見《百年潮》，2001年第9期。

102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3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頁。

10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第496–499頁。

獨立思考、喜歡探索、與時俱進、站在時代發展前列、以天下為己任、對敵鬥爭勇敢頑強，等等，張聞天都是當之無愧的。他入黨後不久即斷然和他極其喜愛並已有相當成就的文藝決裂。茅盾談到張寫長篇小說之早時曾「自歎不如」。還說，「假如聞天同志不是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鬥爭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佔一席之地，充分發揮出他在文學上的才華。」[105] 然而張聞天，不論是為革命出生入死，還是運籌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無怨無悔，總是心懷黨國，仍然盡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見，希望採納。其責任心之強，真是少見。我看他確實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否則也許不會在廬山栽得那麼慘，被打倒後還提開放市場等建議。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情況下，他沒有寫有關自己的片言隻語，而是偷偷寫了大量總結國家建設經驗的文稿。胡喬木就對劉英說，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張聞天也有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耿直和某種清高，見不得阿諛奉承和溜鬚拍馬。當然，他也因清高而吃虧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別人「順着」自己的毛澤東。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個字中就有一個「高」字，不變動他的外交工作也說是由於他驕傲。其實，人們看來他並不驕傲，完全是一個見人還略帶靦腆的謙謙君子。這是許多熟人在紀念和回憶他的文章中都寫到過的。但是，一般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缺點和短處，有些他也並沒有克服掉，最明顯的是軟弱性。這首先表現為在黨內鬥爭中不夠堅強，往往會在壓力下作無原則和無限上綱的反省和檢討，給自己戴大帽子、作違心之論。當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決不承認「裏通外國」和「推翻毛主席」。對別人的揭發交代則堅持實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過頭檢討，實有難言之隱。他的軟弱性還表現在說話謹小慎微、與人很少來往。他本來不長於交際，再加上過去運動的教訓，就盡量減少同人來往，甚至

105 茅盾:〈我所知道的張聞天同志早年的學習和活動〉,《回憶張聞天》,第72頁。

過去的熟人也逐漸變成了「生人」，如黨的許多領導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漢等當年文化界的朋友，共和國成立後都很少見面，見了也是多聽少說。他同一些領導人如聶榮臻、王震等散步或遊覽，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別人滔滔不絕，他卻很少插話。從相互來往看，我一直覺得他同人只有工作關係，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談。這種除工作外，多閉戶讀書，少交際聊天，在他可說已習以為常。所以延安整風以後，他不但不大和同級以上幹部交往，更怕見毛澤東、劉少奇，也就是他後來檢討說的是由於怕毛主席批評。毛澤東批評他的五個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辮子搞無限上綱的批鬥，也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對敵鬥爭和堅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實了。還有一點，就是共和國成立後，他對毛澤東、黨中央一些重要方針和許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見，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這是在他身邊工作的人能夠察覺得出來的。後來大概是憂國憂民的情操和堅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才有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爆發。

毛澤東卻大不一樣。他雖然也出身知識分子，學問很深，見識極廣，但卻很少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習氣。這除天賦外，也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從小紮根中國社會，種過地，求過學，當過兵，教過書，參加政治活動，領導工農運動。他不像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書生入黨，而是入黨前就已經歷大量社會活動，所以學馬列雖少，卻善於聯繫實際。再加上他們家族有從軍打仗的傳統，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從小就尚武好鬥，敢於進擊冒險。傳統哲學對他影響最大的又是「內聖外王」，即梁漱溟說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輕時就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給彭璜的信中還承認自己「論理喜極端，論人喜苛評」，「略有傲氣」。頭一年的6月7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也說，「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

活。」[106]上面這些，特別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識，可說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八七會議」後謝絕瞿秋白勸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當「山大王」，即屬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不足千人的隊伍退到瀏陽文家市，進行了一場涉及中國命運的辯論。師長余灑度等仍主張休整後再進攻長沙。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打長沙必敗，主張退到山區去。他說，哪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何況我們當「山大王」已和過去根本不同，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黨的政策，將來必會取得勝利。他說服了大家，隊伍沿着羅霄山脈南撤。[107]這一星星之火，象徵着毛澤東開始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的「紅色山大王」路線勝利了，而毛澤東本人在長期的游擊戰和同農民相處中也確實養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風。他在革命的武裝鬥爭中，還進一步發揚了尚武好鬥、進擊冒險的精神，認定目標就堅韌不拔，奮鬥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陝北堅持以寡敵眾的戰爭，有不少人勸他離開，他硬是不聽，還為此和任弼時大吵了一頓，最後以撤掉任的支隊司令了事。至於在中央蘇區和長征中冒的風險那就更多了，都證明了他的大無畏精神。再就是決心大，有氣魄，能進能退，能屈能伸，既堅持革命原則，又能靈活運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來潮與退潮，在戰爭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真不失為大丈夫。很明顯，革命如只守條條框框，不講靈活，毫無權變，那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條主義者失敗，毛澤東最後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東西被繼承了下來。如「無法無天」，不受約束。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須列舉。這裏只要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歸之為「造反

106 以上所引資料均見胡長明：〈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斷想〉，《書屋》2001年第7–8期。

107 參閱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14–115頁。

有理」，[108]實在是過分簡單化，在革命期間也許還有一定意義，但在取得政權後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別是在需要法制的情況下，號召「無法無天」，使黨章、憲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廢紙，只能引起天下大亂，嚴重損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澤東說的七八年來一次，那中國就可能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強，罔顧他人，事例也是舉不勝舉。毛總是以個人為中心。對於反對他的人，不是當場發脾氣訓斥，就是長期記怨，尋機報復。所以領導幹部都有點怕他。即以生活習慣而言，他也很少顧及別人，想起什麼就叫人幹什麼。例如他在戰爭中養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在延安如此。共和國成立後生活已安定，但他並未想改，還是要許多人跟着他轉。如作為中央第二把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不但是跟着他夜間辦公，而且有許多次是吃了安眠藥後還得隨叫隨到。為了不至於因吃安眠藥容易從床上掉下來，曾長期打地鋪睡覺。[109]

性格、愛好和作風

用這麼大個標題，其實只擬着重寫三個問題。因為有些內容前面已經講過了，有些也許不值得多寫。

一、談起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性格，差別實在太大。張聞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時外就一直是和書本打交道，養成一種較為典型的書生氣，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極為相似。他說話算數，從不否認。對過去的功過一概不提（甚至包括過去運動中的過火批判和過頭檢討，他事後既不再多講，也不乘機翻案），既不吹噓「出五關」，也不掩

108 原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12月21日），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109 見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飾「走麥城」，更不像一些人為自己歷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習慣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動都按原則、守規矩，開會、上班從不遲到。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那樣溫文爾雅、溫良謙恭，看不出有什麼威嚴。我跟他工作十餘年，從沒見過他和人吵架或發脾氣。例如一次使館翻譯記錯了南斯拉夫國慶節，害得他跑進人家使館就趕快回頭，一路沒說話，只是回到使館臨下車時說了一句「你要很好檢討！」又如一次我幫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話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說了一句「我自己來改」。他從不罵人，從不說一句髒話。作起報告或講話來，總是文質彬彬，擺事實講道理，只宜宣傳，不善鼓動。有些黨史著作上說他在「左」傾時期，對意見不同者如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果說的是寫文章有時用語兇狠，倒有其事；如果說進行實際鬥爭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於說他在中央蘇區肅反中錯殺了多少好同志，更屬張冠李戴。相反，他不僅反對肅反中的極左，還盡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澤東則有鮮明的個性，嬉笑怒罵，一般不加掩飾。但出於策略考慮，他也可長期埋在心頭，時機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鄧小平說，毛在共和國成立後就有去掉劉少奇之意，連一「少小離家老大回」[110]的比喻都不放過，但還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談話看對象，同有的人可以談得很雅致，但在氣頭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說來，他的性格還是比較粗獷豪放的。但對人也用權術，說話不時出爾反爾，經常改變以前說法(修改發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如以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極為恭敬，還去訴苦告洋狀，後來卻說成一直同他們進行鬥爭(黨史學和某些人的回憶還添油

110 1958年，劉少奇曾以此詩為例，說唐時高官上任也不帶家眷。毛專為此查書，說明作者賀知章出外做官是帶了家眷的，不但寫了材料，在中央會議上講，還在黨內作了傳達。

加醋)。斯大林逝世時，我正隨張聞天回國，得知他那幾天情緒極為沉痛，長時獨自坐在沙發上，見人也不說話。他還親自寫了篇《最偉大的友誼》，感情之深，溢於言表，但他後來竟說此是「違心之作」。說過的，事後加以否認；沒說或沒做的，事後又說得有鼻子有眼。這類例子在實際中甚多。此外，或許是由於過去的經歷和從小養成的性格，他容易發脾氣、喜歡講粗話。對於後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眾大會上聽到過，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給赫魯曉夫的信中看到過。

二、這裏談兩人的愛好，主要指讀書。因為張聞天幾乎沒什麼嗜好，不吸煙、不喝酒，連劇曲也沒多大興趣，主要的愛好可能就是看書和研究問題。參加革命前喜歡讀文學書和研究文藝問題，寫作和翻譯的東西也真不少。中國的古典小說也看，但主要看外國的和新文學，其次兼及一些社會問題。參加革命後即集中閱讀馬列理論，並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獵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以至科學技術等某些專業書籍。例如在駐蘇大使任內，就幾乎每個禮拜日約我上書店，購買一批有關蘇聯情況或國際、外交問題的書。他的工資，除一些捐贈外，恐怕有相當部分是用於買書。他買書不是擺樣子，而是真看，做筆記，寫心得，更有不少批註。但他似乎不大喜歡讀中國古籍。我幫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詩詞，他必定刪掉。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傳達毛主席的講話，裏頭引用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一句，他竟說成了冷冷清清淒淒戚戚，為大家所笑。

和張聞天一樣，毛澤東也酷愛讀書，只是兩人所好不同。毛對中國古籍百讀不厭，但對通行於世界的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理論一類書卻讀的不多，對外國文學更沒多大興趣，很少讀什麼世界名着，據說只讀了《毀滅》、《簡·愛》兩本外國小說，《紅與黑》還是只看電影沒看原著。但他對中國古籍讀得多，記憶力又好，許多古文、詩詞，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

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111] 他在講話中經常以古喻今，可以長篇引證原文，順手拈來，毫不費力，但從未見他引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話。有人統計，《毛澤東選集》中引用中國古籍比馬列(又以斯大林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愛好古籍，還經常挑選一些古文叫印發給中央領導或某個會議參加者看，如《後漢書》的《張魯傳》、枚乘的《七發》等。有時還要考問一些領導人，《資治通鑒》看了幾遍？直到臨死前還要人給他念庾信的《枯樹賦》、賈誼的《鵩鳥賦》，以及岳飛、張元幹等人的詞。[112] 在讀書上的這種「厚古薄今」，恐怕對他有不小的影響，多少會妨礙他在考慮問題和制定政策上的現代觀念和世界眼光。共和國成立後喪失一次大發展的良好時機，導致中國的落後，不能説與此無關。

三、關於生活作風特別是節儉問題。張聞天真可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模範地實踐了他在〈論青年的修養〉一文中對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風嚴謹、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強調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且主張用法制規範幹部待遇，堅決反對特權和特殊化。他非常討厭那些用公款請客送禮(那時還沒聽到行賄受賄的事)，拍馬溜鬚，巴結領導，拉關係，謀私利的人。他的儉樸、廉潔，在黨內歷來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慣有的領導幹部住闊綽寬大的住宅，更反對一些人保有幾處「公館」。他的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從以下例證中即可見一斑。在使館，夫婦只佔兩間房子，還兼辦公室用。進北京時有幾處院子讓他挑，他都嫌大，最後住進了一座臨街的小樓，連個放書的房間都沒有，他又愛買書，只好在走廊上擺了一排書架，人走過要側身而行。他回國後看到給他換的新沙發、地毯，也堅決退掉。後來外交部幾位副部長提出搬到東交民巷一個原外國駐華使館大院，

111 李鋭:《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307頁。

112 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頁。

正樓讓他住，其餘的樓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堅決不搬，別人也只好作罷。直到1959年他被罷官，大家才搬了進去。我在別處曾説過，他對三個親生子女要求之嚴，在高級幹部中可能屬空前絕後。大女兒始終是普通農婦。二女兒原在外交部當打字員，他回國不久中央提出精簡編制，他就動員女兒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後當了工人。他送獨生子去新疆建設兵團勞動，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時也沒回到身邊。他從不以權謀私，在他那裏更無「後門」可走。他生活樸素，吃穿簡單，衣服好像總是那幾套。生活上以清貧為樂，連發表文章也不要稿費，不是交了黨費，就是分給了起草人和抄寫者。直到生命的最後，還將補發的工資悉數交了黨費。但現在看來，他的節儉有些地方也顯得過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駐外人員工資，致使最近還有反右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著文不點名地批評他。另外，他對子女親屬要求也太嚴，使一些晚輩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113]

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號召勤儉建國和勤儉辦一切事業。他能吃苦耐勞，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表現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節，更隨着革命取得勝利和個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風也有很大變化。這裏只提以下三點作一簡單説明。一是造成越來越嚴格的等級和特權制。這既是繼承中國的封建帝王傳統，又是從蘇聯搬來的社會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任弼時任中央秘書長和彭真代中組部長後就已逐漸制度化，經過整風大批絕對平均主義就更屬合法，共和國成立後已發展到超過了蘇聯。有時也聽到他的口頭批評如對警衛制度，但實際並未制止，執行者總是得到好處而不會吃虧。不但等級制森嚴，他也常自比秦始皇。無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參觀延安革命

113 以上情況除多年跟他工作時的體察外，還從1999年起與劉英有過幾十次談話。另可參閱《張聞天年譜》有關條目，如下卷第914、965、980、1218等頁；以及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張聞天》和中共黨史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四卷《張聞天研究文集》中的有關篇章。

紀念館時，在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前輩的照片前駐足良久，並深有感慨地說，「當年他們是弟兄，可後來卻成了君臣。」[114] 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頭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對此，辯護者總歸之為地方上「抬轎子」。但上面為什麼不制止？毛還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劉莊和汪莊、上海的西郊、武漢的東湖等。事實證明，「抬轎子」還真有用。而且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5] 三是關於稿費的處理。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曾規定除工資外，「黨的高級幹部嚴禁有包括稿費在內的其他任何收入」。後來雖有改變，但為數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為主要收入。[116]可是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後頭十多年僅稿費收入就已成「百萬富翁」、當年中國的首富，並單獨立項，只能由他本人決定和批准支出。臨終前江青要去三萬元還曾使他落淚，這是當時全黨傳達過的。這裏值得考慮的是，第一，毛著有許多是別人起草和修改，有許多是黨的文件，多為集體創作，例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多數講話還是胡喬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歸他支配似不盡合理。第二，毛著印數多、稿酬高，且多是黨組織買來發給大家。例如我們夫婦二人，前後已領到不同版本《毛選》七八套，還不算各種單行本和《語錄》。所以毛澤東的稿費實際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澤東費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衛等)已是他工資的萬千倍，稿費只是用於買書、生活補貼和資助親友(如每年給章士釗兩千元)等，另為修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補償五萬元，實際上用處有限，因而稿費的積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書文)就特別快。像這樣的稿費只能完全由個人支配是否合適、算不算按勞分配，確是個問題。[117] 提出以上三點，並不是要批評毛澤東的生活作風，主要是想說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唱點反調。因為他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的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制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18] 另如毛去世後全國普遍放映了一個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臥室、書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顯得甚為豪華，從住房到游泳池長長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紅地毯。但是很快這部記錄片不放映了。等故居開放讓大家參觀時，已作了全面的重新佈置，一切都顯得非常樸素，紅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掛了件帶補丁的睡衣，書案上放了本不像翻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影片兩相對照，弄虛作假的現象甚為突出。質言之，毛澤東進城後就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講的兩個「務必」。關於「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

114 見《炎黃春秋》，1999年第3期，第56頁。

115 參閱《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99頁。

116 俄國《真理報》2003年3月9日載文:〈克里姆林宮主人收入揭密〉。

117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大觀》(第1030頁)上說，「除工資外，毛澤東擁有大筆稿費，在五十年代，稿費就達人民幣100萬元。」「毛澤東的稿費，他自己動用的每年不到一萬元。」另據韶山紀念館所編《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1960年前後，毛澤東稿費收入每年為二十幾萬，利息月1.5萬元。該書第511頁也提到，毛澤東稿費存款「50年代即達100萬元」。

118 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702頁。

經替他作了結論。至於「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上面提到的幾點，也許可以作為討論的參考。但應該說，這兩個「務必」張聞天是完全做到了。

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特別是國外、港台和當年的國統區，老早就已展開。這裏不擬多談，只是想在同張聞天比較中簡單歸納一下毛澤東成為黨國領袖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他的道路合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離開農民就寸步難行。中國黨先期的精英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一開始都對此認識不足或不深。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時也沒有準備紮根農村，倒是後來才由朱德、陳毅率領部分起義部隊去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只有毛澤東逐漸認識到並始終堅持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

第二，毛澤東也具備了當領袖的主觀條件。由於他有馬列一些基本原則的指導，就使他的領導同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領袖和當代的草莽英雄有了一定的區別。而他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又超過同時代黨內其他領導人。他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中國基本國情，在長期的實踐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還熟讀中國歷史，博古通今，從中汲取了大量有關領導的方法和技術，包括張聞天說的某些「權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毛澤東成了使中國走上集中統一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澤東是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也從未離開過軍隊和根據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119]，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廣泛的幹部和群眾基礎。例如安排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來自原中央蘇區和一方面軍的幹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澤東的影響。相形之下，張聞天幾乎是光杆司令。

第四，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它的領袖主要不取決於中共本身，而是取決於國際。所以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20]這裏所說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談話。共產國際作此決定，不只是因為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還因為他的影響大，掌握了黨和軍隊的實力。正是由於毛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締造者，所以國際過去雖然對他的政策和作風有所不滿，但還是設法保護他，而且在中共領導人中對他的宣傳也最多，1938年乾脆指定以他「為首」。

第五，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和蘇聯模式的結合，對中國黨的建設和領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這主要指個人崇拜和領導體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對領袖呼萬歲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體系，起始於延安整風，大概只是中國的特色，在外國是沒有的。完全以對領袖的態度劃線和根本不按黨章辦事(如定期的會議制度)，也是延安整風立下的先例，並產生了長期影響。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這樣做還因為毛澤東代表了正確路線，那麼共和國成立後全黨跟着毛澤東的錯誤跑，就只能用個人崇拜和專制體制來解釋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終身領袖的地位。

119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7頁。

120《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425頁。

張聞天應屬個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澤東成為領袖的過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風期間還有意無意地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的工作。這從他參加和修改《歷史決議》，特別是從他的《反省筆記》和各次檢討發言中，就可明顯地看出來。

第四章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整風開始，張聞天首當其衝

毛澤東常說「不破不立」。那麼延安整風要立和破的是什麼呢？毛澤東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這個「道」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整風也就是為了立毛澤東及其政策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為此就得破對他有妨礙的人和事，主要是蘇維埃後期的「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這條路線被後來黨史上定名為「王明路線」，經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人們自然會認為批判的第一個目標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整風的醞釀和開始階段，首當其衝的卻是張聞天。[2]這是當時延安人大都心裏明白，並在下面有所議論的。

毛澤東的幾篇整風報告，聲討教條主義、挖苦「理論家」，人們一看，就知道主要矛頭是對着張聞天。特別是《改造我們的學習》和《反對黨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更是明顯地指張聞天而言。因為張在六中全會的報告《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提綱），[3]就前後用了四種符號分段，大家議論中一對比，很容易聯想到的就是這篇。（其實，1939年6月毛澤東的《反投降提綱》，[4]所用數字符號比張還多，但因當時多數人看不到，即使聽到看到也不會聯想到，所以沒有相關議論。）

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張聞天，這也是張本人完全察覺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就有比較詳細的敍述和檢查。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

1 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梁漱溟自述》，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

2 可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頁。

3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4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同上。

逐漸轉移，……（後來）實際上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而正是宣傳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有時「還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王明活動的方針是：一方面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方面捧毛澤東同志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加以打擊。」「聯繫到毛澤東同志對於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志。」由於總是受到批評和責備，所以「我的工作情緒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盡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負責任。」「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找陳雲、康生談談，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中央決議通過的，照着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均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5]感到有點動輒得咎，很難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終於按康生、陳雲建議，主動找毛澤東談了一次話。這次「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他約了康生、陳雲、弼時同去談，他嚴厲地批評了我一陣，說我有狹、高、空、怯、私的毛病，說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我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說我在會理會議以前政治動搖等等。我聽了雖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始時，我覺得會議的主要打擊方向是我。王明當時興高采烈，想乘機向我進攻。」[6]

這裏引張聞天的話多一些，是為了以他自己的親身感受，證明延安上層的整風，從醞釀準備起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批判矛頭一直是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詳見第一章注15。

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衝着張聞天的。而且不僅是毛澤東帶頭責備與批評，更如上引胡喬木的話，批張還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7]文章很多。如李維漢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一文，就直接批評「領導幹部教育的負責人」；3月24日陳雲〈到什麼地方學習〉一文，也批評把「幹部長期放在學校裏『學習理論』」，等等。甚至為了批判還可以不顧事實，像胡喬木指出的，「説文藝座談會是為了糾正文委工作(張聞天領導)中的問題，這話不符合實際。這是後來的一種解釋，是做文章」。[8]李維漢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説，「1939–1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共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9]

就是上述毛澤東的批評，不但偏激過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同他歷來對張聞天的評價：開明，講民主，不爭權等，就顯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無中生有，如説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上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他，以及「政治動搖等等」。

對於諸如此類的批評，特別是毛澤東所談，張聞天聽後甚感委屈。但他沒有多加辯解，而是從大處着想，嚴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認了錯誤。因為從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就一直認為他在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犯過嚴重錯誤，為此在六中全會上不僅作了檢討，還鄭重提出請求處分。所以對毛澤東這類過火批評，除個別事實表示保留外，他並不進行解釋和爭論，只是「反求諸己而已矣」。但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的態度不僅表明了他個人已完全服輸「繳械」，而且也標誌着發動主要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的時機已經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兩個月後就召開了政治局的九月會議，發動了清算蘇維埃後期

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頁。

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頁。

10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頁。

「左」傾路線的鬥爭，宣告了上層整風的正式開始。而且正是張聞天在會上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決心補課。會後不久，他就為了不干擾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和使自己接觸實際，同時在毛澤東的壓力和排擠下，也擺脱難以正常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話，就是「因為對毛主席的思想了解還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還做不來，做不好」[11])，遂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經中央批准同意，張聞天即於1942年1月率領由原馬列學院一批同學組成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晉西北作調查。從此，他實際上也就永遠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

從遵義會議起，張聞天就對毛澤東實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後同長江局的關係上毛澤東一度處於孤立時，他也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而且六中全會前後還一再主動讓權。有如以前一些蘇聯漢學家所説，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張聞天對毛澤東是「扶上馬，送一程」。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對他還成見那麼深，以至於把他作為中央整風的第一個批判對象呢(而且挖苦諷刺和打擊了大半輩子)？分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由於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

後來被定為「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是王明、博古、張聞天。實際上，不但在九月會議前，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個1942年，鬥爭矛頭也不是對着王明。[12]王明自己1944年3月7日給季米特洛夫的密電，也説是「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

11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2 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頁。

展的重大運動」，就是指1943年才對着他。[13]而且當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實在沒有覺得王明的影響比張聞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談起，大家都有同感，認為王明多半是後來炒出名的)。詳細情況下節還要談到。至於博古，遵義會議被趕下台後，在黨內已沒有多大威信，這時也未擔任什麼重要職務，顯然不值得對他大動干戈。而張聞天則不然，遵義會議後當了名副其實的三四年總書記，任期內實現了中國革命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黨內是有相當影響的。這點連毛澤東本人都極為重視。[14]而且從形式講，直到這時他的總書記還未被正式和明確免掉，還被稱為「黨的領袖之一」(當時出席一些會議或做報告時介紹的稱呼。又如1939年11月14日山東省委主辦的《大眾日報》轉載張文的編者按說，「中共領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華報》上論著……」)。連王明這時還要捧毛澤東、攻擊他，並且回國後就「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15]說明他的地位並非完全虛設。直到上層整風開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在發言中還「談了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古是『敬而畏』，對洛甫是『敬而愛』。這的確說出了張聞天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因此，無論從歷史講還是從現實講，反對教條主義就只能以他為主要對象了。而且開始發動整風時毛澤東的權威也還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劉少奇1937年都曾說過，「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17]就是專門傳達共產國際立毛澤東為領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會的閉幕詞中也沒再提到毛澤東。在第一章中已經提到，毛澤東來抗大只被介紹為

13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記述〉，載《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頁。

1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

1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1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本)，第543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鄧力群說他在1942年以前從未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而1943年前，領導人寫文章也幾乎沒有人引證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要立毛澤東的權威，就必須進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的影響。

第二，張聞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間沒有重視宣傳毛澤東

六中全會發動了一個全黨幹部的學習運動，中央很快成立了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兼任部長，規定每天兩小時學習制，自動與強制結合，要求長期堅持下去。各單位也都紛紛制訂計劃(總政後來就定為半天學習)，成立學習組織。中央和宣傳、幹教兩部還不斷督促檢查。據不完全統計，單1940年，中央下發的有關幹部教育的指示、決定就有七件之多。組織理論學習本是張聞天所長；他興趣大，情緒高，組織領導，認真負責，還帶頭寫文章，上大課(好多機關的幹部在一起上課)，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個學理論的高潮。這時，機靈的王明已經提出了「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但張聞天還是提倡學馬列，而且真幹，單是策劃和組織翻譯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其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就屬空前，先後有《馬恩叢書》十二種，《列寧選集》二十卷，《斯大林選集》十幾卷，[18]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雖然沒有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但實際上毛澤東還是從中獲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內的領導人和各級幹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馬列著作(當時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學習的積極性普遍很高，讀書和討論之風甚盛(因缺燈油，我們往往是每天晚上討論)。平時閒聊，內容也多是學習。人們在那兩年着實讀了些書，以致有些人至今還念念不忘，認為收穫不小，為學習理論和建立革命世界觀打下了基礎。對這場學習運動，頭兩年毛澤東不僅積極參加(如參加「延安新

18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偏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哲學會」，請何思敬講黑格爾哲學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還一再倡導和讚揚（如1938年12月13日在檢查工作的幹部晚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在幹部教育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6月10日的反投降報告等等）。但1940年後，他就逐漸感到這種只學馬列不讀毛著的學習運動不大對勁，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就出現了張聞天上面所說的對他不斷地責備和批評。到1941年5月19日高幹會上的報告，更是一鳴驚人，提出必須對我們的學習來一個根本改造，在職幹部教育和學校幹部教育，都「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不久，馬列學院改組，也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大概他認為照以前那樣學下去，只能繼續立「洋教條」（整風中普遍把馬恩列斯的言論稱為「教條」），被他稱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不但立不起來，而且還會被沖淡甚至貶低。事實上，毛澤東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並沒有被黨的其他領導人看重。連劉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還說，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19]這年5月鄧小平在129師一個會上講文化方針時竟然也不提《新民主主義論》，反而大段地引證張聞天。[20]而張聞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說，「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中國革命的理論，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21]連王明在1940年已經稱毛澤東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22]而主管宣教的張聞天直到1941年還對此認識不足。很明顯，

19 此信原刊登在1942年華中局一本內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六十年代初劉修改此文時刪去了這句話。

20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21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7頁。

22 王明：〈學習毛澤東〉，載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5月7日。

這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張聞天本人的思想還是他主管的全黨學習運動，都是典型的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要進行全黨整風，他又怎能不首當其衝呢？這是連張聞天自己後來也覺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風後期就曾檢討說，「我在宣傳部工作的時候，我只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入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內，只當做中央的一般政治文件看待，而沒有當作同馬恩列斯一樣的，甚至對中共黨員更為重要的理論著作，使之成為每一個中共黨員必須好好研究的馬列主義的讀物。」「我對於我們黨內應該有一個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當時是了解得很不深刻的。」[23]

第三，要「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也改變對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

整風前，雖然張聞天自己表現謙虛謹慎，從不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但人們的心目中他在這方面的名聲卻超過毛澤東。這大概是由於他馬列讀得熟，文章寫得快，知識廣，水平高，因而受到廣大幹部特別是宣教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敬佩。例如僅據《年譜》和《文集》所載，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澤東明確立為全黨領袖後，人們在談到理論問題時也還是毛張並提。例如徐特立在馬列學院作報告時就說過，「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潤之，一個是洛甫。」[24]對於毛澤東和張聞天1940年1月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學會年會開幕詞中也是相提並論，說毛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中華民族再生的旗幟」，張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

2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4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頁。

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是給予我們的鬥爭綱領」。[25] 茅盾當時讀後也將兩者並列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後提供了精闢的透視與指針」，「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 總之，在人們的心目中，毛張在理論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識界人士還認為張的理論水平高於毛澤東，稱張為「理論家」，稱毛為「實幹家」。更為嚴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來從莫斯科治傷回來，傳共產國際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話，也說張聞天是中國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發火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27] 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從馬恩列斯起，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傳統就是黨的領袖必須是理論家。列寧逝世後，聯共黨內群雄並起，首先也是爭當理論上的權威。斯大林一篇〈論列寧主義基礎〉即初戰告捷，也為他後來掃除一切反對派在理論上打下了基礎。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說明張聞天一定要保個理論家的頭銜，更不用說同毛澤東去爭了。事實上，人們都承認張聞天是個不爭權、不圖名、不愛拋頭露面的人。但問題在於毛澤東既然是黨的領袖，卻不是理論家，只落個實幹家之名，這當然是絕對不行的。毛澤東以前在這方面就吃虧不小，由於馬列書讀得少，受「左」傾中央及其代表的壓制，還長期背了「狹隘經驗論」的包袱。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曾多次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28] 例如《毛澤東哲學批註集》[29] 收集的批註讀本共十一種，抗戰初期閱讀的就佔九種。另一方面，為了在理論上有所表現，那幾年毛澤東在講話和發言中也盡量使用一些理論名詞或術語。例如1941年10月13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談到黨的二十年歷史時說，「五四運動

25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34頁。

26 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轉引自《張聞天傳》，第527頁。

2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28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

2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主義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遵義會議後，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30] 在所寫文章中評論劉少奇的用語也說他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31] 不過在毛澤東看來，光靠多讀書是不行的，一則時間有限，緊追慢趕也不會比張聞天等人讀得多；二則讀理論書也並非個人所好，不如讀中國古籍那麼有興趣。所以他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 因為少了，在黨內沒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處不大，反而會壞事(相當於後來說的「書讀的愈多愈蠢」)，實際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出發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馬列主義的一些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做到馬列主義中國化，並徹底改變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看法。於是，被看作理論家和知識分子代表的張聞天，自然就首當其衝了。

第四，張聞天是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障礙

本來，遵義會議不但糾正了「左」的軍事路線，實際上也從此改變了錯誤的政治路線，特別是張聞天主持的瓦窯堡會議已制定出了一套徹底轉變戰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至此，路線問題應該說已經解決了。而且在這期間，包括毛澤東在內，還都沒有認識到遵義會議前的路線錯誤問題。不但《遵義會議決議》肯定四中全會以後的政治路線「無疑正確」，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為全黨領袖的六中全會上，毛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2頁。

3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4頁。

32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頁。

本人在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還特別強調,「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説,「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33]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左」傾路線壓制和打擊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隨着形勢的變化,思想也在跟着變化,而且對當年受壓一直耿耿於懷,有機會就非出那口氣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黨」、「改造中央」,即確立新的指導思想和改組中央以至各級領導,就必須推倒《遵義會議決議》關於政治路線正確這一橫在面前的主要障礙,因而就要清算歷史和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而張聞天正是到這時還維護《遵義會議》決議的主要人物。有些黨史著作把「突出兩條路線」説成是「延安整風樹立的黨內鬥爭模式」。[34]這當然與實際相去甚遠。因為搞路線鬥爭本來就是從斯大林和聯共那裏搬來的,是用於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就意味着一批領導人必須下台,特別是一些所謂為首的,因為毛澤東認為,「為首的,改也難」。斯大林和聯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黨以至按反革命論處。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線問題而論,無論陳獨秀、瞿秋白,還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談路線「色變」,張聞天等人不願承認路線錯誤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還是認識問題)。所以直到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説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説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修改。」[35]張聞天卻表示,在蘇維埃後期雖然因反對立三路線不徹底又犯了「左」的錯誤,但當時還是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的,還是為馬列主義而奮鬥的,路線上並沒有

33 《中共中央文獻選集》(11),第654、746頁。

3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42頁。

3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錯。[36]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上又有激烈爭論,致使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時,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為路線錯誤」。[37]張聞天並非是不作自我批評,頑固對抗批評的人,這次第一個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也是形勢使然。當時情況可能是,王明自認一貫正確,似乎第三次「左」傾與他無關,別人這時確實也沒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義會議下台後雖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線高度,但他的意見已沒多大份量,而且在毛澤東提出路線問題後他還表示願意對錯誤承擔責任;周恩來當時並不在延安,沒參加會,而且歷來在這類問題上表態慎重;這樣,不承認路線錯誤的就首推張聞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前,他都堅持,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儘管犯了許多「左」的錯誤,給革命帶來重大損失,但總還是在幹革命的,執行的是國際路線,在大方向上全黨也是一致的,並無兩條路線之分。鑒於張聞天的地位和影響,特別是他在路線問題上的這種態度,毛澤東要發動整風、清算歷史、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矛頭就不能不首先對着他了。

第五,張聞天又是犯路線錯誤者中的「薄弱環節」

在上層整風要「打碎」的「兩個宗派」中,雖然「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38]但實際上,所謂的經驗宗派的力量和影響要比所謂的教條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條宗派」也比較容易得多。所以胡喬木在解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提宗派的原因時説,「其實關於教條宗派問題早就講了,整風一開始毛主席就講了。政治局檢討歷史時,教條宗派的人頭比較清楚,經驗宗派問題,則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當時擔負着很重要的工作,説他是經驗宗派就不好工

36 高新民、張樹軍著:《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1頁。

38 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6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作了。而且一說宗派就把問題說死了，……又牽涉到很多的人。」[39]關於整風中整的兩個宗派，在本書的一章中要作專門討論，說明它們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無，人數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麼除毛澤東、劉少奇等幾位領袖人物外，多數高級幹部就會「不歸楊則歸墨」，不屬這派就屬那派了。當時對兩個宗派並未全體排隊點名，但人們心目中總有點想法。被認為或被疑為經驗宗派的不但人數多，而且涉及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又統率着千軍萬馬，如果追下去，勢必影響大局。相形之下，教條宗派則顯得勢孤力單，人數有限，上層「人頭比較清楚」的那幾個，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且早已爭相向毛澤東靠攏，還互相揭發。所以整風批判從教條宗派着手，並非因為它是「頭」，而是從黨內鬥爭策略看，這樣做既容易開展又見效快。至於他們中間先從誰批起，則除了考慮到上面講過的地位和影響等因素外，還要估計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頭一個就碰了釘子，那就不利於運動的開展。權衡結果，選定了張聞天。這是因為在教條宗派中，毛澤東與之合作的時間最長也最了解的正是張聞天。經驗證明，他在強大的壓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進行檢討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軟弱的一面也較明顯，最適宜於作為突破口。例如遵義會議後的長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澤東、王稼祥不好處，覺得在中央工作實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討論派一個負責同志去白區工作的會上曾要求自己去。結果被抓住，說是「政治上的動搖」。「在北盤江一個什麼地方同我鬥爭了一晚。我當時似乎承認了錯誤，說要求出去是不對的，是政治上的動搖。」[40]其實，除諸如此類的事例外，發動整風前還作了一次偵察和試探，這就是1941年六七月間的那次談話。無論從事情的前後情況和批判內容看，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襲擊。因為，如果是領導同志間進行批評和交換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頁。

4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意見，那張聞天第一次主動求見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談；第二次談話為什麼要約上陳雲(時任組織部長)、康生(已完全順着毛澤東)、任弼時(張聞天曾支持將其從中央蘇區排擠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樣有準備地算總賬和無限上綱(後來還一再提起，包括1958年5月8日給張聞天的回信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多次批判)，都說明這次談話的不同尋常，可看作中央整風的一次前哨接觸。結果也不出所料，張聞天不但未加抗拒，還當場作了檢討。這就增加了毛澤東很快(一兩個月後)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展中央整風的信心和決心(果然會上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報告和帶頭進行上綱上線的檢討)。[41]如果不是張聞天而換成別人，也許不會那麼順利。例如王明，長期來把他定為教條主義的頭子，實際上那卻是整風後期的事，開始時沒有也不可能從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沒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矛頭指向王明，毛澤東要求王明的，只是檢查1938年武漢時期，還說明是不屬路線的一些右傾的原則錯誤。[42]假定不是這樣，而是按黨史上後來說的「王明路線」，那麼先批評的就應該是王明了。那結果會怎樣呢？必定是開局不利，一開始就陷於僵局。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如按毛澤東頭一階段說法，蘇維埃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其次是羅邁(李維漢)，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錯誤，那就應當以博古為批判的首要對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說，對他已不值得大動干戈；第二，毛澤東知道博古覺悟遲，以他為突破口沒有把握。(例如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還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43]至於羅邁，一則，論地位和影響他都站不到前邊來；二則，教條宗派他沾不上邊；三則，當時普遍認為他的態度不好，而且

41 以上均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8頁；《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0頁等。

4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9-202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43頁。

直到晚年也不承認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澤東印象最好的一個(曾多次強調他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上的功勞，甚至不合事實地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胡喬木談到整風時也說，「開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讓他住到楊家嶺。」還說，「開始他是主要指導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學習組，毛澤東為組長，他為副組長)，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處於受批判的地位」。[44]可見，在批「教條宗派」時不會先把王稼祥拿出來。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王稼祥也不會做過頭的上綱上線的檢討，何況他還「對整風有些看法，曾一度影響工作的積極性」，[45]自然不能成為整風中檢查和認罪的榜樣，他也始終沒有承認是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這也是後來七大選舉時，張聞天順利當選中央委員並繼續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選，後經專門說服動員才當選為候補委員第二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整風中(後來一切政治運動也都學這點)，態度的「好壞」，「揭發交代」和「檢討」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極大重視的。從事後看，張聞天確實起了表率作用。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先把矛頭指向他，也確實是選准了對象，可謂「知人」。

最後，還應一提的是張聞天沒有國際的支持

整風開始時共產國際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啟動於蘇德戰爭之後，說明毛澤東還是很注意國際態度的。因此在選擇第一名教條主義批判對象時，不能不考慮其同國際的關係。王明同國際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沒摸透。所以在國際解散前，他雖然對王明拒不檢討還進行反撲(批評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還揚言要上國際打官司）極為惱火，但1943年前卻並未將整風的矛頭指向王明。而張聞天不受國際的重視和支持卻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國際從來沒有宣傳過張聞天，五中全會還不同意他進書記處。遵義會議後，共產國際為了保持對中共的領導關係，只能承認會議推選出來代替博古的總書記是張聞天這一既成事實，以及中共中央報來的常委排名順序：「洛甫、恩來、博古、澤東」，[46]卻沒見到對張聞天有什麼肯定和讚賞的表示。相反，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上，還傳達要加強集體領導、實際上取消總書記的意見；排名順序，張聞天也被排到了毛澤東、王明之後。這些，毛澤東當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層整風以張聞天開刀，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也是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當然，除以上各點外，在整風中張聞天首當其衝，還由於毛澤東對他一直看不慣、看不起、不滿意，兩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愛好等都有很大差異。這是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的。

關於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各種整風檢討

在黨史學習筆記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證過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寫的並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反省筆記》。現在該是輪到對這部《反省筆記》連帶其他檢討說些話了。因為應該如何看待這部筆記和整風中的其他檢討，還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而這又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當然談不上研究，只是純屬個人的點滴感想。

4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203頁。

4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66頁。

4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2–333頁。

張聞天《反省筆記》的來龍去脈和寫作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上下在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黨史研究也出現了一個稱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間，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公佈了一批檔案和史料，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和爭鳴文章。這不僅有助於澄清一些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而且還掀起了一陣學習黨史的熱潮，使人們得以大開眼界。正是在這時，迎來了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義會議一個重要人物張聞天的有關言論。出自張聞天手筆的有關遵義會議的言論，大概只有他長征途中的日記、1944年寫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47]和1943年的《反省筆記》。由於前兩種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時已經「燒掉」，[48]剩下可用的就只有這部《反省筆記》了。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批准成立的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我也名列其中)去處理。當時有的領導同志，如胡喬木、鄧力群，曾提議趁此機會將《反省筆記》全文發表。但編輯組多數同志不同意這麼做，原因是上層整風中的檔案和其他領導人的檢討都未公佈，單公佈張的手稿顯然不妥，於是就只摘用了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一小部分。這就是後來載入《遵義會議文獻》中的《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一節。(現在看來，發表這點摘錄也是不妥當和不公平的，只是滿足了《遵義會議文獻》編輯的明顯傾向，卻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實。)書中注明，「這是張聞天同志延安整風筆記的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文後還指出，「據中央檔案館所存手稿。」此後，這份筆記人們在引用時就一律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有些人為明確起見還寫成《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實對筆記名稱的這種改變，看來不一定合適。因為第一，既然據手稿，就應保持原貌，按理，後人是無權改變的。而且延安整風時期要寫的筆記很多，「四三決定」[49]就明確規定對《整風文獻》，「各同志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用改後的標題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寫「反省筆記」是毛澤東的統一規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說「學習整風文件一定要寫筆記，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50]而且這種寫筆記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51]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又具體提出，「在黨風學習中，自我批評應更發展，應發動各人寫一次反省筆記。」[52]當然，這也是鐵的紀律。可見，張聞天同年12月所寫，是執行毛澤東當年的這一規定，已不是頭一年要寫的學文件的筆記。而且事後不久的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使用其中的材料時也稱「反省筆記」，沒說是「整風筆記」。[53]因

47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48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這兩件珍貴史料是否真的燒掉值得懷疑。我曾聽說過此事的前後情況。在跟張聞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張聞天逝世後和劉英的二十多年接觸中，都多次談到這批材料。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和劉英是搭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延安的，因此不能帶什麼行李。他們就將生平保存下來的照片、多本日記和其他各種珍貴資料，也包括那本《中國革命紀事》，裝在一個小箱裏，交中央檔案室代為保存。他們走後兩三年延安才失守，但這個小箱並未經機要交通送給他們。延安撤退前，幾乎所有檔案，包括一般幹部檔案(其中還有整風搶救時的假材料，我的檔案袋中就有)都已轉移，保存了下來。但張聞天的小資料箱卻不知去向。共和國成立後，張聞天也曾一再查問。當時被告知，撤退時因攜帶不便，就將這個小箱以及別的東西分散掩埋，準備回來後掘出。但後來忘記具體掩埋地點，一時找不到，還在繼續尋找中。「文革」後，劉英本人和我們「張聞天選集編輯組」又多次追查這箱資料，主管人員斷然告知「已經燒掉」。這就再無尋找之餘地了。同樣令我感到遺憾和奇怪的，就是遵義會議的檔案也丟失得一乾二淨。

49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41年4月3日)，《整風文獻》第一篇。

50 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51 〈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53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頁。

此，這個標題是不可也不應隨便改動的。根據這些，我在提到和引用《反省筆記》時都一律使用原名。這是需要附帶說明的。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以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包括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除了總的精神是虛心檢查和認真反省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過頭檢討和無限上綱。二是大力頌揚毛澤東，有些地方已屬明顯的個人崇拜。但這在當時已並非個別的，而是普遍的現象。因此在討論張聞天的反省和檢討前，需要先談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他個人的處境。

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接受了毛澤東不夠實事求是也不是與人為善的過火批評。同年政治局九月會議上，他又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對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估計和批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承擔了主要領導之一的責任，並在實際行動中注意改正，要求和獲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對他的表現曾表示滿意。[54] 從事後情況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輕鬆，以為放下了包袱，或許可算已經過了檢討的關，所以很愉快地率領農村調查團去了晉西北。一開始也確實進展順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煩，碰了釘子。雖然他並未因此灰心，但這大概會對他了解自己的處境，以及後來的檢討，包括寫《反省筆記》，都有重要的影響，所以值得作一簡要介紹。

張聞天去晉西北，受到晉綏區黨委代理書記林楓和當地幹部的熱烈歡迎。他在《反省筆記》中檢討說，這次去既未擔負任何責任，也打算調查幾個村子就回來。但區黨委同志說，「他們也想派一些負責同志到下面去調查」，要張「幫助他們指導」，張「不好推卻，就答應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來後」，他們要張負責總結。張就和大家「座

54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談了許多次」，並對「土地問題和村政權工作提了些意見」，還在林楓去延安未回來前的「一次在區黨委召集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當時晉綏地區一起參加工作的人「對這次調查都很滿意，很興奮」。「但林楓同志一回來，他沒有看過我們一個村的材料、同我們談過一次話，就表示這一套東西完全要不得，說調查也可以是主觀主義的。」張聞天發現「事情不妙」，立即準備結束調查。最後他為滿足當地參加調查工作的同志們的要求，提議把大家召集起來作一次總結，但也被林楓拒絕，「並把這些同志都遣散了」。張聞天一行只好離開晉西北回到陝北的米脂。對這次事件，他說，「我現在反省我在晉西北工作的缺點，是我在幫助總結調查材料時，很老實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批評了我所看到的各種三風不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晉西北是很嚴重的)，沒有很好的估計到區黨委及其領導同志的威信。」[55] 其實，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主要還是林楓在延安摸清了張聞天是整風重要對象這一氣候。所以參加參加調查團的曾彥修等同志最近還說，他們實際上是被當作不受歡迎的人而被趕走的，臨走時當地竟無一人送行。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張聞天還是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而林楓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書長兼劉少奇的秘書)，到一個地區去作點農村調查，竟遭到如此對待，可見張聞天當時的處境和在一些領導同志心目中的地位。這是他自己開始時沒有完全料到的，無疑對他後來的檢討會有一定作用。

1943年3月，張聞天奉命回到延安。這時延安的氣氛已和他離開時有很大不同。整風已不再是和氣細雨，而變成暴風驟雨。特別是各機關已經掀起搶救運動，出現了一種極為緊張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為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

55 引語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關於晉西北調查不受歡迎的情況，還可參閱《張聞天年譜》，第687–690頁；《張聞天傳》，第549–550頁。另聽到當時參加調查的曾彥修(也是《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等幾位同志的多次談話。

說的重災區。[56]中央機關自不例外，不但許多幹部，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妻子、秘書和醫生也被打成「特務」。而且還有一些高級幹部遭到「搶救」和懷疑，如柯慶施遭「搶救」，葉劍英等從白區回來的人受懷疑。[57]由於國民黨統治區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周恩來的處境也一時變得相當困難。張聞天雖然對「搶救」運動有意見，但不能不受到這種緊張、恐怖氣氛的影響，連意見都沒處提，也不敢在會上提。而且這時中央領導層的整風也更加緊鑼密鼓。毛澤東早就下定最大決心，說：「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58]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同時在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後延安也取得了比較平靜的環境，上層整風的勁頭也隨之更大了。毛澤東在7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59] 8月8日他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大會的講話中更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60]政治局整風的九月會議開始後，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會的問題，毛澤東就大講兩個宗派，並號召對王明、博古、洛甫「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對這次講話，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也認為，「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講話定下了基調，「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61] 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威脅說，「我們要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62]他還「要求犯錯誤的同志寧可把問題看得嚴重些，不要光是解釋，這樣才能認識錯誤，前途才光明。」[63]所有這些，就使批判、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以至多數人認為王明、博古等已屬黨外問題，周恩來等經驗宗派的人更危險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批判還是檢查，上綱上線就越來越高，而犯錯誤的人多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

除了這些客觀環境的巨大壓力外，張聞天的自身處境也很尷尬。在晉西北碰釘子後，回到延安已無多少事可做。他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實際地位遠在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之下，更不用說並非中央委員的彭真、高崗等人了。這時的總學委（九月會議後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喬木）已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點類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大家忙於「搶救」時，張聞天還有時間可以搞點工廠調查，從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實際工作，集中進行整風學習和自我檢查了。所以他當時給自己提的要求是，「甘於寂寞」（說這是毛澤東給他的指示），不怕「門前冷落車馬稀」，「不怕孤立，不怕丟面子」；更重要的還是「徹底反省自己、揭發（坦白）自己過去的錯誤。」[64]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的，其上綱上線、過頭過火、不夠實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難免。這主要表現在：只有大帽子，沒有具體內容，或者帽子和敘述的內容相矛盾，還有些明明是正確的東西也當錯誤來檢討，弄得是非不

56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頁。

5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第126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頁。

58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02頁。

6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288頁。

62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71頁。按：毛在每次反對重要的黨內對手的鬥爭中，往往會提出黨可能分裂，甚至準備上山打游擊的話，如反對高饒、廬山會議、「文革」中反對劉鄧和後來批林彪等。

63 毛澤東1943年10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5頁。

6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96–704頁。

分，等等。這類過頭之處很多，這裏只擇其要者按個人現在的認識舉例作點說明。

《反省筆記》中過頭檢討舉例

一、關於去蘇聯留學

對此恐怕應該有一個客觀和正確的估計。這不只是張聞天和一批被認為是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個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因為中國黨是在共產國際（實為蘇共）幫助下建立起來並長期接受其領導的。中國黨的許多人都去蘇聯或長或短地留過學，包括除毛澤東外的多數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任弼時等其他留蘇同志。回國後也有不少人成了領導幹部和高級將領。可是張聞天在檢討中卻把留學蘇聯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成了一種罪惡，什麼「去莫斯科，從此開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幾年留學，只是「在思想上學得教條主義」，「養成了宗派主義」，「發展了個人主義」，等等。[65] 而且不光張個人這樣檢討，延安整風時普遍把留蘇當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時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蘇就先檢討，好像見不得人的樣子。直到1958年錯誤地批判劉伯承的所謂教條主義時，此風猶存。其實無論是張的檢討還是當時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歷史事實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起碼顯得過分。因為除了少數叛徒和壞人外，多數留蘇同志都在那裏學到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確立和堅定了革命的人生觀，用到了中國的革命實際。即以張聞天而論，他回國後不久就能夠為我們黨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奠定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能夠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確的意見，並以此觀察和指導革命行動（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先後提出蘇區和共和國成立後

65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東北的經濟構成等），[66]不能說不是得益於在蘇聯的學習。至於「在黨內以理論家聞名」和「成為我黨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67] 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二、關於宗派

我在另一章筆記[68] 中將詳細論證，整風中的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這裏先不詳說。而張聞天在《反省筆記》和他的整風檢討中，不斷地承認和檢討自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但卻沒有講出任何事實足以證明它們的存在，也沒有講他是怎樣參加和進行宗派活動的，如同1959年他檢討參加了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一樣。例如「二十八個半」是怎樣產生和活動的，都有些什麼人，自己是怎樣參加的，根本就說不清，完全是一筆糊塗賬。他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一些情況，還是延安整風中聽楊尚昆說的。現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許多當事人（包括楊尚昆）都已證明，「二十八個半」是一些人一時的譏諷話，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宗派，所以張聞天也就談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員了。至於「教條宗派」，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綱上線，戴大帽子，但內容卻是空的。如說他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還有矛盾。還一再說，進中山大學學習，「黨內生活很嚴肅緊張，沒有什麼宗派鬥爭」；他只「埋頭於教條的學習」，「並無任何宗派活動」等。至於怎樣成為宗派的，他說，由於「擁護米夫的教育方針，……（就）實際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雖則我們（他和沈澤民）還是不自覺的」。[69] 至於回國後不存在宗派和宗

66 見前幾章《黨史筆記》敘述的事實和引證。

67 見上引楊尚昆語和鄧小平1979年在張聞天追悼會上的《悼詞》。

68 見下一章《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69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派活動，上章也有詳細論述，這裏只舉兩個他稱進行宗派活動或表現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一是說「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新的文風，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歡迎，……以致造成了馬列學院畢業出去的同學，對馬列學院都有一種留戀、一種好感、一種懷念。以不正的學風、黨風、文風培養幹部、團結幹部——在實際上，這應該說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宗派主義的表現。」二是說，他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中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無條件地為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服務」，「還鬧點獨立性」，「這也是我在宣傳教育部門的宗派主義。」[70]可見，張聞天檢討的宗派主義，也從側面證明，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教條宗派」。

三、關於學校教育和幹部學習

過去由於戰爭環境，沒有多少時間學習。幹部又多是工農出身，缺少文化，而馬列主義書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級幹部甚至不知馬恩為何等樣人，更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很多人把共產主義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時抗戰後參加革命的大批知識青年，多出於抗日熱情和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並無多少了解和認識。對所有這些人，進行一定的基礎教育，佔時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風前就曾以此辦法先後訓練了幾萬人。主管這一工作的張聞天應該說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鄧小平說他「成績卓著」。缺點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難免。即以毛澤東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會後的幹部學習和學校教育而言，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協助張聞天主管此事的李維漢，經過四五十年的思考後也認為，「193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還說，「延安幹部學校和在職幹部教育，為抗日、解放戰爭，也為後來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幹部。」[71]就是當時的學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後改為軍事學院)，學期只有幾個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緒並不是熱中於在校學習，而是要求「畢業上前線」。留校人員多不安心，致使毛澤東要親自動員，甚至對留下工作的人員說過，大家要安心工作，「死了埋在清涼山」。但是到整風時，無論學校教育還是在職幹部學習都被說成是完全錯誤了，根本要不得，學的都是教條，在實際中不能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據我所知，延安大概沒有這樣的「教授」)，「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按：列寧是15歲就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的。所以這句話後來在編入《毛選》時刪掉了)。[72]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他也一直檢討了四五年，其實大多是無限上綱、不夠實事求是的。例如說，「六中全會決定加強全黨理論學習，……然而由於我的教條主義根源沒有剷除，所以一開始學習就轉到教條主義方面去了。」被毛澤東多次表揚的學習運動，竟被他完全否定了！還說，「有時毛澤東同志對於宣傳工作的批評還引起我的反感。這種反感，實是假馬列對真馬列的抵抗！」[73]這種過頭檢討，誰也會一眼看出。

四、關於知識分子政策

這更是一個值得澄清和檢討的大問題。西安事變特別是抗日戰爭以後，大批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的對外不抵抗(後為消極抗戰)和對內的專制統治，紛紛奔赴延安，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學到了一點革命理論，初步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然後分配去抗日前線或到後方機關工

70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頁。

7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1–52頁。《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作，再經過實踐中繼續學習和鍛煉後，多成為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共和國成立後各條戰線上的骨幹，以整個一代「三八式」著稱。但是正是這些人成了整風中的主要鋒芒所指，[74]要他們進行脱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帶上小資產階級的「原罪感」，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馴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風一開始，就以原馬列學院改組的中央研究院為試點單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個王實味和以他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後來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務」。張聞天既主管宣傳教育工作，又是馬列學院的院長，自然在劫難逃了。

其實，在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我們黨過去長時期裏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對知識分子不夠重視甚至懷有偏見。十年內戰時期不用説，就是到了抗戰後，黨的政策對知識分子還是不大信任，無論是共和國成立之前還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層的骨幹作用，上層領導還是用經過長征的工農老幹部。奇怪的是，毛澤東和一些中央領導，雖然本人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但卻不大信任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屬小資產階級，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和影響，因而容易動搖，靠不住。而且越往後越不信任。所以胡喬木説，反右派後，「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心理」。[75]其實這種態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風時就已顯露出來，只是那時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像共和國成立後那樣去掉「小」字歸入資產階級範疇。相形之下，張聞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識分子的。所以在他當總書記和管宣傳教育時期，例如1938年前後，知識青年真把延安當作理想的聖地，到處歡聲笑語、歌聲不斷，人們享受着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學習、生活在團結緊張和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到1941年後，這一切即逐漸褪色，批判和檢討日益佔居主導地位，很快又開始整風和搶救，知識分子也更倒

74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霉了。所以張聞天就為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所稱道和眷戀，他自然也成了整風中主要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檢討説，他的錯誤在於「過分估計外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了他們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視了他們的陰暗面如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散漫性、無紀律性等」。這些倒還沒有什麼，可是後面就越提越高了。説「沒有估計到他們在國民黨十年統治下所受的反動教育與反動訓練，而提出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與對他們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説他對「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就發展起來了。1938年8月我寫的《論待人接物問題》即為這種態度的思想表現」。對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評是錯誤的，他的檢討當然也不妥。[76]至於分析現代知識分子因受國民黨十年反動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時代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總之，張聞天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本來還是比較正確的，整風時對這個問題的檢討卻顯然錯誤了。

五、關於馬列學院的方針問題

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電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內稱：「關於過去馬列學院方針是否錯誤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凱豐、弼時意見待你回來時討論，我覺不必等你，即指出是錯了，你的意見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來，或者你來一電提出意見。盼覆。」毛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張即於5月20日覆電：「澤東同志：(一)來電悉。關於馬列學院過去方針請中央根據實際材料做出結論，不必等我回來。(二)根據我最近一個時期的考慮，我認為應該公開説，他是錯誤的，其錯誤即在理論與實際的脱節，即你所説的矢與的的脱離。這種脱離在馬列學院中即表現為教條主義」。[77]後來，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

76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7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78頁。

還作了長篇大論的檢討，例如說，「我在馬列學院內，特別提倡發揚黨內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而結果卻是放鬆了對各種各樣錯誤思想的鬥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後得以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比較長期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大多數均為教條主義者，而不是理論人才。」[78] 歷史證明，同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說法相反，馬列學院在三年的短時間內，招生五期，培養了八九百人，「在後來的各條戰線上都起了應有的骨幹作用」。1988年5月，馬列學院許多學生如李先念、宋平、鄧力群、馬洪、劉曉、段蘇權等幾十人寫了大量紀念和回憶文章，都用歷史事實否定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例如李先念說，它(指馬列學院)「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宋平說，「馬列學院的教育方針，就是注重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的訓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能說青年學生學習理論就一定是教條主義」。鄧力群說，「院長張聞天對毛澤東著作很重視」，「每有報告都派人去聽，每篇文章都組織認真學習」，「學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澤東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對立和抵抗」。段蘇權說，「我一生當中，真正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其他文章寫得更生動具體，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 這些由親身經歷和通過四五十年實踐的檢驗得出的感想和結論，不是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都是錯誤的嗎？

7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9 李先念等人的引語，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關於張聞天的七大發言和參與制造個人崇拜問題

一、七大發言的過頭檢討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通篇是對自己的責備和對領袖的頌揚，過頭之處甚多，整個精神狀態很不健康，現在讀起來都因其不真實而使人感到有點壓抑。例如他說，「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與長期性』。」這當然是對自己缺點的過分誇張。人們知道，還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張聞天就已站在正確的方面，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不平衡性。進入蘇區後寫的一些文章中，還一再強調「長期戰爭的持久性」，如說「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80]；「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戰爭」，「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81] 等等。至於張聞天較早論證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說一個在白區出生入死、到蘇區艱苦奮鬥、又參加過長征的人，竟沒想到中國革命的「殘酷性」，恐怕在平時也是沒人肯信的。發言中談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同志發生宗派的結合」，我在另章中將論證這是無中生有，張聞天本人也說不清楚，只不過是亂戴帽子而已。

張聞天延安整風中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無限上綱和不實之處實在太多，無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這也是各次運動中比較普遍的現象，人們盡知，沒什麼奇怪。如果說奇怪的話，就是有些人卻將其中顯然不真實的敘述當史實加以引證。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對革命作過什麼貢獻，似乎參加革命

80 張聞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張聞天文集》(一)，第522頁。

81 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張聞天文集》(一)，第533–534頁。

後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甚至有些標題都是「我在這個時期所做的罪惡」，還把有的黨內問題寫成黨外問題等。所有這些，難道可能是真實的嗎？

二、參與制造個人崇拜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不僅個人反省不夠實事求是，而且對毛澤東（個別地方還有劉少奇）的頌揚也有不少太過頭之處，實際上參與了個人崇拜的製造。例如在被以《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為題公佈的幾段《反省筆記》中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82] 關於遵義會議上為什麼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我們上面已有專門章節論證，而且《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也多處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連毛澤東在內當時都沒有認識到。直到在六屆六中全會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毛還特意強調，「要指出：當時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83] 如果早已認識到了，這時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都沒有認識到，張聞天根據什麼這樣稱頌毛澤東呢？什麼「原則上的讓步」，什麼「黨內鬥爭一個示範」！這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按照毛澤東一個月前才定下的基調，即：「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84] 毛的這一說法，連胡喬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要深究就是了。張聞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過去經驗教訓，「順着來」而已。又如他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

82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8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頁。

84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

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 但卻沒有列舉毛成為領導的事實，也沒有敍述到「建立」的過程。其實這正是黨史上一樁最大的疑案，是經不起辯論的。我寫的本書第一章，就是論證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86] 他明知遵義會議只決定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總書記職務的是他自己，也是「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87] 但是他在整風運動擁護毛澤東的熱潮中還是那樣說了。本來他就有一個終其一生的特點，即從來不談個人過去的功績、貢獻以至擔任過的職務，何況這是在整風運動中。因此把功勞讓給毛澤東，自己承擔各種過錯，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講遵義會議確立的領導問題時終究還是設了幾個限詞，如「實際上」、「開始了……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兩個《歷史決議》的寫法和一些黨史教科書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實際上」，「開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為「領導中心的中央」都顯得多餘。例如六屆七中全會特別是黨的七大以後，提到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肯定就不能再用這些限制詞了。這也說明，對這個問題以前的有關論斷還是有問題的。除此以外，張聞天的各種檢討中對毛澤東的恭維奉承之詞也實在不少，為節省篇幅，只簡單舉幾個例子。如說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是服從組織紀律的最好模範。其實，整風期間，違背集體領導、違反黨章黨規，特別是在「儘早召開七大」的問題上不執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決定（包括六中全會）和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就特別多。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黨內第二把手的劉少奇提出書

85 《遵義會議文獻》，第79–80頁。

86 見本書第一章。

87 楊尚昆：〈回憶和懷念〉，載《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按：這是楊尚昆親筆所寫。

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直接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而一貫堅持集體領導和強調發揚民主的張聞天，已深受這種不按黨章黨規辦事之累，怎麼還能說出這種話來呢？又如在七大發言中說，毛澤東是謙虛和戒驕的模範，所以「無愧為人民的領袖。領袖而驕傲就不成其為領袖了。在共產黨內一切因一時成功而驕傲的『領袖』，是已經都被歷史淘汰了的。」[88]這恐怕也不是真心話了。因為張聞天從長征以來受毛澤東驕橫作風之氣不知有多少，以至於想離開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連毛澤東自己年輕時就承認「略有傲氣」，後來又很少作自我批評，怎麼稱得上謙虛的模範？如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願望，那也是事與願違，事實是全國勝利後毛澤東更驕傲了，也更「成其為領袖」。

張聞天還講過不少太過分的奉承話，如談到「群眾觀點」和「群眾關係」時說，「這方面的模範，也是毛澤東同志。……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9]張聞天講的奉承話中有些是直到七屆二中全會時連毛還不好意思贊成，如把馬恩列斯毛並列。[90]而在這之前，就已由於以他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水平，特別是對「左」傾錯誤的檢討特別深刻，對毛澤東一再進行全面讚揚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參加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想」，他的「修改稿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他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同志的有份量的話」和「一段重要的結語」。毛澤東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張稿」的基礎上進行的。[91]而胡喬木事後卻批評說，這個《決議》的第

88 《張聞天文集》(三)，第254頁。

89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見《張聞天文集》(三)，第259頁。

90 《張聞天文集》(三)，第262頁。

91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312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565-568頁。

一個「缺陷」就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92]一生都反對突出個人的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卻參加了「過分突出」毛澤東也就是製造個人崇拜的活動，這是什麼原因？

三、張聞天作過頭檢討和參與個人崇拜的原因

張聞天在整風中作上綱上線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作不夠實事求是的歌頌，看來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思想認識問題。這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確實由於認識到毛澤東在總的路線上正確，因而從內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檢討和歌頌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而不是故意搞兩面派。因為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他就真心尊毛為領袖，常有自發的流露。1941年初寫《自傳》時即已承認遵義會議後就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農村調查組紀念「七一」的座談會上，他「那天晚上講話的全部內容是歌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他的講話「完全出自心聲」。[93]人們知道，中央領導層群起歌頌毛澤東是1943年「七一」前後，而張聞天早一年就自覺地發自內心地歌頌了。因為正像他後來說的，他對毛澤東整風後已開始信服。[94]另一方面，思想認識上可能是由於受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影響(《聯共黨史》就是標本)，認為維護領袖的威信和黨的團結(每次重大的黨內鬥爭，毛澤東都以有分裂危險相警告)，給自己的檢討上綱上線，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是「顧全大局」。如同許多人1959年承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中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甚至「黑幫」、「三反分子」等，就都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93 馬洪等〈回憶張聞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8月28日。

94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有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軟弱的表現。其中不少是久經沙場、視死如歸的人物。張聞天也應算其中的一個。

第二，是強大的壓力。這點，前面已講過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況，上層是緊張的清算路線和歷史，以至有些領導同志很快就變得消瘦憔悴(張聞天、劉英就多次談到，楊尚昆眼看着幾個月就變了個樣)；中下層普遍進行肅反和搶救，許多知識分子被搶救成「特務」。這樣上下交相影響，就使延安出現一種肅殺和恐怖氣氛。試想，人們連一時強加的「特務」都可以承認，還在乎戴其他帽子？因為他們大多相信黨最終總是會把問題弄清的。同時也有如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所説，「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95]也許只有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當時那種強大壓力感覺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個人考慮了，上綱上線是為了過關。每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都有個過關問題，往往是因為所謂檢討不深刻和揭發交代不徹底而過不了關，很少聽説有因檢查交代過頭而受批挨整的。所以為了過關，不使矛盾轉化，能保住黨籍，不如自己主動上綱上線，還可能落一個好印象。這裏恐怕不能説沒有一點私心雜念。但不管怎麼説，張聞天在整風中這樣做的結果是，「高級幹部對於他的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整風以來對過去的歷史錯誤認識深刻」。[96]後來在七大選舉中他順利當選中央委員，還被留在政治局內。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教條宗派」時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沒了他的名字。這當然與他的錯誤較輕有關。但也可以設想，如果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承認有個「教條宗派」，不承認四中全會是「篡黨奪權」，不承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反而談起自己在遵

95 《張聞天文集》(四)，第337頁。

9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義會議、西安事變、瓦窯堡會議等「過關斬將」中的作用，甚至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點批評意見(如在江西無中生有地打「AB團」、西安事變後通電提出審蔣以及在黨內使用權術等)，那結果可就會根本不同了。

如何看待過頭檢討

一、過頭檢討不能當作真實史料

照此看來，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有些亂戴帽子和不夠實事求是，應該説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一切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是張聞天自己還是上層領導，都認為他的檢討是真誠的和實事求是的。而且不僅是他，當時上綱上線、亂戴帽子應當説是普遍現象。因此，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夾敍夾議中的過分自責等以外，對個人履歷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敍述還是基本真實的。正如胡喬木所説，「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出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97]雖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筆記》，但《反省筆記》同樣「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可以看出張聞天有驚人的記憶力，連十幾年來有關的中外人名都如數家珍，更不用説重大事件了。所以在運動高潮期間，參加高層整風的多數人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不合法，這時張聞天寫出了他的《反省筆記》，一下就解決了問題，毛澤東也據此做出了最後結論，[98]成了六屆七中全會的一項正式決定，使黨史上這個重大問題得到澄清。[99]

97 《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5頁。

98 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9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2頁。

但是，檢討、反省終究是檢討、反省，在延安整風以來的一切政治運動中，任何人能獲得通過的檢討、反省都不可能是完全實事求是的，即使不過分上綱上線，起碼也只能講缺點和錯誤，而不談功績與貢獻，所以對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夠全面。對於被當作批判或鬥爭重點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們的檢討、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論根據，那只能使有關歷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張聞天、彭德懷廬山會議上及其後的檢討來為那段歷史定性，那就只能是製造冤假錯案。延安整風當然不可同廬山會議相提並論，但用當時的批判重點如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來為黨史立論，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這樣的歷史也一定不會真實。因為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律和規矩，就是先對某個問題定個基調，然後被批判者就按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廬山會議出現了一個「向黨猖狂進攻」的「軍事俱樂部」，於是「文化人」張聞天就檢討他是怎樣「陷入軍事俱樂部」的，黃克誠也檢討他是怎樣成為周小舟、李鋭參加「軍事俱樂部」的「橋樑」。延安整風時定的基調是有個「篡黨奪權」的「教條宗派」（是為「頭」）和「經驗宗派」（是為「腳」），1938年這個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漢進行活動，於是周恩來等就依此基調檢討。不同的是，「軍事俱樂部」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被徹底否定了，而「教條宗派」則依舊保留在黨史中，只是「經驗宗派」因涉及面廣，特別是牽連到周恩來等一批重要領導人，因而被含糊了起來（黨史界無人敢説無，也沒人敢説指哪些人）。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斷地上綱上線，於是就製造了一堆「史從論出」。前幾章中所談到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毛澤東的黨內鬥爭策略、《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會上發言起草的、毛澤東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是從內戰到抗日戰略轉變的標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等等，就是這樣在延安整風期間一下從「論」中「出」來的。在這之前，上述這些在一切黨史檔案以至個人論述（包括回憶錄）中，似乎還都沒有提到過。由於中共黨史學是在延安整風中創建的，此後又一直只准有一個官方學派，這些從「論」中出的「史」也就越來越變成歷史的真實和如山的鐵案，不容許有不同的意見了。而張聞天的一些亂戴帽子、過頭檢討和過分頌揚也就被派上了用場。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冤假錯案。

總之，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既有珍貴史料，又受當年歷史條件特別是所定基調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提法顯然有誤，因此必須仔細分析。不是用他的這些論斷去印證史實，而是從分析史實印證論斷的準確性，起碼是互相印證。在不公佈重要檔案或只公佈有利於原定基調的檔案的情況下，這點尤其重要。擴大一點講，一般是不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判或鬥爭的人所寫的檢討和交代材料定為可靠史料和文獻的。正因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過兩項深得人心的有關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之外，再加一條「不裝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違心的交代和檢討，裝進幹部的檔案袋。因為過去有些幹部就常因檔案中有這類材料，如把延安搶救運動中定性錯誤以至別人亂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裝進檔案袋，於是每逢政治運動就被揪出來折騰一番，所以從前幹部對自己的檔案袋很重視）。二是「文革」中有關幹部的揭發和交代的各種材料一律銷毀（特殊的例外）。

附帶談一個如何看待「回憶錄」的問題

不但是運動中批判或鬥爭對象所寫材料，而且許多人的回憶錄也都只可作為研究歷史的參考資料，而不能看作正式歷史文獻。（現在許多黨史著作都是把這些當作權威史料引來引去。）因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説，「回憶那時的事，難於擺脱現在的思想意識，如果加上現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況還有「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

距直接獲得印象的時間又有相當間隔」。[100] 列寧也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事實上，延安整風以後所寫的各種回憶錄(尤以「文革」後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風時所定基調寫的，再後來就是一定要和兩個《歷史決議》完全保持一致。於是有些回憶錄所寫就遠離當時的真實情況，甚至不惜削足適履。這裏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遵義會議文獻》選用的一篇回憶錄，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義會議的召開和要毛澤東出來領導軍隊的問題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個會議期間卻根本不見作「反報告」、受委託起草決議和被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而是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當時尚無此名稱的所謂「王明路線」。這種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的「回憶」，能作為研究和佐證遵義會議的「文獻」嗎？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因是後人編輯整理，有些地方就與楊本人生前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們只以《遵義會議回顧》這一節作一前後比較，就可看出差別之大。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在和劉英的談話(在場的有程中原和張培森)中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這篇談話由程中原整理，送請楊尚昆本人審閱修改後，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第6期上。但在楊1998年9月逝世後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卻編寫成：「會上，許

100 轉引自〈前言〉，《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

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見到這樣的「決議」，後面帶引號的話只是陳雲憑記憶寫的可能是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原件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後被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01])『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以後……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時間大約在1935年2月5日。因為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102] 前後兩段，哪個為楊尚昆本人所談，不是很清楚的嗎？再加上書中所說，「它(指遵義會議)的最大功勞是在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聞天同志是個書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103] 而在楊生前自己寫的文章中卻說過，「自從他(指張聞天)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04]「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05] 據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即以楊尚昆之名在他死後三年整理出的「回憶錄」，就是要使楊的意見同黨史學的正統說法保持一致，否則不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生前的說法是，「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後來的說法卻是，「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以及「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等等。楊尚昆生前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組長，對黨史界的情況可說是相當清楚的。所以他

101 《遵義會議文獻》收錄此件時未作說明。

102 見該書，第120頁。

103 見該書，第121頁。

104 〈紀念張聞天同志〉(1990年8月29日)，原載《人民日報》，1990年8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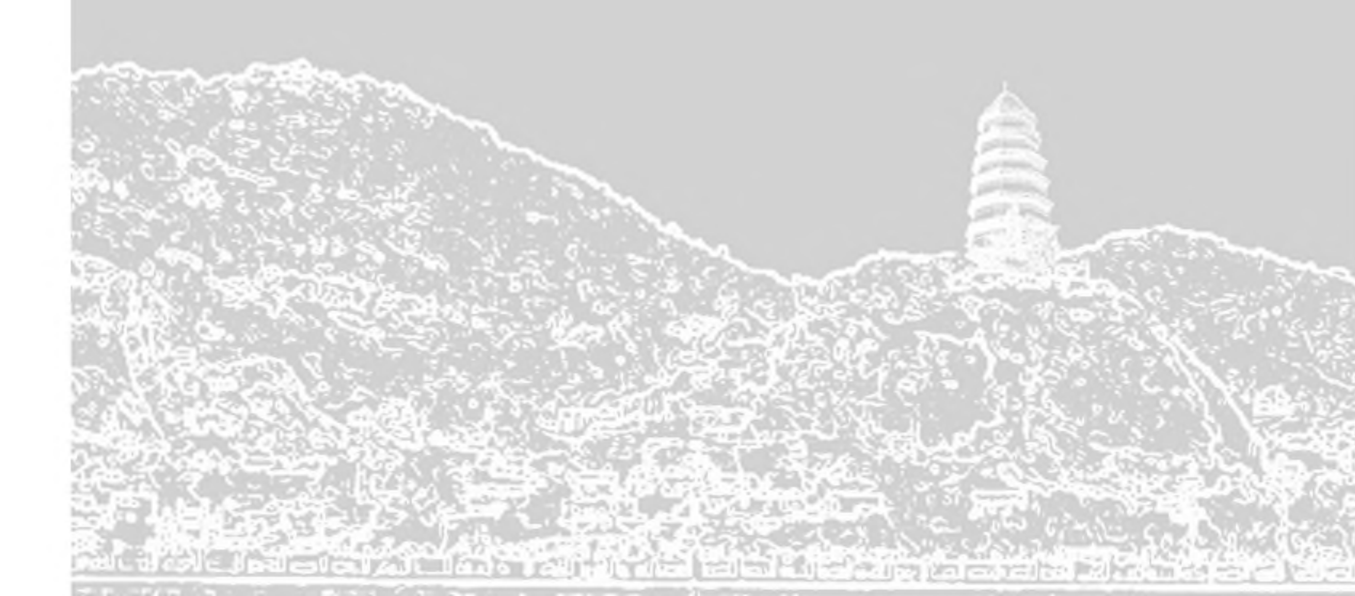
105 楊尚昆為劉英回憶錄所寫的〈序〉，見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在同劉英的那次談話中曾感慨地說，「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黨史。不少歷史上的問題沒有講清楚。」對於曲解、輕視和因「受過去宣傳的影響」而不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所起作用的現象，他提出，「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106] 不料他辭世後剛過三年，由權威機關編寫的他的回憶錄，也需要「撥亂反正」了。

106 《百年潮》，1998年第6期。

第五章

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如何理解反黨宗派

從張聞天被批判三次參加反黨宗派說起

在紀念張聞天百年誕辰的時候，一些同志曾經談起，過去人們對張聞天的印象似乎只是一個老犯錯誤的人。這大概是因為，在黨史上他曾受批判並被定性為參加了三次反黨宗派集團，而且被串連在一起，幾乎貫穿了他入黨五十餘年的整個革命歷程。一是延安整風時定性的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二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說成「軍事俱樂部」的副帥或「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一員。三是廬山會議上追加的「高饒陰謀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和「漏網殘餘」。也是在這次會上還把三者連在了一起，說他「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是由於「老而又老的瘧疾病原蟲(指教條宗派)遠未去掉」又「舊病復發」；[1]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又「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2]對於這些定性和指責，張聞天本人每次受批判時都是承認了的，並按當時定的調子和要求作了交代和檢查。長期以來，輿論一律，就是嚴格按照這些批判內容和定性結論進行宣傳教育的。在給張聞天平反後，有關的撥亂反正又做得很不夠，不少問題都沒有說清楚。所以一些人還殘存有他老犯錯誤的印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1981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3]這就意味着一下子給張聞天減去了兩次反黨宗派活動。一是說明所謂「軍事俱樂部」純屬杜撰，實際上並不存在。無論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還是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以及同志之間會下的接觸與交談，都是正常的，並不是什麼宗派活動，更不是反黨。而且在那場鬥爭中，錯誤的反倒是毛澤東和通過決議的中央全會，並不是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舊病復發」。二是既然那個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那它所提「高饒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也自然站不住了，無論彭德懷還是張聞天，都不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和「漏網殘餘」，更沒有「在黨內組織派別」。[4]不管怎樣解釋，強加給他們的這兩頂帽子總算是摘掉了。

但是對張聞天來說，卻還留有一頂「教條宗派」的帽子(至於彭德懷是否還有「經驗宗派」的帽子，在此不論)。而這又是延安整風時定的性，被看成「板上釘釘子」，有些黨史著作特別是一些所謂「民間研究成果」，至今還在不斷進行炒作、渲染、誇張以至編造，繼續着造神和造假運動(單是一個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有不少人抄來抄去，「著書立說」。)，加深着人們的印象。其實，這一定性和帽子，對張聞天以及其他某些人是否完全準確與合適，現在看來並不確切，還有進一步加以討論的必要。這不僅關係到對張聞天等人的歷史評價，而且有助於弄清黨史上不少問題。因為延安整風期間及此後的多次政治運動，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都有許多偏激的提法，黨史研究又將這些當作第一手資料並據以編寫黨史。因此，不只張聞天個人，某些時期的黨史也還存在着需要撥亂反正和去偽存真的問題。

1 毛澤東：1959年8月20日〈給張聞天的信〉、〈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99、432頁。

2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頁。

4 毛澤東：1959年8月20日〈給張聞天的信〉、〈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399、432頁；〈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

但要談張聞天和教條宗派的問題，首先得弄清什麼是宗派。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就無法進行討論，只能各說各的。所以孔子和荀子都提倡「正名」。

對中共黨史中「宗派」概念的理解

關於宗派，看來大約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理解。《辭源》、《辭海》等工具書上所說的宗派，被定義為「學術、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派別」，顯然是廣義的，可以用得很寬，但卻很難套到中共黨內鬥爭中所說的宗派上來。因此對廣義的宗派，這裏就不多引證和討論了。只是需要說明一點，就是在黨當權的情況下，黨內外也是很難分開的。例如延安整風運動，至今的黨史書上還說是全黨整風，其實當時根據地的非黨幹部也都一律參加了。共和國成立後的一些反宗派(集團)鬥爭，也是大多不分黨內外的。

說到反宗派，即使專談黨內鬥爭，也不能把宗派和宗派主義相混淆。兩者固然看似相通，但具體使用起來還是有區別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只提宗派主義而有意回避宗派。毛澤東還對不提宗派特別做了說明。[5]可見兩者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的。如對「八七會議」後的盲動主義的提法就是，「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沒有說瞿秋白等人組成了什麼宗派。後來說到六屆三中全會，也說「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錯誤」，同樣沒有提到中央有什麼宗派，也沒提瞿秋白、周恩來等人的名字。談到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對宗派主義的批評更嚴厲，但卻並沒有提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只是在延安整風後期，毛澤東的講話和許多人的發言或檢討，曾多次提到

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頁。

兩大宗派。而且從此這兩大宗派就成了歷史定論，許多黨史著作講到四中全會後那段歷史時都要提到它們。胡喬木直到臨終前在關於回憶毛澤東的談話中還講「王明小組織」，講「四中全會是奪權」[6]等。這都說明，《歷史決議》有意不提的宗派問題，但卻至今竟還一直是定論！

宗派和宗派主義顯然是不可完全混同的。根據延安整風中的體會，可以說，宗派主義一般指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和政策，而宗派則着重指組織形態。一個人可以有宗派主義思想和政治傾向，執行宗派主義政策，但卻並不一定組織宗派或參加派別活動。宗派不能只是一個人，宗派必須是多數，成為小組織、小團體、集團或聯盟。整風初期階段，對於作為一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政治傾向的宗派主義，曾有過詳盡的解釋。毛澤東的說法是，「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他舉的例子也是個人主義、鬧獨立性等，較突出的則是山頭主義。[7]這樣的宗派主義應當說是很普遍的，連同當時批判的主觀主義和黨八股，一直到共和國成立後都是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可說是愈演愈烈，至今不衰。但是談及黨內鬥爭中的宗派，情況就大為不同，對宗派主義的解釋已經用不上了，重點不再是思想和政治傾向，而是組織形態和組織活動了。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了解我們這裏要討論的宗派呢？至今許多黨史著作和人物傳記上的說法，仍然保持着整風末期提出的解釋，就是：「所謂宗派，不是說有什麼秘密小組織，而是說以錯誤思想、綱領為基礎形成的同志間氣味相投的結合，對不相投即反對的關係。」[8]由於

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49頁。

7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827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2頁。

思想、綱領，當時不容易判斷誰對誰錯，所以有些書稿還改為「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這種解釋，界定比較寬泛並且靈活，看來主要是為了對批判和追查兩大宗派表示擁護並給予「圓説」，也使大家在思想上比較容易接受，還可讓受批判和作檢討的同志便於對號入座，既維護了批判宗派的權威，又有助於避開或緩解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矛盾。但這種解釋實際上並不解決問題，當時還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後來在黨史科研上的照搬就顯得論據不足，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因為一則，這種説法界定含糊，經不起仔細的科學推敲，理論上站不住；二則，它不符合中共黨史(以至國際共運)上的實際和正式文獻上的説明。例如早已定性的托陳取消派，羅章龍的分裂活動(《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前者「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後者「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以及後來張國燾的第二中央，就都不能説他們沒有組織。就是對教條宗派，胡喬木不是至今還叫「王明小組織」嗎？周恩來關於六大的報告中談到各地代表有很強的「山頭」傾向時，也立即補充一句:「但必須説明，當時各地代表團中並沒有宗派小組織的活動。」[9]這都説明，凡稱宗派，必得有組織，有組織活動，否則，談不上宗派。至於思想和綱領是錯誤的才能算宗派，就更難把握了。因為在黨內鬥爭的當時甚至事後，各派都會自認為正確，因而無法確定誰搞宗派。即使歷史證明錯誤，也不一定能稱為宗派。例如在一些政治運動中錯整了胡風、丁玲、馮雪峰等人的林默涵、周揚、夏衍一批人是不是一個宗派？共和國成立後公安工作的領導人在潘漢年、胡風兩個小集團及其他一些鎮反工作中，參與制造過不少冤案又應如何定性?「反冒進」和大躍進中的一批積極分子和急先鋒能不能説是反黨宗派？歷史證明，廬山會議中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在政治上是正確的，那麼搞反右傾的人們不就成了一個龐大的宗派了？

9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頁。

而且這種解釋和延安整風第二階段的解釋也不盡相同。因為從1943年「九月會議」起，強調和追查的已不再是宗派主義作風和傾向，而是宗派主義的組織形態和派別活動了。毛澤東明確提出，「過去反對宗派主義是抽象的，現在要把原則變成實際」，並「着重講了『兩個宗派』問題」，説「黨從四中全會後，就有兩大宗派，一個是教條宗派，一個是經驗宗派」。還談到這些宗派「有計劃地」進行的派別活動，並指出了一些具體的人。特別強調要「整」教條宗派，説「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還説，「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10](按：其餘三人在當時大概只能是指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了。但劉少奇並不在六大選出的23個中央委員和13個候補委員之內，只是被選為審查委員)。[11]而以王明為首的這個教條宗派，四中全會前，就「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12]，四中全會後，「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並且「控制了中央碼頭」，「欺騙了黨十多年，現在要揭破這個大欺騙。」[13]這樣的「宗派」，哪裏像沒有組織，只有以思想、綱領為基礎的同志間氣味相投的結合？雖然毛澤東也説過，「這些宗派也可以説無組織系統(引者按：不是無組織)，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線的綱領。」[14]不過他強調的已經不再是宗派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而是它的組織形態和派別活動了。此後的整風實踐，追查、批判以至檢查交代，也就更多轉向「小組織」、「小集團」、「反黨集團」、「反黨聯盟」(如「教條宗派」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294頁。

11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頁；《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12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1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和「經驗宗派」的聯盟)的組織和活動了。由此可見,上述那種用於整風中的解釋,實際上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對於毛澤東反對兩個宗派的講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有個相當包容的評論,說:「毛主席關於『兩個宗派』的發言,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發言實際上為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整風定下了基調。這以後,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這成了1943年『九月會議』與1941年『九月會議』相比較,不僅在整風內容,而且在整風方式上的又一顯著特點。」[15]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第一,不只「當時」,而且此後長期以來一直到現在都「不可能表示異議」。第二,犯錯誤的人並不是「都按照這個思路檢討的」,例如王明就沒有;即使「按照這個思路檢討的」,程度上由於「深淺」相差甚遠,得到的結果也大不相同。這是後話。

該書還評論會議情況說,「在會上,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過高的『上綱』,給檢查者以較大的精神壓力,這對後來的黨內鬥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是一個應總結的教訓。」[16]可惜的是,這個教訓不但一直沒有總結和汲取,後來還有了不斷的和更大的發展。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不知有多少所謂的反黨以至反革命集團或聯盟,追根溯源,恐怕就與延安整風時對反黨宗派和集團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無限上綱和隨便套用有關。後來的每個宗派或集團都被說成「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有目的地向黨進攻」,而被批判者也大多都做了相應的檢查交代,問題也就落實定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這類反黨宗派集團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平反,所謂他們有計劃、有組織之類的說法也自然被當作不實之詞推倒了。過去總把常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中的派看成宗派,而宗派又被看成陰謀反黨集團,結果就使反宗派鬥爭或者屬無中生有,或者導致嚴重的擴大化。回想起來,如果延安整風時能把黨內鬥爭中的宗派集團說得清楚點,界定得明確具體些,也許會避免或減少任意劃定反黨集團和牽連大量無辜。在這個問題上也應接受蘇聯的教訓。他們肅錯的也實在不少。直到1988年,蘇聯最高法院還決定對三十年代的四起重大錯案平反,即:1932–1933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編按: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主張應以先支援其他國家共產黨革命為最優先路線;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1921–1926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認定「四個組織都不存在,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17]蘇聯後來的改正和平反也顯得比我們要徹底一些。例如我們對事關上千萬人的「五一六反革命」案就不了了之,更不用說1930年的「富田事件」和抓「AB團」以及後來的某些至今未平反的冤假錯案了。

其實,黨內鬥爭中的宗派和宗派活動總還是有它的特點和質的規定性的,不能用「中國特色」使之成為不負責任的「帽子工廠」。根據習慣用法,派和宗派的性質不盡相同,派一般不含褒貶,而宗派則往往用作貶詞。例如毛澤東就多次稱中央蘇區的「鄧毛謝古」為毛派,對當時的「左」傾中央,則抨擊他們搞宗派活動,並一再追查「小組織」及其後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編按:Bolsheviks,俄語,意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孟什維克)(編按: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7 塔斯社1988年8月14日報道。

Mensheviks，俄語，意為「少數派」）還變成了專有名詞。由於政見不同而形成的派，自然會進行宣傳自己、批評對方、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只要不違反黨章黨紀，都應當視為正常，不能算派別活動，更不能算反黨。他們的活動也是光明磊落和正派的，不同於那些為謀私利而拉幫結派，搞陰謀詭計。促成遵義會議得以召開的「中央隊三人團」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都是光明正大，基本公開的。因此，必須把持不同意見和宗派活動區別開來。

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學說的理論和實踐，所謂反黨宗派和宗派活動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有某種組織。可以沒有固定的組織和組織系統，但必須是通過各種形式（無論是公開集會結社還是秘密串聯）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

二是黨紀不容。宗派組織和宗派活動必定是違反黨章黨紀的，因而往往會採取非法手段，以至施展權術，搞陰謀詭計。

三是具有反黨性質。不管是出於政見不同還是為了謀取私利，宗派活動都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甚至造成黨的分裂。

上列三條，或許不完全不準確，而且也不一定三條都要齊備，但起碼得有一定的組織形態和違反黨規黨紀，否則不能算宗派和宗派活動。以前所說的那種「不謀而合」的聯盟或集團，其實是靠不住的。像「文革」初期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相互之間就不大沾得上邊，只是欲加之罪而已。鄧小平說，過去的「十次路線鬥爭」「有一大半就算不上」。那麼，以前定性的許多反黨宗派以及聯盟，自然也應根據上述標準從新加以考察。已經平反的當然可以不論，但也還有似乎已經蓋棺論定的，如延安整風時批判的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恐怕也還值得在新發掘史料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再做探索，把問題弄得更清楚些。否則講到經驗宗派都有誰，也許連教黨史的教授都會要躊躇一番的。

所謂教條宗派和共產國際的關係

談中共黨內的教條宗派問題，絕不可忽視直接有關的共產國際這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因為中國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共產國際必須絕對服從。而共產國際又是強調集中，什麼都要管的。胡喬木就批評說，「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錯誤。這種組織永遠不能搞。從這裏就可以產生社會帝國主義。」[18]這當然只能是事後總結歷史教訓的話了，當年是沒有人敢說，其實也是並沒有認識到的。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並且一開始就把服從國際定為一條鐵的紀律。直到六大通過的黨章，開宗明義第一條還是「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為共產國際支部。」第二條的「入黨資格」也規定，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和黨章，……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19]行文上都把國際放在本黨的前面，說明國際是中國黨的頂頭上司，是上下級關係，全黨都要首先服從國際。國際也就是它的領導人，不但如胡喬木在上引談話中所說，要判斷「每個黨採取的任何一個策略步驟是正確還是錯誤」，而且可以對各國黨，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具體黨員，發號施令、指揮一切，有權處分各國黨直到將其解散（原波蘭和朝鮮兩國共產黨就被解散，二戰後才另組成工人黨和勞動黨）、撤換黨的領導人直到將其開除（參加南昌起義時的著名共產黨員譚平山就是國際代表一句話給開除的。有些黨的領導人甚至還被召到蘇聯加以監禁甚至肉體消滅）。黨的各級組織和所有黨員，不但對黨中央而且對共產國

18 〈共產國際犯了兩個大錯誤〉》，載《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頁。

19 《六大以來》（下），第1頁。

際都絕不允許鬧獨立性，否則就是違反紀律、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批判宗派主義鬧獨立性就舉例警告說，「張國燾向中央鬧獨立性，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20]

毛澤東和胡喬木曾多次提到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鬥爭，[21] 其實這都只能是根據事後認識說出來的話，在延安整風和共產國際解散前大概是沒有談到過的。相反，在黨內鬥爭中都還需要表白自己擁護國際路線並引證國際文獻。標誌着中國黨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遵義會議，在決議中就多處引用有利於批判極左軍事路線的國際有關文獻。後來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鬥爭，也曾一度以張浩的「國際代表」身份把他壓了下去。直到延安整風，批判教條宗派時還提出真假國際路線的區別，說王明他們標榜的國際路線其實是假的，遵義會議後中央執行的才是真正的國際路線。[22] 即使在共產國際正式解散後，也仍然要利用它的權威。例如第一次在黨內正式點名批判王明博古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指示中，用的就是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愛爾科里（即陶里亞蒂）的一些言論，證明王明路線違背國際方針，而中央的布爾什維克路線才完全符合國際領導者們的指導原則。[23] 到了1944年初，國際已解散，但對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發來的電報，還顯得誠惶誠恐，不但一再解釋，而且在實際上對有關問題也真的提起

20 〈整頓黨風學風文風〉，載《整風文獻》，1949年解放社版。1953年編入《毛選》時改了標題，也刪去李立三對共產國際鬧獨立性一句。

21 例如胡喬木在〈毛主席打破了共產國際的教條化傾向〉的談話中就說，中國黨同共產國際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尖銳的鬥爭。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7頁。

22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8頁原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23 見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42–143頁。

注意，作了調整。[24] 這些都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黨是多麼權威，並不像胡喬木後來說的「同共產國際進行了那麼長期的堅決的尖銳的鬥爭」。更不是毛澤東多年後直截了當解釋的：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25] 當年的《整風文獻》除中國領導人的文章外，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材料。而且毛澤東自己就提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材料」。[26] 可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同事後一些說法是有相當距離甚至完全相反的。

長征前，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領導，除從莫斯科進行遙控外，還經常派代表來召開會議、發出指示，並且在上海設有常駐機構，保持着直接聯繫和直接指導。這種領導不僅體現在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策略的變換上，而且也表現在組織路線的執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即以毛澤東本人而論，他在黨內地位多半取決於共產國際而不是中共中央。未參加二大和這時在黨中央無任何職務的毛澤東，卻能一下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就是由於得到指導召開中共三大的國際代表馬林的器重，因而當選為九個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任中央局秘書並兼組織部長。後來由於馬林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主張遭到批判，國際代表換成了維經斯基，遂使以前支持馬林的毛澤東連黨的四大也沒參加，在中央的一切職務全被免掉了。再後又由於領導農民運動，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重新受到國際及其代表的信任，才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國際代表直接主持下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成功地建立了紅軍和根據地之後，毛澤東就一直得到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與保護，因而這期間

24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162頁。

25 1956年9月同南共代表團的談話，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26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2–803頁。

雖有某些波折，但他的黨內職務卻不斷上升，六大從中央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三中和四中全會均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國際的干預，「左」傾中央沒能達到把他排擠出政治局和派赴蘇聯學習或「休養」的目的，他反而被推舉為中華蘇維埃主席，在「左」傾達到頂點的五中全會上還上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直到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一再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在共產國際的明確支持下，最後確立了作為黨的領袖的地位。[27]

綜上所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產生不了黨的領袖毛澤東。事實證明，黨的事業及其領導人的起伏進退都與共產國際息息相關。

共產國際對中共既是上下級關係，又管得很嚴格，所以中共路線的正確與否都和國際有直接關係。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際代表馬林、羅易和鮑羅廷（編按：Mikhail Borodin，1923–1927年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中國廣州政府代表）要比陳獨秀右得多，因為陳獨秀就認為莫斯科不應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後來在給中央的辭職信（1927年7月15日）中還抱怨國際「不許退出國民黨」。但是從1927年下半年起，國際路線又開始不斷向「左」轉，中國黨也就陸續犯越來越「左」的錯誤。所以李維漢認為，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錯誤，主要責任在國際代表。[28] 連立三路線也是在共產國際的所謂「第三時期」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1930年6月國際還明確指示，「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近期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席捲全中國，無論如何也會波及許多關鍵性的省份」。直到立三路線鬧得太不像話特別是表現有點不聽國際的話，被目為「反國際」了，這

27 參見《毛澤東年譜》有關部分和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三章。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頁。

才被下令加以糾正。[29] 至於後來的王明，更是毛澤東說的，莫斯科刮東風他是東風派，莫斯科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就連著名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口號，發明權也不屬他，而是季米特洛夫參考西班牙人民陣線的經驗通過他向中國黨提出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黨每次犯錯誤都和共產國際有關。但國際又往往不承擔責任，出了問題只是批評和懲罰中國黨的領導人。而且政策有時還變得非常快，使人很難跟上。例如瞿秋白、周恩來完全按照國際指示回國召開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但會後不久國際的調子就變了，又指責他們為調和主義，致使極有才華和威望的瞿秋白也就從此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最後實際上被拋棄了。由於國際的經常干涉和直接過問，往往弄得一些中共領導人無所適從，只有緊跟，遇到指責就作盡量上綱上線的檢討，卻使一些心懷叵測和搞投機的人如王明、康生之流有機可乘。

當然，中國黨犯錯誤首先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負責。而且事實上，對於每次錯誤，受到批評和指責的有關領導人，除陳獨秀等一直不服，認為他是國際錯誤的「替罪羊」，終被開除黨籍外，其他如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開始還頂了一下），直到被中國黨自己定為教條宗派的博古、張聞天等，無不進行真誠或違心的檢討，但都沒有向國際推卸責任。連個性倔強的毛澤東也不曾公開頂撞過國際的指示和決定，遇到國際批評時也不得不作點檢討，如西安事變後承認提出「將蔣交人民裁判，是不對的」，[30] 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表示「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甚至還說出「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31] 這種超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話。大家之所以持這種態度，

29 參閱唐純良：《李立三全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74頁。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頁。

3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1頁。

一方面出自對列寧創立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崇拜，另一方面服從國際領導也是一條鐵的紀律。設想毛澤東當年如果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和「左」傾政策，一直對着幹，那他能得到國際長期的支持和保護，最後成為黨的領袖嗎？

其實，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黨的領導和指揮上也不是千篇一律、始終一貫，而是因人而異和隨時變化的。毛澤東說的共產國際是「兩頭好，中間差」，其實也不儘然。例如兩頭的前頭，就包括整個大革命時期。因為他說過，「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 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32]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不只1927年下半年，1922年以後國際代表馬林就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關於中共三大決議給國際的報告中也提出「只有國民黨才能領導國民革命運動」，而毛澤東則是三大決議的積極執行者，曾被斷定「是馬林的人」。[33] 所以這頭幾年，正是由於斯大林一直到1927年下半年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抱有幻想，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又不了解中國情況跟着犯右的錯誤，才成了促使陳獨秀走上右傾機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中間差」，倒毋庸置疑。隨着斯大林在蘇共黨內鬥爭中勝利，共產國際進一步推行極左路線，更多地干涉中國黨內事務。這時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竟然提出，「因中共中央太軟弱，能力太低，目前階段『保姆是需要的』，現在應當對中國共產黨實行『顧問制度』，讓共產國際代表直接指揮中共活動。」[34] 這就使中國黨十年連犯三次「左」傾錯誤，如果把責任完全或主要推給在國內的中國黨領導人，都不大合乎歷史事實，也有欠公允。

3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頁。

33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8、9頁。

34 〈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見《百年潮》，2000年第12期李玉貞的評介。

至於後邊這「一頭」，即1935年以後，共產國際之所以比較好了一些，則是許多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面對法西斯的崛起，蘇聯和國際的戰略策略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已不再是急於搞奪取政權的世界革命，而是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後來蘇德戰爭起，更是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無暇他顧。中國黨的任務則是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抗日第一。服務於蘇聯政策的國際這時和中國黨目標完全一致，因此也就容易配合與合作。第二，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前同國際失去聯繫後的一年，反而證明政治上漸趨成熟，能夠獨立自主地正確解決問題，因而不願接受過分束縛，國際對中共也不能不稍為放心和放手。第三，雙方都更多地了解了情況，積累和汲取了經驗，大大提高了處理相互關係的水平。國際的新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等，比較尊重各國黨，處事比較民主。中共也學會了更好地和國際打交道。第四，國際選定並堅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這在雙方後期關係上具有決定性意義，也是毛澤東對後期國際及其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一直保持好印象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在共產國際解散前，談中國黨的十年「左」傾，談黨內鬥爭，談宗派集團，離開國際都是無從談起的。而所謂教條宗派，後來也常被稱作國際派、莫斯科派、甚至斯大林派，原因就在此。但是以往在談到教條宗派時又總是忽視國際這個重要因素，似乎弄出兩大宗派都是中國人自己搞的，反而是沒有緊跟國際路線的結果。這也是自相矛盾和造成教條宗派說不清的一個極大障礙。

現在讓我們就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來考察一下流傳了六十年、一些黨史書上至今仍在談的所謂教條宗派（也勢必聯繫到孿生的經驗宗派）。而談到教條宗派的形成，人們往往又追溯到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有些人還熱衷於後期一種謔稱「二十八個半」。為了正本清源，這裏也就從中山大學談起，特別是談點對「二十八個半」的看法。

張聞天與所謂「二十八個半」

如何看待「二十八個半」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稱，大約產生於1929年6月中山大學總結工作的全校黨員大會以後。當時中國學生在政治和工作態度上分為兩派，一派擁護得到共產國際支持而與中共代表團有不同意見的聯共基層組織支部局。(按：中共六大後不久，中共旅莫支部被解散，黨員一律編入聯共基層組織做預備黨員，包括黨的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一些人的擁護支部局。除思想認識外，還有一個自以為是遵守組織原則和黨章的問題。)另一派則支持代表團反對支部局。會開了十天，對立更加尖銳，最後進行表決。據曾任支部局委員並在會上當過翻譯的楊尚昆說，表決結果是：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志九十餘人(還有俄國的三十餘人)，反對的二十餘人，其餘二三百人表示懷疑。張聞天說這是「兩頭小，中間大」。由於支部局派以「國際路線」相標榜，所以擁護的比反對的一派多些，約百餘人，其中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等。[35]持支部局立場和觀點的一些人，由於在兩派之爭中處於「多數」，又有國際支持(自然意味「正確」)，於是就飄飄然起來，以「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俄文正好是多數並代表正確)自命。但反對派並不服，不承認對方為多數和正確，還加以挖苦和譏諷，估算他們中的積極分子不到三十人，就戲謔地取名「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由於布爾什維克在國際共運中是個光榮稱號，不但這兩派要爭相使用，就是中國黨也一直定為奮鬥和爭取的目標。例如毛澤東提出的口號就是要「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36]延安整風期間的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連續兩天的長篇報告，也是以《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為題的。何況在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誰不願當布爾什維克？所以反對者就要給他們的「布爾什維克」加上引號。但這「二十八個半」究竟具體指哪些人，也許初叫的人還心中有數，但叫開後就變成一個政治綽號或帽子，可以給自己認定的人去戴了。所以人們把不同的名單加在一起，「二十八個半」竟變成了五十多個人。這說明，「二十八個半」並非一個確定的群體，人數更不符合實際，也不是產生於「十天大會」中的表決。

不管這些人是一百多還是二十八個半，總是在那場鬥爭中採取了共同立場和共同行動，因而形成了一個存在時間不長的支部局派(或國際路線派)。但既然連具體成員都弄不清，可見它並無固定組織和經常聯繫，這次鬥爭過後大概也就各奔東西了。除參與鬥爭的人還可能憶及外，歷史上也不曾有多少人提及它。「二十八個半」的出名和受到追查，已經是十多年後的延安整風了。

延安整風時定性的教條宗派，主要成員都是在蘇聯留過學的人，根子自然會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於是在那場鬥爭中一時戲稱的「二十八個半」就浮出水面了。根據毛澤東「脫褲子、割尾巴」的號召和寫反省筆記的規定，一些當年留過學或了解中山大學那場鬥爭情況的人也紛紛就此進行檢查交代或揭發，一時鬧得很熱鬧，對被稱為「二十八個半」中的人形成巨大壓力。參加過整風的人都知道，當時鬧得最凶的是康生。他不但多次在會上提，還就此問題作過一次報告。事後想來，他的意圖很明顯，既為迎合上面窮追教條宗派的需要，又可轉移視線以淡化他追隨王明多年的事蹟。但「二十八個半」

35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46-147頁，另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6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頁。

終究是青年學生一時打派仗的戲稱，而且人員複雜、變化極大，並不就是後來批判的教條宗派，因而無須也無法深追和定案，也就沒有提上中央總結黨史問題的日程。所以毛澤東在1944年3月5日的講話中也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派別是否還有？這是書記處會議上沒有提到過的。經過幾次分化，『現在沒有這個團體了』。去掉這個包袱，才符合事實。」[37]這就是說，中央沒提到這個問題，以前有沒有以及情況如何，未作評論，反正現在沒有了。如果確有「二十八個半」，並進行過宗派活動，延安整風能這樣輕易放過、馬虎了之嗎？

正是由於上述情況，延安整風後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比較正式的黨史著作，都沒有提過「二十八個半」的問題。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又是這個康生在1966年提出「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結果凡被列入其中還活在國內的人，都遭到殘酷迫害，有的被關押，有的被整死。一些造反派也跟着亂嚷，把這個本來就說不清的問題弄得更加混亂。很明顯，「文化大革命」後這也是一個需要撥亂反正的問題。有鑑於此，1981年8月，胡喬木根據孫治方的意見建議召開「二十八個半」問題調查會，並決定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召集和主持。與會的有熟悉當年情況的老同志楊尚昆、伍修權、孔原、徐以新、孫治方等19人。經過座談，在分析了王明教條宗派後認為，所謂「二十八個半」，究竟是哪些人很難弄清，而且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批人中除七八個變成叛徒外，多數同志都擔負過領導工作，為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還有十數位同志已成為革命烈士。鑒於「二十八個半」不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還被康生給弄成壞人的代名詞和打人的棍子，因此「與會同志建議黨內今後不再使用『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38]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1頁。

38 見李樵：《徐以新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5頁。另見柳百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號的由來〉，《炎黃春秋》，1999年第12期。

此後，不僅正式的黨史著作仍然不提，就是嚴肅的黨史研究也沒有去討論「二十八個半」的問題。有些傳記因涉及傳主而要提時，或稍作澄清如《張聞天傳》和《徐以新傳》，或一筆帶過如《博古傳》，也有根本不提的如《王稼祥傳》。但是兩次大政治運動（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波瀾和康生的遺毒並不是一下就能完全消失的，所以以「二十八個半」為題進行炒作的還是不少。這裏僅舉《二十九個人的歷史》[39]一書為例，為的是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的炒作情況，倒不是要專門評論這本書。因為現在黨史出版物上似乎有一種風氣，就是互相抄來抄去，並添枝加葉，編造故事，缺乏胡喬木說的，「黨史應該有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態度。」[40]

這本書的內容提要上說，要對這二十九個人的人生歷程歸宿「給您一個滿足的回答」。作者在書中也說，他要「把那些關於『二十八個半』的說不清的地方盡量說清楚」。但是等看完書你就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首先是書名就不確，因為書裏並未把二十九個人的歷史講全，作者確定的名單中大多數人就沒有寫一點他們的「歷史」；着重描寫的那些人也多是從別處抄來的（包括朱仲麗的《黎明與晚霞》這種文學書中的材料）若干片斷故事，談不到他們的「人生歷程」。其次是用「文革」中的語言和不實之詞談論一些黨的領導人。如說四中全會後就是王明「與一幫追隨他的小兄弟們在中共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說「很多人都想借助王明的勢力撈取個人資本」；說「這種互相需要導致了他們共同大搞宗派活動」；說他們「結黨營私」、「損人利己」等等。書中還具體地談到，派往中央蘇區的三人中「有一個則是王明的『心腹』——王稼祥」；說去中央蘇區的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凱豐和楊尚昆是王明宗派的「骨幹分子」和「得力助手」。還有一些編造（或

39 汪雲生：《二十九個人的歷史》，昆侖出版社1999年版。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18頁。

抄來)的不實之詞及虛假事件和故事，如「共產國際指定的中央總書記王明」；說什麼五次「圍剿」後張聞天「以連續兩天的時間趕往雩都」找毛澤東商談，「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分手時毛還讓劉英與張聞天同行；說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決定讓張聞天以(毛)自己的觀點寫一個報告」準備到會上去念；[41] 說瓦窯堡會議經過「充分討論之後，張聞天受政治局委託，起草了會議決議」。[42] 類似這些完全違背史實的問題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借「二十八個半」之題炒作的，當然不只這本書。例如還有一部名為《黨史風雲實錄》的書，在第二章裏也大談「二十八個半」。[43]《中華兒女》2001年第7期也登了一篇從這類書中抄來的文章：〈「二十八個半」的人生結局〉。既然這樣抄來抄去，證明還有市場。那麼到底應當怎樣看「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問題呢？這裏提出以下幾點看法供討論。

第一，「二十八個半」是反對派挖苦諷刺當時擁護國際路線和支部局一批積極分子的戲謔稱呼和政治帽子，並不是一個具有組織形態和秘密聯繫的宗派團體。他們中一些人在聯共黨支部局任職，完全可以用支部局名義，無須搞秘密的宗派活動。他們的追隨者前後有百餘人，積極分子也在四五十，叫作「二十八個半」並不符合實際。也不是人們說的1929年原中山大學「十天大會」表決時投支部局票的人，因為被列為主要成員的幾個人就並沒投票：王明回國了(並不像《炎黃春秋》總第93期所載柳百琪的文章中說的那樣，似乎王明在現場指

41 可參閱〈遵義會議決議到底是怎樣起草的〉，《炎黃春秋》，2000年第9期。

42 事實是，會議12月17日開幕，25日結束，而張聞天起草的決議已於15日油印散發，後來通過的決議文本與此完全一致。見〈張聞天對瓦窯堡會議的貢獻〉，《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集。

43 郝景泉：《黨史風雲實錄》，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揮。其他有些敘述也很不可靠)，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在紅色教授學院而未與會。

第二，「二十八個半」究竟是哪些人，沒有也不可能搞清楚。就連不少書如《二十九個人的歷史》和《徐以新傳》等認為是無爭議的那「半個」──徐以新，就大成問題。徐以新當時還是團員。按楊尚昆所說，「參加十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44] 張聞天對那「半個」卻提出「有的說是傅維鈺」；(他提供的名單中也沒有孟慶澍，以為她和朱自純等「是無所謂的」)。[45] 而且這批人擁護支部局也是一時之事，很快就發生分化，有些繼續支持所謂的「王明路線」，有些就一直反對。例如被列入「二十八個半」的宋盤銘(潘民)就在湘鄂西蘇區被「二十八個半」的夏曦在「肅反」中給錯殺了(兩人又都先後成了烈士)。

第三，被列為「二十八個半」的，絕大多數都是忠誠的革命者。據張聞天《反省筆記》中的名單，當時還健在且擔負一定領導工作的尚有12人，為革命犧牲的10人，消極脫黨和叛變的8人。更不用說其中有許多同志是為中國革命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脫離革命的只是極少數。活着的和犧牲的也都先後改正了錯誤，沒有一個人跟王明到底(按張聞天的說法，孟慶澍不算)。因此對所謂「二十八個半」就絕不可籠統使用輕蔑和不恭的稱謂，如「王明的小兄弟」、「親信」、「幹將」之類。

第四，支部局本來就是聯共的基層組織，一切服從聯共安排本不成問題。在指揮和控制中國黨上，共產國際和聯共其實也是一回事。因此這批人不是什麼「打着國際的旗號」，而是始終得到國際和聯共的

44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李樵：《徐以新傳》，第89、91頁。

4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支持。在支部局同中國黨代表團關於富農等問題的爭論中，共產國際是明確支持支部局的，並隨着聯共的清黨，共產國際監委也把中國代表團給解散了。

第五，根據以上所述，一時在中山大學嘲諷叫的「二十八個半」，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和成為組織形態的反黨宗派；作為聯共一個基層組織的支部局，也不能說進行的是非法的宗派活動。因此在黨史研究和著作中就應按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召開的調查會上達成的共識，不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有名詞，更不應為了別的目的而借題炒作。

第六，不提「二十八個半」，並不是否認王明和在延安整風中受批判的一些人有教條主義，也不能否認聯共支部局在清黨中有冤案和一些中國學生起過壞作用，這都是不應加以混淆的。上述調查會就強調區別對待。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害，這是不可否認的。但被列為「二十八個半」中的人卻並不就是王明宗派，例如孔原、徐以新、陳原道、甚至王稼祥就都不承認。

張聞天和「二十八個半」的關係

從以上的敍述和分析中，也就容易大體弄清張聞天同「二十八個半」的關係了。概括起來，也可歸納為以下幾條。

第一，張聞天在蘇聯學習期間，對共產國際、聯共和斯大林養成盲目崇拜，屬當時的洋「凡是」派。由於他堅決擁護國際、聯共及其基層組織支部局，被一些人目為「二十八個半」是很自然的。他在《反省筆記》中也完全承認。但由於「二十八個半」並非實體，他又沒有在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投票，所以算成「二十八個半」只是被掛上虛名，實際上並沒什麼關係。因此在寫張聞天時把他同被稱為反黨宗派的「二十八個半」連在一起也是不妥當的。

第二，張聞天參加支部局的某些工作不能算宗派活動。他在離校後即和中大疏遠，只是擔任教課和一個工人班黨的小組指導員。其活動均按支部局方針，主觀上認為這就是擁護國際路線，「我當時滿以為參加這種鬥爭是每個布爾什維克的責任，絲毫沒有懷疑這中間有什麼『鬼』」，[46]既無私心，也無派性。吳亮平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也說，「使我親身體驗到聞天同志為人的正直和作風的正派」。[47]

第三，在學校同中共代表團的政治爭論中，張聞天是站在國際和聯共方面的，曾在富農問題上以聯共和國際當時的極左觀點(即消滅富農)寫文章批評過瞿秋白，反對代表團的「右傾」。這不但說明他當時就是錯誤的，而且也可說明他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淵源。

第四，張聞天參加中大的鬥爭，基本上出於他的教條主義和「左」傾觀點，而不是為了「撈取個人資本」、「結黨營私」，不是無原則地投靠米夫、王明。他自己說，同米夫很少接觸，對王明並不賞識，也很少來往(他說王同何子述、李竹聲等人常在一起，「自成一個小集團」)[48]，甚至頗為厭惡，說陳紹禹比周達文(這場鬥爭中張的對立面)更危險。[49]這哪像一個宗派。他還說，他「同博古根本不接近」，而同沈澤民比較接近，有些「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在中山大學的許多人回國後，張聞天同他們也無書信聯繫。[50]

從以上這些看來，張聞天並不像一個被描述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有目的的反黨宗派──「二十八個半」的成員。延安整風

4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7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9　蕭揚等1996年在莫斯科查檔，全總530(原中山大學檔案)，目錄，卷宗5，第29頁。

5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時，他自己的承認和檢討，是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其實並不妥當(對此已有另文討論)。現在如果還是老揪住不放，一定要把他定為「二十八個半」反黨宗派之一，那就是違反歷史真實了。

六屆四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及張聞天同它的關係

應該客觀地歷史地看待四中全會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和後來成立臨時中央，都是按上述斯大林給莫洛托夫信中說的「保姆制」或「顧問制」實踐的，也是延安整風中批判得最厲害的黨史上的兩件大事，被認為是教條宗派的篡黨，並一直成為歷史定論。如上引1990年胡喬木在回憶毛澤東的談話中還說，「四中全會是奪權。」[51]

延安整風對臨時中央自始就持完全否定態度，但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前後卻有天淵之別。1941年「九月會議」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簡稱《歷史草案》)上，開宗明義就說，「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52]為什麼這時認為四中全會「基本上是正確的」呢？雖然胡喬木的書上列舉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有四五條，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一條恐怕還是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在抓「AB團」、處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9頁。

52 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頁。

理「富田事件」等極左錯誤問題上支持了毛澤東而批評和撤換了持比較正確意見和取代了毛澤東書記職務的項英。被稱為「欽差大臣滿天飛」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飛向中央蘇區的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還在一些軍事問題上支持了毛澤東。所以直到十多年後的七大上，長期批「欽差大臣滿天飛」的毛澤東卻讚揚起三人團來了，說「四中全會以後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在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53]被毛澤東當時認為代表「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54]的這四五條作為歷史事實當然沒有也不會改變，但過了兩年，到1943年的「九月會議」以後，四中全會卻沒有任何「成功方面」了，變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55]並成為至今一切官方黨史著作，包括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等的標準評價。

為什麼在延安整風那兩年之間對四中全會的評價會發生如此180度的變化呢？大概主要是由於對王明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博古路線也就變成了王明路線(對此將另文討論)。胡喬木的解釋是，毛澤東《歷史草案》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反映了當時認識上的局限性」，後來的改變則是由於認識的進一步提高和深入。[56]這恐怕是說不大過去的。那麼現在已是事過六十年，又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黨史研究得到空前發展，照道理，對六屆四中全會的評價也可以重新進行一些討論了。

53 《毛澤東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

5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5頁。

55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5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5頁。

綜上所述，對四中全會可否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並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直接操縱下，制定並在後來貫徹執行了一條極左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評估四中全會的前提。對這一基本看法是不能動搖更不能改變的。

其次，四中全會的合法性在正式文件和嚴肅的黨史著作中從來沒有人否定。這是因為，一則它是國際專門派代表來主持召開的，無論是路線的制定還是中央的改組都是依照國際的事先指示，事後又得到國際的批准以至讚揚（1931年8月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中，不但批准了四中全會的路線，還指出四中全會「使中共在繼續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57]）。二則從參加的人選看，四中全會也基本上合乎組織原則。出席會議的37人中，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22人，佔百分之六十，列席的為15人。政治決議案為米夫起草。候選人名單則為中央政治局和國際遠東局商定，由周恩來親筆寫出並在會上宣讀，最後以20票贊成兩票反對通過。[58] 根據這兩條，恐怕就很難說四中全會是「篡黨」或「奪權」。否則，1927年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明那茲主持下召開的在關鍵時刻挽救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八七」會議，從組織原則講，不更是「篡黨」和「奪權」了嗎？但是直到最後，毛澤東和一些黨的領導人以及黨史權威胡喬木等仍堅持「四中全會是奪權」，而至今許多所謂屬研究黨史的書籍中也對四中全會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以至實際上加以否認。例如《黨史風雲實錄》（上冊）中就提出問題說，「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出席

5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89年版，第211頁。

58 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版，第91–92頁；葉永烈：《陳雲之路》，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

會議的37人中，竟然有15個不是中央委員，近百分之四十。這也稱是『中央全會』。」[59]《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上也說，「為了確保王明上台，米夫強迫中共中央同意讓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會議」。這都可能算是少見多怪了。先不論參加的是些什麼人（37人中被列入「二十八個半」的只有6人），[60] 單以非中央委員的人數論，這實在不算特別。此前的三中全會就是中央委員14人，地方和單位代表22人。人們更知道在延安開的中外黨史上都算得上最長的六屆七中全會（11個月），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7人，列席12人，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難道這就不能叫「中央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可以不算？須知這還是在解放區，又是在全黨反對不正之風的延安整風期間；而四中全會則是處於白色恐怖和共產國際派代表直接操縱之下的。在黨史研究中持雙重標準，仍然是在繼續搞個人崇拜。

第三，從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機關的組成和實際工作情況看，還不能說教條宗派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或領導權，發生了「篡黨」、「奪權」問題，也不能說「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碼頭」。因為全會選進政治局有九個正式委員（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王明）和七個候補委員（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只有一個王明屬所謂教條宗派。而且在隨後的政治局分工和確定常委人選中，據說國際遠東局有意讓王明當個候補常委，結果也沒弄成，而是根據周恩來提議，仍然讓他去做江蘇省委書記；常委則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為陳郁、盧福坦、徐錫根。屬教條宗派的其他人，不但沒有能進政治局，而且在補選和遞補的五個正式中央委員中也沒有一個，會前極為活躍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連中央候補委員也沒有當

59 《黨史風雲實錄》（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

60 見該書第155頁。

上。[61] 而且四中全會後米夫還在中國待了半年左右，對中央進行着直接的操縱和指揮。有他的撐腰，王明也許發揮的作用大一些，但其他人大約也只能執行米夫制定的方針政策而不敢對着幹。所以說一個未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王明，竟有如此本領，單槍匹馬一下佔領了「中央碼頭」，這是很難令人想像的。其實，只要稍為翻閱一下《周恩來傳》和《周恩來年譜1898–1949》等書的有關章節，就可以看出，從四中全會到臨時中央成立，主持中央日常實際工作的是周恩來。當時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也如是說。

第四，所謂「欽差大臣滿天飛」，看來也是誇大其詞。首先，毛澤東自己就多次要求中央派幹部來加強領導。如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具體提出，「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當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62] 他對四中全會後派來的真正具有「欽差大臣」性質的中央代表團也是一直歡迎和讚賞的。其次，中央向蘇區派幹部既是實際工作的需要，又是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四中全會後的2月22日，周恩來起草的致國際電就說，「現在正依照國際指示，要從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軍事幹部不論是在莫學過軍事的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蘇區」。恐怕談不上是派「欽差」，也看不出有什麼派性。幾天後的3月4日，中央常委還「決定凡去蘇區的人，統由周恩來、康生（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安排」，卻並不是王明或教條宗派別的什麼人。[63] 而且後來陸續派往各地的也不是刻意要派留蘇學生。例如派夏曦出任湘

6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323頁；《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01頁。

62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4頁。

6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05、206頁。

鄂西分局書記，就是因為李維漢不去。[64] 而且1931年中央派往洪湖蘇區的還有錚錚鐵骨的錢瑛。派往中央蘇區的任弼時和派往鄂豫皖的張國燾等這些重要領導人當然不能說是屬教條宗派。至於先後派往東北組織抗日聯軍的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趙一曼等人[65] 就更不用說了。其實，當時派往各地的人並不算多，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由延安向各地派領導人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共和國成立後由中央派去各地的領導幹部也不少。難道這都是「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出的幹部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屬常規。那時的中央執行共產國際的極左政策，派出的無論是留蘇學生還是土生土長的幹部（如後來去中央蘇區的李維漢），都會照此辦理。至於犯肅反擴大化錯誤和濫殺無辜，更不能看是否「教條」，如果在湘鄂西曾亂殺人的夏曦算「教條」，但先在鄂豫皖後到四川的張國燾卻不能算了。一方面軍中大抓「AB團」還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反倒是中央先後派來的項英和周恩來作了糾正。因此，把「欽差大臣滿天飛」看成都是「教條宗派」，說「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會後是博古，這個宗派是相當有計劃地派出幹部到各蘇區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組，只有幾十個人」，是和事實有相當距離的。至於胡喬木說的，「把原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統統拿下來」，[66]更是無限的誇大。

第五，談到「毛主席對四中全會時國內領導人的批評，主要是講為什麼拱手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領導權

64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1頁）中說，四中全會後不久，「恩來同我談話時，首先要我到湘鄂西中央局任負責人。我表示不想去。又提出要我到贛東北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那裏任特委書記。我表示也不想去。」

65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頁。

66 分別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47頁。

交給博古。他最不滿意的是在這裏。」[67]這既不完全合乎事實，也只能是事後諸葛亮。因為如上所述，說王明控制了「中央碼頭」實際上是誇張。在中央真正管事的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起主導作用的則是任弼時，都不屬教條宗派和「王明小組織」。而且根據國際指示辦事，也不能說是拱手讓權。否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三代，單從組織上說(暫不論路線正確與否)也都是「拱手讓權」了。如同黃克誠所說，毛澤東自己也曾「拱手讓權」，因為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主要是毛澤東創建的，他在軍民中也有很高威望，怎麼能發生「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這樣的事。[68]這恐怕除了他說的毛澤東喜歡偏聽偏信的組織路線和錯誤肅反使其失掉部分人心外，還有個全黨服從中央和國際的紀律問題。實際上在這之前的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上，他已把黨權和軍權「拱手」讓給了並非教條宗派的任弼時、項英等人，只有一個被算作教條宗派的王稼祥反而是支持他的。

第六，四中全會基本上是錯誤的，但說它「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和「教條宗派只有罪惡無功勞」，[69]恐怕也有些太過分。例如在人選上，新進入政治局的除王明外，還有任弼時、劉少奇、陳郁、王克全；保留了一批黨的重要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在政治局的地位(如果他們像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一樣被撤消職務，那以後就有些難辦了)。而且毛澤東原先在《歷史草案》中肯定的那幾條「成功方面」，除「解決富田事件的爭論」是混淆了敵我(現在黨史界已經在為之平反，但毛澤東在世時還是一直肯定的)外，其他如對待立三路線錯誤和打擊羅章龍右派、取消全國總行委、放棄城市暴動和

6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5頁。

68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頁。

6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攻打大城市、在粉碎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中的工作等，還是應當肯定的。特別是在敵人的日夜搜捕、顧順章等叛徒出賣的險惡情況下，能夠保住中央機關和一批重要幹部以及黨的文件檔案等，這種忠於黨的事業和英明機智的精神，尤值得永留青史。

僅從以上幾點就可看出，過去對四中全會的評價顯然有點絕對化，有些說法也不 合乎實際情況，而在黨史研究中那種抱定歷史定論而不顧歷史事實的現象也長期得不到克服。因此對四中全會重新作點考察還是需要的，並不是什麼「要翻歷史的案」。

張聞天與四中全會的關係

至於張聞天和四中全會的關係，也可以談到以下幾點。

第一，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已是四中全會開後一個多月，他既無可能與會，事前對會議也一無所知。因此可以說四中全會和張聞天毫無關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的，那些「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70]的人，主要指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張聞天不在國內，當然也不會參加這些宗派活動。現在有些黨史著作，把張聞天列入參與四中全會奪權的教條宗派之中，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第二，張聞天是四中全會路線的堅定支持者。他本着對共產國際的迷信，進而認定四中全會的路線就是國際路線，因此不用多加考慮和研究，就盲目地投入到捍衛這一路線的鬥爭中去了。例如他1931年2月17日才輾轉回到上海，兩三天後同黨中央接上關係，但2月21日已寫出《怎樣完成黨報的領導作用?》的文章，竟點名批評「秋白同

7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志立三同志一直到四中全會以前」如何如何。這時不要說了解國內實際，而且四中全會本身的情況都還沒搞清楚，表現了典型的毛澤東所說「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的作風。2月23日作時評《南京政府的財政恐慌與大借款》，24日寫《加緊我們日常鬥爭的領導》。到3月17日，抵滬一個月內就已寫出和發表了八篇文章，期間還有參加會議、發表意見、做報告、起草文件及其他具體工作。[71]這固然顯示出他的勤奮和才華，但也說明不作調查研究和教條主義作風的嚴重。

第三，張聞天不但忠實執行四中全會的路線，而且還有所發展。毛澤東把他定為蘇維埃後期錯誤路線的「繼承者與發展者」，有一定道理。由於他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迷信，所以特別強調在社會上揭露和打擊中間派，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鬥爭，大力宣傳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和「進攻」路線，而且往往點名批判，不講策略。例如把中間派別對蔣介石的不滿和要求民主說成是「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欺騙」，甚至公開批評不久即為中共秘密黨員的胡愈之是「國民黨宣傳員」。又如後來寫的長篇社論《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就點名批評了十多二十個省委、一批群眾組織和中央機關，以及不少領導同志。[72]無論黨內黨外，打擊面都太寬了，表現了「打倒一切」的「左」傾機會主義老公式。

第四，四中全會後張聞天的錯誤主要表現在宣傳方面。他主管宣傳，日常工作就是「編報紙、寫文章」。在周恩來、王明離開中央前，決策上他的發言權有限，也很少管其他實際工作。臨時中央時期，他和博古的分工也是「他主要寫決議，我則主要的寫文章」，而且還總是

71 以上均見《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8頁。

72 《六大以來》(上)，第211–224頁。

怕博古批評右，不敢理直氣壯地談反「左」。[73]，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也說，「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74]

第五，四中全會後張聞天在工作中犯過教條主義錯誤，但絕不能像延安整風時對他的批評和他據以反省的「只有罪惡無功勞」。[75]這都是些片面的偏激之詞。事實上，他不但在革命的大方向上同全黨完全一致(毛澤東自己就提出「不要否定一切」，說「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76])，而且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辛勤地為黨操勞，在各個戰線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四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在周恩來的日常具體主持下，進行了對敵鬥爭，粉碎了幾次叛徒的破壞，維護了黨的領導，在這中間也都有張聞天的一份功績。所有這些是不應也不能否定和抹殺的。

如何看待「臨時中央」和張聞天的作用

對臨時中央也要一分為二

其實上面所談內容，多已涉及臨時中央時期的工作和一些問題。這裏想着重談的是如何看待臨時中央和張聞天在臨時中央的地位與作用。先從張聞天回國後工作談起。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3頁。

7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76 〈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8頁。

1931年2月17日張聞天回到上海。2月19日向忠發、周恩來和國際遠東局談話中即已提到「張聞天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長」，前任沈澤民(也是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已決定去鄂豫皖蘇區，需要有人替補。[77]張聞天當上中宣部長後，為了宣傳和闡釋中央的方針政策，他從3月2日起開始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議(這也是正常現象。例如「文革」前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並非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卻一直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各種會議，所以才能寫出《十年論戰》)。這次回國，張聞天已從「五四」後一個頗有名氣的青年文學家變成完全從事政治活動的職業革命家。而且是長期留學蘇聯，忠於國際路線，馬列書念得多，知識面廣，文章寫得快，工作又極為積極認真，因而得到大家(中央領導人和國際遠東局)的器重。加之由於他的主要任務是編報紙、寫文章，而且往往三兩天就是一篇，雖然用了許多化名，但還是很快出了名，被黨內外都看成留在上海黨的一位領導人。例如半年後(9月份)國民黨懸賞通緝上海的七個共黨要人中就有他(和陳紹禹、沈澤民、羅登賢、秦邦憲各為一萬元賞金，瞿秋白、周恩來為兩萬)。[78]可見他後來進入臨時中央並不是完全偶然的。

1931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這之前，黨的工作重點就已轉向蘇區。共產國際也不再堅持城市中心論，指示把從政治局起的大批幹部派往蘇區。在國民黨瘋狂鎮壓和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特別是在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之後，原來幾位中央領導幹部已很難在上海存身而不得不撤離。既然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實際上不可能再存在，那麼為了革命的需要和保持中央工作的連續性，就只能成立臨時中央了，何況這還是遠東局的決定並得到國際的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期

77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3頁。

78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38頁。

間，受到臨時中央打擊和排擠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雖然對臨時中央極為不滿並加以嚴厲批判，但卻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關於臨時中央的合法性沒有爭議了，但還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提出一談。

一是關於臨時中央的產生和手續問題。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主持中央日常實際工作的周恩來已無法留在上海，只能隱蔽起來，停止同中央其他成員的聯繫，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中央另一主要領導人王明，則要求並獲准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二人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就只剩下工人出身的盧福坦一人了。[79]遠東局同周恩來、王明商談後決定成立「新中央」(這是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的提法。他還特別提到，當時「並未說是『臨時中央』」，只是國際批復的電報上稱為「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名單報國際批准。這說明，臨時中央是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合乎列寧關於秘密黨無法講公開性也無法實行民主的原則，因而不但是合法的，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不存在「選舉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我黨當政的根據地，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直到現在，許多重要領導幹部也沒按黨章規定選舉，而由中央甚至領袖個人任命，何況那時是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根本不允許搞正常選舉。

二是臨時中央的人選問題。據張聞天《反省筆記》，名單是由周恩來、王明提出，商遠東局後報共產國際的。確定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張聞天記得國際批復時還增加了黃平、劉少奇、王雲程，成為九人)，並以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至於說「陳紹禹提出秦邦憲進入中央負總責」，[80]則連張聞天也不知道，他只知相互間的分工。他說，「我當時還不知是王明、恩來要博古多負中央工作的責任。」但他記得國際的

7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1–212頁；《劉少奇傳》(上卷)，第164頁。

8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頁。

批復電報是在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由博古宣佈的。[81]大約從此博古就召集開會和通知工作，大家也就分頭去幹了。這足見那時中央機構和章法極不正規，但博古、張聞天等人起草的決議和文件卻可以成為中央指示(雖然未用中央名義)，並對各地發號施令。許多黨史著作，為了肯定教條宗派及其篡黨奪權，把當時的交接說成似乎是王明等幾個人的密謀，甚至採用文學虛構的手法(如一些正式史論和傳記也採用《黎明與晚霞》上的對話)，描述王明行前對博古如何具體交代。這種近乎寫小說的風氣至今猶盛，實際上大多靠不住。有些情況是當事人都在的延安整風中也沒完全弄清楚的。例如在交接時對成立臨時中央是否有「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討論」[82](王明整風時的說法則是，「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83]對此，張聞天開會時和在《反省筆記》中曾質問道，「當時上海就有正式中委，如瞿秋白、劉少奇、陳雲、盧福坦、黃平等，當時為什麼不把中央大權交給他們，而另外交給我們這批非中委?」「而且以後王明到了國際，恩來到了中央蘇區，為何根本不提此事?」[84]看來這些問題大約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弄清。

關於指定負總責的人，可否作這樣的估計和分析。周王走後盧福坦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員，本人也很想當總書記，但米夫和大家都不同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此人是在國際強調工人成分的情況下提上來的，水平有限，負不起責任來；二是鑒於向忠發(也是工人出身)的教訓，對他不大放心，而且他後來也確實很快成了叛徒。因此大家商定不設總書記，只進行分工，並得到批准。這倒是所有當事人都承認的，延安整風時已弄清了。

81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8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213頁。

83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8頁。

8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盧福坦之外，按理應當輪到劉少奇。他是留下的第二個政治局的人。但他在1930年6月就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五次代表大會，會後又留下(因當選執行局委員)工作了一年多才回國。由於他不同意共產國際的一些極左政策，無論是出席大會還是參加執行局工作期間，總是同職工國際甚至共產國際領導(如曼努伊爾斯基、庫西寧等人)發生意見分歧和爭論，以致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四中全會能把他從中央候補委員選進政治局就不錯了，很難想像能把要執行國際路線的新中央的權交給他。即使有人有此意見，遠東局和國際也絕不會批准。而且不久之後，善於投機的康生就已帶頭批起他的右傾機會主義來了，還很快形成圍攻之勢，博古、張聞天等也都點名批評。在國際代表明確說他「不能擔任領導工作」後，臨時中央常委還撤銷了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之職，於1932年初派往中央蘇區。他雖然曾被迫作過檢討，但實際上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和做法，因此就長期背上了「老右」之名，被排斥在中央領導圈外。[85]直到1935年張聞天提議和選派他出任華北局中央代表和書記，情況才發生根本變化。

至於瞿秋白，無論德才資都是堪受重任的。但他由於同共產國際有意見分歧(如上述富農問題和對中山大學兩派爭鬥的態度)，被撤掉了駐國際代表的職務。由於他的地位和威信，後來又與周恩來一起被派回國糾正立三錯誤。但國際很快又把立三錯誤提高為反馬列、反國際的路線錯誤，他們也被指責為調和主義，尤其對瞿秋白主持會議和繼任政治局委員不滿，派米夫來華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和把秋白拉下馬。周恩來因多數反對，以18：6票否決了要他退出政治局的提案，米夫、王明也認為由於實際工作離不開而讓他戴「罪」立

85 以上均參見《劉少奇傳》(上)，第159–183頁。

功。[86]但瞿秋只能跟李立三、李維漢一起退出政治局。另一方面，當時的情況也不允許像他這樣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活動，加之他的病情日重，因此只能像他在《多餘的話》中所說，「告了長假休養醫病」，等到在上海連養病也不可能了，就又「跑到瑞金」。

當然，這還不能完全回答張聞天的上述提問，為什麼要把權交給他們這些非中央委員（主要指博古和他）。至今也還沒有看到有什麼史書能對此說清楚。許多書上說是由於四中全會後，已由並非政治局常委只是取代劉少奇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明掌了實權（不少正史上還寫成「王明一派人」或「王明等」，卻又不能具體指出是哪些人），因此臨走時定要將中央權力交給屬他一派並忠於他的人，還描寫得具體生動，有鼻子有眼。但都沒有提出具體根據，看來都是按教條宗派「篡黨」「奪權」的模子套的。也沒有談及周恩來（臨時中央的名單是他親筆所寫和親自宣讀的）、劉少奇、陳雲等中央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反對呢還是只聽王明擺佈？而且這也無法說明後來為什麼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聯席會議上多數人推選博古為總書記，當時並未說這是遠東局或國際的意見，博古本人還「在形式上推了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87]可見，至今流行的一些說法，不但是人云亦云，而且還在不斷加油添醋，這就只能離史實越來越遠。實際情況大概要比這些描述複雜得多。看來可能是由於工作重點和主要幹部都已轉移到蘇區，留守中央一則是臨時的，二則重要性和任務也大為減輕（白區形勢險惡，蘇區鞭長莫及。當時明確說的也是同上海的遠東局聯絡和協調各地組織），因而帶有某種維持會性質，既找不到適當的人抓總，就找幾個被認為所謂理論水平高（這在當時是個重要條件，實際經驗則不受重視）、名氣還不太大、尚未引起敵人特別注意、叛徒又不大認識、又得到遠東局信任和年輕能幹的人了（常委中加上盧福坦大概只是做樣子，作用不大）。

86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三篇第二章第五節。

87 博古在七大的發言，《遵義會議文獻》，第108頁。

還應一提的是，不能用執政黨的條件衡量秘密黨時的人和事。那時是提着腦袋幹革命，隱姓埋名（不大計較名利地位），四處奔波，職務變化和工作調動是常事，人們也多習以為常，沒有多少等級觀念，也不講究論資排輩。所以張聞天事後還說，「我當時對這種『提補』（指被提補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毫不覺得奇怪，因為在秘密黨內，這是常有的事。」[88]鄧小平就是在24歲時做了中央隊秘書長，在六大前後半年多和李維漢、任弼時組成「三駕馬車」的留守中央領導全國工作的。即使在蘇區和抗戰後的解放區，也不一定按「台階論」、「等級制」。例如楊尚昆1932年秋後任上海臨時中央宣傳部長，1933年初到蘇區卻做了蘇區中央局宣傳部的宣傳幹事，不久又出任三軍團政委，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反在他領導下任政治部主任。連延安整風期間都是「有經有權」，不完全「循規蹈矩」的。例如一直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時卻一下成為三個書記之一，黨中央的第二把手。又如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彭真，回延安後就當了多數七大代表參加整風學習的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校長為毛澤東。參加黨校工作的彭真和林彪當時被傳為一政一軍兩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44年又替代了政治局委員陳雲連任過七年的中央組織部長（時值審查幹部、特別是七大代表資格和準備七大。陳雲是當着劉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的。[89]他則轉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這時邊區已做到「豐衣足食」，很難說是後一工作更重要）。同樣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的薄一波卻可建議開華北工作座談會（從毛澤東起幾乎所中央領導都是或多或少參加了的），並被推舉為主席，使任政治

8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89 《陳雲之路》，第75頁。

局委員的彭德懷挨了四十多天不公正的批鬥(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說法還是「鬥了我」)。這類例子還有許多，如高崗的迅速上升和陳伯達、胡喬木等得到重用等，茲不多舉。而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連在晉西北作農村調查，後來也因不受代理區黨委書記林楓的歡迎而不得不提前離開，1944年只當了個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領導十來個人編寫《參考資料》。[90] 周恩來此時也幾乎無「事」可做，說話也不大管用。如他曾致信晉西北的廖井丹證明穆欣無問題，但主持搶救的林楓不予置理。[91] 談論這些並不是要討論這些事本身的是非，只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即成立臨時中央及其人選難免有點不周，只強調幾個非中央委員是「一步登天」、移交的純宗派性質和手續不全等，不但過分，且不公正。同六七十年代「四人幫」的上台和單憑偉大領袖一聲號令就任免黨國領導人，就更不能同日而語。

總之，要全面地評價歷史上的(而不是在安全和優越條件下想像的)臨時中央，恐怕也還用得着一分為二的方法。即一方面，它執行的是共產國際通過四中全會強加給中國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接權的博古、張聞天既忠實執行又缺乏經驗，還要發號施令。其餘如陳雲、康生等人也都是順着來，跟着走。這是他們在延安整風期間正式作了檢討的。國際的錯誤(後來都稱王明路線)又遇到博古這樣的盲目而剛愎的執行者，遂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損失，主要是九一八後沒有及時適應民族革命高潮而轉變策略。但另一方面，說臨時中央「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92] 白區黨和群眾工作損失百分之百，則是不顧事實的故意誇大(毛澤東後來也稍有點更正，「過去說損失百分之百，現在看沒有

90 同劉英、鄧力群、曾彥修等人的談話。《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10頁。

91 穆欣:《劫後長憶》，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頁。

92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41頁。

到那樣的程度，還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損失了。」[93] 但沒有看到劉少奇的更正，特別是至今許多書和文章還在繼續重複以前的誇大之詞)。因為一則黨還在白區發揮着領導作用，特別是以上海為主的文化界反「圍剿」的第二條戰線和各種愛國組織的建立，從北平開始的「一二·九」運動和東北興起義勇軍等。這哪能說「精光」？恰巧證明不僅有政策，而且還有組織有人。所以，「一二九」時任北方局書記的高文華以及許多白區工作者如王世英等，在幾十年後也一直對完全否定白區工作不服。二則臨時中央時期各地黨組織的重大破壞及其造成的損失也遠沒有以前(1927–1930年)大，把白區損失的賬完全算到臨時中央的頭上是違背事實和有欠公允的。三則遭受損失也不能只說成是黨本身「斷送」的，而不提敵人的破壞。這就使人忽略了當時的那種殘酷環境，即使路線正確也會遭受損失(隱蔽的好，損失會減輕，但仍不可避免)。這裏舉個相反的例子。黨史上有一不可動搖的結論，即中央到陝北後路線早已是正確的了，但此後卻發生西路軍兩萬多人的全軍覆沒(只李先念帶了四百餘人撤到新疆)。黨史書上對造成損失七千人的皖南事變總要大書特書還不準確地批判項英為右傾機會主義，但對西路軍的失敗卻輕輕帶過(以前還推到張國燾的頭上)。這種做法，是有悖於中國史學「求真實錄」的光榮傳統的。

臨時中央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完全抹殺。說它「只有罪惡無功勞」，「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無處不被其毒」等，[94] 不只顯得用詞過火，而且也離事實太遠。至於諷刺挖苦和近乎謾罵，動輒「老爺們」，「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對於許多聰明勇敢的同志……則加以流氓式

93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67頁。

9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的武斷和威脅，……這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95]就已經不像黨內鬥爭，更談不上「與人為善」了。這大概是毛澤東極為珍愛的文章卻不能發表的原因所在。其實，臨時中央在有些地方也還是功不可沒的。首先，它的大方向正確，這是上述毛澤東也承認的。為數不多的這批人，不畏艱險，戰鬥在敵人的心臟，高舉革命和救國旗幟，主張和宣揚土地革命，號召和組織抗日反蔣鬥爭，協調全國黨和群眾組織，在白區保存了(不少城鄉還有所發展，如1932年在敵心臟上海紀念九一八的一個月裏，就吸收新黨員千餘名，新建支部94個[96])一些革命種子和組織，做了許多實際工作，始終保持着黨是全國人民希望所在、特別是抗日救亡旗手的形象。這個時期的許多進步人士和進步運動，也多和黨有關係。這些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俱在，無須多講。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臨時中央還根據四中全會後的決定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以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人民委員會主席。這時，毛澤東雖然黨內地位不高，又在剛才開過的贛南會議上挨了批和被取消了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但卻因當選中央蘇區主席而從此名揚四海，在國內外成了中國黨、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象徵。這為日後毛澤東被確立為領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主席」的稱號也從此一直保持了一輩子。

張聞天在臨時中央的地位和作用

張聞天同臨時中央的關係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這是經過一再清算，他也交代清楚了的。他是臨時中央的第二把手，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在宣傳方面犯有許多錯誤。他也一直承認

95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恩恩怨怨》，第150頁。動輒「老爺們」，參閱《毛澤東文集》第二卷〈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節錄)〉。

9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86頁。

和檢討是「左」傾錯誤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都是沒有問題的。但對他在臨時中央的工作採取一筆抹殺和全盤否定(「只有罪惡無功勞」)的說法也是完全錯誤的。他臨危受命，在一些同志根據決定撤離或隱蔽起來的情況下，仍不計個人安危，堅守崗位，積極工作(在國際批准的臨時政治局成員中就有盧福坦、李竹聲、黃平、王雲程四人先後叛變)。臨時中央高舉革命紅旗，戰鬥在敵人心臟，也有他的一份功勞。此外他還有些特殊的貢獻，尤其是在他較為熟悉的文化領域。由於張聞天的為人正如胡喬木後來所說，「敢於獨立思考，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正確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具有「不迷信、不迎合、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唯物主義精神」，所以「在實踐中碰了釘子以後，他能夠思考而逐步在某些具體政策問題上突破『左』傾的桎梏」。[97]例如，他被稱為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的奠基人；[98]他首先站出來批判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黨八股，對黨領導左翼文藝和成立文藝界統一戰線起過重要作用(胡喬木在上述回憶文章中說，發表在《鬥爭》上的「這篇論文當時實際上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這從當時馮雪峰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來)；在《鬥爭報》上著文反對河北高陽蠡縣暴動的「左」傾冒險；在會上批判中央蘇區抓「AB團」和「肅反工作成為最大的罪惡」；以及反對王明對工運估計過高等。[99]

組織路線是服從和服務於政治路線的。張聞天既然在政治上犯「左」的錯誤，組織路線上也不能不犯錯誤。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有宗派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例如他同意任弼時、項英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和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先後同意周恩來

97 〈回憶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第21頁；另參閱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17–118頁。

98 薛暮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第25頁。

99 以上均據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2–189頁。

取代毛澤東的職務和讓毛回後方專搞政府工作；公開批評劉少奇並同意撤換其在全總的領導；瞿秋白在他領導的宣傳部工作，他承認尊重和照顧不夠；對鄧中夏，他也有排斥之意，等等。[100] 所有這些，當然他都是不能辭其咎的，但卻並不能成為證明他屬有組織的教條宗派和進行有組織的宗派活動的依據。

如果說在政治路線上他和王明、博古、王稼祥都擁護和執行四中全會制定的極左路線，因此應算作一派（從派的廣義講也說得過去。但當時的政治局，包括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等都在內，沒有一個是反對國際路線的。他們不也都可算作一派了？這恐怕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中共黨內鬥爭的「宗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因擁護同一路線成為一個有組織形態的宗派，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如前所述，搞宗派必得是有組織、違反黨紀的陰謀活動。而眾所周知，張聞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作風上，一生為人都是光明磊落、奉公守法，從不結黨營私、搞見不得人的事。而他又恰巧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一直不和，更談不上拉幫結派進行宗派活動了。他回國後沒有見過米夫。他說，有一次「周恩來同志通知我，說米夫要找我談談宣傳問題，但屆時沒有來。顧順章被捕後，米夫即走了」。[101] 至於王明，他的印象一直就不好，在中山大學時就看不起。[102] 回國後因王明任江蘇省委書記，「無直接工作關係，故來往很少」。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因罷工問題（他反對王明對革命形勢估計過高）「頂了一陣」。事後又給國際遠東局代表雷利斯基寫了一封信

100 以上均據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2–189頁。

10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2 西門宗華也有此印象，見〈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風雲〉，《中共黨史資料》，第68輯。

告王明的狀。王明走時既未向他作任何交代，走後也從無聯繫。[103] 這哪裏談得上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

四中全會後，博古因任團中央書記，張聞天同他的接觸就更少。臨時中央成立後，接觸多了，但卻使他對博古增加了不滿，經常發生點矛盾。他特別怕博古批他右，所以處處設防，寫文章時要講反「左」，也得先強調一下反右。後來他「稍微感覺到，博古想把他排擠出中央」。由於叛徒告密，他的住地團中央機關被抄，只得離開中央去做實際工作。博古意欲派他去北方工作，他則要求去蘇區。經請示國際，覆電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全部遷入中央蘇區。[104] 於是，作為臨時中央「三駕馬車」[105] 的張聞天先走，博古和陳雲隨後同行，從此結束了上海臨時中央的存在。從這中間也實在看不出張、博之間的宗派活動。至於王稼祥，則早在四中全會後就已和任弼時去了蘇區，沒有同張聞天在臨時中央共過事。

10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5 葉永烈：《陳雲之路》，第30頁。



第六章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過兩大宗派嗎？



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遵義會議後這個集團分化了。」[1]「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2]「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3]但是直到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了一個宗派，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一）並進行着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當時，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4]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5]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者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者要毛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6]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歷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他回後方外，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7]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派並列在了一起，一再說「我的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31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洛甫、任弼時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8])。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借助這兩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着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在(1941年)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經驗主義的問題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9]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着『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10]他還把宗派問題分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11]這前後的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其他領導人不是這邊就是那邊，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裏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承認了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派。還不說有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12]這又是指的那個宗派？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後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單有雙方與會的佔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上海還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制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後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長征。

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鉤

張聞天到蘇區後，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後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着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後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接觸實際後，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暲和到陝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北後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說來，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 我總覺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雕，把他排擠出黨中央，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後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16]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17] 羅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18] 這裏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後，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閒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19]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雖然這裏用的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後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後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裏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裏面的人」[20])、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着「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大宗派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41頁。

說三十年代黨內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敍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規的。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範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

天後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一個名單」[21]，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了政治局。至於毛澤東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22]不少黨史著作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後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斯科任副團長後，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做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23]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周國全、郭德宏：《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27頁。

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為例）」[24]。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做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後，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25]直到1937年「十二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26]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裏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後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裏只能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成黨內危機。」[27]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28]這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也是他們聯署。[29]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後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校做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4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年》，第402、403頁。

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產生，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在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山地游擊戰」），在中央領導中完全同意的大約只有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等則主張「運動游擊戰」（或「游擊運動戰」）。現在看來，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裏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都比較了解。這裏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一、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説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上層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説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同志類似的評價。連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長後，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説，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的反右派）後，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二、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論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也可説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裏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蘇區，怕吃苦）説，「我同意聞天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後經報遠東局轉莫斯科得到批准。[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説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中説，「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着毛澤東同志的。」[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佈的片斷材料，説明張聞天到蘇區後一年多竟不了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後這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鬥爭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過頭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准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調入外交戰線後仍一直想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接陳雲來信，説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33]對此，他不但堅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領域幹下去了，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研究心得都送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後，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臨時中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40頁。

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説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路線的氣球，後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多數反對而暫時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説。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等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説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夠發洩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説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爭又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是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説他主張「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34])。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説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常，完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635頁。

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説張聞天同各領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説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三、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着中國一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經不起正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説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35]感到他真是在盡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説，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説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少奇、總理、陳雲、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裏見到總理，當即説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説，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他只是和顏悦色地説了句「那也好」，就拿着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説話，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他，寒暄後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他也是少説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常拉我作陪。[36]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是劉英還時而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是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説。給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話，多請示。不説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重大事情不要驚動他。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話是金，少說話是銀。」[37]總之，經過長期的磨練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一員訪問延安後，寫到對他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姬鵬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姬鵬飛分工管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加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貨三五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獺大衣之類送給領導人等行為，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於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呆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後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裏說了他的壞話。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後對過去工作講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38](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裏糊塗受了個警告處分。再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低調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過他過去居住和學習過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東幹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多是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報告大綱草稿。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開不到一半，他就不再參加，略事休息後即回使館。[39]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後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後也沒給任何人看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46頁。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着自己而不願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籠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和至死都在維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缺少寬容的美德」。[40]黃克誠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41])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問題，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四、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裏只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頁。

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佔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開玩笑説，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説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不止一次地講過，説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要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期間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共和國成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作，周對他們夫婦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我也算得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説過，我還遇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説，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後)人家不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説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澎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説，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説，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到她。[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説，單是共和國成立後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後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脱，如説，「毛澤東在很長時間裏(按：從文意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43]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説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説過有更多宗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説。

對反「教條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裏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論的結束。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作用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歷史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信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跡盡量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反宗派鬥爭的來由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做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們所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44] 可是事實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做法，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棍子，經過「中國化」後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加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共和國成立後就長期受極左路線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的控制，也一直存在着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46] 胡喬木就說過，「毛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鬥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來年，到90年代才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共和國成立後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後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後，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共和國成立後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 36,800億美元。[48] 經過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頁；李鋭：《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後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後、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共和國成立後「左」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具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着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後一次「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裏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信潘是內奸；搶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

49 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第176–177頁。

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體制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説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一、在個人崇拜佔統治地位和只惟上、不惟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説，「這些歷史在《決議》中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也不可能。」[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説。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着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説。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説，「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51] 而且只惟上，不惟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者和不順着自己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了，後被葉劍英帶着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説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説法是由於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説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52]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214頁。

二、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裏説的馬克思（其實讀的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説，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殺害」。[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説成是康生一手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脱。這説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黨內鬥爭的反右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三、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構成，更要正統。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回避、縮小以至抹殺。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給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第七章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20歲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82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的斯大林」。其實，共和國成立後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正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後，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蒙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恨，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着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連胡喬木也承認的。[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口如瓶，所以這裏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規格，重複着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裏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

---

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

2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1997年3月22日，見《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3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69、288、297等頁；〈回憶張聞天同志〉，《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點。」[4]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怎樣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5]毛澤東在另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6]對於中國民主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7]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價都顯得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

4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

5 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0頁。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佔統治地位，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禁區。「文革」後，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有關文獻也公佈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後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既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着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佈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律。」[8]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嚴格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致使共和國成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

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9頁。

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裏要討論的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後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嘗不可。

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在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作「全黨整風」、「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着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和一種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共和國成立後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了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後，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一章，這裏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

9 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第68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611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頁；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1993年版，第48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頁，等等。

10 〈整風問題〉，《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頁。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作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12]（引者按：這裏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着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13] 對下層一般

1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頁。

12 見該書第188頁。

1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61頁。

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醞釀過程的。

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
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時的妥協。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

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期還應以抗日為主。[14]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正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總書記張聞天居間調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15]接着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後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16]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的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

14 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78頁；《周恩來傳》，第457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頁，等。

15 《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頁；《彭德懷自述》，第222–223頁。

16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1頁。

上做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一切為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17]在「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18]第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19]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着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裏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佈的據說是經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20]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5頁。

1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70–72頁。

1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93頁。

2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21] 王明也許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覆電的情況下，王明、周恩來、

2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406頁。

2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99、401、406頁。

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重申此建議。[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的多數否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逕自送交國民黨。一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佈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指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游擊運動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安《解放》雜誌給予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週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響的成分，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定周

2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3、404頁。

24 王玉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見《中央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5 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第192頁。

26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7 《周恩來傳》(二)，第520–521頁。

恩來等在當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着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佔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證明恰巧相反。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

28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231頁。

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別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批判第三期「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線二字。[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佈。《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

29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文獻和研究》1986年彙編本，第70–71頁。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3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35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62–763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1頁。

3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3、53頁。

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改名《新民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的一生中是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5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裏有個「現」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

33 吳亮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見《懷念劉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頁。

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蘇聯(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着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34] 這是必須弄清的，談延安整風也應着重談這方面的情況。

3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3頁。

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看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36] 對於「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裏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然對一切事物都要一分為二，那麼對延安整風運動自然也必須一分為二，而且還既要看到短期的作用，又要估計到長遠的影響。例如有些方針和作法在當時主要起了正面作用，但後來卻主要產生負面影響。還有些方針和做法在當時就不妥當，只是沒有認識到，或者出於一時的偏激而矯枉過正，特別是有些問題表面上説的和實際做的或要達到的目的完全兩樣，表明黨內鬥爭中也講「權術」。

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延安整風，按理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卻沒有，看來也很難做到，其中的原因和奧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些黨史書上把整風分作幾個階段，最後有個總結階段，但在高層整風，那是指為清算第三次「左」傾和路線鬥爭作結論，並不是指對整風運動

35 毛澤東：〈反對折衷主義〉（1965年12月），轉引自《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頁。

36 參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3頁。

本身的成績和錯誤如「搶救」等作總結。而且對這樣一樁重大歷史事件，除非中央領導提倡、允許和親自抓，是沒有哪個機關和哪些人能夠和敢於進行系統研究和認真總結的。因此，長期以來，無論是黨史研究還是黨史的宣傳教育，對延安整風都只能重複已有結論，只講成績和收穫，不提缺點和錯誤，自然也難有什麼發現和創新。由於整風以來形成的傳統和嚴格的紀律約束，使得許多黨史著作、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涉及延安整風的描述，觀點多少有些千篇一律、互相照抄的味道。直到撥亂反正以後，研究才一度有所鬆動，公開了一些檔案材料，有的領導人還揭示了部分內幕和提出過某些缺點，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談到整風的「緊張」和過火的批判，薄一波在《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介紹華北工作座談會對彭德懷的錯誤批鬥和中央黨校肅反運動的殘酷[37]等。但是整個説來，除對搶救運動還可説一些有限的話以外，對整個延安整風的錯誤和缺點還是很少有人論及，全面的歷史的研究和系統的總結經驗教訓就更談不到了。特別是很少見到有人注意研究這次運動對後來歷史的消極影響。

由於始終沒有允許並組織深入研究和探討，至今有關延安整風的著述與教學，總顯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亂，在不少問題上還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現象。作為對過去一段歷史的了解和認識，弄不大清楚或者分歧很多，也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可以「宜粗不宜細」。但如果對當前工作和今後發展有重大影響，那就是需要及早研究解決的問題了。正是由於我們沒有認真總結和虛心汲取延安整風的經驗教訓，才使後來發生許多類似的失誤和弊端，有些甚至變成久治不愈的頑疾。這方面的情況，上文已略為提到，下面還要就其中影響較大的幾個問題展開加以討論。

37 《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3頁。

在看待延安整風問題上的偏向

對延安整風既然應該一分為二，那麼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就都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把當時整風的經驗教條化更是有害的。但是，直到現在，這些偏向都還依然存在。下面先舉例作點簡單說明。

一、全盤肯定論

在看延安整風上，歷來都是全盤肯定或實際上全盤肯定的意見佔主導地位。至今所看到的黨史論著，除歸罪於康生的搶救運動外，幾乎都不談整風存在的問題和缺點，更不談對以後歷史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類意見的不夠客觀不夠全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人們對整風並不作毛澤東自己提倡的一分為二的分析，把他的兩點論變成了一點論。例如談得最多的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38]但卻總是不提另一方面的事實，就是整風中主要學習的是斯大林及其思想影響下的東西，特別看重《聯共(布)黨史》。整風在號召批判教條主義的同時，卻在強化對另一些問題的教條態度，實際上是以對我有用的教條反對於我不利的教條。如過分強調階級出身和階級鬥爭；過分強調掌握政權和實行專政；把政黨和領袖的作用推向極端；只注重統一思想、集中領導和鐵的紀律，實際上取消自由討論和民主決策；抑制了活躍思想和獨創精神，還使察言觀色、言不由衷、摸意圖、講假話等歪風流行。因此許多人，包括周揚、胡繩等，把整風和「五四」、「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並列為三次啟蒙運動或思想解放運動，顯然是不確的。其次，關於延安整風的言論中還存在許多帶有誇張和不真實的提

3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第70頁。另見該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5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3頁；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48頁，等。

法，或者對一些問題只談抽象命題，不講具體事實。如許多黨史書上幾乎千篇一律說的，「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同『左』傾錯誤領導所實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相反的。」[39]其實都是重複現成詞句，卻並未提多少具體例證。至於把整風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描寫得如何和風細雨、心情舒暢，以及堅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原則，更是完全脫離實際。還有不少移花接木、歪曲事實的提法和敘述，如上述毛澤東等三人找王明商談答覆季米特洛夫電報事，被說成「為了幫助王明」。由於所說與實際不符，一個人往往也前後自相矛盾。例如在中辦機關參加整風運動領導的曹瑛，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先說，「這次整風運動很民主，沒有抓辮子、打棍子的現象，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對待犯有錯誤的同志，堅持了和風細雨、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針。」後面講到具體情況時卻說，「在某些單位出現了對錯誤思想的鬥爭大會。中央黨校也召開了鬥爭大會。」提到搶救運動，更是：「當時氣氛很緊張，搞得特務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亂捕亂殺的現象也產生了。」[40]胡喬木更是經常自相矛盾。在稱讚整風方針及其在《歷史決議》中的體現時，就說要「多引用一些歷史文獻，證明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41]談到「那個決議也有缺點」時，又說「毛主席對決議沒有做很多的修改」。[42]還應指出的是，對延安整風運動，許多黨史著作不但充滿溢美之詞，而且有的還對它的作用作了過分誇大，如說延安整風「保證黨在短短幾年內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43]「沒有延安整風，……就沒有

39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1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4–615頁。

40 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中共黨史資料》，1996年6月，第58輯。

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2頁。

4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5–86頁。

43 《延安整風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第57頁。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44]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特別是抗日戰爭，離開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單靠經過整風的我們，漫說「短短幾年」，恐怕再多幾倍的時間也是勝利不了的。毛澤東就承認，假如沒有一切有利的國際條件的綜合，「我們能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45]總之，全面肯定，把延安整風看得神聖至極，把整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當成金科玉律的教條，實際上虛構的成分多。因此，對延安整風的收穫與成就，早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做出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判斷了。

二、持攻擊態度

對延安整風看法上的另一極端是全盤否定和進行攻擊。在這些意見中，不僅有程度的不同，而且還有本質的差別，其中有的就是基於個人原因或完全站在敵對立場上對整風進行攻擊。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的有關敘述。他不但把整風說成完全是毛澤東為了整人，特別是整他，還編造了一系列謠言。例如說，毛澤東1941年9月曾向他說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在建立毛澤東主義時，我保留馬克思主義，我拋棄的只是列寧主義」。[46]凡是參加過延安整風或稍有黨史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絕不可能真實。毛澤東不但不會跟王明談「建立毛澤東主義」、「拋棄列寧主義」的問題，而且與王明的說法相反，整風中毛澤東倒是很少引證馬克思，更多強調列寧關於集中、紀律、政黨、領袖等的論述。王明還捏造中央領導通過金茂岳醫

44 馬文瑞：〈發揚延安整風精神切實加強黨的建設〉，《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3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4頁。

46 王明：《中共50年》，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頁。

生對他進行毒害，更是荒誕不經。[47]但是由於王明的歷史身份和《中共50年》內容的真真假假，所以還是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在海外的中共黨史研究界。另外，在中蘇公開論戰年代蘇聯有關方面編輯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孫平）著《延安日記》，基本上也屬這一類。而且由於署名作者的身份（蘇聯和共產國際常駐延安的聯絡員）和整理時可以動用蘇方的大量檔案，所以就更容易使人們相信其真實性。其他類似的「研究著作」也還不少。不過完全否定特別是攻擊延安整風的材料，多為海外出版。由於對輿論和出版的管理，還沒見到大陸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只是一些文章中從不同側面流露否定的意思和情緒的事例倒是時有所見。

三、其他傾向

還有一些研究延安整風的著作，敘述有根有據，顯得比較客觀，但傾向有點過分渲染個人間的爭權奪利和恩怨相報。例如前面提到過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就多少表現有這種偏向。書中引用了大量材料、作了仔細分析，也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看法，但多少有點紙上談兵，在許多問題的分析和判斷上不夠客觀，而出於不真實的主觀想像。這裏只舉一個例子。書中說，張聞天之所以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提法，是因為這與

47 宋以敏注：何方後來先後讀到王明夫人孟慶樹編著《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和郭德宏（中央黨校教授）編《王明1904–1974年譜》兩書後，才知道他所寫的這句話是站不住的。郭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3月，494、509、514、519、520、531、533、535、536、552、573、592、609、640、655、699頁）引用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編按：Pyotr Parfenovich Vladimirov，中文名孫平，塔斯社記者，1942–1945年被派駐延安作為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著《延安日記》和孟書談到王明在延安治病時汞中毒、曾成立「王明中毒事件的調查委員會」等情況。孟書有《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自1941年9月到1943年6月）》的影印件。是孟慶樹的堂侄蕭青（曾任外交部信使隊隊長，晚年和何方有深交），先後把孟書（2011年在莫斯科印了一千冊）和郭書贈送給何方的。

他的政治前途有關，因為這一提法直接打擊他和一大批領導幹部的政治威望，嚴重動搖他在黨內的地位。[48]這就不但把問題過分簡單化，而且也完全看偏了。

張聞天堅持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一則，這是共產國際的多次結論，而張聞天當時對國際還是極為尊重和崇拜的。二則由於歷來把路線錯誤看得十分嚴重，幾乎等同於反革命，因此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雖有許多錯誤，但總的方面還是正確的，中央和廣大幹部在艱苦的條件下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説路線錯誤豈不是將這一切都一筆勾銷。出生入死工作了幾年還落得個犯路線錯誤的下場，思想上很難轉過來。所以當時黨內幹部普遍不能接受路線錯誤之説。即以該書作者在後面詳述的白區工作會議為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時，支持劉少奇認為白區工作路線錯誤的也只有一個華北代表團團長彭真。而參加工作會議的絕大多數代表都是反對的，特別是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單是華北代表團就有高文華(原北方局書記，生前一直堅持不同意見)、柯慶施、王世英、黎玉、李雪峰、烏蘭夫等。張聞天的觀點(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報告)反而得到全體擁護。可見，這顯然不是出於個人權力和地位的考慮。

該書所提張聞天同劉少奇的關係，推論張説的造謠他「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的XXX同志指劉少奇，[49]就純屬臆測。張在《反省筆記》中幾次提到，明白無誤地寫着王稼祥。事實上，張對劉並無個人恩怨，瓦窯堡會議後，正是張提出和決定派劉出任北方局書記，使他受到重用。劉當時也是很感激的。[50]至於對毛澤東，張聞天在整風中更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擁戴和崇敬，絲毫談不上個人恩怨。

48 見該書第92頁。

49 見該書第87、116頁。

50 張聞天夫人劉英1999年以來同本人多次談話(多有錄音)，如該年6月10日的談話等。

就是毛澤東，也不能説他完全是搞「權謀政治」，一切都是為了抓權。須知，在那個時候，從黨的領導人到一般黨員，參加革命都是基於一定的信仰，決心不惜犧牲為理想而奮鬥。投機分子和為個人爭權謀私利的是極少數。這就是為什麼延安整風中傷害了那麼多人，許多被打成特務的人還沒有完全平反(沒有做出結論或因結論不合適本人拒絕簽字)就奔赴前線和分配各地工作而不講價錢，更沒有叛變投敵的。因此不能把延安整風完全看成上層一些人的爭權奪利，加以庸俗化。

2000年12月，王若水寫了一篇〈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這是一篇討論延安整風頗具新意的文章，得到一些人的稱許。但我覺得他所設的前提就值得考慮，有些事實和敍述也不夠確切。文中首先提到，「整風運動在起初，可以説是一種啟蒙運動，因為它所反對的是以王明等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這是一種頗為普遍的議論，但卻不合乎實際。因為不但「以王明為代表」的提法不準確，而且更重要的是，整風並不是要反對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而是以蘇共為模式實現中共的完全布爾什維克化。連胡喬木都説，「延安反教條主義對斯大林的一套體系沒有批判……」[51]這些都將有另文説明。

這裏要説的是，整風一開始，目的就是要「整掉兩個宗派」(囊括了以前的多數領導人)，確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斯大林」[52]毛澤東領導的絕對權威，恐怕談不上解放思想和什麼啟蒙，因而也就不存在誰壓倒誰的問題。而且用西方的啟蒙運動往這時期的中國身上套也不一定合適。依王若水所説，「啟蒙運動是要把一切現成的事物帶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審查。」那麼這時的最高的理性法庭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批判和審查的最高標準就是抗日救亡。實際上在抗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7頁。

5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

戰前後的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就掀起了一個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五四」的啟蒙運動，左翼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傳佈起了巨大作用。許多知識青年就是由於讀了一些魯迅等人的文章和《大眾哲學》之類的書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年，進步書刊廣泛流行，知識青年爭相閱讀，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以及憎恨舊社會、嚮往新社會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現在回想起來仍令人感奮不已。正像最近有人著文所說，「在民族危亡之際，民族主義比任何其他的意識形態都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會動員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種社會資源。」[53] 當時的中國正是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救亡圖存無論是在知識界還是其他階層都高於一切，民族主義成為啟蒙的最重要內容，導致了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所以不是什麼「救亡壓倒啟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兩大運動已合二為一，甚至可以說救亡就是啟蒙。任何先進人物都只能把抗日救亡放在首位，不會置抗戰事業於不顧而關門鑽研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等等。這次規模宏大的以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為主要內容的啟蒙運動，對中國社會和中共的發展起了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黨史研究不能只重視紅軍長征，而不重視這一過去被稱為救亡運動的啟蒙運動。實際上，正是那次啟蒙運動，促成了在中國歷史上起轉折作用的西安事變。而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紅軍的生存都將遇到極大困難，更談不上國共合作抗日。也正是那次啟蒙運動，把中國大批知識分子、工農以至民族資產階級許多人推到主張抗戰和代表進步的共產黨一邊。

王若水說的，「中共中央抓住這個機會（「國民黨暫時停止對共產黨員的迫害」），在1939年12月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53 仲崇東：〈全球化與三大意識形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第5期。他認為，「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又是三種不同的政治運動，還是建立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的不同政治制度。」其中「民族主義是一定歷史階段中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運動」。

「這樣，大批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其中很多人從國民黨統治區湧入延安。」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國民黨不但從未停止對共產黨員的迫害，而且1938年下半年就已加強了所謂「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和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我們一行人就是這時在從西安去延安的途中被國民黨扣押囚禁的。1939年冬國民黨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這時做出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已經很難起到多大作用。事實上此後已很少有知識青年能通過封鎖線去延安（而且不說進步知青，中國整個知青也有限。這是搶救運動後期任弼時按周恩來提供的材料推算過的，這一事實並成為停止搶救運動的一個根據），致使我們抗大只能主要從延安和敵後調幹部培訓（我當時已留校任助教，對此有親身體會）。還應指出的是，這次啟蒙運動把大批進步知識分子推向共產黨，他們主要不是來張揚個性解放、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批判的精神、獨立的人格，而主要是胸懷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獻身精神，甘心接受民主集中制和嚴明紀律、集體主義和艱苦奮鬥等的教育和鍛煉。這是革命的需要、時代的要求，也是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基於自覺自願參與的，所以帶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並不是某個人能用整風把一場啟蒙運動給「壓倒」。至於發動整風的目的和做法有根本性的缺陷，中間又走了很大的彎路，特別是留下了許多影響極為深遠的後遺症，那也是由於當時的諸多因素，如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傳統、世界共運形勢和黨實際上奉行的指導思想、建黨原則、當時和後來的領導集體尤其是領袖的個人素質等，而不能說成是由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被整風給「壓倒」了。相反，正是那場啟蒙運動，終於掀起全民抗日並取得最後勝利，洗雪了中國人民的百年屈辱。

延安整風的主要收穫與成就

延安整風一直被說成不僅是中共黨史上的創舉，也是國際共運有史以來的創舉，對黨的建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具有重大

意義。這些說法雖然帶有一定誇張，但基本上是正確的。確實，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以及整個中國，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方面影響的重大、深刻和久遠，是近現代史上至今的任何一次思想政治運動都無與倫比的。而且這種影響今後還會持續若干年。所以對延安整風的作用、意義和影響應該有充分的估計，就中自然也包括它的收穫。不過應特別指出的是，對收穫不僅同樣適用一分為二，而且還必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這就是說，第一，許多收穫一開始就有它的負作用。例如整風統一了全黨思想，但同時也限制了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第二，原來主要起正面作用的收穫，後來負面作用逐漸佔了上風。如「一元化」領導不但成為一黨專政，而且變為黨的第一把手專政。因此，在談延安整風的收穫時，必須注意到這兩方面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的「兩點論」。由於對延安整風所造成的損失和負面影響後面還將分別進行討論，所以這裏先談收穫的一面。但是延安整風留下的傳統，本來就是只講成績不講缺點，而且多是互相重複，所以為了不再過多重複，下面只簡要談幾點個人體會。

一、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

正是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才被歸納為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和正式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實際上成為當時擁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影響範圍還得到不斷擴大。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一件大事。因為自從外國列強的侵略使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後，中國就面臨實現國家獨立和統一的神聖任務。中國人民也為此奮鬥了近百年，都因為缺少一個既適應時代潮流又符合中國實際的指導思想和在這一思想引導下的革命運動，因而統統失敗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長期奮鬥和集體努力，才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之交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加上遇到極為有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全國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雖然新民主主義秩序尚未得到全面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文化更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但終究民族獨立了，國家統一了，也為有可能實行現代民主和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因此應該說，毛澤東思想勝利地完成了它偉大的歷史使命。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我曾根據劉少奇在延安整風後黨的七大上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中的權威論述和歷史的檢驗，對毛澤東思想作過如下的表述：「毛澤東思想就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化的列寧主義，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54]這包含了以下幾層意思。第一，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背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的戰爭與革命時代，五十年代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後就基本過時了。第二，它是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即在強烈濃厚的中國傳統上吸收融合的列寧斯大林理論，而不是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吸收、繼承的。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5]第三，它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不一定適用於整個新民主主義建設，更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第四，說它特別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意在強調中國傳統與中國特色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和份量，但也包含斯大林解釋的列寧主義一些原理的指導作用，因而有別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並決定了這一理論和政策能夠取得最後勝利。

延安整風正處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時期。適應這一形勢的毛澤東思想得到全黨的認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是很自然的。因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和方法的正確和行之有效。高級領導層對

54 何方：〈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見《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2期，後收錄《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5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677頁。

毛澤東思想的擁護是真誠的，多數人以此為準繩的檢討主要出於自覺自願。這也是使黨的七大成為「檢討的大會」(「多數同志發言是作自我批評」[56])的原因，不能說完全出於毛澤東的「精心安排」。[57]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高級幹部，因為毛澤東說，「『犯思想病最嚴重的』，是高級幹部中的人」。[58]只要高級幹部認同和信服毛澤東思想，全黨的思想也就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之下了。即如我們這些去延安的知識青年，那時就是為了要抗日(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要民主(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腐敗)，實質上也是要實行新民主主義，並進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因而信仰毛澤東思想如同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完全出於至誠，即使遭遇挫折或受到委屈，對毛澤東思想仍然堅信不疑。所以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次整風運動的直接結果，是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黨的思想。」[59]

二、牢固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

無論是當時黨的有關決議還是領導人的講話，都把這點視為整風的最大成果。例如劉少奇在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談到當時(整風後)的黨「同它在歷史上任何時期比較」時，提到的最後一點說，「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60]張聞天在改寫黨的《歷史決議》時也加上了一段話，說「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這領導，無疑的，將保證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完全勝利。」[61]確實，當時的普遍的看法是，中國黨找到了自己的偉大領袖，這是為中國革命解決的一個最大問題，從此就必將從勝利走向勝利。

毛澤東規定的整風的兩大目標，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黨八股只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實際上從深層次看，反對主觀主義就是為了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對宗派主義則是為了確立毛澤東為全黨和全軍的領袖。因此正是在整風中，1943年3月進行了中央機構的調整。對此，有的黨史著作評論就直截了當地說，「它最終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是整風運動的最大成果」。「黨的組織調整的軌跡是毛澤東、黨中央鋪設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整風從解決思想方法入手，達到組織上出現這樣的結局，恐怕是事先難以預料的。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出現這樣的結局卻是經過多年準備、意料之中的事。」[62]

這個問題的明確解決，就使整個黨政軍民的最高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人之手，而且各級也都實行了嚴格的一元化領導，保證了上面意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此後不但不會再出現像未得到答覆就自行發動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以及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就某些問題自行做主那樣的事；而且原先各地的山頭主義和分散主義也得到根本削弱。這是連外國人也承認的。例如費正清就說，「國民黨吃了很厲害的宗派主義的虧。共產黨的組織小些，他們能排除宗派主義而取得成功。」「毛應用他的理論框架，在延安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為後來的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樹立了範例。這是毛已當政後，不僅為了鞏

5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6頁。

57 如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79頁。

5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88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88頁。

60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19頁。

61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本)，第566頁。

62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頁。

固他的地位並且為了統一全黨和整頓紀律所做的努力。」[63]抗戰勝利後，解放區已壯大到必須全國一盤棋(抗戰期間各根據地還多是各自為戰，中央軍委一般不直接進行軍事指揮)，無論政治、軍事，都更需要高度集中、統一指揮、令行禁止。毛澤東的最高領導和絕對權威也顯得更加重要。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以其中國曠古少有的軍事天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放了除台灣外的全中國。凡是參加過解放戰爭時期工作的人都會體會到，當時確實做到了全黨一心、全軍一心、全民一心。無論是在哪個解放區，只要聽到延安(陝北)電台的評論和號召，都會堅信不疑和堅決執行，更不用說內部發出的指示電報和文件了。如果沒有延安整風確立起來的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統一指揮，解放戰爭也可能還要多花一些時間，不會那樣乾脆利索。但一些人說的中國人民將因此要長期在黑暗中摸索，則是受個人崇拜影響的過分誇大。還應該看到，進入近代以後，中國不但對外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內部的地方勢力也日益成為嚴重問題。不但清朝，就是辛亥革命後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能做到實質性的統一全國。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才完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任務，實現了對外的民族獨立和對內的政治統一。而毛澤東正是這個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

三、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

這裏所指，包括「三大作風」，特別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等。這些都對建設革命隊伍和取得革命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這次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的重大區別。有關三大作風，應該承認從整風起就執行得並不令人滿意。例如說得最多的理論聯繫實際、言行一致，就做得比較差。而且越到後來，說的和做的，宣傳的和實際的，距離更越拉越大。批評與自我批評存在的問題也不小，似乎批評者和被批評者有着一定的「分工」：一些人只批評別人，自己既不接受批評也不作自我批評(不算一般的應付如「我也有缺點，有責任」之類)；一些人則是在不斷地接受批評和作自我批評。至於對整個黨和黨的中樞領導，除對遵義會議前的歷史，此後就都只強調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也缺乏鄭重的自我批評。談到群眾路線，即使照正式的說法，後來長期犯錯誤，也是由於脱離實際、脱離群眾的結果。雖然三大作風在整風中就在理論上不夠徹底，後來在實踐中執行得還越來越差，但是整個說來，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還是在中國歷史上創下了空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當然，這都是從紅軍時代起就逐漸積累起來的，通過延安整風，得到進一步系統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所提高，並為全黨和全軍所接受。在戰爭時期和解放初期，共產黨的政權和解放軍(包括以前的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為政清廉、紀律嚴明、宣揚正氣、軍民一家等，都是中國老百姓過去從未見到過的，同黑暗腐敗的國民黨統治形成鮮明對比，因而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普遍擁護，成為國民黨走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民歷來受壓迫受欺侮，一旦見到不但不擾民，而且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和軍隊，自然會心悦誠服。所以在新解放區，群眾很快就發動起來了。例如日本投降後我們初到東北，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群眾不了解共產黨，抱着正統觀念，歡迎中央軍去接收。但是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工作和群眾自身的體會，情況就完全變了過來。又如解放軍開進一些城市，寧可露宿街頭也不擾民，群眾見到或聽到後的感想至今都是美談。那時幹部作風一般都做到了艱苦樸素、克己奉公，下鄉下廠普遍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多吃多佔和違法亂紀的很少，貪污行賄幾乎沒聽到過。不但在解放區，連國民黨統治區群眾，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中小工商業者以至民族資產階級，也都對國民黨完全絕望，熱烈歡迎共產黨和解放軍。柳亞子的詩句：「佇看荼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確實反映了國統區各地人民希望早日得到解放的情緒。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成了瓜熟

63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303頁。

蒂落的事。很明顯，對於保證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延安整風總結出的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並使廣大幹部能夠自覺遵守和履行，確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一定成效

正如胡喬木所說，那次整風的「主要鋒芒是對着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64]「對着教條主義」，也就是「整風主要對象是高中級幹部」(雖然他們大多被劃歸經驗主義，但按整風中的說法，經驗主義是教條主義的俘虜)。至於「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更是廣大的一群，已經是或即將成為黨政軍各方面的骨幹。鋒芒對着他們，就是要改造他們的思想。用當時和後來黨史上的正式說法，知識分子的思想屬小資產階級，因此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加以改造，也就是把他們改造成革命事業的「螺絲釘」和黨的「馴服工具」。不過應當稍作說明的是，第一，談到知識分子不光指「新參加革命的」，實際上從來都是連早就參加革命的一起算，被胡喬木稱為「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資產階級弱點的作家」丁玲，[65]就是一位老革命；第二，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已將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範疇，一律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裏只是依照老的傳統說法。由於整風以來的歷次思想改造對知識分子傷害太大，「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人們不再多提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已經變成了貶義詞。但以前並非如此，參加革命後，人們還是自覺自願接受改造的，希望用無產階級思想感情代替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因而對毛澤東貶低知識和挖苦知識分子的話(如說讀書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等)，也聽得進去，並無反感。

64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頁。

6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64頁。

其實，毛澤東所講知識分子的缺點，總的來說，都確實存在，如驕傲自大，個人英雄主義，對工農兵有所輕視，不大了解中國實際特別是農村情況，極端民主化傾向，組織性紀律性較差，表現軟弱和容易動搖等。陳雲在抗大講《黨的建設》時說過一句一時廣為流傳的話，大意是：工農群眾一般小處小氣(指處理生活和待人接物特別節儉)，大處大方(指捨生忘死)；知識分子多是大處小氣，小處大方。這也有一定道理，後來我在打游擊和對敵鬥爭中就深有體會。無論是整風中還是整風後，知識分子對這些不但真心承認，而且實際上也在切實改正。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機關幹部和學校學員，普遍做到了「聽黨的話」，「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服從分配，不講價錢」。由於時間緊迫和人員眾多，許多單位分配工作，就是集合起來宣佈名單，哪些人去東北，哪些人去華北，如何編隊，何時出發，既不徵求意見，也不進行個別談話，散會後即分頭做準備工作，沒見到還有什麼人提不同意見。1940年一位在抗大和我一起做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其他幾個人被分配去平津做地下工作，他們表示希望繼續留延安學習。時任中組部長的陳雲找他們談話，說：「共產黨員在艱苦工作的面前，說一句話都是多餘的，提意見就是錯誤。」於是撤消了對他們的分配，並給予了很重的黨內處分。應該說，經過整風，在這次大分配中就再沒有聽到這類事了。即使在整風搶救中受到很大委屈的許多人，也能以「馴服工具」和「螺絲釘」要求自己，表示要接受考驗。

思想改造的成效更加明顯地表現在知識分子同工農結合上，文藝界的變化就特別引人注意。1942年下半年先後展開的肅反(搶救)運動，使大批知識分子蒙冤受屈，搞得氣氛極為緊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還是決心走同工農結合的道路，掀起下鄉運動，爭取和利用一切機會接觸群眾，如幫助農民勞動，當掃盲教員、做鄉村文書等。毛澤東還竟然提出，「要搞七千知識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

個延大、整個行政學院解散下鄉」。[66]這雖然在實際上沒執行(像「文化大革命」中停辦大學一樣，真要執行也辦得到)，但也足見決心之大和當時的精神、風氣。文藝界顯得尤為突出，各種文藝形式都在搞大眾化、表現工農兵，而且很快做出了成績，產生了許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1943年春節前後，《兄妹開荒》(著名表演藝術家王大化是戴着「特務」帽子參加演出的)、《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等秧歌劇曾引起很大轟動。許多老百姓跟着魯藝的演出隊從這村到那村地跟着跑，機關學校的幹部學員也是多看不厭。延安整風和其間的文藝座談會，影響到全國和長遠，把中國的文學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丁玲在四十年後還回憶說，「文藝座談會以後，整風學習以後，延安和敵後各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都紛紛深入工農兵，面向群眾鬥爭的海洋，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文藝面貌煥然一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展開了新的一頁。」她說的「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一代知識分子，培養了一代作家的成長，而且影響到海外，未來，」[67]也並非誇大之詞。對《講話》本身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誰也不能否認它所發揮的廣泛深遠影響和劃時代作用。郭沫若當時看了《講話》後提出「凡事有經有權」，即文藝既有基本規律和普遍原則，也有適應當前需要的權宜之計。胡喬木認為，這也適用於《講話》本身。即以基本觀點而論，毛澤東去世後胡喬木就批評「文學服從於政治這種話是不通的」。[68]但有些概括又確實是普遍規律，如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大段引證的文藝來源於生活以及源和流、繼承與創造的關係，他就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69]。可見，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需要「一分為二」。

6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0頁。

67 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作於1982年3月)，《丁玲文集》第五卷，第283頁。

6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8、60頁。

69 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頁。

延安整風的收穫和成就當然不只這麼四條。只是前面已說過，六十年來，有關這方面已經講得很多，這只要看各種正式的和雖非正式但能夠通過審查得以出版的黨史著作、無數的傳記和回憶錄等就可知道。因此這裏就不再錦上添花了。同時要說明，寫出這一段，也只是要表示對整風應該一分為二；雖無意對收穫和成就作全面概括，但卻有意反駁那些完全否定整風和把整風只看作幾個人爭權奪利的言論。

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及影響

既然對延安整風要一分為二，因此在談過成績和收穫之後，自然就輪到談它的缺點和錯誤了。而且我以為，現在需要着重探討的，不僅是延安整風的缺點和錯誤，更重要的是一些對日後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問題。根據個人的體會和學習，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很好反思。但是由於每個問題都將分篇展開討論，所以這裏只列出題目，點到為止。

在我看來，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和長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這些問題上。

一、延安整風開創了用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見，並進而造成對一切知識的輕視。在普遍整風中，知識分子作為改造的主要對象，受到無情批判和衝擊，使他們減弱以至喪失了敢想敢說、獨立思考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基本上被改造成領導的馴服工具。整風造成的不信任知識分子和輕視知識的傳統與機制，長期影響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

二、延安整風貶低了理論學習的重要，妨礙了理論上的發展創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後來影響到全國)的理論水平得不到提高。胡喬木就說，「從整風以後，實際上很少有什麼創新的研究，要

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說過的，沒有說過的，沒有人敢研究。……實際上以後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70]無論從當時情況還是事後影響看，延安整風都不能稱為「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而是貶低理論學習以至理性思維；也沒有反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像後來人們說的，而是照搬蘇共和斯大林一套。曾經在民主革命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毛澤東思想，定為一尊後就逐漸走向停滯和僵化，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

三、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是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犯「左」傾路線錯誤的一次重要演練，還為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創造了範式。這就是在對形勢(敵情)的過左估計下任意發動一場大規模運動，從動員群眾、挑選和培養積極分子、引蛇出洞，全面反擊、大轟大嗡，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然後倉促收尾、甄別定案。事實證明，搶救運動傷害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和幹部，給黨造成重大損失，延安氣氛也從生動活潑變為萬馬齊喑。但卻堅持不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遂使類似錯誤不斷重演。看來這不是偶然的，可能還有其他緣故，是否有如《禮記》上所說「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害怕的就服了。錢鍾書說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的考慮，就值得研究。

四、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後來又不斷得到加強。當時的主要表現可舉出以下幾點：(一)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着不突出個人的傳統，此後即開始打破，有計劃地掀起學習毛澤東的運動。除王明的《學習毛澤東》經毛閱後見報外，毛的秘書張如心、和培元、陳伯達等已陸續有文章發表。還有選擇地編纂《六大以來》，以樹毛的一貫正確。(二)以活人正式命名「主義」或「思想」，在國際共運史上可謂只此一家。(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封

70 《胡喬木談中央黨史》，第131頁。

建迷信稱呼和比喻流行全黨全國，如山呼萬歲、人民大救星、紅太陽等。(四)黨內的正確與錯誤以人劃線；制定出違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71]開始了個人的獨斷專行和領袖的終身制。(五)對領袖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甚至反革命，使七大成了「歌頌的大會，檢討的大會」。僅以上幾點已足證明，延安整風開始並實現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黨史學界對個人崇拜盡量淡化特別是盡量後推(如否認共和國成立前有個人崇拜現象)，本身就是個人崇拜流毒繼續存在的表現。

五、延安整風確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黨專政和書記獨裁(個人說了算)法制化。從「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演變為黨領導一切。胡喬木說，「簡單地說黨領導一切這個話，是非常不妥當的。這個話在外延上就沒有劃清楚。」[72]其實是清楚的，那就是：凡是人世間事，黨都要管。事實上，中國的事沒有黨不管的。一黨專政和一元化體制使黨和國家不可能有民主，使憲法和黨章不過是一紙空文，選舉制和代表會制只能流於形式。實際推行的倒是終身制和變相終身制、委任制和變相委任制以及交接班制。權力的集中和壟斷、缺乏透明和監督，既談不上人民當家做主，還必然導致官僚主義和腐敗成為頑疾。

六、整風創立了壟斷與管理意識形態的體制及其表現形式延安文風。前者如限制言論與出版自由，嚴格的審核檢查和「輿論一律」，新聞管理和限制人民的知情權等。後者其實就是一種新八股，如預設前提，不留商量餘地，只下結論，不講根據，以及空話套話等。

71 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時，毛澤東被選為三人書記處主席。這是關於書記處工作章程的規定。

7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09頁。

七、既然談黨史，下面還將專門談一下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榜樣作出的《歷史決議》，和以此為基礎創建的中共黨史編纂學。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黨史》，貫穿着突出個人，以人劃線，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等個人崇拜精神。由毛澤東增刪修改七次的《歷史決議》，[73] 為黨史學以至整個現代史設定了框架和體系。黨史的研究和寫作，雖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動，而且「只此一家」，不許爭鳴，遍設禁區，不得逾越，使黨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為一門不講科學的學科。

八、整風造成工作和時間的重大損失。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內外形勢對中國革命極為有利。這時蘇美英忙於打仗，對我均有所求。日本雖為鞏固佔領區不時發動掃蕩，但主要對付的已是美國。原估計的「片面抗戰必敗」和「蔣必降」證明不確，國民黨全面反共打內戰也無可能，且日益失去民心。正是此時我們卻集中力量搞整風，全黨主要領導幹部調回延安算歷史賬，不但沒能更好抓住發展機遇，還耽誤了正常工作和學習。其實，整風前全黨以毛澤東為首的團結統一已得到不斷加強；説新黨員多必須整風也屬奇談。花三四年時間搞整風，理由並不充分。蔣南翔也説，單是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就「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74]

7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2，312頁，文獻全稱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74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以上列舉，只是個人認為特別值得討論的幾個問題。而且如同上面談整風收穫時所説，這些缺點錯誤和負面影響同樣應該一分為二，特別要重視其轉化，因此必須及時總結經驗汲取教訓。而這正是延安整風所沒有做到的，需要後人補課，而不是只在原有的框架內打轉轉，繼續重複前人的敍述和結論。

下面就分別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八章

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



知識分子成為普遍整風主要對象的原因

前面的章節中談過，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上層整風的對象即毛澤東說的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1]實際上主要還是中央一級對「左」傾路線的清算。普遍整風的主要鋒芒，就是胡喬木說的針對着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2]（如前所述，實際上早參加革命的也不例外）。但什麼是知識分子，都包括哪些人，卻一直是個不大明確的概念。延安整風時對知識分子含義和範圍的理解顯然寬泛得多，既不是限於列寧、考茨基論述的那種同無產階級存在一定對抗的靠個人奮鬥立足於社會的「知識分子階級」，[3]也大大超出廣義定義的知識分子範圍（即有知識有文化和有某種技術專長的人）。那時投奔延安等地參加革命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除少數作家、學者和一小部分大學生外，絕大多數是高初中學生，甚至還包括一些小學生。因此，就其主體而言，也許稱為知識青年（如同「文革」中下放的「知青」）更合適些。正是那時的這些大小知識分子（由於絕大多數是1938年參加革命，所以通稱「三八式」幹部，其實也包括1938年之前和以後參加的，例如毛澤東就常把「一二・九」運動的幾位學生領袖也稱作「三八式」），先後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頭三二十年，各條戰線上的中下層主要骨幹。

那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成為普遍整風的主要對象而總是挨整呢？

現在要討論的是，不僅延安整風，就是歷次的政治思想運動，知識分子都首當其衝。而且在平時工作中，對知識分子也總有點不夠

1　1942年7月4日致聶榮臻電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頁。

2　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3　見《整風文獻》中〈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摘引自《列寧全集》第七卷《進一步，退兩步》第十三章。

重視和信任，「文化大革命」中更被稱為「臭老九」。所以對延安整風中「主要鋒芒針對知識分子」的問題有必要多說幾句。現在想來，對知識分子的這種認識和態度，原因是否可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點。

國際共運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

這大概是基於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般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範疇的緣故。上面提到的考茨基的論述就是證明（考茨基後期的看法有很大變化）。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也說，「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性和組織性；……意志萎靡、動搖不定……。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條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體裏工作等等）有密切聯繫的。」[4]事實上，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對知識分子就很不重視甚至加以排擠和打擊，因而造成流亡國外的高潮，其間約有200萬到250萬知識分子和富有階層的人自願或被迫離開蘇俄。[5]這曾是高爾基和列寧發生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列寧臨終前的口授「遺囑」中還特別提到要擴大中央委員會特別是增加工人的名額。共產國際對各國黨也是一再強調在發展黨員和提拔幹部上要特別重視工人。對中國黨不但經常提醒，還直接干預。例如黨的六大，就是在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和米夫的坐鎮指揮下，選舉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政治局和常委的主席（四中全會改為總書記），五個常委中有三個是工人出身（即向忠發、項英、蘇兆徵，另兩位為周恩來、蔡和森）。中國黨不但接受共產國際這一「左」的理論，還有

4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第256頁。

5　（蘇）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中譯本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頁。

所發展，而且越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人越強調「出身論」。這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得最明顯。他有一句名言，「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6]他對知識分子也確實從輕視發展到了「敵視」(胡喬木語)。包括中國黨在內的國際共運對知識分子的這種看法和態度，似乎有點近於悖論。因為在理論上，不但列寧講過，歷史也證明，科學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運動中自發產生，只能由有淵博知識的知識分子創立，並且還只能經由知識分子傳播才能和工人運動結合。這就是有名的「灌輸論」。在實際上，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到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締造者和歷代領導人，絕大多數也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中國更不例外。對這一現象歷來的解釋是，這些知識分子都是背叛了原來所屬的階級而自覺地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只是有的人轉變徹底，因而立場堅定；有的人轉變不徹底甚至發生倒退，因而犯嚴重錯誤直到「叛變」，如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編按：Georgi Plekhanov，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陳獨秀等。這種把政治思想問題直接和人的出身聯繫起來，如同劉少奇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論黨內鬥爭》中說的「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7]一樣，排除了經歷變化和思想認識上的原因，顯然都是過分的簡單化和片面化。不過這裏不擬多談理論問題，只是順便提出來，希望引起討論。

中國黨背負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傳統

在封建時代，作為「士」的知識分子，雖為「士農工商」之首，社會地位在勞動人民之上，但卻依附於統治階級，缺乏獨立身份，而下層讀書人如落第秀才、教書先生，更被人看不起，成了所謂「九儒十

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頁。

7 《劉少奇選集》，第179頁。

丐」。統治者也常對知識分子視之為隱患，用之如玩物。「屈賈誼於長沙」，「竄梁鴻於海曲」，還算不錯的，更有「焚書坑儒」、與「文字獄」、「株連九族」等。而知識分子也是為了「學而優則仕」，即使爬上去，仍然自視為統治者的附庸，什麼「文死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韓愈替文王寫的檢討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到了林則徐，還說「謫居正是君恩厚」。就是這樣的傳統，延續了兩千多年。而且直到近代，中國也沒有經過徹底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和爭取個性解放的啟蒙運動，更沒有實現現代化，因而封建流毒依然既深且廣。

既受國際共運影響，又有中國傳統的沉重包袱，這就使中國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表現得比蘇聯還「左」，而且越來越「左」。事實上，中國黨的許多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長期以來就一直對知識分子表現出輕視和不信任。早在1928年，毛澤東主持的湘贛邊「洗黨」，就把重點定為地富出身的知識分子，「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准)。」[8]開始於六屆四中全會前，在毛澤東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所轄的地方打「AB團」中，殺掉的中小知識分子就不知凡幾。其中有些人只是由於政見不同如江西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或因對領導有意見如黃克誠師的宣傳科長何篤才。也有些人只因偶然機會而得救，如傅連暲遇張聞天，黃克誠遇彭德懷，胡耀邦遇馮文彬和顧作霖等。陳丕顯的哥哥因當小學教員被打成AB團遭處決，陳丕顯因沒文化就未受牽連，活了下來。至於張國燾在鄂豫皖和四川、鄧發在閩西、夏曦在湘鄂西，殘害的知識分子更是無法統計。著名的大知識分子瞿秋白，從四中全會起就一直挨批鬥，後派往中央蘇區，高層仍無人接近，連自稱崇拜魯迅的毛澤東等領導人也並不多和他來往交談，長征時又被「三人團」強行留下。在他就義近三十年後，還因那

8 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伯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頁。

份自我解剖的《多餘的話》被定為叛徒，直到「文革」後才平反。[9] 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連毛澤東也曾承認過。例如他說，「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10]「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11] 可惜實際上他自己並沒有接受這些教訓，不久後的普遍整風以及肅反搶救，就又把主要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屬小資產階級範疇，[12] 即使入了黨，也還是有點不大可靠。毛澤東說的：「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13] 就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文化人說的。知識分子要把小資產階級思想變成無產階級思想，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的改造（胡喬木在毛澤東審改過的《解放日報》社論中曾比之為脫褲子和割尾巴[14]），要一直「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周恩來語）。不僅如此，矛盾還會轉化，小資產階級思想不改造就可能走向反黨和反革命。整風中的肅反，對那麼多的人懷疑，也是源於這種認識。中央書記處1943年12月22日會議承認反特問題的偏向之一，就是「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懷疑新知識分子的現象」。[15] 共和國成立後更把知識分子提升到資產階級範疇，他們也就越來越倒霉了。

9　瞿獨伊：〈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後後〉，《縱橫》2001年第一期。文內稱，1963年毛澤東看了《多餘的話》，就認為秋白叛變了。劉少奇隨即向安子文等傳達說，「中央傳達最高意見，適當時候將宣佈。」「文革」後王任重還對獨伊說，不能給你父親平反，因為十二號文件所談秋白自首叛變是毛主席定的。直到1980年才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

1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12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2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14　《胡喬木文集》第一卷，載〈教條和褲子〉（第47–50頁）等篇。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9頁。

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

一方面，知識分子確實存在許多弱點，且不說以前強調的階級立場的轉變，即以思想和生活作風而論，如上文所說的自由散漫、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崇尚空談、個人計較、容易動搖等，在革命隊伍中就很不適應。對這些，當時延安的知識分子也都承認，並深感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且真心接受，毫無抵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知識分子感覺銳敏、意見較多，不容易變成完全的「馴服工具」，因而不受多數領導者的歡迎。知識分子感覺銳敏，這是由於他們知識較多而帶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列寧在論及大學生時就說過，「大學生是一部分最敏感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們最有意識、最徹底、最準確地反映了和表現了社會的階級利益的發展和派別利益的發展。」[16]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人們關心中國向何處去時也說，「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17] 知識分子不但看問題銳敏，而且還總要表現出來。毛澤東說的，「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18] 就主要指知識分子容易看出問題，並且有意見就提。這本來應視為優點，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應該說，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就是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區別），一般的特點都是滿懷愛國激情，嚮往民主自由，為革命不惜犧牲一切，關心國家大事，喜歡獨立思考，還往往正道直行，仗義執言，看不慣等級和特權，顯得意見多，不安分。乍一看，這些都是不壞的品格和素質，但實際上卻經常碰釘子，不容易行得通。因為一則，這些人多是初出茅廬，對革命

16　《論青年的任務》（第一封信），《列寧全集》第七卷，第324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02頁。

18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87頁。

隊伍的道理和規矩知之甚少，又缺乏革命實踐，所以看問題有時也容易失之偏激。而革命隊伍卻需要統一思想、嚴格紀律，因此他們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二則不但言多必有失，而且許多領導人還不大願意聽逆耳之言。根據前面所引資料，毛澤東本人就「不願聽不同意見」（田家英語），「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黃克誠自述》）。而知識分子卻大多不諳世故，不夠含蓄，直來直去，有話就說。有些水平高的知識分子還強調和堅持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有些人不但愛提意見，還講話尖銳甚至刻薄。這自然容易引起領導的不滿，有時就被上綱為反領導。要理順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使知識分子學會「循規蹈矩」，做黨的「馴服工具」，就必須加深他們的「原罪感」，磨掉他們的棱角，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和作風。否則就是毛澤東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所以「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19]這就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必然性。

出於對黨內主要不良傾向的估計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就曾一再指出，「遵義會議以前，在黨內關係的問題上，主要偏向是過火的鬥爭。遵義會議以後黨內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20] 1937年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 雖然，毛澤東後來對自由和自由主義也作過解釋，說：「黨內與黨外的自由主義是有區別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是進步的。思想自由與自由主義應有區別，黨內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義。」[21]而實際上，豈但黨內，在革命隊伍中以至黨領導

19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375頁。

2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頁。

21 1943年3月《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的地區，自由主義也是不合法的。而且思想自由和自由主義的區別也從來都模糊不清。延安整風後黨內有無思想自由，以及如何界定，也值得考慮，恐怕至今都還是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普遍整風主要整自由主義，則是越來越明確的。黨中央在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鬥爭中的主要的不良傾向。」「第一是因為我黨接收了約七十萬新黨員，而這些新黨員不論來自哪一階層，都未受過馬列主義的鍛煉，他們帶來了濃厚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其中尤以許多知識分子黨員表現得最為嚴重。」[22]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自由主義的主要載體，普遍整風以他們為主要對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這裏需要稍為一提的還有，整風在知識分子中並未多提反宗派主義。因為所謂反宗派主義是有特定含義和目標的，就是整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宗派。對於知識分子，雖然「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延安的作家也確實分派，但反宗派的重點並不是他們。何況普遍整風的主要對象還是廣大中小知識分子，當時稱得上「文人」的也不多。而這些中小知識分子，當然也是喜歡和志同道合、談得來的人接近，但卻並不搞宗派。而且那時同志間的關係真是不分地區、不論年齡、不計學歷，都能和睦相處，團結互助，親密無間。有的同志調走，歡送會上哭鼻子是常有的事。但是有些黨史書，為了說明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延安普遍整風的必要和正確偉大，就盡量誇大那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毛病，不但把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寫得如何嚴重，而且還要給他們戴上宗派主義的帽子。如說，「有些人還搞小宗派，從上海亭子間來的是一夥，從桂林、重慶等『大後方』來的是一夥，從香港、南洋作秘密工作的也是一夥，從不同學校出來的如北大的、清華的、北師大的也結成小圈子，不願和其他學校出來的人在一

2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3頁。

起，文人相輕的習氣很嚴重。」[23] 這種現象不但聞所未聞，也不可想像。事實正好相反，分成兩派的少數作家恰巧都是來自上海亭子間。在這裏特別提出這點，是因為近來看到不少寫延安整風的書或文章太不真實。事實上，普遍整風批判的主要是自由主義，並沒有提什麼搞宗派，只是後來製造了幾個反黨小集團冤案就是了。

普遍整風中的一些實際情況

有關延安整風的研究、回憶和「實錄」，幾十年來出的書籍、文章已實在不少。而且由於對中央一級整風一直實行嚴格保密，能寫的基本上又都是普遍整風。所以一般情況，人們都大體了解，無須重複。但是也要看到，有許多對延安整風的論述和描寫，只是根據一些有關文件、領導人講話(有的還經過事後修改)和很多領導幹部或積極分子的回憶錄，以為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只要加以綜合甚至照抄即可，卻忽略了在運動中的口號和實際、做的和說的，往往並不一致。只看官方的文件和說法，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也就很難做到實事求是。例如每次政治運動，都說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不同意，可以申辯；對事不對人，等等。但是，只要是過來人，對這些都是心明如鏡的。即以中央級的黨內鬥爭而言，廬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能申辯嗎？更不用說反批評了。正是由於看到一些研究延安整風的書有點紙上談兵，所以也想對普遍整風的實際情況作些補充和辨析。雖然在此無意寫個人的回憶，但由於要談延安整風，特別是普遍整風和搶救運動等，卻不能不聯繫到個人的某些經歷和所見所聞。不過我參加普遍整風，只限一隅，整個情況仍了解極

23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少，這裏談的一些情況，也可能失之片面，因此寫出後已先送請一些老同學和老延安審閱指正。

關於學習文件

整風開始後，大家(這裏和以下都主要指：先是抗大三分校和軍事學院俄文隊，後為俄文學校和外國語學校俄文系的許多同學)對於所發學習文件還是認真閱讀和積極討論的，但對文件本身一般缺乏新鮮感，沒太大興趣，不像一些人說的那樣如饑似渴地閱讀鑽研。這是因為：一則大部文件都曾讀過，而且翻來覆去老是那些材料；二則有些文件既不大懂又覺得與己無關，如一再強調要高幹學的「十八條」(《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20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就不容易弄明白；三則覺得自己不寫文章，談不上什麼「黨八股」。許多同學在業務學習與整風學習各佔一半的頭兩三個月裏(1942年4月到6月)，實際上主要精力和興趣是放在學俄文上，甚至開整風討論會時有些人也在偷背單詞。但到同年7月，根據中宣部和中央軍委指示，學校停止業務學習專門進行整風。[24] 此後兩年多大體上是一半時間整風審幹，一半時間勞動生產，安排學俄文的時間很少。整風和勞動雖然安排得很緊張，總還是有一定的休息和空隙。在大反教條主義之後，基本上已沒人再讀馬列了。於是一些人就利用業餘時間爭相閱讀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外名著，以至古文詩詞。比起來延安後那一段時間學馬列和轉業後學俄文，整風學習在我校(以至一般機關學校)並未形成高潮。實際情況恐怕不像有些書上說的「高潮迭起」，「一浪高過一浪」，甚至「在整風期間，窯洞的燈火比平時亮

24 參閱《北京外國語學院簡史》《延安建校 艱苦創業》部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得早，比平時熄得晚」。[25] 前面的抽象形容也許還可見仁見智，但後面的具體描述卻不會真實。因為當時延安除首長和特別部門供應洋蠟外，一般機關學校都是限量發土煉煤油，只能晚上點一會兒（連「搶救運動」中的「車輪戰」也是在外面分攤摸黑進行），不允許「亮得早」、「熄得晚」。而且那時挖的窯洞，土炕佔一大半，一個班開會也多是坐在炕上（沒桌子可以圍坐），大冒黑煙的煤油燈，點着了就放在洞壁的土龕裏，哪能看成書。我們單位有一陣倒是批評過讀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導致情緒消沉，但沒聽說過哪個單位把「讀書太晚影響了身體健康作為缺點提出來」。[26] 普遍整風開展後的兩個月，1942年6月13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已經說，「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成效。」[27] 但基本上仍然是這些文件，此後又學了兩三年，自然不容易引起「如饑似渴」的熱情來。當然，整風期間，總學委和中宣部也曾隨時通知學習新的材料，除作為補發的幾份整風文獻外，多為與時局有關的材料，但往往也是用的時間太多。如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就學了一兩個月，[28] 以至有些段落都能背下來。1943年在打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後，為揭發國民黨、蔣介石的本質和認清三民主義，曾印發過一批材料，記得其中還有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致大限重信書》等，也學了個把月。1944年學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蘇聯考涅楚克的劇本《前線》（均當作整風必讀文件），也用了幾個星期。翻來覆去總是討論和閱讀那幾個文件，實在很難掀起一些人形容的那種學文件的熱潮。

但這並不是說大家不同意文件的精神，更不是說學了沒用。相反，學習文件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是很重要的。對照文件，大家

25 如《延安整風實錄》的章節標題和第190頁。

26 如《延安整風實錄》的章節標題和第190頁。

2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7頁。

28 毛澤東對這項學習極為重視，曾要求各根據地：「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58–459頁。

對自身存在的弱點認識得更深刻了。經過這場鍛煉後，在實踐中也確實改正不少。其實，在投奔延安和學習一些馬列後，這批「三八式」知青就已下定決心革命到底並初步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也有了基本的組織性紀律性。每次抗大和陜公等校畢業分配，都是要求上前線，聽從組織安排，就是證明。抗日和反頑鬥爭中，許多知識青年的英勇悲壯表現也不是偶然的。因此不應貶低整風前革命知青的覺悟，而無限誇大整風對改造知識分子的作用。至於胡喬木說的，「黨採取了整風運動的方法，領導全黨的幹部和黨員來認識克服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29] 不但有點神秘化，不着邊際，而且還是對廣大幹部和黨員，特別是對「大量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新黨員」的大不敬。怎麼能說他們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偽裝的」？何況胡本人後來也不承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存在。[30]

關於聯繫實際

延安整風的重要特點是強調聯繫實際。上層主要聯繫的是清算十年前的第三次「左」傾和抗戰初期的右傾，並以人劃線，檢查各人的站隊。針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整風，則主要是聯繫自己，用整風文件的精神反省個人的思想和歷史。《四三決定》的第一條就提出，「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31] 毛澤東也說，「要把理論和實際行動聯繫起來，把文件

29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48頁。

30 他在1980年11月12日說，「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這種說法不但是簡單化，而且是向壁虛構。說資產階級思想，說封建思想殘餘，確實還可以舉出來，但說小資產階級思想，說不出來。」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頁。

31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

上講的東西和自己的行動聯繫起來。什麼是實際？個人的歷史實際，機關工作的歷史實際，各個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實際。」[32] 聯繫的目的，除為了審查幹部外，主要還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強調整風的重點在自己。他說，「每個同志必須明白，這次整頓三風，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33] 這些精神，均為一般幹部所了解和接受。所以整風開始後，大家都能響應號召，聯繫實際。一方面是個人檢查思想與交代歷史以及相互批評。另一方面就是對當前現實和領導提意見。例如我就曾給賀龍寫過一份書面意見，認為從一二〇師調來培訓的幹部，除軍事學院給他們和大家一樣發一套襯衣外，一二〇師系統還另發一套，這種做法不符合反對山頭主義的精神。賀龍還派人來向我作過解釋。總之，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個人檢查思想或交代歷史，還是對上級提意見，一般都是嚴肅認真和心平氣和的。自我批評也大有進步。以前我們在抗大曾實行過五分鐘檢討制，即在睡覺前每人反省一下當日的思想和言行，內容多是日常小事。由於為省油不點燈，基本上是躺在炕上講。說五分鐘，只是言其簡短，實際上無法計時。那時連隊沒有鐘錶，晚上輪流站崗都是以燒香計(燒完一根香換崗)，何況開會。整風後經過學習文件，檢討和交代就深刻多了。特別是交代歷史，不但更為詳細，而且還坦白了一些過去對組織不夠老實的地方，如填表時多報學歷或提高家庭成分(說窮了怕人

32 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的整風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21–222頁。

33 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76頁。

笑話)，誇大曾參加過的救亡和進步活動，以及隱瞞某些事實等。[34] 總的說來，整風前期無論黨員還是非黨員對黨都是忠誠老實的。後來也出現過另一些偏向，如對歷史問題越摳越細，弄得自己前後矛盾，說不清楚。或者走極端，有的人為表現積極和交代徹底，就對個人過去的思想和歷史盡量上綱上線，甚至瞎編亂造。這些都給爾後的肅反帶來很大麻煩。

至於對工作和領導提意見，當時同學們意見最多的是官僚主義和1940年後較明顯的特權和等級制，普遍感到上下和同志間關係不如1938年前後那樣平等和融洽。對一些特殊待遇，如一樣進校學習，某級以上幹部可以帶警衛員和勤務員等規定，特別反感。這倒不是一些人說的，知識分子同工農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和相互看不起。其實，知識青年初來延安，對長征老幹部普遍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即使相處幾年後，這種感情也沒有多大變化，只是對越來越明顯的等級制和某些領導的官僚作風頗為不滿。因此，我們學校，同其他知識分子成堆的院校一樣，開始時多數人同情王實味《野百合花》的觀點。後來《野百合花》作為反面教材印發下來討論時，仍有不少人一時轉不過彎來，直到領導上一再指出和延安對其形成聲討之勢，大家才轉為參加批判和進行檢討(前後也不過二十天)。但也就是從這時起，普遍整風運動開始發生了明顯轉折。

34 這種現象相當普遍。例如1940年12月25日馬列學院幹部科在一份《馬列學院審查幹部中的一些經驗》的材料中說的，「從1940年6月馬列學院291個抗戰後入黨的黨員測驗中，前後表冊填寫一致的僅103人，佔全數測驗的33%，其他67%都是經過黨的無數次教育解釋工作才改正了、補充了自己的歷史的。」(《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其實，根據多年的見聞和經歷，有些填表前後一致的，往往是由於個人保留有底稿，到時照抄，其中一些人隱瞞問題的可能反倒大；前後不一致的，許多人則是由於問題不大因而馬虎所致。所以後來在審幹中，對前後表冊填得一模一樣的，反而有所懷疑，因為人們記憶不可能那麼準確。

告別和風細雨

一些人談到延安整風，總要描繪出一種和風細雨的氣氛。如果指整風前期的幾個月，也確實如此。當時領導上對普遍整風採取的是「放」的方針，提倡自由討論、暢所欲言。《四三決定》規定：「在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在規定檢查時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35] 兩個多月後中央總學委還提倡：「各單位的牆報，要注意開展思想上、工作上的爭論，對於投稿的選擇，不論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都應刊載，不得抑制。」[36] 實際上，普遍整風的開始階段，在討論中大家雖然也聯繫自己，但興趣和爭論多在對現實和領導提意見上。只是《野百合花》事件和整風試點單位中央研究院的鬥爭，才改變了（不是急剎車，其他機關學校還是繼續「放」了一陣後）普遍整風的方向。因為毛澤東讀了《野百合花》就極為憤怒，「曾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做出深刻檢查。」[37] 後來聽王震看過中央研究院牆報的彙報後，他也連夜去看，還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並斷言：「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38] 不久後，各機關學校就普遍發動了對《野百合花》的批判，整風運動的形勢也隨即變得日益嚴峻起來。運動的風向能夠迅速改變，說明黨員和幹部還是聽黨的話的。這裏既有認識問題，也有紀律約束，還有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即以中央研究院為例，整風開始後的兩個多月，經填表統計，全院研究人員中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實味言論的佔89%。但在院領導李維漢的總結報告後，不出一周，多數人的態度就一下轉變過來，原來的座談會也很快成為對王實味的揭發批判會，延安各機關學校，就有七十多個單位的一千多人前來旁聽。[39]

王實味事件後，普遍整風聯繫實際的重點已從提意見轉為各人的檢查交代，討論會也就變成了思想鬥爭會和歷史清查會。而且這種檢查和交代是可以沒有盡頭的，如果領導上不扭轉方向，大概可以一直進行下去。如思想檢查，一旦被定為重點，就總是過不了關。而追查某些重點對象的歷史，更是越搞越複雜，總是說不清楚。大約除組織上確定的骨幹和積極分子有所恃外，廣大幹部各自考慮的已主要是自己的問題，準備會議檢查和寫反省筆記。寫反省筆記，被毛澤東宣佈為「鐵的紀律」，「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40] 就是領導上看了認可才算。許多人對一再填表，寫筆記和自傳，實在感到有點頭疼。1942年底，總學委又發出肅清「小廣播」的通知，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調查表」，內容包括自己散佈的和聽到別人的「小廣播」。本來在思想檢查中的揭發批判和歷史交代中的質問追查，就已使同志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現在一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互相間也不敢再隨便聊天談話了。所以從1942年夏秋起，已談不上什麼和風細雨、暢所欲言，整風的重點也隨之轉移，普遍整風實際上進入了以審查幹部為主的階段。而作為群眾運動，審幹、肅反和搶救實際上又是很難分清的，後來人們也就統稱之為搶救運動。這就是為什麼普遍整風不過三年，胡喬木卻說，「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

35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365頁。

36 1942年6月15日中央總學委第三次會議的第三項決定。見《延安整風五十年》，第231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49頁。

38 轉引自《王實味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39 以上見《第一個平反的「右派」── 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頁；《王實味傳》，第190–220頁。

40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毛澤東1943年6月致彭德懷電，《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7–208頁。

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41] 我個人的感受也確實如此。而且一些人因特務嫌疑被抓起來坐班房就是一兩年，兩三年，甚至直到抗戰勝利。還不算一些人長期沒能得到甄別的問題。

一些談延安整風的書，都要把整風分為幾個階段，如整頓學風、整頓黨風、整頓文風以及檢查總結等階段，每進行完一個階段，還要考試。其實這多是紙上談兵。實際情況是聯繫到深挖思想和追查歷史後，已分不清什麼階段了。例如我們單位，在學習文件階段，大體上還能依據計劃，按部就班，比較平穩地進行。整頓黨風，似乎也宣佈過計劃，但因為重點已轉為聯繫各人的思想和歷史，學習計劃就自然成為具文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也一變而為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追查歷史。學校已再也組織不起各種集體活動如時事報告、教唱歌、出牆報、同別的單位聯歡等。這就分成了前後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一些黨史著作或領導人的回憶錄，大多暢言延安整風如何開展民主，如何生動活潑、心情舒暢、言者無罪、治病救人等等，如果是指前面一個短時期，倒還可以；如果包括後來兩三年，那就只能是不顧事實的向壁虛構了。實際上對後一階段，過來人一直是心有餘悸的。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一次提到整黨時還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兩個問題總猶疑不決。一是整黨，一聽說整黨就害怕，因為幾十年搞整黨沒有哪一次不留下後遺症。這一次恢復了延安整風前期的好作風。」[42] 這也證明，延安整風分前後期，而且後期的作風不好。

大約是出於領導上有計劃的部署，普遍整風很快轉為肅反。有所謂「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43] 之說。因此，整風對

4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42 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對上海黨政幹部的講話。

43 這兩句話到處在引用，如《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都說是康生所說。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應包括肅反搶救所起的威懾作用。有關搶救運動，下面還要專門進行討論。這裏只是要說明，談整風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必須把搶救考慮在內的。

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的一些消極影響

延安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對現代的中國革命、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正是那次整風和通過思想改造培養出大批幹部，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後來搞了三十年上下的社會主義探索。這方面的論述已是汗牛充棟，我們前面也略有提及，因此不必再多重複。但毋庸諱言的是，延安整風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少深遠的消極影響。當然，如前所述，中國黨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並不自延安整風始，但由於延安整風確實繼承、實踐和系統化了這一整套「左」的政策和做法，才使它能夠長期傳下來。現在看來，主要的消極影響可否歸納為以下相互關聯的幾個問題。

開創了輕視知識的風氣與傳統

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來說，從什麼時候開始輕視書本知識，我沒有研究，不能亂講。這裏用「開創」二字，只是從個人經歷和所見所聞得出的一個看法，就是延安整風前和整風後對於學習(主要指學書本知識)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

初到延安得到的最深印象，一個是「到處傳遍了抗敵的歌聲」，另一個就是人人都在抓緊讀書，於是就很自然地捲進了這個洪流，也如饑似渴地讀起書來。學習內容，主要是政治即馬列主義，但也重視學

文化。那時書很少，有些書往往要排隊相約，按時交換。而且中央和一些領導同志也在組織各種各樣的學習，如哲學研究會、《資本論》學習小組等。部隊戰士和機關勤雜人員學政治學文化的勁頭也不小。記得作家黃鋼寫過一篇報告文學《我看見了八路軍》，其中就講到戰士們的學習，還提到有一個「小鬼」(通訊員？)在日記中寫道，昨夜夢見了馬克思，給他提了意見，認為他的鬍子太長，不大衛生。至於機關和學校的學習，就更熱烈了。特別是學校，要求在很短時期學很多東西，準備畢業上前線。以我所在的抗大總校而論(1938年底已有八個大隊一萬人)，一期半年到一年，但卻要學一二十門課程。當然主要是政治課，記得的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概論、中國問題(近代革命史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黨的建設、時事政治等。軍事課程雖不算主要的，但也有七八門之多，除游擊戰術、政治工作、各種條令、日常的制式教練和沙盤作業等以外，至今能記得的還有(其實大多只上三五次課，但由於教學方法結合實際觀察和演練，所以印象很深)：地形學(識別和利用地形地物，如開闊地、獨立樹、集團家屋等)、築城學(修築各種掩體、挖戰壕，有所謂蛇形壕溝、電光形壕溝之類)、軍械學(輕重機槍和各式步槍、木柄手榴彈和馬尾手榴彈等)、彈道學(只記得步槍的來復線)。寫這些只是想舉例說明，1938年前後延安學校學習的緊張和內容的豐富。[44] 1939年後，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國民黨的加緊封鎖，知識分子投奔延安的人數已急劇減少，中共中央雖然專門發了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但已是馬後炮，並沒能扭轉局勢。這時延安各學校已只得主要從機關和部隊調來學員培訓。學生來源的變化和流動性的減小，就使學習時間有所延長，學習內容更加專業化。根據個人體會(這時我已調抗大三分校當政治助教)，此後的教育仍然是遵照原有精神，注重實際運用，並不是後來人們所說學的都是脫離實際的教條。

44 可參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整風開始後，局面就全變了。不但以前的教育受到批判，而且對知識的看法也提出了新的解釋，實際上是在批判教條主義的口號下貶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在整風中提出的著名論斷，「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45] 證明了他一貫只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觀點，也不合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理論的發展史實。他不但把所謂「教條」說得「比糞還沒有用」，而且就是「學生們的書本知識」，「假定都是真理」，對他們也「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的」，「學這種知識……可以說是最容易的」，「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因為，「如果只是死讀書，那麼，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46] 諸如此類的話，不只是提倡讀書無用論，也違背起碼的常識。不信，請讓「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的人，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看是否「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人們會說，這是有意曲解，因為原來的意思只是為了挖苦讀死書的教條主義者。但是，第一，這裏講明是指假定都是真理的書本知識。那麼，學生們(也應包括不是學生的人)要不要學書本知識？不要書本知識，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怎樣來提高？第二，既然只是挖苦教條主義者，那為什麼要在十年後修改發表時全部刪掉？[47] 可見拿不出來。但即使刪去這些話，也並未改變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原意。第三，更重要的不只是對這段文字的解釋，而應結合實際來了解這篇報告的精神和實質。如果考察一下整風以來的歷史事實，那麼就可看出，延安整風無論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開了輕視知識的先河。在整風期間，各機關學校就以少則一兩年多則兩三年的時間，主要學那二十多篇《整風文獻》，其他知識基本上一律停學，包括馬列主義(只是高幹選學一點思想方法論)。專科學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外語學校，就是「1944年

4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49頁。

46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見《整風文獻》(訂正本)新華書店1949年版。

47 見〈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秋收以後，俄文、英文兩系師生，(才)開始集中精力，投入外語教學活動」。[48] 抗大總校也是「直到1944年底，全校整風學習方全部結束，並轉入正常學習」。[49] 嚴重的是，延安整風開創的輕視知識和輕視科學文化學習的傳統，共和國成立後還愈演愈烈，一直發展到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50] 連作為指導黨和國家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如前所引，胡喬木也承認，經過延安整風，「實際上以後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51] 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了。這都勢必導致全民族的思想貧乏和文化落後，嚴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和國民素質的提高。

加深了對知識分子的輕視與蔑視

這裏之所以用「加深」，是因為以前從國際共運到中國黨內就存在輕視知識分子的傳統。不過遵義會議後，這方面已逐漸有所改進，抗戰初期知識分子成群結隊奔赴延安，以及抗大、陝公、魯藝、女大、馬列學院的輝煌成就，都是證明。可惜延安整風沒有很好繼承和發揚這一新的傳統，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恢復和加深了老傳統，並且長期堅持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接連挨整受折磨，中國文化發展也受到嚴重障礙和摧殘，到反「右派」特別是到「文化大革命」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過程有稍加回顧的必要。

延安整風的結束，實際上直到日本投降。此後我們在無全國政權的條件下，必須着重同國民黨爭取群眾，當然也只能對知識分子執

48 《北京外國語學院簡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第10頁。

49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第171頁。

5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1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行爭取和團結的政策。而反獨裁、爭民主的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和解放軍確實也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黨同知識分子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共和國成立後。許多留學國外的優秀知識分子也突破重重障礙回國效力。這期間，雖然仍在提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但還注意方式；知識分子對黨的某些提法和做法開始也不大理解，但並非主流，有些還很快糾正了。例如吳晗在大約寫於1956年的《自傳》中就説，「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52] 等到抗美援朝結束、三大改造完成，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已過了民主革命的關，現在要過社會主義的關了，因此需要大約也能夠騰出手來大抓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了。這也就是陸定一所談中宣部的工作，「無非是抓階級鬥爭，一個政治運動接着一個政治運動」。[53]

改造知識分子的辦法還是延安整風時用過的兩手，即説服(思想教育)和壓服(批鬥和肅反)。共和國成立後，一方面是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土改、抗美援朝等各項運動，另一方面也接連發動了對《武訓傳》、梁漱溟、俞平伯、胡適等的批判，不久後更挖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知識分子的評估也從小資產階級升為資產階級，説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共和國成立前受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54] 並且提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認為現在知識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的身上」，「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因此

52 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頁。轉引自《隨筆》2002年第4期，第19頁。

53 《陸定一傳》，第587頁。

5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9頁。

就要聽這些主人的話，否則「就要辭退你」。[55]知識分子也真的聽主人的話，起來幫助黨整風，結果卻引起一場「反右派」鬥爭。在這次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55萬餘人，加上其他挨整的(挨批和劃為「中右」以上，以及在工作上受到影響的)當超過百萬，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不少人還是社會精英。

反「右派」被説成「擴大化」，是否妥當恐怕也值得考慮。因為過去説的許多擴大化都並不準確。如蘇區無中生有的「打AB團」、延安一個特務也沒抓到的「搶救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純屬亂來的「抓五一六反革命」，都被説成什麼「擴大化」。其實這些説法不但談不上實事求是，冤屈了不知多少人，而且還妨礙汲取教訓，致使類似錯誤一再重演。按毛澤東估計，中國當時有高級和普通知識分子五百萬左右。[56]挨整的一百萬紛紛繳械檢討，剩下的四百萬還是繼續聽黨的話，參加對「右派」的批判和對自己的檢查，這就使不久前才提出的「百家爭鳴」完全變成了空話。毛澤東自己就説，「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説，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其實，兩家爭鳴之説仍然不實。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環境是不會允許「資產階級一家」出來爭鳴的，只能實行「無產階級」的，也就是黨的「輿論一律」。而且反「右派」鬥爭既暴露了知識分子並不都聽話，也證明知識分子沒幾個人敢起來爭鳴，所以對他們反而更不客氣了。胡喬木就説，「經過反右派鬥爭以後，在毛主席的頭腦裏，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改變過。」[57]反映此後對知識分子看法的，還有因大搞個人崇拜和奉行極左路線而得到賞識和不斷升遷的柯慶施的妙論。「據老報人徐鑄成回憶，柯慶施在反右運動中對中國知識分

55 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2–453頁。

5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4–405頁。

5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子做過如此獨到的概括：知識分子的習慣，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懶於檢查自己，問題成堆就難挽救。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58]主管文教工作的錢俊瑞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小組發言中也説，「主席指示對知識分子必須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而把他們放在應該改造、消滅的階級之內。」[59]對知識分子的這些看法和態度，根源都在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抑制了知識分子的長處而助長了他們的短處。對這個問題可以説的有很多，但為節約篇幅，只舉一個例子或現象。無論是思想檢查還是坦白交代(肅反和搶救)，一些堅持實事求是不説違心話的人，往往被視為態度不好，即使最後作平反結論也要給留點尾巴。那種在思想批判和肅反搶救中能夠衝鋒陷陣、按領導意圖辦事的人，就成為運動中的骨幹，即使搞得過火甚至違法亂紀，也不予追究，還會得到重用。還有些人不但在壓力下亂供亂咬，還搖身一變成為「積極分子」，去批鬥和搶救別人，並且被認為「態度好」而受到歡迎。整風運動中的這種做法，自然造成説真話吃虧、説假話佔便宜的效果，客觀上壓制了知識分子正道直行、仗義執言、堅持獨立思考和獨立人格等優秀傳統，助長了投領導所好、順着來、隨風擺、互相拆台、打小報告等不良作風。而這種現象不但累見於歷次政治運動，即在平時也是大行其道。

使整個一代「三八式」沒能起到應有歷史作用

輕視知識與知識分子的觀點反映到幹部路線上，就是主要依靠和重用工農老幹部，而不大信任知識分子新幹部。延安時期人們説的老幹部，是指參加過內戰特別是長征的工農幹部，即使原來是知識分

58 轉引自馮錫剛：〈「好學生」的最後十年〉，《隨筆》2002年第4期。

59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頁。

子，既已做了黨政軍領導工作，當然也屬老幹部。所謂新幹部，就是一代「三八式」。新老幹部的這種界定，一直保持到共和國成立後好久。在領導和老幹部眼裏，也如同父母看子女總是孩子一樣，始終把「三八式」視為知識分子新幹部。而「三八式」們，在老幹部面前也自認低一輩，經過延安整風更增加了對他們的敬畏。後來的形勢變化，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有點加深新老幹部的這種界定和相互看法。正是在延安時期形成並由整風固定下來的這種看法與傳統，實際上決定了整個一代「三八式」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應當說，這對我們黨是一大不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劇。這並不是為「三八式」鳴不平，而只是要說明「三八式」一代的斷層，給中國黨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後果。

從「一二・九」到「三八式」，這是中國人民空前覺醒的時代，是需要人才也湧現出大批人才的時代。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投奔共產黨，這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空前壯舉，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正像《抗大校歌》中唱的，他們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擔負着民族解放的重任。按道理，在他們中間一定會產生一批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大師級的專家學者(連沒有奔赴解放區的知識分子中都出現了一批堪稱大師級科學和文史方面的著名人才)，可惜結果並不理想。這除了那個時代的客觀環境外，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與政策也是重要原因。思想改造和思想管制限制了知識分子幹部在科學、文藝和學術諸方面的創作和成就，而不讓他們進入省部以上領導，特別是中央決策層，就使他們對黨的建設和社會發展無從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使黨和社會發展規律「長江後浪催前浪」出現長達三四十年的斷流。

延安整風結束時舉行的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是清一色的老幹部，絕大多數還是職業軍人，政治局十三人中的十人和書記處全部又來自中央蘇區(任弼時是從中央蘇區派往湘贛的)，在中央委員會裏竟然沒有知識界的代表(也許靠鼓吹個人崇拜發跡的候補委員陳伯達可算一個例外)。這種人員構成雖然不盡合理，但在戰爭時期多少還可理解。違背黨章規定，缺乏充分理由地拖延十一年才召開的八大，已處在全面建設時期，可選出的領導機構卻和七大基本相同，全面排斥「三八式」幹部，不要知識分子和懂經濟建設的人才。毛澤東的不成其為理由的理由是因為人數多。他說：「現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出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我們現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幹部人數很多……所以這次就不考慮安排了。」[60]但他同時也不能不承認，「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們這個中央委員會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61]這顯然與黨提出的「向科學進軍」、「向自然開戰」的任務完全背道而馳。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成員的知識與經驗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這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一再承認的。可毛澤東不僅沒有講一定要保持這個缺點的原因，反而說，「我們這個名單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紀。」[62]就是說，基本上由工農老幹部組成、排斥知識分子和「三八式」的中央還要管中國四五十年。而它也確實在一人的操縱下又拖了近十三年才召開立林彪為接班人的九大。八大產生的中央領導不適應中國建設的需要是如此明顯，所以有人認為，八大領導結構必然導致八大路線的中斷。 因為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絕大部分出身於農民階級」；「從其職業構成和社會心理來看，他們大多數是職業軍人出身，而軍人的特點是服從命令和權威」；這「也就不難

60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93頁。

6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2頁。

6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8頁。

理解為什麼經濟建設會變成群眾運動了。」[63] 七大和八大產生的中央實際上是個軍事司令部(劉少奇1947年7月4日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報告，就承認聯共(布)為世界共運的統帥部，「而中共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64])，總司令一聲號令，整個中央以至全黨就立即照辦。例如沒有經過任何應有的黨內外會議，只是一個人的批示和政治局成員的緊跟就廢除了《共同綱領》，全國就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至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好」等就更不用說了。誰不服從，就「軍法」從事，還可得到整個中央和全黨的支持，如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等。

當然，輕視知識與知識分子同「犧牲」(指排斥在決策層領導之外)一代「三八式」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關鍵在於指導思想和體制。即使「三八式」按常規逐漸參與領導和決策，甚至成為多數，但只要保持由延安整風固定下來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各方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恐怕局勢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但「三八式」既然指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因此如果他們真的能夠當權，中國社會的發展總會好一些。例如對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反右傾、大躍進等就可能減輕(假定由有科學知識的人而不是大老粗管農業，也許就不會發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等怪論)，「文革」也許可以避免，中國社會的發展會少走些大彎路。而且，「三八式」能夠進入黨和國家的領導與決策層，這本身就意味着黨內還有一定民主，發展下去，必將直接影響以至動搖終身制和老人政治，起碼也會抑制和弱化專制獨裁的作用。試想，在廢棄《共同綱領》上，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如果中央委員的大多數不隨風倒，政治局和書記處有幾個人能頂住壓力，結果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可以肯定，毛澤東不會去，也沒人跟着「上山打游擊」。可惜這都只能是假設，因為「三八式」一代的中斷是延安整風註定了的歷史必然。

其實不大信任知識分子，更信任老幹部，也並非從整風開始(只是經過整風，理論上更有系統，如出身的「原罪論」和改造的強制性等，體制上更加固定化了)。在延安時期，早就是這麼做的。從一開始，各單位的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就一律都是老幹部，甚至包括一些小單位，例如抗大頭幾期的連隊長和指導員就都是長征老幹部，更不用說大隊一級和校領導了。著名的知識分子如任白戈、徐懋庸、張慶孚(還是老黨員)等，至多也是做到大隊的主任教員。共和國成立後仍然堅持這一傳統，連選派駐外大使都非老幹部莫屬。原因就是毛澤東接見他們時所說，「你們都是老戰士，雖不會外交，還要你們去幹外交，我看都跑不了。」[65] 將軍當大使，有些人還是勝任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既不懂外文，又不了解國際關係以及外交一套，多少有點像原四方面軍參謀長(1955年評為中將)的倪志亮所說，「中央要我當大使，是拿着黃牛當馬騎，難啊！」[66] 選派他們，只是因為「跑不了」。難道抗戰後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當大使就會跑了？這也是太不信任「三八式」幹部了！當然，老幹部為革命立過汗馬功勞，在他們身上有很多長處，確實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應當受到後輩的敬仰和學習。他們中間也有些人，能夠勤奮自學，掌握淵博知識，保持思想常新，做到了與時俱進，如胡耀邦等，但終究是極少數，更不佔主流地位。就絕大多數或整體而言，對經濟建設，老幹部們的知識準備卻實在不足，視野不夠廣闊，思想認識很難跟上時代的發展。這

63 黎見春：〈從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看八大路線的中斷〉，《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64 〈劉少奇給聯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報告〉，載《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2期。

65 王幼平：〈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選派情況追憶〉，《新中國外交風雲》(第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66 〈首任駐朝鮮大使倪志亮〉，載《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一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

是業經歷史證明的事實，絕不是對老幹部的蔑視。如果不是由於本身不懂業務，又受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傳統的影響，那就不一定會出現大躍進中許多違反常識、嚴重破壞生產力和生態環境的事來。鄧小平就承認，大家頭腦都發熱。[67] 其實這個「大家」，只能指中央和省級領導，總不會包括各方面的專家和科學家以及廣大工農群眾。而對於那些領導者，也並不只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而主要是缺乏應有的科學文化和業務知識。例如直到準備黨的十二大，胡耀邦首先提出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思想，于光遠鑒於從蘇聯學來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法極不準確，水分太大，建議改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並打電話給在武漢的陳丕顯。陳卻說，「可是現在我們的幹部都不懂什麼叫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呀。」[68] 這就是輕視知識帶來的惡果。所以長期主管宣傳教育的陸定一曾對到醫院探視他的于光遠說，他的一個重大失誤和遺憾是共和國成立後沒有提出組織老幹部上大學。這確是一個真誠而深刻的反思。因為延安整風立下的主要信任工農老幹部而不大信任知識分子的規矩和傳統，使從中央到省部一級的所有重要領導職務都只能由老幹部擔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全部)並不懂新的業務，又輕視學習新的知識，還看不起專家學者，所以就只能跟着上面的風走，造成大躍進時期上下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例如冶金部長王鶴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説「鋼產量完全可以五年超英，十五年超美。」過了一個多月後又向中央報告，把1962年的指標從三千萬噸提高到六千萬，[69] 説超英用不了五年，有兩年就行。至於九千萬人上山砍樹煉鋼，造成多嚴重的後果，恐怕絕

6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6頁。

68 于光遠：〈紀念耀邦的六篇文章〉，《懷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64頁。

69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第302、377頁。

不只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主要原因還是不懂業務，迎合領導。因為生物學家頭腦再熱也不會提倡在除「四害」中消滅麻雀，農學家頭腦再熱也不信畝產數十萬斤糧。然而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卻在大力貫徹深耕密植等「八字憲法」、讚揚各地放「衛星」，把糧棉產量高估了又高估(因大躍進中表現突出，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上與柯慶施、李井泉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直到1960年許多地方已在大批餓死人，他還在4月6日二屆二次人大會上作農業問題報告時講糧食增產，説「除四害、講衛生運動，成績之大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70] 這不都是「外行領導內行」和輕視專家學者的結果嗎？

由於不遵「人事有代謝」之規，堅持偏信和重用老幹部的傳統做法，因而自然就形成老人政治。老人確實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但除少數例外，卻都容易情感上懷舊和思想上保守。例如毛澤東和某些老同志就常懷念並主張恢復供給制、游擊習氣和農村作風。[71] 在改革開放以後，有些老同志還對特區有保留，對開放想不通，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提出「鳥籠經濟」。其權威和影響所及，曾使某些地區落後了好多年。還有個例子可以看出老人思想的守舊，就是當年在延安首先起來大罵丁玲《三八節有感》的人，在新時期又要大批巴金的《隨想錄》。更有甚者，有的領導人公然提倡老幹部子弟接班，説他們起碼不會挖祖墳。總而言之，歷史證明，工農老幹部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執行極左路線的一貫制領導，卻也使中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70 譚震林：〈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新華半月刊》1960年第8期，第25頁。

71 《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611頁。

給日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損失

二戰後，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得到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快的發展，知識分子可以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國，由於延安整風開創的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在共和國成立後反而愈演愈烈，因而使我們喪失了二三十年的大好時機，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比人家落後了一大截。這本來是不爭的事實，鄧小平就曾多次指出過。[72]但是有關方面和有些人卻硬是不承認歷史事實，總要把過去的成績盡量拔高，對錯誤遮遮掩掩不露真相。例如直到前幾年，還有這樣的權威說法：從1952年到1998年，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7.7%，明顯高於世界年均增長3% 左右的水平。這就太不實事求是了，也許是由於繼續照搬蘇聯那種水分極大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法的緣故。因此，為了汲取輕視知識釀成惡果的教訓，並還歷史以真相，這裏只舉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例子對共和國成立後的損失作點說明，雖然有些問題在前面的章節中也曾提到過。

一、以《聯共黨史》為學習中心造成實行「一邊倒」的惡果

「一邊倒」的靈魂是照搬蘇聯模式，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而在「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方面，[73]我國可能還要大大超過蘇聯，因為我們強調「主觀能動性」(實為唯意志論)比他們更厲害。共和國成立後二十多年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不是上述「明顯高於世界年均增長」，而是恰恰相反，大大低於世界水平。如前所述，1955年中國經濟總量(按匯率折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比重是4.7%，日本大約佔

72 參閱《鄧小平文集》第三卷，第90、116、137、266、383頁等。

73 《鄧小平文集》，第116頁。

2.5%。到1980年，中國的份額降為2.5%，日本則升到10%。[74]同一些東亞「四小龍」的差距拉大得更快。如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情況可能稍有不同，但基本趨勢並未改變。至於人均產值，那差距就更大了。因為我們在發展，人家也在發展，近二十多年來，速度雖然我們快，但他們的基數大。例如美國年增1%就是八九百億美元，我們增1%只一百億美元。可見，錯過一次機會，落後二三十年，追趕起來用的時間就要多得多了。因此，我們對改革開放前所走彎路和所犯錯誤應有充分估計，更不可再用那些靠不住的統計數字自欺欺人了。蘇聯國力統計的虛假就是前車之鑒。

二、延安整風創立的對意識形態壟斷制妨礙科學文化的發展

科學文化的發展要求解放思想、獨立思考、百家爭鳴，而我們在整風中卻從蘇聯學來一套思想專政和輿論一律，這就與時代發展有點背道而馳。當時也提倡解放思想，但那主要指從馬列的書本知識中解放出來，從「左」傾中央時代的所謂「兩個宗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此後一直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統治也就隨之越來越嚴，思想越來越貧乏、越單調。例如大躍進就是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發動起來的，但是農學家能對「八字憲法」提出懷疑、生物學家敢著文反對打麻雀、政治學家可被允許討論政黨制度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怎麼能夠得到順利發展、怎麼能夠實現創新和突破？這種環境也自然難以培養出各學科的大科學家來。這就是我國經濟建設至今在技術上主要還得依靠外國、依靠引進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一切都不是絕對的。國人就一直以「兩彈一星」自豪。這確實證明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從戰略上看，卻並不是完全成功的。因為在高度集中

74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經濟日報》，1993年7月20日。

的經濟體制下，一個大國要調動各方面的力量，辦成幾件事，相對而言是並不太難的。蘇聯就曾集全國的力量發展軍事技術和國防工業，結果也能在同美國經濟實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取得軍事上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在某些領域如核能和航天方面還一度領先美國（蘇聯首先發射人造衛星曾是毛澤東得出「東風壓倒西風」的重要依據之一[75]）。但它卻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水平大大落後於西方，據蘇聯崩潰前統計的經濟總量，也只相當美國的八九分之一。俄羅斯人早已在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但蘇聯/俄羅斯的軍事技術還比較全面，而我們只有「兩彈一星」，飛機、艦艇等還有求於國外。在這點上，也應以蘇聯為鑒，更不宜老是高談「兩彈一星」了。

不用說，思想統治和輿論一律，對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影響更大和更直接，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不例外。前面已經引證過，連胡喬木也承認，「從整風以後，實際上很少有什麼創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說過的，沒有說過的，沒有人敢研究。」因而得出結論：「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76]那些研究延安整風的人，那些自認為是胡喬木學派的黨史工作者，請牢記和很好體會胡喬木這段話，因為幾十年的歷史也確實是如此。這不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紀律，更重要的還由於新聞和輿論的壟斷（不同意見出不來）、現實利害得失的考慮（順着來寫作肯定佔便宜，發表不同意見可能挨整）以及專政的作用。毛澤東在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說過，「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77]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剛過去不久的反「右派」鬥爭中不知就有多少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後來更厲害，據胡耀邦說，單是在十年動亂時期，為堅持真理而鬥爭的「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分子，……遭到殺害的，有三十萬人」。[78]人身都不保，還遑論其他。所以延安整風形成的這種思想管理體制，很難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各領域培養出公認的大師級的專家學者來，即使原有的大師級人物也很難拿出大師級的作品。這曾使一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抱憾終生。他們想研究的問題不能研究，想寫的東西不能寫，想出版的書不能出，想演的戲不能演，哪裏有過什麼「雙百方針」，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看來要做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百家爭鳴和文學藝術的百花齊放，求得學術的興旺和文藝的繁榮，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於多年來常說的要造成一種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局面，更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

在這一節原來還計劃寫兩個問題，一個是延安整風的結果宣佈了黨史上第二個生動活潑時期的結束；一個是延安整風中滋長起來的弄虛作假等不良風氣。但是現在已經寫得太長了，而那兩個問題又不能過分簡化，所以就只好另辟章節了。這樣，關於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的反思就暫且到此為止。

75 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634頁。

7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7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296頁。

78 1979年7月11日在中宣部例會上的插話，見《懷念耀邦》第四集，載鄭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紀略〉。



第九章

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馬列主義教育運動的提法與實際不符

六十年來，對延安整風一直有個正式提法，即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先後用詞雖有某些差異，但基本精神是一貫的和一致的。[1]只是近些年來，根據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原有提法作了點修訂，改為：「整風運動既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2]所有這些，無論是以當時實際還是事後發展來衡量，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對此，前面幾章中曾提到過，但鑒於這個問題關係到對延安整風的根本評估，所以還需要再稍為系統地作點說明。

先談幾個用詞問題

一、說整風是全黨範圍的運動就不是事實

除中央一級完全採取暗箱作業的方法清算所謂兩大宗派的鬥爭外，即以普遍整風而言，還是胡喬木說的主要針對機關幹部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而全黨這時（1942年初）已有八十萬黨員，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整風學習。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也只是一萬多名幹部，並不包括非幹部的黨員群眾。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作風的發言中，就明確要求：「全黨幹部在現在這個時期，在一兩年內，能夠把作風有所改變」，「我們的幹部就能夠提高。」還說，「延安的幹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這都是全國性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從客觀條件看，毛主席認為，無論在延安還是全國各根據地，讓幹部集中一段時期學習、整風，也是可能的。」[3]可見，說來說去還是幹部（當時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幹部）的整風，所謂「全黨範圍」是把廣大的普通黨員排除在外的。當時的情況也確實如此。這並不單純是咬文嚼字和摳字眼的問題，而是說明一種精神，就是我們在黨內歷來依靠的是黨員幹部（全黨就是指他們），而不是黨員群眾。推而廣之，我們的政權所依靠的也是各級幹部，而不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名義上說是群眾當家做主，實際上是黨的領導和各級幹部當家做主。

另外，還要在此附帶一提的是，「全黨整風」的「全黨」也是不顧事實的說法。因為無論延安還是各根據地，凡搞整風的單位，非黨幹部都是參加了的。當時還沒有1957年那種要非黨幹部「幫助黨整風」的說法，而是黨內外幹部「一視同仁」，不曾聽說有什麼機關的非黨幹部可以「逍遙」於整風之外。現在有些談到延安整風的書籍和文章，還把當時的審幹和搶救運動說成是「開展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4]更是脫離實際的天方夜譚，因為不少機關學校非黨幹部和群眾被搶救的反倒更多些。

1 如：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集，第48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頁。

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615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788頁，《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3 均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

4 如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論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延安整風運動紀實〉，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47頁。

二、稱為「普遍深刻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也不恰當，起碼屬無限誇大

「普遍」，已如上面所說，實際上整風學習不但限於幹部，而且發展很不平衡，不少地方的幹部並沒來得及開展學習就被捲進了搶救運動；有些對敵鬥爭緊張和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也沒機會組織學習。至於說「深刻」，只是個空洞的形容詞，怎麼個深刻法，始終沒有講出幾個具體標誌。是否像《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中為了說明全黨普遍整風的必要而編寫的一些理由：「在全黨，新黨員、新幹部佔90%。他們沒有經過內戰，沒有參加過長征，共產主義的許多道理不熟悉，階級鬥爭是怎麼回事不懂得，雖然有的讀了兩年書，但只記得一些教條，不懂得馬列主義是什麼。」所引毛澤東的話要求更高，要全黨幹部在一兩年內「把馬列主義搞通」。[5]是否經過整風，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所要求的目的都達到了，因此才叫「深刻」？其實，這些話不但前後矛盾（整風到底是全黨黨員還是全黨幹部，或只是新黨員、新幹部），而且完全脫離實際，要求之高也只能是主觀主義幻想。例如說新黨員、新幹部，由於沒有經過內戰、長征，所以許多共產主義道理不熟悉，階級鬥爭、馬列主義都不懂得。那麼參加過內戰、長征的老黨員、老幹部對這些就都熟悉了、懂得了？我曾多次同長征老戰士共事，親自體會到，多數老長征由於出身於沒有文化的貧苦農民，參軍後又是緊張的戰鬥生活，很少學習機會，所以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道理幾乎是空白，反倒不如那些被譏為「只記得一些教條」的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就算上引說法可以成立，那為什麼整風反而要以參加過內戰和長征的高級幹部為主要對象呢？何況鄧小平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注，當然也包括毛澤東）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不過什麼叫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才解決。」[6]連問

5 見該書第205頁。

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261頁。

題都還沒有弄清楚，怎麼能談得上以此進行「深刻的」教育？總不能像毛澤東常批評別人的那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

三、提「馬列主義」這個名詞不準確不科學

因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馬列主義當同義詞用，這是我們一再講過的。[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新著的兩本黨史教科書（即本章第1頁「注2」提到的簡史和長編）中已將以前慣用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改為「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顯然是一點進步。但是兩本書又都增加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含義，卻是極不準確和違背歷史真實的。這大約是由於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期間，周揚、胡繩、溫濟澤等人著文把「五四」、整風和這次撥亂反正並列為近現代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所導致的結果。實際上，延安整風只是以反對存在於遵義會議以前的舊教條為名另立一套完整的新教條，而且束縛更嚴。整風前還有相當程度的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領導上，如作為總書記並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更「特別提倡發揚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8]報刊上確實也經常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和對工作的批評。還創立了針砭時弊的《輕騎隊》之類的街頭小報。整風後，這些都成了批判的對象和個人檢討的內容，搶救運動一來更是萬馬齊喑。這哪裏談得上思想解放，倒是真正實現了統一思想，輿論一律。整風學習給像我這樣的一般幹部所留下的最深印象，主要是列寧的「鐵的紀律」、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反對的教條主義是什麼，實際上是並不清楚的，無非是講話時少引證馬列，多引證毛主席等等。至於反對把國際指示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那已是過了十多二十

7 如另一章〈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另見作者：〈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載《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頁。

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對這些，他是作為教條主義錯誤檢討的。

年中蘇關係出現問題後的提法，屬慣用的事後諸葛亮的話，在延安整風時沒有也不可能有此提法，連暗示的含義都沒有。而且正好相反，整風中正是用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指示、斯大林言論與蘇共經驗來反對那些被稱為教條宗派的人，說他們是假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擁護者，以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派才是真的。所以經過整風，實際上倒是增強了對斯大林的崇拜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

延安整風學的是斯大林理論

延安整風不能稱為也確實不是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除了前面一再說過的，因為普遍整風的學習材料中，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著作，還特別是由於把斯大林的理論誤認成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對整風學習，毛澤東明確規定，「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因為照他說，「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9]這種提法現在已經可以明確斷定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的官方輿論也早已不再提斯大林和聯共黨史了。因為多年來揭發暴露的事實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充分證明，並得到舉世公認，斯大林的理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聯共(布)黨史》則是偽造歷史和搞個人崇拜的典型。以這樣的理論為中心的學習，怎麼能稱得上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也許人們會說，《整風文獻》中除了斯大林的論著外，不是還有我們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嗎？確實如此，而且中國黨和領導人的材料還要更多些。但是應該承認，整風學習既然以斯大林的理論為中心，那麼其他材料一定是同這個中心保持一致，絕不會與其矛盾，更不能唱反調。這在邏輯上和常識上都是不成問題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讀《整風文獻》收錄的他們的文章，不但可以看出立論是以斯大林的理論為基礎，而且也都只引證斯大林，有些還是大段的引證，卻看不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多少引語。這能說是偶然的嗎？就內容而言，像毛澤東在幾篇報告中那樣對書本知識、外來文化、理論研究和知識分子的輕慢和蔑視，就很難說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批評「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10]還是在同列寧唱反調。因為如前所述，列寧15歲就開始閱讀《資本論》，17歲被捕，18歲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並講解《資本論》。[11]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和〈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則是更明顯地立足於斯大林理論，有極大的負面影響。頭一篇就是要把黨員培養成黨的(實際上就是領導的)馴服工具。第二篇雖表明是要反對黨內鬥爭中「左」的傾向，但因為是以斯大林的論斷:「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和「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12]為依據，因此基本精神還是強調鬥爭，事實上也立竿見影地為整風和搶救中的殘酷鬥爭所證實。至於第三篇，所起作用主要是用斯大林黨同伐異的理論製造中國的個人崇拜。當然，這裏無意從理論上分析和討論《整風文獻》中選用的每篇文章，只是要舉例說明延安整風不可簡單說成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而是用斯大林理論(當時的毛澤東思想也是這一理論的中國化，所以被劉少奇稱為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統一全黨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思想的教育運動。

---

9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引自《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6頁。此文在1953年編入《毛選》第三卷時，刪去了「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的話，聯共黨史書名也用了全稱。

10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第51–52頁。這句雖在共和國成立後編入《毛選》時刪去，但整風時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1 見《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

12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9，180–181頁。

不但學習內容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理論，而且整風中特別是整風後實際上執行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的原則。這裏只以整風期間違背黨章規定，一再推遲七大的召開為例做點說明。對於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黨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張年會制，並要公開進行，以防止造成個人專權和脱離群眾的暗箱作業。列寧也堅持了這一原則，因此即使在國內戰爭的緊張時期，俄共的年會制也從未間斷，而且對社會特別是對全體黨員完全開放，不但公開進行，還在報上開闢爭論專欄。只是斯大林專權後才逐漸加以改變，致使聯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更沒有不同意見發表。中國黨在被毛澤東稱為第一個生動活潑時期，即陳獨秀任總書記的年代，也是實行每次都有爭論的年會制(在國內無法舉行時還到國外去開了六大)。六大黨章仍寫明年會制，只是實際情況變得很難執行。1931年四中全會雖有決定，但未實現。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才認為有可能決定「在最近時期」召開七大，並選出了準備委員會。此後政治局和書記處又多次作過討論和決定，尤其是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特別專門做出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確定了議事日程和代表選舉辦法，要求加緊準備工作，以便「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13]但是後來已確立了領袖地位的毛澤東，卻置書記處與政治局的歷次決定以至中央全會的決議於不顧，要先統一思想再開會(從此，就都一直開成了無爭論的「團結的大會」)，各地選派的代表被安排參加整風學習和搶救運動，於是又經過五六年到1945年才開成七大，距六大已有十七年。此後在大半為和平時期又是拖了十年才開八大。這只是一個較顯著的例子。其實，七大以後的黨內生活以及國家體制的改革和建設，基本上也都走的是斯大林的路子。例如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毛澤東個人想法的變化，決定立即放棄《共同綱領》、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卻既不經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

1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74-776頁。

全會，也不打算經過制定《共同綱領》的新政協會議，但決不忽略向斯大林請教。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隨後即委託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向斯大林請示和徵求意見。10月20日，劉少奇致信斯大林。10月24日，斯大林在接見中共代表團的談話中，對中國從現在起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作了肯定的評價。第二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正式提出來了。[14]又如在這之前，毛澤東原也想按照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在革命勝利後取締各民主黨派，但由於在徵求意見時斯大林不同意才保留了下來。[15]至於建設中的照搬斯大林模式，就無須多說了。可見，不但整風時的學習，而且整風後的實踐，都是貫穿着斯大林的理論。至於多年後說的，延安整風是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教條主義，那也像經常用的以事後的形勢變化和新的認識修改幾十年前的文章一樣，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他們所寫《共產黨宣言》再版時，就一再說有些論斷已經過時或當時的提法本來就不完備，但總是聲明，「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16]甚至連斯大林也都表示，對過去寫的文章，現在看來有些錯誤(所謂「顯得陳舊了的論點」)，但也不去修改原文了。[17]有關這些，特別是整風後的學蘇聯、「一邊倒」和維護斯大林等問題，下面還將談到，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14 魯振祥、楊茂榮、王朝祥:〈關於總路線的提出文獻發表情況簡述〉;薄一波:〈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問題致田家英的信〉。以上均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四期。另參閱《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所收給斯大林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4)，第262、258頁等的有關篇章。

15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238頁。

17 〈著者第一卷序言〉，《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

整風前倒是進行了幾年馬克思主義教育

延安時期以前中國黨的理論水平不高

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一直不高。從以陳獨秀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起，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重視不夠，加以時間和條件的限制，使他們沒能下大功夫進行學習和研究，還表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他們很注意用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原則指導現實鬥爭，不斷探索着同中國實際的結合，即後來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8] 也一直參加和領導着各個領域的革命鬥爭。黨從成立之日起，雖然理論準備很不充分，卻立即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並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但由於黨的領導層，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缺乏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所以使黨在路線和政策上總是容易出現隨意性和片面性，不斷犯右的和更多犯「左」的錯誤。

以中央到達陝北時的情況而論，領導層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掌握大致分兩種情況。一是，部分人在蘇聯學了些馬列書本知識，但不了解中國實際，一回國就擔負起領導工作，因而只能跟着共產國際犯「左」的教條主義錯誤。經過幾年實際鬥爭的鍛煉和汲取犯錯誤的教訓，他們中的多數人已較快地走上理論聯繫實際的正確道路，還增強了免疫力，避免了此後再犯重大錯誤。不過他們在領導層中屬少數，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也沒什麼基礎。再一種，是更多的在實際鬥爭中湧現出的領導人和骨幹。他們一參加革命就捲入緊張的實際鬥爭，沒有時間和條件多學理論，更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例如毛澤東就說，「有三本書(即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特別深刻的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 此後在戰爭環境中也只能再讀點列寧、斯大林的小冊子如《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概論》等。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屬西方文化，這本身就增加了中國人理解的難度，還往往容易搞偏，發生誤解。加之文字的隔閡(翻譯成中文的數量很少)，更使黨的多數領導人和各級骨幹無法閱讀許多馬列原著，更不用說廣大黨員群眾了。所以在很長時期，可以說黨和紅軍(黨的主要力量所在)的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基本上還是處於小冊子階段，當然談不上做到完整、全面和準確。至於廣大的黨員幹部和群眾，多屬文盲和識字不多的工農。他們的參加革命和入黨，純粹出於反壓迫、求解放的純樸階級覺悟，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戰時期則是抗日救亡。中央進駐延安後，曾抽調一批有培養前途的幹部進黨校學習，其情況竟如李維漢所說，一些黨員幹部連「聽也未聽說過馬列主義」。[20] 1938年前後大批湧入延安的知識青年，像我們這類人，雖然讀過一些馬列和其他進步書籍，但確實極其膚淺，多數人並沒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真正的學習還是參加革命以後才開始的。還有一批理論工作者，過去在白區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社會科學戰線的鬥爭，但卻遠離黨中央的領導，對革命實際也不大了解，仍然需要重新學習和補課，使理論聯繫實際，更好地了解、掌握和宣傳黨的政策，以至對領導起點智囊參謀作用。

18 見毛澤東、張聞天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8–659、709頁。

19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20 李維漢：〈回憶中央黨校〉，《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頁。

延安前期的理論學習

上述情況說明，無論是黨的領導還是普通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上下一致的要求。但是怎樣學習呢？根據考茨基、列寧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在工人運動中自發地產生，工人群眾也不可能通過實踐就自然學到手，而必須讀書和聽講。[21] 正是根據學習馬列必須從讀書開始的原則，加之黨中央進駐延安後獲得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可以大辦各種學校和訓練班，培訓原有的軍政幹部和來自敵佔區或大後方的知識分子，也有可能較正規地組織在職幹部的文化和理論學習。於是在黨中央的號召和組織領導下，就掀起了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為了盡可能適應學習的需要，張聞天還親自主持和組織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其規模也屬空前，但因紙張和印刷條件的限制，仍滿足不了各地的需要。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更提出，「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22] 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些，更好一些」。[23] 這就把這次學習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且學習範圍也從延安擴展到各根據地和全黨。

幾年的學理論熱潮，幾乎把革命隊伍中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人們都以極大熱情、爭分奪秒地擠時間讀書、討論、記筆記。因此，不但個人爭書讀(因為終究書少，一些書留在誰手裏的時間是有限的，例如《資本論》第一卷普通幹部一人只能借閱兩個月，後面還有好幾個人排隊等着)，就是機關、部隊也扣書籍、「搶」教員，特別是敵後

21　參閱《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頁(《怎麼辦》一書中「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一節)。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56–757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3頁。

根據地。我就親自聽過朱總司令從前方回來不久講到的一些情況。他說：「前方學習中的困難首先是缺乏教師。去年鄧小平同志帶了兩個馬列學院的同志去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總部才派人換了回來。第二個困難是缺書本子。最近延安給山東送去了一兩百本《聯共黨史》，但他們只收到七本」。[24] 當時那種學習情景，六十多年後想起或同熟人談起，還有些心潮澎湃。許多人一生好讀書的習慣就是那陣子養成的。

這段理論學習，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在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共和國成立後的各條戰線上起到骨幹作用的整個「三八式」一代，就是在這次學習熱潮中培養出來的。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感受，而是許多同代人的深切回憶，都證明那是不可忘卻的歷史事實。例如單是我們抗大，截至1942年整風前，總校和各分校培養出的幹部就近十萬，百分之九十上了前線，沒有多少人願意留在後方搞學院式研究或讀書。[25] 即以被毛澤東視為教條主義大本營並迫使張聞天承認過去方針錯了的馬列學院[26] 而論，三年培養了八九百人，據朱鳳熙1982年編同學錄時的統計，除一二個敗類外，都在各條戰線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少人後來還成了高級幹部)。所以他的結論與毛澤東相反：「可見當年教育方針與實施的正確」。曾在馬列學院學習過的許多學員，無論知識分子還是老紅軍，也都在五十年後提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建立和確定自己世界觀的那個重要時刻，是在馬列學院度過的，這是幸運」(王惠德)。「我一生當中，真正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段蘇權)。「強調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對於理論修養底子很薄的我

24　朱德：〈在延安幹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上的講話〉(1940年6月)。

25　參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6　《張聞天年譜》下冊，第678頁。

們中國共產黨，是十分重要的」(雪葦)。[27]五十年後的回憶和總結，大家一致認為，那段理論學習，無論內容和方法還是事後的實踐證明，都是學用一致、密切聯繫實際的，並不是什麼被批評的教條主義。

與這次學習熱潮互相呼應、相互促進同時興起的，還有建黨以來唯一的一次社會科學大繁榮。[28]這首先表現在黨的領袖們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和時間，系統地學習理論，並結合實際，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最後昇華為新的理論。所以延安時期，是一個理論上出現飛躍和成果最顯著的時期。這不但出自領導層的集體努力，也得力於上下左右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影響。在這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就是一大批理論工作者來到了延安，發揮了教師和智囊的作用。例如毛澤東親自組織有蕭勁光、羅瑞卿等參加的「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就是請何思敬來翻譯和講授的。當時的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還表現為延安的學術組織和機構也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我所記得的就有：張聞天主持的《資本論》學習組，艾思奇任會長的「延安新哲學會」，王學文、王思華等人組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會，其他還有中國革命問題研究會、中國歷史研究會、政治工作研究會等幾十個。參加的人多是相互交叉的，其中不少人只是為了學習聽講而去。我個人就是毛澤東批評的那種啃起了《資本論》的十七八歲娃娃，17歲開始在抗大當助教，還參加過《資本論》學習組的旁聽。那時延安經常舉辦上大課(比較固定)、講演會和討論會(看到海報即可自由去聽)，有些人禮拜天竟可參加兩場。所以，當時的理論繁榮並不只是一批領袖人物和理論家們的事，而是帶有相當廣泛的群眾性。因為在那全民抗戰的大時代裏，共產黨員和一切先進的人們，特別是聚集在延安的熱血青年，都有一種追求真理的激情和濃厚的理論興趣。

27 以上所引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28 這是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會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談話。他的原話是：「從我黨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們的社會科學，只有一次大繁榮，這就是延安時期」。見《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頁。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見。

當時延安能夠出現這一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時期，除了處於民族覺醒(這是中國一次空前廣泛和深入的啟蒙)、全民抗戰這一大的時代背景外，還因為當時黨本身也處在一個生動活潑的時期。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實行着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重大問題都要開會決定，經常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在無法取得一致的情況下還會進行表決，沒有個人說了算的事。毛澤東雖然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已成為實際上的領袖，但在一個時期，黨還是保持了不突出個人的優良傳統，更未形成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黨內生活正常，強調發揚民主，保護少數，尊重不同意見。不但有「輕騎隊」之類的牆報，而且在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也可經常看到爭論的文章。在這種民主氣氛和寬鬆環境下，人們雖然過着清貧的生活，但都感到心情舒暢、精神飽滿，為追求真理而學習和進行理論探索蔚然成風。加之當時的延安已多少擺脱了內戰時期根據地受到嚴密封鎖、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有可能實行對外開放，外面的報刊書籍可以輾轉得到了，還和國統區以至美國等外國開展了一定的人員來往與學術交流。這不但有助於我們黨和解放區影響的擴大，而且也有助於我們自己視野的開闊和認識的提高。

延安時期的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是緊密相連的。正是在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基礎上才有了廣泛的理論探索和創新。所以這段學習，不只對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已處於各級領導崗位的工農幹部極為重要，就是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也都從中獲益匪淺，使他們能夠在結合中國實際的研究中做出重要的理論貢獻。特別是毛澤東，他利用這一相對安定的環境和較多的讀書時間，又可得到許多過去看不到的書籍，進行了廣泛的閱讀和深入的研究，寫出了大量有創造性的理論著作。正像《毛澤東傳》所說，「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為理論概括」。[29]可以說，正是這段學習和

29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497–498頁。

研究，才使毛澤東思想臻於成熟。他的一批理論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和《實踐論》、《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都產生於這個時期。而《新民主主義論》，應該視為毛澤東思想正式形成的標誌。毛澤東思想固然包含中央領導的集體智慧，但主要還是毛澤東本人的理論和政策。

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毛的領袖地位得到鞏固後，毛澤東認為原來那種學習馬克思主義熱潮和理論繁榮的局面需要加以改變，改為以他的理論和政策統一全黨的思想。這在1940年就表現得日益明顯，使得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不斷挨批，並設法緊跟。不只張聞天如是說，[30]我的一段經歷也可證明，這在過去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31]

根據毛澤東的想法，張聞天很快就對延安的學校教育和在職幹部學習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1941年春，他要找一個在抗大作教育工作時間較長的人了解情況，剛由抗大三分校改組成的軍事學院就推薦了我。從談話中可以體會到，中央改革教育的決心以至具體方案均已醞釀成熟。按照他的說法就是，今後學校教育可以不再學基本理論，主要學一些有關中國的情況和黨的政策，馬列主義要在實際工作中學習，因此在學校的培訓時間應該縮短，免得鑽到書本裏出不來變成教條主義。這只是大概意思，不一定準確。但是過了一個多月，就聽說毛澤東作了一個《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而印證了他談話的來由。

不過，事後的發展卻並非張聞天所談，改造學習只是個引子。隨着1941年「九月會議」中央政治局內部整風的「初戰告捷」，第二年春

30 見張聞天1943年的《反省筆記》。

31 如1980年寫的〈張聞天同志和研究工作〉，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憶張聞天》；1994年寫的〈我在遼東同張聞天同志的接觸〉，載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的《張聞天在遼東》，等等。

就開始了普遍整風，在民主氣氛、寬鬆與開放的條件下的學習高潮和理論繁榮時期也宣告中斷了。

整風中斷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熱潮和延安的理論繁榮時期

根據正統的提法和一些只是傳抄和附會的黨史著作，所謂延安時期，不但包括1942年到1945年的整風運動，甚至認為整風是延安時期的主要內容。在這種傳統教育下，人們看到這裏的提法自然會視作大逆不道了。但是，我們應當看事實，而不是背結論，否則還真成了教條主義。關於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不是抽象的「概括」），這裏只列舉以下幾點，做點簡單說明。

整風停止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

延安整風規定學習的文件中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這是前面一再講過的，問題還在於全面停止了馬列理論的學習。被稱為理論學習最高學府的馬列學院，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即一再改組，最後合併到了中央黨校。而黨校則根據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停止了過去規定的課程（馬列主義理論如哲學、政治經濟學等，中國和世界革命運動史，黨的建設），規定1942年內，學習黨的路線。[32]至於1943年和1944年，那更是進行緊張的整風和審幹（搶救），然後是繁重的甄別、總結，直到日本投降分配工作。總之，整風開始後再也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32 參閱〈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22頁以下。

特別是哲學和經濟學。其他學校和在職幹部也都一樣。以我們學校來說，1944年是領導和骨幹忙於進行甄別(搶救運動到了甄別階段已變成少數人的暗箱作業，而不是什麼「群眾運動」了)，廣大群眾就是學外文和勞動(時間大約各佔一半)，這樣直到日本投降後奔赴前線。總之，在整風期間，除高級幹部為配合路線學習的需要，選擇馬列著作的片斷或少數幾本小冊子(如為加強階級鬥爭觀念學《共產黨宣言》，為強調鐵的紀律學《「左」派幼稚病》的有關章節等)外，無論是學校還是在職幹部，都完全停止了系統的學習馬克思主義。至於普遍整風中的一般中下級幹部，則連那幾本小冊子也沒安排學習。

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

整風期間不只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乾淨些，起碼不用檢討。例如著名經濟學家王思華就帶頭檢討說，「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又把它『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說他教學生「啃《反杜林論》則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聯繫中國只是為「裝飾門面」，其實還「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來翻筋頭」，「只知背誦教條」。[33]甚至連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扔到了窯洞門外，曾被張聞天當作笑話。[34]一時間，馬克思主義幾乎和教條主義劃上了等號，連一些人做報告或講演都不敢再引證馬列，也盡量避免分一二三四。例如我就聽過《解放日報》總編輯楊松、總政宣傳部長蕭向榮來給我們做報告時，在特別適合引證經典作家話的情況下，總要笑笑說：我又要

33 見〈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載《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34 1999年2月26日劉英的談話。

引證兩句「教條」了。原來人們感到很缺的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無用而多餘，於是就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1945年春謝覺哉老人就說，「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35]近年有的研究論文也說，「反教條主義的空氣，使學習理論的風氣大大下降，廣大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幾乎都不學馬列了，學馬列『無用』論普遍存在。」[36]

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基本停止

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親自主持下，延安翻譯出版了大量馬、恩、列、斯原著，成為全國翻譯出版發行馬列著作的中心。1938年馬列學院成立後，還專門組建了一個編譯部，主任由張聞天兼任。另外，中央軍委也有個編譯局，和我們外語學校合在一起。毛澤東做《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馬列學院改組，撤消了編譯局，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編輯工作。雖然毛澤東有時也提一下翻譯馬列著作，中央書記處還於1943年5月27日做出《關於1943年翻譯工作的決定》。[37]但由於只限於口頭說說，即使形成決定，也缺乏具體措施，而且在學習馬列上歷來口頭說的和實際做的往往是兩回事，何況本年領導上主要抓的是搶救運動，這都註定了該決定只能最後落空。因為反對教條主義不僅反到理論工作者的頭上，也反對到理論書籍翻譯者的頭上。例如先前在國統區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柯柏年就受到批判(可見當時是普遍把書本知識當作教條的)，氣得柯柏年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了，雖經毛澤東親自勸解，柯柏年還是堅決不幹，後來就一直搞起了外交工作，所以跟我很熟。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七大講話

35 《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頁。

36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偏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42頁。

中說的，做翻譯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作別的工作」，[38] 其中所指可能就有柯柏年。實則根本原因還在於批判所謂教條主義用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後來的搶救運動更把知識分子，特別是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整苦了；除極少數得到重用的之外，他們大多被打入了「另冊」。所以毛澤東在七大講話中對翻譯工作口頭上作了很高的評價，但延安理論翻譯的繁榮時期經過整風已徹底結束了，延安也從此失去了翻譯編輯馬列著作在全國的中心地位。

有利於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的對外開放一時中斷

1941年到1944年，延安的對外交流與來往幾乎陷於中斷。這期間，延安同國統區還有點秘密渠道，但大量的來往已基本停頓；同外國人來往就更困難得多了，例如過去每年都有好幾起來訪的美國人，這些年就已完全中斷。這當然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加強了封鎖，但我們自己忙於整風搶救，停止對外聯繫和不願在全面戒嚴的情況下讓外邊人來視察訪問，也是重要原因。而且為了粉飾自己和應付參觀，還搞一套形式主義以至弄虛作假的招數。例如直到三年後的1944年7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21人訪問延安，我們就費了很大的勁，除打掃衛生等作表面文章外，各機關學校還要進行一點臨時訓練，由上面發下估計記者可能提出的二三十個問題，寫出標準答案，讓大家記住甚至背誦，以免答錯。那次沒來我們學校，我們算是白準備了。但其他被訪問者的答覆看來不見得效果就好。有的記者在報道中提到，大家的回答有點千篇一律且不自然。特別是對王實味的訪問，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作法，似乎被當作「優良傳統」保持了下來，以此應付上級的檢查和外來參觀。

38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

整風停止了一切理論學習和理論研究

整風開始後，無論是學校還是在職幹部，都已完全停止了原來的政治學習（即正常理解的馬列主義教育），只學整風文件，其實主要時間還是開會（對照文件）進行檢查交代、批評質疑和沒完沒了地寫反省筆記、交代材料。因為毛澤東規定，各人都得寫反省筆記和思想自傳，而且這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過了不久，各單位就又先後開始了肅反。特別是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的講話中批評了對敵特麻木不仁和提出要抓「第三個王實味、第四個吳奚如」之後，被稱作審幹運動的搶救運動就在延安普遍展開了。在這樣的氣氛下，誰還能顧得上學習理論？因為要學理論，起碼就得讀書。這是劉少奇當時還在強調的。他說，「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39] 可是在延安，這樣的環境和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

在輿論一律和萬馬齊喑的情況下，也是根本談不上理論繁榮的。以第一個《四三決定》為標誌的普遍整風開始不到兩個月，就發動了對王實味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批判，所有原來從事理論工作的人，連參加批判尤其是進行檢討都有點來不及，哪兒還有心思和時間進行研究？無論是報刊還是會議，很快就實現了輿論一律，已無從看到和聽到理論上的爭鳴。及至搶救運動發起後，延安更是一片蕭索，人人自危，不但失去歡聲笑語，而且已沒有什麼人再對理論感興趣，理論研究實際上完全停止了，哪兒還談得上繁榮!

按照多年來的正式說法，情況似乎恰巧相反，延安整風本身就不只標誌着理論繁榮，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創造性的理論和政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毛澤東思想已被定

39 〈答宋亮同志〉，《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19頁。

為全黨以至全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但這裏是預設了兩個很不準確的前提條件的。一個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似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書本知識）已經學到手，只是不用或不會用的問題。二是把斯大林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當作了馬克思主義活學活用的典範，而整風的目的正是使中共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是用斯大林的理論武裝全黨。這兩點合在一起，就得出一條結論：不要多讀馬恩著作了，只要着重讀一點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東西就行了，關鍵在於實用。毛澤東就說，「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40] 雖然毛澤東聲明這是故意挖苦教條主義者的，但實際情況證明這倒是實實在在的真實思想，不僅整風時，而且此後一直輕視以至鄙視讀書和書本知識就是證明。這又是後來堅持知識分子和一切幹部都要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思想根源。其實，對於馬克思主義這支箭是否已拿到手，老早就有人提出了質疑。[41] 實際上，這時黨的主要領導及其主要理論助手（或稱智囊）都沒有讀過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很難說已把馬克思主義這支箭拿到了手。因此射出去的箭就摻有大量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更多的是中國封建社會（包括農民起義）、斯大林專制主義以至民粹主義的東西。例如在整風中大搞無法無天的搶救運動，就決不能說符合馬克思主義。後來許多做法更與馬克思主義大相徑庭。所有這些，下面將作進一步的討論。不過這裏還得附帶說明一點，就是整風中採用的學習方法也不是解放思想而是束縛思想，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倒是帶有中國封建社會私塾那種填鴨式的死讀書的味道。例如往往一個文件要反復閱讀和討論一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幾乎可以背誦。那二十多篇《整風文獻》，就拖拖拉拉學了兩三年。這種

40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見《整風文獻》，解放社1949年版，第16頁。

41 例如王惠德在〈憶往昔〉一文中就談到，沒說「箭」是怎樣拿到手的，怎麼就連聲贊曰好箭好箭。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

號稱「少而精」的學習辦法，很容易使人思想受到束縛、禁錮和簡單化，妨礙個性的發揮、思路的活躍和境界的開闊。這也許正是領導上的要求，所以這一學習方法被視為好的經驗，一直傳了下來。至今這一反復學一個文件或「重要講話」的傳統，仍是政治學習的主要方法。

由此可見，延安整風不僅打斷和改變了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及進行理論研究的秩序和環境，而且還產生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後遺症。

延安整風對後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影響

延安整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學習和運用，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但是歷史地看，積極作用是短暫的，消極影響卻是長遠的、處在主要地位。長期以來對延安整風的那種全盤肯定，不但違背歷史事實，而且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災難。下面作為舉例，只着重談三個問題。

延安整風使學習馬克思主義之風日下，反而增加不少扭曲和誤解

上面說過，這是連胡喬木也承認的。[42] 古今歷史都一再證明，理論上的壟斷，是對理論繁榮的扼殺。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權的壟斷，則不僅限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且還會使它被修正和篡改，成為解釋者不正確的理解甚至只是他個人思想認識的宣傳。整風反教條主義的結果，使理論學習進入低潮，讀馬列不再是風尚了。雖然毛

4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澤東有時也指定幾本馬列著作為「幹部必讀」，但由於只是說說而已，並無具體措施，所以從地方到中央機關，幾次都落空了。後來更逐漸形成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各級幹部包括高級幹部，更沒有什麼人去讀馬列了（大約只是一些高等院校，由於照搬蘇聯，倒還有學馬列的課程安排）。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領導人，不學馬列，缺乏馬克思主義常識，對工作曾帶來極大危害。例如鄧小平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然而他（指毛澤東）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沒有按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法。」[43] 胡喬木也承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看法」。[44] 既然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其實，經濟是基礎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怎麼能不犯錯誤，怎麼能搞好經濟建設？這恐怕也是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界上落後了三十年，被周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遠遠拋到了後面的一個原因。哪兒能談得上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不學馬克思主義，但有些政策和做法卻又要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這就勢必出現一些歪曲和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提供一種方法，而不是現實的答案。事實上，由於時代的限制，馬克思主義本來就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設想帶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列寧就更不用說了。這都是不可苛求於前人的。問題在於，經過延安整風，我們已更不重視學習馬列，而只學毛澤東的幾本小冊子和各時期的中央文件，這才出現了上引胡喬木所說的現象。但老祖宗的旗幟（毛澤東連列寧、斯大林也都稱為不能丟的兩把刀子）又必須高舉，於是就把一些民粹主義的東西、中國古人的設想（如張

4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6頁。

4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08頁

魯推行的「義倉」、康有為著的《大同書》之類）和我們自己過時的做法（如供給制、游擊習氣等），也硬要和馬克思聯起來。這，作為思想，是更多的烏托邦；付諸實踐，最後必然失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就是鐵證。這裏再根據個人的認識，舉幾個曲解和誤解的例子。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對未來的社會作了許多設想，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十分科學和準確的。如果再加誤解，那就更屬「失之千里」了。例如馬克思提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45] 於是，我們就抓住「過渡」二字大作起文章來了。人家說是「從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卻要急着從資本主義很少發展的所謂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還批評那種「說中國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後來才逐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46] 實際上，我們說的過渡是名副其實的「窮過渡」，和馬克思說的過渡是兩回事。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經濟愈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47] 他談的過渡是不顧生產力發展，主要指所有制的轉變。他以人民公社為例說，最主要的就是要實現「從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轉變」，並預言，「將來人民公社從公社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我們就比蘇聯先進入了共產主

4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第21頁。

46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清樣本上冊，第87頁。

47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見《毛澤東大觀》，第633頁。

義，就會同赫魯曉夫的意見分歧大起來，發生所謂「對表」問題。[48]要知道，當毛澤東帶領幾個秀才在杭州這樣想入非非、坐而論道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每日餓死數萬（單是四川一省，按官方統計，到1960年底已死了整一千萬）的人為「三年困難時期」。後來，他竟發現經濟發展的危險，即「富則修」。「因此，毛澤東同志認為，由窮變富就要變成反革命。同樣，……知識越多越反動。」[49]所有這些，不是對馬克思的曲解又是什麼？

我們還可再以《哥達綱領批判》為例。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後譯權利），是指按勞分配中等量交換的原則，完全是在抽象意義上說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已經講得有點偏。到了毛澤東，理解與馬克思就離得更遠了。他把按勞分配中等量交換原則體現的「資產階級權利」誤解成按勞分配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性的權利，說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跟舊社會差不多。[50]而且早在1958年，他就曾一度主張恢復供給制，贊成吃飯不要錢，所以對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頗為欣賞。[51]

類似案例還可舉出許多。這都說明，延安整風造成了一個錯覺，不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是由於認為已經掌握了，問題只在運用和發展。但是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許多問題，包括它的一般知識，特別是基本原則，都並沒有搞清楚，所以理解和實行的就自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了。

48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清樣本上冊，第77–78頁。

49 〈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1頁。

50 毛澤東1974年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時的談話。

5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447頁。

只學斯大林，也為共和國成立後一切照搬蘇聯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於延安整風，多年以後毛澤東曾一再說，「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52]其實，這只是黨史上常見的事後諸葛亮的說法，但卻沒有看到任何能拿得出來的證據。同這些事後的說法正好相反，當時的延安整風主要是學蘇聯的，不但公開提出以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材料，而且在當時完全保密的西北局高幹會上，毛澤東連續兩天的報告還是講解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12條。而對整風宣佈的宗旨也是要把黨建成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高層整風還是普遍整風，學的都是斯大林理論，這是我們在前面一再說過的，而且有《整風文獻》為證。那麼，是不是在內部極小範圍的整風中指名或不指名地「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事，連一點點暗示也不會有。任何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當時還不可能有這種認識和膽量。實際情況相反，當時中央主流和非主流各方都要盡量把自己說成是忠於斯大林和擁護共產國際的，把批判對象的擁護說成是假的，甚至把「國際」也分成「真假」兩種，[53]並用斯大林的教導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批判所謂教條主義宗派。例如1943年12月1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文件中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

52 〈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維塞林諾夫等人的談話〉，1956年9月24日。

53 這是周恩來在整風檢查中的提法，是既不能否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估計和指示有錯誤，又不能批判和反對共產國際，於是發明了這種「真假」兩個籮筐，錯誤的就可裝到米夫之流的「假國際」籮筐裏，仍然保住了「擁護國際」的立場。這當然談不上批判國際的教條主義。

和語錄。[54] 28日書記處和政治局又分別發出《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的指示》和《關於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都在於說明，王、博們的活動「是違背前共產國際方針的。現在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路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中央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55] 這只是順便舉個例子。實際上，延安整風中不但上面沒有講過，下面也根本沒有感到有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意思。幾十年後翻過來的說法，自然舉不出任何根據，只能證明個人迷信影響之深和輿論控制之嚴。按我們這些普通幹部的真實思想情況，和這些事後說法相反，經過延安整風，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對斯大林的崇敬(他死時，全國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沉痛悼念就是證明)和對蘇聯經驗的嚮往，更加堅定了把中國變成蘇聯的決心。

說「整風是整蘇聯的風」，是「破除」「把蘇聯經驗神聖化傾向的偉大思想運動」，不但完全不符合延安整風的學習內容和從上到下的思想狀態，而且和我們在革命和建設中一直照搬蘇聯經驗是相矛盾的。既然那時就已「破除」了對「蘇聯經驗神聖化傾向」，為什麼後來還一切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實在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不只共和國成立後一切學蘇聯，在整風中就已盡可能地在以蘇聯為榜樣。這是我們當時在延安親身體會和親眼看到的。例如1938年前後延安那種生動活潑的局面，「首長」現象並不明顯，人們星期天常在街上遇到中央領導同志，晚會上可以「拉」包括朱德、毛澤東等領袖們唱歌、出節目，等等，整風以後這些現象就完全消失了。這除了整風搶救造成的緊張空氣外，還由於任弼時出任中央秘書長以後就從蘇聯搬來了一套包括政治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級制度、領導幹部的警衛制度等規矩。從此，除開會外，在街上已再碰不到中央領導人，更不用說隨便談話和請簽

5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11–135頁。

5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43頁。

名、題字和拉唱歌之類以前常見的事了。這大概是沒有哪個老延安能夠否認的。至於大的方面，特別是黨的建設和組織生活，也是盡量向蘇共看齊，連書記處的改組也以蘇共為榜樣。1934年蘇共十七大後，為了便於斯大林的控制，書記只剩下四個人，即斯大林、卡岡諾維奇(編按：Lazar Kaganovich，斯大林的主要夥伴之一，由於他在執行斯大林的命令時冷酷無情，被稱為「冷血拉扎爾」)、基洛夫、日丹諾夫(編按：Andrei Zhdanov，斯大林得力助手，主管意識形態)。由於基洛夫擔任列寧格勒市委書記，而且不久後遇刺身亡，所以實際上書記處只有三個人。1943年我黨中央領導機構調整後，書記處也只剩下三個人：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而且乾脆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其餘兩人只是主席的助手。[56] 從此，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六屆七中全會後還是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在黨內外就行使他的「決定之權」了。所以共和國成立後曾兩次批評劉少奇和楊尚昆說，「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57] 在這裏，黨的紀律已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服從一人了。不僅在中央權力向書記處集中、書記處又賦予第一把手決定權上，中共完全按蘇聯的模式辦事，而且也正是從延安整風起，毛澤東開始以中國的斯大林自況。對延安整風、對毛澤東思想真正稱得上權威的胡喬木就曾說，「而蘇聯的那種模式，確實對中國黨影響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不說中國的列寧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58] 胡喬木還直截了當地說，「延安反教條主義對斯大林的一套體

5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54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3頁。

5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頁。

5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

系沒有批判，對斯大林建設黨、領導國家、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理、方法沒有批判。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59] 由此可見，那種關於延安整風是批斯大林、是破除崇拜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的說法，是多麼不真實。而有些自認為喬木胡繩學派的黨史研究者又只是師承了他們不夠實事求是的一面。

正是延安整風掀起的全黨學習斯大林理論，把《聯共(布)黨史》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認定「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奠定了我們建黨、建國照搬蘇聯模式的基礎，使我們走了極大的彎路，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至今影響仍嚴重存在。

中共自身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優良傳統也遭到損害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在俄共的幫助下成立起來並接受其直接領導的，因此受俄共及其指揮下的國際共運的影響很自然，而且非常之大，在某種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這是無須多講的。但中共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不能不帶有很多中國的印記和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值得強調的是，建黨初期的一批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等，對此都有比較清醒的一定認識，所以從一開始就注意汲取西方的先進思想和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學習馬克思主義，從而培育出了一些好的作風和傳統，為中國黨開創了毛澤東所稱的第一個生動活潑時期。這些好的作風和傳統，可以簡要舉出以下幾點。

一是充分發揚民主，反對個人獨裁。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領導後，即明確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採取黨魁制，如孫中山之任國民黨總理那樣，而採取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選一個書記來負聯絡之

5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7頁。

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權力不應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指出，委員制，遇事公決，不但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絕個人獨裁和官僚式的流弊。他雖然自視極高，脾氣很倔，但也經常警惕大家因對他的尊敬和畏懼而不願或不敢提不同意見，所以在1924年5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還特別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決於他的意見，難免發生偏差，要求會議予以糾正。李大釗的民主作風更受到黨員們的一致好評。[60]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雖然黨處在白色恐怖中，但他仍再三強調要擴大黨內民主生活，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號》中指出，「黨內生活只有家長式的命令和機械式的服從」，是領導人犯錯誤的「組織上的根基」。在另一《通告》中還提出「反對封建社會的遺習，因為中國黨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很容易流於首領個人的獨裁形式」。[61] 這也確實為後來的事態發展所證實。

二是與民主有關的自由討論作風。陳獨秀已認識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不但不可能避免，且不應避免，有時還是萬分需要」。[62] 在這方面，瞿秋白的態度更開明，早在1927年2月就批評那種不准討論政治問題的諸多「不准」，「不准說，不准問，不准討論……」的黨內消極紀律。[63] 他在1928年7月起草的六大《決議案》中還正式規定：「秘密條件之下盡可能地保證黨內的民主主義；實行集體地討論和集體地決定主要問題。」六大通過的黨章中也專門增加了如下內容：「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64] 而且事實上，那個時期不僅黨的會議上經常有爭論(六大就有激烈的爭論)，

60 以上見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11期。

61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378頁。

62 陳獨秀：《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1927年3月6日)。

63 《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頁。

64 《六大以來》(上)，第12 頁；(下)，第7頁。

而且在黨的報刊上也總有不同意見的文章發表，討論各種重大問題。大家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就說過，「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65]馬克思寫、登在《馬恩全集》上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就是批評輿論一律的。他寫道，「你們並不要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66]

三是與民主和自由都有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早期黨的生活中，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公開進行的，黨員可以在黨報上公開批評領導包括總書記。當時就有不少人(如瞿秋白等)著文批評陳獨秀。而黨的領導既可作辯解和反批評，也常進行自我批評。陳獨秀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就公開講過，「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同時他也指名批評了張國燾、鄧中夏。[67]當了第一把手，就「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現象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四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延安整風後的黨史編纂學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向後推了十多年，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受個人崇拜的影響。其實，建黨後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就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李大釗很早就已提出，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68]黨的一大，陳、李因故未能出

65 恩格斯1889年12月28日給格爾桑•特利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第471頁。

6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頁。

6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72頁。

68 轉引自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11期。

席，大會通過的黨綱只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69]陳獨秀主持中央工作後，對中國現存階級和政黨以及經濟政治狀況進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民主革命基本綱領，為二大的召開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論準備，使二大《宣言》正式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70]參與二大《宣言》和《決議案》起草工作的蔡和森也曾說過，要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形成自己的理論」。[71]可見，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理論聯繫實際，並非六屆六中全會或延安整風中的建樹。至於密切聯繫群眾，黨的創始人在建黨前就已注意和實踐起來。例如陳獨秀1920年就來了個創舉，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編成《勞動節紀念號》，請了16個人題字，既有孫中山等7位名人，還找了9個名不見經傳的勞苦工人。李大釗親身參加群眾鬥爭，多次在反對軍閥的遊行中衝鋒在前，更是早已出了名的。中國黨創建後的迅速發展壯大，是同這些領導人確立和奉行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分不開的。

五是嚴格保持清廉自律作風。1926年8月4日，陳獨秀親自簽發了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反腐文件:《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敗分子》，內稱:「一個革命的黨若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的黨陷於腐化，不但不能執行革命的工作，且將為群眾所厭棄。」[72]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性，陳獨秀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同時，他和李大釗等人還以身作則，長期過着清貧的生活。他放棄了大學教授的優厚待遇，一心撲到革命工作上，生活十分清苦，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而且還是一個硬漢，從不開口向人要錢。李大釗作為教授，收入不菲，

6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3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86頁。

7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61–66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100–102頁。

71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376頁。

7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82頁。

但他多用之於革命事業和接濟他人，自己卻常有斷炊之虞。他犧牲後得到的社會評論是：「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後則一貧如洗，棺槨衣裳，皆為友助。」[73]

最後再提一點，就是我們黨有一個延續了二十年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

上述這些優良作風和傳統，經過延安整風，都被嚴重削弱以至破壞了。第一，關於發揚民主，以我個人感受而言，整風前還真有點民主生活的體會，整風後就再感覺不到什麼民主了，有時也參加選舉，但基本流於形式。至於個人獨裁，這是人所皆知，不用再講的。第二，關於自由討論，整風後即為輿論一律所代替，連黨代表大會的發言都要事先經過審查批准，瞿秋白批評的「不准」倒是「與時俱進」，越來越多也越嚴。第三，整風後已沒有人敢於批評毛澤東(開頭還可提點不同意見，後來也不行了)，他自己又宣佈是不下「罪己詔」、不作自我批評的(那種空洞的承擔責任當然算不上)，而對有些人的批評則實在是殘酷鬥爭、徹底打倒。流風所至，只有上級對下級的批評，很少下對上的批評，特別是第一把手不能碰。第四，説的和做的越來越分家，毛澤東本人的脱離實際和脱離群眾更是寫到黨的歷史決議中了。第五，關於清廉作風，延安整風時就已從蘇聯搬來等級制，嚴格的保密制和警衛制等，背離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提倡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強調的巴黎公社原則——「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及為此而採取的有關措施。[74]這個變化雖然有個過程，但最後還是變了，而且首先從黨的領導變起。例如在「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的三年困難時期，各地為領袖所修豪華別墅之多，恐怕古今中外都是少見的。最後，關於不突出個人的傳統，大

73 轉引自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11期。

7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第335頁。

約從1940年起就開始被打破。這一年不但出現不少歌頌和學習毛澤東的文章，還辦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和「澤東日」。及至整風運動開始，「紅太陽」、「大救星」、「萬歲」等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稱呼和活動就日益普遍和升溫了。

提出上面這些問題，是為了説明，延安整風不僅沒有學馬克思主義，而且整風的結果還導致實踐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現在有些研究黨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等理論的人，過分注重書本材料和言論，而不去了解當時的實際，更不願把有關言論和當時實際相對照，只是紙上談兵。例如寫毛澤東如何講民主，善於聽取不同意見，根據無非是毛什麼時候説過關於民主的話。有的還舉例説，在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和任弼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不但未影響關係，反而更增加了同志之間的感情」。[75]這顯然是屬有傾向性的想像，提不出任何「增加」感情的根據。但人們卻知道，爭吵後，任弼時的「支隊司令換成恩來同志」。[76]其他還有什麼毛澤東和文化人包括蕭軍、丁玲等交朋友；毛澤東如何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幾被消滅殆盡)的友好相處，等等，實在都是莫大的諷刺。如果光看言論，那斯大林也許是最反對個人崇拜和阿諛奉承的。你看他在聯共十七大的報告中對那些只會講空話和向上討好的人挖苦得有多厲害。另外，從言論中還可看出斯大林非常重視自我批評，是個很謙虛的人。然而實際情況卻都恰恰相反。何況我們和斯大林還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對過去的講話和文章採取「與時俱進」的做法，按後來的思想不斷加以修改。至於那些用現在的認識去編寫多年前的《回憶錄》，就更不用説了。甚至搞文字獄的專家乾隆皇帝也冠冕堂皇地聲明，「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大清律例》也無「以文字殺人」的規定，但卻有「詩文書札」

7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50頁。

7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0–71頁。

「顯有逆跡」和有「確實悖逆形跡者」，治罪。光看表面文章——公開言論和書面規定就下判斷，行嗎？

這就是為什麼在討論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時要談一些實際效果的原因。這也是試圖從理論聯繫實際的角度看延安整風是否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倒不是「離題萬里」的發洩。

第十章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之一
——關於搶救運動的評估、資料和一些提法問題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一直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比中央蘇區抓「AB團」還要嚴格。因為抓「AB團」後來一般都把責任推給尚未成立的「左」傾中央和並不存在的王明路線（即使按許多黨史書上的說法，也是大抓「AB團」後的四中全會上才出現所謂「王明路線」），[1]但搶救運動卻無法可推，只能乾脆不提，因為不但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等人，連康生在生前也是沒人敢公開提的。例如被稱為中共黨史奠基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就根本沒有提這個作者胡喬木自己也說是搞了兩三年的搶救運動。[2]有些文件和文章如果提到，也說成審幹運動（至今還有審幹工作擴大化這種不通的提法[3]），或只把中間一小段說成「搶救運動」，而且都要強調審幹運動方針的正確和取得的偉大成績。其中最權威的，當數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所做的如下評價：「延安的審幹運動，中央定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審幹運動把許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清查了出來，純潔了革命的隊伍，在組織上保證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這個成績是很大的，是應該加以充分的估計的。」同時指出，「這個運動第一階段發動群眾，第三階段甄別工作，都是做得對的，只是中間一段即第二階段的『搶救運動』，是有偏向的。」「當時所以犯這個錯誤，除了有些幹部主觀上有『寧左勿右』的錯誤思想以外，也有客觀原因。」如：「當時我們沒有全國政權」，「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用發動群眾的方法」來肅反「還缺乏經驗」

1 反「AB團」可分兩個階段。頭一段為1930年至1931年初四中全會後，由毛澤東主持。第二段1931年4月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江西蘇區，此後即由中央代表團領導，毛澤東配合。

2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51頁。

3 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頁中寫道，「對審幹工作中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審幹是每個幹部都應審查，並且經常進行的，因而談不上什麼擴大化。

等。[4]現在看來，這個評價並不妥當。第一，關於「九條方針」是否「完全正確」，下面還要專門討論。而且蔣南翔早在1945年3月的書面意見中就提出了批評。中央組織部1985年已為他徹底平反，指出他的書面意見和在七大小組會的發言，「不但符合組織原則，而且內容也是實事求是的」。[5]第二，對審幹運動成績的估計不夠實事求是。因為實際上並沒有清查出幾個反革命分子，連1947年在晉西北被處決的王實味和藺克義都是冤案。至於說沒有搶救運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就缺乏組織上的保證、就勝利不了，事實證明也許正好相反，只能說它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第三，把犯錯誤的原因歸於客觀，責任完全推給下級幹部，根本不合乎事實。然而這個評價卻保持了幾十年，至今仍在起著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搶救運動的禁區也打開了一條縫，露出了一部分真實情況，也可以在一定範圍進行討論了。研究和討論比較活躍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只是後來才逐漸趨於沉寂。而且總的看來，即使較活躍的那陣，也不能說對延安整風特別是搶救運動設的禁區已經解除，例如重要檔案就繼續嚴格保密。但是無論如何，經過那段撥亂反正，搶救運動已不再是秘密，正式的黨史著作都不能不提到，人們也可以進行一定的研究討論了。雖然仍舊把關很嚴，卻還是暴露出不少問題和引起一些爭論。為了便於後面的討論，先根據接觸到的有關搶救運動的論述，談以下三個問題。

4 轉引自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

5 吳學昭（蔣南翔夫人）：〈韋君宜在「群花」中遠行〉，《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

關於搶救運動的評價

一般說來，主流黨史論著和民間研究成果（其實，有些關於搶救運動的書籍和文章，只是互相傳抄，談不上研究），除了極少數例外，關於搶救運動的基本說法都是一致的，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輿論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敍述詳略有些不同。這些共同特點主要是：承認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中主要為康生造成的一個錯誤；但只是一個支流，且時間很短，即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並糾正；同時為維護延安整風的正確和領袖及其他領導人的威信，對搶救運動盡量淡化，重要內幕和詳情實行嚴格保密。既有這些（或許還有別的）無形規定，自然就很難做到實事求是。不過在這幾條規定的框架內，有些問題似乎還可討論，因而也就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後來的正史敍述和評論，一般都採取輕描淡寫和簡化的辦法，並且要說明審幹（肅反）運動的必要以及方針和結果的正確；跟某些所謂民間著作不同的是，沒有把責任全部推給康生，也承認對敵情估計有些過分嚴重。除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完全回避了搶救運動外，撥亂反正後出的黨史書一般都會提及。比較標準的提法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全書574頁，講延安整風不到7頁，對涉及全黨和黨所領導的幾乎所有地區的搶救運動用了還不到半頁。說是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了搶救運動，「在十餘天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中央及時作了糾正，「這個錯誤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6] 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共836頁，談延安整風只有8頁，涉及搶救運動的半頁，精神與內容和胡繩說法大致相同。其他一些領袖的文集和傳記如《毛澤東傳》、《劉少奇傳》等和他們的《年譜》，也都詳略不同地稍有涉及，但都不出上述的原則和精神，而且特別明顯的是盡量簡化和多有掩飾。這點下面還會談到。

6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3頁。

民間論述，包括許多人的回憶錄，雖然各有千秋，但出圈（違背上述框架和原則）的也不多。只是更多地把責任推給康生，描寫和敍述更生動具體，還揭示了一些歷史上回避的問題，但編造的成分也更多些，特別是一些所謂回憶錄和「演義」式的黨史著作。當然，對搶救運動持獨立看法的黨史著作也有，這裏只簡單提一下有代表性的兩本。一本是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7] 對搶救運動只是附帶談到，所佔篇幅很少，敍述還比較客觀和真實，沒有夾雜多少主觀成分，雖然也多少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但不那麼明顯。另一本是高華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本書的特點（這裏只談有關搶救運動部分，其他不論）是，查閱的材料多，用了很大功夫；未受上述框框的限制，有更多自己的看法；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和被忽略的問題。應該說，本書對了解和研究延安整風頗有參考價值。但也有些片面性，例如過分強調毛澤東個人的肅反情結，而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和有關的國際因素重視不夠；特別是由於作者只是從書本到書本，所以不免有主觀臆測成分，一些事實也自然不夠準確。值得一提的是，前一本書還能在內地出版，後一本書就只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了。

對於遍及延安和邊區及其他許多抗日根據地前後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究竟屬什麼性質，過去討論還不多。但也有一些著作提到，認為在我們黨有了地方政權後就一直存在一條肅反上的極左路線，直到「文化大革命」，搶救運動只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表現。這當然是毛澤東和正式黨史所不承認，並極為忌諱的。所以陳毅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批評整風和搶救運動，就曾引起毛澤東大發脾氣，受到痛斥。其實，陳毅當時只是輕微地提了幾句說，「在延安整風時，有人整老幹部就整得很凶。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現在還有意見。挨

7 此書在以前的各章中曾多次引用，在此不再詳述。

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也挨整了嗎？」[8] 何況黨史界現在已從過去濫用路線的極端走向主張一概不用路線的另一極端，這就更不能說搶救運動是路線錯誤了。但鄧小平在講「十次路線鬥爭」中有好些次算不上，卻也沒有否認以往的肅反曾經存在過一條錯誤路線。而且毛澤東在搶救運動中就已提到「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錯誤路線是：逼，供，信。」[9] 對此，至今也沒有人否認過，官方黨史著作為了說明「九條方針」的正確和毛澤東反對「逼、供、信」，也還在經常引證。但是，事過境遷，毛澤東卻改變了說法。在1944年10月25日的報告中的提法是：「『搶救運動』有錯誤，錯誤是誇大了問題方面，但不能說是路線錯了。」[10] 這就同以前說的「錯誤路線是：逼、供、信」相互矛盾了。其實不管毛澤東怎麼說還是黨史書上怎麼寫，了解情況者還是心中有數的。1944年北方局黨校搶救運動中整人的與被整的幾位老同志，1983年12月24日在一起的議論就是證明。當楊獻珍向劉建章道歉後（楊在搶救中曾動手打過劉），劉就說，「當時發生的錯誤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個人之間不存在什麼恩怨，那完全是一種『左』的路線造成的。」在場的張策接着說，「回顧我們黨幾十年走過來的歷史，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線，對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的危害，尤為慘重。」[11] 連師哲都說，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是「一條錯誤路線」，只是認為是由康生「推行」的。[12] 總之，搶救運動是「左」的路線錯誤，不論是否承認這一定性，都不能改變那個黨史階段發生過的事實。猶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不管你承認與否，都

8 仲侃：《康生評傳》，第210頁；《陳毅年譜》，第1184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566頁；紀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記〉，載《歷史在這裏沉思》（2），華夏出版社1986年。

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48頁。

1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53頁。

11 蕭島泉：〈楊獻珍的自責與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12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

是一場路線鬥爭，而不是「階級鬥爭」，只是鬥爭結果極左路線佔了上風。

最近聽到一位黨史工作者說，她訪問過的歷次政治運動參加者，往往聽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運動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總要強調運動的必要性和成績，而把錯誤和缺點看得輕一些。被整者則相反，總是強調錯誤而看輕以至否認成績。這被人們視為一般「規律」，奠定爾後一切政治運動模式的延安整風搶救自不例外。由於延安整風中創立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一直佔統治地位，因此對整風搶救的評價就只能以它為准。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著書立說回憶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就多是一些領導幹部和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而且黨史界也多將其作為第一手的正面材料加以引用。至於在運動中挨整的、被搶救的、蹲過保安處、西北公學班房的，一些人在共和國成立後還成了領導幹部，但是很少看到他們對整風特別是審幹搶救所寫的回憶，大多保持緘默。原因是不難想像的。

其實，這個「規律」能否成立，倒也不一定。例如對搶救運動始終持否定態度的中央領導同志中就有周恩來、張聞天等多數人，只是他們當時說話的作用不大，事後也不便提起。就是積極分子和骨幹，對搶救的評價也不盡相同。例如1935年入黨，曾是「一二•九」運動領導者之一的蔣南翔，當時主持中央青委的整風和搶救，本人並未被搶救，但卻出於一個共產黨員的公心和知識分子的正直，還在運動尚未完全結束的1945年3月就忘身進諫，向劉少奇並中央寫了〈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很難得的是，他那時就能點名批評康生並對搶救提出十分尖銳的意見，如說青委的搶救是「石子裏榨油」，「根本失敗」；說搶救中的「群眾路線」是「瞎子摸魚」、「亂做鬥爭」；說搶救是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說搶救暴露了黨的領導上「存在很嚴重的弱點」，缺乏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說搶救產生了許多消極因素，包括造成同志間

的隔閡等，事後領導上的解釋並沒有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說搶救期間幾乎停頓一切正常業務，「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等等。[13] 又如批鬥王實味的積極分子溫濟澤，在被改正錯劃「右派」後，不但竭力促成王實味的平反，還發表了一些跟中央不同的意見，批評關於「九條方針」的中央決定對敵情估計過火，認為搶救運動不是什麼「支流」，「而是一次爆發的山洪」，是在提倡「實事求是」的整風中幹出的「不『實事求是』的壞事、蠢事」。[14]

當然，現在已沒有人敢再否認搶救運動的錯誤了，但對錯誤的性質、程度、因果、責任等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正式黨史著作和許多當時的積極分子至今對搶救運動的論述和評價，就同蔣南翔、溫濟澤、韋君宜[15] 等人有根本的區別。例如現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在事過半個世紀的1991年底發表的一篇〈回憶延安整風〉的文章，談到搶救運動就很不實事求是。如說，「毛主席的『九條方針』」「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說「甄別工作一直到七大前後才結束，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審查者向被審查者『脫帽鞠躬，賠禮道歉』，實現了同志間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16]

可以說，這裏沒有一句話符合實際。關於「九條方針」及其是否解脫了被審查者等問題，以及文中所提壞事變好事，「沒有『搶救運動』，恐怕就沒有九條方針」的說法，下面還要做些討論。這裏先指出一點，即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不太久才做了兩件重要的平反工作。一件是1982年2月中組部作的《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

13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4 《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頁。

15 見韋君宜著《思痛錄》，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頁。

16 《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17] 一件是全國上下特別是學界、文藝界幾乎無人不曉的王實味一案。先是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在注釋中修改了以前對王實味的無據罪名，說「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據查，不能成立。」[18] 後來就是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的《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宣佈為他「平反昭雪」。[19] 僅據此兩例，人們就可以看到，上引《回憶延安整風》中所說的不實。因為既然「沒有一個同志受冤屈」，「全都作了符合實際的結論」，那還搞什麼平反和昭雪？而且還應特別說明的是，恰巧王實味和「五人反黨集團」兩案，正是《回憶延安整風》作者親自參加批鬥的(所謂「大會一起開，小會分別開，連續開了七十二天」)，文中對王實味等有關問題也有詳細描述。既然如此，怎麼能得出上述那樣絕對化的結論呢？是否仍然認為整風中對王實味、陳傳綱(未等及平反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處理是「符合實際」、並不「冤屈」的？因為無論是作者還是組織和整理這篇回憶的單位《黨的文獻》編輯部，都不致忽略三中全會後對延安整風搶救中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其中也包括中組部1985年給蔣南翔上述《意見書》的平反。問題還不在於這些具體案例，更重要的是這篇《回憶》反映了黨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因而受到重視。例如作為正史的《毛澤東傳》在《整風運動》一章中就有三處引證，[20] 成了除毛澤東本人外，被引證頻率最高的一個文件。而被中組部在平反決定中肯定為「實事求是」的蔣南翔當時的《意見書》，卻無一處引證，別的黨史著作和主要領導人傳記也沒見到引證過，可見其不受歡迎。這也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權威的黨史界對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的評價。

17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頁。

18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6、890頁。

19 《王實味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

20 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39、654、666頁。

對於已經過去六十年的搶救運動，是應該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了。無論從當時情況還是六十年來的實踐檢驗看，搶救運動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場自己人把自己人當敵特整的大混戰，收穫極小，損失極大，沒有抓到什麼敵人，自己卻有一定傷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殺或被逼瘋、致殘，包括搶救中自殺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鳳平等），特別是造成人力、物力、時間、精神的巨大浪費，還為以後許多運動開了不良的先例（有些完全是依樣畫葫蘆，如某些地區在共和國成立後的肅反和「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如果認為這種估價錯誤，那就請有關單位和權威機構公佈一些早應解密（其實並無密可保，主要還是為了掩蓋錯誤）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抓到幾個真特務、姓甚名誰；假坦白者及其檔案的處理；搶救中的傷亡和致殘情況；搶救運動耽誤了多少戰鬥、工作和時間，等等。有關搶救運動造成的損失和影響，下面還要加以討論。總之，搶救運動已經事過六十年，現在不應再由於「為尊者諱」，而對實際情況和史料加以遮掩，也不必只作沒根據的斷語結論，而應趁着參加過搶救運動的還有許多人健在，由有關單位組織和進行真正實事求是的總結，以便汲取教訓，也對那段重要的歷史作一個交代。這當然就要開放禁區，放鬆在檔案資料、發表權利和觀點看法上的壟斷，允許不同意見在平等條件下的爭鳴。其實，這點希望恐怕在相當時期還辦不到，因為要維護延安整風創建的政治體制和思想原則，對意識形態的管制是不會放鬆的。這從對史料的使用和處理上也可看出來。

研究和討論整風搶救所用資料問題

對所用資料必須去偽存真

在研究工作中常聽到的一句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那麼整風搶救的第一手材料是什麼呢？按理，主要應為：有關整風搶救的檔

案，包括正式文電，會議記錄等；當事人的見證；人們當時所寫材料，如表格、自傳、日記、建議，以及證明、交代、申辯、控訴等。其實這些所謂第一手材料中，假的就不少，特別是個人填寫的表格、寫的自傳，以及檢舉證明和坦白交代等。我們上面論及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時，尚且提到許多不夠實事求是之處。我也多次聽到過一些領導人如周恩來、陳雲等的過頭檢討。那時才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小幹部就更不用說了，在整風搶救中許多人的坦白交代和檢舉證明，完全是瞎編的假話。我自己就曾犯過嚴重錯誤，一度為了過關寫了承認是特務的假材料，雖然清醒過來後又很快推翻，但仍是「鐵案如山」，被放進檔案袋。除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以外，就是中央文件和重要會議記錄，同實際情況也有很多不一致。所以即使對這樣理解的第一手材料，在引用時也有個去偽存真的反復對比和調查研究過程，千萬不能以為當時文件或記錄上怎樣寫，實際情況就是怎樣。例如，文件上寫明「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說了四十多年，結果證明完全錯誤。因為說「托派」，還多少有點影子（本人早已交代清楚），說成「國民黨探子」就只能是毛澤東的主觀推斷了。

一些人幾十年後寫的《回憶錄》和對當時運動的領導幹部或骨幹的訪問記，能不能算第一手材料，恐怕很難算，即使算，可靠性也是大成問題的。我們在前面曾提到過，列寧就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因為寫回憶錄的人總要把自己說得好些。董必武老人對回憶錄所說，除了前篇引的「回憶因為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時間距離又長，特別是「難於擺脱現在的思想」等以外，他還接着說，「兩個人回憶同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憶的結果就不可能一樣。」[21] 可見回憶錄上說的東西不一定可靠。但是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卻掀起了一個領導人和名人寫回憶錄的熱潮，而且至今不衰。據我所知，除極個別領導同志如李一氓以外，多數領導人都是組織一個少則兩三人多則幾十人

21　李劍主編：《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冊）〈前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

的班子，幫他查找材料、執筆整理，在既無詳細日記又無紀錄更無錄音的情況下，竟然可以對三五十年前的事寫得生動活潑、有鼻子有眼以至大量用帶引號的對話。這只能是按照當年歷史的大致情況和現在的思想認識，共同編造出來的，其真實性，可想而知。然而由於是應運而生，還真派上了用場，許多正式黨史出版物，特別是領導人傳記，也按其「所需」在大量引用。例如《聶榮臻回憶錄》談遵義會議的一段，會前醞釀和會議期間竟然沒有張聞天的名字，有的倒是「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能是歷史真實嗎？可就是這樣的「回憶」，竟被作為正式文件列入《遵義會議文獻》。[22]這只是順便提到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帶有明顯編造和炫耀性質的所謂《回憶錄》，真可謂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這本來是古今通例，原不足怪，問題就在於對這類歷史資料如何看待和如何使用。中共黨史研究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還真有它的特色。

延安整風創立的中共黨史編纂學，對黨史設置了一個比較固定的框架和原則(如上面列舉的幾條)，不但史實的研究論述，而且史料的取捨使用，都得合乎這些框架和原則。不但頭幾十年，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曾一度有所放鬆，但這一框架和原則仍然不許突破，後來反而更嚴格了，並設立了專門機關負責編寫和把關，以保證黨史的資料管理和研究著述不出這個圈。關於整風搶救的檔案是一貫嚴格保密的，三中全會後，特別是前段時期，倒還一時稍為開放了一部分。一是公佈了少數檔案中的中央文件，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毛澤東文集》中有幾篇，還在1984年專門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1941年9月－1943年3月)[23]；二是一些領導人在個人的《回憶錄》中使用和涉及的有關檔案，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薄一波

22 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102頁。

23 《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9期。

的《七十年奮鬥與思考》、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等；三是一些研究論著中透露的檔案材料，如《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一書，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24]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25]以及其他一些書籍和論文；四是許多人靠自己記憶寫的回憶錄和一些人的日記。現在人們的研究恐怕主要就靠這些一二三手資料。但是在使用這些材料時也得注意兩點。一是公佈的檔案和領導人回憶中所透露的點滴，都是經過特別篩選的，不但沒有越出固定框子的圈，而且毋寧說是為證實和加強有關原則服務的。二是領導人的論述和回憶也要打折扣。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26]的胡喬木的不少論述就不符合實際，我曾一再指出過，下面還會多次談到。

就是寫回憶錄別開生面、「也寫了自己錯誤」、因而受到鄧小平讚揚的李維漢，[27]也有不少為自己開脫之處。例如他說的陝公創辦之初製造了一件冤假錯案，把一批好學的進步青年組織的名曰「卡爾學會」的讀書會，毫無根據地(只是因為名字叫的怪，為什麼叫卡爾不叫馬克思)打成反革命組織，開除了七八名，幾十個人不分配工作。其實，抗日戰爭前，上海左翼人士多稱馬克思的名字卡爾，目的在減少國民黨檢查官的注意。對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是這樣。李維漢在四五十年後還就此進行檢討，「深以為咎」，這種精神確實少有，令人感動。但中間卻加了一句「那時王明、康生剛回國，他們把蘇聯鬥爭搬到延安，也影響了陝公。」[28]就顯得有點牽強。因為陝公創辦於1937年8月，王明等11月才回來，他們影響不會傳播得那麼快。又如他在

24 《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25 《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26 李鐵映在《喬木文叢》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02年5月22日。

2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17頁。

28 李維漢：〈回憶陝北公學〉，《中共黨史資料》第15輯(1985年)。

1942年4月6日毛澤東主持的會上的發言，把中央研究院在整風中出現的偏向歸咎於「過去教條主義的教育」。[29]事實證明並不正確。涉及個人責任問題的更多，如把王實味打成托派和在邊區政府搞搶救的責任推給康生，把長征前夕提出政府系統人員去留（包括瞿秋白等）名單的責任完全推給三人團，以及許多敍述的跟風表現，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

至於一些權威著作如毛澤東的文章，經過篩選發表出來的是否就是原文呢？大多不是。不合上述框子和原則的，把關的單位仍然要加以刪節改動，而且往往不作説明，不留痕跡。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其中有一篇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注明是「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紀錄稿刊印」，按理應當是真的原文了。但楊奎松在〈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一文中引證的，毛澤東在同一天同一篇講話中卻有：一個2,500人的黨校已挖出250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説，「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30]看來楊奎松大概沒有這樣大的膽量，敢編造這麼一大段「最高指示」。實際上只能是有關單位對原文作了刪節改動，説根據紀錄稿刊印，自然不是真話。又如《毛澤東文集》同卷載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也注明是根據紀錄稿刊印，但卻刪掉談王實味等的有關問題。如説，「整風審幹改造了人，我們有一條，叫一個不殺方針。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我們也不殺。……王實味也變了，有進步。西安給他開了追悼會，還説延安殺了好多人。現在我們把王實味的照片一登，送給他外面的朋友。」[31]這是從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陳晉著《文人毛澤東》一書中所引，大約絕不會是捏造領袖的言論，差錯更不會出在紀錄稿的身上。這裏只是為了説明有關問題順便舉兩個例子，類似情況還可舉出不少。

對毛澤東的文章、言論尚且如此，對其他的人和事，就更不在話下了，因此也無須多所列舉。但有一件事卻不能不在此一提，就是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親啟電報，和毛澤東1944年1月2日和1月7日的兩封覆電，對中蘇關係、黨的政策、黨內鬥爭和整風審幹都有巨大作用，在某些問題上可以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促成搶救運動在延安的剎車和上層路線鬥爭的顯著緩和。對這樣的重大事件，奇怪的是，正式黨史著作一律不予理睬，《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隻字不提，似乎這樣一件大事從未發生過一樣。[32]同樣，毛在這個時期同共產國際代表兼塔斯社軍事評論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頻繁接觸和長時間重要談話，這些正式著述和資料中也都不見痕跡。對於這類有意「忽略」，我們下面還會回過頭來談到。

人們也許會問，延安整風時不是特別強調實事求是，而且一直強調到現在嗎？為什麼正好會在整風期間幹出這樣的「壞事、蠢事」來呢？既然明知是犯了錯誤，卻又為何既不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還要長期刪削文件、修改歷史？其實道理很簡單，都是為了維護上述的框架和原則。而且對於「實事求是」或「尊重事實」，我們也有獨特的解釋，就是要符合毛澤東所提「革命的功利主義」，一切都看是否對革命「有利」。按以前的説法，「實事求是」也是講「階級性」的。例如那時陸

2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486頁。

30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頁。

31 轉引自黃昌勇：《王實味傳》，第237頁。

32 參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1989年）；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162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588–591頁；以及《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外交文選》等。

定一就談到「兩種真實性」，一種是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哪怕還處於萌芽狀態甚至還沒發生的「本質真實性」，一種是只反映事物「表像」和「假像」的「虛假真實性」。[33] 所以要遵守「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的原則。[34] 現在更有人提出，講實事求是也要顧全大局、有利於穩定。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的黨史研究完全不講實事求是、一點也不尊重事實，而只是說實事求是和尊重事實必須遵守延安整風及此後確立的各項重要原則。設立有關的權威機構，一個重要原因和它們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嚴格把關。

《回憶錄》不可靠的舉例

為了表明在黨史資料上也是定論第一，事實第二，同時也要着重說明一下被黨史界廣泛引用的回憶錄的不可靠，這裏再特意舉兩個例子，並要多說幾句。

一、《楊尚昆回憶錄》談搶救柯慶施是後來編的

對於2001年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我在本書前面篇章中談到遵義會議確立的黨中央領導時，曾指出這本《回憶錄》有關遵義會議的一段論述和楊本人生前的說法截然不同，並指出只能斷定他生前的說法是真，死後由別人整理的「回憶」是假。這是明顯地要把楊的「回憶」納入黨史的固定框架內（諸如要求毛主席領導全黨是眾望所歸，張聞天不是總書記，只是分工「負總責」之類），因而要編造一些話來代替本人生前一再發表過的觀點和說法。現在我們討論到搶救運動，還可再以該《回憶錄》的有關部分（其他無關的不談）為例，來看一下是如何在為維護固定框架（為毛澤東開脫，把罪責推給康生）服務的。關

33 見〈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載《解放日報》，1942年11月17日。

34 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載《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於搶救，《回憶錄》寫得最有聲有色的是關於搶救柯慶施的大會[35]，而正是這一段可以看出完全是編造的，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差太遠。

關於開柯慶施的會，近年來曾同一些老同志多次談到，[36] 不但印象和看法與《回憶錄》所寫大為不同，而且覺得《回憶錄》的許多提法不近情理。如說楊自己（才從華北局書記任上回延）和李富春（中央副秘書長兼中辦主任）、鄧發（當時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去找康生，康生竟「躺在床上，聽都不聽」。這可能嗎？據過去許多接觸過和同康生一起工作過的人如曾彥修等說，康生的待人接物根本不可能是這樣的，他對人，包括青年，還是挺客氣的。「說常委決定了」中的「常委」又何所指？那時政治局常委早已不存在，沒聽說過總學委設有常委。而且既然是「常委決定」，毛澤東怎麼會不知道，還問「你們開什麼會呀？」豈非自相矛盾。何況毛澤東已於1943年初搬住棗園，遠隔延河和十里山溝，怎麼能聽到他們「又叫又鬧」呢？楊尚昆怎麼會「回家經過毛主席的窯洞」？據在楊家嶺大禮堂正對過（中有山溝）、與大禮堂直線距離在百米以下的窯洞中住了幾年的曾彥修說，「兩三年間，大禮堂內除演京戲時偶能隱約聽到一點兒鑼鼓聲外，其他什麼聲音也聽不着」。毛住的一排窯洞，起碼在上述距離的三倍以上。因此，毛就是沒搬家，也不可能聽到大禮堂的開會聲音。另外，會上根本沒有人提過書上引號中那些幼稚的問題，即使真提了，也根本不起作用，因為會議是相當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的。[37] 會議由李富春主

35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頁。

36 1998年以來曾和延安整風時任中央辦公廳行政處學委會副主任的劉英談到幾次（如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一些談話有錄音或記錄，並有別的同志參加。最近還同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院和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曾彥修幾次談及此事。2002年8月6日曾又特別來電話提到，《楊尚昆回憶錄》關於搶救柯慶施的描寫是不合乎實際的，他從頭到尾參加會議，至今記憶猶新。

37 以下情況，除曾經與會的劉英、曾彥修等所談外，還可參閱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1996年6月）。

持，先談的是別的問題，已到下午四時後，李富春突然提出有人在禮堂內牆上寫了「柯慶施是特務」等字樣，要柯說明。在柯嚴正否認後就開始揭發和提問。首先發言的是李克農，鑒於他社會部副部長的身份，人們在吃驚之餘也難於理解，大多抱將信將疑態度。第二個重點發言的是陳伯達，問題提得極尖銳，講話雖有口音，但意思還聽得懂。第三個發言的是個姓張的東北軍中的老地下黨員，馬列學院已畢業的學員。提問題最積極的是中組部幹部科長王鶴壽，如問為什麼北平黨組織遭破壞時柯慶施恰巧去外地，一次就去了綏遠。據曾彥修談，那天各個揭發發言重點幾乎全是這同一性質的問題，只是時間、地點不同而已，可見均是事先佈置好了的。徐以新坐在前排呼口號。由於柯慶施態度堅決，會議無結果而散。此後柯實際上即被軟禁。他的妻子曾憲蘭在婦委搶救中被逼跳井自殺後，領導上還故意找柯追問，說是他放跑的。曾彥修說，當時聽到的傳達是，曾憲蘭是延安特務和境外特務裏應外合逃出邊區的，號召大家提高警惕，不可大意雲。直到1944年4月，才發下中央文件為柯平反，說當時所提問題均已查清。在延安搶救中，這大概也是中央在短時間內對第一個人的正式平反，以後就沒聽說對第二個人再這樣做了。從這些情況可以做出這樣幾點判斷：第一，搶救柯慶施是有計劃的一個重要行為，決非康生一時心血來潮。第二，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事先不會不知道，康生膽子再大也不敢擅自作此決定，李富春等也不會那樣順從康生。因為外號「柯大鼻子」在當時是延安的名人，又是領導幹部。他是1920年的團員，1922年轉黨，誰都知道他是延安惟一見過列寧的人，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因王明生病住院，實際上是他負責)，非一般幹部可比。毛、劉當時主要抓整風審幹，而且抓得很緊，決不會讓這樣的大事漏掉。第三，楊尚昆等三人如果真的會前去見康生，那也是商討做法，而不是去勸阻。而且估計三人不會結伴去見康生，既然來回要「經過毛主席住的窯洞」，那為什麼不先見一下毛澤東？難道那時不是毛領導康，反而是康領導毛？總之，在僅一頁書中就存在這麼多問題，是極不合理的。何況參加那次會和了解情況的老同志還有

不少人健在，如果整理時能訪問幾位，也不致搞得很多情節都像小說似的。

二、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關於搶救運動的敘述多有不實

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是一本較有影響和被引證較多的回憶錄，因此這裏要多說幾句。影響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書名響亮，又經過中央文獻研究室「鼎力協助」和派黨史專家整理出版，還有王震給寫《序》，因而受到普遍重視，印數那時就近七萬冊，為一般回憶錄所少見。但是只要看有關整風和搶救的部分，就會發現編造和炫耀的成分實在太多。此後出版的一本《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38] 硬傷還要更多。例如開篇《整風運動之初》第一段，只有兩三句話，卻有幾處硬傷。劉少奇1942年底才回到延安，怎麼可能同毛澤東、康生三人組成第一次成立的總學委。說毛在總學委「只掛了個名」，更是毫無根據。說「劉少奇是政治局委員，也沒有管」，也完全違背歷史(劉當時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什麼會出現這類差錯，而兩次編輯又都輕易放過(先發表於1989年第4期《中華英烈》，1997年出書)？原因就是黨史工作中的把關，主要看是否合乎所需要的原則，至於合不合乎事實似乎倒在其次。而師哲這樣說，正可以為毛、劉開脫，把責任推給康生。所以《劉少奇傳》上談到肅反擴大化時，也樂於引證他的回憶：「劉少奇因自己剛到延安，對延安的整風和中央機關的情況都不大了解，很多事實際上還是康生在主持這方面的工作。」[39] 其實，延安的搶救高潮出現在1943年下半年，這時劉少奇已回延安大半年，並出任「中央反奸鬥爭委員會」(成立於4月28日)主

38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但內收文章多在《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寫作之前。

39 《劉少奇傳》(上)，第495頁。

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也有好幾個月，何況上面還有總學委主任毛澤東在直接抓整風審幹，怎麼可能是師哲「回憶」的那樣讓康生成了總學委的「實際負責人」。而且就在引證這句話的一段裏也有好幾處硬傷，如說「1943年3月，劉少奇回到延安」(實為1942年底)，說「毛主席、劉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楊家嶺」[40](這時毛澤東、康生住棗園)等。既然在一小段話裏就有這些明顯的硬傷，定然說明這段「回憶」的不可靠，怎麼還能引證其中「有利」的那一句呢？綜觀師哲兩部《回憶錄》，可以說都是盡量按現在的思想認識和輿論導向，編寫幾十年前的故事。這裏只就兩個較重要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第一，回憶錄似應有別於傳記文學，應該完全寫實，不可任意虛構，特別是一些重大事件和領袖人物的談話。而這兩本《回憶錄》卻很不嚴謹，除了明顯的硬傷外，有許多描述也是經不起推敲和不夠真實的。例如作者個人同領導人的對話，不但不說明時間、地點、場合和旁證，還要加上引號。那麼這些領導人的話能否當真呢？恐怕不能。否則單是這兩本《回憶錄》就可編一本《毛主席語錄》。而且有些話，一看就不真、不像、不可能。例如總學委成立後，「毛澤東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41] 又不談此話的來源與根據，人們能信嗎？又如，「毛主席先找康生談過，指出要糾偏，康生卻置之不理」。[42] 這可能嗎？康生和毛康關係會是這樣的嗎？

有些話顯然是越編越離譜，如敘述毛澤東對他講中央蘇區反「AB團」的問題，在〈峰與谷〉中一文(按：文在前，出書在後)先寫為：「毛澤東要了解其中的奧妙，有一天他悄悄從窗孔看如何審犯人，原來是

40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6頁。

41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5頁；《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2頁。

42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59頁。

『打雷公』。」[43] 到《在歷史巨人身邊》就變成了毛澤東引號內的原話：「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覺，悄悄地走到審問犯人的地方，用舌頭將窗紙舔了一個洞，偷偷地看，看見審訊人員正在搞逼供信。」[44] 固然越編越有趣，但編造的痕跡也越明顯。應當指出的是，在我們討論的這段搶救運動期間，作者既未「在歷史巨人身邊」，實際上也不再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了。1943年4月5日，書記處會議決定，「取消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另行分配工作」。[45] 何況在這之前的1943年1月他就被調去當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一年半後又調社會部任室主任。就是在巨人身邊時，也是主要只做一部分俄文翻譯工作，不能和他列舉的某些政治秘書如胡喬木、陶鑄等相提並論。既如此，他對中央的事和上層整風就不可能了解太多，所以寫得也比較膚淺，而且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不真實。

不信，這裏就舉幾個例子。如說中央總學委「主任先是毛澤東，後是劉少奇，都是掛名」，康生「是整風運動的實際領導人」。這些話完全是海外奇談。實際上，劉從未當過主任，兩人也決非掛名，康生更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領導人。說向忠發叛變後，王明就「直接接替了總書記」，「但任總書記才一月，便辭去該職，……」還「在1935年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後來印成小冊子，即臭名昭著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其實，王明既沒當過總書記，他的報告也不是那本小冊子。王明在國際七大上的專題發言題為《論反帝統一戰線》，相當於一個有關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副報告(同樣性質的還有德共皮克與意共愛爾科里(即陶里亞蒂)的兩個長篇發言)。這三個重要發言，延安均有蘇聯運來的不少小冊

43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16頁。

4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56頁。

45 《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頁。

子。而《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則是王明在1930年黨的四中全會前夜寫的一本小冊子。

又如說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時，毛是「中共中央主席」。(1938年還根本未設中央主席，毛當時只是軍委主席。)[46]說「在張聞天出使蘇聯期間」，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之間「建立了較密切的關係，常在一塊交談，就某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47](對此，我倒可負責地證明：絕無此事。否則，1959年廬山會議定的「裏通外國」罪名還真可成立了)，等等。

其次，這兩部《回憶錄》寫到一些領導人的事或其他人的政治問題時很不嚴肅，也是信手編來。如談劉少奇和王前的離婚是康生挑撥，[48]說明作者根本不了解這件事。《峰與谷》中「綏德的故事」一節，寫得更離譜，還竭力炫耀自己。[49]如說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和專員袁任遠親自主持搞的肅反「騎虎難下」，於是(大約五月底)他帶了七八個人，突擊了一個月，三個縣的局面就「安定下來」，並受到林伯渠和西北局的表揚。還說徐向前是「綏德抗大分校的校長」(實際上當時駐綏德的是抗大總校，徐為總校校長)，「重大問題都是徐向前、習仲勳、袁任遠和我一起研究」。情況恰巧相反，正是1943年6月後，綏德專區的搶救才鬧得更厲害了。9月，綏德師範還連開了九天的控訴坦白大會，9月22日的《解放日報》以《綏德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為題作了詳細報道。「1943年10月9日，毛澤東看了綏德反奸鬥爭大會後才批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

46 以上分別見《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237、258、270頁。

47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83頁。

48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60頁。

49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8–10頁。

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50]抗大總校的搶救運動起步更晚，1943年8月開始，10月才大幹，搞出特務和特嫌602人，佔全校排以上幹部57.2%。[51]可見當地情況和師哲所寫，差別有多大！還有一個談七大代表的審查問題，兩本書都提到了一個叫「小米」的人。在《峰與谷》中，說他是湖南代表，學文件時發現他說話不對頭，總提錯誤路線誰負責的問題，後來找他一談，他承認變節，當了特務，「那時並沒有逼他」。[52]《在歷史巨人身邊》已描繪得更具體了，說「大約1942年5月間，冒出了一股蠱惑人心的陰風，說對黨內歷次錯誤的發生要找根尋底，追查責任。」「後來在肅反中查明他是隱藏在黨內的一個叛徒。」並由此引起了他同毛澤東一段加引號的對話。[53]情況到底如何，再看當時中辦秘書處一位負責人曹瑛的說法。「秘書處的密家凡同志，是湖北地下黨送來的七大代表，由於七大一時開不成會，就調他來中央秘書處暫時工作。這個同志思想活躍。在大搞逼供信的情況下，有人咬他」，於是「大家『搶救』他」，提一連串很離奇的問題要他回答。「小密很年輕，他就反駁。我覺得他駁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會上幾天沒發言。後來，在半夜裏社會部派來一輛馬車把他抓走了，關在『西北公學』……我對那樣搞有些想法，認為不對頭，但不敢說。」[54]經訪問劉英等當年在中辦工作過的老同志，大家叫的小密(師哲誤為小米)就是密家凡，但沒人說他有問題。了解他的曹瑛既然在五十年後仍以同志相稱，且認為那種做法不對頭，卻沒指出最後處理，不知是否有不便說之處。因為搶救運動中自殺的、逼瘋的不少。該同志如

50 見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51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62頁；《徐向前傳》，第399頁。

52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5頁。

53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3–244頁。

54 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原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後又收入《親歷重大歷史事件實錄》，第三卷。

果還活着，恐怕是會跟師哲打官司的。還有提到其他七大代表的審查及其與搶救的關係，[55]也值得懷疑。例如所指河南省委書記，是七大後自己交代並要求取消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向全黨發過通報，內容我至今還記得。至於回憶錄上提的另外兩個候補委員，卻沒聽說過，有點不信。但這類問題一查就清楚，只是我沒有這個條件。

對師哲《回憶錄》的訛誤之處所以談這麼多，並非苛求於這位老前輩，其實這是普遍情形，只是想借此說明《回憶錄》並不可靠，而黨史研究又似乎有點濫用《回憶錄》的現象。特別是一些名人傳記，往往「各取所需」，大量摘用許多《回憶錄》，很容易把一些歷史事實弄得更亂。常看到一些引證是當時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或使用的語言。但研究歷史又不能不使用《回憶錄》的資料，所以這是一個需要慎重對待而且值得研究的問題。恐怕只有多讀、多問、多疑、多考證才可能好一些。關鍵在多讀、多比、多思。

在學習黨史的過程中看了一些人的《回憶錄》，覺得類似的問題不少。原打算專門寫一篇讀書筆記進行討論，但後來一想，這與改行學黨史寫筆記的主旨關係不大，所以決定作罷，只是在此以這兩種《回憶錄》為例，多說了幾句。

對搶救運動中幾個具體提法的辨析

由於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至今沒做過什麼總結，在黨史研究和論述中，除了注意維護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則外，涉及具體問題就只能各說各的了。而且原則第一、事實在次，這一條還越來越盛行，

55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5頁。

因此有關搶救的一些說法也就和當年的實際距離越來越遠。為了使討論時所用概念的含義明確一些，這裏只提出幾個較常見也較重要的問題，作點辨析。

是「搶救運動」還是「審幹運動」

從前，搶救運動一直屬禁區，史書很少提到，所以名稱也無定規。「文革」後黨史研究談及整風搶救的多了，於是就發生了「正名」問題。事實上，從 1942 年到 1947 年延安撤退，除常說的搶救運動外，也還有坦白運動、反特運動、鋤奸運動，惟獨沒聽說過有「審幹運動」這個詞，這可能是許多年後人們為遵守中央 1955 年8月指示中的提法，才普及起來的。但是這一名稱，既不科學，也無根據。審幹是組織上對所有幹部定期或經常進行的（據我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從1939年起，對黨員和幹部的審查就沒有停止過），內容包括政治、歷史、能力、表現等，一般是和群眾運動掛不上鉤的。大約除1955年8月指示[56]中這一不確切的提法外，歷史上似乎再沒提過還有其他什麼審幹運動，但審幹卻一直在進行。說這一提法沒根據，是因為整風期間以及此後，從來沒見到和聽到這種說法。整風期間的指示、文章，提審幹很多，但未和運動連在一起。而且整風中的審幹也不是通常的審查幹部，一開始就明確為反特或肅反，所以實質上就是搶救，而不是審幹。因為審幹是中央一貫重視並作過多次指示的。例如 1940 年8月1日就做出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認為審幹是鞏固黨的一個重要方法，要求各級黨委和各單位成立幹部科，擔負有關工作。[57]但這次審幹並未變成搶救。

56 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57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66頁。

還應指出的是，審查幹部一貫是組織部門的事，這次則由社會部直接抓，怎麼能還是審幹呢？可見，把肅反等同於和叫作審幹都並不合適，搶救運動更不是什麼審幹運動。之所以事後改稱審幹運動，可能只是為了淡化甚至掩飾延安整風中這一嚴重錯誤而特意想出來的一個名詞，並不是當時實際上存在過這麼一個運動。1955年8月的文件還把這個運動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的甄別工作，只能是也完全是極少數領導骨幹的「暗箱作業」，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群眾運動。而且這三段論也從側面說明應稱搶救運動。因為，第一階段發動群眾幹什麼，還不是為了第二階段的搶救。第三階段的甄別，則是由於搶救出了亂子。可見中心還是搶救，人們一直稱為搶救運動也是確有道理的。例如整風運動(或稱整風學習運動、整頓三風運動)，就是一開始就有的提法。[58]

搶救運動也是隨着運動的開展，各機關先後叫起來的。最早可能源於毛澤東1942年6月1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的「發現壞人，拯救好人」。[59] 後來在坦白運動(1943年4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中直軍直單位和邊區各機關開全體人員會議，號召特務分子自首[60])中，逐漸演變成挽救失足者或爭取失足者，作為運動，就叫搶救運動。[61] 而實際上延安各機關單位叫得最普遍的還是搶救失足者。搶救運動與坦白運動是無法分開的。大體上講，自上而下發動的是搶救運動，對被搶救者來說是坦白運動，被指定施行搶救的小組則叫「勸說運動」或「勸說小組」。三位一體，但根本上還是個搶救運動。大概1943年四五月後，由於估計國民黨將趁共產國際解散機會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斷定它已準備好以武力進攻陝甘寧邊區，因此中央總學委於7月11日發出《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運動的通知》。其主要內容就是「繼續加緊反奸細鬥爭」，要求開各種形式的會，包括群眾大全、大小座談會、坦白大會等。[62] 於是延安各機關學校便在緊急備戰聲中相繼提出了「搶救」的口號。我所在的學校領導在全體大會上的說法是，如在平時，還有時間說服教育，而現在已是非常時期，可能馬上就打仗，所以必須緊急搶救，否則一旦開戰，對這些特務就只能就地處決了。就這樣，搶救失足者和搶救運動的提法，在1943年夏已很快在延安普及。後來中央文件也加以確認，又一下傳遍各根據地。如1943年8月5日中央總學委通知的第一句話中就有：「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亦已告一段落」[63]；1944年11月26日中央給晉察冀並發其他根據地的指示中，提到的也是「鑒於去年延安搶救運動時」；[64] 1943年12月22日，書記處會議主要討論反特鬥爭，也一再稱「搶救運動」，而沒有叫「審幹運動」。毛澤東的一再稱呼同樣是「搶救運動」，而不是「審幹運動」。例如1944年1月10、11日書記處會議上聶榮臻報告中，他的插話就有：「過去延安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65] 他在延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的也是：「『搶救運動』那時候，空氣緊張得很，『搶救』了好些人，許多是搞錯了的……」[66] 總之，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都把那次運動叫作搶救運動。多年後才編出來的這個「審幹運動」，既不科學，又沒根據，名不正，言不順，自然以不用為好。

---

58 如《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1942年6月8日)；《解放日報》1942年6月5日社論〈延安一個月學習運動的總結〉，其中就叫「整頓三風運動」。

5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6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3頁。

61 還可參閱毛澤東給康生的信(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48頁。

62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74–78頁。

63 中央總學委〈關於進行一次國民黨的本質及正確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85頁。

64 《中央書記處關於審幹反奸工作給晉察冀分局的指示》。

6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13頁。

66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155頁。

搶救運動的時間到底多長

對此說法很多，但基本上是兩種，即十多天和兩三年。前者以各種正式黨史為代表，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把時間定為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報告後的十餘天。根據大概是毛澤東1944年10月25日講話中所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67]（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話。）雖然這裏沒有說這「十多天」的起訖時間，也沒說是怎樣「使它停止」的，以及是否合乎實際情況，但因為是領袖所說，所以就定下來了，成為黨史上的正式說法。此後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自然沿用此說，並明確為半個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生報告後開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按：這可能是為了把發起搶救的責任推給康生和運動開始時間從康生報告後算起，特意將當時及此後叫了多年的「搶救運動」改稱「搶救失足者運動」），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68]其他較正式的有關搶救運動的論著和一些領導同志的回憶錄，也大多持此說法。如前面引證過的鄧力群在《回憶延安整風》中就說，「到1943年7月搞了十來天的搶救運動。」[69]但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只有斷語，不提根據；只講虛，不講實，例如什麼地方、什麼單位、是怎麼個搶救法、又是怎樣「馬上」停止的等等，這當然就無法，其實也不容許討論了。

後者以蔣南翔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為代表，其中明確指出「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一些討論搶救運動的文章，如《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在詳述具體經過後，也說是從1942年底的坦白運動起到1945年甄別工作結束，「歷時兩

6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53頁。

6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6頁。

69　《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第19頁。

年多」。[70]（這裏附帶說一句，當時和事後這兩文的標題都稱「搶救運動」，可見「審幹運動」和「搶救失足者運動」是後來特意制定也極少使用的名詞。）連親自參加搶救和恢復總學委後任秘書的胡喬木也說，「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71]這是1981年9月14日回答問題時本人親自所談。至於《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的，「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毛主席就指示讓它停下來」[72]，則是由別人整理（顯然是按上述「正史」的統一口徑），且本人生前未及審閱的。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毛主席何時和怎樣指示讓它停下來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寫的雖然更具體，說是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但也沒有交代這個「指示」是用什麼形式下達的。當然，兩本書都是由權威機構和權威黨史學者所整理和編著，是不應有什麼懷疑的。但奇怪的是，這樣重要的史實和文獻，《毛澤東年譜》、《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等竟都沒有提。7月30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只提了審幹的九條方針，也並未提停止搶救運動。[73]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事實。而事實是，搶救運動7月後在許多機關和地區，特別是一些敵後根據地，反而進行得更猛烈了，有些還是1943年底或1944年才大幹的，如晉冀魯豫邊區等。我所在的單位和親身經歷，以及一般機關學校均可姑置不論，就是毛澤東親任校長並抓得很緊的中央黨校，作為延安整風審幹（搶救）的重點，直到1944年初也還沒有停止。據被搶救的黨校一部（高幹）學員曾志說，「春節過後，大約是三月份（引者注，1944年），我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又被編

70　《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7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7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

73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52–53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82–84頁。

入了黨校臨時支部……雖然中央有了『九條方針』但這裏的『逼供信』仍相當嚴重，與以前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打、罵、踢，刑罰各種各樣。」[74]駐綏德的抗大總校，搶救運動1943年8月份才正式開始，還是「從十月下旬起，兩個月的時間裏，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場糊塗。」[75] 延安和綏德等地區，九月份搶救也還熱火朝天，《解放日報》還作了詳細報道。直到12月，中央才提出「坦白大會要更慎重更有準備的召開」(以後又提出停止開)，指示「不能到處採用搶救運動的簡單方式」。[76] 12月22日書記處討論反特鬥爭，決定向高級幹部傳達的內容中也才有「今後延安審查幹部應進入新的階段，即甄別是非輕重階段。」[77] 而且這些都只適用於延安，一些敵後根據地並未停止，還要他們繼續進行或補課。中央書記處1943年11月15日才致電華中局，要他們「即在軍部與二師一部附近進行一般的清查特務分子的運動(公開名義為審查幹部)，以便能在華中突破一點，推動全局」。並介紹了搶救的具體做法。[78]

另如前所述，直到1944年，北方局黨校也才大搞搶救，劉建章、李爾重、任仲夷等正受折磨。1984年7月4日中顧委第三支部開會時楊獻珍就檢討說，「1944 年我在北方局領導整風，犯有錯誤。當時從延安刮來一股『搶救失足者』運動的歪風……」[79] 1944年2月26日毛澤東和康生還聯名覆電鄧小平、滕代遠說，「你們的審查幹部工作，已進入坦白運動」。[80] 也正是1944年，中央才派舒同去山東任分局總學委副

74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

75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61頁。

76 轉引自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

7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87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35頁。

78 中央書記處關於《關於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給華中局的電報(1943年11月15日)。

79 《百年潮》，2002年第9期。

8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96–497頁。

主任，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幹工作，推廣延安(特別是中央黨校)搶救運動的經驗，只是由於羅榮桓的抵制才沒全面展開。所有這些都說明，1943年7月後，搶救運動無論在延安還是其他地區不但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毛澤東7月30日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停止搶救運動的指示，否則各地怎敢拒不執行。事實上，各地停止的時間也不同，有的也許是1943年底，有的則是1944年，總之都絕不是「十餘天」或「二十天」的事。

再說，搶救運動更不能說是從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後才開始。實際上，1942年底許多機關學校即已開始，只是全面展開則是上面說過的任弼時4月9日和12日的報告之後。但這時叫法仍然不一，有坦白運動、肅反運動、搶救運動等，後來才逐漸統稱搶救運動。所以4月28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討論任弼時的報告，還說是「繼續進行坦白與檢舉內奸運動」。[81] 中央總學委7月11日通知中的提法，又是「繼續加緊反奸細鬥爭」(請注意前後都有「繼續」二字)，要求把對幹部群眾的教育「必須與審查幹部坦白運動密切的結合起來」。[82]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有根有據的研究論文也都指出是開始於1942年，只是要按正史說法稱為「審幹運動」，再在下面注明為反特鬥爭。[83]

至於親身經歷過的人，說得就更具體了。例如住在毛澤東隔壁、天天同毛澤東見面的葉子龍夫人蔣家英(江英)在回憶文章中就明確說，「1942年延安搞了『搶救運動』。」在被搶救了大半天後，她跑回去找毛澤東說，「主席，他們搶救我了。」但最後還是被送去黨校一部繼

81 《彭真年譜》上卷，第216頁。

8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75頁。

83 如上引王素園、賀晉等人的文章。

續審查。[84] 曾志也說，1942年她調黨校一部學習，有天晚上全體去聽「失足青年」的報告，「以後這樣的會隔幾天就要舉行一次。」「有一天黨校一部又舉行全體學員和工作人員動員大會……講到黨內成分不純時，特別提到：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所有黨員都是紅皮白心的假黨員。」會後，河南省委組織部長、著名的長征女戰士危拱之就回窯洞自殺了(雖經救活，最後還是得了精神病)。[85] 再看作家劉白羽所說：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以後，就「使得延安生活的氣氛慢慢緊張起來」。他由「文抗」到中研院才分配到歷史研究所，「就在這時，一陣暴風驟雨，驟然平地而起了」，「審幹之中所謂的『搶救運動』開始了」。[86] 不用再多引證(其實我自己就是那一陣開始受到車輪戰搶救的)，就可看出，一些黨史論著和專家所說搶救運動開始於康生1943年7月15日《搶救失足者》報告之後，距離實際情況有多遠。因為在中研院揭開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後，審幹的重點單位中央黨校就「查出」吳奚如的「特務案」，隨之反特鬥爭就在全校展開，一些單位也聞風而動，搶救運動就實際上在延安開始了。特別是1942年10月開幕的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了對敵特破壞麻木不仁的自由主義，康生和彭真又先後作了肅反問題的報告。在這種情況下，哪個單位還敢怠慢？因此，只能說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又掀起了中央機關和學校一輪搶救運動的高潮，但決不能說是搶救運動的開始。至於剎車，則是1944年的事。對於這些，在後面談「九條方針」等問題時還要進一步討論。這裏只是要說明，搶救運動決不應從1943年7月康生報告算起，更不能說只搞了「十餘天」，這些說法完全與史實不符，這樣說的黨史著作當然不能算信史。

84 江英：〈姓名惹的禍〉，《眾說紛紛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4頁。

85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第333頁。

86 劉白羽：〈平地風雷－我經歷的整風搶救運動〉，《心靈的歷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整風和搶救的關係

本來，搶救運動就是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文獻上還是事實上都沒有分開。但是有些人為了維護延安整風的崇高聖潔，不願讓純屬錯誤的搶救運動(多按正史提法稱為審幹運動)玷污，於是就把它們說成是兩個運動。例如有一篇〈審幹運動與延安整風運動〉的文章，就認為「延安整風與審幹運動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運動」。[87] 還有些談及延安整風的黨史論著，也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包含着這個意思，說明這也是個較普遍的問題，值得一談。其實，從搶救運動一開始就沒有這種提法。相反，無論領導人講話還是正式文件，都始終把審幹(肅反或反特、反奸，意思是一樣的，實際上就是搶救)當作整風的一部分、整風的兩大任務之一。早在1942年4月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已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88] 6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又明確指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89] 即將肅反和糾正路線錯誤並提。1943年3月《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中更明確指出，「有步驟地清除內奸分子，這就是整風的第二個目的。」[90] 第二個《四三決定》[91] 同樣可以說明問題。它的宗旨就是肅反，但題目卻是《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其中還一再強調肅反是整風的一部分，是整風期間要辦的大事。如說：「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最常用的說法還是，整

87 夏宏根作，載《爭鳴》1986年第3期，《黨史通訊》同年第9期摘發。

8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89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3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90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9期。

91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28–33頁。

風要同時解決半條心(糾正錯誤思想)和兩條心(肅清內奸分子)的問題。兩個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一個運動，還被明確定為「是整風過程中互相聯繫着」的兩件事。只是在搶救運動進行了幾個月後，中央才做出專門的審幹決定，提出「九條方針」，但仍然不是要把審幹(反特)和整風分開，還是說「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幹部」，為了審幹「各地整風須延長至1944年」。劉少奇也明確指出，「審查幹部與清查內奸的運動，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及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92]

當然，有時為了便於操作或訂計劃，也把整風中的這兩件事分別稱為整風學習和審查幹部，或簡稱整風和審幹，但並無人說這時延安進行了兩個運動。其他根據地也並未把整風和搶救當作兩個運動來抓。晉綏分局的林楓就說，「整風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整學風……第二個時期是反特鬥爭，這個時期是從黨內鬥爭轉到黨外鬥爭；第三個時期又開始整風，成為黨內黨外兩種鬥爭的結合。」[93] 事實上，差不多1943年全年和1944年大半年，包括我們學校在內的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機關學校，都是以大部以至全部時間搞搶救運動的。在此期間，幾乎再未討論和批判什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1943年九月會議後，上層在批王明右傾路線和「左」傾路線，中下層幹部根本不知道)。在這兩年左右，普遍整風就是搶救運動，並不是許多書本上和後來某些黨史學者想像地那樣在「整頓三風」。對於搶救運動，既然黨史著作都要盡量加以淡化和遮掩，那麼一些人進而設法把它和延安整風分開來，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92 劉少奇:〈關於審幹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43年7月),《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

93 《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幹會關於整風審幹的結論》(1944年7月7日)。

向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問題

刹住搶救，進而向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是由於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致書毛澤東對整風搶救干預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廣大幹部包括許多高幹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越來越對搶救運動發生懷疑和不滿。為了應付這種局面，但又在不能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的前提下，才想出和採取了這一似為檢討而又不作認真的自我批評的奇特作法。但這卻被整風搶救中的積極分子和後世黨史研究者大書特書，當作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批評」。

關於毛澤東對搶救運動主動承擔責任和向搶救錯的人賠禮道歉，一些書寫的最早的一次是:「1944年元旦，王諍帶着中央通訊部門被錯誤地打成『特務』的同志來給毛澤東拜年」，毛講話說，「這次延安審幹，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這不好，今天我向你們敬個禮，你們回去要好好工作。」(之所以安排這次活動，是因當時通訊部門絕大多數人被打成「特務」，已「使延安同各根據地和各省黨組織的聯繫一時中斷」，所以要急於解決他們的問題。)[94] 後來在大會上的正式賠禮道歉，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載，前後共有三次，而且還描述得甚為生動感人:「許多受過冤屈的同志最初氣很大，經過毛主席這樣多次地賠禮道歉，不僅氣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對運動中的事大家不再計較了，同志間的團結增強了，心情重新舒暢了。」[95] 這段描寫雖然不是胡喬木自己所寫，但看來是合乎他的意思的。以他為代表的黨史學派(稱得上學派的，中國恐怕也就這一個)和其他整風搶救的積極分子，所寫的黨史著作和回憶錄，基調都是一樣的，區別只在於有繁有簡，還有些更屬誇張和編造。

94 梅劍主編:《延安秘事》(第十三章〈延安「搶救運動」寫真〉)(下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45、540頁。

9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281頁。

奇怪的是，寫被搶救者如何感動、如何感到不安的，好像都是搶救別人的積極分子和一些領導人。而被搶救者（共和國成立後當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政府部長和司局長等各級幹部的都有），不知什麼原因，卻很少見他們寫搶救，更沒見到說如何感動和自己為何如此不安之類的話。我至今只讀過被搶救和關押過的李銳、任仲夷等少數人的片斷回憶，但他們的重點都在反「左」。也許是其中多數人不願或不能（有禁區）談那段歷史，而不是如此健忘或沒感覺。於是積極分子就替他們「感覺」了，也因此才使「感動」、「不安」、「消除芥蒂」、「增強團結」、「心情舒暢」等寫進一些黨史讀物。為什麼有些積極分子不去「回憶」自己如何整人、如何搶救、如何傳授和學會「車輪戰」、「假槍斃」等方法，以及如何罵人、打人、污辱人，當時靈魂深處的活思想是什麼，事後有無懺悔之意，等等，卻要越俎代庖地去琢磨被搶救者的感情和反應，以致使我們至今看不到一本搶救者寫本人真實思想的《回憶錄》，更不用說《懺悔錄》了。

其實，這倒是可能起源於延安整風搶救，從而成為歷次運動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例如錢鍾書在《幹校六記》的《小引》中就說，幹校兩年的重要任務是搞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最後「水落石出」，一個也沒有。「按道理」，那些「充當旗手、鼓手、打手」的積極分子，最應當寫出「記愧」的文章。「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96] 所以這種文章至今未看到。錢先生着重講了人性上的原因，「記愧」吃虧。但我看主要還是體制上的原因。我們一貫實行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即積極分子在政治運動中的極左和過火行為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不用檢討（甚至不讓檢討，否則會洩密），經過運動的考驗還會得到重用。在這種政策下，會有「記愧」文章嗎（個別例外也許有）？

96 楊絳：《幹校六記》，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1–2頁。

根據我的所聞所見和親身體會，情況則是有些和上述積極分子的描述大不相同，甚至有點相反。而且這絕非個別現象，不但在延安，後來遇到其他根據地的被搶救者所談也大體一樣。實際情況是，當時被搶救者的氣主要是向着本單位各級領導（因為「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和積極分子的，多數人不但對毛澤東，連對康生也沒有什麼氣。所以毛澤東的賠禮道歉，不僅沒能消氣，反而使那種對本單位搶救者的氣發作出來了。因為以前無論自己承認與否，總是被戴上特務帽子，不斷挨鬥，許多人心中有氣也不敢發作，處於「被動應戰」態勢。現在連毛主席都承認弄錯了，你們還有什麼話說，被搶救者腰杆硬了起來，不怕再挨鬥了。而整人者，正如上面所說，自以為是響應號召、執行任務，服從組織，自然「心無愧怍」，仍然「理直氣壯」，給被整者作甄別時還要留尾巴，寫成「事出有因」（給搶救找個藉口，如說因為你有些自由主義、黨性不強或社會關係複雜等），雙方進行着激烈的「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一些積極分子說的消除了芥蒂、增進了團結，而是矛盾進一步激化（這是蔣南翔當時就在《意見書》中提到的），有的當時爆發，有的長期積怨（上引陳毅在「二月逆流」中的發言就提到）。

我所在的軍委編譯局，就在聽了毛主席賠禮道歉的傳達後，發生了一個被搶救者拿起凳子去打一個假積極分子（自己假坦白，又去搶救別人）的事。至於發脾氣、同領導頂牛和不理睬積極分子的情況，當然更多些。而且許多被搶救者的甄別結論這時還沒下來，頭上那把達摩克利斯劍還在懸着，心情怎麼可能「舒暢」。即使拿出了結論，本人滿意的也不一定是多數。這種悶悶不樂的日子，在我們單位，大概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離開延安。至於我和周圍的一些同學，對毛澤東的賠禮道歉只聽過一次傳達。聽後也感到高興，那是因為眼看這場冤枉人的搶救運動有了結束之日，弄清個人的問題更有希望了，但談不上感動和不安。其實在這之前就已開始了甄別工作，但因弄得很神秘（少數人的「暗箱作業」），大家還是不太清楚，這一傳達就等於公

開化了。對於毛主席主動承擔責任，當時並無感覺，既然發號施令的是你，當然應當負責。「文革」後由於把搶救說成是康生搞的，毛澤東似為代人受過，所以黨史學才又出現了一個強調所謂「主動承擔責任」的偉大精神問題。總之，我沒有見到聽傳達後如何感動和過意不去的人。現在看來，這幾次講話和賠禮道歉，實在算不得列寧所說的自我批評。列寧的要求是，「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97] 可毛澤東從來也沒有承認過搶救運動是錯誤（更談不上路線錯誤），自然也不會滿足後面那些要求了。至於他在整風中一再強調的，對錯誤必須採取主動態度，要深挖思想根源，詳細說明犯錯誤的經過和後果，提出改正的措施和努力方向，還要反復寫反省筆記，「以寫好為度」等等。所有這些，似乎都不適用於搶救運動，當然更不適用於他本人。所以對搶救這樣的嚴重錯誤，由毛澤東以偉大領袖的身份，向整錯的人敬個禮再講幾句詼諧的話也就行了。這哪裏像鄭重的自我批評，簡直有點像兒戲。例如，把自己的同志當「特務」整，刑訊逼供，還整死了一些人，怎麼能和洗澡多放了點灰錳氧相提並論！這不但對受害者交代不過去，而且註定類似錯誤以後必然會不斷重犯。事實也確實如此。搶救運動過後不久的解放戰爭期間，就有使許多幹部挨整和受委屈的所謂「三查」和「搬石頭」等運動。共和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每次整錯的不是全部也是多數。而「文革」中純是無中生有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就冤枉了幾千萬人，迫害致死者自然不少，但也是不了了之。搶救運動，如果沒有最後找出來個康生負責，大概也會像抓「五一六」一樣，逐漸從歷史書上消失掉。因此，以後的黨史著作，恐怕不宜再強調和渲染什麼「主動承擔責任」和「賠禮道歉」，更不要提倡這種不承認錯誤的「自我批評」如何偉大，而應適當揭示搶救運動的內幕和着重應汲取的教訓。

97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13頁。

第十一章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之二

—— 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和領導問題

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

問題的提起

在整風中進行審幹(即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是由毛主席、黨中央發動領導進行的。這本來不成問題,歷史也確實如此。在整風搶救期間,無論是大會號召還是小會勸說,都是用的黨中央、毛主席的名義,說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你們這些失足者坦白,誠心挽救你們等等。例如最近看到一篇紀念楊獻珍的文章[1],其中就提到任仲夷回憶1944年在北方局黨校被搶救的情況。任說,「我相信黨。」楊就說,「黨認為你有問題。」任說,「我相信毛主席。」楊就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其實在整風搶救中,這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且可以斷言,沒有任何人能夠提供任何材料,可以證明當時某個人(無論是高級領導還是「文革」後寫這方面《回憶錄》的人)曾公開或私下把毛澤東和搶救運動分開過。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設法分開的呢?是在「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和把康生揭發出來以後。因為這時需要也可能對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的歷史做點修改了。

說需要,是由於在撥亂反正中,搶救運動的真相被暴露出了一部分。即使在這一部分中,也有兩大問題對維護毛澤東作為偉大領袖的歷史地位和最終使黨成為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的延安整風極為不利。一是那場大規模的持久的搶救運動竟然沒有抓到幾個特務,這連參加搶救別人或被搶救的人也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搶救運動是公開進行的,誰被搶救過,大家一般都知道,何況有些人在坦白大會上還亮了像。但後來的甄別卻是秘密進行的,即使作了平反也是個別

1 蕭島泉:〈楊獻珍的自責與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通知,並未在原來搶救的範圍宣佈。所以人們互相並不知道誰搶救對了和誰搶救錯了,即使知道,也是自己猜出來或因關係好對方私下告訴的。直到離開延安,慢說外單位,就是本單位,到底在運動中抓到多少特務,是哪些人,除了「親自動手」的首長,恐怕誰也沒有底。例如我們外語學校,直到1986年看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編的一本1941–1985年《校史》,大家才知道在只有180名學生的學校裏被搶救的師生竟有75人,最後甄別結果,一個「失足者」也沒有。[2]而且有些人的甄別結論是很晚,包括離開延安後、共和國成立後和「文革」後才做出的。加之甄別結論不像打成「特務」時那樣張揚,當年聽到傳達或現身說法的人一般不會了解到當事人已摘掉帽子。例如我知道張克勤、吳奚如(著名的老黨員作家)等不是特務,就是在「文革」後。由於平反的晚,大約多數人也是四十年後才知道王實味不是國民黨探子的。二是在革命聖地延安和偉大的整風運動中竟會發生這樣草菅人命和踐踏人權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使人看到,搶救運動(就算叫審幹吧)中的殘酷無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黨校和任仲夷等回憶的北方局黨校的情況[3](比這更嚴重的還有),較一直批判的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知要厲害多少倍。而這些,當時恐怕也是很少人才知道的。所以在很長時間裏,人們基本上還是相信毛澤東的估計:搶救運動「成績是偉大的」,「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拿件數來算還不能否定我們運動的性質」。[4]現在經過撥亂反正,已經露出來一部分真像,人們看到搶救運動不僅談不上什麼成績(既未抓到特務,又沒很好總結和汲取教訓),只能說是對廣大

2 《北京外國語學校簡史1941–1985》,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第6、16頁。

3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3頁;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40–341頁;〈任仲夷回憶〉,見《南方週末》2000年8月17日。

4 毛澤東:〈時局問題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黨校的報告),《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60–361頁。

幹部和革命群眾的一場災難。而且還在搶救運動期間就估計和斷定，陝甘寧邊區黨政軍中的國民黨特務有一萬人，「各根據地合併就有十萬大軍」，[5]「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6]被搶救的人大部分是新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但也有一批當時就擔任領導工作，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升任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國務院部長的，如柯慶施、陶鑄、劉瀾波、劉建章、武競天、任仲夷、周建南、李爾重、張維楨、雷任民、宋維錚、梁膺庸等，還有許多十幾歲天真無邪的中小學生和目不識丁的工人農民。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這場運動都是實在荒唐，事後很難想像的。這樣的運動還能說成「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怎麼能同偉大領袖和光榮正確的黨相聯繫？因此，對這段黨史必須做些修改。於是，名稱從搶救運動變成了審幹運動，時間從兩三年變成了十來天，特別是發起者和領導者從毛澤東變成了康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說法，等等。

說可能，是因為「文革」後提出了康生的問題，並做了永遠開除黨籍的處理。而他正是整風期間總學委副主任和社會部長，又是「文革」中大量製造冤假錯案的專家和「國人皆曰可殺」的小人。於是康生這個確也作惡多端的傢伙一下變成了個大籮筐，整風搶救中的什麼錯誤和罪惡都可往裏裝。正式的黨史論著、許多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都把搶救運動的罪責推到了康生頭上，有些還強調，多虧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及時察覺和糾正等。康生被描寫得極其神通廣大，不但在延安和邊區到處點名抓特務，指示和派人到敵後根據地搞搶救，而且其他壞事或錯誤（如薄一波筆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對彭德懷的過火鬥爭）也總是有他的插手。想當年康生得寵時，哪一個敢把整風搶救中的錯誤和罪行同他掛鉤。但當康生被打倒後，說也怪，搶救運動就一下被說成完全是他搞的了（胡喬木說的「康生這些人」，不知還有

5　毛澤東1943年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見《延安整風實錄》，第379–380頁。

6　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給陳毅、饒漱石的電報）。

誰）。而且「曾參殺人」，「三人成虎」，宣傳多了也似乎真的變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連被搶救和關押了一年多的李銳都說，「延安『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並執行」，「幸有毛主席的九條方針」云。[7]可見輿論導向和意識形態管理的作用之大。這也就是為什麼黨史的研究和論述一直受到重視和一些問題得到及時定調或修正的原因。例如「文革」才過去不久，就確定一切罪責都歸之於林彪、「四人幫」。於是，上自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一般幹部群眾，凡在「文革」中被整的，都說成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而且連胡喬木也硬說，許多重大事情如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人在什麼地方和受什麼虐待等，毛澤東並不知道。[8]但他們的家屬卻說，不僅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疏散」和安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連他們的子女能否升學、能否探親，也必須經過毛澤東的批示。[9]更具體的證據是，1967年1月1日彭德懷就給毛澤東寫信，說他「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周恩來第二天就批道，「碰頭會上已宣讀，即送主席、林彪同志、江青同志傳閱，擬退彭德懷專案組存。」[10]諸如此類的證據，真是不勝枚舉。為毛澤東開脫的專家學者，不可能不知道，更不用說胡喬木了。如果真不知道，那也不應假裝知道而說些不符合事實卻又以權威自居的話。

看來這大概是我們的黨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既從蘇聯學來，更繼承中國封建傳統），即一方面，竭力維護黨和領袖以及其他領導人的威信，實行「為尊者諱」，把他們說成一貫正確，對一些無法

7　李銳：〈世紀之交感言：還是要防「左」〉，《書屋》2001年第3期。後收入《直言》（見第438頁）時刪去「發起」。但說搶救運動由康生「執行」也不確切，因為根據中央規定，是由各單位各地區領導「自己動手」執行的，所以才出現大不相同的情況，有的地方厲害，有的地方甚至沒「執行」。這點，後面還要談到。

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頁。

9　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10　薛鵬、孔繁玲：〈彭德懷晚年歲月實錄（之五）〉，《中華兒女》2002年6月。

推卸的錯誤則盡量採取淡化、含糊或《紅樓夢》上「真事隱」的辦法不提名道姓(至今傳媒仍如此，凡正面報道均提名道姓；凡負面報道，除被打倒者外，不但一般不提人名，連地方、機關也以「某」代)。另一方面，被打倒者往往成了錯誤和罪行的大籮筐，盡可能地把壞事往他頭上推。有的人以前被捧上了天，後來又一下變得一無是處。這當然不能叫作實事求是，但卻是延安整風以來存在的普遍現象，且有日益發展的趨勢，所以有必要以搶救運動為例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有的黨史專家在談到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問題時提出，「誰應負責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好的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11] 其實正是由於對搶救運動不追究責任，大搞逼供信以至有人命案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普遍得到保護和重用，被搶救錯者得不到揚眉吐氣，許多人長期背黑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也不可能進行總結，當然無法汲取教訓，更嚴重的是使類似錯誤不斷重犯。也許是由於認識上的這種「差之毫釐」，才得出了「怎樣對待『反對者』？毛澤東為後世做出了表率」(還特別提到蔣南翔對搶救提了意見反而得到重用這一與事實正好相反的例子)[12] 的結論。通過對延安整風的研究，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反對者」幾被消滅殆盡之後，還會得出這種結論，就使人在吃驚之餘頓生「失之千里」之感。如果我們還要認定，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和執行，為毛澤東察覺並糾正，現在大概會和幾十年來一樣，仍然不能「更好地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所以研究搶救運動，弄清運動的發起和領導，還是十分必要的。

11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頁。

12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291–292、463頁。

搶救運動是由誰和怎樣發起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對搶救運動允許稍作討論後，就由領導定調，多數人緊跟，很快形成了一種佔主導地位的意見，即上面提到的：運動為康生發起和執行，幸虧毛主席及早發現並制止，沒有造成什麼嚴重後果，所以只是延安整風中一個小的曲折。不但各種記述和討論延安整風搶救的正式黨史及有關的文章書籍，而且許多領導人和積極分子的回憶錄，大都是按此路子寫作和整理的。特別應該一提的是，對搶救運動非常了解、且親自參加過搶救別人，又是中共黨史學的開拓者和領導者的胡喬木，就在一次談話中說，「比方像搶救運動，確實是康生這些人搞起來的，並非出於毛主席的發動。」毛主席只是「在一段時間裏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後才糾正了這些錯誤。」[13] 這不但不合乎事實，而且有悖於邏輯。按照胡喬木所說，康生成了毛澤東的領導者了。因為稱得起運動的發起者，至少得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首先倡導，二是得到響應。對搶救運動，最先在中央的重要會議上提出「要發現壞人」、「要查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等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康生。康生即使有這些想法，他也只能向毛彙報，由毛出面號召。而且涉及全黨和普及到所有根據地的搶救運動，康生本無資格號召；即便想號召，大約也不會有多少單位和地區響應。我就沒有聽到一個搶救者或被搶救者說過他是響應康生的號召。連「文革」都還沒有人說是林彪、「四人幫」等人所發動，難道搶救運動由於事隔久遠，知之者少，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其實，正因為不顧事實，所以胡喬木這篇談話本身就破綻不少，自相矛盾。例如前面才說過，「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14] 緊接着，為了減輕毛澤

1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2頁。

1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東「左」傾錯誤的分量，又很快改口說，「不過，這些確實是很短暫的。」[15] 後來大概有些人覺得這種說法太不合情理，所以就做了一點調整，指出搶救運動是黨中央決定和部署的，但又要設法讓康生負主要責任，如說他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到處插手製造混亂，是搶救運動(肅反)的「主要領導人」等。[16]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雖然有關討論日趨沉寂，但是正式黨史著作和少數人的論述，已多以這種說法為基調了。這當然比以前那種眾口一詞卻不近情理的說法強一些，但由於只是在上述規定的框架(即淡化和簡化搶救運動、為尊者諱、加重壞人的罪責等)內進行微調，所以還是不能自圓其說。例如：在大講實事求是、大搞調查研究的整風運動中，中央其他領導人怎麼都會受康生一個人的欺騙；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竟然可以隨意鬥這個整那個，包括柯慶施等不少高幹、各地選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身邊的人、以及不少領導人的妻子；康生有那麼大的權把幾乎整個國統區的黨打成「紅旗黨」，把審幹權從中組部拿到社會部，把陳雲擠出中組部；列為康生製造的一些重大假案，多是只有結論，不講根據，又怎麼能證明是康生製造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列舉很多，都是從來沒見過有人能解釋清楚的。原因就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

如果真正講實事求是，那麼在大量的史實面前就只能得出結論：搶救運動是毛澤東發起並在他親自關注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作為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央的決定和部署。康生既不是搶救運動的發起者，也不是它的主要領導者，而只是善於揣摩領袖意圖，並據此上躥下跳，推波助瀾，把錯誤引到極致的一個小人。所以康生雖然早在1939年2月已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下半年中央就接

1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2頁。

16 例如直到2002年《百年潮》第5期發表李東朗的一篇〈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仍持此論。

連做出了兩個有關審幹和鋤奸的決定，即8月25日《關於鞏固黨的決定》和10月10日《關於反奸細鬥爭決議》，[17] 卻也並沒有見到他曾借此興風作浪，發起什麼運動。至於這時期的「肅托」和康生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仍是糊塗賬，各種黨史也從不提起。就是在1940年8月全面審查幹部工作開展後，如前所述，社會部1941年關於清理嫌疑分子的兩份文件也還比較穩妥與溫和。直到1941年9月政治局宣佈成立以康生為主任的中央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以後，也沒看到揭露出他有什麼重大劣跡。看來，康生真正放開手腳做壞事，主要還是在1942年開始的普遍整風後。因為他已完全揣摩到整風中要大搞肅反，在這方面對他會有更多依賴，他也正可大顯身手。如果將整風中毛澤東和康生關於肅反的言論加以排列比較，就可以看出康生基本上是緊跟和充當打手的角色，並不是什麼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

這並不是說毛澤東一開始整風就要發動搶救運動。但正如人們所傳康生的話：「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18]（延安整風中說的審幹，從頭到尾都是指的肅反，第二句話實為同義反復），事情也真是這樣發展的。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目的，就是他一再說的「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並以高級幹部為重點，因為他們在這方面起着決定性作用。整風中的反對主觀主義，實質上就是要把全黨首先是高中級幹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上來；反對宗派主義，就是要實行高度集中和絕對服從；反對黨八股，則是要打擊那些身份高或知名度大的知識分子(即被稱為教條主義者)的「威風」，全面推行可稱為「延安文風」的一種文風。

在1941年「九月會議」上層整風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央領導對整風認識基本達成一致(對沒參加「九月會議」的兩位重要領導人周恩

17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第155、181頁。

18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其他地方引證的也很多。

來和彭德懷，由毛澤東親自不斷通報情況和做工作）的條件下，1942年開始了普遍整風。其主要目的是把知識分子幹部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但同時還有兩個作用。一是發動群眾批判領導上的三風不正，使「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的人們受到上下夾攻，處於孤立，同時也燒一燒各級領導中的官僚和軍閥作風。所以一開始就提出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相結合，意在使矛頭向上。二是通過運動暴露錯誤思想和階級敵人，以便批判和清查，就是後來所謂的「釣魚」或「引蛇出洞」。為此，頭幾個月都是強調「放」，提倡不同意見的爭論，不准歧視和壓制。[19]這在中央決定、內部通知和一些電函中說得更清楚。[20]其實不用到1943年，1942年普遍整風一開始，知識分子們的「錯誤思想」已以《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為標誌紛紛暴露了。在整風肅反的最高領導分清兩文作者的錯誤性質後，就開始了全延安對王實味及其所代表思想的批判和聲討，普遍整風也就逐步轉入肅反。

而在這之前的4月上旬，政治局會議聽取康生關於國民黨對延安動態反應的彙報，提到《輕騎隊》時，與會者就已反應強烈，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歷數延安「特務分子」的種種罪行。聽了彙報和發言後，4月17日毛澤東說，「在檢查工作與審查幹部中發現反革命分子，應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這次高級組學習計劃的改變，由研究歷史到注意十八個文件的學習，到現在審查幹部，是很有益處，很有必要

19 例如1942年3月19日《解放日報》社論〈發揚民主作風〉，就公開號召黨員幹部要「傾聽各種不同意見」。

20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中就明確寫道，「在領導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地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批評領導，批評工作，……絕不加以抑制。」「這樣做的目的，第一，在於使下情獲得上達的機會……第二，在於讓有錯誤思想的同志盡量表現其錯誤觀點……第三，在於使內奸分子利用我們的民主政策，認為有機可乘……以便誘使他們盡情暴露」。「領導人員對之均要鎮靜忍耐，不慌不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30–31頁）。這已說得夠清楚了。

的。」[21]這是最早佈置審幹肅反，也是緊接着毛澤東看了《野百合花》拍案而起之後。可見五至七月的王實味事件，只是從整風轉入肅反的導火線和使審幹肅反走向半公開化而已。所以王實味被揪出後，延安的普遍整風已不大再提反對三風不正，重點隨即迅速轉移到思想上批判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和民主化，組織上追查內奸分子（辦法除內查外調、會上會下交代歷史和社會關係外，還反復填「小廣播調查表」，以發現破壞分子），而且越往後越向肅反傾斜，終於進入全面的搶救運動。

由此可見，發起搶救運動既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那樣的暴露，不發生王實味事件呢）；既是原有的計劃（出於領導人的肅反情結而非一些人所說出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又是發動群眾造成的結果（每次群眾被運動起來後總是越來越「左」）。這些，在共和國成立後都是屢試不爽，得到再三證明了的。例如所謂的「胡風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立即認定暗藏的反革命還很多，於是1955年7月1日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定陸定一「掛帥」，在全國發動了一個有四百多萬人參加的肅反運動。「運動開展以後，鬥爭對象超過了5%的比例。陸定一覺得不對頭，於是向毛澤東請示，不能再發展了。毛澤東表示同意，並稱讚他說：『你有大將風度，能進能止。』」[22]至於稍後的反右派鬥爭以及其他大的運動，就更不用說了。對照這些，對普遍整風轉入搶救運動也就不難理解了。

21 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75–376頁。

22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2頁。

作為轉折點的王實味事件，近二十多年已有大批文章書籍介紹和討論，而且幾近一致地認為這是康生製造的。[23]但仔細考究起來，似乎康生還沒有這個資格。他可極盡煽風點火、添油加醋之能事，但整個指揮權還輪不到他。先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的權威論述。毛主席「在整頓學風階段（大約指1942年5月到10月）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多次主持文藝座談會；二是從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同志錯誤思想的揭發轉變為對其政治歷史問題的審查。這在當時是轟動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為審幹（引按：即搶救）運動有直接影響。毛主席非常關注事態的發展。」[24]

其次，從批判的陣容和安排看，只有毛澤東有權作此部署，如派曾長期任中央重要領導、對鋤奸既有經驗又不手軟的李維漢前去主持（掛帥）；派李富春、楊尚昆等領導人和毛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張如心等參加批判；審改並送《解放日報》發表李維漢給王實味定性的總結報告和范文瀾、周揚、艾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等。這些難道是康生能辦得到的？

第三，毛澤東的直接過問還表現在不但隨時有單獨批示，而且幾乎每次都有會前研究和會後總結。例如4月6日在毛澤東主持的高級學習組會議上，李維漢彙報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情況；第二天（4月7日）中宣部就專門約集中研院領導和積極分子開會，部長凱豐在總結發言中已直接批評到《野百合花》及其代表的偏向；6月3日晚，更在毛澤東住處開會研究對策，有人提出王實味發表長篇謬論怎麼辦，毛指示：「准許插言。」這些又難道是康生所能左右的？

23 包括當時參與此事的某些領導和積極分子如李維漢、溫濟澤等。後輩的黨史研究者就更不用說了。直到2002年第5期《百年潮》載文〈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還將製造「王實味案」列為「製造一連串錯案影響中央決策」、「將運動引上了歧途」的第一樁。

2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頁。

第四，宋金壽兩次專訪中組部，了解到中組部保存有1942年10月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是由凱豐簽署，毛澤東親批的，文字很少，只說王實味因托派反革命，開除黨籍」。

第五，說「王實味案」是康生製造，都是只有結論，不提根據。李維漢是最早提出復查的。他對幫助他整理回憶錄的宋金壽說，「王實味的問題是由我引發的，我有責任把它搞清楚。王實味被定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據是什麼，大家都不大清楚。這個責任要康生負。康生說過，王實味不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復興社（藍衣社）分子。」其實，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到底是誰先說的，至今還是糊塗賬。看來還是李維漢先說的可能性大，在1942年6月11日他對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座談會作總結時，就已給王實味定了性。他說，「根據座談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王實味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他的言論不僅有政治的目的，也有組織的企圖。」直到1981年6月，宋金壽將整理好的李維漢回憶錄《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風運動》的稿子送給李看，此時李已病重，在病榻上給宋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條是：「⑤王實味是托派，在報紙上發表過沒有？我覺得在寫批判王實味時，只提康生說他是托派就可以，不必扯開。」這種說法顯然有隱情，更沒說出王實味的托派和反革命是康生所定的根據。至於宋金壽所引證的康生談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原始記錄，其中雖然也提到王實味，但主要是講「五人集團」，而且講的時間已是1943年8月，帶有內部總結經驗的性質，並不能證明王實味的托派問題為康生先提。

第六，據我所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溫濟澤在他的回憶文章和書籍中把康生說成「王實味案」的直接製造者，所提具體根據就是他所記得的鬥爭王實味時李言對他的幾次談話。例如在《溫濟澤自述》中提到，李言告訴他，康生說王實味是托派，還是藍衣社特務。但與溫寫這類文章的同時，李言卻對訪問他的宋金壽說，當時是他到組織部去看了王實味的檔案才知道王交代的與托派來

往情況。而且還特別聲明:「關於揭發王實味的托派言論，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這些。有沒有別的材料，我們不知道。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也沒有告訴過我們。」眾多回憶材料中提到王實味與托派的關係，也都說是潘芳、雪葦等人在座談會上的揭發，並非李言或他找人給捅出來，溫濟澤的回憶錄和李言所談也完全不同。從現有材料看，第一個指明王實味加入了托派組織的倒是陳伯達，也還不是康生或李言。[25]由此可見，實際上,「王實味案」為康生製造之說，在黨史上只是一樁人云亦云(最初說的人可能是依照黨史傳統筆法)的事情，沒人能說清來龍去脈。而且溫濟澤的說法就矛盾百出。例如照他說來,「五人反黨集團」中的王被康生說成是她的堂兄「王昆侖派到延安的藍衣社特務」。而且他的說法表明，不僅延安的所有領導人和黨中央有關機構都不知道王昆侖的政治面目，就連周恩來、董必武回到延安也只說王「思想進步，是我們的朋友」。一直「到建國以後，人們才進一步知道王昆侖從1933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秘密黨員。」[26]全黨沒有一個人知道本黨有這麼一個黨員，這可能嗎？又如說，李維漢1942年9月,「下放(原文如此)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任秘書長。四十多年之後，李維漢有一次和我談話，才告訴我，這是當時康生向中央提出的打擊他的建議。」[27]但是胡喬木卻說,「李維漢去當秘書長，這是毛主席下的很重要的決心」,「是很重要的一着棋，這在陝甘寧邊區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協調林老、謝老和高崗之間的關係上。」[28]稍微了解那段歷史情況的人恐怕只能相信胡喬木而不會去相信溫濟澤。

25 以上材料來源見:《王實味傳》、《中央研究院回憶錄》、《溫濟澤自述》、《延安整風實錄》;宋金壽:〈為王實味平反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50輯。

26 《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

27 《溫濟澤自述》,第147頁。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4頁。

最後，也並非不重要的是，從現有文獻看(我能看到的)，在中央領導層把王實味說成是托派加特務的，首先還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而且用「國民黨探子」、「蹲班房」這類詞匯的也只能是毛，而不像康生或其他人)。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5月23日)中說,「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29]其中指的大概就有王實味。事實上在內部很快就挑明了。他在6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的整風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30]而且他估計,「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還提出,「對過去參加過派別活動的老的壞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對於意識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31]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在王實味事件後，毛澤東已從思想認識到具體部署上準備進行全面肅反了，只是還沒公開號召，先在內部進行。緊接着就是中央黨校查出「吳奚如特務案」和中研院與中央政研室的「五人反黨集團案」。但其他機關學校卻沒有什麼大的動靜，更沒抓到多少暗藏的壞人。於是在10月開幕的西北局高幹會上，毛澤東講到整風問題時就批評了對敵特破壞缺乏警惕的自由主義。在後來的報告中，他更明確宣佈：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與非無產(半條心)，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提出要重視反特鬥爭，要各單位抓第二、

29 《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316頁,編入《毛選》已刪掉。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3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頁。

第三個吳奚如、王實味這一類人，也點了「五人反黨集團」的名。[32]半個月後的12月6日，一方面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33]一方面是康生在高幹會上作關於審幹肅反的動員和情況介紹的報告，並嚴厲批評對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態度和自由主義傾向。1943年1月4日，彭真也在會上作了反奸肅反報告，結合中央黨校破獲「吳奚如特務案」，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高崗也趕快緊跟，使會議做出決定，要清洗黨員10%。[34]也就在這個期間，康生和社會部領導在自家門內製造了「張克勤特務案」，做出了「示範」。所以西北局高幹會後，接着就是1943年的「四・三」決定和幾天後的動員大會，於是肅反運動(即後來所稱的搶救運動)就在延安遍地開花了。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研究延安整風的著作和一些真實回憶，都把搶救運動的上限定為1942年底甚至更前一些的原因。

談及「張克勤特務案」的論述實在不少，而且更眾口一詞認為是康生製造。其實，對此也需要稍作辨析。當然，這事出在社會部辦的西北公學(簡稱西公)裏，康生出任總後台是不成問題的。但把製造此案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康生卻有失公允，所以我在前面加上了社會部領導。因為在當時的氣氛下，難道只有康生要對上迎合、表現自己，而專事鋤奸工作的社會部其他領導同志就對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與部署置若罔聞而不積極響應？因此，「張案」應看作社會部集體創

32 引證毛澤東這兩次講話(一為10月19日的開幕詞，一為11月21日和23日〈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中有關反特鬥爭的材料很多，有詳有簡，但多是個人著作，如《延安整風實錄》，第368–369頁，《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所載〈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等等。正式的文獻和著作，如《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以及其他黨史論著，都一概不公佈、不敘述。這也是黨史編纂學中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為尊者諱」的表現。

33 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

34 對以上情況，《延安整風運動紀事》、華世俊和胡育民的《延安整風始末》等均有介紹。這裏主要參考了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九到第十二章。

作，不能只往康生的「籮筐」裏裝。當時西北公學的正副校長李克農和李逸民都是我比較熟悉的老首長。正是這位李逸民，1941年還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時，硬是把我這個馬列主義小教員調去學了俄文。我了解李逸民是位忠厚長者，因此也完全相信他在《參加延安「搶救運動」的片斷回憶》中有關搶救張克勤具體情節的敘述。這就是：1942年11月間，在李克農親自佈置和直接領導下，西公審幹領導小組幾位成員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王濤江、毛誠在汪東興辦公室提審張克勤。在張拒不「交代」的情況下，他們根據汪東興提供的在中央蘇區肅反鬥爭的經驗，分為兩組連續突擊審問，即使用車輪戰(可見車輪戰也非傳說中的康生發明)。經三天三夜連續作戰，張克勤終於招認，並根據康生和李克農的指示讓他在第二天的全校大會上作現身説法。[35]另據説，後來張克勤曾翻案，氣的李克農用手抽他耳光，從此他再也不敢翻案了，而且還被安排在各地坦白大會上作典型報告。「張克勤案」對康生來説確有重大作用，既可向上交差並邀功，又可作為重要經驗向各地推廣，把本來就是不該發動的搶救運動搞得更亂。[36]

經過上述這一系列的發展演變，毛澤東遂決定以1943年為審幹年(有些敵後根據地則規定推後一年或半年)。這年春天，延安整風即「轉入以審查幹部、清理隊伍為主要內容的第二階段。」[37]根據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央發佈了主要內容為佈置肅反的第二個

35 《革命史資料》第3集，1981年版。

36 有關張克勤案，黨史著作多有敘述，特別是各種民間的編著。談得較詳細的，除上述《李逸民回憶錄》外，還有：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曾繁正主編：《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上)，紅旗出版社1988年版；郝景泉編著：《黨史風雲實錄》(下)，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文聿：《中國「左」禍》，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等等。

37 《延安整風實錄》，第369頁。

「四三決定」(《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別召開了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兩萬多人的幹部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在會上作了《特務活動和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報告，號召「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的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種自己滅絕的死路。[38] 會上還由張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報告。於是搶救運動就在整個延安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且完全公開化了。到6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和我黨反特鬥爭的指示》已指出，「延安各機關學校各級幹部一萬人中，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國民黨特務及日本特務將近一千人。」在幹部中抓到十分之一的「特務」還不滿足，7月11日，中央總學委又發出通知，要求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39] 可見，從4月份起，延安的搶救運動已經不再是風雨滿樓，而是山洪暴發了。那些堅持把搶救運動寫成開始於康生7月15日《搶救失足者》報告之後、而且只進行了十多天就被毛主席發覺和制止了的黨史研究者(他們許多人看到的資料比我多得多，更不用說那些可以翻閱機密歷史檔案的人了)，請設身處地和真正實事求是地想一下，這些說法能站得住嗎？

從以上的簡略敍述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完全是毛澤東既有計劃又隨着形勢發展而發動起來的，並得到中央主要領導人(不是全部)的支持，以及大批骨幹和積極分子的響應和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康生無疑在搶救運動中做了許多壞事，但說是他「發起的」、「製造的」，甚至說成是違背毛主席的部署、是對毛主席指示的「陽奉陰違」等等，[40] 卻都沒有大約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能站得住

38 《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頁；《延安整風實錄》，第372–373頁。

39 《延安整風實錄》，第373頁。

40 如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和後人編寫的《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敍述。

的根據，而且邏輯上也說不通。以康生的地位和權力，怎麼可能在延安那塊巴掌大的地方和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眼皮底下，製造那麼一場捲進全體幹部和許多群眾、時間又長達兩三年的驚天動地的運動？但是這種說法的流行和佔主導地位，也說明封建傳統和個人迷信的影響之深廣和黨史編纂學上「為尊者諱」等原則執行的嚴格。

關於搶救運動的領導

搶救運動始終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這同樣也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且毛澤東歷來對他發動的運動都一抓到底，毫不放鬆，從開始部署(如規定指標、安排步驟和宣傳口徑等)，不斷督促檢查，到最後結束，都管得非常具體、細緻。凡對共和國成立後各種政治運動稍有了解的人，對此大概都不會有什麼懷疑。先不說抓潘漢年、反胡風及其他政治運動，就是對1951年開始的「三反」，他也管得具體、細緻。高崗在東北抓到個把「大老虎」(大貪污分子)，趕快上報表功。但毛澤東回電卻潑了冷水，還下達了5%的指標。由於毛澤東提出「上海可能有上千隻老虎」，大約為了完成任務，地方上就想出了個「思想老虎」的名目，於是兩袖清風的顧準和黎玉、惲逸群等一批高幹隨即中箭落馬，其中就有毛澤東親批的黃逸峰(這些「思想老虎」，「文革」後均已平反)。[41] 這還是在「邊抗(抗美援朝)、邊建(恢復和建設經濟)」、日理萬機的緊張時期。而整風期間的延安(1941年秋到1945年夏)，則處境相對安靜、工作較

41 高建國：《顧準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章。

為輕鬆，也不用直接指揮打仗(抗戰時期敵後根據地基本上是各自為戰)，所以毛澤東主要就是抓整風審幹。他也不斷強調整風審幹的重要，並要求各級領導務必抓緊。不過根據他的總體安排(他也多次説過)，1942年是整風學習年，1943年才是審幹肅反年。因此，1942年多強調整風，他在4月20日的講話中就「要求全體幹部把整風學習當成一項中心工作」。[42]《解放日報》6月5日社論《延安一個月學習運動的總結》中也明確提到，「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學習總委員會，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來更細密的及時的領導整個延安的學習運動。」[43]毛澤東也確實抓得很緊很細，不斷督促檢查。1943年2月10日還致電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等各地領導人，要求他們回答的問題之一就是:「各級負責同志是否以身作則，親身負責領導學習，有無放棄職責，將學習領導交給秘書或他人管理之事？」[44]及至1943年第二個「四三決定」發佈、全面展開肅反後，毛澤東就已密切關注和指導着肅反運動的進展，不但整風審幹並提，且對兩者的評價提得同樣高。如1943年6月6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就説，「如能在今年真正做好整風，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審查幹部(前面曾注明「主要是清查內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請你緊緊抓住此關鍵」。[45]只是從這一簡單敍述中，人們即可看到，對這樣大的「關鍵」問題，怎麼可能像許多人後來説的那樣讓康生去領導，甚至説毛澤東在總學委也只是「掛個名」，劉少奇更不大了解情況，所以「很多事實際上還是康生在主持這方面的工作」。這都實在把康生抬得太高了，當然不可能是事實。其實，康生不但無權領導全局，許多系統、地區和單位也是他管

42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黨建讀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221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514頁。

4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27頁。

4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44頁。這是由於敵後情況與延安不同，整風、審幹各推遲一年。

不了的，如任弼時、高崗領導的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彭真(上面直接管的還是毛澤東)主管的被稱為延安整風審幹重點的中央黨校，更不用説一些敵後根據地了(以黨中央名義派舒同赴山東推廣延安搶救經驗的做法都沒行得通)。

其實，毛澤東本人倒是一直承認搶救運動是他發動和領導的，多次説，「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他也從來沒有把罪責向康生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關頭還為其辯護和開脱。例如針對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電函中的如下指責:「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佈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46]毛澤東在1944年1月2日的回電中答覆説，「康生是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並不負責審查幹部。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隨後即和蘇共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進行了談話，當彼得提到一些黨的領導人對康生有看法時，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這些人的説法。[47]後來在七大會議上，康生發言主要講黨的農民政策等問題，對搶救運動不作檢討。一些代表對此寫條子質問，他卻回答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線。[48]

46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頁。按：這時季米特洛夫雖已不是共產國際總書記，但仍在蘇共中央任職，因此他用的是個人名義，代表的卻是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意見，毛澤東不能不重視。對搶救運動，蘇聯駐延和駐渝人員當然知道是毛澤東直接領導，季氏只指摘康生，也是由於不便於直接批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而康生及其機構在搶救運動中也確已惡貫滿盈。

47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頁。

48 〈康生年譜〉，見仲侃:《康生評傳》，紅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頁。

寫到這裏，實在有點想不通，那些把搶救運動的罪責完全加給康生的黨史專家，為什麼在這方面一定要和毛澤東唱反調？有什麼根據不相信毛澤東説的對搶救運動中的錯誤他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他，而偏要製造一些既違背歷史真實又自相矛盾的說法？這裏僅以比較權威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為例，細加揣摩，也許能看出一些問題。先是說，「延安審幹（按：即毛澤東注明的『主要是清查內奸』，很快發展為坦白運動或曰搶救運動）從1942年冬季開展後，毛主席密切的注視着運動的發展，」（可見不是「掛名」）還很快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也不是「沒怎麼管」）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以「加強領導」。[49] 可是在敍述了毛澤東如何重視之後，筆頭一轉卻來了個「但是，審查幹部的實際工作卻沒有像毛主席設想的那樣順利發展。」又不說明原來的設想是什麼，只是把沒「順利發展」的責任推給了下面「負責審幹工作的同志」和「專門負責審幹」的康生。[50] 那毛主席和那個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幹什麼去了？須知延安並不大，人口只四萬，其中幹部和學生約佔一半，一切都在毛澤東、劉少奇的眼皮底下，他們對當時全黨這一中心任務又是情況明、決心大，怎麼能讓康生和其他「負責審幹工作的同志」（按「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規定，應為所有領導幹部）長時間搞「特務如麻」，還在「不少單位」「採用『逼、供、信』」？[51] 又是什麼原因才使「毛主席逐漸（引注，為什麼不是很快）發現了審幹工作的偏差，不斷地（引注，為什麼不立即）採取措施予以糾正」？[52] 而且如上所述，在「正式發佈毛主席提出的首長負責等九條方針」後，為什麼反倒使搶救運動更加猛烈？這樣的敍述和論斷，能講得通嗎？能使當年在延安和敵後根據地參加過搶救運動的人相信嗎？

49 見該書第276–277頁。

50 見該書第277–278頁。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7、278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7、278頁。

在此還應順便一提的是，最近看到新出版的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經過修訂的正式《1921–1949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有一段題為「整風過程中的審幹工作」。其中寫道，「（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反特務鬥爭問題，認為『搶救運動』應予否定。」[53]

這一論斷大約仍然是為淡化搶救的錯誤而想出來的。因為第一，文中未提哪怕一句當時紀錄上的根據；第二，事實是這次會議後許多地方搶救運動搞得更厲害了，包括毛澤東直接領導、彭真經常彙報的中央黨校（如薄一波、曾志等的揭發）；特別是一些敵後根據地；第三，這一說法同其他正式黨史著作如《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等以及《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介紹也大不相同。胡書上說，「對於搶救運動以來的反特鬥爭，會議認為應從兩方面分析」，而且首先指出五條成績，可見並沒有「認為『搶救運動』應予否定」；[54] 第四，如果1943年底搶救運動即已否定，那在黨史上也不會長期成為禁區，中央對搶救運動的惟一一次評價（1955年8月《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也不致說，「延安的審幹運動，中央定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中間一段即第二階段的『搶救運動』是有偏向的。」只有「偏向」，當然不等於「否定」，兩者精神有本質的區別。僅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官方的黨史編纂學仍然繼續堅持因政治需要而定的框框第一，歷史真實倒在其次。

實際上，由於1942年底以後，整風中的審幹已是中央所抓的頭等大事，所以毛澤東、劉少奇和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其他成員，對搶救

5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21–1949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頁。

5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86–487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32–435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279頁。

運動的進展以至許多具體的人和事，都是一清二楚的，並不是「逐漸發現」「偏差」和「不斷採取措施予以糾正」。即以毛澤東而言，延安搶救運動的發起、領導、進度、作法、存在問題、抓到「特務」人數以及一些具體案件，他每天聽彙報、看材料，基本上可說了如指掌。例如，任何人不可能提供任何證據，說明毛澤東對以下列舉的人和事及有關情況竟然不了解，或者是後來才「逐漸發現」的。以人頭論，從王實味、吳奚如、「五人反黨集團」、張克勤到那些被搶救的著名人士，包括在邊區政府工作的張曙時(原國民黨左派，南昌起義時任革委會委員，1933年入黨，1943年5月李維漢親自主持搶救[55])，吳伯簫(著名作家)、黃亞東(邊區銀行行長)；中直的柯慶施(統戰部副部長、參加整風高級組學習)、武競天(中組部秘書長)；地方黨的四川工委書記鄒鳳平，甘肅省委書記孫作賓，河南省委兩任書記王志傑和張維楨、組織部長危拱之、宣傳部長郭曉棠；毛澤東自己身邊的葉子龍妻子蔣家英(送黨校搶救)、公務員羅海章、苟興錄(抓到西北公學搶救)、秘書處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被社會部抓走)，以及積極搶救別人的胡喬木(他曾晚上提着馬燈向行政處學委負責人劉英建議對凱豐妻子和鄧潔妻子使用車輪戰，說這樣可使其在疲倦頭暈時講出實話)[56]；投奔延安的二戰區少將參議錢來蘇(其子彭爾甯、還有女兒、女婿均被搶救。錢被軟禁在交際處，常發脾氣以至絕食，處長金城多次報告均無下文，直到1944年2月8日才得到毛澤東模棱兩可的批示：「金城同志：錢拯(按：即錢來蘇)應優待他，他可能不是漢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務也還是疑問，如不是，應平反的。」[57])；在搶救中被迫自殺的鄒鳳平、柯慶施妻曾憲蘭、原凱豐妻(逼瘋後死的)等等。

55 《林伯渠傳》，紅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頁；陳永清：〈紀念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見《懷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頁。

56 劉英曾多次談到這一情況，如1999年1月28日、6月1日、6月10日等。

57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593頁。

至於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如延安從1943年4月起開各種坦白大會、聲討大會、搶救大會，任弼時、康生等代表中央講話或做報告；1944年初，主要由綏德師範和米脂中學的學生組成的「坦白運動先進典型代表團」到延安一些機關學校做報告(我就參加了一次在中央大禮堂的報告，小孩們上台後先向台上坐的一排中央首長鞠個躬)；1943年延安和邊區機關學校以主要力量搞搶救；幾乎整個大後方的黨(十多個省，如四川、河南、甘肅等)被打成「紅旗黨」，等等。所有這些，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當時肯定都是知道的，而且這一時期《解放日報》有大量報道和文章，總不能說他們不看報吧。因此，在搶救運動問題上，後來經過多方製造並終於形成的這種「由康生發起和執行，幸虧毛澤東發現和糾正」的說法，竟然可以長期流傳，得到人們相信，甚至包括某些過來人。這一似怪不怪的事，既說明思想改造和控制意識形態的作用之大，也說明個人崇拜流毒之深和廣。

毛澤東指揮和領導整風搶救，交替使用的機構主要是三個：政治局、書記處、總學委。整風開始，主要還是利用原有的書記處和政治局。因為自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已基本上可以控制這兩個機構，他的意圖也基本上能夠得到貫徹。但由於沒有經過改造，還由原有人員組成，並依原有機制運行，因此就不會十分得心應手。例如1940年底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就因在政治局討論時遇有不同意見而不得不做出妥協。書記處的組成則更不理想，被劃歸「教條宗派」的人就佔了一半，擔負重要領導工作的如劉少奇、任弼時等人卻仍被排除在外，這當然不妥當。於是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七大前不改組書記處(但後來還是改組了)，只是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組成書記處工作會議，由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參加。實際上，不住在楊家嶺，也不是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中央委員的重要部門負責人，如主持中央黨校的彭真，就一直列席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工作會議。但這還不能適應整風時期的領導體制。為使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更加運用自如，1942年5月21日政治局又決定成立中

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負總責，康生副之，委員：陳雲、高崗、彭真、李富春，並自成系統，直接管下屬各級的分學委。[58]由於整風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毛澤東1942年3月16日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風學習，是整風學習年。」[59]實際上1943年的整風搶救還更緊張)，學委會又由各級領導掛帥(「首長負責」)，所以整風中總學委所起作用，在一個時期就相當於「文革」時期的「文革小組」，幾乎可以號令一切。但在當時，人們還保留有某些傳統觀念，總覺得學委只是管學習的，涉及其他工作(而整風又必然衝擊其他工作)就有點名不正了。所以6月2日成立了總學委，6月22日書記處會議就決定今後書記處和總學委會議合併進行。這樣就可根據問題的性質以不同的名義作決定發通知，也可使彭真、高崗、李富春等正式參加進來。

後來，隨着整風的深入和各方面條件的成熟，已經可以和需要改組中央機構和正式在組織上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了。於是，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遂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新的書記處，推選毛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並根據劉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60]。這就使黨內從此也實行起了一把手拍板的領導體制。雖然《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對此解釋說(其他一切正式黨史著作如《毛澤東傳》等都如此說)，「這裏所說的『最後決定之權』，是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政治局決定大政方

58　以上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彭真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任弼時年譜》、《陳雲年譜》等有關部分。《彭真年譜》總學委中有高崗，《任弼時年譜》和《陳雲年譜》則無，且指明為五人。不知孰是。也可能是因高崗為壞人，故有意抹掉。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6頁。

6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0頁；其他日期也均據該《年譜》。

針。」這一辯解是與實際不符的。事實上後來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還是由書記處決定，有時向政治局報告求其批准通過，但也是形式，因為從未聽說過有政治局否決書記處建議的事。成立不久，書記處即提出對幾個黨內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看法，包括王明、博古屬黨內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六大方針正確等，這些恐怕就不能算「日常工作問題」。至於以書記處名義對地區或全黨所發指示、通報等，如中央局的組成、關於戰爭和工作的安排等，有些也不屬日常工作範圍。特別重要的是，「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運用到整風搶救上就更得心應手了。這從毛澤東發給各地領導的電文中即可看得很清楚，指示有些地方如延安，開始甄別；有些地方如晉冀魯豫等根據地，開始進入坦白運動等。這說明，書記處改組後，毛澤東對上層整風(主要是1943年的「九月會議」)和整個搶救運動的領導指揮可以更具體更靈活。但一切都以書記處名義號令又太過正式、不好變通，所以不久後的4月24日又恢復了一度停止運作的總學委(10月5日改組後仍由毛任主任，加劉少奇為副主任，排在康生前面，胡喬木為秘書)。此外，就是4月28日成立的以劉少奇為主任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協助毛澤東，具體抓肅反即搶救運動。作為整風審幹(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毛澤東早已於1942年2月親任校長，主持常務的副校長彭真既列席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又經常向他請示彙報，使他對黨校情況知之甚詳。至於全面搶救，毛澤東和劉少奇、康生也有密切聯繫。特別是康生，由於同住棗園，所以接觸更多。據說，毛澤東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康生對搶救運動的彙報。[61]

所有這些都說明，主管搶救運動的一切機構和負責人，都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之下，聽從他的指揮。而毛澤東又是一個自稱「從來不讓權的」、對主持各種政治運動極其認真和非常仔細的人。何況，那

61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187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577頁。

時他又年富力強、精力旺盛，怎會把關乎百年大計的整風審幹的領導權交給別人，自己只「掛個名」？

劉少奇參與搶救運動的領導

劉少奇1942年底回到延安前，既未出席1941年中央整風的「九月會議」，也沒參與1942年普遍整風的領導，而且看來他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和部署還不一定十分了解。例如他領導的華中局和新四軍，對整風就沒有像毛澤東抓得那麼緊。毛曾說，「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風學習，是整風學習年」；可劉在回延安途中奉命指導各地工作卻很少強調甚至沒怎麼提整風問題。對書本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提法兩人也不盡相同。毛在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貶低書本知識和知識分子；劉在稍後的7月13日《答宋亮同志》中卻提倡埋頭讀書，說「黨員在黨校中學習，……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62] 但是兩人在整風的基本目標上還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互相支持。他們在政治路線上一直比較接近，都曾受過「左」傾中央的壓制，都反對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宗派」，主張徹底改造中央。毛澤東雖在六中全會後已實際上成為黨的領袖，但基礎還不十分鞏固，還需要像劉少奇這樣的幫手並借重他在華北和華中以及原來白區的力量。劉少奇雖在瓦窯堡會議後因張聞天的推薦而得到重用，在華北和華中工作中很有建樹，又團結和培育了一大批幹部，但無論是為了推進革命還是黨內鬥爭，都還需要依靠毛澤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整風開始後，毛澤東即請劉少奇回延安參加中央領導，並對其一路安全關懷備至。劉少奇也適應形勢需要，回延安後很快就提出從組織上正式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任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則在改組書記處中使劉少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而升為黨內第二把

62 分別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795–803頁，《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18–219頁。

手，成為他領導全黨全軍（當時主要則是整風審幹和召開七大）的第一得力助手。從此也就建立起了延續二十年的毛劉領導體制。

劉少奇回到延安，普遍整風開始進入審幹（肅反）階段。他經過兩三個月的觀察和了解後，就積極參加了對審幹和搶救運動的領導。1943年3月16日和20日的政治局會議，除討論和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和精簡的決定》外，還聽取和討論了康生關於反特工作的彙報，並決定向全黨發出開展反特鬥爭的指示（也許就是那份沒有載明時間和發文機關的《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63]）。不久，中央又發佈了以開展肅反為主的第二個「四・三決定」，全面開展審幹反特鬥爭，很快就發展成為搶救運動。在這次機構調整中，劉少奇除參加三人組成的書記處和增補為軍委副主席之一外，還和毛澤東兩人分別主管一個方面的工作，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領導中組部、統戰部、民委、中央研究局、海外工委等部門。為了加強對肅反運動的領導，4月28日政治局又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以劉少奇為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64] 這就使劉少奇成了延安及各地肅反、搶救運動的最高負責人（實際上為第二把手，因為上邊還有抓得很緊的毛澤東），康生還在他的領導之下。而在1943年「九月會議」前，中央層整風也無大動作，延安和邊區各地在集中力量搞反奸搶救（學校停課，機關大部工作暫停，地方政府連農忙時也只留很少幾個人值班），劉少奇當然也主要抓這方面的工作。但他作風穩健，不大出頭露面，很少參加坦白大會，更不作鼓動性的報告，所以對他的領導作用，了解的人實在不多。例如他在七月所作《關於審幹中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像我這樣的一般幹部，當時和事後長時期都不知道。

63 載《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9期。

64 以上情況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3–277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15–420頁；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看來，劉少奇當時領導審幹反奸工作大概着重在兩方面。一是研究和制定政策。他確也一貫重視實際工作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在進入書記處後的3月20日，他即向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關於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電報，要求仿效延安作法，立即開展審幹，其中提到，「今天國民黨向我們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65] 6月29日給陳、饒的電報中除此以外，還説，「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我們要把反特務鬥爭看成和軍事政治經濟鬥爭一樣的重要」。並提出一些具體方法，如注意審查「韓(德勤)武裝經過和駐紮過之處」的幹部，「尤其被韓捕後釋放之黨員」；對被俘之國民黨軍官要「用説服利誘與威逼等辦法令其自首」，但要選好對象，「選擇那些在他不肯自首為我做事時，我能長期拘押或秘密槍決的人威逼之」等。[66] 七月所做報告還從理論上説明，「審查幹部與清查內奸的運動，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及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並從方針政策上提出，「審幹運動的全部任務是：『清查內奸，爭取失足者，訓練幹部。』」[67] 二是抓有關幹部的調動和組織安排。從1943年3月，連任六年多中組部長的陳雲被批准離職養病，從此組織部的重要問題即請示劉少奇決定。一年後彭真正式接陳雲任中組部代部長，就是在劉少奇住處並當着劉的面進行移交的。[68] 新書記處成立後，已正

65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劉少奇年譜》將此電列為6月29日，但《陳毅年譜》同日卻無此記載。無論時間如何，這一電報總是有的。

66 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覆陳、饒27日電)。

67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這一報告的全文未能看到。

68 《陳雲年譜》上卷，第375、381頁。參閱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嚴格要求真心愛護」一段；葉永烈：《陳雲之路》中「當上紅色掌櫃」一節。據時任陳雲秘書的劉家棟在書中説，陳雲被調離中組部是因為他在組織工作上「右」(吸收了大批「特務」)，又不贊成搶救運動，還反對過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所以反特鬥爭和搶救運動開始後，他就離開中組部閒居棗園「養病」，1944年才當上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賀龍的副手——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

式進入審幹搶救階段，所以日常會議的主要議程之一也是這個問題，而有關組織方面的事按分工自然由劉少奇負責處理。如4月5日的書記處會議就正式決定：「由劉少奇準備對晉西北、晉東南、晉察冀三個區域各派一個整風學習組，負責幫助該區域內整風學習。」[69] 8月9日書記處會議又決定：「派幹部去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幫助整風。」[70] 這自然又屬劉少奇的分工範圍。此外，有關審幹反特，劉少奇還為中央(對華中多以個人名義)起草了一些指示電。總之，劉少奇出任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和組織委員會書記，絕不是虛位。所以《劉少奇傳》上特別指出，「這一時期，他還協助毛澤東參與領導了審幹運動」，因此對審幹肅反(搶救運動)中的錯誤，「也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71] 作用自然遠非康生之流可比。

他對搶救運動的全面情況和許多具體問題應當説也是比較了解的。第一，作為肅反的主要領導(毛澤東倒是喜居幕後)，他要經常在書記處和其他有關會議上聽取彙報、了解情況、研究問題、討論對策。(例如從3月20日書記處改組到6月24日，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加上政治局，兩者共開會研究肅反問題十一次，還不算總學委等組織討論肅反搶救的。[72])第二，他必須閱讀各地和各機關報來的有關反奸搶救的大量材料，包括康生等送來的許多假材料。第三，他的住地楊家嶺的中直機關，正常工作早已停頓或打亂，搶救運動鬧得熱火朝天，晝夜連續作戰。特別是他分工主管的統戰部、民委(工、青、婦)等單位，更是搞到全延安出名，如搶救柯慶施，婦委絕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其中不少是高幹妻子。青委的蔣南翔(還有王世英等一些人)直

69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19頁。

70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

71 《劉少奇傳》上卷，第495頁。

72 見《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任弼時年譜》、《彭真年譜》等。

接找他反映過不同意搶救的意見，還受到他的批評。第四，有他身邊工作和他比較了解的人被搶救。如他的政治秘書因坐過國民黨的牢被抓走，他曾要康生動員張聞天夫人劉英來繼任，但被劉英堅決推掉。他在白區工作時曾在一醫生家住，受其掩護。後來該醫生到延安在楊家嶺醫務室工作並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搶救運動中也被打成「特務」。[73] 由此可見，劉少奇是了解情況並盡職盡責的，在認識上也和毛澤東基本一致。據劉英説，直到1943年底，劉少奇才對延安的搶救運動開始從懷疑到不大相信了。主要有兩件事對他的觸動較大。一是那位掩護他的醫生被搶救；二是聽了綏德「坦白運動先進典型代表團」一批小孩的報告（那次會我也參加了並坐在前面，看到劉少奇與會），認為那些十幾歲的小孩竟然當了特務，不可信。正是他和任弼時的覺醒，促成了1943年12月22日的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在延安停止搶救運動，「進到甄別是非輕重階段」。[74] 不過，在這之後，延安一些單位如中央黨校，搶救運動並未完全停止，有些敵後根據地不但沒受到書記處決定的影響，還進一步加緊了搶救運動。

劉少奇作為搶救運動的僅次於毛澤東的主要領導人，無論當時還是事後，一般人都不大清楚。這是因為：搶救運動一直屬禁區，有關

73　以上情況，有些是在延安時的了解；有些則是近年的調查研究，特別是訪問當時在楊家嶺工作的老同志所談。如康生、李富春等要劉英兼劉少奇政治秘書和那位醫生被搶救的事，就是劉英多次所談（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6月10日等）。據劉英説，兼政治秘書事因她不同意也就算了。她的理由是忙不過來，一則她在行政處雖為學委會副主任，但主任鄧潔因被敵人捕過，已靠邊，實際上一切都她管，且已因搶救不力受到批評，壓力很大；二則她還是張聞天的政治秘書（由於張靠邊，實際上工作不多，但名分還在）。她説，當時沒講的重要原因還有兩個：一是覺得劉少奇太嚴肅，有點怕；二是劉晚上辦公，她熬不起夜。民委特別是婦委的搶救情況，劉英、曾彥修都談到不少。另，蔣南翔在〈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也提到婦委的搶救和他找劉少奇反映情況等問題。

7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

檔案資料至今嚴格保密；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主要領導人採取「為尊者諱」的方針，有關他領導搶救的言行盡量加以掩飾；「文革」後可以談搶救，但這時劉已成為受人們同情的最大受害者，而且從正史到野史，又把搶救的責任幾乎全推給了康生，連毛澤東都從發起者和發號施令者變成發現偏差並加以糾正的人，更何況劉少奇。但是，延安整風後，中央層和高幹中對劉在搶救中的領導作用還是有所了解和議論的，劉本人當然更清楚，而且一些受過委屈和不服氣的人適當時候也會提起。所以在事過八九年之後的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還不能不在最後一天作自我批評時包括對「1943年延安審幹期間的一些問題『做出』檢討和説明」。[75] 如果對搶救運動的錯誤沒有什麼責任，何用「檢討和説明」？在這次會上就搶救運動作檢討的，據知還有原中央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但眾所周知，這次揭發「高饒聯盟」的中央全會，毛澤東以在杭州休養為由，沒有出席，委託劉少奇主持。康生則因病假缺席。

搶救運動中的中央黨校

一、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中的地位

討論搶救運動必須專門談一下中央黨校。這是因為，黨校在延安整風和審幹（搶救運動）中處於特殊地位和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像中共中央黨校黨校教育歷史經驗編寫組在〈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説，「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對於全黨的整風學習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由於中央黨校集中了黨的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幹部進行整風學習，實際上是全黨整風學習的一個縮影。中共中央經過中央黨校這個點的實驗，取得經驗，運用這些經驗指導全黨

75　《劉少奇傳》下卷，第754–755頁。

幹部的整風學習。」又說，「黨領導的整風學習，以中央黨校為重點，逐步推向全黨」。[76]而且整風也正是從黨校發軔，開始於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所做報告《整頓黨的作風》(原題為《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編入《毛選》時改為現題)。中央黨校既是整風和審幹(搶救)的源流和樣板，就不能不多說幾句了。

中央黨校地位之特殊和所起作用之重要，首先是因為它不僅是毛澤東整風的試驗田，而且是他對黨的高幹和精英進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審查的基地，甚至還擔負着其他某些份外的重要任務，如對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當然，中央黨校所負擔的任務和它的重要性也是逐漸增加的。一開始的重視是由於把它當作訓練高中級幹部的基地(原來馬列學院起此作用，但後來認為它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所以整風一開始即被取消，最後合併到黨校)，不久才被用為整風的試點和重點，並大力加強了對它的領導。首先是1941年「九月會議」期間任命彭真為黨校教育長，由他負責制定新的黨校計劃。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會議做出《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停止原有課程，學習黨的路線(也就是集中搞整風)；延安高幹三到四百人參加黨校學習；黨校直屬書記處，政治指導毛澤東，組織指導任弼時；取消原黨校管委，整風由彭真負責。[77] 1943年3月20日中央機構調整，黨校劃歸毛澤東任主任的宣傳委員會管理，並由毛澤東親自兼任校長、由延安當時傳為兩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為政治，一為軍事。傳為毛澤東所說)彭真、林彪分別任副校長。但因林彪受委派代表毛澤東去會見蔣介石並滯留重慶一年多(毛澤東為培養林彪，說光懂軍事不行，還必須懂政治。這次適值蔣介石邀請毛去西安會談，所以雖有周恩來在渝，還是派了林彪)，實際並未到任，主持黨校常務的一直就是彭真。

---

76 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47–148頁。

77 《彭真年譜》上卷，第191、198–199頁。

毛澤東放手讓彭真管理黨校(他自己也極為關懷，如上大課、做報告、聽彙報、找人談話等，事無巨細經常過問)，並非偶然。除賞識彭真的政治素質(和他思想一致並擁護他)和工作能力外，也還有些歷史淵源。作為全黨領袖，毛澤東不只要團結中央蘇區幹部和紅軍官兵，而且需要團結原在白區工作的幹部(雖然他說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這首先就是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北方局班子。1936年春，劉少奇到天津後，撤換了原來執行「左」傾中央政策的高文華(書記)、柯慶施(組織部長)等人，當年夏末即任命同他意見一致的彭真任組織部長。1937年4–5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上，彭真完全支持劉少奇的意見。正像他後來所說，「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完全失敗，蘇區工作大部分失敗。」[78]可見，在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上，他是完全擁護毛澤東、劉少奇的觀點的。抗戰開始後，彭真協同聶榮臻創建晉察冀邊區，被譽為模範抗日根據地。1941年初奉命回到延安，在政治局會議上陸續作了七次彙報，匯總寫成《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一書，毛澤東稱其「講得很好，是馬列主義的」。[79]主持改組中央黨校也很合毛澤東的意。他又是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人。[80]因此得到毛澤東的高度信任和超常重用，如：以一個非中央委員的身份，到延安後就經常列席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所起作用超過一些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組織工作的關鍵時刻(審幹的甄別結案和七大的籌備)，接替由政治局委員和曾是書記的陳雲擔任中組部代理部長(1940年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中有一條是成立幹部局——相當於中國黨的組織部，領導人應是書記處成

---

78 《彭真年譜》上卷，第191頁。

79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59頁；《彭真年譜》上卷，第192頁及其他有關條目。

80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據他回憶，1966年5月11日彭真向他交接工作時，聽後面有人念材料，「彭一聽就火，態度激昂，回過身朝着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他是先喊主席萬歲的。」

員。對此，中共中央覆信表示同意)[81]；七大開幕前出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七大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後來還和陳雲一起成為候補書記；抗戰勝利後即派赴東北任東北局書記(成員包括陳雲、高崗、張聞天、林彪、李富春等)。由此可見，毛澤東放手讓彭真長時擔負管理中央黨校這樣的重任，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中央黨校集中了全黨大批高幹和精英。自從六中全會後，各地即先後選出參加七大的代表，其中許多代表來到延安，由於七大一再推遲，大部分就被送到黨校參加整風審幹。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貫徹保存實力的方針，還於1943年1月1日做出「關於徵調敵後大批幹部來陝甘寧邊區保留培養的決定」。[82] 1月12日政治局會議又決定，為準備培訓從華北、華中徵調來延學習的幹部，在中央黨校設中級班，由任弼時、陳雲、鄧發、王稼祥、彭真、葉劍英六人組成委員會籌劃一切，[83] 表現出中央的高度重視。此外，除上述在延高幹三到四百人參加黨校學習外，還陸續將軍事學院、中央研究院、文聯、[84] 西北文工團、西北局黨校等單位合併到中央黨校。這就使中央黨校在1944年全盛時期擁有的教職員工和學員(各佔一半)達到六千人(那些時而旁聽和走讀的幾百延安高幹未計算在內)，佔當時延安脫產人員的五分之一，[85] 而且教職學員多是前後方的黨政軍骨幹和知識界精華。全校編制分為六個部：一部為地委、旅級以上高幹和七大代表；二部為縣團級以上幹部；三部為原馬列學院和文聯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包括非

81 李永昌：〈周恩來赴蘇治病始末〉，《百年潮》2001年第7期。

82 《任弼時年譜》，第438頁；《彭真年譜》上卷，第213頁。

83 《任弼時年譜》，第438頁；《彭真年譜》上卷，第213頁。

84 《彭真年譜》(上卷，217頁)稱「延安中央文聯」，別處均稱「文協」或「文抗」(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會延安分會之簡稱)，不知是否一回事。

85 延安當時的總人口為四萬，「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見〈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94頁。

黨人士如蕭軍、塞克等)；四部為文化低的縣團級工農幹部；五部為陝甘寧邊區的縣區級幹部；六部為敵後調來的縣區級幹部和國統區來的知青。集中這麼多重要幹部和精華的中央黨校，無疑對全黨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起着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經過兩次改組，黨校也發生了一些帶根本性的變化。例如教學內容和課程不再學哲學、經濟學等馬克思主義的系統知識(有時也指定閱讀兩三本馬列的小冊子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左」派幼稚病》中有關集中和紀律的章節)，而是主要學整風文獻、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黨的路線和歷史等，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其次是將一切人員按工作地位、級別和資歷從學習內容、政治待遇和物質享受(吃、穿、住、行、警衛服務人員等)上進一步加以明確區分，形成固定的等級制。三是集中全力從事整風(進行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和審幹(主要是肅反，並有權對在校學習的七大代表資格進行審查[86])，有關經驗和做法還通過中央機關發文件電報或抽派人員去外地向各根據地推廣。僅舉這三點，就可看出中央黨校在全黨整風審幹中所起作用及其以後的長遠影響。

二、中央黨校是延安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中央黨校改組後的三年(1942–1945)，也就是整風審幹的三年。鑒於教職學員的構成，政治審查(即政治面目、出身、歷史等，主要還是肅反)自然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審幹中大搞「逼、供、信」，很快就發展成了搶救運動。其在搶救運動中的無法無天、殘酷無情、吊人

86 彭真作為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在向七大的報告中指出，「這次到會的代表大多數經過1940年、1941年中央指定的小委員會做過初步審查，以後在黨校一部、西北局組織部、聯政組織部又做過一些審查。」見《彭真年譜》上卷，第264頁。在這之前毛澤東就說，「在黨校的七大代表是在學習中進行審查的。實際上將來也要根據黨校審查結果作為結論。」同前，第233頁。

打人，在當時的延安就是出了名的。大約由於黨校各級領導和學員們的前後身份，很少有人寫黨校搶救運動的真實情況，一些領導人寫的回憶錄也多是從正面寫整風學習和思想轉變，只顯得春風化雨、正確偉大。這當然是不會全面和真實的，因為即使都是事實，也只寫了事物的一面，終究經不起歷史的考驗。例如中央蘇區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現在情況和性質都已基本弄清。當時毛澤東先後派李韶九、古柏等去富田在紅二十軍中抓「AB團」，又以曾山取代李文林任江西行委書記。可在事隔三十年後，曾山作為參與者回憶對「富田事變」主要領導人的公審時竟還說，「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87] 這只好信不信由你了。關於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也是過了五十年才開始有了一些權威性的片斷透露。我和周圍的熟人是一般幹部，當年在延安得之於道聽途說的情況可以不算，但以下三人所談卻是不容懷疑的。因為根據他們的地位、名望和思想傾向等，他們談的只會少不會多、只有保留決不會誇大，因而是完全可信的，可以從中了解到黨校整風審幹的陰暗面，雖然很不全，卻可以此類他，了解個大概。

（1）薄一波的敘述

他於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黨校一部學習。跟他一起去的母親住在深溝的一個窯洞裏，一天對他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着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員才無可奈何的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我初到延安時，還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況。我進中央黨校後，校方給了我一個好差事，讓我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甄別平反工作。當我開始甄別平反工作時，就馬上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窯洞裏，也關押着『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150名幹部，如武競天、宋維靜等。」因此，他評論搶救運動中的錯誤說，「我看這不僅是『錯誤』！簡直是對嚮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老幹部的迫害、摧殘！」結論是「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88] 這裏照錄這麼多，是為了說明兩件事：第一，才進黨校學習的薄一波就對黨校的搶救運動有如此了解，那麼長期主持黨校工作並直接領導搶救運動的副校長彭真、秘書長黃火青以及各部主任古大存、張鼎丞、郭述申、張啟龍、白棟材、馬國瑞等人，難道竟然一無所知？可能嗎？根據當時情況，連「密切地注視着運動的發展」、[89] 對黨校給予特別關懷的校長毛澤東，從聽彙報和看材料（除各級的報告外，被搶救者的書面申訴就極多，例如曾志在一年多的審查批鬥中就給毛寫了一封長信。1944年12月給毛祝壽，跳舞時她「乘機問：收到我的信沒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90]）中也是基本上了解的。這也許是他向黨校一再賠禮道歉的原因之一。第二，長期擔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薄一波（排名在另兩名副組長之前），關於搶救運動結束的時間及殘酷程度等的敘述和正式黨史（更不用說許多領導人的回憶錄和民間的演繹之作了）的寫法竟然大不相同。後者多是說，1943年7月15日康生報告後發起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30日毛澤東就讓它停下來了。[91] 而薄一波卻在搶救運動「停下

87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見《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8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61–363頁。

8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6頁。

90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44頁。

91 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3頁；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6頁；經過十年磨一劍修訂的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90頁甚至說，在康生報告之前，「中共中央曾發現審幹工作中有『左』的錯誤發生……試圖予以糾正。」但後來卻搞出了個「搶救失足者運動」。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

來」四五個月後，發現幾百人被關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現象。至於薄一波把黨校搶救運動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康生，卻顯得極為牽強，後面有關康生的一節還會一併談到。

（2）曾志的回憶

曾志是作為被搶救者寫回憶的，同樣可信。她說，在黨校一部學習時，「『搶救運動』陰風陡起，河南省委成了『紅旗黨』，我也成了小組審查重點，……有人罵我是吃屎的，歷史比狗屎還臭。」坦白大會「隔幾天就要舉行一次。」「有一次黨校一部又舉行全體學員和工作人員動員大會，校長（原文如此）彭真、教務主任（？）黃火青都參加了……主要是動員失足的人自首坦白。」審查方法是，以小組為單位，各人報告歷史，經過背靠背地分析、找疑點，再到會上當面質疑和作答，如此反復多次，「經歷簡單的也要半個月才能過關，經歷複雜些的，至少要一個月，認定有問題的，半年一年也結束不了。」1944年「春節過後，大約是三月份，我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又被編入了黨校臨時支部。」「新搬來的黨校一部黨員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七大代表……雖然中央有了『九條方針』，但是這裏的『逼供信』仍相當嚴重。」「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襖都抽破了，遍體血跡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塊。有一次用繩子只吊着他兩手兩腳各一個指頭，高高懸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還有一位被鬥的女同志被打昏過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反而用腳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盡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洇透了，還把窯洞染紅了一大塊。」曾志還說，她自己「在高壓下沒有講過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志中沒有講過假話的只有四人」。但支部給她審查的最後結論卻是：「有特務嫌疑」，「問題掛起來」。[92] 這裏要作

92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下），第333、340–341、343頁。

點解釋，又從這本公開發售的書上摘這麼多，還是想說明，中央黨校搶救運動中這種無法無天的逼供信，包括彭真甚至毛澤東在內的學校領導不可能一點也不知道，下面誰有那麼大的膽量擅自成立一個黨校臨時支部，任命耿飆為支部書記，關押二十多個七大代表和一批老幹部（曾志本人就是中央婦委秘書長）？同時也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編寫黨史教科書的作家，盡量能以學者的良知和求實精神論述搶救運動，而不應再輕描淡寫甚至有意地以訛傳訛了。

（3）是劉白羽的描寫

堅決擁護延安整風的作家劉白羽，雖然對搶救運動大為頌揚，說「是一堂必須上的課，必須經過的磨煉」。它「打掉了我那小資產階級無謂的自尊心，而不打掉它，是不可能嚴格地進行自我解剖的」，所以「從審幹（按：即反特）到整風，是思想改造不可分割的整體步驟」。但他也還是以文藝手法描繪了審幹和搶救的一些真實情況。如說，從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後，「這時，整個延安處於一種非常狀態之中」，他和在不同單位的妻子都不能見面。談到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4日）合併到黨校後的一次坦白大會，說「一位廣東哲學家在台前不斷聲嘶力竭地奮臂高呼口號，這裏的氣氛突然熾熱得變為一場騷亂。我站在人群的後面，眼看一個一個走上台去，還不斷有人向台上遞紙條。愈是親近的人，愈要表明態度，於是夫婦之間、朋友之間喊得愈加聲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誠。『搶救運動』是由康生的極左路線造成的（按：連他也提到了路線高度，雖然歸在康生名下），但是這麼多人這麼盲從，經過十年浩劫，我有了較深的理解。我認為這是民族陳腐淤積的湧動。在這種關頭，只要被遞上紙條，念出來，就得表示坦白，這樣一次又一次輪回旋轉，人們腦子糊塗了，思想混亂了。」經過坦白大會，「平時活躍的三部，整個落入沉悶之中。人們走着路，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說話，大家的嘴巴都像貼上了封條。」此後，「鬥爭轉入各個支部，一個一個審查，有的大哭大鬧，有的吵嚷不息」。這些還只是「形容審幹像是狂風暴雨，而真正『搶救』高潮，卻像延安夏天的

山洪，充滿巨大的恐怖，挾持無窮的威力，一下衝擊而來。當時我們常常到中央黨校去參加坦白交代大會，……」不久，劉自己也被卷了進去。有人交代：「說他來延安時，《大公報》的一個特務，就告訴他劉白羽是我們的人。」[93] 他的這些描繪不是也足以說明：搶救運動的真實情況、時間長短、嚴酷程度，同一些官方黨史著作所寫，相差有多遠！

談了以上情況，就不難得出結論，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中央領導特別是黨校領導都是清楚的，要求達到的目的和許多措施也只能是領導上做出和決定的。因為1943年延安主要做的就是審幹和搶救，直到年底才進入甄別階段，而且許多領導人的妻子、戰友和某些身邊的人都在黨校接受審查，哪有不透風的牆！例如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妻子蔣家英，被送去黨校一部審查，中秋節仍不准回家(可見那種說7月30日搶救已被「指示停止」的黨史教科書是多麼不可信)，她一怒之下就領着1歲和3歲的兩個孩子說，「走，媽帶你們遊行示威去！」在校園轉悠時終於碰見彭真，問明了情況，還是沒解決問題。[94]

對中央黨校那麼長時間、那麼殘酷的搶救運動，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的「重災區之一」，彭真應負直接的重要責任是很自然的。他在1944年6月8日的黨校支部書記聯席會上也做了點檢討，說：「那次鬥爭(原注，指1943年的搶救運動)，有的同志受到一些打擊，我要負責，接受那次錯誤，把方法搞對，立場搞對，自己先解決。」[95] 不論這是否算得上檢討，但他在已經提出要搞甄別時還說過一些很不實事求是的話卻是事實。如在1943年12月3日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搶救運動是「一個革命」，「沒有殺一個人，也沒有毀滅一個人。這是一

93　劉白羽：《心靈的歷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轉摘自《眾說紛紜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9頁。

94　江英：〈姓名惹的禍〉，《眾說紛紜話延安》，第174頁。

95　《彭真年譜》上卷，第244頁。

個很大的勝利。」[96] 其實，這時已有鄒鳳平、危拱之、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一些老同志和知識分子幹部被「毀滅」了(自殺和瘋癲等)，還有一批七大代表如河南省委負責人張維楨、郭曉棠、王志傑等，則因「特嫌」或其他罪名未通過資格審查沒能與會，至於甄別結論中留或大或小的尾巴而受到長期影響的人就更多了。作為搶救運動中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的領導人，特別是中央黨校運動的主持者，彭真是從未承認過這一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的。只是由於上面有毛澤東頂着，他又掌握着中組部和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所以這個問題並未影響他七大後的地位上升(連康生都沒受影響)，而且也從無人提起。只是「文革」開始時，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彭真時，說他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但由於他和劉少奇一樣因受到嚴重迫害而獲得大家的同情，搶救運動又找到康生作為罪魁禍首，所以就沒人提到他了。又如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在搶救運動中搞得也很厲害，但因他1962年後長期挨整，韋君宜還是筆下留情，點了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的名卻沒點他的名，只說「當時，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97] 但最近還有人著文，介紹習仲勳說自己「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左的錯誤。」[98] 這就不夠實事求是了。在一個「左」傾路線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國度裏，作為國家領導人，特別是領導過中宣部的人，說從沒犯過「左」的錯誤，恐怕難以講得通。

中央黨校搶救運動錯誤的嚴重，也在於它是整個運動的試點單位，創造的經驗要向全國推廣，還由它那裏抽調人去別地或別單位指導整風審幹(搶救)。所以黨校搶救的錯誤影響到全黨全國。各地搶

96　《彭真年譜》上卷，第231頁。

97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8年版，第12頁。

98　吳江：〈秦川談習仲勳二三事〉，《炎黃春秋》2003年第11期。

救運動中的作法、用語等幾乎一模一樣，與此不無關係。例如前面提到1944年北方局黨校搶救那套打人，車輪戰等做法和「黨認為你有問題」等說法，大約都是從中央黨校傳過去的。因為主持北方局黨校搶救運動、並動手打冀南行署副主任劉建章的楊獻珍，1943年中央黨校改組時就和劉芝明同任教務處副主任(主任為張秀山)。[99] 1944年派往山東專門去協助羅榮桓搞整風審幹、任分局總學委副書記的舒同，也是由黨校一部學員中抽調去的。但由於路途遙遠，1944年9月到任後，全國各地搶救的高潮已過，問題也暴露得越來越多，特別是由於羅榮桓的抵制，所以「延安經驗」沒能行通。中央書記處幾次決定派人去敵後根據地指導整風審幹，多是從黨校抽調，因為那裏儲存着大批高中級幹部，而別的機關幹部卻都有現職工作。至於中央所發有關整風審幹的文件中，有哪些是出之於黨校的經驗，自然無法說清。但彭真1944年1月14日直接覆信抗大總校李井泉政委和何長工副校長，介紹黨校整風經驗[100](按：這時抗大早不是整風學習，而是搶救運動的甄別階段)，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因為當時向黨校「取經」是常事。

最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對歷史人物的點名和評論，我認為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就是繼承中國史傳的優良傳統:「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錄」；反對個人迷信和封建專制主義提倡的那一套，如：一切功勞歸領袖，「為尊者諱」，對認為好的人「隱惡揚善」，認為壞的人給追加罪責。這些將在下面《延安整風與中共黨史編纂學》一章中專門討論，這裏只是先提一下，也許有助於人們不忘過去。在中央黨校的負責人中，就有些人過去也曾被自己的人幾乎整死，現在卻對以同樣方法整人的搶救運動，或熟視無睹，或參與其中。時任教務

99 〈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38頁。

100 《彭真年譜》上卷，第236頁。

處主任的張秀山(還有上面提過的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就曾在1935年同劉志丹等一起被關起來，刑訊逼供，打個半死。據郭洪濤說，他就是從審訊張秀山中引起對陝北肅反的懷疑。他說，張秀山被吊起來打，就承認「反革命」，一放下來又翻供。如此一再反復，郭洪濤才認定劉志丹等不會是反革命，因而在中央紅軍到陝北前，就已同朱理治、程子華等研究決定，停止了抓人。[101] 正是這些不久前才挨過整的同志，在搶救運動中卻把自己過去蒙冤受屈的事給忘掉了，又來參與制造新的冤假錯案。我還親眼看到有些在延安被搶救過的人，在共和國成立後的肅反等運動中，搞起逼供信來並不手軟，甚至連方法都和搶救運動時一樣。其中也可能有人在下一次什麼運動中又栽了跟頭。為了避免這種「天道輪回，周而復始」的毛病繼續變相重演，指名道姓講得具體點可能有好處。反正這多是涉及一些有地位的人，大概不會被誤會為有什麼個人恩怨。

地方和單位領導所起作用更重要

由於搶救運動已經打亂了以前黨內有關的規矩和系統(如審幹一般由組織部門負責，鋤奸一般由安全情報部門負責等)，又實行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並明確規定「首長負責，自己動手」，[102] 這就使各地區和各單位的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的認識和態度，起着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央雖有統一部署和不斷發文電或派人檢查督促，但各地和各單位做的卻並不一樣，有些甚至完全不一樣。這除了某些客觀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一把手的思想認識和

101 1999年3月20日和張培森、葉暉南一起訪問郭洪濤的談話。

102 最先提出「首長負責，自己動手」，概為1943年5月21日政治局會議關於防奸工作應遵照六項原則的決定。7月1日毛澤東致康生信談「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時又重申，8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最後形成為著名的「九條方針」中的第一條。以上均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劉少奇年譜》等的有關條目。

人品個性。對於多數人來説，恐怕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認識上的「左」，真的相信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特務之多，原不足怪」的提法和搶救中的「延安經驗」，[103] 其結果必然導致認識上的「特務如麻」和做法上的「逼供信」。二是組織紀律的約束和整風造成的威懾力量。許多人經過一陣搶救後已感到有點不對頭，但由於怕挨批，不敢表示懷疑和提不同意見，還是硬着頭皮繼續蠻幹或做點表面文章，應付上面。當然也不能否認，不少人抱有個人打算的成分，要在運動中爭當積極分子和培養對象。因為從來都是響應號召、緊跟領導、衝鋒陷陣的人會得到重視和重用，何況這次還明確地提出通過運動「培養幹部」是肅反（搶救）的一項重要任務。這就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思想和抓到「特務」越多成績越大的動機，驅使着越來越多的領導者和骨幹分子搞起逼供信。而且歷史和眼前實際都一再證明，由於搞逼供信和製造冤假錯案而受批評和處分的極少，甚至沒有；謹慎行事、搞不出「特務」或者被認為搞得太少的，就不斷挨批，很難過關。不管是出於思想認識、組織觀念還是私心雜念，地方或單位首長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本地區或本部門搶救運動的命運。遇到開明的首長，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錯誤。遇到「左」的首長，大家可就倒霉了，會製造一大批冤假錯案，毀滅不少人（如中央黨校的鄒鳳平、危拱之，中直婦委的曾憲蘭，1947年被晉西北處決的著名「愛國五青年」之一藺克義等），使更多的人不但一時受屈，還背了一輩子黑鍋，結論留尾巴或受控使用，每遇運動都挨整，等等。由此可見，遇到什麼樣的領導，對參加革命的每個人來説，都是一個重要機遇，這也體現了某種封建因素。

由於搶救運動是自上而下發動的，因此一般説來，愈接近上面，「災情」就可能愈重。邊遠地區和非直屬單位，由於領導人的「左」，

103 〈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也有搞得很厲害的，但總是少數。在延安，除作為試點和重點的中央黨校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外，在我看來，中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比軍直（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就要嚴重一些。例如中辦秘書處（處長王首道）是專為毛主席和書記處服務的機要單位，五六十人中也有十幾個被打成「特務」。據劉英説，民委下的婦委一大半女幹部被打成「特務」，而且使用刑訊逼供。她們就打了曾憲蘭，把她逼得實在受不了了，才跳進枯井自殺，婦委還造謠説她是柯慶施放跑的。搶救凱豐原來的妻子時，胡喬木也積極參加了晚上的車輪戰，還動員劉英去勸。劉英一勸，她就哭，説「我是愛凱豐的呀！我什麼目的都沒有。我很單純的。」[104] 相比之下，我所在的軍直，除三局的電訊學校（駐安塞）的200人就有170人被鬥外，總政、總參等直屬單位還是比較稍為穩一些。而總政各單位中，胡耀邦領導下的「組織部系統就沒有一個人受到衝擊」。[105] 就是總參大本營，相對而言，也還平和點。譬如説開坦白大會吧，也頂多是大喊大叫，推推搡搡，並沒看到打人現象。我參加過幾次軍委所在地王家坪桃林裏的坦白大會。當時的情況是：軍委首長坐在台上，旁設「特務」當場坦白後的「光榮席」，放有茶水香煙等。葉劍英（大家稱「參座」）主持並作動員講話，編譯局長兼外語學校校長曾涌泉甩着他的白頭發領呼口號。下面就是拉人上台「坦白」。有一次是專為編譯局和外語學校而開，我也被幾個男女同學連勸帶拉，但卻因「太頑固」而沒拉上去。（最近還和同班同學藍曼回憶往事，談到搶救時他笑説，那次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抱住小桃樹死不放手。可惜這次談話後一個月藍曼就與世長辭了。）我們學校這時已按中央第二個「四三決定」，實行了全面戒嚴，外出勞動規定「三

104 劉英1999年1月28日談話（錄音）。她講得具體生動，還一再説，「延安肅反，可以寫篇東西，非常生動的。」

105 秦川：〈1983年風雲中的胡耀邦〉，見《懷念耀邦》第二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

人同行」，個人日記、筆記、小刀等用具一律上交，顯出一派「赤色恐怖」氣象。不過搶救時也只是勸說、圍攻、車輪戰、假槍斃，以及各種威脅；但還沒有中央黨校那種腳踢吊打，刑訊逼供。我感到最受辱的就是一位女同志(當時三五九旅副旅長劉轉連妻子邸桂芳)向我臉上吐痰和謾罵，而最難挨的也只是車輪戰不讓睡覺。可見，我們學校比起一些中直單位還是比較文明些。

地方上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就搞得凶一些。西北局系統是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成員高崗負責，自然不會手軟。不但民運部全部打成「特務」，直屬單位如西北黨校、行政學院等，也搞得相當厲害。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就舉例說，「行政學院除了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很多是特務，恐怕過半數。」[106] 邊區政府由李維漢負責(林伯渠、謝覺哉二老實際管不了)，搞得要比他在中央研究院厲害得多。不但林老的秘書區棠亮被打成「特務」，而且總務處的勤雜人員還在老處長的帶領下「集體坦白」成「特務」。[107] 至於李維漢親自搶救參加過南昌起義年屆六十的張曙時，更是有聲有色。李說，「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經有些時候了，但問題沒有交待。」張問，「這話是不是對着我講的？」李大聲說，「就是對你講的，今晚的火就要燒到你的頭上去。」後為林伯渠所挽救。[108] 陝甘寧邊區各地情況也大多如此，據了解，搞得厲害的有延屬地區、綏德專區，隴東專區。延安縣由康生的老婆曹軼歐蹲點任宣傳部長，進行調查研究，要證實：特務已滲透到農村；以外來知識分子為主的小學教員基本上都是特務；可以分化瓦解為我所「用」等。延屬各縣共挖出了2,463個「特務」，一個縣長就打過

106 見上引楊奎松：《莫斯科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第153頁。

107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108 陳永清：〈紀念林伯渠同志誕生一百周年〉，載《懷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頁。參閱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傳》，第286頁。

17次人。[109] 隴東專區搞的也不輕，外來知識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特務」，這是蔣南翔在他的「意見書」中已提到過的。大約最出風頭的還是綏德專區，除派示範團去延安中央禮堂、邊區政府及一些機關學校做報告外，在地委所在所地更鬧得熱火朝天。單一個綏德師範就開了九天控訴大會，在十幾歲的小孩中挖出「特務」230人。佔全校人數73%。[110] 後來又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6歲。[111] 這都是公開的。地委的《抗戰報》整天發表搶救運動的消息和一些學生寫的「坦白」和「控訴」。運動從綏師發展到社會再到機關。於是國民黨統治時留下來的共產黨員幹部全部被鬥，機關裏面外來的知識分子大多難免，《抗戰報》的楊述(共和國成立後當過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也被迫承認為「戰略特務」了。[112] 有些外縣，地委首長顧不上，也可能稍為緩和些。

搶救運動搞得「熱鬧」的，陝甘寧邊區之外大概就算晉西北了。一則是因為「近水樓台」，和陝北隔河相望，所以陝北一有風吹草動就先影響到晉西北。雖然敵情嚴重，但還是早在1943年3月18日就發出《關於整風學習中配合審查幹部的指示》，全面推廣延安經驗，各地軍政幹部集中起來搞整風審幹。同年9月，駐軍和邊區一級機關分頭召開「反特務」大會。參加搶救運動的幹群約三萬三千人，有的單位抓出特務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113] 二則是任晉綏分區代書記的林楓，對整風審幹既知之甚詳又執行堅決。1942年夏他從延安彙報回來後，就毫不客氣地立即送走了在晉西北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搶救

109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110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詳細報道登在1943年9月22日的《解放日報》上。

111 韋君宜：《思痛錄》，第7–14頁。

112 韋君宜：《思痛錄》，第7–14頁。

113 張稼夫：〈庚申憶逝〉(之二)，《中共黨史資料》第8輯。

期間又不理睬周恩來給穆欣的證明。[114] 因此晉西北照搬延安經驗就是自然的事了。曾任新軍副總指揮的張文昂和一些領導幹部如雷任民、張雋軒、梁膺庸等都被搶救過。分局黨校也是重災區，70–80%被搶救。師範學校幾乎是全部。但發展也不平衡。例如據羅貴波說，八分區整風審幹就比較穩一些，沒發生過逃跑自殺等現象。[115]

其他根據地搶救運動情況，輕重情況不一，主要也是看領導。例如上面提到的晉冀魯豫北方局黨校就曾經是重災區，太行等地還發生殺人現象。所以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並轉太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據彭(德懷)、羅(瑞卿)諸同志說，太行太岳兩區反特鬥爭中在許多地點捉了並殺了許多人」，他要求「必須立即檢查這種現象」，「立即停止殺人」。[116] 這才制止了太行太嶽地區的胡來。

搶救運動中領導人的決定性作用，從華中各地情況的不同可以看得更明顯。據時任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委和蘇北區黨委書記的黃克誠說，「1943年4、5月間，華中局和軍部召開會議，佈置開展『搶救』運動。會議期間，我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華中不要搞『搶救』運動了，以避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同志之事，要接受中央蘇區打『AB』團的教訓。」但這是中央指示，華中局不能不執行。只是由於各地不同的領導，所以執行情況產生極大甚至根本差別。搞得最凶的就是譚震林任政委和區黨委書記的新四軍二師和淮南區。每個團都搞出

114 這兩件事，前面均已提到。按：穆欣(「文革」後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當時在晉綏《抗戰日報》工作，被誣指為「特務」。周恩來於1943年9月托韓鈞給晉綏分局和報社社長廖井丹捎話，分局未理周的證明，對穆仍予批鬥。見穆欣：《劫後長憶》香港1997年版，第132頁。

115 羅貴波時任八分區司令員兼政委和地委書記。見羅貴波：《革命回憶錄》，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35頁。

116 《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了「數以百計」的「特務」。該師政治部一個女同志被迫承認是「特務」，還供出了第七師政委曾希聖的妻子，弄得曾希聖極為苦悶。可黃克誠的三師和蘇北地區就沒搞「搶救運動」。黃克誠還替曾希聖查清他妻子的冤案。[117] 據林穎(原彭雪楓夫人)說，彭雪楓、鄧子恢領導的四師和淮北地區，以及鄭位三、李先念領導的五師和鄂豫邊區也沒搞搶救。

就大區而言，大概惟獨山東沒有搞搶救運動。這是因為，1943年山東戰事頻繁，形勢嚴峻，劉少奇又才解決了分局的爭論，調整了領導班子，書記朱瑞換成了羅榮桓，需要些時間進行整頓，因此一直到1944年才開始整風。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羅榮桓的領導。他不但反對利用「民主檢查大會」搞「釣魚」，而且還明確不讓開展搶救運動，認為山東情況特殊，敵人已為我們審查好了幹部，如果按延安的搶救辦法搞審幹，一定會搞垮山東根據地。所以延安發來康生的《搶救失足者》，他下令分局辦公廳「不要向下發」。一開始民主檢查，在分局機關工作的王若望就跳出來大反黎玉，被稱為「山東的王實味」。舒同等人已將其定為「特務」並報告延安，延安也回電同意。但羅榮桓不以為然，說王是思想問題，不是特務，單獨找王談話，加以批評。羅榮桓1944年12月21日在發給全區並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於審幹問題的意見》中提出，不應把整風與審幹混淆起來，要避免「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輕易發動坦白的嚴重的逼供信」，認為整風的正確方法應是「以檢查領導開場，以檢查領導結束」。[118] 此時適逢延安的搶救高潮已過，正忙於甄別平反。這樣，羅榮桓就使山東避免了一場搶救運動的大災難，事後還得到了人們讚揚。在羅榮桓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江澤民就特別提到，「1943年，他正確領導山東軍區和115師的整風運動，

117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9頁。

118 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3頁。參閱王力：《王力反思錄》(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51頁。

制止了絕對化、擴大化的錯誤做法，使這次運動真正起到了團結教育幹部的作用。」[119]

* * * *

關於延安和各地的搶救運動，已有不少書籍文章介紹，這裏無須作詳細敍述。之所以談上面這些片斷情況，只是為了說明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搶救運動(正史稱為審幹運動或「搶救失足者運動」)是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中央向各地發文和派人推廣的延安整風審幹經驗，對高級領導主要是分清路線統一思想，對廣大幹部主要就是從「引蛇出洞」到搶救運動。第二，搶救運動雖為中央統一部署，但如何執行和所犯錯誤大小，則決定於地區和單位的領導。實際上進行抵制(不敢公然抗拒)的領導也有，如山東、蘇北等。第三，由於搶救運動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在運動中犯錯誤甚至草菅人命的錯誤，如一些「搶救運動的重災區」，其領導者都沒什麼責任，不會受到處分，相反還往往因表現積極而受到重用和提升。這只要看一下一些人在七大後的安排，就會得出或證實「左」比「右」(並非真右，故用引號)好的結論。第四，實際情況證明，搶救運動並非康生發起，而且災情重的單位和地區大多是他不能隨便插手的。輕災和無災區，他也不一定沒有插手，如山東就曾派要員去推廣延安經驗。許多史書對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作用的評估和描繪，實屬有意誇張和以訛傳訛。下面就來談這個問題。

119 新華社2002年11月26日電。

第十二章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之三
── 康生其人和搶救運動



為什麼要談一下康生

談搶救運動不能不談及康生。這是因為，康生確實在搶救運動中做了許多壞事，而「文革」後的黨史界又已經把他定為搶救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領導人，甚至成為一切錯誤與罪惡的淵藪。我在前面的敘述中，曾一再提到這是對康生地位的過分拔高和對他在搶救運動以至整風中所起作用的無限誇大。而且這不是黨史界個別現象，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區別和繁簡的差異。所以康生的問題仍然有必要比較集中地談一下。但這絕不是要為康生翻案。康生並不是好人，對他開除黨籍的處理也沒錯，因此不存在平反問題，而只是存在着對他的作用做實事求是的評價。如同鄧小平說林彪、江青不算路線鬥爭[1]，絲毫無意減輕他們的罪責一樣，否定康生是搶救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也不是要把他從壞人變成好人，而只是說出歷史的真相，並在這個問題上附帶做一點破除黨史界普遍存在的絕對化傾向和「籮筐主義」的工作。但對此，在後面一章《延安整風創建了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還會專門談到，這裏只是為了說明康生的作用，先提個頭，作點名詞解釋。

所謂絕對化，是指被定性為壞人的人，就只能說壞不能說好，而且是「生來壞」、一貫壞，還要盡量誇大和增添他的過錯與罪行，減少和埋沒他的功績與貢獻。被定性為好人的人，特別是要保護的領袖和高級領導人，就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也要盡量掩蓋其過錯和誇大以至憑空增加其貢獻。所謂「籮筐主義」，則是絕對化的延伸或形象化。無論是被定性為好人還是壞人，都有各自的籮筐。好人的籮筐裏只准裝好的東西，除本人的外，也有些本來是別人的；關於缺點錯誤，則要盡量去掉，實在去不掉的就設法減輕和淡化，或者乾脆裝到壞人的籮筐裏去。壞人的籮筐則相反，還裝了許多並不屬自己的壞東西。黨史

1 《鄧小平文集》第二卷，第293頁。

研究中除絕對化和籮筐主義外，還有禁區和禁人的問題。禁區，這是人們都了解的。例如「文革」就越來越不能提了，連一些人物的電視文獻片，演到「文革」時也一躍而過，使歷史縮短了十多年。「文革」也和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等一樣，已逐漸變成實際上的禁區。所謂「禁人」，這是實在無法表述而自行杜撰出來的一個名詞。例如胡耀邦，大概沒有人敢說他是壞人，倒是公認的大好人。但是他的著作和紀念他的書籍在內地不能出版，他的形象不得見諸報端和電視。至於趙紫陽，更不能提了，直弄到觀看簽訂英國歸還香港的議定書的鏡頭或照片時，只看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編按：Margaret Hilda Thatcher，港譯戴卓爾夫人，1979–1990年任英國首相），看不到中方的簽字人。和禁區不同，禁人們辦的事可以公開，只是人不能出來，故名之「禁人」。

以上這種極端化、籮筐主義、禁區和禁人等，自然不會實事求是，只能做假，但要「打假」卻又很難。一是「假貨」和被隱瞞的真貨都太多，打不勝打；二則「打假」顯然不會被允許（指重要的，小事也許還可以）。因此，直到現在，黨史界的造神和造假運動還呈上升趨勢。只舉近日所看到的兩事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有一篇〈《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學術座談會發言選登〉，一位著名的黨史教授在發言中說，「『四人幫』企圖把豐富多彩的中共黨史縮小為『十次路線鬥爭史』，是抱着毀黨、篡黨的陰謀的。」[2]這就使人如墮五里霧中。「十次路線鬥爭」明明是毛澤東1971年8至9月在外地巡視期間的談話，每次「鬥爭」都講得頗為詳細，[3]什麼時候又怎樣變成了「四人幫」「毀黨、篡黨的陰謀」？這是不學黨史的「文革」過來人都知道的史實，何況黨史專家。他這樣講恐怕多半是由於已習慣於籮筐

2 《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3頁。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42–250頁。

主義，把領袖所提站不大住的東西順手裝到「四人幫」的籮筐裏，而且還上綱成為「陰謀」。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第2期《炎黃春秋》載文說，北京皇城根遺址公園北部「一座挺立於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紀念浮雕中，居然沒有陳獨秀」。「熟知五四歷史的人們敢於斷言：它的壽命絕對長不了。」「因為它根本違背歷史的真實，而近乎對歷史的嘲弄。」這種做法恐怕也不是領導人和設計者的疏忽，而屬有意的造假，所以引起這位作者的憤懣。

這些看似都同康生和搶救運動無關，但由於它已成為普遍風氣和不成文的戒律，所以討論康生或搶救運動的問題一般也不得違犯。而且是禁區，有關資料又看不到，一些公開揭批康生的東西，不是只戴帽子不講事實和根據，就是事實有誤和以訛傳訛。例如《康生評傳》上有一節談康生同饒漱石爭當華東局書記 ，說「饒漱石在七屆一中全上才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就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饒從未做過政治局委員)，可是後來還有些文章在抄襲。這就是為什麼在談康生的時候要先交代一下這種絕對化偏向和籮筐主義現象的原因。

關於對康生的一點評介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在開除康生、謝富治黨籍的決定中，提出的理由是:「鑒於康生、謝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康生、謝富治的黨籍，撤消對他們兩人的《悼詞》，並向全黨公佈他們的反革命罪行。」[4]這當然是罪有應得。不過主要算的還是他們在「文革」

4 《人民日報》，1980年11月1日。

中的罪行，至於其他歷史問題，如康生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的錯誤與罪行，就只是在《附件》中提到「在延安一再製造冤案，陷害大批幹部」，沒有提到搶救運動。這也從側面說明，搶救運動是否錯誤尚無定論，即使錯，罪責也不能完全推給康生。但我們算的正是康生在延安整風搶救中的賬，自然不能為中央這次決議所限。而且既然說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是個陰謀家、野心家，可他為什麼會入黨後一帆風順，步步高升，進入政治局四十年，還做到「善始善終」，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死後落得個「全國人民愛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等美名？[5]可見，康生的一生還不能簡單地只用一個「壞」字概括。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一分為二」同樣適用於康生，特別是康生也確有能爬上去的客觀條件和自身本領。因此討論康生和毛澤東的關係及其在搶救運動中的作用之前，對康生作點簡單評介並不是多餘的。這裏只談與我們所討論問題有關的幾點。

康生一生中的重大罪行

康生並不是一些書籍和文章中說的生來盡做壞事。這種絕對化傾向當然是違背史實的。我們無須為康生評功擺好，但是他在民主革命時期除犯錯誤的一面外，也還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貢獻。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八年，那可是提着腦袋幹革命的，而且大部時間是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如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特科的除奸保衛工作，為蘇區輸送幹部，維持中央的聯絡機構。(至於康生是否在上海被捕叛變，說法不少，但中央決定附件只說存疑，未作正式結論，且附件竟還提到已證明完全錯誤的所謂「潘漢年內奸案」，因此這裏也不作定論。)在駐共產國際時期，他也不光是同王明一起推行「左」傾機會主

5 《人民日報》，1975年12月22日，康生追悼會上葉劍英致《悼詞》。

義，還根據共產國際新的精神，多次聯名寫信批評博古中央的某些過左政策（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在他們一次來信後停下來的），維護和宣傳毛澤東（指令博古中央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將毛從政治局候補委員選為正式委員，大力宣傳毛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蘇二次大會上的報告等），特別是提出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落實。回到延安後，康生很快就順風轉舵，和王明拉開距離，同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站在一起，使中央在同長江局的爭論中可以合法使用書記處名義。他不但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就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反對王明去武漢的意見，而且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已醞釀推舉毛出任總書記，並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和忠實擁護者。這也是他能夠一直站穩腳跟並步步高升的基礎。如果說，在延安整風前，康生還為革命做過一些好事，有一定貢獻，那麼以後他起的好作用就不多了。因此，綜觀康生一生，實在是貢獻不多，罪惡極大。他的主要罪行大致可歸納為三項。

一是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推波助瀾，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這是本文一直在討論的問題，下面還會專門談到。

二是製造和鼓吹個人崇拜。

他雖談不上發明者和帶頭人，但也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個人迷信問題，是中國黨在延安整風以來（自然包括搶救運動），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累犯重大錯誤的根本原因，也是康生之流賴以安身立命的關鍵所在。因此不能以「法不責眾」和「人人有份」等為由，淡化和減輕個人崇拜問題的嚴重性及其製造者們的責任。實際上，搞個人崇拜才是康生最大的一項罪行，其他犯罪多是由此產生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但這個問題在下面討論康生和毛澤東的關係時還將涉及，這裏就先不多談了。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惡多端。

這正是犯事——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所在，自然不能不說。但是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又可謂汗牛充棟，而且其他有關材料也是一談及「文革」中的壞事，大多要掛上康生的名字。所以對他做的壞事，既無須多所重複，也不必作什麼分析論證。這裏只從中央決定中處分他的主要根據（即主要罪行）「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說起。不過關於「篡黨奪權」，也如同「路線鬥爭」一樣，在過去的黨史中使用得一直有點亂。如果說張國燾另立中央，是明目張膽的篡黨奪權，那是不會有爭論的。但從延安整風以來，批判的許多「篡黨奪權」卻不大容易站得住。例如一直批判六屆四中全會以及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都是篡黨奪權，（中共黨史學的開拓者胡喬木直到臨終還堅持「四中全會是奪權」[6]。）就已值得商榷。既肯定它是奪權，又不敢否認其合法性，這就不但說不清，而且顯得自相矛盾。[7]還有些已徹底否定的「篡黨奪權」，如1959年廬山會議中的「軍事俱樂部」、「文革」初期的「劉鄧司令部」等，就更不用說了。至於林彪、江青等人的篡黨奪權，也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的。因為林彪成為副統帥和法定接班人，江青成為「文化革命」的「旗手」和前台總指揮以及後來進入政治局，都是毛澤東的安排和得到中央全體的擁護，並不是他們自己設法篡奪得來。而且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一開始是被說成混在一起的，後來才被分成了兩攤，康生則明確是江青集團的「顧問」。談到他們的篡黨奪權問題，如果是指把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權奪到只聽毛澤東一人指揮的（1966年毛澤東就明確說現在不要一線二線，他自己就是一線）中央文革之手，那很快就完成了，因為這只有毛澤東一句話就行。1967年11月27日《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聯署發出的。[8]實際上「九大」從籌備到召開，也

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7、49頁。

7　對此，我們在前面的〈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一章中已有所討論。

8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91頁。

都是在中央文革把持下進行的。1967年2月，毛澤東就已說過，「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9]全國各省市和地方機關的奪權，1968年冬也已全部完成，先後成立了各級的「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10]在這種情況下再提篡黨奪權，就只能被理解為奪毛澤東的權了。關於後來林彪的設國家主席之爭是否算得上篡黨奪權，在此不論。但說江青要從毛澤東手中奪權，康生也直接參與，恐怕就值得考慮了。實際上，「文革」中康生對毛澤東表現得更加忠誠，而且正是由於揣摩到領袖意圖，才對江青變得完全馴服，甘做她的一把殺手鐧。

康生同江青本來就有一種特殊關係。他了解江青的底細，特別是被捕叛變問題，又對江青同毛澤東結婚有撮合之功。所以江青一直對他有點敬畏和感激，在延安時就一再說：這「老」那「老」，我只認一個「康老」。而康生對江青也不大在乎，人家都稱「江青同志」，他卻直呼其名。只是「文革」開始後連續發生的幾件事，才使他這個感覺銳敏、老奸巨猾的陰謀家開始認識到了江青的「來頭」和「厲害」。一是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建議改選政治局常委，並由他提出名單，讓周恩來寫出去徵求林彪和江青的意見。江青提出鄧小平不應排名第四(原排毛、林、周後，因是全票)，應把「文革」組長陳伯達提到前面，但又說陳太軟，壓不住鄧，還是陶鑄厲害，把陶調上去。周恩來回覆毛澤東，毛表示同意，於是就把陶鑄由最後一名勾到了第四位。從這件事上已可看出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江青這時在黨內的地位和作用了。第二件事是，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11] 這等於明確宣示，中央文革實際上是以江青為首，組長陳伯達已成傀儡。所以在幾次會上，陳伯達講話都說他這個「小小的老百姓」只不過是劉盆子(西漢亡後被赤眉起義軍抬出來當皇帝的一個放牛的劉氏宗室)，意思是「文革」小組由江青當家，他只是掛個名。但他又不能不跟着江青幹壞事並承擔責任。例如由於他們對陶鑄不滿，江青就封陶一個「最大的保皇派」，並在沒有事先報告毛澤東的情況下，於1967年1月4日組織大會，讓陳伯達講話(陳陶也有舊怨)，突然把陶鑄打倒了。其實陳伯達的日子也不好過，曾一度想自殺，還對周恩來等人說過，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已查了書，認識到共產主義者是可以自殺的（指法國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殺後列寧參加了悼念）。[12]這也許是陳伯達被認為後來轉而投靠林彪的一個原因。對康生震動最大的還是第三件事，即毛澤東對所謂「二月逆流」的發火。他曾對人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主要是針對陳毅批評延安整風搶救和譚震林說江青比武則天還凶)。康生從此對江青俯首帖耳、百依百順，不但言聽計從，而且還為掃清江青「前進」道路的障礙獻計獻策。變化的明顯也表現在連稱呼都一下由直呼其名改為「江青同志」了。只要江青提到或暗示要整什麼人，康生就會立即着人搞出材料，並上綱定罪。[13]

上面只是談點康生揣摩領導意圖、緊緊追隨江青的情況。至於他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那確是罄竹難書。單是被他羅織罪名、直接點名和批准迫害的幹部即達839名，其中包括中央領導人和高級幹部243人。[14]而且事實證明，康生的罪行並非思想認識問題，所以在臨

9 〈(四)書記處和政治局名存實亡了〉，《王力反思錄》(下)，第709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1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183–186頁。

11 《「文化大革命」簡史》，第97頁。

12 以上材料見：《「文化大革命」簡史》，第112、97頁；穆欣：〈關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69輯；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頁；《王力反思錄》第376、617、957頁；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369–377頁。

13 《王力反思錄》，第983頁。

14 《康生評傳》，第284頁。

終前還要作點洗刷。一是讓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轉報毛，說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15] 二是死前在輸液和吸氧中由擔架抬進周恩來病房密談近一小時，除交代江青、張春橋的變節問題外，[16] 據說還請周轉一封信給毛澤東，對「文革」提了意見。不管這兩件事是否出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為了留點好的「名聲」，都說明他的許多罪行多是明知故犯。

康生的兩副面孔

康生有兩副面孔。在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參加運動和整起人來，他心狠手毒、陰陽怪氣，是個搞逼供信和製造冤假錯案的專家。一個時期，黨史研究和輿論導向也搞極端，一會兒把他吹上天，出事後又一下描繪成一尊凶煞惡神。其實康生還有另一副面孔，平時總要擺出一種文人學士的派頭，顯得頗有才學，曾得到不少人的賞識，也成為同毛澤東有親和性的一個因素。其實這種有兩副面孔的奸佞小人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被《明史》評為「機敏猾賊，有才藻」的阮大鋮就是突出的典型。康生的不同面孔的顯露也決定於不同的時間和條件。從我到延安後的印象中，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在整風前延安生活還處於生動活潑的那三四年，康生也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樣，人們是可以在街上和一些集會上常見到的。雖然他的裝束顯得有點與眾不同，如穿一件延安少見的皮夾克之類，但大家對他還是作為中央首長加以尊重，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什麼壞話，反而傳說他如何學識淵博、多才多藝，以至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都來得。不管傳說如何，許多人親眼看到延安開始演平劇(即京劇，那次

15 《康生評傳》，第307、437頁。

16 張佐良：〈在情感與原則漩渦中的周恩來〉，載2001年《中華兒女》精裝本，上集。

是江青和阿甲演《打漁殺家》)時他當司鼓確是事實。說他出口成頌也不全虛。記得一次謝老(覺哉)在報上發表一篇談寫字要規範的〈爐邊閒話〉，就曾提到康生。說延安當時成立了一個名叫「飛魚隊」的游泳組織，把舉行比賽的通知錯送給了康生。康生即以打油一首相覆。道是：「邀我游泳吃一驚，字如飛魚認不清。半天識得一個字，原把康雲誤康生。」[17] 總之，在延安的頭幾年中，一般幹部對康生大多還是敬佩的。

延安整風開始，康生由於跟得緊、受重用，一時名聲大噪。不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報告由他向廣大幹部傳達，而且他的傳達報告還被中宣部列為最初規定的十八個學習文件之一，即「(3)康生兩次報告」。[18]《解放日報》在社論中甚至將毛康並提，號召全黨「細心研究一下毛澤東和康生同志的報告」，以「了解什麼叫三風」。[19] 整風開始一個月後，又宣佈「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康生為副，領導全延安學習。」[20] 從此，康生的地位日益顯要，除聽他的報告外已經很難在別的場合見到他了。他的報告也是聲色俱厲，一副「格柏烏」(蘇聯秘密警察、鎮反機構)派頭，使人望而生畏。一次講民主集中制，就把集中和紀律強調到了可怕的程度，還高聲念了幾個外文字，說民主是形容詞，集中才是作為主詞中的名詞。搶救運動開始後就更少知道他的行蹤。現在許多黨史讀物說，搶救運動中康生到處插手、經常到各機關煽風點火、宣佈整人的名單，多半是後人的臆

17 僅憑記憶，沒查謝老的文章。記得謝老抗戰期間曾在延安報紙上先後設過兩次專欄，先是仿美國總統羅斯福，名曰「爐邊閒話」，整風後改為「一得書」。另據延安同學馬列閱後告，他所記康詩的最後一句是：「誤把康雲作康生」。

18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

19 《解放日報》1942年4月5日社論。

2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395頁，原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12日。

想和某些人的編造(為好人解脱，為壞人加罪)。實際上，一般幹部對康生在搶救中的活動和所起作用並不清楚。只是許多被搶救者由於對他的一些搶救報告不滿，因而對他的印象變壞了。但可以看出，那時和以後，他和一批積極分子和秀才們的關係還是一直不錯的。

共和國成立後頭十年，康生因長期養病和做了幾年內部編輯之類的工作，沒有怎樣露出凶相，反而在文化方面撈到了一定名聲，不少人讚賞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涵養與鑒賞水平，如書畫、詩詞、戲曲、金石、文物收藏等。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陳叔通，就曾寫過一篇文章，尊康生為當代中國四大書法家之首，不但真草隸篆皆通(尤擅章草)，還可左右開弓，他家就有康生書寫的真草隸篆四幅屏。郭沫若游晉祠後也吹他，「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紅牆繞晉祠。」康生也能畫兩筆國畫，署名「魯赤水」，意欲與齊白石試比高。鄧拓(馬南邨)在《燕山夜話》中曾寫過一篇〈談魯赤水同志的墨梅〉，極為讚賞。康生的詩詞無緣多見，只記得大約1959年前後，名人中興起一陣吟廬山仙人洞之風，並傳出康生的一首小令：「仙人洞，天開石竇。一滴泉，地辟清湫。綠蔭深(處)隱紅樓。踏白雲，天外走。望長江，天際流。這神仙是到處有。」而且據説毛澤東、郭沫若有些作品還徵求康生的意見。康生收藏文物更為出名，主要是硯台、印章和善本書。據王力説，康生看合適的字畫也買，但一般自己不藏，大多送給了鄧拓、王力、田家英等人。一次有人告知，康生從收藏的硯台中選出了九十方交王冶秋在原北大紅樓作內部展覽，我也去看了一下，因純是外行，現在只對一方漢代瓦當硯和一方明代脂硯有點印象。[21] 這類

21 以上全憑記憶，如康生的《小令》就可能有錯。按：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個時期，由於曾參與起草有關國際與外交問題的文件，曾和一些秀才如喬冠華、熊復、王力、姚溱等多有接觸。有關康生的這類情況，多從他們那裏聽來。而且從閒談中也感覺到，人們對康生的印象還是很不錯的，這也許是由於正當「王莽謙恭未篡時」。有關康生這方面的情況，還可參看《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三聯書店2002年版；〈王力與文物〉，《王力反思錄》的附錄。

事情還可舉出一些。例如我就不止一次聽到陳毅説過，北京的廚師怕他，唱戲的怕康生，意思是各為有關方面的內行。但是熟悉中國封建傳統的康生很鬼。他的特長一般不露，以免「木秀於林」和遭人主忌。他號稱「理論家」，卻堅持述而不作。(有人説他理論上根本不行，一篇文章都寫不出來。但過去那種常寫理論文章，還引經據典的人，對領導造成無形壓力因而遭忌也是事實。)談以上這些，無非是為了説明，康生當年還迷惑過一些文化人和秀才們，並不是後來人們描寫的那樣完全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也不像一些事後諸葛亮為領導人編寫的傳記和回憶錄所説，似乎這些領導人老早已看出康生是壞人。也許正因為有「文武」兩手，才使康生能夠長期得寵和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行兇作惡。

隨着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和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感到搞政治鬥爭還是得心應手，搞經濟建設卻把握不大，於是就自然將「左」的路線更向「左」推，大抓起了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這就為康生提供了發揮特長的用武之地。從1959年起，康生又順着領導意圖，沿着極左路線，大肆活躍起來，到處挑撥離間，煽風點火，起着越來越壞的作用。例如「利用寫小説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原來就是康生寫的一張條子。就張聞天《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給中央的報告，向毛澤東告狀，説張「比利別爾曼還要利別爾曼」的，也是他。在「反修防修」、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中，康生出盡了風頭，在把中國推向十年浩劫中起了重要的準備作用。至於在「文革」中，更是作惡多端，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害死了多少人。也正是這個第四階段，使康生的原形畢露，落得了個遺臭萬年。

關於康生和毛澤東的關係

像康生這樣一個奸佞小人，為什麼會長期大顯神通，成為少有的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於從延安整風起他就同毛澤東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關係。他以毛為靠山，忠心耿耿。毛對他既用其所長，也始終信賴。康毛關係悠久而且面廣，這裏只簡單談幾個有關的問題。

政治上的結合

雖然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對毛澤東也有照顧(如上所述)，但確立長期相互信賴基礎的還是延安整風。善於觀風和投機的康生，回到延安後就開始向毛澤東靠攏。這時毛的領袖地位尚未確立，正需要像康生這樣從莫斯科回來的大員的支持，所以對康也是投桃報李。如康生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支持了他，四月就取代鄧發擔任了中央黨校校長。隨着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形成，康生的擁戴和支持也越來越明顯，他的地位和職務也得到迅速提高和增加。整風開始後他一時幾乎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他身兼職務到1942年就已有：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總學委副主任、中央黨和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指導整風的《學習報》主編、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局長，1943年還增加了中央敵後工作委員會主任，不可謂不多。康生在整風中一個重大功勞，我看就是實際上對王明「左」傾路線(並從四中全會算起)的定性和強調教條宗派篡黨等問題起了明顯的啟迪作用，而這些又正是整風中清算歷史中的關鍵。因為在1943年政治局「九月會議」之前(甚至包括「九月會議」康生發言前的頭幾天)，對王明的批判還是限於武漢時期(先稱右傾錯誤，後升為投降路線)，批評第三次「左傾」也是從「九・一八」臨時中央上台算起(故稱「博古路線」)，還明確指出，政治局「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是「主要的根本的」。[22] 但在康生大批《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發言後，會議的內容和氣氛即隨之一變(《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康生發言的一些看法「對後來會議的進程發生了較大影響」，[23] 不知是否有此含義)。此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發言中，四中全會就一下變成了篡黨奪權，只有罪惡，博古路線也加上了王明的名字(後來乾脆變成了「王明路線」)，還更加強調清算兩大宗派，即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延安整風的根本問題和中共黨史學的基調從此奠定。當然，康生並沒有提出這一整套，但連毛澤東都說發現四中全會的錯誤是康生的功勞。[24] 延安整風後，康生更是竭力揣摩毛澤東的意圖。當然不少人也在揣摩，但比較起來，他顯得見事早、摸得准、跟得緊、變得快。例如毛澤東提出編《劉少奇選集》，他就一馬當先，表現甚為積極。當看出毛要打倒劉少奇而亟需重要材料時，他又首先提出自己完全知情的「六十一人出獄案」。還可舉個小的例子。關於稱呼毛澤東的「四個偉大」，本是陳伯達(提了三個)和林彪(補了一個「偉大的統帥」)先後提出。康生不甘落後，一天搬來幾部外文辭典到「文革」小組，論證「偉大的導師」最重要，必須擺在第一位。後來毛澤東對斯諾談「四個偉大」「討嫌」，以發洩對林彪的不滿時，惟獨表示「導師」還可接受，因為他當過小學教員。此事雖小，也可看出康生揣摩領袖心思的功夫之深和用心之苦。

---

22 毛澤東：〈歷史草案〉，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225頁；毛澤東和王稼祥1942年2月21日覆周恩來電，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06頁。

23 見該書第286頁。

24 除前已注明的毛同印尼客人的談話外，還可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5–299頁；《王力反思錄》，第712–713頁。

康毛的個人關係和家庭關係

兩個人有相同愛好，談資甚多，在延安時曾同住棗園，經常一起聊天。康生為了逢迎討好，還不時向毛澤東周圍的人打聽毛最近讀些什麼書。自稱同康生曾長時朝夕相處並頗有交情的王力也說，「毛主席對康生個人關係很好」，「毛主席說康生歷史上有功勞」。兩人在詩詞、書法等方面有共同愛好和交往，以致毛主席一些「詩詞定稿由康生負責。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經過康生。」「他們來往書信都是用毛筆字，寫得很漂亮。」還說，毛岸英、毛岸青就是康生佈置一個姓張的把他們找回來的。1936年康生又到巴黎把他們接到莫斯科，並一直加以照料。「毛岸英回到延安後，毛主席還叫毛岸英跟康生學點東西。」[25] 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書中也曾提到：「康生當年從法國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我伯父對康生的印象不錯。」在跟隨康生參加土改時，「化名為小曹，對外稱是曹軼歐的侄子」。他伯父對人說，「跟康生學到了很多知識……康生要他每週給爸爸寫一封信，主要談農村的土改工作。」[26] 除毛澤東幾次把毛岸英託付康生培養鍛煉外，在康毛關係中還有個江青的因素，也許更重要。對江青的歷史問題，康生原本就知之甚詳，加上從1938年起黨內又有不少人揭發檢舉。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康生幫了大忙。他把江青的關係放在社會部，算做社會部人員，使江青輕而易舉躲過整風搶救這一大關，她的一切醜惡歷史也都被包了下來。[27]

不僅對毛澤東家庭成員，就是對毛澤東身邊的人如田家英，康生也竭力接近和搞好「關係」。解放戰爭時參加康生土改工作團，以保證

25 《王力反思錄》，第712–713、1271頁。

26 該書為長城出版社2000年版，以上引自《文匯報》2001年2月14日的「新書摘」版摘錄，題為〈毛岸英識別康生〉。

27 《王力反思錄》(下冊)，第713頁。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475頁也曾引用，還說除江組織關係在社會部外，連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也參加社會部工作。但葉的妻子蔣家英卻被送中央黨校搶救。

其安全。當了解田家英在收藏方面有共同愛好時，他也降尊紆貴，走曲線道路，將一些書畫和清人墨蹟贈給一個三八式的田。共和國成立後他養病期間，曾對一部《醒世恒言》仿照宋體木刻字補寫了七十餘處3,600餘字，割愛送給了田家英。(據王力說，寫字是他治腦病的一種方法，單是《西廂記》他就用蠅頭小楷抄寫了十幾本並裝訂成冊。)而田家英對他的印象也一直很好，來往較多，1959年廬山會議前還作詩稱康為「東海聖人」。王力也說，田家英只罵江青、陳伯達，從來沒罵過康生，對康生始終尊重。但康生之接近田家英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旦發現毛澤東已不再滿意田家英，他也就與之疏遠，不再給田送書畫了，最後送的一副對聯「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卻具有如此明顯的諷刺意味。[28] 這就是康生的為人。

毛澤東對康生始終信賴

對康毛關係，有許多人(特別是黨史界)認為搶救運動後毛澤東不再信任康生，[29] 因此康生裝了六年病。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毛對康的信任並未因搶救運動而改變。這裏只舉幾個我在別處曾列舉過的證明。第一，為康生進行辯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致信毛，其中專門提到：「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國民黨)奸細助長聲勢。」[30] 對於季這條真誠尖銳和一針見血的意見，毛澤東1944年1月2日的答覆是：「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不負責審查幹

28 以上分別見：前引《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摘錄；《王力反思錄》，第596，1271–1275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29 如上面提到後人編寫的《楊尚昆回憶錄》，第220頁。持這類說法的書籍文章可說不勝枚舉，因此有必要作點澄清。

30 轉引自《國外近代史資料》第十三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

部。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31] 事過多年後再回頭看兩封信對康生及其工作的說法，誰對誰錯、誰真誰假，已經昭然若揭。第二，康生的地位並未下降。在「七大」上他並沒有檢討搶救運動的錯誤，反而以高票當選中央委員(名列17，票數在周恩來、彭真等27位正式委員之前)，在一中全會選出的13人政治局委員中又名列第七，位居高崗、彭真之上。可見當時上層領導對康生和搶救運動的看法，並不同於後來一些寫書人的觀點。第三，離延安後仍委以重任。1947年4月，中央決定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委，常委中即有康生，名次排在彭真之前。參加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時還擔任主席團常委，不久又被派往山東，指導土改和解決渤海、膠東兩個區黨委的問題，整掉了黎玉等一批領導同志。第四，比較起來，毛澤東對康生很少批評(對陳伯達則多次狠批)，而且有時還公然加以包庇。如康生在晉西北土改試點中搞極左，在幹部會上對原有劃分階級標準的文件說，「這個東西害死人，把它燒了(作廢的意思)」，造成晉綏地區土改混亂了約半年。1948年毛澤東路過興縣時批評晉綏分局，說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燒了」，卻隻字未提康生。所以時任分局宣傳部長的張稼夫1982年還在成都對曾彥修說，「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燒的，批評的是我們，我們沒作聲。」第五，如前所述，毛澤東在1947年3月前就把毛岸英託付康生培養鍛煉，並配備了幾名秀才，去了山西、山東、河北。第六，康生在共和國成立後長期沒有工作，確因有病。據說是由於在延安時騎馬摔了一跤，傷了腦神經。共和國成立後腦病發作，單在北京醫院就住了五年。1956年他的腦病居然好了，[32] 在「八大」會上仍當選中央委員。一中全會上由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降為候補委員，可能由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長期生病沒工作，對解放戰爭和建立共和國談不上什麼貢獻。二是七屆四中全會上曾提到延安搶救，劉少奇都做了說

31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頁。

32 〈王力與文藝〉，《王力反思錄》(〈附錄〉)，第1275頁。

明和檢討，他卻拒不檢討(因病缺席)，自然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但當他病好後積極貫徹「左」傾路線時，就又重新紅了起來，抓文教、抓理論、組織寫國際反「修」文章和參加國際反「修」鬥爭，經常出席毛澤東召開的小型會議，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還補選成書記處書記。由於在「文革」中擔任「顧問」立了「功」、扶保了江青，1973年十屆一中全會上竟當選為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壽終正寢」。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作用和態度

由於搶救運動在黨史上仍屬禁區，所以康生在搶救中的所作所為，至今也沒有檔案和文件公佈。現在流行的各種說法，大多只有帽子而不提根據。 我雖然經歷過搶救運動，但因是一般幹部，對康生的情況了解很少。現在看到的一些材料，也多是泛指康生到處插手，卻無具體事例，或所舉不實(如鬥爭王實味)，而且不論官史民史說法基本一致。因此這裏對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無法全面討論，只能挑出幾個問題提點看法。

康生算不得搶救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

說康生一次報告掀起搶救運動，既不符合事實，又違背常理。實際情況是，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作於1943年7月15日，但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後，延安一些機關就已開始了肅反鬥爭的坦白檢舉運動。彭真一次報告中就說，「關於清算反革命的鬥爭，中央黨校是從1942年10月開始的」。[33] 1943年《四三決定》發出後，4月9日和12日即分別

33 《彭真年譜》上卷，第224頁。

召開了兩萬多人的大會，由任弼時作審幹反特鬥爭的動員報告[34]，還安排了幾個人當場「坦白」。從此，延安和邊區各地的坦白運動（即搶救運動）就普遍開展起來了。那些堅持康生報告後才開始搶救運動的說法，除了武斷和摳字眼外，並沒有舉出多少事實根據。例如誰能說清，後來提的那個「審幹運動」究竟和當年的搶救運動有什麼區別？搶救運動搞逼供信，審幹運動就不搞？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所說，「過去一年內清出的『特務』曾高達一萬五千多人」；康生報告後，「在延安，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毛主席就指示讓它停下來。」[35]那麼其餘一萬三千多人又是什麼時候和怎樣「清出」來的？這不是太自相矛盾又太不真實了嗎？但是由於「輿論一律」，既然權威方面確定「搶救運動是康生搞的」，於是一切黨史著作就都得照此寫去，頂多在用字上稍有不同而已。[36]

說這一提法不合情理，是因為它把康生的地位和作用誇大得過了頭，似乎整風和搶救都是他說了算，連中央黨校竟也歸他領導。例如薄一波說，「在康生等人的領導下，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37]這又把校長毛澤東、特別是常務副校長彭真置於何地？須知，就在康生作那個報告的7月份，彭真已在黨校作了四五次談到肅

34 《任弼時年譜》，第442頁。

3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280頁。

36 例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3頁；中共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6頁；《毛澤東傳1893–1949》，第652–653頁；《周恩來傳》，第682–683頁；《陳雲年譜》上卷，第378頁；《任弼時年譜》，第347頁；薄一波：《七十年的奮鬥與思考》，第363頁；《陸定一傳》，第280頁；還有一些傳記和回憶錄，不再一一列舉。

37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63頁。

反搶救的報告，列席中央有關的會也有五六次。[38]黨校的搶救運動按理康生是插不上手的，更何談「領導」。實際上康生並沒有一些黨史書上說的那麼神通廣大。在當時的反內奸鬥爭中他還歸劉少奇領導。而且社會部派駐各單位的特派員制度1940年即被取消，代之以各單位黨組織領導的保衛委員會。這就使社會部不能直接插手各單位的肅反，更不用說審幹了（要插手就得通過有關單位領導）。整風特別是搶救中，毛澤東又明確規定：「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因此，各單位搶救運動進行的如何，首先取決於本單位領導，這是前面已經舉例說明了的。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事過四十年後，各種黨史書又忽然間把康生抬出來，把搶救運動的發明權和領導權讓給他，把運動中一切偏差和罪過都往他頭上推？這就是因為黨史學須遵守「為尊者諱」的原則和上述的籮筐主義。而且，光「諱」不行，還得增添更多東西。例如一些官方黨史書上說，在康生報告之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已「發現審幹工作中有『左』的錯誤發生」，並「試圖予以糾正」，[39]就不是事實。否則，為什麼不糾正，反而讓康生作那樣一個報告並由中央批發全黨？《彭真年譜》1943年7月有一條說得更具體：彭真和李克農一起「向毛澤東報告延安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普遍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情況。毛澤東聽完後說：我看是擴大化了。 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40]這又是以訛傳訛。第一，它沒有注明具體日期。資料來源可能出自《毛澤東傳》，而後者則採用王保成《跟隨領袖二十年》的回憶錄。[41]如無正式檔案

38 《彭真年譜》上卷，第222–225頁。作報告的時間為：2日、14日、19日、23、31日。其中2日為傳達毛澤東報告，除23日為二部和四部外，其餘均為全校。

3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6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2002年版，第790頁。

40 《彭真年譜》上卷，第227頁。

41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53頁。

資料，恐怕不足為憑。第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10月9日在綏德反奸大會材料上的批示，[42]改為七月同彭真等的談話恐是主觀臆測。第三，以實際情況推論，他們三人不可能有這一內容的談話。如果毛澤東認識到「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那就絕不會有他8月8日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講話中談肅反的那些內容，[43]也不會有我們經歷過的延安和邊區八九月的搶救高潮(只要翻閱一下那一陣的《解放日報》就會知道)。如果彭真有此認識和聽到毛的反「左」談話，那更不會使中央黨校這個「『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一直保存到1944年。再如《毛澤東年譜》1943年7月(也無具體日期)一條同綏德專員袁任遠的談話，也是反復講不能搞逼供信，要汲取過去肅反的沉痛教訓，又談到「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看來這條同樣缺乏充分根據。因為如果真有這一內容的談話，袁任遠大概不會回去在八九月大搞搶救，致使綏德師範、米脂中學的一大半師生變成「特務」，也不會有上述的材料和「一個不殺」的批示了。由此可見，黨史對尊者豈只一個「諱」字。

關於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

對於康生的這個報告，了解和研究延安整風搶救的可以說無人不曉，我們上面也多次提到，因此這裏不必要多作評論，只是有幾個看法還值得加以討論。首先，不可把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以下簡稱康生報告)單純看成康生的個人行為，也不能像黨史學界評介得那麼高。無論名義上還是實際上，他都是代表中央正式傳達毛澤東的指

4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75頁。

43 以前多次引證過，如：黨校2500人中有250個特務，聽說還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行政學院除一個人外，教職員全部是特務，等。對這些，正式黨史、年譜、傳記照例都給「諱」掉了。

示和中央的決定，是中央對搶救運動統一部署的一部分，只是同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其他成員彭真、高崗等一樣，向他分工負責的系統所做的報告。當時中央估計國民黨正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機會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於是一方面準備對國民黨的鬥爭，一方面加緊內部肅反。6月24日，中央在《關於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和我黨反特鬥爭的指示》中即指出，延安一萬名幹部中已發現國特和日特近千人，華北和華中各根據地估計也一定是很多的。7月9日延安三萬多人集會紀念抗戰六周年，緊急動員，保衛邊區。11日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在動員群眾保衛邊區的同時「繼續加緊清除內奸」。[44]13日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按：實際上，11日蔣介石、胡宗南均已覆電朱德，表示無意進攻邊區。12日胡又下令撤走部分部隊)的同時，還討論了利用機會進一步提高上層整風水平和加大搶救運動的力度問題(如毛澤東在講話中已把王明定性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並警告說，機會主義者不改正錯誤就有走向敵人的危險；康生發言說，肅反工作已摸到規律，一是群眾大會，二是精雕細刻，軍事時期就要實行鎮壓，楊家嶺一次群眾大會就弄出六名特務。)[45]會後除準備上層整風的第二次「九月會議」外，就是立即發動一輪搶救運動的新高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成員隨之向分工負責的系統作動員報告。例如14日，彭真即「根據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精神，在中央黨校全校大會上就審查幹部問題作動員報告。」[46]15日，康生向中直機關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會上除康外，還有別的領導人講話)。19日，彭真再次向黨校全體人員做報告，「進一步談審幹問題。這時正是坦

44 見《延安整風實錄》，第373頁。

45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57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延安整風實錄》，第373頁。但有關討論搶救運動問題，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年譜》均未提，只有《任弼時年譜》提到「審查幹部」。這可能屬黨史學上應遵守的原則之一，即一般不提領導人參加搶救的言行。

46 《彭真年譜》(上卷)，第222頁。

白高潮時期」。23日和31日兩次作報告，其中提到：「搶救運動高潮是在軍事緊急時期進行的。」[47] 8月8日，毛澤東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上作了上面引過的，談到行政學院教職員除兩個人外都是「特務」等內容的講話。9月4日延安縣在蟠龍召開鋤奸動員大會，高崗作反特動員講話，接着就有23人上台坦白。9月21和22日，《解放日報》連續刊登「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和「綏德失足青年紛紛悔過」的報道。10月8日，康生簽發推廣綏德經驗的材料。9日，毛澤東在批轉這一材料上作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批示。[48] 這都說明康生的報告是在他分工主管系統（中直）執行統一部署，絕非個人的發明創造，更不是膽敢背着毛澤東和黨中央擅自發動一場「搶救運動」。

其次，康生的報告，不僅是執行中央的決定，而且報告文本必然經過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和書記處成員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審閱批准，否則絕不可能由解放社大量印成小冊子，按組織系統發給全黨（延安和各根據地）。這是起碼的黨史常識，任何人也不可能提出反證。無論是在當時人們心目中還是事後從黨規黨法觀點看，康生的報告都是代表中央的，其地位同任弼時四月的動員報告大體一樣，印發下來都是被當作中央文件看待，指定大家學習討論的。只是康生的報告，無論印發的數量和範圍，都要大大超過任弼時的。但這是形勢使然，絕無重要性的差別。

第三，康生報告的內容，除強調坦白的緊迫性（即彭真所說「搶救運動高潮是在軍事緊急時期進行的」）外，基本精神和三個月前任弼時的報告完全一致。任在4月9日的報告「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方針」（15日書記處決定鉛印一千冊印發各機關學習討論），主要是揭露

47 《彭真年譜》（上卷），第223、224、225頁。

48 以上材料來源見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

國民黨特務破壞活動的嚴重性，號召「誤入歧途」者只要向黨忠誠坦白，黨會原諒他們的錯誤和罪行，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的鎮壓。康生的報告也是兩面都講，只是強調戰爭危險（開場白就是：「今天的會議，是緊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和更多地批判國民黨和蔣介石。對兩次動員的銜接，他在報告中也提到：「在三個月以前，我們在此地（中央大禮堂）曾告訴過大家（按：那次康生也講了話）……從四月十日起，我黨中央又一次的以寬大政策號召這些青年們起來改過自新。」[49] 根據我們學校和軍直一些單位的情況，實際上搶救運動在《四三決定》和第一次動員會後就已全面鋪開了，康生報告只是火上澆油罷了。但由於黨史學上的「為尊者諱」和籮筐主義等原則，全延安四月那次大動員和任弼時等人的報告，大多不被提起，惟獨突出康生在中直機關的這次報告，以便把發動搶救運動的責任完全推給康生。

第四，康生的報告無疑是完全錯誤的，起了很壞的作用。它利用形勢的緊張（現在看來，當時估計國民黨必然進犯邊區也有點過分，證明對內的「左」和對外的「左」歷來是密切相連和互相促進的）掀起了搶救運動的一次高潮，加深了極左錯誤。特別是經毛澤東和黨中央批轉各地，更使其流毒全黨和所有根據地（山東、蘇北等地雖然抵制了，但也不得不進行試點和應付[50]）。再加上8月15日中央審幹決定[51]的發佈（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介紹延安經驗），搶救運動就在延安和各地更加猛烈地展開了。而且康生在報告中隨意點名，說：「國特為日寇服務的事實，在延安反奸細鬥爭中，是不勝枚舉。如：混入新四軍的許遇之，破壞河南黨的杜征遠，破壞邊區銀行的蕭煌，破壞自然科

49 《搶救失足者——康生在中央直屬大會的報告》（1943年7月15日）。

50 參閱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1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學院的彭爾寧等等，他們都是敵探兼國特……」(經甄別，上述四人都是好同志)[52]。當然，在此前的西北局高幹會上，毛澤東也輕率地點了老革命吳奚如和成綱等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名，但那還是內部的口頭傳達，而康生的點名卻上了書並廣肆印發。這就使一些機關和領導人隨便點名、誣陷好人以至挾嫌報復的惡劣作風更加盛行起來。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康生的報告固然起了極壞的作用，但在黨史教科書和領導人傳記、回憶錄中，把它作為個人行為，卻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康生為什麼不作檢討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作為，當時就引起一些領導人的不滿。例如張聞天從外地搞農村調查後回到延安，對康生送閱的捕風捉影和靠逼供信搞出來的材料就不信，而且當面指出。但康生根本置諸不理。張聞天除向任弼時私下反映外，也只能採取超脫態度去工廠搞調查。[53]其他不少領導幹部也對康生的作為表示懷疑和不滿，但由於康生得到毛澤東的信賴和重用，大家都不願多講。當然也還是有些人提過意見並向中央作了反映，如前面提到的蔣南翔就先找劉少奇面談，後來又寫了書面意見；[54]老幹部王世英也寫了《關於請求中央糾正搶救失足者運動過左問題的報告》，上書毛澤東、劉少奇、康生。[55]至於被搶救的幹部，即使不大了解康生的具體活動，但對他的報告自然會感到憤懣，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這都說明，對康生搶救運動中的錯誤和罪

52 轉引自《康生評傳》，第87頁。

53 1999年1月28日訪問劉英的談話；另見張聞天1959年8月13日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54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55 段建國、賈岷岫：《王世英傳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2頁。

行，不但當時人們多已了解，而且事後也一直有所議論，並不是康生被開除黨籍後才突然發現。既然如此，為什麼在大講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延安整風期間，卻沒有上層領導對康生的批評，更沒有他的檢討？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整風總的精神及其對處理黨史問題的態度

上層整風以毛澤東稱之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的《聯共(布)黨史》為主要學習材料，因此對黨史問題的處理自然也以它為榜樣，即貫穿個人崇拜(即個人迷信)精神和神秘色彩。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兩點上。第一，上層整風完全是暗箱作業(不是列寧說的民主只能建立在公開性的基礎上)，而且規定嚴格保密。第二，對黨史要設禁區、作修改，既不解密檔案資料，也不准異說爭鳴。那麼，對於在大講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延安整風中，竟然出現如此嚴重的主觀主義(還夾雜一定宗派情緒)和殘酷鬥爭的搶救運動(整風三年中兩年為搶救)，怎麼向歷史作交代，又如何維護這場「偉大的整風運動」和鞏固它的成果？可見作不作檢討不完全是康生個人的問題。因為在搶救運動中他是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統一部署，因此，這是個涉及全局的大問題。對此，毛澤東和書記處不能不作通盤考慮。何況康生每次大報告，並不是由他自己隨便亂講，而是要事先經過書記處和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的審批。無論是他自己的表白還是人們的理解，他的報告都是代表黨中央和總學委的。對於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搶救運動，既要貫徹到底，又要對缺點錯誤稍作交代，於是就決定康生1944年3月29日向西北局高幹會作一《關於反奸鬥爭的發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在肯定成績後也講些缺點和不足。但這個報告不但沒解決問題，還進一步引起大家的不滿和義憤。例如蔣南翔的《意見書》中，批評的就是這個報告。正是由於很多人有意見，對搶救運動是否要作正式和完整的檢討與說明，確實是個不小的問題。尤其是對於進行了三四年、一直被中央和全黨當作主要任務抓的整風運動，

總得有個總結。所以毛澤東和書記處先是決定要向即將召開的七大作一專門報告，於是就責成作為總學委副主任和社會部長的康生準備。康生於三月底寫出初稿，名為《整風審幹工作成果的報告》。1945年4月20日，在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這一草稿時，引起義憤。「毛澤東同志不得不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一個個的找人談話。最後，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撤除康生為七大準備的報告。」[56]道理很簡單，那麼一場在黨史上起轉折作用並有長期影響的延安整風，理應有一個報告，但要報告又勢必要談缺點錯誤，那搶救運動這一被薄一波說成「我看這不僅是『錯誤』！簡直是對嚮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老幹部的迫害、摧殘！」[57]怎麼講才能服人？看來只能以取消整個報告為好。

二、直接得到毛澤東的保護

根據前面的一再說明，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康生只不過是看着他的眼色行事和做他的得力助手。他如果不保護康生過關，那無異於引火燒身，因為那時的形勢還不像「高饒事件」時的高崗那樣，搶救運動的內情領導層完全清楚，大家之所以不出面批康，也只是由於投鼠忌器。因此，毛澤東不僅向季米特洛夫表明康生與搶救運動無關，而且在內部也採取了自己承擔責任的辦法，以其最高權力和崇高的威信來緩和大家的不滿。所以他先後講了四五次意思相同的話，都未涉及康生和社會部。如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說，「這兩年運動有許多錯誤，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那些至今堅持搶救運動只搞了十多天毛澤東就讓它停下來的黨史專家，請注意，毛自己說的可是兩年。）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58]就這樣，用一種雖非真正的自我批評卻又大包大攬的辦法把歷時兩年左右、傷害上萬（算上各根據地恐有數十萬之眾）幹部的一場搶救運動算是含混過去了，以後也不許再提起，於是康生就自然被包庇和保護下來了。

三、康生本人的政治品質

他不是以是非為准，而是看形勢說話，是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如果毛澤東、劉少奇接受蔣南翔等人的意見，同意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否定搶救運動，那康生也許會爭先檢討，以表明他的認識快、跟得緊。例如1941年「九月會議」上，他一看劉少奇成了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於是就在10月29日的會上發言，檢討他當年批評少奇為「右機」不對，並挖出三條犯錯誤的根源，如自己主觀、聽信共產國際等[59]。這次對待搶救運動卻完全不同，上面不僅沒有算賬的意思，而且連「左」的錯誤都不提，毛澤東又包攬到自己身上，還為他作了開脫。在這種情況下，他如果主動出來檢討，既不是毛澤東的意思，還會在客觀上起帶頭作用，使其他如劉少奇、彭真、高崗以及林楓、習仲勳等「負責」搶救的「首長」也得作檢討，這不就把整個部署給打亂了？聰明狡猾的康生當然不會做出這種對己不利又礙大局的事來。何況他認為他在搶救運動中的一切活動都是遵命和看顏色行事的。所以在七大會上對代表的質詢，他的回答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線」，[60]別人也就無話可說了。如果說在七大前沒有當眾作檢討可能出於某種客觀原因，但惡劣的是此公始終以一貫正確自居，後來也從未聽說他就搶救運動作過什麼自我批評和檢討。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上，連劉少奇都對「1943年延安審幹期間發生的問題」，「作了檢討和說明」，[61]但康生卻滑了過去。若果說他因病請假，那為什麼

56 仲侃：〈康生年譜〉，《康生評傳》（附錄），第352–353頁。

57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62頁。

5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1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80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8頁。

60 仲侃：《康生評傳》，第353頁。

61 《劉少奇傳》（下），第754–755頁。

能寫字畫畫刻印章，就不能作一個書面檢討呢？加之後來在「文革」中又翻出他搶救時製造的冤假錯案、更厲害地整許多被他搶救過的幹部，他這個惡棍的面目至此也就暴露無遺了。

康生和審幹九條

審幹九條的形成過程

這裏須先作點說明，即原打算對所謂審幹九條方針單獨寫一章，進行專門討論，可是現在看來，覺得還是和康生聯在一起談可能更容易說明問題些。因為現在無論是黨史教科書還是給領導人寫的傳記或回憶錄，都把康生同審幹九條對立起來，大意都是說，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了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而審幹九條方針的正式下達就「解放了被審查者」，停止了搶救運動（更多的說法是，毛澤東在康生報告後半個月的七月底就讓它停了下來）。[62] 其次，從康生被開除出事後，就上下一律認定他的《搶救失足者》報告是完全錯誤的，是導致審幹（又是完全必要的）中出偏差或逆流的禍根。與之相反，毛澤東的九條方針則是完全正確的。這後一結論，從1955年8月中央正式肯定[63]後，不但在「文革」結束前的歷次肅反中被一直當作指針，而且在「文革」後的黨史研究中也仍然被奉為圭臬，不得有所懷

62 如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版，第790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616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7–280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53頁；以及其他等等。

63 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見上引《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

疑。所以，這不只是一個學術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被實踐了多年的實際問題，很值得在談康生問題時提出來作點回顧和討論，把康生的報告和最終確定九條的《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作一對比研究。而且既然已肯定前者完全錯誤後者完全正確，我們也就着重討論後者。

其實，所謂九條方針，並不是像一些整風中的積極分子和某些黨史專家描述得那樣神秘：正在審查者和被審查者關係很緊張、處於僵持狀態時，突然中央下達了九條方針，於是雙方隨之立即得到「解放」和「喚醒」。[64] 其實，九條方針單是提出也是經過一個並不太短的過程，更不用說落實和實施了。從1943年4月3日中央發佈以反特為重點的《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9日和12日任弼時代表書記處向兩萬多幹部作《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動員報告（也稱寬大政策報告）、延安全面展開「坦白與檢舉內奸運動」（實即搶救運動）以後，中央即密切注視和具體領導這一工作。單是4月份，書記處和政治局就接連開了五六次會研究反特問題，並不斷充實工作方針的內容。例如4月28日書記處會議在決定設立以劉少奇為主任的反內奸鬥爭委員會時，就提出「審訊不動刑，重證據不重口供」等要求。隨後即召開政治局會議，報告並通過書記處決定。其中「關於反特鬥爭，決定繼續進行坦白與檢舉內奸運動」，要求「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以達到肅清內奸、培養幹部兩大目的」。[65] 5月6日，書記處會議又提出反對反特鬥爭中的官僚主義和粗暴工作方式。5月21日政治局會議還對今後防奸工作應遵照的六項方針做出決定：（一）首長負責；（二）自己動手；（三）調查研究；（四）分清是非輕重；（五）爭取失足者；（六）教

64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53頁 。

65 《任弼時年譜》，第443頁。參閱《彭真年譜》，第215–216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3–435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19–421頁。

育幹部。[66] 7月1日，毛澤東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經驗》第6期上刊登毛有關防奸工作兩條路線的一段話。正確路線，除上述六條外，增加了「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兩條；另將（六）分解為「培養幹部，教育群眾」兩條。「錯誤路線」是「逼，供，信」。[67] 此後即利用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加緊進行反特鬥爭，並分別由康生等人向各系統作動員報告。直到8月15日，中央發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以下簡稱《審幹決定》），才正式定為審幹的九條方針。但由於此前半月已以毛的名義在《防奸經驗》上公佈，所以從當時起直到現在，人們多稱之為「毛主席的九條方針」。而《審幹決定》無論是什麼人起草（當時有陣傳說為毛澤東親自起草），根據毛的指示精神，經過毛的審閱修改則是無疑的，因此人們那樣稱呼也並無不妥。

康生報告和《審幹決定》並不矛盾

黨史學界把康生報告和九條方針（即《審幹決定》）完全對立起來，無論從兩者內容還是當年實際看，都是沒有根據的。說康生報告完全錯誤和《審幹決定》完全正確；說前者在審幹中掀起了一場犯「左」傾路線錯誤的搶救運動，後者則及時予以糾正，其實這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至今還沒有看到一部黨史著作對兩者的根本對立和原則區別做出條分縷析的比較，都只是照抄幾句空洞結論。為什麼會如此，就是因為實際上兩者之間很難找出有什麼矛盾。因此一些黨史研究者以為是在批康生報告，結果卻批到了《審幹決定》的頭上。例如《延安整風實錄》批康生報告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康生炮製的特務

66 《任弼時年譜》，第444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1頁；《彭真年譜》，第217頁。

6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48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7頁。

的世界性、群眾性的論點，在這個會上得到了表現。」[68] 這就可真敲錯了門。事實上，康生報告中除強調「日寇和國民黨訓練了大批偵探奸細」和「敵探、托匪、國特三位一體」[69] 略帶有這方面的含義外，並未炮製出「特務的世界性、群眾性論點」，倒是《審幹決定》貫穿着這一論點的精神。對此，當時蔣南翔就指出並批評過，[70] 因而落得了一個反對中央九條的罪名。《決定》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務是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下面還說，這次審幹「不稱為肅反」，而採取九條方針，「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群眾性的問題」。[71] 這一論點確屬錯誤，應當批判，但它不是康生在《搶救失足者》報告中炮製的，而是出自一直被認為「完全正確的」中央關於審幹九條的《決定》。

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康生的地位，九條方針的形成（變成《審幹決定》）必定有康生的不少「貢獻」。而且從一些條文的闡釋中，就可感到康生意見的存在。例如在「首長負責」條中，提到對「有問題的人」的三種處理方式（各單位自行處理，送西北公學、行政學院等反省機關，送社會部、保安處等保衛機關），以及「在一定時期內實行戒嚴，除可靠人員攜帶通行證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問題的人都暫時禁止個人外出自由，只許隨大眾集體行動」的陰森規定。[72] 又如規定對「大多數有問題的人，均須經過核心組的談話與群眾的質問，勸說，鬥爭及開展熱烈的坦白運動」。[73] 還提到延安已審查出特務、叛徒等

68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374頁。

69 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70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

7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89頁。

7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90–91頁。

7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91頁。

二千多人等。[74]這些例子可從側面證明，九條的制訂，康生是參與其事的。因此，康生決不會反對審幹九條，而是它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執行者。

但是審幹九條規定反對逼供信的錯誤方針，康生卻搞逼供信，這豈非陽奉陰違？也可以這樣說，只是不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事情常常是矛盾的。在大喊反對逼供信的口號下大搞逼供信，可能是我們黨從蘇維埃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在肅反問題上一直沒能解決的「左」傾路線問題。在搶救運動中，毛澤東反對逼供信，康生又何嘗不是。例如他1944年3月29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對搶救運動的估計就兩面都説到了。他説，「一年零兩個月的反奸鬥爭……我們獲得了巨大成績。但在執行正確路線時，工作中也產生了許多缺點和錯誤。最主要的是：有的地方因經驗不足，對大部不捉的方針沒有及時注意；有的地方對九條方針宣傳不夠，對寬大政策與爭取方針沒有貫徹到底；有的地方不注意調查研究，輕視證據，重口供；有的地方忽視分清是非輕重，對清查特務與保護好人沒有完全統一……」。當前的「具體任務是：反對逼供信的錯誤，貫徹九條方針，開展甄別工作。」[75]康生到底是搞逼供信還是反對逼供信，這不能從片面的講話來判斷，而必須看他不同場合的不同講話，特別是要看實際行動。過去一些黨的領導人講話，多是方方面面都照顧到，既講到正面，又講到負面，或者不同時間講不同的話。例如一時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時又講就是要「釣魚」、「引蛇出洞」；一時講「對事不對人」，一時又講「既要對事，也要對人」。而我們從聯共(布)學來的黨史編纂學，採取的做法卻是：對要保護的人只講其正面的言行，負面的盡量隱去，對不予保

7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93頁。

75 轉引自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蔣批康生的報告過高估計成績對錯誤估計不足，説「成績大於缺點」的估計是「自欺欺人」，和客觀事實不符。另見《康生評傳》，第351頁。

護人則正好相反，因而研究和編寫黨史很難做到求真和避免片面性。這就是為什麼各種黨史書和領導人的文集、傳記和年譜，都在説從審幹(搶救)一開始就反對逼供信，而逼供信卻貫徹着運動始終的原因。例如被稱為糾正逼供信、闡釋九條方針的《審幹決定》，實際上就是在提倡和推廣逼供信。下面就對此稍微作點分析。

簡評《審幹決定》(即「九條方針」)

在黨史研究中對搶救運動的評估和敍述，最大的問題(或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體現在《審幹決定》中的「九條方針」。中共黨史編纂學歷來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76]説它糾正了逼供信的錯誤，停止了搶救運動，把「審幹運動」引上正確軌道，使原來出現的差錯得到妥善處理，還為後來的歷次肅反提供了指針。一些領導幹部和搶救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更把九條方針説成靈丹妙藥，頌揚備至。但是，如果真的堅持實事求是，以求真精神對待黨史，重新研究《審幹決定》，人們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那就是：九條方針基本上不正確，無論對當時的運動還是以後多次肅反都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應當對其進行認真批判和揚棄，而不是全盤繼承和推崇。不過前面已經説過，這裏不打算對文件詳細分析和列舉大量例證，只是結合實際提出以下幾點加以討論。

第一，關於特務的群眾性、世界性的估計，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完全錯誤的，而這卻正是發動搶救運動和制定九條方針的基礎。也正是根據這一認識和估計，才提出「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

76 〈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中稱，「延安審幹運動，中央訂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此後一切黨史著作均以此為准。

查幹部，並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77]造成的結果已不是什麼擴大化，而是並未抓到特務的一場自相殘殺的運動。因此在搶救運動中出現一些機關、學校把大多數人打成特務的現象就毫不足怪了，而且離黨中央越近的地方還越嚴重。以致「有的地方和軍隊將所有新知識分子都認為是特務，有的學校將整個班的學生甚至十二三歲的小學生都戴上特務帽子……有的農村將大多數居民都坦白成特務」等[78]。而且由於此後還一直堅持九條方針正確和特務群眾性、世界性的認識，因而在肅反上一貫推行極左路線，每每造成嚴重擴大化以至無中生有的後果。連許多高級幹部，不知是真懷疑還是假懷疑，一旦被整，也都要給戴上「內奸」、「叛徒」、「裏通外國」的帽子，如彭德懷、張聞天、劉少奇、楊尚昆、陸定一、譚震林等。

第二，用群眾運動搞肅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都是完全錯誤的。正像中共中央在搶救運動後期所承認的那樣，「任何地方只要群眾反奸運動坦白運動開展起來，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會隨之而來」，何況「坦白運動中的群眾壓力，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的。在群眾威力下，即使不打不罵不逼不鬥，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經刺激下，自己戴上帽子。」[79]新出版的正式黨史也認為，搶救運動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審幹肅反工作……絕不能搞突擊式的群眾運動。」[80]但由於毛澤東迷信群眾運動，所以此後的肅反還是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直鬧到「文化大革命」。

77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943年8月15日）。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處的，均引自這一文件。

78 〈中央關於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79 〈中央關於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8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2002年版），第791頁。

第三，《審幹決定》肯定和推廣延安經驗，使搶救運動的災難殃及華北和華中許多根據地。《決定》最後說，「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針與經驗，希望各地同志研究採用」。這「經驗」指明就是延安經驗，包括:對「有問題的人」「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衛三種機關進行這個工作的」和根本不講法制、任意「實行戒嚴」，剝奪廣大黨與非黨幹部的人身自由，實行類似「文革」期間的「群眾專政」；(中央書記處直到《審幹決定》發佈三個月後，還指示華中局，要他們在搶救運動期間，各機關學校「必須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81])規定各地和機關最高首長「親身參加審查幹部的大會、小會、勸說、詢問及研究」等。另一方面也還介紹了爭取失足者，對特務採取寬大政策，「少捉不殺，或少捉少殺」等經驗。此外又具體提到延安頭一期四個月參加審查工作和被審查的人數，等於暗示特務大體應佔比例。從這些內容特別是從運動在各地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推廣延安經驗就是推廣搶救運動。所以《決定》頒佈後，搶救運動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在更多的地區開展得更猛烈了。

第四，《決定》雖然指明逼供信是錯誤方針，九條才是正確方針，但實際上正是在九條中隱含着逼供信，《決定》的頒佈起了推廣逼供信的作用。首先，正如中央事後所承認的，群眾性的反奸運動一開展，逼供信就會隨之而來，[82]而九條又是提倡和依靠群眾運動的。其次，《決定》肯定和介紹的延安經驗實際上主要就是逼供信的經驗，如文內所提首長參加「大會、小會、勸說、詢問」，「群眾的質問、勸說、鬥爭及開展熱烈的坦白運動」等，加上特務群眾性的觀點和延安的數字，使各地領導為完成任務(一般的都是願意越多越好)，不能不

81 中央書記處給華東局關於《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的電報（1943年11月15日）。

82 見〈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搞逼供信。再次，所謂「培養幹部」就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保護積極分子政策。積極分子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搞逼供信可以不負責任，不予追究，還會得到賞識和重用，運動中的骨幹事實上也多成為提拔對象。這就鼓勵一些人有意行「左」。

第五，最後必須指出，《決定》上雖然提到反對逼供信，但既未明確逼供信的界限，更未提對犯逼供信錯誤作何處置，而有意無意地給留下一大漏洞。假如規定在搶救運動中打人罵人、使用刑訊逼供等，要給予處分，逼供信肯定就不會那麼普遍和嚴重了。

正是由於以上各種原因，《審幹決定》闡述的九條的發佈，不但使搶救運動搞得更加猛烈（其實，除延安及其附近少數地方外，陝甘寧和晉綏一些地區以及許多敵後根據地，還都是在這個《決定》發佈後才開展搶救運動的。《決定》也明確要求：「各地整風須延長至1944年，審查幹部可在整風中摻雜着進行」。中央書記處也是在1943年11月15日才給華東局發出《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的），而且逼供信也搞得更厲害了。除我們上面舉過的中央黨校、抗大、綏德等地區和北方局黨校的例證外，還可從中央1944年5月13日《指示》批評的許多過左現象中看出個大概。它說，延安、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都犯有嚴重的逼供信錯誤（還說明這是三月間，即《決定》發佈半年多以後，西北局高幹會檢討結果），「最主要的是捉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損傷了人，」並舉例說，「有的在一個整風班內使用24種肉刑及變相肉刑」。實際上《指示》着重講的還是華北，說：「太行軍區發生一二九師之司令部、通訊隊、參訓隊、偵察隊、印刷廠、生產部各有一個反革命支部之錯誤認識，集總直屬部門發生在大會上亂逼特務組織關係，認為電台人員均是特務，軍工部各廠均為特務掌握……冀南『左』的毛病更加厲害。冀察晉平山縣……在坦白大會上使用鬥爭鎮壓方法」。「所有這些現象，證明逼供信『左』的錯誤，在各地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特別是太行軍區，存在着嚴重的逼供信錯誤。」[83] 這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所講，它的權威性是不應當被黨史研究機關和專家忽視的。

當然，也不能說《審幹決定》沒有起一點積極作用，事實上它確曾使延安一些機關學校的搶救運動緩和了下來。那種大轟大嗡的坦白大會、設「光榮席」之類純粹形式主義的做法不大搞了（地方上如綏德、隴東、延屬專區還在搞），逼供信也稍為收斂。同時，領導和積極分子可鬆口氣，考慮點問題。這就促成了延安的搶救於1943年底進入甄別階段。但整個運動並未結束，華北和華中有些地方還正在按延安的經驗開始發動。所以總的說來，《決定》實際上起了推廣搶救運動和以逼供信為主的延安經驗的作用。這點，當年蔣南翔的《意見書》中就已指出來了。山東等地也曾明確表示（特別是1944年後）抵制延安搶救運動的做法。

以上情況尤其所引中央指示，起碼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搶救運動決非由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所發起，更沒有因九條方針的發佈而結束。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即使不重視「求真」的史學原則，但也應當相信中央當時發的指示吧，總不能說中央指示列舉的不是真實情況。第二，說各地搶救運動中搞逼供信都是康生叫幹的，是康生到處插手的結果，顯然屬人云亦云和以訛傳訛，是黨史編纂學遵循「籮筐主義」的表現。若果真是康生有此本領，那只要責令他限期改正就是，何用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發指示。其實，這正是延安整風為日後一切政治運動創立的規律：開始提倡放手大幹，有意不及時糾「左」（「對於過左偏向，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84]），隨之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在大傷元氣後再進行甄別糾偏，而且最後大多是草率收場，不了了之。

83 見〈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84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943年8月15日）。



第十三章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之四

—— 發起搶救運動的前因後果



主流黨史學論搶救運動的因果

這一問題前面已多次談到，但有的提法還須再作些辨析。

「文革」後黨史界對搶救運動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說法，大意為：在普遍整風期間，一些機關學校開展了審幹工作，在黨員迅速增加和國民黨特務加緊活動的情況下，這樣做是必要的，只是當時對敵情估計過高，不少單位還採用了逼供信。特別是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後，把審幹運動弄成了搶救運動，造成反特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直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發現後提出「九條」，才及時作了糾正。[1]這個公式看似照顧周到，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例如單是頭一個小分句就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把搶救運動和一般審幹混為一談；[2]第二，含糊地把這次運動說成似乎是各機關學校自發地開展起來的；第三，把涉及全黨和各根據地千百萬人並錯鬥了成十萬幹部的大規模運動，說成好像只限於延安的機關學校，不僅不提邊區和各根據地，還回避了不少地方曾對工農兵的搶救；再加上把兩三年縮短成十多天，就使這次自上而下製造的一場嚴重災難，變成了小事一樁。

雖然歷史已經證明，這場運動不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是災難性的，但是各種黨史書上卻堅持說成必要，又都按公式提兩點理由：「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國民黨加緊特務活動」。這兩條理由，邏輯上

1　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3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81頁；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216頁；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8–790頁。

2　例如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88頁），就把搶救運動標題為〈整風過程中的審幹工作〉，在入題前先講了1939年和1940年涉及審幹的兩次決定。用意很明顯，但卻給自己製造了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如為什麼那兩次審幹並沒有變成搶救運動，等等。

講不通，事實上也站不住。因為不能說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就意味着特務大量增加。說國民黨加緊了特務活動也無根據，實際上，國民黨此時正哀歎在延安無內線。[3]戴笠確曾在陝西漢中辦過特務訓練班，並分批向陝甘寧邊區派去四十多人，但在1942年即被全部破獲。[4]有的史書為了證明特務活動猖獗，還編了些聳人聽聞的故事。如說搶救運動前曾發生過一件中央大禮堂演戲，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剛進場，就從外邊小山坡向後門投了幾個手榴彈，投彈者當場被抓的重大案件。[5]對此，不但我在以前從未聽說過，最近問到許多老延安，包括搶救前就住在楊家嶺的老同志，也都說不知道，並且認為不可能，肯定為有意編造或以訛傳訛。[6]

為了顯得真實，新出的黨史書也還講點主觀方面的原因，如：說「在審查幹部中對敵情做出過分的估計，把審幹工作視為鋤奸、反特鬥爭」。[7]這已不像十多年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那樣，把搶救運動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康生了事。[8]但由於仍須嚴格遵守上述編纂學原則和表述公式，所以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實事求是。例如這部新編黨史教科書，既沒有指出是誰對敵情估計過分和把審幹視為反特，更不敢透露毛澤東對中央黨校和行政學院特務數目的估計和國民黨特務有「十萬大兵」的說法。而且，由於要掩蓋真相，還

3　如李銳多次引證唐縱（抗戰時期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務工作的組長）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見〈世紀之交感言：還是要防「左」〉，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2期。

4　《延安整風實錄》，第366頁。

5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頁。

6　當時在中宣部和中央政研院工作、住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周邊的曾彥修和齊速同志還來信證明，他們在禮堂建成不久即搬去住，住了五六年不等，但「從未聽說有這件事」。寫信日期，曾為2003年4月7日，齊為5月25日。原信存我處。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2002年版，第789頁。

8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3頁。

引出更多矛盾。如:「在這(指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之前，中共中央曾發現審幹工作中有『左』的錯誤發生，已通過制定工作條例和講明正確路線，試圖予以糾正。」[9]這就產生了個問題，即為什麼不進行糾正，反而讓康生、彭真、高崗等在各自系統一再作進一步的動員報告？而毛澤東本人還能在康生報告二十多天後向黨校二部做出那種特務如麻的講話，特別是到10月竟說出國民黨特務有十萬大兵這些話來？[10]這哪兒能看出半點「試圖糾正」的意思？該書還輕易斷言，說在中央發佈《審幹決定》和毛澤東10月9日指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之後,「審幹工作中的錯誤得到制止」。只要看了上面筆記中提到的一些過來人如薄一波、曾志、任仲夷等的回憶，翻一下《審幹決定》發出後延安、邊區和各敵後根據地的報紙和內部通訊刊物，查閱一下這個時期特別是中央和各中央局有關搶救運動的來往文電和各種決定，就會發現這些關於搶救運動的論述，與當時實際情況有多麼大的差距。而1944年5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恰恰證明,「審幹中的錯誤」並沒有在1943年10月前後「得到制止」。何況《審幹決定》也明確要求整風和審幹「延長至1944年」，所以華北和華中正是在黨史書上說的「得到制止」後才猛烈展開搶救運動的。孟子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看來今天仍然適用。

研究和學習黨史，應當和主要是為了鑒古知今、接受經驗教訓，而不是要繼續製造迷信和蒙昧群眾，因此必須本着「求真」的史學原則，來探討搶救運動的前因後果。

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冊下卷，第390頁。

10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頁；高新民 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379–380頁。

造成搶救運動的原因

肅反上一貫的極左路線

造成搶救運動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黨在肅反問題上歷來執行的就是一條極左的肅反路線，只要是肅反或其他政治運動(實際上許多政治運動也與肅反無二，如1957年的「右派」就和反革命並列為地富反壞右，1959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後來就被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等等)，沒有一次不是敵情估計過高和鬥爭處理過頭的。這從黨有政權起，在肅反和整人上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中就可得到充分證明。只是為了維護黨的一貫正確和個人崇拜，才諱疾忌醫、不作自我批評、不汲取經驗教訓，使這條極左路線一直延續至今。而且由於有關檔案的嚴格保密，加之許多事本來就無檔案，所以人們也無法確切知道歷次肅反和其他政治運動究竟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特別是錯殺了多少人。但是從以下登過報和上了書的數字，已可看出這條「左」的肅反路線前後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失。有人估算，我們黨從建立根據地政權起，主要是1930年到1935年，一、四方面軍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閩西等地，在反「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名義下(全是無中生有，根本不是黨史教科書上說的「肅反擴大化」)，被自己人殺掉的幹部、黨員、紅軍官兵，總數近十萬人。[11](其中許多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紅軍將領軍官)。李鋭在列席十五大的書面發言中也說，根據他接觸的材料，在這一時期，「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七八萬」。[12]經過這些自相殘殺，延安搶救運動總算佔了點便宜，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這就使被認定為「特務」的人，除極少數被

11 見〈項英的輝煌與失落〉,《炎黃春秋》1998年第4期。

12 李鋭:〈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見《直言》，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頁。

殺、自殺、致殘和很多人留有「尾巴」外，基本上都保住了性命和獲得甄別平反。這也算得上是進步，可惜共和國成立後的肅反又有些不適用了。搶救運動不但製造了以十萬計的冤假錯案，[13]還留下諸多後遺症，特別是為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創建了整人的範式，如胡風案，經過和做法都很相似。[14]其實，共和國成立後已有點隨心所欲地不斷發動政治運動，肅反和整人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動輒都是千百萬人參加，因而冤假錯案的比重就更大了。共和國成立後初期的鎮反運動，鎮錯的當以百萬計，還大部被處決。1955年的全國肅反運動嚴重擴大化，肅對的只8萬1千多人，肅錯的竟達一百三十多萬人。反右派，全國單是戴帽的就有55萬餘。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全國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受重點批判的共計365萬人。[15]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是大抓階級鬥爭，挨整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就越來越多，直鬧到十年浩劫。單是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運動——抓「五一六反革命」，全國就抓了兩三千萬人。

從以上的很不完整的敍述中可以看出，半個世紀中，我們黨在肅反以至一切對待人的問題上，始終執行的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當然同在總路線以及其他方面一直犯「左」的錯誤有關。鄧小

13 1943年10月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作報告，談到反特鬥爭時說，「反特務是今年我們一個很大進步。去年共產黨21歲，還未學會作這篇文章，今年則學出來了。國民黨抗戰以來，眼睛是亮的，聰明的，而共產黨六年是盲目的，結果國民黨的特務就無孔不入。抗戰第六年的下半年，我們學會了，破壞了國民黨的這一計。國民黨的妙計安天下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們共產黨的妙計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務鬥爭的經驗，兵即是送來的特務。邊區已有7,000，恐怕1萬人。各根據地合併就有10萬大兵，這些兵要好好訓練，我們可以用它以毒攻毒，決不殺一個。國民黨能利用我們的叛徒，難道我們不能學會利用特務！」見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379–380頁。

14 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第400–402頁。

15 參閱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9–232頁。

平臨終前也承認，中國「主要是防『左』」，因為「左」的影響「根深蒂固」。[16]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也就容易理解了，它只是「左」傾肅反路線鏈條中承上啟下、更具創造性和奠基性的一環。造成肅反上一貫犯「左」傾路線錯誤的原因，這裏只着重講以下兩點。

一、全盤接受蘇聯的建黨理論和肅反經驗

正如劉少奇所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基本上是列寧創立的」。[17]因此，中國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從一開始就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後來更是斯大林主義。由於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歷史條件和主觀認識有很大差別，所以列寧雖然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中已作了重大修正（或曰背離）。即以對人的態度而言，兩者就有根本性的不同。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是多數對少數，而且時間並不長），但更重視以人為本，主張維護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把個人的解放定為全人類解放的標尺，把奮鬥目標定位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所以在建黨學說上也更強調民主。恩格斯在論述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原則時就說，「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18]列寧生活和活動的地方，卻是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東方，是經濟相對落後，政治絕對專制，因而只能從事秘密活動的俄國。所以列寧主義就特別強調暴力和專政，主張實行恐怖與鎮壓，不講民主與法治，輕視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列寧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19]在建黨學

1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

17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84頁。

18 恩格斯：〈共產主義同盟者的歷史〉，《馬恩選集》第4卷，1972年版，第196頁。

19 參閱《列寧選集》第三卷，第594–595頁。

說上，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重點也是集中和紀律。列寧在奪取政權後實行的也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一黨專政，[20]有趣的是開始時連斯大林也有過異議。例如，1917年11月28日列寧在人民委員會提出「關於逮捕人民之敵的政黨(指立憲民主黨)內一些最著名的中央委員並將他們交付革命法庭審判的法令草案」，斯大林就是唯一的反對者。[21]但當斯大林完全掌權後，就加緊實行個人獨裁，消滅異己、濫殺無辜，形成一套完整的個人獨裁理論和高度集中的專制模式。中國黨接受的就是這種被稱作馬列主義的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延安整風以後，在全面學蘇聯和照搬斯大林模式中，蘇聯肅反的一套也就自然搬來了。中國人學蘇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共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國際的領導和指揮。在肅反上的「左」，有些就是直接受國際(實為蘇共)的影響和支持。如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就提出，「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22]而蘇共和共產國際領導還對這種殺戮叫好。布哈林在聯共十五大上即曾宣佈，中國蘇維埃「在有幾百萬居民的地區內，地主已從肉體上消滅」。[23]

二、繼承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傳統

造成中國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執行極左路線的另一個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受中國歷史傳統的影響。從秦始皇以來，中國的專制主義

20 《「左」派幼稚病》中論述的領袖、政黨、階級的關係，把領袖專政等同於群眾專政，為領袖專政製造了理論根據。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就曾反對蘇俄實行的獨裁和恐怖。過去一直對盧森堡批評列寧的意見持否定態度，現在看來，歷史已證明了盧森堡的正確。

21 見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下冊，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454–1455頁。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58，481頁。

23 《蘇聯與中國革命》，第299頁，轉引自《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41頁。

延續了兩千多年。直到近現代，中國也沒有經過成功的啟蒙運動和民主革命(或改良)，根本談不上什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中，人民群眾從來不被當作人看待，既不講人身自由與個人尊嚴，更談不上人權、人道、人格、人性等觀念。當被統治者不能再繼續生活下去的時候，就會揭竿而起，爆發農民起義。無論系統治者還是起義者，都視百姓如草芥牛羊，可以任意踐踏殺戮。而刑訊逼供和屈打成招，更是自古以來的常事。在統治較穩定時，朝廷還會講點封建法制，「殺人償命」、「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判處死刑也要經過一套審批手續。而新起義者就不管這一套了，反而更加無法無天，殺人如麻，大肆破壞。長期以來，民間傳說中就有「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殺盡四川人」等。其實，中國勞動農民並非野蠻成性，相反，他們大都老實巴交，膽小怕事，只是在無法生活下去時才會跟着帶頭人(多為遊民中的活動分子，即我們在土改中所謂的勇敢分子)走險。而中國社會又一直存在着一個龐大的可稱之為遊民的階層，在農民起義和各種運動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如劉邦、朱元璋等，也包括洪秀全和那些充當軍師、智囊之類的遊民知識分子)。生長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受專制主義文化的影響，更重要的還是自覺接受歷史上農民運動的傳統。因為在它看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時代，稱得上革命和起到推動歷史前進作用的，只有歷次農民起義，因此繼承它們的傳統是理所應當的。又照毛澤東所說，當代「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24]因為農民不但「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還「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25]革命軍隊，也只是「穿起軍服的農民」。因此，中共領導下的革命戰爭，就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相似之處極多。黨的領導也以他們的繼承者為榮，還借鑒他們一些具體做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開始的依靠對象就是被贊為「革命先鋒」的「痞子」，

24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92頁。

25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35、642頁。

即「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以及「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他們合共佔貧農中的百分之二十。農運起來，農村政權就主要掌握在他們手中，因為老實農民不但怕出頭，也不會當差，所以「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痞子』之類」。[26] 直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還從歷史中的農民運動中尋找啟發。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期間，他特意批印《張魯傳》發給大家，並提出，「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27] 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28] 看法相反，毛澤東把貧農也許看作最先進和最革命的，所以要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幹部(哪怕是工人出身)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此，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接受封建專制主義特別是農民運動的傳統影響就是很自然的。表現在肅反以及其他整人的運動上，特別值得指出的有兩點，第一是繼承了「無法無天」的傳統。以黨代政，可以隨時宣佈戒嚴與鎮壓，對人任意實行拘押、審訊、逼供以至處決。延安搶救運動雖規定不亂殺了，但仍實行有罪推定，說抓就抓，說押就押，既有群眾搶救，也有嚴刑逼供，談不上任何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共和國成立後製造了更多的冤案，錯殺了上百萬人，既談不上法治，也不講法制，黨章和憲法實為具文。第二是繼承了發現與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我們在每次政治運動中，也和農民起義一樣，注意發現那些積極響應號召、敢於衝鋒陷陣、緊跟領導的分子，並加以培養和重

26 《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25、27頁。根據李維漢的建議，共和國成立後正式出《毛選》時刪去了其中一些話。李認為這些都屬遊民，即流氓無產階級。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101–102頁。

2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627–629頁。

28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1頁。

用。歷次肅反運動中，甚至一些假坦白、會聽話、跟得緊、誣陷好人多又不隨便翻案的，也可變成積極分子，最後得到甄別平反，既不受批判，更不受處分。而那些堅持實事求是，不搞假坦白和不說假話的人，不但當不了積極分子和運動骨幹，被咬的定會大吃苦頭，事後還落個態度不好之名，更沒聽說有因不說假話受到表揚的。這樣，每次運動都是違法亂紀的受到庇護，堅持實事求是的反而倒霉，說假話的獎，說真話的罰。一茬一茬下來，積極分子自然越來越多，運動也一次比一次紅火。試想，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運動前和運動中不光提禁止逼供信，還對違反政策的及時處理(直至撤職查辦)；特別是總結時批判和處分那些違法亂紀搞逼供信的，表揚和重用那些敢於實事求是、決不隨風擺的。這樣一來，情況就會大不一樣，靠整人和弄虛作假起家的積極分子會大為減少，正派人自然會更多地得到重用，黨風和社會風氣也會變得好一些。可見，執行保護積極分子和使用順着來的幹部政策，不但是歷次運動製造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助長不正之風的一個重要因素。

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強調國際影響和歷史傳統等因素，絕不是要忽視人的作用。而且作為領袖和統治者的個人品質、意志和性格，在一定條件下還會起決定作用。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就說過，領袖「個人由其性格帶來的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不過「個人性格只有在社會關係所容許的那個時候、地方和程度內，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因素』」。毛澤東的肅反情結能夠長盛不衰，正是由於中國所處的社會條件，包括國際影響和中國傳統。這就使毛澤東對肅反的極左思想起了決定作用，使極左路線得到長期執行。設若他生長在美英等西方民主國家，不論他有什麼性格和情結，恐怕要搞搶救、反右之類整人的運動，只能以失敗告終，甚至根本搞不起來。他自己就曾經說過，像斯大林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

國家就不可能發生。他雖然也認識到這點，但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體制等原因，還是導致了「文革」十年浩劫。[29] 如果這些社會條件不改變，缺少個人自由和民主體制，即使沒有毛澤東，而是別人當領袖，也許程度不同，但肅反上的「左」仍然難免。例如劉少奇，他在歷次運動如解放戰爭時的土改、共和國成立後的肅反、反右、「四清」中，特別是在土改和「四清」中就比毛還要「左」。因為不這樣，就在信奉皇權主義的農民中壓不住台，就降不住起重要作用的遊民階層，就拿不到專制獨裁的權力，就當不成中國黨的終身領袖。毛澤東不但適逢其時，而且本身也具有壓倒群雄的高超能力和手段，其中就包括對待人的問題上能夠成功地推行一條極左路線，而沒人敢於反對或反對不了。這裏說的「情結」，也包括一切不顧惜人命的思想和態度，而不完全限於「肅反」。

造成毛澤東肅反情結的因素很多，這裏只根據個人的看法列舉幾項。

一、鬥爭哲學

毛澤東從小就好鬥成性，青年時期即提出了「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只要鬥爭就好的口號。縱觀他的一生，也確實是鬥爭不息。只是除個人的經風雨之類以外，大規模的與天與地的鬥爭沒鬥出什麼名堂（與天地鬥爭的大躍進是遺患無窮地徹底失敗了），後來也有點知難而退，不再敢與天地鬥了。但與人的鬥爭，無論是黨內、國內還是對外，都是接連不斷、其樂無窮。直到晚年，還提出被他的秘書胡喬木批評的毫無邏輯、純屬武斷的「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

29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麼一個口號」。[30] 黨內、國內的鬥爭太多，人皆盡知，無須列舉。這裏只談點國際鬥爭的例子。如支持金日成南下（斯大林要金聽取毛的意見[31]）和決定抗美援朝（重要原因之一是為證明他並非鐵托（編按：Josip Broz Tito，1939–1980年任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以及喪失有利條件下的停戰議和；解決朝越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後批評沒有立即突出台灣，放鬆了反帝鬥爭（後發展到為支援阿拉伯國家而炮擊金門）；此後「鬥志」更強，要帶頭反帝搞世界革命，大力支援許多亞非拉國家的武裝鬥爭，一般不再提「和平」與「和平共處」，對外開展了全方位的鬥爭。[32]

二、不顧惜人命

毛澤東對肅反中的冤假錯案從來都不大在乎，對屈死的幹群以至某些領導人和著名英才也少有憐惜之意。例如一方面軍在他主持下打「AB團」，錯殺了九分之一的人，他卻輕鬆地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33] 對於他派親信李韶九、古柏等去紅二十軍大搞逼供信，釀成政變，最後還將副排以上幹部全部屠殺、一個軍被處理這樣的大冤案，直到1965年9月23日同彭德懷談話時還稱之為「反革命的富田事變」。[34] 對於延安搶救運動中逼死的許多人如

3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62頁。

31 見章百家、牛軍主編：《冷戰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頁。

32 原來毛澤東還只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也是忠誠的國際主義者，因此對於蘇共懷疑他是鐵托非常在意。但在蘇共二十大後，毛已有做世界斯大林之意。特別是大躍進的失敗，促使他更集中於搞政治鬥爭和準備打仗，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以至報刊輿論一時不提「和平」與「和平共處」字樣。

33 《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廖蓋隆1980年12月10日的發言）。

34 《彭德懷年譜》，第790頁。

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以及柯慶施、凱豐等人的妻子，毛澤東自然知道，但並未聽說過他有任何哀憐之意。至於「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功臣戰友和大批民族精華，多是出自他的安排，至少也是置若罔聞。這就不免令人聯想到他為什麼會賞識像劉邦、朱元璋、洪秀全濫殺功臣而出身於遊民或遊民知識分子的農民運動領袖。毛澤東對不管死多少人都不當一回事，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動輒說無非死多少人，有什麼了不起。例如為炮打金門辯解就對赫魯曉夫說，「為了最後勝利，我們願意承擔第一個打擊，滅掉帝國主義，無非是死一堆人。」[35] 最令世界震驚的是 1957年在莫斯科會議上說的不怕帝國主義打核戰：「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一半」。「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一定還要多」。[36] 有些辯護者說，這是毛主席的豪言壯語，顯示了他的英雄氣概，並非真的對死多少人也不在乎。其實不對，這正是毛澤東的真情表露。如1937年對相當中央紅軍三倍的西路軍的全軍覆沒，毛不但不在乎，而且在這之前好久就已稱之為「國燾路線的破產」。[37] 共和國成立後在鎮反中錯殺了百餘萬人，也從無悔意，還總說肅反不徹底。毛甚至不惜以犧牲大量人命作社會實驗。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和後來的反右傾，就是著名例證，結果釀成4,040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慘劇(超過八年抗戰中軍民傷亡總數2,100萬人，其中犧牲近千萬人。——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73頁。或相當於10個挪威、12個新西蘭、

35 毛澤東：1958年10月覆赫魯曉夫信。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36頁。

37 按西路軍的失敗為1937年3月，而毛澤東1936年秋就已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585，609頁。

兩個半澳大利亞的人口)。[38] 說是實驗，是因為毛澤東自己把大躍進說成「做了個大實驗」。還曾表示，如果實驗的結果是中國人死十分之一，5,000萬人，自己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39] 結果大概由於沒死那麼多人，所以職務和頭顱都完好無損，而且實驗(為世界革命創立新模式)仍繼續進行，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還有一件頗能說明問題的事，就是發生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毛澤東稱讚的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即誕生於該地區遂平縣)。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派人調查了三個月，核實死人70多萬，認定是領導上「左」傾蠻幹的結果。報送中央後，毛澤東批的定性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辟」，於是又來了一次大整幹部(信陽地區16個縣的書記和縣長全部被抓，還準備殺一批)。[40] 像這樣不顧惜人命、死多少人都不在乎(每次都既不認真檢討、嚴肅處理，也不引為鑒戒、避免重犯)的事，可說是舉不勝舉。但史學界為了維護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的威信，為了保護這種不顧惜人命的專制體制，不但隱匿真相，還要加以肯定，說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41] 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講得更妙，出問題是由於沒有按

38 關於人為的三年困難餓死的人數，由於始終視為絕密，至今未敢公佈數據，因此說法頗多，相差也大。廖蓋隆在《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上著文估算為4000萬人。李成瑞(原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中說，經研究計算得出結論是，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200萬，其中大都是餓死。本文說的4,040萬，是根據上海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合刊號所載的調查。但不管怎麼說，大躍進造成兩三千萬人餓死大概是沒人敢否認的。就算是2,200萬，那也不但超過中國的八年抗戰，還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死亡的兩千萬。

39 參閱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14、139頁。轉引自《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頁。

40 見喬培華：《信陽事件》，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李銳寫的〈序〉發表於《同舟共進》2002年第3期。

4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2頁。

毛澤東的指示辦。[42]對幹部群眾的死活，毛澤東既然一輩子都持這種態度，在搶救運動和各次肅反中大搞逼供信、製造冤假錯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疑心太重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始終為他信任和能一直合作到底的人似乎沒有幾個。他也和中國過去的一些皇帝一樣，對於開國功臣和對他了解較多的人(也許康生例外)包括曾受重用的秘書，總是不大放心，都要設法弄走甚至除掉，其中許多老戰友還被打成內奸、叛徒、裏通外國等。他不但性格多疑，而且心胸狹隘。有些已經一再證明的誤會，他還是要繼續懷疑和肯定。例如他認為在長征路上的會理會議上是張聞天、彭德懷煽動林彪起來反對他，就是毫無根據的猜測。而且經過一再對證，證明純屬誤會。但他仍然揪住不放。他的這種多疑性格，一方面表現在不大信任自己同志(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對他有過不同意見的人)；另一方面也表現在過高估計敵人的壞(如蔣抗戰必降)和間諜活動。只要看一下毛澤東在搶救期間有關反特的許多話，就會知道「特務如麻」的估計主要來自他。

四、一定的政治權術

像毛澤東這樣一位才智過人、經驗豐富的終身領袖，怎麼會對革命隊伍中的敵情估計總是弄得特務如麻、草木皆兵，動不動說有百分

42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講話是顛倒是非、拍馬溜鬚、鼓吹個人迷信的標本，但卻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親筆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而劉少奇的講話雖然沒涉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更沒敢追究上面的責任，但他借湖南農民之口，說造成當前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已感到不悅。特別是他的老部下彭真在小組會發言中竟點名批評毛澤東，就更種下禍根。事實上，在毛澤東去世前，三面紅旗還一直被高舉着，直到1981年《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正式砍倒了。

之多少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一再提到黨面臨分裂的危險，他準備上山打游擊等。不能說他的這些估計是故意放空炮，因為實際上幾乎每次都是按此佈置工作的，如規定挖出百分之幾，下面還往往超額完成任務(上述胡風案後的肅反對象就超過了5%的比例[43])。說他真是那樣想的吧，可實在是匪夷所思。例如搶救運動時，毛講話中說的國民黨派到我根據地的特務有「十萬大兵」，高幹集中的黨校竟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特務，還相信延安機關學校有一半人是特務，大後方各省的黨幾乎全是「紅旗黨」，等等。要真是這樣，那共產黨不老早就垮了？共和國成立後幾次把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打成特務、叛徒、裏通外國，恐怕也不一定是真的這樣認為。他雖然多疑，腦筋也不致這麼簡單。

看來這裏面還另有文章在。以延安整風為例，就是採用的文武兩手。文的一手是通過學習文件、批評和自我批評，統一思想和進行原罪感教育。武的一手就是用劃成黨內還是黨外問題和不同方式的搶救相威懾。上層整風，開始主要用文的一手；對下層則多用威懾，也有製造緊張，以影響上層之意。例如1941年九月會議的上層整風，就顯得有點和風細雨，下面的搶救運動也沒開始，對上面當然不會形成什麼壓力。1943年上層整風的九月會議，情況就已大變，延安處於全面戒嚴狀態。到處搞逼供信的搶救。這種緊張氣氛立即影響到上面。上層對所謂兩個宗派的攻擊，就有點超出黨內鬥爭的界限。連胡喬木也認為，「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44]掀起搶救運動，造成恐怖，就是為既影響上層也威懾中下層而使用的武的一手。顯然，為達到從組織到思想都「定於一」的目的，只用文的一手是不夠的，因為情況大家都清楚，特別是上層。承認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在打仗等問題上高明，大概沒有問題。但要說從建黨起毛澤東就一

43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第40頁。

44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二部分第十章〈整風運動：1943年「九月會議」前後〉。

貫正確，存在一條與歷次錯誤路線相對立的毛澤東路線，特別是還得把許多錯誤掩蓋起來甚至栽給別人（如打「AB團」是「王明路線」搞的，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破產」等），恐怕就很難使人信服。因此還需要威懾，不但要使你自覺「顧全大局」，也要使你只能以人劃線，認清反對誰就會倒霉。

在這文武兩手之下，大家不但真的都老實了，還逐漸習以為常，以致對一些歷史問題已沒有人敢於去考慮真假，知情者也跟着說違心話。例如西路軍問題的當事人陳雲、徐向前、李先念等，就對這一重大冤案半個世紀不敢置一詞，還得說些違心話。

可以說明搶救運動中複雜政治內容的事實確乎不少，所以才要設為禁區，嚴加保密。例如，每次肅反都會懷疑到被捕、被俘和坐過牢的人。這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和態度。在延安和各地搶救中也基本按此照辦。但也有奇特的例外，就是華北局屬下沒有被捕坐牢的柯慶施遭到搶救；而「六十一人案」中卻未聽說有什麼人被搶救，反而多成為搶救別人的積極分子。所以「文革」的「二月逆流」中，陳毅就發牢騷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45]當然，這絕不是說對「六十一人」也應該搶救。搶救運動本身就完全錯誤，何況他們的出獄還是黨中央批准營救的。問題只是在於多少有些蹊蹺。而且作為「六十一人案」中一員的薄一波在整風後的七大上還以正式中央委員候選人順利當選。連對於把薄作為中央候補委員人選都提意見反對的陳賡，卻只當選為名次靠後的候補中委。而那個營救「六十一人」出獄、在彭真之前任華北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大概根本就沒能上候選名單，還遭到搶救。[46]另

45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上輯。

46 柯慶施被搶救可能由於太說不過去，中央於1944年4月即已專門發文為其平反。

外，1930年前因托派問題受到黨內勸告處分的陳伯達，[47]竟以高票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還有江青在上海的被捕自首問題，從1938年起就有不斷揭發，但她同陳伯達一樣，都在搶救運動中得到保護。所以從這些也可看出，搶救運動的操作中還有複雜的政治上的奧妙。確定批鬥和搶救對象要看山頭，即除本山頭外，還要對決定爭取和團結的山頭加以照顧。至於對決心打掉和削弱的山頭及其領導人，則盡量羅致罪名。例如竟會把大後方十多個省的黨組織打成「紅旗黨」，而且真的使許多省的領導人遭到長期迫害或作為當選代表不能參加七大。為此還製造一些「秘密武器」，如胡喬木所說的「九篇文章」，必要時祭起，使被批者喪膽。「文革」中就拿出過三次，最後一次大約是為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

看山頭，主要是對中上層領導幹部。至於一般知識分子新幹部，凡是組織上認為可疑或被「咬」（有人「供」出）的，那就碰到誰是誰了。但也要看具體的對象。某些受到信任和重用的積極分子，特別是有關係的人，即使明知有歷史問題，也不會遭到搶救，大多會設法保護起來，如上述的江青（屬自首變節），葉群（參加過國民黨組織的一些活動）等。（在「文革」中也是如此。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就對鄧小平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48]）而且在獨斷專行和長期威懾的情況下，就是高級幹部也是有意見不敢提的。據我所知，像周恩來、張聞天這些人，當時就明白搶救運動是胡鬧，但既不敢在中央會議上提出，更不敢直接找毛澤東、劉少奇談，事後一輩子也不敢再揭發和像毛澤東對別人那樣算老賬。連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等一些老同志，也不信他手下那麼多青年是特務，甚至有時還灑點同情之淚，但沒聽說進行過廷諫和站出來反對。一般幹部，真正相信的也

47 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6頁。

48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75頁。

許只有一些積極分子，多數是半信半疑或不信而只得應付的。哪兒有多少人敢提不同意見，更不用說反對運動的了(蔣南翔的《意見書》寫於搶救基本結束之後，但確也難得)。總之，通過搶救運動，無論是搶救者還是被搶救者，都不是主動就是被動地變成了「馴服工具」。可見搶救運動威懾作用之大。這也可能正是發動搶救運動的原因之一。

其他因素

造成搶救運動的原因也還有一些，例如前面提到的用群眾運動(其實都是上面發動起來的)搞肅反，勢必會犯「左」的嚴重錯誤。此外，還有排除異己、打擊報復等因素，有些下面還會提到，這裏就不加細談了。

搶救運動的後果和影響

大約國內出版的所有黨史著作，對延安整風都持肯定和頌揚態度，但大多數不能不承認搶救運動的錯誤。當然也有例外，前面引證過的劉白羽就是其中之一。其實，這也決非個別人的認識，從運動中和運動後的許多事實可以看出，不少人認為搶救雖有錯誤，但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從毛澤東到一批骨幹和積極分子，並沒有把搶救運動看成多麼大的錯誤，因此用不着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反而認為可以壞事變好事。[49]他們還對「九條方針」頌揚備至。這就為後來的肅反不斷犯「左」的錯誤種下了禍根。

4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1頁；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確實，如果從他們的立場和觀點考慮，搶救運動的威懾作用確實有助於整風取得完全勝利，實現一個領袖、一個思想的目標。首先是在上層摧毀了「兩個宗派」，完全降服了被列為「兩個宗派」的領導幹部，從而使黨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其次是使全體黨員都變成馴服工具，黨的紀律進一步加強，[50]領導更集中，步調更一致。客觀地講，這都有助於在領導與指揮正確的條件下取得勝利(如解放戰爭)。但如領導錯誤，卻也無法糾正，只有全黨跟着犯錯誤了。

但是整個說來，搶救運動確是抗戰期間黨犯的一個重大錯誤，絕不是黨史書上輕描淡寫地說成肅反擴大化(或不通的「審幹擴大化」)，而是涉及廣泛、影響深遠的嚴重錯誤甚至罪行(薄一波就表示了這個意思)。從總結經驗記取教訓來說，不應繼續簡化和淡化、掩蓋和造假，而應重新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做出真正實事求是的敍述和結論。但這只能寄希望於整個黨史研究界，像我等進入耄耋之年才開始學習黨史的人，大約只能提供點滴素材和某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參考和討論。下面就搶救運動造成的嚴重後果和深遠影響，談幾點個人意見。

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搶救運動沒有抓到什麼特務，而是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這是所有黨史著作都不能不承認的，所以無須多講。問題只在於對這件事的嚴重後果一直估計不足，致使冤假錯案得到持續、重複和越來越多的製造，給黨和人民帶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毛澤東和一些人總是認為，每次運動出現一些偏差、整錯一些人，不僅在所難免，而且沒多

50 中國黨的所謂紀律，實際上就是絕對服從，且只有對上服從。因為在缺乏民主、極少按黨章開會和進行表決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幾乎不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了。還不說後來提出的違背建黨原則與黨章規定(如保護少數、黨員有保留不同意見的權利等)的必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大關係，甚至本來就是要殺一殺他們的威風，起威懾作用，何況運動後還有個甄別階段，弄錯了的人給他平反不就沒事了。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正式的黨史著作和許多搶救的積極分子，至今仍對那場災難輕描淡寫，不當一回事的原因。有時還說得很輕巧：在毛主席賠禮道歉後，被搶救者「不僅氣消了，反而感到不安」。[51]這樣極端的個人崇拜者當然有，但不會很多，也不會是那些受過牢獄之災和嚴刑拷打以及長期戴特嫌帽子受控制使用的人，更不用說那些抱恨終身的冤魂了。[52]刑訊逼供和冤假錯案，給被整者造成的精神創傷，對許多人都是終生難忘的事，決非一些局外人所能體會到的。直到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談起搶救事，發現他們仍然很動感情。但是有些積極分子，卻大不以為然，認為這些同志屬思想狹隘、斤斤計較。其實，最斤斤計較的倒是毛澤東和某些積極分子自己。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雖受打擊，卻仍然擔負全蘇主席的工作，既未被隔離審查，更未被逮捕法辦，但他還是講了一輩子(次數之多，恐怕權威機關也很難統計出來)，而且不分內外場合到處發牢騷(不厭其煩地向外賓講，還向斯大林告狀)。對所有這些，沒有發現有任何人和任何黨史書上說過不同意的話。可彭德懷、陳毅等對整風搶救發了幾句牢騷，就被抓住不放了。可見在黨史研究上，存在着多重標準，無公平可言，封建皇權主義仍佔主要地位。以被大講特講的「左」傾中央推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反「羅明路線」和批鄧毛謝古為例，如果同延安整風搶救及其後的黨內鬥爭如「高饒事件」(高在囚禁中自殺，饒被非法關押和錯誤判刑[53])、廬山會議對彭黃張周的批鬥和處理相比較，就太輕了。因此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1頁。

52 「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這都是些幹部和知識分子。

53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頁。內稱，「後來對饒的處理出了格，主要是毛澤東當時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助長了『左』的情緒，又過分自信，聽不進不同意見……以致犯了主觀臆斷和先定性後查證的錯誤所致。」

建議今後寫黨史，最好對問題做些具體分析比較，而不要只講些無法使人分清什麼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什麼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空話。

造成同志間的隔閡和結怨

和某些積極分子的說法相反，搶救運動沒有也不可能增強同志間的團結，而是造成了同志間的嚴重隔閡和長期結怨。試想，在搶者和被搶者、罵人者和被罵者、嚴刑逼供者和無辜受難者……之間，怎麼可能因為敬了個禮就忘卻前嫌，「實現了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毛澤東只因人家譏諷他是狹隘的經驗主義和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竟記恨和痛斥了一輩子，批評者幾乎先後都被整掉(楊尚昆一次同劉英談話時說，講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的任弼時沒挨整是因為死得早)，而黨史界也還繼續宣揚毛澤東對犯錯誤的人如何寬大。其實，搶救運動對團結的危害，被官方黨史界一直視而不見的蔣南翔當時寫給中央的《意見書》中就已明確指出，如說：「是不是有隔閡存在於『搶』與『被搶』的同志之間呢？有的。這種情況是不是個別的現象呢？不是。無論機關或學校，這種現象毋寧說是普遍地存在着」。[54]可惜毛澤東、劉少奇(他是先找劉少奇面談，然後將意見書交劉轉中央的)等人聽不進蔣南翔既實事求是又極為溫和的意見，反而給他戴上一頂「反對中央九條方針」的政治帽子，裝進他的檔案袋。當時提意見的不只蔣南翔一個，還有其他領導幹部。例如王世英就給毛澤東、劉少奇、康生寫過《關於請求中央糾正搶救失足者運動過左問題的報告》，也曾招來不小麻煩。[55]至於被搶救者，直接寫信給毛澤東進行申辯和控訴的，可能不下萬件(我自己就寫了三次)。有些可能因是關係特殊的人

54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55 段建國、賈岷岫：《王世英傳奇》，第191–192頁。

所寫，毛澤東事後説他看到了（但也沒起什麼作用），如曾志；[56]其他絕大部分恐怕都是石沉大海。慢説毛澤東，本單位領導大概都沒看過。

因為搶救而產生隔閡和記怨的人和事，實在多不勝舉，只是一般都能做到既往不咎、不去算老賬就是了。我就親自看到在一些搶和被搶救的同學之間長期沒什麼往來，體現不出一起學習、勞動四五年的情誼。還有些人一輩子也互相不大理睬。例如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們學校有三五十人編隊前往東北，行軍路過張家口。先到此的校領導[57]已出任晉察冀軍區一高職。他很熱情地來看望大家，並每人送白糖一斤，然而一些同學竟躲而不見。有的同學後來分配到他領導下工作，也是一直顯得冷淡。我同張策（去北滿任省委書記）夫婦一路從瀋陽到哈爾濱，就曾聽到張策夫人哭訴遭搶救的情況。張策從旁勸解説，「那是夜間戰鬥，沒分清敵我。」夫人反駁道，「什麼夜間戰鬥！對敵人還優待俘虜呢，對自己同志就那麼狠。」又如我校俄文教員李潔民，因是東北人，搶救中被定為日特，關進保安處備受折磨，後來查不出什麼問題，就於抗戰勝利後帶着留有尾巴的結論被派回東北工作。到北滿分局分配工作時，談話的是陳雲的政治秘書，姓劉，又提起結論上並未取消的特嫌問題，兩人因而吵了起來。李潔民堅決提出退黨，説要做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經分局書記陳雲勸説無效，遂放他回到老家黑龍江省雙城縣。正好我不久前分配來雙城，一時幹部奇缺，縣委商量無論如何要動員他出來，他就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和我們一起工作了。據説此人後來還是死於肅反或反右派運動中。

老實説，一般幹部間的隔閡和結怨到底無關大局，抗戰勝利後四處分配、各奔前程就是了。但高級領導幹部因搶救造成的結怨，影響可就大了。言之鑿鑿較為可信的，茲舉以下幾件。

56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下），第344頁。

57　因為他是乘劉善本起義駕來的國民黨飛機，我們則是一路步行。

一、關於劉少奇和柯慶施的關係

對此，得先談點歷史背景。1930年8月劉少奇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五大，因發言反「左」，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劉對此一直不服。1936年春劉奉派任北方局書記（原為高文華），除政策糾偏即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外，組織上也進行了調整，由彭真取代柯慶施（是他向劉少奇建議並設法營救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和王若飛出獄的）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這些都引起了原北方局一些幹部的不滿，特別是高文華、柯慶施等。所以在1937年4月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的報告就遭到華北代表團多數的反對，柯慶施在發言中竟指着鼻子罵劉少奇為「老機」（即老機會主義）。[58]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遭搶救，大約是高幹中的第一名。如前所述，毛澤東、劉少奇對此肯定知道。有人説這也可能是毛對劉的一點照顧，不知確否。1948年成立華北局，劉少奇任命薄一波為書記（經薄再三懇求，劉同意掛名）。薄建議時任石家莊市委書記的柯慶施進中央局任委員，「少奇同志堅決反對。我仍堅持。少奇同志説，那好，但後果會是嚴重的，你可要負責。」[59]共和國成立後，柯慶施採取吳法憲「文革」中概括的為官之道：「緊跟，高舉，拼命幹」（緊跟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拼命幹工作——實為竭力搞極左），結果很快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而且一篇〈乘風破浪〉的文章幾乎當上

58　按華北代表團除團長彭真外，還有高文華，柯慶施、吳德，李雪峰、黎玉，烏蘭夫、孔原等。會上一些人特別不同意劉少奇説的「白區損失百分之百」，以及「一二•九運動有立三路線殘餘」等提法。從事後情況看，劉柯關係一直不和。參閱《劉少奇傳》和《劉少奇年譜》；《懷念劉少奇同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張聞天：〈反省筆記〉；黎玉：〈抗戰前夕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革命回憶錄》增刊[1]1981年）等。

59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463頁。

了總理。[60] 在緊接着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插話說，「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於是柯慶施（還有陶鑄）就在會議中號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61] 由於「緊跟、高舉」和在大躍進中衝鋒陷陣的結果，柯慶施迅速紅了起來。毛澤東決定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把他和同樣在大躍進中立了大功的李井泉、譚震林增選為政治局委員，但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說柯在抗戰前北方局時期反對宣傳毛澤東，而且從不檢討。於是毛讓柯找劉談，作了檢討，問題遂得以解決。[62] 但「劉少奇在廬山會議後不久的一次講話中說到延安審幹，有這樣一番話：『有些在延安曾戴過特務帽子的人，以後取消了，我們就說他是好同志，現在已經做了重要的工作，又叫他去審幹，他給別人戴帽子可是也很厲害。有沒有這樣的人，我看是有的，我知道有這樣的人』。在筆者看來，這番話幾乎就是衝着柯慶施來的。」[63] 以後的情況已是盡人皆知：上海變成了極左路線的大本營、指揮中心和「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柯慶施在1965年病逝前又一次充當了急先鋒。他去世一年後劉少奇被徹底打倒。

60 1958年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狠批了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1月14日會上毛當眾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上作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我寫不出來」。（《周恩來傳》，第1367頁）周估計到毛已有意以柯代己，遂在檢討「反冒進」問題時提出擔任總理是否合適的問題。

61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第200，216，259頁；《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5頁。

62 《王力反思錄》，第1070頁。王力所說如屬實，也是劉少奇的藉口，因為他本人在北方局期間也不大可能宣傳毛澤東。他當時的正式報告可為佐證：「中國黨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還不能獨立的領導中國革命……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中國黨還是要由我們這些人來領導，沒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63 馮錫剛：〈「好學生」的最後十年〉，《隨筆》2002年第4期。

二、林彪同賀龍的結怨

林彪同賀龍分屬一、二方面軍，幾乎未共過事，不會有什麼歷史恩怨，可為什麼「文革」一開始就先對賀龍下毒手？（連毛澤東後來也說是受了林彪的騙，因而為賀龍補辦了骨灰安放儀式。）據劉英等人說，根子也出在搶救運動。搶救期間，林彪在重慶，其妻葉群在中央黨校受審查實即搶救。同上黨校的賀龍夫人薛明，曾揭發葉群抗戰初期參加國民黨的一些活動，如CC派搞的「演講比賽」等，並硬拉葉群到中組部科長王鶴壽處。林彪回延安後遇到賀龍。賀直言相告：「你老婆有問題，是薛明揭發的」，還叫林「要提高警惕」。[64] 從此林賀兩家就結下了冤仇，據說連孩子們都互不來往。「文革」一起，林彪、葉群就利用手中權力一舉害死了賀龍。

三、林彪同陸定一的冤仇

在搶救運動期間，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得知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等問題，就進行了揭發。後來兩人又同住醫院生孩子，更加深了相互成見。1961年嚴慰冰恰遇林彪前妻之女，了解到葉群對她也不好，於是就開始給林彪全家寫揭批怒罵的匿名信，發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親托兒所的地方，許多信署名王光x。到1966年五年間共寫了五十多封。查出後，中央常委決定停止了陸定一的工作，並開政治局擴大會批判。一次會上與會者每人得到一份林彪1966年5月14日署名的手書，「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是處女，沒和王實味談過戀愛；兩個子女是他和葉群親生；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是造謠，云云。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林彪大罵陸定一是野心家，是

64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頁。安熠煇：〈「文化大革命」中的賀龍〉，《文史精華》2003年第8期。此外，我還就此訪問過劉英等一些老同志。

假革命，現在就在用種種辦法殺人，並且吼道，「我今天要是帶手槍來，一槍崩死你！」最後處理結果是，陸定一夫婦被監禁十三年，在林彪叛逃後也未得到赦免。因為經毛澤東一再審閱修改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就是針對陸定一等人提出的。不過有點奇怪的是，四個幾乎不大沾邊的人卻被安上個「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之名。[65]

四、陶鑄和古大存的例子

延安整風期間，古大存任集中高幹和七大代表學習的中央黨校一部主任。一部也是黨校六個部中審查、搶救、刑訊逼供最厲害的單位(但也區別對待，凡來自井岡山、參加過長征的以及「一二•九」後在北方局工作過的，一般不定為搶救對象)，上面列舉薄一波、曾志等人所述各種對人的折磨和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長征女戰士(原葉劍英夫人)危拱之被迫自殺等也都出在一部。曾志經過兩三年的搶救，結論上仍有特嫌的帽子，並決定問題掛起來。曾志不服，去找古大存，「但他不表態」。而且在運動期間，「有人甚至想通過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鑄(時任王稼祥的政治秘書，後任軍委秘書長兼總政宣傳部長)」。[66]加之陶鑄被捕坐過牢，也一度被隔離審查，說他是叛徒。當社會部的李逸民去看他時，陶鑄「暴跳如雷地在罵娘」。[67]搶救運動顯然在陶鑄和古大存的關係中投下了陰影。例如對於曾志的結論被「掛起來」，陶鑄就當面批評過古大存，說沒有證據就憑主觀主義將曾志的結論拖了兩年。古大存還在七大的發言中批評被搶救的人不該有怨氣，說他們應去怨恨日本、國民黨。不過在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

65 《陸定一傳》，第485–541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01–202頁；《王力反思錄》，第593–594頁。

66 曾志：《一個革命倖存者》，第336頁。

67 李逸民：〈參加延安「搶救運動」的片斷回憶〉，《革命史資料》第3輯，1981年版。

全會上，古大存已發言檢討他在中央黨校一部領導整風時傷害了一些同志。[68]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廣東解放後，陶古又同到廣東工作。1952年，毛澤東批評廣東工作落後，決定由陶鑄取代葉劍英、方方抓總。反右派運動中，陶鑄在毛澤東支持下發起了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火力對準古大存。後來中央批准了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古大存反黨聯盟」的處理意見，撤去古的省委書記，保留副省長職務。古寫信給陶，接受處分，但有些事實不確，解釋了一下。陶鑄看後不滿，報經中央批准，撤消了古的副省長等其餘職務，使他實際上退出了政治舞台(1997年含冤去世)。廣東反地方主義跟馮古一同受害的幹部有兩萬多人，直到1979年才平反。中央批准的通知上說「不存在馮、古反黨和其他反黨小集團」，這筆賬才算是清了。[69]

以上例證說明，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對黨的團結曾造成多麼大的危害，影響多麼深遠，但是以往的官方黨史卻對此一概不提。

嚴重摧殘新革命知識分子並影響對他們的使用

有關「三八式」和知識分子問題，前面幾章中多已提到，這裏只談兩點。

一、搶救運動是對新革命知識分子的一次嚴重摧殘

對於這一點，明眼人早已看得很清楚。這裏不妨再引證蔣南翔當時寫的一段話。「我願鄭重地向黨反映這樣一種情況：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

68 楊立：《帶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東省委研究室1997年)，第51頁。

69 陳模：〈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炎黃春秋》2001 年第12期；楊立：《帶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錄》。

了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當然不只是新知識分子受打擊)。雖然經過甄別工作，時局又處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勢下，情況沒有也不致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但這次留在他們精神上的傷痕確實劃得相當深，而且至今沒有完全平復。搶救運動後，我在延安和隴東曾接觸了不少抗戰前平津知識分子和抗戰後的大後方知識分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銳氣、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沉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70] 他還說，這些知識分子黨員參加革命後，大都有「吃苦耐勞，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決心和思想準備，而且近十年他們也確實做出了艱苦工作和英勇奮鬥的成績。把這樣的同志打成敵人，進行摧殘身心的搶救，其精神受到打擊和創傷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作為一個身歷其境的基層搶救運動的領導者，蔣南翔的反映恐怕要比官方黨史的描寫真實得多。毛澤東、劉少奇和黨中央後來也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承認逼供信的普遍和搶救運動的為害，特發指示提出：「如果不徹底糾正，便會冤枉同志，孤立自己，不僅不能有效地反對特務，反會在黨內造成混亂現象，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使黨遭受重大損失。」「一個人如不是特務而戴上一個特務帽子，對他精神上是一個重大打擊，甚至長期不能恢復，個別還有可能走上仇恨黨的道路。」[71] 此外，搶救運動給被搶救者造成的精神創傷還表現在，不但有些人精神失常，而且更多人的思想和性格也變了，喜歡說話的變得沉默，愛提意見的人不再多提，等等。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好事，因為本來就是要把大家變成馴服工具的，磨掉棱角、減少「刺頭」有什麼不好？但是應該說，搶救運動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一次大考驗。它證明大家找共產黨確實是為了革命，雖然遭受誤會和侮辱，但還是相忍為革命、意志沒動搖。例如由於抗戰勝利來得快於我們的運動，不少人

70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

71 〈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還沒來得及做出甄別結論。於是毛澤東就說，現在東北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到前線自己作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那裏去，怕什麼呀！[72] 結果據說沒有一個叛逃。這既證明這些知識分子忠於革命忠於黨的本來面目，也證明發動搶救運動純屬主觀主義的判斷和決策，絕不是什麼「審幹是必要的」，只是「錯在擴大化」。

二、搶救運動影響革命隊伍的正常交接

由於搶救運動加深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就盡量把他們排斥在領導層外，而使長征後的一代人沒能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這主要指「一二‧九」前後到抗日戰爭這兩個時期投奔共產黨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原因大概有三：最主要的當然是延安整風固定下來的終身制體制和權力結構；再就是對知識分子和新幹部不夠信任的傳統；第三，這批人大多被搶救過恐怕也有關係。按照一般規律，凡在運動中挨過整的，不管是否整錯，都會影響到日後的使用。因為整錯人者始終處於正統地位(真正懺悔的幾乎從來沒有)，即使被整者不記怨，對這些人也總還有些顧忌。因此，搶救運動就增加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程度。所以在毛澤東看來，還是長征一代老幹部靠得住，文化高低和懂不懂業務倒可以不計。

妨礙充分利用大發展的機遇

1942年到1945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大發展機遇期，國內外形勢和主客觀條件都非常有利。在外部，蘇德戰起，蘇聯和共產國際己無暇干涉中國黨的事務，反而有求於我。發動太平洋

72 高新民 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383–384頁。

戰爭後，日本侵華的總兵力自然減弱。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中共作為一支反法西斯力量能夠第一次在國際關係中嶄露頭角。美英需要國共合作抗日，對國民黨的反共是極大牽制。國內形勢也不是毛澤東此前估計的蔣介石定然投降和準備國共分裂。1942年國共關係反而趨向緩和，並有蔣毛西安會談的計劃(後派林彪為代表見蔣)。而且全國人民抗日情緒始終高漲，對國民黨的不滿日增，民心更加向我。主觀條件也是建黨以來最好的。全黨團結一致，黨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擁護，力量發展神速，單是八路軍抗戰頭一年就從不到3萬多人擴大到25萬。[73]特別重要的是成十萬革命知識分子投奔共產黨，與工農兵結合，成為中下層骨幹，使黨政軍的素質和水平空前提高，不少人只要給機會就可以獨當一面，打開局面。1942年已有黨員80萬，軍隊57萬。[74]總的形勢很明顯越來越有利於我。當然，日本為鞏固佔領區可能一時加強掃蕩和推行「三光政策」，但它無力長期堅持。國民黨也總找機會反共，但已不敢全面破裂和再製造皖南事件。這是國內外形勢決定的。

但是毛澤東卻一方面對形勢作過分悲觀的估計和安排(是否有意為整風製造氣氛?)，認為「兩年後如能保存現有軍隊(57萬)的一半，全國則保存現有黨員(80萬)的一半，便是勝利」。[75]所以提出大量精簡脫產的黨政軍人員，如中央和軍委從二萬四千人減為五六千人；[76]而且指示各地，「軍隊在抗戰時期原則上不再補兵，全軍準備明年至後

73 《彭德懷自述》，第220、229頁。

74 毛澤東致劉少奇、彭德懷電，1942年2月20日。

75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6月13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7頁。

76 毛澤東1942年8月2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16頁。

年縮小一半，從五十萬縮小到二十餘萬」。[77](以上各點因脫離客觀形勢而未能落實。)另一方面卻是集中領導幹部，全力以赴搞整風審幹(後變為搶救)。大部高幹調到延安，部分高幹和中下級幹部分別集中各地。前後方都把整風擺在第一位，不但沒能抓緊大好形勢下的發展機遇，還貽誤和影響了日常工作，甚至嚴重打亂正常工作秩序。以延安和邊區為例，中央和軍委一千多名工作人員的通訊部門，因許多人被打成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就挖出170個特務)，無法進行正常工作，致使延安和各根據地的聯繫一時中斷。陝甘寧邊區各縣在農忙時也只留一兩個人值班。即以我們學校而論，在校四年多，但完全學外語的時間不到一半，實在可惜。毛澤東自己就說，「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風學習，是整風學習年。」[78]1943年搞肅反搶救，耽誤工作自然更厲害。

但由於形勢大好，所以在集中搞整風審幹的兩三年裏，革命力量的發展還是違背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安排，到1945年5月開七大時，正規軍已發展到91萬，民兵220萬，黨員120萬。[79]這就為後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如果進一步設想，讓被集中的大小幹部利用有利形勢，按照總的政策，放手大幹，各顯其能，革命力量必定發展得更快，對解放戰爭更有利。抗戰頭一年並沒經過整風審幹，力量發展得那麼快，就是證明。又如山東(羅榮桓)和蘇北(黃克誠)抵制了搶救運動，整風也沒像延安等地那樣大張旗鼓地搞，但內部整頓和力量的發展壯大(包括抗戰後進軍東北)，恐怕要勝過整風搶救搞得特別厲害的一些地區如晉綏邊區。有人說，不經過延安整風搶救這文武兩手，思想不易統一。這也不一定。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證明，整風

77 中央給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16頁。

78 毛澤東1943年3月6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79 任弼時在七大預備會的講話(1945年2月21日)；《朱德選集》，第149頁。

運動還影響了團結統一。事實上，不但像羅榮桓、黃克誠不存在思想統一不統一的問題，就是對整風搶救有意見的許多領導人(說出來的有彭德懷、陳毅等人)同樣在重要政策上也是一心一德、堅決執行。何況延安整風後的重大決策也有失誤之處，如王震南下，挺進大別山等。總之，權衡利弊，搶救運動，確如蔣南翔當時痛心之言，「在這緊張的時代，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80]

開創了運動模式，加劇了不正之風

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肅反(搶救)，這確實是一個創舉，並成為後來許多運動的模式。對此，主流黨史學不肯明講，但實際上早已是中外史學界的共識。美國的費正清在所著《偉大的中國革命》中，對延安整風就得出結論說，「這種運動方式成為一種既定模式，此後在中共歷史上就司空見慣了。」[81] 在國內，類似說法更多。如：「整風運動開創了一種形式，即以大規模的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思想問題（按：當然也包括審幹肅反）……延安整風成為後來中國各種思想運動的源頭。」[82] 有的書在以《延安整風樹立的黨內鬥爭模式》為標題的一節中，除大力歌頌「突出兩條路線」、「採取群眾運動的形式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以外，也不能不承認在樹立的這個「模式」中包括搶救運動，說「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延安整風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密切相關的」。[83] 總之搶救運動影響深遠，絕不是某些人說的在歷史上只存在十多二十天就完全過去了。

80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

81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頁。「好評如潮」，見扉頁。

82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448頁。

83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42、453頁。

至於這個模式的特點，凡是經過共和國成立後各種運動的人大都明白，無須多講。這裏只提個線索。先是自上而下發動，進行內部排隊，號召鳴放(答應「言者無罪」)。第二階段是組織積極分子開展大批判。第三階段為放手發動群眾鬥爭，批評或鬥爭對象只能檢討或坦白，不容申辯。在積極分子帶動下，群情憤激(有真有假)，從勸說到刑訊，運動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直至上面叫停。由於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只得進行甄別平反。在時間緊迫，倉促做出的平反結論中總還要留點尾巴，表明「事出有因」。還要將運動中的真假材料連同結論一起裝進各人的檔案袋。作總結，照例是兩點論。一是肯定成就，如同毛澤東所說，審幹取得了重大勝利；二是也有缺點，就是把許多好人當成「特務」搶救了。運動結束後論功行賞，即以各人在運動中的表現進行安排，這在七大選舉和後來的工作分配中就表現得很明顯。大凡領導和主持搶救積極的，多得到顯著提升和重用，也是一些人進入中央的原因之一；被搶救者有不少人因未做出結論，七大代表資格尚被褫奪，更遑論其他。

搶救運動對黨風(當然也包括學風、文風和一切作風)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而且影響不可輕視，有些不但成為主流，而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下面只舉數例，稍作說明。

一、所反對的「三風」反而得到發展

這是蔣南翔當時在指出搶救運動「根本失敗」的幾種表現中提到的，「三風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進而是更其發揚」。[84] 延安整風所提出的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恰巧在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裏得到了可說是全面的、更高的發展，而且一直影響到現在。原來在整風中就是一面大講反對主觀主義，一面大幹主觀

84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年3月）。

主義的搶救。當時提出「特務的群眾性、世界性」[85]就毫無根據。各種對特務數目的估計，證明都是純粹的主觀主義。對此，現在大概已沒有什麼爭論了。對發動一場群眾運動，能夠事先估計到具體數目(如黨校的特務數)，並定出各種百分比，這本身就是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一種典型。可惜搶救運動中這一創造，一直適用了幾十年，不知先後有多少無辜的人們被捲進了這個百分比內。

又如搶救運動中有無宗派主義，這也得看事實。為什麼柯慶施被搶救？為什麼有些被捕過的受到懷疑以至搶救，有些被捕過的反而得到重用？為什麼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大多受到懷疑？是否因為他們不夠馴服？為什麼陳伯達的托派問題就沒事，王實味卻因托派問題被槍斃了？為什麼明擺着有問題的江青得到保護，而一些著名的優秀青年如藺克義、楊學誠等卻被打成特務？如果再從更大的系統或山頭看，問題也許更多，這就需要另作仔細研究了。總之，搶救運動中的一些宗派表現和報復情緒，當時人們就有明顯的感覺，並在互相信得過的朋友間有所議論。

至於説到反對黨八股，搶救運動的兩三年大概是新黨八股(所謂「延安文風」)日臻完備和成熟的時期。其專橫武斷、不要證據、強詞奪理、不容辯駁、空話套話、永遠正確等，決不在舊八股之下，只是引證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證毛澤東就是了。這只要翻閱一下1943年《解放日報》有關搶救運動的報道和評論，就會知道。人們可將當時關於搶救運動中爭相坦白的報道和大躍進時期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關於放「衛星」等的許多報道對比一下，看看它們的繼承性。

85 《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即所謂「九條方針」。

二、搶救運動在發揮威懾手段上的作用

在革命隊伍裏，對於改造人、加強集中和確立領袖崇拜上，事實證明，單靠學文件講道理是不夠的，同時要使用威懾手段，不但收效快，還有助於鞏固。例如對於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來説，整風學習本來是要啟發和提高你的原罪感，但由於他們大都有自由思想，還往往「要頑強地表現自己」，這時就顯出威懾手段的作用了。以延安整風中第一個試點單位中央研究院為例，和風細雨的整風進行了兩三個月，被認為「錯誤」的思想仍佔絕對優勢。1942年3月18日表決院務會議通過的室以上領導為當然檢查委員的決議，贊成的只有1/4，而王實味等提出的全部委員由選舉產生，竟得到3/4的支持。[86] 在毛澤東的密切注視下，5月27日研究院召開關於「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87] 會前，院黨委調查大家對王實味言論(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和整風後歷次會上的發言)的態度，統計結果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的達到89%」。[88] 座談會上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李宇超提出的王實味的錯誤同大家的偏向有無根本的不同。對此，頭兩天會議同意和不同意的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第三天艾思奇傳達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結論部分後，大家意見立即趨於高度一致。對李維漢提出王實味的錯誤不但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沒爭論了。[89] 會議第四天(6月1日)，已經完全變為清算王實味的鬥爭，並開始揭發他同托派的關係。經過一個禮拜的揭發批鬥，李維漢在總結中已説明王實味是個托派分子，大家一致要求開除他的黨籍。不但研究院大小知識分子思想轉變得這麼快(其他機關學校一樣)，文化人變得也一點不慢(大

86 《延安整風實錄》，第346頁。

87 《溫濟澤自述》144頁、《王實味傳》195頁引證溫濟澤的《鬥爭日記》，以及其他有關材料都寫為27日，惟《延安整風實錄》第350頁寫為17日，恐有誤。

88 《溫濟澤自述》，第144頁。

89 《王實味傳》，第196–198頁。

約除蕭軍外)。6月15日起四十多位作家開座談會(主席團由丁玲、周揚、塞克組成),「一致認為托派分子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90] 艾青在發言中説,「王實味的文章充滿着陰森氣。當我讀到它的時候,就像走進城隍廟一樣……他把延安描寫成一團黑暗……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的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這同他不到兩月前的雜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別。[91] 有關王實味的問題,人們都比較了解,這裏又一次談得這麼多,是為了説明:善於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態度變化得極快,但這必須在強大的威懾之下。我就有此親身感受,若不是上面組織批判,我們學校大多數人還會繼續對王實味代表的觀點同情下去,對《輕騎隊》繼續支持下去。

三、搶救運動加強了黨管一切和個人獨斷之風

列寧創立的一黨制本來就是一黨專政,但它管理國家和人民還要通過許多環節,如政府、蘇維埃等。我們在搶救運動期間卻是以黨的名義直接管理一切。例如黨組織和領導人可宣佈一個地區或單位的戒嚴,廣泛限制人身自由,任意拘捕、審訊、刑逼和沒收私人東西。按道理(或黨史書上説的),邊區政府系統停止正常工作、搞搶救運動、逮捕重要幹部,起碼應該通過實行「三三制」的政府,報經主席副主席批准。但運動一來,至今還有史書在講的這套民主形式就露了餡,再沒人提起「三三制」了。不但名義上「有職有權」的民主人士副主席李鼎銘不能也不敢過問搶救的事,連共產黨員的林伯渠主席也只能冷眼旁觀(由自己從大後方介紹來的許多人都不能保。他還為錢來蘇案

90 〈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痛斥托派王實味反動思想,建議文抗開除其會籍〉,《解放日報》1942年6月19日。

91 艾青的發言以〈現實不容歪曲〉為題發表在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報》上,經毛澤東審閱過。轉引自《王實味傳》,第213頁。

多次呈文毛澤東,毛卻不表態,給他碰了軟釘子)。搶救和坦白大會均由負責整風審幹的政府秘書長李維漢主持。

搶救運動使黨外民主連形式也看不到了。那麼黨內民主呢?恐怕誰也説不清。下層已是黨內外不分,許多黨員成了搶救對象,一些非黨員變成積極分子。支部大會長期不開,書記由上級指定。積極分子倒是常開會,以傳達上級指示,研究搶救策略。各級黨委活動不大清楚。以我們學校而論,委員本來也不是選舉的,開會內容除按上級指示佈置工作外,也還有批評和檢討。例如教我班俄文的大隊長常乾坤(共和國成立後任空軍副司令)被多次批為右傾,説他對搶救工作持消極態度,同情「特務」云。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執行情況,如果以1943年主要搞整風搶救為主的一年為例,倒還可以從當時的耳聞目睹和事後看到的一些資料中得出一個籠統印象,就是:張聞天任總書記時期(1935–1938)堅持的集體領導和會議制度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包括平等與會、暢所欲言、進行爭論、必要時表決等,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政治局除整風學習的擴大會議外,正常的例會已大為減少,作用也明顯下降(主要是通過一些決議和宣言,聽取書記處的通報和毛澤東的講話等),有些職能為總學委取代,更多的事情由改組後的書記處處理了,並非胡喬木和黨史學上説的只是「日常工作」。[92] 請問,1944年5月19日書記處會議決定5月21日召集六屆七中全會、確定會議議程、參加名單和全會主席團組成,這能説是日常工作?而成為全黨一個相當時期的主要工作搶救運動,基本上也都是書記處決定和處理的,許多重要指示就是以書記處或其成員的名義發出的。造成這種情況也有它的客觀原因。因為七大以前的政治局組成,如果按各成員的真實意向,大多數是反對搶救運動的,即使整風中那種對所謂兩個宗派的無限上綱和過火批鬥,也不一定能得到多數擁護。如果真按黨規黨章辦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3頁。

事，作為黨中央第二把手的劉少奇在政治局連表決權都沒有(因他是候補委員)。而實際情況卻是，不僅毛澤東一言九鼎，在政治局及其他一切會上的講話沒人敢批判反駁，就是劉少奇的意見，恐怕也沒有人能站出來反對。多數委員不是被打成教條宗派或經驗宗派，就是多少沾點邊，他們只有接受批判進行檢討的份，求得過關和寬大處理就知足了。不少人親眼看到，搶救期間，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陳伯達，不但實際上在中央的權力和作用比一批政治局委員如博古、王明、張聞天、王稼祥和有的被戴上經驗宗派帽子的人大得多，而且見面談話時態度也要高傲一點。從幾個領導人不太準確的《年譜》統計中也可多少看出一點中央的「集體領導」情況。[93]從1943年開始到1944年5月21日政治局、書記處職能停止，幾個人參加(包括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次數，政治局(整風學習的擴大會未計在內)：毛澤東17次，劉少奇17次，任弼時16次，周恩來(從7月起)4次，陳雲8次，張聞天4次，彭真17次；書記處：毛23次，劉26次，任22次，周4次，陳1次，彭26次。[94]這就是說，彭真列席是每會必到(發言權無限制，大概也沒進行過表決)，而陳雲只參加過8次政治局會議，張聞天只4次(書記處更無一次列席)，周恩來也是4次，另列席書記處會議4次。搶救期間開創的這種開會模式，後來不但在運動中，平時也經常用起來了。

根據搶救運動這一年半的情況，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中央的集體領導已大為減弱和縮小，並開始走向個人獨斷體制；毛澤東的意見只有得到擁護，而很難聽到不同意見；個人崇拜日益佔據主導地位。

93 最好是將各種類型歷次會議的內容和與會者的發言情況作些分析比較，才能了解問題的實質，但這樣作一則不太可能，二則勉強作起來(如政治局和書記處各次會議的主要議題還是有蹤可尋的)也會佔篇幅太多。單講次數，雖不知內容，但也總可看出另一方面的問題，例如有的正式成員反而比非正式成員出席會議的次數少。

94 均根據各人年譜統計。

四、助長和養成說假話、順着來佔便宜，說真話、提意見吃虧等不良風氣

在搶救運動中，假坦白的可以立即得到解放甚至被吸收為積極分子，事後也決不追究，有些還得到重用。堅持真理、說真話的，眼前就會吃虧。認為問題嚴重或進行對抗的，還可能遭到逮捕、監禁，甚至受殘酷的刑罰，甄別平反後既得不到表揚，反而會落個態度不好的評語。同時，那種善於觀測風向、揣摩領導意圖、並且順着來的，再加上有一定能力或某種特長，那就不但在運動中會成為積極分子，錯整了人甚至違法亂紀也不會受到責備；而且此後發展也往往「前程似錦」、一帆風順。這樣的人我們看到的實在不少。相反，那些堅持實事求是，敢於指出搶救運動為「左」傾和主觀主義，指名批評中央領導人的，肯定會受到指責甚至處分。由於個人崇拜和威懾力量，公開批評毛澤東的人和事一句沒聽說過，也許本來就不曾發生。

搶救運動不但不許人們說真話，而且還剝奪了人們不說話的自由。被搶救者固然要坦白交代、回答問題、進行解釋，其他人也必須參加搶救和表明態度，而且許多人為了自保，還主動上陣，假裝積極。這就是為什麼前些天還贊同王實味觀點的人，嘩啦一下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但表態和他劃清界限，而且積極參加口誅筆伐。據說文人知識分子中只有蕭軍態度不改，憤而下鄉當了兩年自食其力的老百姓。但這個例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蕭軍是個名人，對他無可如何。要是機關學校一個小知識分子，那結局可能就大不相同了。連胡喬木事後也承認，不但王實味，「對其他人的鬥爭也很不合適。對蕭軍，搞得不讓他吃公糧。」[95]其實蕭軍如果沒有當地農民幫助吃住，恐怕一家人是很難生活下去的，何況老婆還要生孩子。[96]

9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5頁。

96 王德芬：〈蕭軍在延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

在運動中，緊跟領導，順着來，善於奉迎和打小報告的，肯定佔便宜。這使一些人發展或學會了兩面作風。有些人為了討好上級、表現積極，可以出賣親人朋友，揭發以至編造相互間的談話，弄得事後反目成仇。有個假坦白後又積極參加搶救我和別人的同學，兩年後甄別平反了，又來對我說，他當時就不相信我這樣一個十五六歲就參加革命的小鬼會是特務。對此，我能說些什麼呢？如果只按黨史教科書的說法，整風是要在革命隊伍中樹立好作風，而肅反和清除壞人是為了有助於作風的純潔。可是實際情況卻正相反。在搶救運動中，舊社會的許多庸俗作風反而大為氾濫。當然，有些問題，如鼓吹個人崇拜、自封一貫正確、篡改黨的歷史等風氣，不光是搶救中的創舉，可能還是整個延安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搶救也許正是為此而採取的威懾手段。如認為這種估計完全錯誤，但經過搶救運動，不少好作風為壞作風取代，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特別是說假話、順着來的吃得開，堅持說真話和愛提不同意見的倒霉，這種惡劣作風，不僅沒有得到糾正，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不衰。至於歷史一再證明，人們也習以為常的「假大空」現象，就不必多講了。可見搶救運動影響之大和為害之深。因此在黨史研究中，應很好探究其前因後果，汲取教訓，消除影響，改善作風。長期以來之所以沒有也做不到這點，原因之一就在於，掌管和講授黨史的人們不願也不能違背延安整風創立的原則和精神，對搶救運動盡量掩飾、含糊其事。這已是教訓中的教訓了。

結束了黨史上第二個生動活潑時期

延安整風特別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搶救運動，如同一道鴻溝，把延安和全黨的政治生活和風氣截然分成了兩個時期。前者確實稱得上生動活潑，後者只能以萬馬齊喑為喻。在我的計劃裏，還想根據個人

親身體會並參閱有關材料，再寫一篇延安生活在整風前和整風後的對比的筆記。所以這裏不擬展開，只稍提一下。[97]

一、整風前的延安生活

我是1938年從西安跑到延安的。在延安生活的頭幾年，感受特別深的有以下幾點。

（1）積極向上的精神，如饑似渴的學習

去延安，本來就是追求進步參加革命的，所以從精神面貌到實際行動，各方面都表現非常積極，同志間一天到晚的工作、學習、勞動好像都在進行競賽一般。以我這個中學生來說，1939年才過16歲，在生產運動的開荒中已被評為勞動英雄。[98] 1941年抗大五周年時又因以往學習和工作積極受到總校表彰。[99] 至於談到學習，無論是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向老紅軍學習，我們這些知青們都有一種拼命精神，可以少睡覺不休息，盡量想多學點東西。這種學習總的說來是健康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提高政治覺悟，增加各方面知識，理論密切聯繫實際，並非整風後被一些領導者和學舌者所說只是摳書本的教條主義學習。道理很簡單，因為多數甚至全部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都是為了學些革命道理很快到抗日前線上去用，所以不但對學馬列主義、中國革命問題等理論如饑似渴，而且對準備馬上就要用的游擊戰術、

97 這只是原來的設想，現在看來也許很難實現了。

98 見《生產戰線上的抗大》一書。當時尚未流行勞動模範稱號。

99 見《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頁。

步兵操典，以至地形學(利用地形地物)、築城學(挖戰壕、修掩體)等也抓得很緊。那時需要動員的不是上前線，而是留在後方工作。所以毛澤東才有「你們要下決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涼山」的話[100](毛好說極端的話)。

(2) 團結友愛，親如家人

一到延安，如同回到家裏，大家那種互相關照、互相幫助的精神令人感受至深。在這種氛圍裏，一個人很快就被捲進去同化了。平時談的除國家大事、學習內容等外，還經常「交換意見」(相互提點注意事項)。有不同意見，可以爭得面紅耳赤，但並不影響同志關係。在相處中，不分年齡大小、文化高低、天南海北，都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就從一些大學生老大哥那裏學到不少知識。那種同志友好感情還可從這樣一件事看出來，和我們有兩三個月吃住在一起的班長要調到同院另一個班去當班長，在歡送會上竟有好幾個同學哭了。當然這些大小知識分子也確有不少缺點，給我印象深的是虛榮心強，常有偽造學歷等事。但現在看到許多黨史資料，為了襯托整風的必要和偉大，把當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熱血青年描寫得如何自私自利、極端個人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等，説輕點也是過分誇大，有些乾脆是在瞎編基礎上的以訛傳訛。延安的男女關係總的説來也是自然又嚴肅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書中描述的什麼「杯水主義」、「打游擊」等，恐怕也只是片面的道聽途説。[101]這不但當時(以至事後)沒有聽説過，而且在延安幹部和學員男女比例為18:1的條件下，那種情況也不

100 為了穩定留後方工作的軍心，1938年有一次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來給抗大幹部做工作，説你們都想到前方去，這種精神可嘉，但是抗大還辦不辦？並説了上引的話。凡在延安抗大工作過的人大概都知道這次講話及其內容。另參閱曹慕堯：〈聆聽毛澤東在延安的五次講話〉，《炎黃春秋》2001年第3期。

10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322，358頁(注15)。

大可能出現。在這方面，反而是先後到過延安的江文漢和趙超構描述得真實一些。[102]

(3) 文化生活豐富活躍

在延安雖然生活艱苦(這是早有思想準備的)，但精神愉快，總是歡聲笑語，正如《延安頌》唱的，「到處傳遍了抗敵的歌聲」。我們一個禮拜一定要學一個新歌，早飯前和晚點名後必唱。當時的集會遊行和聯歡晚會也特別多。小到班排、大到機關學校，只要集合到一起，總要以拉拉隊形式互相歡迎唱歌或提名某人唱歌，包括朱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我記得一次朱總司令就在不斷的喊聲下站起來唱了一個「打倒列強除軍閥」。文化活動多種多樣，我在延安看的戲就不少。

(4) 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和空氣

這也許是最重要的感受。因為大家去延安就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所以到延安後便會立即得到同國民黨地區那種精神壓抑大不一樣的感覺。有關這方面的情況，過去已有大量書籍文章介紹。這裏只簡單講一下我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一次是第一屆邊區參議會的選舉。我們軍事學院和魯藝、自然科學院為一個選區，合選一名參議員，共提了三名候選人。只記得我們提的是郭化若，魯藝提的是周揚。郭化若那天因參加軍委的會而告假缺席，委託俄文隊長曹慕岳(後改名曹慕堯)代為競選。周揚是親自上台作競選演説，其中曾批評到郭化若缺席證明他對參議會不夠重視，當選後能否負起參議員的責任就值得懷疑。魯藝的助選拉拉隊名堂也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領呼人(記

102 江文漢是由基督教青年會派遣，於1939年由美國來延安考察，回美後在以英文寫的報告中曾講到：「男女之間顯得很融洽，十分坦率和自然」等。黃天霞翻譯題為〈參拜延安聖地〉，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4期。趙超構關於延安女同志的描寫，見他的《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重印。

得是劉熾)喊:「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是誰?」魯藝人齊聲回應:「周揚!」但終因軍事學院人多，最後還是郭化若當選了。自然科學院的徐特立老人也在競選大會上講了話，説這是為將來參加同國民黨、青年黨等在民主政治中進行競選的練習。後來邊區參議會開完了，郭化若在向三個單位的選民作傳達彙報時還回敬了周揚對他的批評。另一次是黨的七大代表的選舉。在延安是採取直接差額選舉的辦法。抗大三分校自己是個獨立選舉單位，候選人有分校校長許光達等，只記得差額是二或三與一之比。先把候選人的詳細情況以小字報形式貼在牆上，經過全體正式黨員閱覽和議論後進行無記名投票。由於選出後再無動靜，且過了五六年才開七大，所以後來的情況已不得而知。但這總算我入黨六十多年中參加的一次真正的黨內民主選舉。

關於延安頭一個時期的情況，原説只擬舉例提一下，不想已寫得太長，而且有些重要內容還沒寫到，如理論的繁榮、對外的開放等。還應該説明的是，史學上和許多書上所講述的「延安精神」、「延安時期」，多半是指這個時期。如1986年胡耀邦説的，「從我黨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們的社會科學只有一次大繁榮，這就是延安時期。」[103] 搶救運動一起，社會科學已無人再談，哪來的大繁榮。胡耀邦顯然指的前期。又如《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一書所描繪的理論繁榮時期、生氣勃勃時代、相對開放的大環境、比較民主寬鬆的氣氛等，也只能指前期。它為説明對外開放列舉的美國人訪問延安的日程表，1941年到1944年7月就完全是空白。整風搶救以後「民主寬鬆的氣氛」更根本無從談起了。[104]

103 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時的談話。我參加了這次會見。參閱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260頁。

10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二篇第三章〈延安時期理論繁榮的歷史思考〉。

二、搶救運動發起後的延安氣氛

對搶救運動開始(1942年)後的延安生活和氣氛，我們前面已談到不少，這裏也再簡單歸納幾條。

(1) 搶救運動期間實行全面戒嚴，延安處在一片蕭索氣氛中

人們不得自由出入，不得會見親友和熟人，連處在不同機關的夫妻也不能團聚。單位之間的來往和聚會(如過去經常舉行的討論會、聯歡會、各種學習和文體活動)完全停止，路上行人也大為減少(有趣的是，曾有幾次看到評劇院以唱青衣和小生著名的陶德康一個人從山下走過，嘴裏唱着戲或念鑼鼓經。後聽説他是假裝瘋癲，共和國成立後在上海工作)。集中了「三萬黨政軍」的延安，被弄得空氣緊張，人人自危，[105] 失去昔日的歡樂和光輝，幾乎變成一座死城。當年的積極分子和官方學派的史學家們，如果不同意這種説法，那就請開放這一禁區，允許討論和爭鳴，改變那種只有空洞和武斷的結論，而避開擺事實和講道理的學風。何況這方面不但已有大量文件資料，而且參加過搶救運動的老同志健在的還不少(許多被搶救者不大願意寫這段回憶，多半是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延安整風偉大正確的結論)。

(2) 同志關係變得冷漠，甚至到了互不理睬，互相提防的程度

自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一再追查各種小道消息和錯誤言論、經過互相揭發等以後，一則產生或加深了相互隔閡，所謂「話不投機

105 這是一些官方黨史論著和教科書都不能不承認的，如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790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至於有的書，如《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把1938和39年延安的所謂「肅托」，描寫成:「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延安的幹部和黨員都犯上了『托派恐懼症』……個個談『托』色變」云云，則是無限誇大的道聽途説(見該書，第448頁)。

半句多」；二則搶救的範圍和聲勢不斷擴大提高，人們的思想已被搞亂，哪有心思跟人閒聊；三則言多必有失，各人從被揭發、被打小報告中得到沉痛教訓，逐漸變得謹小慎微、少說為佳，甚至被迫去學舊社會的為人之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和「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四則，搶救者和被搶救者之間有什麼話好說？等等。所以連真誠擁護搶救運動的作家劉白羽也說，搶救大會的第二天，「平時活躍的（黨校）三部，整個落入沉悶之中，人們走着路，誰也不看誰，大家的嘴巴都像貼上了封條」。但他說的一到晚飯後又「歡樂」起來，整人者和被整者打起了撲克的話，恐怕連沒經過搶救運動的人也是不會相信的。想想看，會有這種吃頓飯竟忘了白天被打成特務的人？[106] 我們學校大概這兩年也是「大家的嘴巴都像貼上了封條」。由於搶救也不能誤農時，我校1943年春全部男同志開進距延安有幾十里路的杜甫川（據說為避安史之亂杜甫曾逃難至此，故名。有「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等詩為證）開荒播種，從早起吃飯、排隊上山、勞動休息（午飯送上山），到晚上回來吃飯睡覺，幾乎一整天都是鴉雀無聲。一些人走路和休息時寧可低着頭看小說，也不願和人搭腔。如果聽到說話聲，多是有人在發脾氣或吵架（當時人們的火氣都特別大）。這種局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甄別後雖逐漸有些變化，但始終沒能恢復整風搶救前的精神面貌。幸虧日本很快投降，大家分配去各地工作，才同這種冷漠的局面告別。記得我們第一批學外語的三四十人編成一隊，1945年9月2日出發去東北，全校教職學員列隊相送，走的許多人並未表現出惜別之意，對離開母校離開延安也並不留戀，反而聽到一些牢騷話。

106 見劉白羽：《心靈的歷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3）學習發生根本變化

馬列主義被說成「教條」，課程被取消，有關書籍（那時翻譯出版的還真不少）也是人們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會去讀了。一切書本知識被挖苦得狗糞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對現代化和面向世界的知識，除關心東西兩大戰場的戰況外，當然沒人再去「言必稱希臘」了。至於什麼是實際知識，怎麼去學，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說不清楚。因此兩三年搶救運動期間學習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關文件，還有某些中央決定、臨時指定的什麼文章如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康生的〈搶救「先足者」〉、《解放日報》某篇社論等，聯繫實際就是思想鬥爭和反特搶救。學習真正有用的東西，反而受到輕視，時間被擠掉。例如我們那所辦了四五年的外語學校，似乎並沒培養出幾個真能勝任翻譯的人來，還不說一些人進校前就已有一定的外文基礎。而且這種長時間翻來覆去學一個或幾個文件的做法，還容易使人對這種學習養成一定厭煩心理，一聽指定某一時期集中學某一文件就產生反感。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這種學習方法卻一直適用到現在。根據我個人六十年多的觀察和體會，以這種辦法學習，收效歷來不大。

（4）建立起嚴格的保密制度和森嚴的等級制度

經過搶救運動，一方面從組織制度上加強了保密，黨內外許多事情不讓一般黨員知道。另一方面，黨員們也從學習和教訓中獲得不該知道的事不打聽等馴服工具的修養。例如延安整風，大家都參加，但上面究竟搞了些什麼，下面一概不知，頂多聽到點小道消息，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才看到少數材料。因此，整風搶救的歷史就可做到任憑打扮，保證輿論一律（即壟斷）和與時俱進（隨時改）。例如「文革」前，搶救運動好像不曾發生過，學黨史的大多不知道有這回事。後來改說成有過一個短暫的搶救運動，是康生發起和領導，被毛澤東很快發覺糾正了。而且不只歷史，各方面都需要保密。搶救運動前，黨員還可看點黨內文件和《共產黨人》期刊；搶救後，黨內外變成一

樣了。(共和國成立後改行「先黨內後黨外」,如糧油漲價,黨內早一夜傳達;發表重要文件,早一天傳達等。)與此有關的是,搶救運動進一步加強了等級制度。因此不是所有黨員都「不可使知之」,而是嚴格按等級規定行事。整風學習的編組,依據的原則就是實施政治上的等級制,高級組還把絕對保密定為一條重要的紀律。至於生活待遇以至警衛上的等級制,1941年任弼時出任中央秘書長後,就以蘇聯為榜樣,逐步固定和不斷完善起來。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使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級制更加具體。那裏集中了四五千名幹部,其中有大批高級幹部和七大代表,後來分配到各地,遂使等級制影響到全國並一直傳下來,共和國成立後更得到不斷發展。延安頭幾年那種上下級界限不怎麼嚴格,中央領導同志經常同大家一起參加聯歡、各種文體活動,星期日街頭散步,一些人遇見首長掏出筆記本請題字等延安特有的現象,搶救後已不復再見,我只見到幾次領導人和大家一同看秧歌或看戲。

總之,整風前可稱作「延安時期」的那種生動活潑局面在搶救運動開始後就完全結束了,此後再也沒有恢復起來。共和國成立後,那些經過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知青,在新的環境下,由於勝利的喜悅興奮和群眾熱情的鼓舞,似乎又恢復了青春,同新解放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一起迎來了一陣生動活潑的局面。但隨着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一些人翻身落馬,更多的人則接受教訓,變得老練以至世故了;特別是反胡風和反右派後,全國也逐漸變得和後期延安的情況差不多了。

搶救運動造成許多消極影響,大約是不會有爭論的。至於對這些影響如何估計,那就有很大或根本的區別了,有正視與掩蓋之別,有過頭與不足之分。這就應當允許以至鼓勵討論,但必須依據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不能只用空泛議論和扣大帽子的辦法。無論如何,總不能把搶救運動作為禁區永遠保持下去。

第十四章

從「博古路線」到所謂「王明路線」



延安整風突出路線問題及其對後來的影響

正當轟轟烈烈的搶救運動在延安進入最高潮時，上層整風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所批判的第三次「左」傾從「博古路線」變成了「王明路線」。下面就談一下這一變化。

延安整風一直被視為黨內鬥爭的「楷模」，為黨內鬥爭樹立了一個「模式」。有的黨史學家歸納這個「模式」的特點，提到的第一條就是「突出兩條路線」。[1]這當然指的是上層整風，也就是中央領導層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清算。至於一般幹部的普遍整風，並沒有也用不着突出什麼路線問題。所以整風開始的標誌，不是1942年發動普遍整風的《四三決定》，而是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會議」。因為會上「討論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從此「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帷幕」。[2]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指明：整風要清算的是多年前歷史上的而不是抗戰時期的路線問題，當時說因為抗戰尚未結束。實際上遵義會議已經糾正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路線，這是整風期間和直到現在都得到公認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大的精力和那麼長的時間去清算一個早被糾正、實際上已不存在的路線呢？傳統的說法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肅清「左」傾路線及其表現形式——主觀主義等的影響。這或許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一分為二地看，總還有些問題，不但當時，現在也仍然說不清楚。例如，總結經驗教訓為什麼要有那麼強的選擇性，只着重七八年前那一段？遵義會議後的歷史賬也不是完全不算，例如就只挑選了長江局和皖南事變那兩件，對於此前的西路軍慘敗卻又視而不見了。又如，延安整風的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那為什麼會正好在整風期間發生最典型的主觀主義錯誤，即無中生有地發動一場「搶救運動」？

更重要的是，共和國成立後為什麼不從延安整風中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致使類似錯誤此後一再重犯？出現這些說不清的自相矛盾問題，根本原因是不願揭示出整風的真正目的，即毛澤東說的要整掉兩個宗派。於是說什麼徹底批判「左」傾錯誤，並着重思想根源的分析（一切都來源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解決思想認識問題，是為了汲取教訓，增強犯錯誤的免疫力。但事實卻是，只過了短短五六年，到共和國成立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就日益嚴重起來。[3]而且所犯錯誤也是越來越「左」，還同樣打着反右的旗號。歷史如此重複，致使延安整風時參與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胡喬木，在「文化大革命」後參加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竟喟然歎曰，「人是很難牢記歷史的教訓的」，當年批評的「盲目地認為『鬥爭高於一切』，不就是後來的鬥爭哲學嗎？」他還在重述一段當年批判的宗派主義表現後說，「這些歷史經驗大家都忘記了」。[4]對於延安整風時一再強調，直到1951年他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時仍在強調的「思想根源」，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也給改了。「1954年毛澤東在中央文件上已將『小資產階級』的『小』全部刪去」。[5]從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都變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於是胡喬木也改口說，「我特別反對把一切問題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那個概念用得太濫了……這種說法不但是簡單化，而且是向壁虛構。」[6]其實，無論是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

1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頁。

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93頁。

3 參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61–163頁。

5 見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40頁。

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頁。

階級思想都並非要害，延安整風中的過火鬥爭和搶救才是促使後來犯越來越「左」的錯誤的根源。

延安整風之所以要算多年前的路線的老賬，從後來的結果和多年的對比看，有以下相互有關的幾個原因。一是要使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後來還加上抗戰初期的右傾)犯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徹底認輸、完全繳械。遵義會議以後，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例如張聞天，不但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而且還多次檢討，甚至在六中全會上請求過處分，但他卻不承認路線錯誤，因而仍被看作沒有徹底繳械。毛澤東歷來都主張「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以前的老賬必須算，影響必須消除。他在整風後期就明確指出，「黨書(即《六大以來》)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前年的『九月會議』。這時大家才承認路線錯誤。」[7]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還說，「洛甫、任弼時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一擺出，解除武裝。」[8]第二，是為了「改造中央」。毛澤東1943年10月6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這一改變是很困難的，因為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同志(其實，劉為中央審查委員，並非中央委員)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按：這裏只能是指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是擁護王明、博古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所以他明確提出，「鬥爭的性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9]就是說，要通過整風，或者換人，或者換思想，把舊中央改造成新中央。第三，為了最終確立毛澤東作為領袖和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絕對權威。突出兩條路線，實際上就是以人劃線。這在第三次「左」傾時期比較明

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8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頁。

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顯，除蘇區的毛澤東和白區的劉少奇外，其他原領導人多是參與制定或基本執行「左」傾中央路線的，人頭容易分清。如果回到抗日戰爭的現實中來，那就很難找出有多少執行錯誤路線的人了。所以只能算歷史賬。而且既然以人劃線，那就勢必會產生功勞歸一人和為尊者諱的現象。例如張聞天檢討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0]代替博古總書記的張聞天尚且如此說，別人還能說什麼，於是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就變成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又如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反「圍剿」以來的最大勝利，但這也要設法歸功於毛澤東。於是創造了這樣的說法，「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取得了勝利。」[11](也許由於這一說法顯得太牽強，現在已不大提了。)至於為尊者諱，最明顯的例子是，不算打AB團和富田事變的賬(或者含糊地把責任推給「左」傾中央，毛澤東在起草的《歷史草案》中就說，他們「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殺害」[12])，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歸之於張國燾。應該說，通過延安整風，這些目的都完全達到了。

其實，突出路線問題也並非毛澤東和延安整風的創造，而是從蘇聯搬來和從「左」傾中央繼承下來的。有人說，「毛澤東本人一貫十分重視路線和路線鬥爭問題」。[13]這是事實，但說「一貫」卻不準確。在共產國際提出立三路線前，中國黨包括毛澤東，還是很少講，也是不

10 《遵義會議文獻》，第79–80頁。

11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13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43頁。

懂路線和路線鬥爭的。此後雖然很重視，但仍然一直沒弄得太清楚，所以用錯的時候更多些。在1981年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期間，針對過去對「路線」的「大量濫用」，胡喬木說了這樣一段話：「路線一詞，馬恩列都少用，在他們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時也未給予何種嚴重意義。斯大林在1929年〈論聯共黨內的右傾〉一文中開始把路線問題提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就按路線的嚴重意義說，至多也不過是指總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針罷了。過去用了若干年是事實，但那樣用法的害處也是事實……路線錯誤、路線鬥爭兩個詞，不知害了多少同志。」[14]

對毛澤東所提的，「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15] 鄧小平就給推翻了一大半，並且明確說，「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16] 所以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就主張不用路線錯誤、路線鬥爭了。但是，這種做法只免除了毛澤東和一些黨的領導人犯路線錯誤和戴「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帽子，卻搞亂了歷史，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說不通。例如，硬要說1959年廬山會議那一次不算路線鬥爭，恐怕就說不過去。實施四五年、維護了二十年的「三面紅旗」，造成那麼嚴重的生產倒退和生態破壞，餓死三四千萬人，還不算路線錯誤，那什麼才算路線錯誤呢？廬山的一場鬥爭，不是一場典型的路線鬥爭，難道還真是「一場階級鬥爭」？它的特點只不過是一條糾「左」的正確路線才一露頭，就給錯誤路線壓了下去，結果造成更大的損失。但結局並不能改變這是一場路線鬥爭的性質。至於搞得十年暗無天日的「文化大革命」，那更是一次嚴重的極左蠻幹主義路線錯誤。連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開始時都主張講。他說，「葉帥三十周年講了極左路線，現在是不是可以不再講，除了『文化大革命』，其他都不講路線錯誤。『文化大革命』不講有點麻煩。暫時講一次，以後就下不為例了……如果單講兩個反革命集團，歷史不容易解釋。」[17] 但後來連胡喬木這樣「暫時講一次」的意見也終被兩位元老給否決了。這當然有利於維護領袖的歷史地位和其他跟着犯路線錯誤的領導人的威信，但卻確實弄得「歷史不容易解釋」了。又如說劉鄧這一次不能算，那是否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鄧和大家都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或者毛澤東的問題也同「四人幫」屬同一性質？

還有，如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解釋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提議對1945年《歷史決議》作重要修改之二時所說，「在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處，點了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是因為「犯路線錯誤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點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比瞿、李要嚴重得多，不點名，對這些歷史問題擺不平。」[18] 那麼共和國成立後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內的「左」傾錯誤，其嚴重程度，造成損失之大和持續時間之長，是歷史上無可比擬的，卻既不算「主義」，也不算「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只不過是「一次嚴重失誤」，「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執行的「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也不能說成是「左」傾機會主義或極左路線，而只可說是「全面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19] 這種說法，難道就可以在歷史上「擺平」？還有一種解釋，說毛澤東是好人犯錯誤，是好心做了壞事。那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更不能說是壞人、壞心，何況上有共產國際的指揮，他們的責任還相對輕一些。

14 《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154頁。

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頁。

1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59頁。

1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

1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58頁。另參閱《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歷史是一門科學，世世代代都會研究下去的。我們作的有利於我們這一代的結論，不一定就能長期保持，也許在第三代第四代就會重新修訂，或被徹底推翻，因為學術上的控制與壟斷只可能行於一時，不會永遠生效。弗・培根有言：「人們説得好，真理是時間的女兒，而不是權威的女兒。」[20]

從提出路線問題到定名「博古路線」

前面已經講過，第一個把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提到路線高度的是劉少奇(這也是後來毛澤東能和他聯合起來的原因)。但他的所指只限於白區工作，認為「以全國範圍來説，白區工作還是佔着主要地位」，但「不能説中央在蘇區的工作在總的方面是錯了」。[21]所以胡喬木説，「從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的政治路線怎麼樣。」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才提出，「遵義會議的決議只説那時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説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遵義會議的決議須有些修改。」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是路線錯誤。」毛主席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則是1941年4月為《農村調查》所寫的「跋」。正式提出路線問題是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所做主題報告。[22] 在這之前，為了給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實際上可能是為了整風)，毛澤東已着手編《六大以來》。「在編輯過程中，毛主席愈來愈深入

20 弗・培根：《新工具》第一卷，關琪桐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79頁。

21 〈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張聞天)的一封信〉，見《六大以來》，第806、805頁。

22 以上分別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190–191、193頁。

地從中找出他要提出的問題──兩條路線問題。」「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着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23] 1941年九月政治局整風會議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路線問題，即獲得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原來不同意的張聞天首先發言檢討，更明確表示，「在中央蘇區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24] 博古檢討説，「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25] 李維漢、王稼祥、任弼時等也作了檢討。其他與會者全都擁護毛澤東的報告。這樣，「九月會議」就對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錯誤正式定了性，明確為路線錯誤。大約是為了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區別，也為了簡便，當時普遍稱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簡稱第三次「左」傾，但還沒有冠上什麼人的名字。

冠名，自然是毛澤東的事了。根據編《六大以來》時對有關文件的研究和九月政治局會議的討論，毛澤東寫了兩部重要文稿。一是為政治局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他在封皮上題寫了《歷史草案》四字，遂成為簡稱。一是對第三次「左」傾中他認為具有代表性的九份文件的批評，按理只是屬個人筆記性質，後被胡喬木介紹於世，並命名為《九篇文章》，因而也成了黨史上的著名文獻。它們雖被一些人贊為「有着相當高的理論價值」，[26] 但卻至今未予全文公佈。據胡喬木介紹，《九篇文章》「初始稿題目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後來先後改為『關於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

2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62–163頁。

24 《張聞天文集》(二)，第163頁。

25 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頁。

26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此書對《九篇文章》內容介紹較多。

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內容也作了一些較大的修改。」[27] 這樣，在「九月會議」後，第三次「左」傾錯誤被上層一致同意定為路線錯誤，毛澤東在他的《九篇文章》（原準備和《歷史草案》一起發給在延安的中央委員討論）中又明確定名為博古路線。《歷史草案》標題雖無博古名字，但據胡喬木介紹，內容許多處都提到博古路線，並在分析幾個錯誤時期的主要負責者時指出：1927年大革命後期的錯誤，主要負責者是陳獨秀；立三路線時期的主要負責者是李立三；蘇維埃後期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志。[28] 由此可見，上層整風批判第三期「左」傾不久，即定名為博古路線，實為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連博古也是承認的。大約直到1943年九月政治局整風會議，第三次「左」傾路線還沒有和王明連起來。後來，一直到現在，許多黨史著作，包括胡喬木、胡繩、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正式黨史談到上層整風（甚至整個整風），一開始就提到清算王明「左」傾路線，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至於還有些黨史著作特別是許多《回憶錄》，在整風前以至遵義會議前後就談起了「王明路線」，就更是有意地編造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介紹「九篇文章」時，到處是「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批判」，「揭露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等；介紹《歷史草案》時，又是接二連三地「王明、博古路線」多達十來次之多。這都像他在談話中說的，「我的這些話是事後諸葛亮」。[29] 不過，細心一看，雖然文字顯得前後矛盾，但他總還算是作了交代的。例如逐項批判《歷史草案》所列錯誤之前即注明：「關於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原來只寫了博古同志，後來修改時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為『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30] 缺點是沒有說清是什麼時候修改的。還有那「九篇文章」，只考證出寫於1941年「九月會議」以後，並說「前後作了好幾次修改」，直到1965年還在修改，1974年6月仔細閱讀時又將「其中稱讚少奇同志的內容全部刪掉」。[31] 但就是沒有講各次修改的具體時間和內容，而中央文獻研究室在所編《毛澤東文集》時又故意不加說明地把它定為「一九四一年」，這就容易使一些人以為是1941年「九月會議」以後撰寫和修改定稿的。例如《延安整風實錄》就似有重大發現地說，「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過去並沒有特別指出王明是『左』的路線創始人，但在這篇文章（按：指「九篇文章」）中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32] 並以楊奎松在〈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一文中引用的話為證。可能作者沒有查楊奎松成書後的注釋，即《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五章的第58條注釋。楊認為，「九篇文章」的第三次改定題目既不包括對四中全會的批判，而毛澤東直到1943年才全面批判王明，並將四中全會定為第三次「左」傾路線之起源，故可判斷「九篇文章」從形成到改定經過一個過程。又鑒於文章在延安整風時只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而劉少奇1943年初才回到延安，劉、任做毛的助手也是1943年3月後的事，因此「肯定目前看到的這篇文章應當是在1943年寫成的」。[33] 而且寫成後還改過多次。所以，不能簡單用毛澤東事後多次修改過的「九篇文章」證明博古路線是什麼時候變成王明路線的。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3頁。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3頁。

2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6頁。

3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3、214頁。

32 見該書第100頁。

33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頁。

整風開始只提博古路線沒提王明路線的原因

從1941年「九月會議」到1943年「九月會議」，提到第三次「左」傾，一般只稱博古路線，還無王明路線之說。這一歷史事實前面已多次提及，並引證了王明自己的說法，即他在1944年3月7日通過蘇聯駐延人員給季米特洛夫密電中的反應。[34]就是說，延安整風不但開頭，而且整風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沒有以王明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但是共和國成立後修改的《歷史決議》、一些領導人的有關言論以及各種正規的和非正規的黨史著作的提法，就都冠上了王明的名字，如「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35]「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是執行者與發揮者」；[36]整風的「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左』傾路線」，「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消除王明路線的影響」；[37]「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及其影響，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38]等等。其實，所有這些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說法。但是這些說法的流傳，卻在黨史上造成這樣一個定論，即延安整風一開始就是以王明為主要對象的。這種把事後的認識和說法當成早先的結論，在黨史上實在不少，因此對這個路線的提出和改變也有多說幾句的必要。

對於整風開始只提博古路線而未提王明路線，還可再舉以下幾件事例加以證明。

34　見前引〈《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記述〉，《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

35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2，963頁。如前所述，《決議》中點名是共和國成立後出版《毛選》時修改加上的。

36　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69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88頁。

3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第70頁。

一是上面提到過的1941年「九月會議」後毛澤東寫的「九篇文章」，初始稿題目為「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內容中加上王明的名字，則是1943年「九月會議」後的修改稿。《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介紹「九篇文章」時，也把「前後作了好幾次修改」的稿件攪在一起，開頭就不實事求是地說成是毛「寫了一篇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的文章」，後面更一再提到「九篇文章」和「歷史草案」「集中揭露了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內容、性質及危害等」，「『九篇文章』對王明『左』傾路線的批判，」等等，這就和他介紹「九篇文章」的初稿題目相矛盾。可見介紹的內容只能是1943年修改後的稿件。[39]

二是毛為政治局起草的「歷史草案」，認為第三次「左」傾路線始於「九一八事變」，這正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上台之後。「歷史草案」開宗明義還指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40]這就意味着第三次「左」傾路線是以博古為代表而不是王明，因王明這時已出國。毛澤東1942年2月21日同王稼祥覆電周恩來，仍堅持對過去路線這種分期的看法。電文說：「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共三年又四個月）中央路線是錯誤的。」[41]直到1943年1月，「任弼時在大會（指西北局高幹會）的講話中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宣佈在九一八以後一直到遵義會議這一個時期，黨內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42]

39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2–232頁。

40　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頁。

4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42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310頁。

三是從1941年「九月會議」直到1943年「九月會議」的頭一階段，對王明的批判基本上還限於抗戰初期的右傾問題，並沒有同第三次「左」傾相聯繫。而且，不單是從博古路線變成王明路線有一個過程，就是王明抗戰初期的幾個非路線的原則的錯誤，升為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再升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到「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也都經過了好長的時間。

整風開始，毛澤東把第三次「左」傾路線命名為博古路線，其實這一定性倒是比較準確和切題的。「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標誌，正是在這個時候，黨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王明等已離開上海，由他們二人指定並商共產國際遠東局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執行脫離實際的極左政策。博古這時只有24歲，既未做過多少實際工作，又未擔負過什麼實際領導(此時還不是中央委員，只做了幾個月的團中央書記)，其水平可想而知。[43]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還批評說，此人比較剛愎，又比較懶(不大看材料)，但卻分工起草對下的指示文件，因此毛澤東批的「九篇文章」中就以他的為最多。其次，博古臨時中央對毛澤東採取了壓制和排擠態度，如批准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先後在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上剝奪毛的黨權和軍權，只讓他去後方作沒有太大權力的蘇維埃工作(後來他乾脆請假養病)。第三，博古一進蘇區就掀起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並讓李維漢查組織、追後台，目的在於把毛澤東給套進來。而且後來還想送毛澤東去蘇聯養病和在五中全會上去掉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這些都因國際不同意而未果。第四，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極左政策，加上打仗又全靠李德的瞎指揮，因而導致反五次「圍剿」的失敗和倉皇長征。而且直到遵義會議，博古還不承認錯誤。第五，組織上違背集體

43 參閱《博古傳》。

領導，搞家長制，後來更「把中央領導變為三人團，變為外國顧問一人專政，剝奪政治局委員與聞軍國大計的權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44]

當然博古標明的是執行國際政策，但實際上他在有些地方比共產國際還「左」。當1932年後法西斯威脅增長，國際政策已開始調整時，中國黨的政策還是繼續向「左」傾。所有這些，就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後來博古也是完全承擔責任。他在七大的發言中檢討說，「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45]毛澤東直接受博古壓制，受氣數年，對他的意見也最大。所以直到1943年「九月會議」，鬥爭矛頭已主要移向王明時，毛澤東也並未放鬆博古。1943年9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還說，「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會後是博古。」[46]而且直到最後也還把博古放在同志圈外。1943年12月28日以政治局名義發給各地黨的指示中就明確指出，「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47]這時不但參加高級班學習的不少人提出王明、博古是黨外問題，而且中央文件也不以同志相稱了。能否保住黨籍已成問題。《博古傳》中也說，「他甚至做了更壞的準備。」[48]如果說，王明是由於態度不好引起公憤，而且還有個國際背景和歷史問題(被捕過)，那麼博古恐怕就完全是由於博古路線了。毛澤東對那幾年受他的氣也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44 毛澤東語，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45 《遵義會議文獻》，第104頁。

46 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延安整風五十周年》，黨建讀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47 轉引自《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82頁。

48 《博古傳》，第453頁。

清算第三次「左」傾為什麼遲遲未針對王明

現在幾乎一切黨史著作，在講到延安整風時，都說是為了清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或者簡稱「王明路線」)，肅清它的影響。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不但全黨普遍整風中始終沒有提到過王明，就是政治局整風也是最後才提到他的「左」傾錯誤問題，而且提得比較籠統。這大概是由於以下的幾個原因。

首先是不能排除有共產國際的因素。這點下面再說。現在先談直接有關的幾點。

對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路線的估計

1941年「九月會議」認定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一看法大約一直保持到1943年的第二次「九月會議」開始。既然如此，也就不用特意去算王明在四中全會前後的賬了。及至「九一八事變」後犯了路線錯誤，這時他已離開中央去當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了。對四中全會看法的根本改變，是第二次「九月會議」中間。在康生作批判《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什而鬥爭》小冊子而作的煽動發言後，毛澤東才提到，「現在有幾位同志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49] 直到1945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才正式通過決議，指出「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50] 至於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講「兩個宗派」的發言中，把四中全會說成是「篡黨」、「奪權」，則明顯帶有偏激情緒，前後也有點矛盾。如前面說，「黨從四中全會後，就有兩個大宗派，一是教條宗派，一是經驗宗派。」接着又說，「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會後是博古。」[51] 既然四中全會後才有這個「宗派」，而且頭子是博古，那王明怎麼能成為「最主要的」？還有劉少奇批判四中全會的發言中說的，「四中全會對黨是不獨無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惡，」[52] 也顯得「左」得過火。本來，我們在前面對四中全會已經談過一些看法，但鑒於有關的偏激之說至今在黨史界仍佔統治地位，例如胡喬木就堅持「四中全會是奪權」，[53] 所以這裏還得再談兩點。一是四中全會從召開到定調都是米夫一手操縱的。米夫既是作為共產國際代表而來，從政策路線制定到重要人事安排，恐怕他不但需要秉承國際意志，還得照顧中共中央多數人的意見。例如他是奉命衝着瞿秋白、周恩來的「調和主義」來召開四中全會和改組中央的。但情況卻是，「大會對『周恩來應退出政治局』的提案單獨交付表決。18人不同意，6人同意，提案被否決，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米夫也不能不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54] 另一方面，黨章也明確規定：黨員必須「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55] 所以李維漢說，米夫來到中國，說王明等人是正確的，「政治局同志的態度就都轉變了」。[56] 既執行國際指示又服從多數意見的四中全會，怎麼能說成是「篡黨」、「奪權」，奪誰的權？二是上文已講過，四中全會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完全抹殺，因為毛澤東在「歷史草案」中指出的那些「主要的根本的方面」依然存在。即以組織而論，在選出的九個政治局委員和七個候補委員

4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70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7頁。

52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65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9頁。

54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21頁。

55 《六大以來》(下)，第1頁。

5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頁。

中，至今明確說成「教條宗派」的好像也只有王明一人。而且國際遠東局提出選他為候補常委，還因周恩來的建議而沒弄成，仍然讓他只任江蘇省委書記。中央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和候補常委(陳郁、盧福坦、徐錫根)六人中，連一個「教條宗派」中的人也沒有。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就王明這麼一個角色，只進了政治局和代替劉少奇任江蘇省委書記，竟單槍匹馬地一下篡了黨，迅速建立了一個以他為首的「教條宗派」中央，不知其他十多個人是否和為什麼會那樣盲目地跟他走。而且控制了中央碼頭的這個宗派也沒有將該派的積極分子博古、王稼祥等補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反而除王明外補選了劉少奇等四個不屬該派的人為中央委員，劉少奇還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也繼續留任政治局候補委員。[57]這樣一個中央組成，怎麼能說成是「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碼頭」(毛澤東語)？這是否過分誇大了王明的能量而抹殺了其他中央領導成員的作用？如果沒有四中全會，劉少奇怎麼能當成中央委員，還和毛澤東一起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又怎麼能算成「罪惡」？

內戰後期毛澤東受排擠不是王明之過

在內戰後期，毛澤東曾直接受博古的壓制和排擠，同王明並沒有什麼歷史糾葛，而且還得到過王明一定的支持和保護。毛澤東記怨也記恩，既容易感情用事，也善於藏而不露，所以對王明回國後一年的某些作為，他也能照顧到當時的形勢和王明的身份，採取溫和態度。現在許多黨史著作上說，內戰時期毛澤東如何受到王明路線甚至王明的打擊，其實都只是空洞的言詞而列舉不出什麼事實。王明經過四

57 有關四中全會的情況，參閱《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00–201頁；《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頁；《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19–421頁；《周恩來傳》(一)，第275–285頁。

中全會進入中央領導核心，但那幾個月的工作重點還在江蘇省委(曾有一陣稱江南省委)，特別是在上海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和進行人事改組。四中全會後三個多月，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又過了兩個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已無法在上海工作。王明就乘機要求也獲准去共產國際當中共代表團長。他和毛澤東從沒見過面，相互並不了解，在這一短時間裏也無工作上的聯繫(四中全會後蘇區工作分工由周恩來管)。王明到莫斯科後雖然繼續推行「左」傾路線(也就是國際的路線)，但沒有見到他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和言行。李維漢幾十年後還特別提到他在莫斯科期間沒聽王明說過毛澤東搞右傾機會主義。[58]在工作上，王明上有國際的節制，對國內也只能通過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怎麼可能遠在莫斯科搞出一條「王明路線」？而且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和紅軍中，一般都知道總書記博古，卻很少人知道還有個王明。我們在前文中就曾舉例說，連時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的羅瑞卿都沒聽說過王明。更應強調的是，王明同博古的關係和對毛澤東的態度後來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起初他支持博古中央及其對毛澤東的批評。但從1933年國際開始調整政策起，他因近水樓台，又感覺敏銳，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則既閉塞，又剛愎，反而落到後面。所以此後兩人就開始出現政策上的分歧。王明不但在同康生發給國內的電報或信函中，而且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都批評博古中央在土地、富農、工商、勞動等政策上的過左傾向。

另一方面，王明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影響下，從1934年起改而對毛澤東採取了某種支持和保護的態度。例如1934年4月20日王康(王明和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在反「羅明路線」鬥爭中的「嚴重弱點」，實際上促使反「羅明路線」停了下來； 以及同年8月3日王康致

58 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35頁。

信中央，批評五中全會的某些問題等。[59]共產國際反對把毛澤東排擠出軍事領導和送他到蘇聯養病，以及對五中全會撤掉毛澤東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不滿等，都是王明傳遞的。[60]而且王明還在一些場合突出宣傳毛澤東，如在國際七次代表大會上以中共代表團團長身份的發言中，讚揚毛澤東是「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在他列舉的中共領導人名單中也把毛澤東排名第一，博古反倒排為第十二。在黨的戰略轉變中，王明更是中共領導層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人。所以毛澤東在第二次「九月會議」上猛批「教條宗派只有罪惡無功勞」中提到王明時也說「八一宣言還能考慮」。[61]這些都說明，第三次「左」傾亦即博古路線時期，功過相抵，王明沒有太大辮子可抓。他的問題主要還是出在1937年回國以後，即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那人所共知的右傾和對中央鬧獨立性的問題。這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極大不滿，但還是對他採取了溫和甚至保護的態度。例如六中全會上，彭德懷、劉少奇等對王明作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在作結論時仍然說，「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62]就是1941年「九月會議」上層整風開始，集中清算第三次「左」傾(後來黨史上通稱王明路線)時，受批判和作檢查的主要還是博古、張聞天、李維漢等人。王明不但未受到多大衝擊，他在發言中反而以正確自居。毛澤東這時所要求於他的，也

59 分別見周國全、郭德宏：《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頁，255–257頁。

60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1頁。

6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62 1938年11月5日在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頁。

只是檢查抗戰初期的右傾問題。在王明倒打一耙後，毛澤東對他還是只算抗戰初期的賬，宣佈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作為定論。在準備的《講話大綱》中，「也指出了王明還有一些『對的地方』」[63]。此後就沒有再多談王明的問題，直到1943年九月會議。可見，整風頭兩年，不但沒有人提出王明「左」傾路線，而且批判第三次「左」傾也都沒有針對他。應該說，這絕不是明察秋毫的毛澤東的疏忽。

王明路線的出現和定型

在延安整風中，提到王明路線，只是1943年後且限於上層的路線鬥爭。至於中層以下，在整個整風過程中也沒聽說過王明路線這個詞。向全黨和公開提到，更是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事了。而且就是上層，在共產國際解散後大批王明的時候，開始提的王明路線也並非後來黨史著作中講的王明「左」傾路線，還限於抗戰初期的右傾，只是把1941年還說的「不是路線的錯誤」給他升級為路線錯誤就是了。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介紹，「就對王明路線的批評來說，事實上早在7月中旬就已開始了。」這是指194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的《關於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的通知》裏講的，「反對那些認為現在的國民黨還是民族聯盟」，但也還是「不點名地批判王明」。[64]過了兩天，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極為嚴厲地指名

63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633–634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9–202頁。另見《延安整風實錄》，第86頁；《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1頁。

64 見該書第282–283頁。

批判了王明，說投降主義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並提出警告，「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如張國燾。」[65] 此後的發言，包括林伯渠、葉劍英、朱德、周恩來等，都按毛澤東定的基調批判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直到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報告時局與學習問題時，才「第一次在較大的範圍公開點名批評王明（右傾投降）路線」，並概括其特點為四條。還揭露說，「王明最近兩年，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志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我們要有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66]

這些情況都說明，直到1943年「九月會議」開始，對王明的批判雖已由「原則性的錯誤」升為「路線錯誤」，但都是指的抗戰初期。而且這個時期的兩條路線鬥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正確路線和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恐怕也不像後來分得那麼清楚，否則為什麼至今不能公開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王明的報告和毛澤東等人的發言，以及任弼時1938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大綱》（4月14日）和《補充說明》（5月17日）。至於蘇維埃後期「左」傾的路線錯誤，名稱從博古路線變為王明路線，又是稍後的事了。

根據現已公佈和可以看到的文獻，首先把王明推向犯第三次「左」傾錯誤前列的是康生。如前所述，第二次「九月會議」頭三天，集中批判的還是王明抗戰初期的右傾路線。9月13日會議繼續舉行，康生第一個發言並提出新的問題。他說，「首先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還要聯繫內戰時期來找王明主義的來源。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發現這是一個大騙

65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56–257頁。

6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75頁。

局。……王明比立三路線『左』得多，要從1930年的小冊子算起，這是代表『左』的綱領。」[67]《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評論這一發言，說它「顯然含有嚴重錯誤」（如對《新華日報》等的批評），並說「他的這些看法對後來會議的進程發生了較大影響」。[68] 前者姑置不論，「發生了較大影響」大概是事實，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有兩點。一是他的發言實質上提出了王明「左」傾路線問題，綱領就是那本小冊子。二是四中全會是錯誤的，第三次「左」傾不能從「九一八」算起，而應從四中全會算起。幾天後才是毛澤東着重談「兩個宗派」問題的重要講話，其中就提到我們上面認為不好理解的「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及「教條宗派只有罪惡無功勞，超過了李立三、陳獨秀。王明有何功勞？四中全會已被揭穿」等。他在10月6日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中更明確提出，「過去，王明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鬥爭的性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錯誤路線以米夫、王明、博古為首」。[69] 在此期間，周恩來、劉少奇等在發言中也都狠批王明的小冊子，並徹底否定四中全會。及至12月28日，中央書記處的指示電已正式提出「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同日以政治局名義發的指示，還特別指出，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將「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的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的篡黨……」等。[70]

從這些簡單敘述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九月會議」的一個短時間內，對黨史上幾個重大問題的評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三次「左」傾從博古路線正式變成王明、博古路線，錯誤的主要負責人從博古變成了王明（博古作第二遍檢查時已表示，「在教條宗派中，除王

6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5頁。

68 見該書第286頁。

69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60–261頁。

70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62–282頁。

明外，他是第一名」。[71]），四中全會從「基本正確」變為「只有罪惡」。這些變化起因於康生，所以毛澤東在事後很久還說，「四中全會的錯誤是康生同志發現的，不是我的功勞，四中全會決議歸根到底是反右，不是反『左』，是錯誤的。」[72]但是康生在政治局整風會議上提出這些問題，恐怕絕不是他個人一時所想。有些延安時期的同志早就議論，根據康生的為人、他當時的地位與職務、他同毛澤東的工作與私人關係，以及休會幾天和他發言完毛澤東即接着講等情況看，大概可以認為，他們兩人事先進行過商議和討論，康生的意見是先摸准後表達毛澤東的想法。這就使康生這位王明當年的追隨者和得力助手變成了反王明的英雄。

博古路線為什麼和怎樣變成王明路線的

1941年「九月會議」以後，毛澤東受委託起草「歷史草案」和他所寫《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都對這條路線定名為「博古路線」，並有比較詳細和具體的敍述。1943年「九月會議」後雖改為「王明、博古路線」，但大體上還是原來的框架，時間也還是從博古上台後的1931年9月算起。毛澤東不但在早時起草的「歷史草案」上說，「左」傾路線的第二個特點是時間長久，「延長了三年四個月之久」；而且1943年9月13日講話也還是說，「他們統治中央計三年又四個月」，[73]就都是指「九一八」以後。而這個時期，王明已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許多問題實際上和他沾不上邊。1933年後他還在不少

7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5頁。

72 1965年10月毛澤東關於印尼局勢的談話。

7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287頁。

問題上批評博古的「左」。他宣傳毛澤東，但卻從未宣傳過博古和張聞天。在這種情況下，要把王明換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頭子，就得有個說法，而這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中共黨內鬥爭中倒是很容易解決的。於是，就有了「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與支持者」[74]的定性，並強調那本《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的作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甚至說四中全會的決議是「在實際上」批准了王明的那本小冊子。[75]胡喬木也說，「歷史問題決議對四中全會的說法，是同王明的小冊子聯在一起的。可以看決議，決議對四中全會本身並沒有說什麼，但它說這個會議批准了王明的那個代表黨內『左』傾思想的小冊子。」[76]

改稱王明路線就是因為那本小冊子，問題也實在太簡單化了。王明的小冊子既未經中央會議通過，也沒有作為正式文件下達，怎麼就能起那樣大的作用。難道王明路線的定名就只是因為那本並不出名的小冊子？根據我自己在延安整風前後的所聞所見，那本小冊子的名聲和地位完全是同命名王明路線一起被人為地抬高的。現在一些黨史著作還把延安整風、編印《六大以來》等問題或多或少地和那本小冊子在延安的再版聯繫起來，大概也是從有意製造變成人云亦云，後學者只好信以為真了。即以四中全會的決議而論，那完全是米夫起草的。從時間上看，1930年9月舉行三中全會，10月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指責立三錯誤是路線問題，批評三中全會搞「調和主義」。有人提前將來信內容透露給了王明。王明即根據國際來信的精神，花了半個月的時間趕寫出那本原題《兩條路線》的小冊子。[77]而且從整風前後的情

7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69頁。

75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92、394頁。

7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4–75頁。

77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第138頁；李維民：〈王明其人其事〉，《炎黃春秋》2004年第11期。

況看，就是中央許多領導人閱讀這本小冊子也都是在1943年批判王明時的事(這是出自許多人發言時自己的表白)，還沒有看到哪個人說四中全會前看了這本書及所受的影響如何。也很難說米夫看過王明的小冊子。即使看過，專為貫徹國際精神而來的代表，竟撇開國際十月來信，而批准一個據此趕寫出的小冊子，也實在說不大過去。所以連王明自己也搞不清為什麼叫「王明路線」。1944年2月26日，周恩來奉命找王明談話勸他檢討。第二天王明致信周恩來提到，即使假定四中全會決議為路線錯誤，可「為什麼這是所謂王明路線。」[78] 至於「王明路線」是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文件上正式定名，因未作調查(只是近年來同一些當年在延安的老同志談起，都說整風時以至共和國成立前都從未聽說過「王明路線」這個名詞)，無法判斷，但胡喬木講的博古上台後仍稱王明路線的三條理由，[79] 卻並不足以服人。

「第一，沒有王明就沒有博古上台，當時博古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80] 這裏並未講出王明是怎樣把博古搞上台的。而毛澤東的提法卻是，「僅依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81] 胡喬木自己的說法也是，「毛主席對四中全會時國內領導人的批評，主要是講為什麼拱手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博古。」[82] 實際情況大概只能是，博古等臨時中央領導人是由周恩來、王明同國際遠東局一起商定提出名單，並報經國際批准的；或者本來就是國際(這時米夫主管東方部)的主張，國內領導人不能不服從，正像毛澤東等中央蘇區的領導人拱手把蘇區的領

78 《王明評傳》，第407–408頁。

7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8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8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8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5頁。

導權交給赤手空拳的博古一樣。而且按胡喬木的說法，四中全會既為「王明一派人」所把持，米夫又是後台，那為什麼沒有把博古補選成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

「第二，博古執行的路線與王明是一脈相承的。」[83] 即使改變原來所說第三次「左」傾路線始於博古上台後，而按後來說的始於四中全會，那會前寫信反對三中全會也是博古和王明聯名的，「一脈相承」又從何說起?「承」的是什麼？另外，米夫在四中全會前即已來華，會後又留住幾個月，前後都在直接指揮着黨中央。在這種情況下，博古執行的路線是繼承國際代表米夫還是王明，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王明到共產國際搞的還是四中全會那一套。」這更是源流顛倒、本末倒置。四中全會搞的本來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套，王明正是根據這一套起來反對三中全會和寫了那本小冊子的，現在到了共產國際反而不執行國際的一套卻在搞四中全會的一套，這能說得通嗎？如果說兩套本來就是一套，那這條理由就更站不住也毫無意思了，而且並不完全合乎實際。因為1933年後，博古在不少方面還受到王明的批評和指責。黨史書上雖然通常對此不提，但總不能否認這是事實。

由此可見，胡喬木所提命名王明路線的三條理由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有些黨史著作，為了證明王明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的說法，還強調整風前王明作為理論家在延安名噪一時，受到一般幹部的崇拜；還說理論是王明等留蘇學生的「專業領地」，連毛澤東也「盡可能不去涉足」。其實，這些說法大多是以訛傳訛或傳抄中的誇張和臆造。事實上那幾年正是毛澤東理論創作的高峰時期，寫出的理論著作最多。當時黨校及其他機關學校(例如我們抗大)的幹部學員們普遍歡迎來作報告而且作得最多的也是毛澤東。至於王明，既無什麼

83 這裏引證的三條理由均出自胡喬木的同一次談話，故不再另注。

理論著作，也沒多少文章，六中全會前又很少留在延安，六中全會上已受到批判，怎麼可能在延安名噪一時呢？他在1940年再版的那本小冊子也並沒引起多大注意。引起注意（也只是上層領導）還是1943「九月會議」受到批判後的事。起碼當時最大的學校抗大，在我們這些訓練部從事理論教學的同事們中，並沒有什麼人把王明當作理論家崇拜。也許正是這些情況，加上是共產國際回來的人，使批判教條主義沒有拿王明開刀，張聞天反倒首當其衝，王明竟還能落井下石。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把王明列為錯誤路線的頭子是因為他有野心，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連胡喬木也說，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對毛主席的領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84]。這點也許有一定道理，但那只是一時的事，而且屬人們的猜測。因為王明一回來在十二月會議上提的名單就把毛澤東列為第一，並且針對毛的不安，還極力表明他「決無『奪帥印』的意思」。照張國燾的觀察，「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注：總書記）而代之的意向」。[85]張聞天後來確也感到王明「暗中打擊他」。[86]1937年回國後，王明確乎表現得不可一世，總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在「十二月會議」上唬住了大家，連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見並作檢討，如說，「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87]會議不僅一致通過王明的報告、委託他起草「決議」，而且還決定王明作七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只作工作報告（六中全會改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作組織報告。1940年，根據季米特洛夫意見，決定周恩來作組織報告。1943年中央決定改為劉少

8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8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86 見前引張聞天《反省筆記》。

87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507頁。

奇）。[88]但斯大林和國際實際上並不支持王明（可能是一則看出王明不是當領袖的料，二則他在中國毫無基礎），大約在他回國前的談話中還作了交代。所以他雖然顯得目空一切、派頭很大，但終究未敢自封領袖，還表現了對毛澤東的一定尊重和照顧（如「十二月會議」上的批評未點毛的名）。但是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特別是武漢時期的表現，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和擔心，以致說出這一時期「中央已名存實亡」這樣偏激的話。不過這種擔心到六中全會前夕就已基本解除，因為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共領導要以毛澤東為首的談話，從而使王明完全失去了競爭的資本，再加上他近一年的表現還引起領導層的普遍不滿。王明倒也乖巧，隨之迅速改變態度，不但擁護毛澤東為領袖，還成為中央領導層中稱毛為「偉大的理論家」和號召學習毛澤東的第一人。從此，毛澤東就基本上再也不把他放在眼裏，開始整風兩年也沒有把矛頭指向他的意思。其實不僅王明，就是博古、張聞天也不是整風的主要目標，首先拿他們開刀和狠批他們的教條主義只不過是為了造成聲勢以掃清統一思想（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之下）的障礙和實現統一組織（領袖的絕對權威）、統一行動（領袖的令行禁止）。所以有的研究延安整風的書上直截了當地說，「可見，就整風運動的最初目的而言，毛澤東既不是針對已經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針對一般黨員群眾來的，他的基本目標是那些手中有權的領導幹部。」[89]

王明作為整風對象在1943年的迅速升級，即不僅抗戰初期的右傾被上綱為路線錯誤，而且還被定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領銜者，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

第一，在1941年「九月會議」上，王明在發言中貪功諉過，已引起大家的不滿，緊接着還自己跳出來公然反對中央抗戰時期的方針政

8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67頁。

89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頁。

策。這年10月初，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針對毛澤東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對蘇聯求援的冷漠態度和皖南事變後準備和蔣介石破裂的傾向，提了15個措辭嚴厲的問題。王明得知後，以為國際要和毛澤東攤牌，他可以乘機撈一把，於是在同毛澤東等人的談話中和第二天的書記處工作會議上，都發表了全面反對中央現行路線的意見，批評黨的方針過「左」，提新民主主義不妥，並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打官司。後來由於在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和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人員的揭露下，王明即稱病不起，他的問題也就放下了。但他這一鬧，卻撕掉了擁護毛澤東的偽裝，還把自己置於毛澤東和中央的對立面，特別是反對到毛澤東思想的要害新民主主義論，這在整風以後領導人中還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顯然這筆賬是一定要算的，問題只在於時機。

第二，他的態度不好，還搞小動作。從延安整風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中，被批判者的表現和態度都是個至關重要有時甚至是起決定作用的問題。王明在這方面可說是表現最差，不僅對自己錯誤拒不檢討，倒打一耙；還私下串連，挑撥離間(這點最使毛澤東惱火)；以及向共產國際告洋狀、求干預等。其實毛對他本來還是相當寬容的，在很長時間，都是只要求他檢查和交代抗戰初期的錯誤。但他大概總以為自己執行的是國際路線，而且國際一定會為他撐腰(所以一見季米特洛夫上述電報，就反攻倒算)。殊不知對於中共這樣一個擁有政權、軍隊的大黨，國際不能再像當年對波蘭、朝鮮等小黨那樣，可以宣佈解散，或任意更換領導。何況這時蘇德戰起，國際以反法西斯為第一要務，對中國黨的事務也很難過多干涉。所以毛澤東一方面對國際表示尊重，盡可能接受某些意見；另一方面在黨內問題上，包括對王明，先還有所照顧，後來就不大客氣了。結果就形成頂牛局面。王明的態度越是轉不過彎來，這邊的批評就越厲害，上綱越高，王明也就越過不了關。不但整風後期是如此，就是整風結束後幾乎每次中央會議他都要挨批。共和國成立後好久，他的問題也沒有結束，一直被揪住不放。可見中國黨對檢討反省、認錯「繳械」是多麼重視。所以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還做出《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同年10月26日政治局會議決議中又提出王明同志尚未按照中央全會決定「對所犯錯誤寫聲明書」。不久他也就藉口治病去了蘇聯。

第三，由於共產國際解散，毛澤東顧慮大為減輕。毛後來常說(有許多人還為之渲染)，他長期和國際對抗。其實情況並非如此。毛對國際是一直很尊重的，如有意見分歧，多是他自覺或被迫放棄原來主張(如西安事變時的審蔣除蔣、皖南事變後的準備國共「根本決裂」和提出「十五萬精兵計劃」等)，轉而執行國際(實為蘇共)意見。[90]因此，整風期間處理一些問題，包括對四中全會和王明的看法，連胡喬木也說，「至於共產國際這個因素，一般都會考慮到的。」[91]這就是為什麼《改造我們的學習》一年多以後才見報(並非胡喬木和一些黨史學家所說是由於管宣傳的人不重視)、以批教條主義開始的整風運動在蘇德戰爭後才啟動，等等。因此對於王明也不能不有所照顧。因為王明不但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國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也是共產國際的領導成員，是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東方部副部長、部長，主管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運。對於這樣一個來自國際的人，進行公開批判恐怕總得十分慎重，特別是批判內容還與國際有關。所以對1941年10月8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任弼時、王稼祥等批評王明時引證幾位國際領導人的話，毛澤東都特意叮囑大家不要在政治局會議上講。[92]王明生病後一年多也沒有再提他的問題。可是，1943年5月共產國際終於宣佈解散了。此後毛澤東雖然還保有強烈的國際主義傳統觀念，也需要照顧和蘇聯的關係，但總有點像蘇方聯絡員報告王明的估計，「毛和他的擁護者大大鬆了一

90 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88–110頁。

9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92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6頁。

口氣。」某些「國際派」的人「甚至可能被開除出黨」。[93] 不管怎麼說，國際解散後，在處理王明的問題上是可以放手得多了。毛澤東自己後來就說，「共產國際解散後我們比較自由些，我們就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判王明路線」[94] 了。再加上皖南事變以後，毛澤東對國際的干涉和掣肘有所不滿，這當然影響到以國際為後台的王明，更要把第三次「左」傾路線同他聯繫起來。事實證明，王明的擔心和估計並非杞人憂天。如果不是後來情況有變，包括整風中的過火鬥爭和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冤案已引起廣大幹群的不滿，特別是季米特洛夫1943年底以「個人」名義來信，明確提到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共產國際建議的統一戰線政策並開展對他們的鬥爭、應把他們留在黨內等，王明到底會怎樣處理恐怕還是個問題。事實上，毛澤東第一次覆電還說，「在我看來，王明是靠不住的。」並提到他被捕過以及同米夫的可疑關係等。但第二次覆電已改為黨內團結的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95] 此後，「毛澤東沒有再提王明『反黨』問題。不久，毛澤東在1944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說王明等人的錯誤是黨內的問題。」[96]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還特意讓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排名在博古之前。

第四，是當時的氣氛，即肅反和路線鬥爭以及上下左右的互相影響。胡喬木說，「讓我給整風打分，我不會打100分。因為整風很緊張，所以才會一下子轉到審幹，當然這裏康生起了關鍵的作用（引者按：這是黨史界後來的普遍說法，事實上康生再壞也不可能起「關鍵的作用」。對此前面已作評論），但是，沒有那個氣候、土壤，不可能

93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6頁。

94 1956年9月29日接見南共聯盟代表團維塞林諾夫等人的談話。參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21頁。

95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2頁。

96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418頁。

一下子轉入審幹。」[97] 胡喬木講的「緊張」不知是什麼意思，但根據我們下面幹部的體會，就是整風中的過火鬥爭、無限上綱、進行圍攻、強迫檢討，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到矛盾性質的轉化。可以想像，一方面是從思想意識問題變成敵特（這是普遍現象），以「群眾運動」的形式搞逼供信，大轟大嗡地進行「搶救」；另一方面怎麼可能做到和風細雨，在民主的空氣下清算路線錯誤。所以胡喬木也不能不自相矛盾，一方面說整風運動「很民主」；[98] 一方面又說對毛澤東「很不恰當」的批評，「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99] 正是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許多人提出了王明和博古是黨外問題，而且王明還被捕過，他的恩師米夫已被蘇聯處決。上述各種因素，就使第二次「九月會議」對他的批判急劇升溫，定性也就隨之水漲船高了。

第五，還有王明博古兩人的不同表現和最後結局問題。本來毛澤東在蘇區是直接受博古壓制，所以對博古的氣最大，但後來由於王明和博古表現極不相同，所以一大半氣就轉到了王明身上。例如在整風期間，正像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做報告時所說，王明「最近兩年，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100] 而博古呢，一方面對所犯錯誤（無論過去的路線錯誤，還是來自對當前工作的批評）進行虛心檢討，主動承擔責任；一方面對分配的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有些人說，整風後博古任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長，連對當毛澤東秘書才一年多的胡喬木的領導（1942年凱豐生病，胡喬木奉命替代中宣部長[101]），也都很能適應。他對工作不講價錢，叫幹什麼就

9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0頁。

9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8頁。

9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8頁。

10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

101 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21頁。

幹什麼。最後因飛機失事犧牲，成為一位著名的「四八烈士」。正是由於後來的態度，人們對他多表諒解和同情。王明則不然，共和國成立不久即要求去蘇聯治病，中央對他還比較照顧，盡量滿足他的要求，但他卻遠托異鄉，不思回國。在中蘇關係破裂後，還參與反華活動，並於最後出版了一本反黨的《中共五十年》，使他的面目徹底暴露。這樣，一個成烈士，一個變叛徒，於是黨史上的「王明、博古路線」就完全變成「王明路線」了，一般已很少再提博古的名字。由此可見，王明之成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領銜者，主要原因還在於他整風後的態度。如果他能進行深刻檢討，真誠擁護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情況也許就完全不同了。但歷史不能假設，所以，結果王明路線還是成了個符號，許多與王明無關甚至王明不同意的事，也歸之於王明路線並成了鐵案。

值得探討的幾個問題

有沒有個王明路線和什麼是王明路線

討論從博古路線到王明路線的問題，原是想探索什麼是王明路線、為什麼叫王明路線、王明在這條路線的形成和推行中究竟起了哪些足以和他名字聯在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王明教條主義的具體內容，等等。但是說老實話，這些問題實在不容易弄清楚，結果仍然是以前的老印象，就是王明路線多半是個模糊概念，只能人云亦云。上面已經講到，連胡喬木尚且自相矛盾，一般黨史工作者就更難說清了。因此，我以為把1931到1934年的「左」傾路線定名為王明路線是缺乏充分根據的。因為總不能把一本既非正式文件，又沒有多大影響和沒有多少人看過的小冊子（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整風中在康生未提出前並無人提起，而且還肯定四中全會基本正確，都可證明）稱作一條路線。何況那個時期的許多事情歸之為王明路線顯得實在牽強。如說「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02] 其實，對淞滬抗戰和福建事變的態度，在蘇區的許多過左政策，五中全會以至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被迫長征，是很難掛在王明的名下的。

而且王明駐國際期間的作為也很複雜，除執行國際先「左」後有些右的錯誤政策外，也貫徹了1933年後經過不斷調整的許多正確方針，如首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起草了《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征得宋慶齡、馬相伯、魯迅等千餘著名人士的簽名）以及《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由於蘇維埃後期的「左」傾路線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極大，所以稱為博古路線或王明路線都不合理，最好還是恢復「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提法。因為從根本上講，這條路線並不是他們哪位的發明創造，掛上他們不管誰的名字都沒道理。毛澤東自己就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103] 原來胡喬木說由於博古路線是從王明那裏（主要是那本小冊子）來的，所以要改稱王明路線。現在又說王明的兩套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那是否又應改稱「斯大林路線」了？當然，毛澤東也經常說，外國人的東西是我們自己要照搬，又怨得誰人。可是不能忘記，中國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對國際必須絕對服從。否則，毛澤東為什麼也要服從博古、李德，交出黨權、軍權，跟着長征呢？

---

10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頁。

103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1頁。

黨內鬥爭和黨史研究都應該講科學

延安整風以來直到現在，存在着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黨內鬥爭不大講科學，隨意性很大，致使黨史這門學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不違背事實、不講原則、以人劃線、因人而異、改來改去、前後矛盾。無怪乎一些人反映：黨史教員覺得難講，學生則是不願意聽。即以我們現在討論的路線這個問題而論，就不像一個科學概念，缺乏明確的內涵和外延，倒像一個可以隨意用來懲辦持不同意見者（有些是錯誤的，有些還是正確的）的工具，說不好聽點就是用來整人的棍子或帽子。例如原來肯定四中全會基本正確時，曾逐條擺出幾個「成功方面」；後來認為四中全會「只有罪惡」時，既沒提出什麼新的論據（只有一本王明小冊子），也未否定那些「成功方面」，正確路線就一下變成了錯誤路線。對此，胡喬木還有所解釋，說因為：毛主席對四中全會不完全了解，情況不熟悉，經過編《六大以來》，認識才有所提高，思想也發生了變化等。[104] 就算說得通，那第二次王明路線就很難解釋了。王明回國後的情況完全清楚，中間並無重大發現，怎麼1941年說的是幾個原則性錯誤，還特別注明不是路線錯誤，到了1943年就一下子變成了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次變化，連胡喬木也沒講出什麼道理來。毛澤東不僅講武漢時期王明是路線錯誤，而且還提到以王明為首的宗派又一次篡權。[105] 現在恐怕很難找出有幾個黨史學家敢於和能講出武漢時期參與王明宗派篡權和犯路線錯誤的都有些什麼人。我曾聽周恩來自己承認是一次路線錯誤，但這是個人崇拜和以人劃線的結果，實際上是不大恰當的。這是一樁冤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傳》已基本上給平了反。正是由於延安整風以來特別強調路線鬥爭，又搞亂了路線鬥爭，所以就使此後

10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215–217頁。

10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287、294頁。

的黨內鬥爭經常是非混淆，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給黨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不應在黨史中繼續製造個人崇拜

現在繼續在黨史中加深和製造個人崇拜，對國家對學科發展都是很不利的。延安整風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製造個人崇拜，而且把這變成一個原則問題，黨史敘述只能以此為准，至於是否合乎事實倒在其次。以我們這裏討論的同王明的爭論為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基於王明的惡劣態度，為了對他進行幫助，（1941年）10月7日，毛主席偕同稼祥、弼時，找王明談話。」[106] 照抄的就更多了，如：「為了對王明進行幫助，10月7日，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找王明談話。」[107] 實際情況卻是，毛澤東收到季米特洛夫嚴厲責問的電報後，10月4日毛將電報交王明請他考慮如何答覆。「10月7日晚，當毛澤東與王稼祥、任弼時到王明住處商量向季米特洛夫覆電時，他向毛澤東提出一連串責難。」[108] 另一本書上的說法是，「10月7日晚，當毛澤東找到任弼時、王稼祥和王明幾個與共產國際較熟的領導人商量回電辦法時……」[109] 究竟毛澤東等去找王明，是為了「幫助他」，還是為「商量回電」，人們是很容易作出判斷的。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和其他許多黨史著作為什麼要那樣寫？是作者真從研究史實中得出的結論，還是有意要改變史實，了解情況者大概也是心裏明白的。又如1938年三月

106 見該書第199頁。

107 《延安整風實錄》，第83頁。

108 李東朗：〈王明到達延安之後〉，載《百年潮》2001年第11期。另見《任弼時年譜》，第409頁。「10月4日」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37頁所記。《任弼時年譜》上寫為，「日前，毛澤東把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交給王明看，徵求他對如何覆電的意見。」

109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1頁。

政治局會議，明明是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一再電中央書記處建議召開的；會議兩項議程(抗戰問題和準備七大)的建議，也是王、周、博電書記處同時向其他政治局委員提出的；為了不拖延時日能開成會，他們三人又向書記處提議會期為兩天。[110]但是正式的黨史上卻是這樣寫的：「王明(按：其餘二人不知是作者們奉命還是自作主張地刪去了)不但在長江局內頤指氣使，而且也不尊重在延安的黨中央，例如他以通知性的口吻致電延安，單獨決定下一次政治局會議的議程並規定會期不超過二天。」[111]這種敘述總不能說是實事求是的吧，這樣編寫出來的黨史恐怕決不能說是信史。然而這類事例在黨史著作中可說不勝枚舉。大約可以說，黨史書上之所以那樣寫，為的是進一步拔高崇拜對象和矮化批判對象。

對黨史教科書應進行實事求是的修正

最後，歷史問題能不能根據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實事求是的修正，還是只能如陳雲說的「一錘子敲定」，[112]後人不能再動了？這從學術上講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否則要歷史研究幹什麼。然而在實際中卻是一個大問題，特別是涉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結論與評價，大約只能重複已有的論斷和提法，有所修正就可能變成政治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有關黨史的著作，大多是抄來抄去或作點通俗化的工作，很少看到有新的發掘和突破。長此以往，黨史作為一門學科自然是繁榮不起來的。以我們現在討論的路線鬥爭問題來說，就很值得重新進行研究和修正，突破那些出於一時的利害得失

11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3，404頁；王玉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見《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519頁。

11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5頁。

考慮而設置的條條框框。例如為了要整倒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在延安整風時，雖然已事過十多年，也還要提倡進行徹底揭發和批判；但對於涉及領袖和與我們切身有關的大問題，才過去不久(如「文化大革命」)，就主張「宜粗不宜細」，從逐漸淡化到停止討論。這就前後太不一致了。而且這種「一錘子敲定」和「宜粗不宜細」等原則，是適用於一時(說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還是應貫穿整個黨史？是只適用於毛澤東，還是同樣適用於其他人？這能不能作點明確的規定，使黨史研究者心裏有個準頭。另外，對歷史研究是否也得實行「人治」，即領導人一句話就可把多年的史實推翻。例如，博古、張聞天當過總書記，全國上下(書上、報上、課堂上)講了幾十年，但到1982年陳雲一句話，從此總書記又在全國上下變成了「負總責」。把中共黨史上的路線鬥爭誇張成十多次固然顯得太濫，但說共和國成立後一次路線鬥爭都沒發生過，能說得過去嗎？又如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議，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而在共產國際或它的代表，那麼能不能進行恰如其分的重新定性和必要平反？總之，延安整風強調路線鬥爭，也正是從此以後路線鬥爭搞得越來越亂。整風期間，毛澤東譏笑「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老爺們」，說「他們連什麼叫作『兩條戰線鬥爭』也是一點不懂得」，「他們拿了衡量一切的他們自己的路線，是不根據於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於主觀願望，胡亂製造出來的」。[113]可惜，共和國成立後三十年，毛澤東和全黨仍然沒有弄懂路線鬥爭，吃了「亂鬥法」的更大的虧。所以說，黨史上的路線鬥爭問題很需要進行研究並加以清理，真正弄懂什麼是路線和路線鬥爭，也還歷史以真面目。

113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45頁。



第十五章

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什麼是個人崇拜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

關於什麼是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問題在中國已談論了整五十年，幾乎早已到了無人不曉的地步，現在還來談它似乎有點多餘。其實不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從來就有分歧，認識並沒統一。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但卻並未汲取教訓，以致至今造神造假運動還盛行不衰，因此仍有提出來加以討論的必要。

什麼是個人崇拜？1999年版《辭海》的定義是：「神化個別人物並加以盲目崇拜的現象。」應該說，這一定義並沒有錯，只是後面的釋文不盡完善。如說「一切剝削階級都利用它作為愚弄和欺騙人民群眾的工具」，[1]就不合乎歷史事實，因為被剝削階級也在利用，如農民起義。而且如果以過去和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無產階級專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為資產階級專政，那麼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反倒表明，這些無產階級國家吃個人崇拜的虧要大得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崇拜造成的惡果。這既包括所有這些國家對列寧特別是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包括各國內部的個人崇拜，即推出一個崇拜對象，由他實行專制獨裁和對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壟斷。所以我們這裏談的崇拜，既屬意識形態範疇，還更多地體現在國家體制問題上，有很強的政治性。這也是在黨史研究中被實際上列為禁區的原因。

1 《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第378頁。

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

個人崇拜是個外來語，一個時期也被譯成個人迷信。因為這裏的崇拜(cult)，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崇拜，如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而是指對崇拜對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倫理上的狂熱追隨、組織活動上的盲目服從，此外還有巫術治病、會道門、邪教等含義，所以譯成個人迷信也許更確切些。[2]但是個人崇拜已被長期普遍使用，這裏也就只好從眾了。只是要指出，在中文上，個人崇拜似乎輕一些，個人迷信則嚴重得多，於是就可隨政治上的需要而選用。例如在討論和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為了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領袖形象，胡喬木就特別提出，「決議稿中把個人迷信改為個人崇拜，後者是馬克思的原話，八大也是這樣用的，不宜用個人迷信代替，因含義不同。」[3]含義有什麼不同，他沒有說。至於「馬克思的原話」，則是個翻譯問題，如果最初翻譯成個人迷信，個人迷信也就是馬克思的原話了。因為馬克思不懂漢語，而在英、德、俄等外文中並沒有漢語中個人迷信與個人崇拜這樣兩個平行的可以互換的詞組，所以在不同的場合有時用這個，有時用那個，有的是由於不大經心，有的則是出於政治需要，但譯成外文卻總是一個。

據我所知，個人崇拜（或譯個人迷信）的提法盛行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是由蘇聯傳到中國的。1951–1955年我在駐蘇聯大使館任研究室主任，對當時的情況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並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同年7月後即已公開批判和反對在黨的宣傳中的個人崇拜了。使館研

2 例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編的《漢英詞典》（1997年版）就只設「個人迷信」條目，意為無須再列「個人崇拜」。還可見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新英漢詞典》、劉澤榮主編的《俄漢新辭典》（時代出版社1956年版）對cult、культ的中文釋義，等。

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頁。

究室在張聞天大使的指導下，及時注意到這一動向，隨即由蕭揚執筆寫了一篇〈蘇聯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被中宣部摘登於翌年的《宣教動態》第三、四期上。此後研究室又連續就蘇聯輿論大反個人崇拜的問題向國內寫了情況反映和研究報告，有幾份還由張聞天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署名報送黨中央。這就在國內引起了重大反響，毛澤東也在1954年4月28日就〈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一文作了批示。[4]劉少奇還據此批定，以中央文件或中辦文件的形式印發縣團級以上幹部閱讀。從此，中國的報刊也就開始談論起個人崇拜的問題了。應當說明的是，我們一開始就將俄文的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譯作個人崇拜。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用的也是個人崇拜。[5]但是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公開的同年，中共中央先後發表了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其中〈再論〉是胡喬木起草[6])，直到1963年9月寫的〈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時，卻都用的是個人迷信。由此可見，對斯大林就用個人迷信，對毛澤東只能改用個人崇拜。雖然顯得親疏不同，在中文裏變換用法，但實際上兩者的含義並沒有胡喬木說的含義有什麼不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時，也還保留着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結。

個人崇拜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

為了給個人崇拜辯護，也就是維護對自己的崇拜，毛澤東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提出個人崇拜有正確和錯誤之分的「理論」，並把談「個人崇拜」時只有貶義的「崇拜」和該詞另一方面的含義——尊敬、信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4)，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84–485頁。

5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版，第229頁。

6 見《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仰、服從等混淆在一起，[7]還公開聲稱：「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8]這一提法的完全錯誤，現在已經無須多說了，因為當年的宣傳和實踐就已得到充分證明。其實從延安整風以後，個人崇拜就既已先在黨的領導層，共和國成立後更在全國輿論界大行其道。只是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才進一步公開為個人崇拜「正名」。例如個人崇拜積極製造者之一的陳伯達，在聽了毛的插話後立即說，「個人崇拜如果按這個定義，全部是正確的。」[9]而作為封疆大吏的柯慶施和陶鑄等，在發言中對毛澤東竟提出當年國民黨對蔣介石的口號，只是把「蔣總裁」換成了「毛主席」，說成「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胡喬木說，「這是成都會議上正式提的口號，當時就沒人敢反對，提出者後來還提升為政治局委員。」李銳對這一提法不以為然，去向毛澤東反映，但毛卻以「他們是有所指的」推開了去。[10]正是在這個口號(迷信和盲從)下掀起的大躍進和反右傾，使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餓死三四千萬人這樣的空前災難降臨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也證明了個人崇拜是正確的這一「理論」的荒謬。現在雖然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還頗盛行，但敢於說個人崇拜完全正確的人卻已經沒有勇氣公開站出來了。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起於何時

個人崇拜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毛澤東曾經推行個人崇拜，這在中央做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已是鐵板上釘釘子，沒人能否認的了。但是有關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為害程度和起於

7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4頁。

8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第200頁。

9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第200頁。

1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5頁；李鋭：《大躍進親歷記》，第216頁。

何時，卻存在巨大爭論。而實質上這兩個問題又是一回事，說時間短些，無非是要將它的為害程度減輕一些。所以關鍵還是個時間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有着各種不同的說法，最權威的當屬中央決議上的說法了，正式的黨史教科書自然不會越雷池一步。

關於個人崇拜開始的時間，中央決議上的提法雖不十分明確，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後。它在講到「文革」前十年的黨史時說，「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11]既然「這個時期」才「逐步發展」，可見以前是沒有的。於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並且是逐漸地開始）於1956或1957年就在黨史界佔據主流地位。全部官方的黨史教科書和多數民間的黨史著述，都持此說。其中不少還斷然否定在這之前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相反，至今有些書籍和文章還在大講共和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的謙虛謹慎和民主作風。[12]根據無非是毛澤東的一些言論和一時還允許其他領導人提不同意見。或者是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表面，而不知就裏，即不了解複雜的歷史背景。這些，下邊我們還要專門討論，這裏先舉兩個簡單的例子。

關於所謂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不提『毛澤東思想』」。[13]對此，這方面的權威胡喬木卻說，「為什麼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的關係。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們刊用時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14]其實不只蘇聯如此，整個國際共運都是追隨蘇聯的，

11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1–22頁。

12 例如我手頭就有2002年第5期《炎黃春秋》發表的〈建國前後謙虛謹慎的毛澤東〉（作者為余廣人、于保紅）。

13 〈建國前後謙虛謹慎的毛澤東〉一文中的第二個小標題。

1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而且早已發生開除和批判南斯拉夫鐵托的先例。自認是中國的斯大林和想在國際共運中佔據顯赫地位的毛澤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情況及其後果，所以才使他產生不使用毛澤東思想用語的想法。他在1950年8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將《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毛選第二卷時，就正式建議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員都圈閱同意」。這些「修改」中有兩項重要內容，一是凡有毛澤東思想的用語一律刪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正確指示的分量，原來一些地方沒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幾處還增加了他的引語。」[15]（這也間接證明，那種說延安整風是整斯大林的風，毛澤東和斯大林一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是並不真實的。）可見，「堅持不提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出於毛澤東本人的「顧慮」，他並未「力排」實際上不曾存在的「眾議」。

至於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後是否「謙虛謹慎」、「率先垂範」，[16]這方面從主要以個人意志決定（政治局多數成員改變態度表示支持）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支持朝鮮戰爭、放棄《共同綱領》、實行「窮過渡」（從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貧窮落後狀態迅速向社會主義過渡）等事例看，回答都是基本上否定的，下面再說。這裏只舉兩個小例子，即可見一斑。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頒佈的「五一」勞動節口號中，毛澤東自己加上了「毛主席萬歲」一條[17]（正式發佈時定為「偉大的中國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8–330頁。

16 〈建國前後謙虛謹慎的毛澤東〉。

17 據2003年12月李銳為哈佛大學舉辦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發言。2004年1月25日在新華社黃亭子食堂有三、四十人包括我、方實、郭先逑、田綠平、汪丁丁、殘雪等參加的春節聚餐會上，李銳在宣讀了他的這篇發言稿後，曾談到毛加寫口號一事是1981年討論《歷史決議》時朱德秘書的發言中所講，他現在還保存着這份《會議簡報》。

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18])。二是1953年9月，毛澤東以黨和國家主席之尊，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上對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評革命勝利後「忘掉」了農村、不重視提高農民地位和改善農民生活的意見，多次進行近乎破口大罵的所謂批判，並對梁的意見正式表示，「我聲明，確是『拒諫』。」[19]這是人所盡知的事。從實際情況看，正是靠農民運動起家，並在同梁漱溟的論戰中自稱「代表農民」的毛澤東，用統購統銷特別是戶口制的辦法，把農民定死在土地上，變成不能進城的二等國民，製造了城鄉二元結構，人為地阻礙現代文明重要條件之一的城市化進程和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消滅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等社會目標。這一切所造成的惡果早已越來越明顯。從三十年後梁漱溟帶有自責性的話——「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後」看來，他的「雅量」倒要比毛澤東高得多。單就這兩件事而言，能說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如何「謙虛謹慎、率先垂範」嗎？

還有些人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定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有的甚至說只是產生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幫」鬧的。這本身已屬個人崇拜，所以就不一定要專門提出來討論了。

那麼個人崇拜究竟起於何時呢？尋根溯源，查證找據，還只能定在延安整風。

個人崇拜的標誌和條件

關於個人崇拜起始時間的爭論，實際上是個如何界定個人崇拜的標準問題。

18　見《新華月報》，1950年5月號。

1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7–115頁；戴晴：〈梁漱溟與毛澤東〉，見《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由於個人崇拜的研究屬禁區，所以看到國內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談及這個問題的著述，也大多說不清楚。例如有所謂《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20]但並未回答何時「走向」、「走下」和怎樣才算「走向」、「走下」的問題。新近故去的黨史專家馮建輝寫了一本《走出個人崇拜》的書(河南人民出版社)，認為在共和國成立初期沒有形成個人崇拜，而是到六十年代以後才「愈演愈烈」。後來牧惠就在《隨筆》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如何「走出」?〉的文章，[21]不同意這一說法，但卻承認這是「頭一本探討這類問題的書」。這既說明國內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說明至今還未明確個人崇拜的標誌問題。

至於國外有關個人崇拜的研究，倒很活躍，說法也很多。最近墨西哥一個刊物發表了一篇〈領袖的真實與神話〉的文章，說他們「研究了學術與實踐中存在的有關領袖的350種理論……澄清了社會生活中有關領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話。」[22]實際上這也多是談個人崇拜的。我們既無可能看那麼多的外國材料，即使看到的一些談論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材料，也覺得不完全合乎中國的實際。因為國際共運和中國當代的個人崇拜，固然同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過或至今還存在的個人崇拜有許多共同點，但又有它們自己的特徵，這同它信奉或宣佈信奉馬、恩、列、斯的理論是分不開的。對這些理論不大了解、又缺少檔案可查且無實踐體會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奧妙的。這也是一些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研究者總是說不清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個人雖然從小就開始作一點理論方面的工作，但多屬一知半解，而且對黨史又遠非內行，所以下面試圖歸納的幾條個人崇拜的標

20　兩書分別署名為李銀橋、權延赤，但實際上都是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一個人所述。

21　《隨筆》，2001年第3期。

22　《參考消息》，2004年2月2日，第9頁。

誌或突出特點，只能是管窺蠡測之見，提出來供批判和討論而已。在我看來，這些標誌主要有或必須具備如下幾條。

一是對領袖的神化、迷信、盲從和狂熱追隨。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就要把崇拜對象宣傳得一貫正確、無比英明和偉大，還要為他隱惡揚善、偽造歷史、貪人之功、諉他之過、拔高領袖、矮化他人，等等。

二是崇拜對象擁有絕對權威和權力。實際上所謂個人崇拜就是個人權力的崇拜。權力是個人崇拜的主要基礎，小權可造成小崇拜，大權能造成大的崇拜，沒權就都鬧不成，如同漢朝的劉盆子和偽滿的溥儀，只能充當傀儡。共產黨裏的崇拜對象，必須擁有最高的黨、政、軍權，特別是人事權，對一切人(主要是幹部)可以任免獎懲以至生殺予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禮記》上說的「百眾以畏，萬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懼結合成思維和行為的習慣定式。否則，光有天大的本領也是難以成為崇拜對象的。

三是實行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個人崇拜不僅絕對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只能限於口頭。因為個人崇拜歸根結底表現為體制問題，實即政治上的封建皇權專制主義：朕即黨、朕即國家。作為黨國領袖，可以獨斷專行，讓整個社會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轉。他的想法和行為不講法度，無規矩可循，使其他領導幹部以揣摩他的意圖為第一要務，群眾則無論志願還是隨大溜，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義，輕視知識文化、禁止言論自由、取消幹部群眾的知情權。對於黨和國家的重要規章制度如黨章、憲法，以及有關決定、指示以至領袖講話，必須學習和執行，不准自由討論和提不同意見。建立個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至製造群眾的愚昧，因而不重視發展教育，不普及科學，輕視知識分子和提倡少讀書以至不讀書，遍設禁區和各方面特別是領導活動的嚴格保密。很明顯，如果人民群眾的文化和素質得到提高，民主意識(當家做主的要求)增強，

了解領導的活動和國家大事，個人崇拜是很難建立起來的。試想，在餓殍遍野的困難時期，當人們知道領導人一面在大造豪華別墅等奢侈情況和弄虛作假，一面則宣傳如何與群眾同甘共苦，他們會有何感想？如果群眾洞悉領導者的政治活動以至家庭、親屬的生活情況，他們會心悅誠服嗎？回到本題上來說，如果延安整風的一切檔案都公之於世，允許自由討論，那對這一運動的許多傳統說法就會立即動搖，人們的神聖感就會大為減弱以至失落。可見，個人崇拜是建築在多數群眾的愚昧無知和當權者實行愚民政策、不按列寧強調的公開性(即現在流行說的透明度)辦事等制度上的。

五是允許和鼓勵各種迷信言行和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口號、宣傳和儀式。例如喊「萬歲」、「萬壽無疆」、「人民大救星」等口號；誇大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宣傳沒有大救星，「中國人民現在還在黑暗中徘徊」云云；或者學了領袖思想甚至只是語錄，人們立刻就可創造出奇跡，實現各種發明創造等；進行一些宗教式的活動，如廣修廟宇(名曰紀念館之類)、聖地朝拜，更不用說早請示晚彙報及其他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還必須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結合，包括黨領導一切的一黨專政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或變相終身制、各級幹部的委任制或變相委任制、傳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嚴格的等級制和法定及非法定的特權制，等等。

關於個人崇拜的標準和條件，還可舉出一些。上面所列幾點，也不一定完備，甚至還相互重疊，但這都不妨礙我們對個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關於上引墨西哥刊物對領袖神話的概括中有：領袖是天生的天才人物、領袖有常人沒有的超凡本領和魅力、領袖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在中國也是並不例外的。如果以這些標準來衡量，延安整風不但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正式開始，而且為中國黨的個人崇拜體制奠定了牢固基礎。

延安整風中個人崇拜的重要表現

打破了中國黨不突出個人的優良傳統

前面說過，中國黨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所保持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從1940年起就開始被打破了，後經整風即被徹底拋棄。例如關於誰是黨的領袖，經過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事實上的領袖地位已經確定，但並不鞏固，也未公開，在延安講演或見報，和其他書記處成員一樣，一律稱為黨的領袖之一。所以連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鄧力群，1942年聽陳雲報告時說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還覺得「特別新鮮，因為在以前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23]但實際上，從1940年起情況就在逐漸發生變化。這一年不但成立了以陳雲為校長的「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和規定了「澤東日」，更重要的是從此開始了對毛澤東個人的宣傳，且不斷升溫。首先開篇的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上的講演《學習毛澤東》，經毛看過發表在幾天後的《新中華報》上。文中除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外，還第一次給毛加上了「偉大的理論家」的頭銜。[24]此後，宣傳和歌頌毛澤東的文章和新聞就日漸增多。在這方面較活躍的是張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已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說毛的言論和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一個月後又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25]此後即被調為毛澤東的個人秘書。1942年2月18和19日的《解放日報》，又連載了他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

23 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24 見1984年《黨史通訊》第7期載〈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其中指出王明文章經毛澤東看過，除按王明《中共五十年》的記載外，還根據任弼時1945年4月1日《日記》。

25 分別發表在同年的《共產黨人》第16期和《解放》週刊第127期上。

略〉，進一步談到「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提出「毛澤東主義」這個名詞。同年7月1日，遠在晉察冀的鄧拓，也著文論及「毛澤東主義」。總之，從1940年打破不突出個人的傳統後，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宣傳已日益普遍起來。在這些宣傳中，後來人們常用的領袖、導師、舵手等稱呼和一貫正確及其他誇功掩過的阿諛之辭已不斷出現，使個人崇拜的趨勢開始形成潮流。發動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既然在於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皇權主義傳統和國際影響下製造起個人崇拜。這有很大的必然性。

獨斷專行、以人劃線得到黨內認同並走向合法化

如果按照建黨原則和黨章規定，延安整風是不合法的，只是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為中國黨的獨斷專行、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奠定了基礎。

第一，發動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個人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沒聽說這一報告事先經過什麼形式的中央領導集體的討論。像整風這樣涉及全黨、影響全部工作、歷時三四年的大事，理應由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每年一次)討論決定，起碼也應通過中央全會，何況按當時情況(大多數七大代表和大多數六屆中央委員都集中延安)，舉行這樣兩個會議可說易如反掌。至於政治局和書記處，不管有無這個權力，有些重大問題沒經過它們(如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沒說是代表政治局或書記處，而是「我主張」)，有些即使經過也是限於形式，僅用其名義而已(整風後政治局和書記處實際上均陷於癱瘓，於是指定了個如同「文革小組」式的總學委)。所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一再說「毛主席認為」(而不是黨中央「認為」)，進行整風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等等。[26]整個整風運動的部署、變化，如學文件、寫章節、

2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4-205頁，以及其他有關章節。

查歷史、搞搶救等，無一不是跟着毛澤東的思路走。因此應該肯定，整風和搶救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具體領導的。

第二，黨的七大一拖再拖，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三到五年參加整風和搶救(整人或挨整)。這不但違背黨章黨規、違背共產國際關於迅速召開七大和「不應花很長時間爭論過去十年內戰的問題」的指示，[27]也違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有關決定和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決議。原因只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一全黨的認識。」[28]這就是說，七大的開不開、何時開，不決定於中央全會或大會籌委會，而是個人說了算，他認為要什麼時候開就只能什麼時候開。

第三，違背黨規和黨紀的不正常組織設置和以對毛澤東態度為標準的人事安排。這方面事實太多，真可謂不勝枚舉。例如設立一個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總學委會，並下設垂直系統，由延安派向各地的「欽差大臣滿天飛」。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彭真，主管作為全黨高幹整風重點的中央黨校，取代政治局委員陳雲做了中組部長，還負責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列席政治局、書記處等所有中央會議。原在中央無任何地位的高崗一下成了西北局書記，和彭真一樣成為總學委成員和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列席各種中央會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原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專門從蘇北調回延安的劉少奇，在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中一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志寄予厚

27 王稼祥(1938年)和周恩來(1940年)都先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決定，而且按黨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服從和執行國際的指示和決定。何況中共中央從1937年12會議後就一再決定儘快召開。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76頁。

望，要委以重任。」[29]這就是說，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也是毛澤東個人說了算。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另一方面，政治局委員、原組織部長陳雲，卻只在並非中央委員的賀龍底下任個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和王稼祥，1944年分別被安排擔任各管幾個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30]張聞天還全身心投入地幹了一年多，寫出了若干研究報告。王稼祥也許因身體不好或思想不通，據說一直未曾到任。同為政治局委員的周恩來、彭德懷，回到延安參加整風，主要是清算歷史、進行檢查，也未擔任整風中的任何重要職務。還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七大候選人的提名和選舉。在醞釀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一波是從監獄辦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麼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此說向各代表團作了傳達，薄一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31]這都說明，延安整風和從此以後，路線政策的正確與否是以對毛澤東的態度劃線排隊的，緊跟的就正確，意見不同的就錯誤。

第四，在組織上除有一元化的決定外，還做出授予毛澤東有獨斷專行特權的安排。這就是1943年3月關於調整中央領導機構的決定，規定作為主席的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雖然說是大政方針在政治局，這裏的最後決定權只涉及日常工作，實際上此後哪些大事不都是毛澤東乾綱獨斷？劉少奇這一旨在製造個人崇拜的建議，不但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而且也直接違反四年多前的六屆六中全會決

2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5頁。

30 《張聞天年譜》，第707頁；〈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31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定，[32]為黨內的獨斷專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全黨服從於一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即個人獨斷的黨內領導體制。在這一體制下，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還是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之間已不是平等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和紀律也自然失效。如果遇到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澤東在某一問題上發生不同意見時，總是多數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跟着毛澤東走。這就是為什麼共和國成立後當毛澤東對大家有所不滿，帶着黨章和憲法來參加會，說是要維護他的發言權，把大家訓了一頓，竟沒有一個人敢於頂撞；而當劉少奇在「文革」時也拿着憲法，聲稱他是國家主席，以此對抗造反派的批鬥，卻絲毫未起作用，終於作了他參與創建的個人崇拜體制下的犧牲品。所以陳雲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於提不同意見)，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仍然不可能。「反『冒進』不是一次實踐嗎？中央同志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33]

至於劉少奇在生命的最後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其實也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從來的歷史都系統治集團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老早就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34]例如現在，國史、黨史、領導人的傳記，都是黨和國家設的專門機構在寫，連減少以至取消禁區、進行不同意見的爭鳴，具體到設一個「文革展覽館」讓人民參觀，都不允許，哪兒還談得上人民寫歷史？

整風中的蒙昧主義

王若水在一篇題為〈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提到，「整風運動在起初，可以說是一種啟蒙運動，因為它所反對的是以王明等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35]其實這一流傳極廣的論斷是並不合乎實際情況的以訛傳訛。延安整風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前面的章節中已多有說明，毛澤東和當時的黨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於國際和執行國際的指示。因為共產國際實際上也就是蘇共和斯大林，而《整風文獻》中除中國黨的材料外，主要就是斯大林(還有季米特洛夫)的材料，整風學習主要的也是斯大林的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你總不能說整風是在用斯大林的理論反對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吧？至於王明成為教條主義的代表，大約是共和國成立後的黨史編纂學才提出來的。參加普遍整風的人，不但在延安，就是解放戰爭時期也沒聽說過有個王明路線。公開提出十年內戰中的王明路線和王明為教條主義的代表，只是在編《毛選》時修改《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而且是逐漸定型的(1943年底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在極小範圍提出的也是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36])。整風開始後，在重大問題上，中共中央還是向共產國際及時請示彙報的。而且看來，在抗日戰爭期間，國際指示都是大多或基本上正確，特別是在糾正毛澤東某些「左」的錯誤和冒險傾向如制止國共破裂、緩和整風鬥爭、剎住搶救等上都起了積極作用。王若水以及其他許多人類似的看法，顯然是受長期以來黨史編纂學關於延安整風是清算王明路線、是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這一多年以後才有、但並不確實的說法的影響。

關於延安整風並非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說不上啟蒙，前面章節中已作了專門說明。這裏需要補充的是，延安整風實際上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一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這也許是《整風文獻》根本不收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整風學習中不強調

32 〈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

33 〈陳雲同志的三條意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頁。

34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頁。

35 王若水2000年12月提交給「中國和東歐知識分子如何應付21世紀的挑戰」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

36 《延安整風實錄》，第415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9頁。

學馬、恩著作，而以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為中心學習材料的原因之一。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反對盲目服從，主張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馬克思在回答他女兒的問題時說過，他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37]但整風學習中卻強調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反對自由主義和查禁「小廣播」。毛澤東說的，「馬、恩、列、斯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38]等，就都是絕對化的說法，只能信守不准懷疑。這顯然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事實上，如馬列學院的馬列主義教研室，就改為以《聯共黨史》為主，馬、恩著作只不過作為參考資料而已。延安的學校，也大多從1940年起，把馬列主義課程改為《聯共黨史》課程了。

整風還遠離五四運動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繼承和發展了紅軍時期輕視書本知識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傳統，只要集中和紀律，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的思想自由。因為知識多了，思想就會變得複雜，不如工農幹部那樣思想簡單些，容易領導和指揮。這也是後來乾脆說「書讀的愈多愈蠢」、「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根子。從整風學習的文件內容和當時的實際作法以及事後的發展來看，整風就是要把革命隊伍中的一切人培養成崇拜領袖的馴服工具。這就是李維漢說的，「整風的主要收穫是教育了兩代人，兩層幹部。」[39](指紅軍到達陝北前的老幹部和此後參加革命的新幹部)。事實也確實如此。經過延安整風，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上都鞏固地建立起來了。新老幹部，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都變成了崇拜毛澤東和「聽毛主席的話」的馴服工具。這從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來。整風前我們在生活會上批評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就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下來就數他了。但整風後已改成「老子天下第六」，即斯下面還有毛。事實上，整風後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已經穩定建立起來，而毛又極端重視權力和善於運用權力。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數的意見，也只好放棄。共和國成立後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別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變成了馴服工具。毛澤東的權威實際上超過了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封建皇帝和其他最高統治者。

37 〈自白〉，見《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305頁。

38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3頁；第三卷，第803頁。

3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495頁。

建立起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

個人崇拜所要求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領袖和領導集團的活動以至日常生活都處於神秘狀態，而且黨國大事、國內外形勢等的報道和評論都要層層把關。社會新聞則實際上被取消，如1942年4月10日《解放日報》二版登了一條「黨校一學生失戀自殺」的消息，就受到毛澤東的批評。[40]其實，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開始還不太嚴格，人們從中可以知道不少信息，還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見的爭鳴，國際消息也比較多。我就是每天風雨無阻地到報社門口看報上有關蘇德戰爭進展的報道的。可是延安整風後情況大變。由於在報上看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毛澤東曾拍案大怒，「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41]於是決定《解放日報》改版。從此報紙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和宣傳工具，主要的已不再是為大眾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傳媒了。報上連篇累牘地是：關於整風的報道，對王實味

4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53–454頁。

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49頁。

等人以及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一些文人和知識分子的檢討。再往後，就是肅反與搶救運動的報道充斥報端。例如在官方黨史學一再重複毛澤東已下令停止搶救運動[42]後的一個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報》還連續刊登了《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道。沒聽説毛澤東看了諸如此類的消息後發脾氣和拍桌子，反倒是綏德地委組織的宣講團被邀請來延安給一些機關學校做報告。我就在中央大禮堂前排聽過綏德師範、米脂中學一些小孩們的「坦白、控訴」，並且看到台上坐着中央首長。

整風後，除《解放日報》外，其他報刊基本上都已停刊，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牆報自然也沒有了。因為先提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號召，實際上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起碼是挨批的自由主義或「小廣播」。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談不上黨和政府接受輿論監督，而是由黨中央直接掌管輿論導向，並組織人馬審查一切新聞報道。同時規定，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道原則上也須通過各地黨委。[43]與加緊控制報紙(當時無廣播，一切新聞均靠報紙)的同時，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僅不再印行各種期刊和一般書籍，而且連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關整風學習的文件和材料。還須在此一提的是，整風開始不久，特別是開展審幹肅反(搶救運動)後，前幾年很活躍的各種學習和學術活動及其組織如討論會、上大課、研究會等即完全停止。從此，延安的生動活潑時期宣告結束，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堅持強調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被「輿論一律」所代替了。

42 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90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53頁。

43 1942年8月29日政治局會議關於《解放日報》問題的決定；同年9月9日西北局〈關於《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

控制輿論須有嚴格的保密制度，這也是現代個人崇拜賴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條件。因為個人崇拜後面隱藏着許多虛假的甚至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些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崇拜也就坍塌了。例如斯大林當年在蘇聯被崇拜得勝過神仙，在他去世時，莫斯科簡直是哭聲震天，為向他的遺體告別而擁擠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於歷史上任何獨裁者的專制暴虐、殺人如麻的真相後，人們對他的崇拜急轉直下，等赫魯曉夫把他屍體搬出列寧墓移葬別處時，在人民間竟沒引起任何波動。同樣，如果中國黨的許多檔案沒有銷毀，能公之於世，恐怕中共黨史就只能重寫。以延安整風而論，一開始就搞得很神秘。上層整風當時就是在嚴格保密中進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關於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就明確規定，「確能遵守組織紀律，未經允許，不得將學習中涉及黨內秘密的爭論或結論向外宣佈」，否則就不能編入學習組。[44]所以像我們這些從頭到尾都參加了延安普遍整風的中下級一般幹部，不但當時，就是現在也不大了解上層整風的情況。即使專門研究，有些問題還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説沒參加過整風和後世的人們了。大家對延安整風的了解，只能相信黨史教科書上所説。甚至有些過來人，包括審幹肅反中被長期關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誤信搶救運動是康生發動和執行的，毛澤東發現後及時作了糾正。

可見，現代的個人崇拜，特別是過去和現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搞個人崇拜，必須對許多問題嚴格保密、設置禁區。延安整風中叫得最響的是實事求是，但是對中央蘇區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對長征結束後西路軍的被殲等，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偽造歷史。而且這種口頭大講實事求是，實踐中並不實事求是的傳統，倒是一直繼承了下來。不但在延安整風中就搞一些並不實事求是(如無限上綱)的批判和檢

44 〈延安整風運動紀實〉，《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95頁。

討，特別是開展無中生有的搶救運動，而且共和國成立後哪些重大舉措又是實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瞞天過海？例如至今仍說造成慘絕人寰的三年困難，原因有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等，以減輕「人為」的罪責，而不提餓死了多少人，更不講出現過人相食的慘狀。為什麼不敢設「文革博物館」，就因為它有礙個人崇拜下的領導體制。

喊萬歲和唱《東方紅》

延安整風中形成個人崇拜的另一個標誌，就是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神化，進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屬封建蒙昧主義的歡呼歌頌，如喊萬歲，唱《東方紅》之類，而且還不斷升溫，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達到宗教狂熱的程度。

在封建專制時代，萬歲是皇帝的專稱，任何人都是不能亂喊的。到了近代，特別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後，萬歲也可用於對擁護的黨派與事業的歡呼，如「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但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對個人用萬歲的，我只知道毛澤東初期崇拜陳獨秀時寫過「我祝陳君萬歲」，[45]也有人對崇拜或諂媚對象用過萬歲，但屬個別現象，並未普遍化。整風前，我在延安的五六年，也沒聽過開會時對某個領導人喊萬歲。只是1943年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才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一個喊的。[46]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後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當時延安六分之一的幹部，包括大批高幹和文化人，只要彭真振臂一呼，各機關學校必然群起仿效。也就是從此以後，像封建社會的皇帝一樣，萬歲就屬毛澤東一人了。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和見聞，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一些地區也被「萬歲」了一陣，但很快就糾正了。還有

45　祝彥：〈走近真實的陳獨秀〉，《百年潮》2003年第1期。

46　參見《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頁。

個別地方領導人出現被喊萬歲的事故，一旦發現，就會受到批評和處分(調離)。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共和國成立後仍然堅持這一意見的，我知道就有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這大概是招來毛澤東特別痛恨的原因之一。不但絕對不能反對喊萬歲，連不喊或喊的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我去農墾部看王震和陳漫遠打大字報戰，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一就是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他則是經常喊。

與喊萬歲同時興起的，是對毛澤東的各種封號。人們多以為「四個偉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所提，還被毛澤東斥之為「討嫌」。其實，在延安整風後期，提出的「偉大」還要多些。除了最普通的偉大領袖外，還有「偉大的革命舵手」，[47]「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48]「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49]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50]等等。對所有這些極端過火和明顯個人崇拜的頌揚和稱謂，毛澤東不但沒表示過任何「討嫌」，而且還完全接受。因為這都是經過他一再審閱和定稿的，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和自謙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他對斯諾說「討嫌」的並非官方黨史學渲染為表現毛澤東謙虛的不贊成喊「四個偉大」，而是要消除喊「四個偉大」的林彪的影響。

《東方紅》大約也是整風期間由農民唱起的，被發現後，經文人修詞定譜才很快傳播開了。農民對領袖有神化和感恩思想是並不奇怪的。因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

47　陳毅：《新四軍抗戰始末》，1945年5月1日在七大的發言。

48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頁。

49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報》社論：〈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

50　《任弼時選集》，第383頁。

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51]問題在於這樣明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歌詞，不但未得到制止，反而由黨組織廣為傳播，直到定為一些會議和廣播必須具有的開始曲。我在國外工作時，就常遇到出國文工團的節目安排，開始有《東方紅》，最後唱《國際歌》。才唱罷毛澤東是紅太陽，「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這種自相矛盾，實在顯得有點滑稽。然而從延安整風起，卻在中華大地盛行了幾十年，無人敢隨便改變。例如1954年四、五月間，總政文化部長陳沂率文工團訪問蘇聯，節目單開頭就是《斯大林頌》和《東方紅》。由於蘇聯當時已公開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因此對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頌》。我們向張聞天大使反映，既然不唱《斯大林頌》，最好也不唱《東方紅》，否則有點不夠禮貌，顯得在和蘇聯鬧彆扭。張聞天完全同意並向陳沂提出。但陳沂堅持要唱，說演出節目是經周總理審定的。張聞天只好請示國內，最後得到中宣部和總政聯名覆電(據說請示過中央)，同意使館意見。這就是說一個文工團演出時唱不唱《東方紅》，不但一位中國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員說了不算，而且連外交部也無權決定，可見問題之大。

其他對毛澤東的神化和宗教儀式也是越來越多，不可勝數。我對有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就是1958年毛澤東視察河北徐水摸過的一株棉花，後來被繫上紅綢飄帶，成為來徐水參觀的人必須先看的景觀。毛澤東確也做到了一語定乾坤：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全國就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一句「人民公社好」，幾個月內就實現了全國農村的公社化。這還都是在林彪出山前。等林彪出來念起多種符咒，那就一切都「立竿見影」了，中國一下子回到了現代野蠻和迷信的時代。

51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93頁。

個人崇拜在中共七大的表現

七大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的。前者是指七大期間已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全體代表俱已團結在領袖毛澤東的周圍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後者則是指毛澤東的理論和政策已戰勝過去的一切不同意見，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又將保證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提法(適用後來的每次大會)本身就有問題，下面還將談到，而且隱含着明顯的個人崇拜之意。這從大會開始特別是代表們發言們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七大是經過三年多的整風和開了近一年的七中全會之後，思想認識已完全統一，所有政治問題都已得到解決的情況下舉行的。大會又有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具體操持，大會的任務只是從組織上和法律上把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確定下來。因此，會議的發言內容(都是事先寫好並經過審定的)，主要就是對毛澤東的歌頌和多數人的檢討。[52]而這些歌頌和檢討，大部分是很不實事求是的，有極大的誇張和作假，不少說法已超出尊敬愛戴的範圍，明顯的是宣揚個人崇拜以至帶有奉承討好之意。而對這些，毛澤東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掛在他的賬上。我們前面在評論張聞天的《反省章節》時，已經有所說明。他在七大的發言中，許多地方說的都是過頭話。如說自己，「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長期性。」這就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論和實踐。說到毛澤東，就是：「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53]這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根本講不通的。又如上面所提任弼時說的毛澤東是「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恐怕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多少個東方民族會承認，這完全是自封。又如

52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6頁。

53　見《張聞天文集》第三卷，第246–263頁。

周恩來的發言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54]這就完全違背史實，因為毛澤東並沒有領導三個歷史時期，周恩來本人在整風前就沒有接受他的領導，這是周自己後來經常檢討的。朱德在會上說，「我黨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舵手的指揮，終究越過了各種艱難險阻而前進了」；「二十四年的歷史證明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55]這都是明顯的誇大。難道領導打「AB團」、指揮西路軍、發動群眾性的肅反搶救運動也是「完全正確的」？連彭德懷在七大發言中也用了不少個人崇拜的語言，如說，「從黨的全部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56]除會上這些頌揚崇拜的言詞外，七大前後還刮起了一陣向毛澤東敬獻錦旗之風，在中央大禮堂掛得密密麻麻。據說，會後兩個月，國民參政會代表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訪問延安。毛澤東陪他們參觀七大會場，傅斯年看見這些錦旗，脫口說了句「唐哉皇哉!」使毛當場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現在看來，七大實在是一次檢討的大會、頌揚的大會、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為後來開類似會議立下範式的大會。既沒有或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的發表與爭論，各種報告和所有發言又都是早準備好並經過統一審查，開會前就已發到各人手中，開會時只是台上念、台下看。(七大時倒還有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和一些臨時發言，後來這種情況就很少甚至沒有了。)大概連毛澤東也覺得這種會議有點形式主義走過場，所以過了十一年才召開八大。至於九大和十大的召開，看來只是

54 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的發言。

55 見1945年5月1日《解放日報》。

56 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的發言。

為了樹林彪和去林彪，並沒有其他什麼實質意義，但也被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由此看來，七大在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被無限地誇大了，其消極影響至今沒有得到認真對待，自然也不會引起重視了。

七大的這種開法，是否有意搬運蘇聯的做法，不得而知，但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材料，受其影響則是無疑的。為了進行對照，這裏對以「勝利者代表大會」載入史冊的聯共(布)十七大[57]作一簡介。

聯共第十七大舉行於1934年1月。這也是一個歌頌的大會，許多人檢討的大會，大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斯大林走向權力頂峰的大會。它之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主要是因為斯大林已戰勝了所有黨內反對派，完全定於一尊，而且這時蘇聯也宣佈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建設上的一些勝利。所以這次大會的基調就是慶祝勝利，大力歌頌斯大林和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作檢討。於是對斯大林的贊詞和封號就傾盆而來，什麼「偉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鋼鐵般的」，不一而足。這些讚譽不僅來自斯大林的擁護者，也來自他以前的反對者。前者如：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首先稱他為「天才的領袖」。基洛夫說，總書記是「解放我國和全世界勞動者的最偉大的戰略家」。一批參加大會的國際共運的領導人，如多洛雷斯·伊巴露麗、庫恩·貝拉、威廉·克諾林等，也都宣稱斯大林現在不僅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等等。至於被安排在大會發言的一些原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則是拼命檢討自己和歌頌斯大林。布哈林說，「斯大林出色地運用馬克思列寧的辯證法，徹底批評了首先是我……提出來右傾思想的一系列理論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確……團結在黨的智慧和意志的體現者、黨的領導人、黨的理論和實

57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初版，第407頁。

踐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周圍，是每個黨員的義務。」李可夫說，「他（指斯大林）一開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他是一位領袖和我們的勝利的組織者。」托姆斯基說，「我應該對黨說，正因為斯大林是列寧最堅定，最傑出的學生，正因為他的警覺性最高，目光最遠大，最堅持不渝地引導黨沿着正確的列寧的道路前進，正因為他用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們，正因為他與反對派的鬥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得到千錘百煉，正因為這一切，斯大林受到攻擊。」季諾維也夫第一個把斯大林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排在一起。加米涅夫提出了「斯大林時代」，最後高呼「我們的領袖和指揮員斯大林同志萬歲！」[58]

從這些引證中，人們可以看到，我們七大的一些發言和聯共十七大的這些發言是多麼相似。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與舊黨章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增加了一個說明黨的定義、作用和地位的「導言」。[59] 我黨七大通過的黨章與過去黨章顯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個很長的「總綱」。這種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這兩次會，雖然都是個人崇拜的開始，但其為害和發展也還有些不同。聯共十七大後三四年，這些「勝利者」代表，1916名中就已有1108人被捕被殺。他們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就有98名被逮捕或處決。而中國黨雖在共和國成立後已有幾次清洗，但直到「文革」後才大量拘捕和「監護」中央委員，致使八屆十二中全會能出席的委員已不足半數。

58 以上均見（蘇）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69–374頁（各人發言均據《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

59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503頁。

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是個人崇拜的重要標誌

以活人命名思想或主義開創了國際共運的先例

對活人冠以主義或思想之名，在一百多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不曾有過，只是中國的黨開了一個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在當時就曾堅決反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名稱。對那些濫用馬克思主義的人，他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60] 因為正像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群眾的讚美和聲望，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個走上邪路的證據。」[61] 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國黨員的問題時明確表示，「由於我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個人迷信，因此在國際存在的期間，我從來不允許發表那些來自各國的許多令我厭煩的、表彰我的功績的文電；我甚至從來也不答覆它們，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62] 列寧在世時也不稱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稱為布爾什維主義。毛澤東就說過，「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後別人提的。」[63] 斯大林是國際共運中大搞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但他並不讓人提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思想，總以列寧的學生自居。他說過，「至於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64] 朝鮮的金日成是竭力想留點思想遺產和聲望的，但也沒有搞金日成主義或思想，而是

60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8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6頁。

61 威廉・李卜克內西：〈憶馬克思〉，載《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頁。

62 見弗・梅林：《馬克思傳》中譯本（樊集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4頁。據原注，這段話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26卷，第487、488頁。

63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387頁。

64 〈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頁。

發明了個「主體思想」(編按:也稱金日成主義)。其他如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這些大搞個人崇拜的人，也都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義或思想連在一起。除中國外，現在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後。根據胡志明的為人，在世時他是不會允許人們有此稱謂的。所以，延安整風中提出毛澤東思想，是超越國際共運傳統和接受水平的空前之舉，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這也是共和國成立後決定不再提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要提和為什麼不提，胡喬木是這樣解釋的，「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但他又說，「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着蘇共的。共產國際雖然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為什麼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的關係。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們刊用時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65] 這些說法顯得自相矛盾。人們弄不清，提和不提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需要，還是因為蘇聯的關係。不過可以從此看出，提和不提，關係都不大，主要不在中國的需要，而是蘇聯的因素。提，「是對着蘇共的」，不提，是由於蘇聯「拒絕承認」。這就推翻了胡喬木同一段話裏面說的，「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66] 事實上，1935年瓦窯堡會議後，特別是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以後，全黨思想已經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戰略方針之下，長江局取消後已沒有什麼大的分歧，而且在提出毛澤東思想之前的七、八年間，革命力量還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無論是黨員還是軍隊的人數都是成十倍地增長，更不用說黨在全國的

6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73頁。

6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73頁。

政治影響了。共和國成立後有六七年不提毛澤東思想，天也沒有塌下來。那些年黨內在方針政策上無疑有不同意見，但仍然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統一行動。由此可見，提毛澤東思想的歷史作用顯然被誇大了，有重新做一點討論的必要。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命運

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最早提毛澤東思想的上述張如心的文章，雖然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含義和毛澤東思想並無兩樣。1943年「七一」前後掀起宣傳毛澤東的高潮，劉少奇在7月6日發表的文章中仍然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67] 只是兩天後發表的由毛澤東佈置並經他審閱的王稼祥的文章，才減去三個字首次用「毛澤東思想」。[68] 此後，雖無統一規定，但全黨已普遍用起了「毛澤東思想」，直到1945年七大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正式寫進黨章。雖然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許多說明，下了不少定義，但在長時間裏知道毛澤東思想是怎麼回事的人並不多見。延安整風和七大以後，全黨確實做到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體會，這倒不一定是由於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都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主要的還是由於明確和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因此地無分南北，都接受毛澤東的指示，按毛澤東的方針政策辦，即使有政策上的不同意見，也會自動或被動放棄而服從毛澤東。這是解放戰爭和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所一再證明了的。例如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三個月內就遭到毛澤東的三次點名和不點名的批評。[69] 於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了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

67 《劉少奇選集》，第300頁。

68 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69 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81、99頁。

擁護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實，劉少奇起初的想法並不見得錯，後來同意他的觀點的人反倒越來越多。楊尚昆就是其中一個。他曾公開說，「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改造沒到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70]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恐怕不是劉少奇違背了由他在不久前黨的七大上作了全面概括和闡述的毛澤東思想，而是他沒能跟上毛澤東思想的變化，在他受到批評後又能立即放棄自己的原有意見，完全跟着毛澤東的新思想走。這類例子真可謂不勝枚舉。這都說明，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以後，做到統一認識和統一行動的關鍵是「緊跟毛主席」，倒不一定是胡喬木說的由於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延安整風已經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實際上，毛澤東思想提出後，由於得不到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國際共運的承認，毛澤東經過幾年的觀察和考慮後就建議少提以至不提。1948年起他已一再提出將「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71]或「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72] 1950年8月19日毛澤東更進一步提出，從《歷史決議》中一律刪去「毛澤東思想」的提法。直到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還正式下達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明確提出，「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所以在第三年黨的八大會議及其通過的文件中，就再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黨的指導思想。有人說這是由於毛澤東的謙虛，[73]我們前面已經作過澄清，這裏只要再指出一點，就是為什麼延安整風和籌備七大時在這個問題上毛

70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1997年3月22日)，先發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後收入《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71 1948年11月21日審閱共青團文件時給劉少奇等人的信。

72 1949年3月13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

73 如上引《炎黃春秋》2002年第5期所載〈共和國成立前後謙虛謹慎的毛澤東〉一文。

澤東一點也不謙虛，過了四五年卻突然謙虛起來了？這是沒人能自圓其說的。還有人說八大沒提毛澤東思想，是因為鄧小平反對個人崇拜，在他所作修改黨章的報告裏沒提。這大概是出於對七大後的中共太不了解。實際上，在黨章草稿修改過程中，沒有幾個中央領導人提出過應保留毛澤東思想。如果毛澤東主張提的話，恐怕也沒有任何人敢於不提。不然的話，為什麼八大二次會議後(特別是中蘇論戰後)就又更多更高地提起來了？這裏還要着重說明的是，在八大前和八大後一個長時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並沒有影響全黨統一認識和統一行動，而且不只全黨，全國人民都是緊跟毛澤東走的。這從共和國成立後各種席捲中華大地的運動和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連續激烈的變革中就可得到充分證明。而這些，也與七大時定義的毛澤東思想並無多大關係。

斯大林逝世後，通過一個時期的觀察和實踐，毛澤東就更加驕傲了，不再把蘇聯放在眼裏，不但要中國爭取比它先進入共產主義，還想在全球反帝和世界革命中起帶頭作用。許多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領導人也立即緊跟，因而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又進一步掀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高潮，幾年不提的毛澤東思想也開始大談起來了。直到1969年黨的九大，不只恢復在黨章的總綱中將毛澤東思想定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還給毛澤東思想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不再僅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作為中國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而且成了「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74]成了整個國際共運的指導思想。眾所周知，就在對毛澤東思想重新提和提得越來越高的年代裏，中國發生了一連串嚴重事件，如大躍進、反右傾、三年災難和「文化大革命」。這就自然引出這樣一些問題，即究竟如何理解

74 分別見劉少奇的〈論黨〉和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過的黨章。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共和國成立後起了什麼作用，以及應該怎樣對待毛澤東思想。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撥亂反正中，在確定把以階級鬥爭為綱改變為集中力量從事經濟建設的總路線的同時，當時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認為需要趁他們健在時就趕快敲定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主要是確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原因是很清楚的，下面還會專門講到。問題是這時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還是不太清楚。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的鄧力群說，「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完備。……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這一次，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貫徹執行的，用概括的語言寫出來。」[75] 這次是否寫清楚了，也很難說。當時就有許多人不主張再提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的許多嚴重錯誤在毛澤東思想中是怎麼也揮之不去的。但是由於主要領導人的堅持，按照中國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決議》還是做出來了。不過由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及市場經濟，實際上在主要問題上鄧小平理論已經代替了毛澤東思想，重提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更多的是為照顧其同代領導人和對後世的影響。

根據以上所述，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命運大體上經過了四個階段。一是從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到七大後幾年。這一時期雖叫得很響(大家都要提)，但缺乏系統研究和對全部內容的闡述，所以除部分內容和個別詞句(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外，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恐怕不多，連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陳伯達後來也被說成原來是個

75 鄧力群：〈中央起草歷史問題的指導思想〉(1981年7月21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頁。

騙子。二是共和國成立前後十來年決定不提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國事運轉還是人們的感覺，可以說並沒什麼影響，不研究黨史的人大約也不會知道毛澤東幾次不讓再提。三是八大二次會議以後，特別是中蘇關係破裂後，毛澤東思想被叫得更響、提得更高，成為辨別國際共運中是否「變修」的標誌，甚至被說成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第三個里程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可正是這個時期，中國人民遭受到一個接一個的大災難。四是第二個《歷史決議》以後。照說，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闡述得更全面了，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了，但事實卻是知道毛澤東思想內容的人反而越來越少，指導中國前進的已經是鄧小平的主張和指示(後來被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毛澤東思想實際上還真被架空了。

第二個《歷史決議》後，毛澤東思想是否真的被解釋得更全面、更確切，使得人們更明白了，其實遠非如此，只是閉門造車而已。為了不扯得太多太遠，這裏只提以下三個問題進行討論。

一、毛澤東思想是否能和毛澤東本人分開？

問題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毛澤東思想當然只能是毛澤東本人的理論和政策。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集體貢獻和集體創作，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這個集體的範圍就無法確定。例如民主人士李鼎銘的「精兵簡政」主張被毛澤東思想所汲取，梁漱溟提的要重視農村和農民問題(當時雖遭批判，現在又很強調)，那他們是否也屬這個集體？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主要是陳獨秀在黨的二大上明確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王明首先提出的，那他們是否也算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創建？如果這樣算下去，那會把無數古(例如作為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實事求是就出自《漢書》)今中外的人都算進去，豈不亂了套？把毛澤東思想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可能是為了做到「禍福同當」，因為「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

了重要貢獻」。[76]那毛澤東的錯誤和罪責，同樣也得人人有份，包括彭德懷、張聞天等。這顯然既不合理，也違背科學。毛澤東在主張不用毛澤東思想時，就特別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著作』字樣」。[77]這就是說，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思想只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沒提及別人。斯大林也說，「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因而自然和列寧的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78]可見，以個人命名的主義或思想，只能屬他本人，而不應由許多人分享，否則歷史上和現實中的一大堆主義、思想以至責任就都分不清了。應當指出，一些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外國人倒是沒有把本人和他的思想機械地分開。

二、談一個人的思想體系，能不能只算正確部分而將錯誤部分去掉？

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這是個中國特有的、也根本說不通的、硬要強加於世人的問題。不然的話，各種主義和思想大都可以成為完美無缺的了。例如把黑格爾哲學中的唯心論成分去掉，把費爾巴哈哲學中的機械唯物論因素去掉，就自然更接近真理，但那也不成其為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了。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錯誤區別開來」，這也是毛澤東本人所反對的。例如他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和日本；另一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79]照胡繩的詮釋，這第二件事就是指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80]這當然是為了維護毛澤東而違背毛本人意思的一種奇想。但即使只把「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給全盤否定掉，那毛澤東思想也就去了一半。所以胡喬木有時就把毛澤東思想分成兩個。他的說法是，「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有兩種形象：一種是長期的中國革命，一直到1957年……另外一種，主要是從60年代以後或者晚一點……我們現在繼承第一種形象，朝着這個方向努力，雖然有困難，但是可以克服的。」[81]不過這種兩分法也不解決問題。例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如一貫的「左」傾肅反路線（而且這種事還早於斯大林六七年之多），既不屬「晚年錯誤」，又在毛澤東思想中佔什麼地位呢？特別不可理解的是，為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和完整性，還製造出這樣一個理論，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弄出兩張皮，於是毛澤東因犯嚴重錯誤而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反而是其他人在堅持毛澤東思想。這「晚年錯誤」指的是「文化大革命」，那大躍進、反右傾等算不算呢？是否也要說成毛澤東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全國黨組織都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這樣的解釋，恐怕只能把毛澤東思想越說越糊塗，更談不上科學性。

三、關於胡喬木所談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

胡喬木被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他也終其一生認為自己是中國黨的理論權威。他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對毛澤東思想作過多次闡述。一方面指出，「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82]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

76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40頁。

77 毛澤東1953年5月24日對軍訓部部長蕭克報送的內務條令等三個草案的批示。

78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選集》第一卷，第186頁。

79 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2頁。

80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作的兩件大事——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7日。

8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2–83頁。

8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7頁（1980年7月24日的談話）。

思想，他認為，「毛澤東那個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種衝動，根本沒有，說不上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邏輯的思維。」除「文革」外，「當然，毛主席的思想裏面也還有一些其他不完全正確的方面」。如「有把馬克思主義愈來愈簡單化的一種傾向」[83]等。只從這些簡短引證中即可看出，胡喬木認為毛澤東思想不能與馬克思主義並列，更不能說成全面發展(還指出哲學特別是經濟學)；同時也認為毛澤東思想並「不完全正確」，甚至還有極其錯誤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堅持上述違背科學的「發明」，提出「我們還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塊倒掉」，「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在把思想和行動上的錯誤從「毛澤東思想」中剔除後(「他的錯誤是違犯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對於完全正確和純潔的毛澤東思想，胡喬木歸納出三項「基本原則」或「根本精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84]後來寫進《歷史決議》時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三個基本方面」。胡喬木的這一歸納倒是很值得加以討論。

第一，關於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一條就是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可見，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並不是毛澤東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中只是屬他的特別的新貢獻。現在許多政治教科書還把實事求是說成也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因此，把實事求是定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很難講得通。那麼從實踐上看，如果說民主革命中不夠實事求是之處如打「AB團」、指揮西路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等還可以算成支流，那麼，共和國成立後的從「過渡時期總路線」到工農業的一公二純，從《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到反

8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18、123頁。

8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6–101頁。

右派、反右傾，從《論十大關係》到大躍進和大饑荒，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到「文化大革命」，等等，恐怕必須看作主流，從理論到政策都不能再說成實事求是了。

第二，關於群眾路線。我在前面的一兩章節和其他有關文章[85]中曾經提到，群眾路線是作為領導者的一種工作方法，不宜在理論上提得過高。這一方法始終貫穿着黨是領導者和群眾是被領導者的思想。它的全部內涵都是以黨及其領袖和各級幹部為主體的。通俗點說，就是你們應做的一切都是我們要你們幹的，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們，(但)也靠你們，所有方針政策都是把你們的意見集中起來，經我們制定成政策，再由你們去執行。這不但不合乎馬克思主義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做主的民主精神。而且這裏的形式和內容也大有講究。因為作為主體的領導無論做什麼，都可以說成是為了群眾和依靠群眾。至於集中起來又要堅持下去的是否絕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也無具體衡量標準。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許主觀上以為是為了群眾，但實際結果卻完全是害了群眾。幹這兩件大事，是集中了廣大群眾的意見還是出於領導人純粹主觀空想下的決策，恐怕是不必深究就會得出肯定結論的。

第三，關於獨立自主。如果主要指外交政策，應當說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做到了的，而我們卻在共和國成立後的相當時期嚴格實行「一邊倒」。如果主要指社會主義建設所走道路，那麼從理論到實踐都是「走俄國人的路」，不但一切照搬蘇聯模式，而且斯大林在世時還就一些重大問題向他請示彙報。例如作為我們黨「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如果不是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見，也許共和國成立後我們會

85 如〈張聞天的民主追求和實踐〉，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把所有民主黨派都給解散了。[86] 要知道，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把「一邊倒」列為國策，鎖定的主要是蘇聯模式，而不僅僅是對外關係。照搬蘇聯模式，這是毛澤東直到晚年還承認的。而且多年的實踐也正是如此，至今還留下不少陰影。許多黨史著作把「一邊倒」只限於對外政策，那屬明目張膽的斷章取義。與獨立自主相連，《歷史決議》還加上了「自力更生」。其實，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後一直強調的「自力更生」，實際上是閉關鎖國，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從理論上講，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和各國革命需要聯合行動。[87] 何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化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任何國家不實行對外開放就只能落後於時代發展，落後於世界潮流。毛澤東思想中的「自力更生」，包括去掉張聞天所提六種經濟中的「秋林經濟」(指外資)，變為七屆二中全會時的新中國經濟構成只有五種，[88] 表明拒絕引進外資；從「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到「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89] 以及多次講的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不急於和西方國家建交，美國封鎖的時間愈久對我們愈有利等等，實際上就是閉關自守，導致了共和國成立後二三十年的落後。鄧小平就説，「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90] 由此可見，歸納為毛澤東思想中三大原則之一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正好反映了它的一個消極面。

86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頁。

87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0頁。

88 《張聞天文集》(四)〈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原稿和中央修改稿，第46頁的〈選編説明〉。

8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8頁，陳毅傳達毛澤東的講話。

90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綜上所述，胡喬木歸納毛澤東思想的三項原則，比起劉少奇四十年前在黨的七大上作修改黨章報告中所下的定義——《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等八項「理論與政策」，[91] 反而是理論上的倒退，劉少奇的解釋倒還比較確切些。

對個人在毛澤東思想認識上的一點修正

我個人對毛澤東思想沒有研究，但對於它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還是長期服膺的。只是隨着大躍進的失敗，對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指導作用逐漸產生了一些懷疑。經過「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對毛澤東思想，我逐漸形成了一個看法，並在〈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92] 一文中作了如下表述：「毛澤東思想就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現在看來，這種表述是不準確的。原來第一句話只是為説明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背景，即只適用於戰爭與革命時代而不適用於和平與發展時代，卻沒有考慮到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在這點上倒是胡喬木講得對，即對毛澤東思想下定義，既「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説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大概是由於深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了解並不多(連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沒讀過)，還有些誤解(如過渡時期、資產階級法權等)，特別是簡單化偏向(如在延安講的，對馬克思主義，「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以及常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鬥爭哲學」等)。不過正像胡喬木在許多問題

91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5頁。

92 分別發表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和《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2期。

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樣，他一方面提出「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卻又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93] 人們實在看不出這兩種說法有什麼原則差別。與其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倒不如像我們前面說的，毛澤東思想是斯大林理論同中國實際的結合，也許更確切些。當然，一些人過分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但在同胡喬木唱反調，而且還屬並不合乎實際的拔高。[94] 這是在研究毛澤東思想上的繼續倒退，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個人崇拜影響的表現。

根據以上所述，對毛澤東思想似可表述為：毛澤東思想是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這裏第一句話包括了共產黨的領導，使毛澤東思想同歷史上的一切農民起義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區別開來，也說明它的指導作用主要在於革命，而不涵蓋建設；第二句話顯示出農民為革命基本力量的特點，使毛澤東思想不同於完全依靠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也和走城市暴動道路的列寧主義不盡相同。

93 以上均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7頁。

94 例如2003年12月22日《解放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毛澤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章就屬這類。文中說的，「為什麼別人沒有出來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是由他來倡導呢？」就不合乎事實。即使不算以前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意思相同的言論和實踐，單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具體提法，也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同時提出的。至於文中說「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更是違背歷史的拔高。

個人崇拜的形成與發展

造成個人崇拜的根源和條件

從延安整風起形成長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並不奇怪的，也可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追根溯源，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因素。

一、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

皇權專制主義傳統在中國可說是根深蒂固，源遠流長，應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朝。在西周，雖然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說，但實際上周天子的統治還是比較薄弱鬆散的；到了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更出現了至今都沒有過的百家爭鳴局面。只是從秦始皇起，中國開始形成持續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而且是長盛不衰。十五世紀前後，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和接踵而來的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中國卻是在蒙古人的殘暴統治結束後建立了世界上罕見的極端專制的明朝，接着又是對外閉關自守、對內嚴厲鎮壓特別是文化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清朝。後來，封建王朝被推翻了，還一度興起提倡科學與民主的「五四」運動，但是封建的皇權專制主義並未被根本觸動。直到我們黨領導的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三十年，1980年6月李維漢還向鄧小平提出，「我認為反封建的問題是黨和國家根本性的問題」，「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一課」。[95] 現在，又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看來大概沒人敢說這一課已經補上了。和春秋戰國時期相比，在言論自由和百家爭鳴方面恐怕完全是兩種局面。

95 見王煥春：〈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封建的皇權專制主義體制和傳統，是產生個人崇拜的天然土壤。一些人總是希望並想方設法以取得人們的崇拜(歷史上想當皇帝者不知凡幾)。有些人則是選定追隨的目標製造個人崇拜，然後就為這個人大造輿論。還有些人則出於愚忠，在崇拜對象的威懾下，甘願跟着偉人的指揮棒轉，甚至助紂為虐。至於廣大工農群眾，則在世代傳統影響下，自認低人一等，對皇帝、長官和一切強人都存有崇拜和畏懼之心。所以馬克思説，「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站起來吧！」[96]

二、中國的社會結構以至近現代中國的重大革命運動和革命組織，都是以農民為主

中國的農民也和上引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講的法國農民(小農)一樣[97](甚至還要落後、愚昧得多，因為那時法國已經過大革命，而中國農村則一直是死水一潭)，歷史傳統也在中國農民中造成了一種迷信，不是相信自己，而是把希望寄託在好皇帝、清官或者領導起義的頭領身上。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曾經發生過多次農民起義，但充其量也只起到改朝換代的作用，取得勝利以後，有的統治同樣殘酷，如明朝；有的很快就走向腐敗，如只取得部分勝利的太平天國。雖然太平天國那樣腐敗，可廣大太平軍對天王洪秀全也還是崇拜的。這也是農民成為個人崇拜重要基礎的一個證明。

我們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只能是依靠農民。所以毛澤東説，「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98] 如果加以延

96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頁。

9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第692–694頁。

98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2頁。

伸，也完全可以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實質上就是農民隊伍，即使有其他階級或階層的人如知識分子參加，很快也會「農民化」。在這支隊伍中製造個人崇拜，實在是一拍即合的事。這就是為什麼延安整風能以短短的幾年就會在全黨很快確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三、國際影響

崇拜英雄人物、崇拜群體首領等這類個人崇拜，本來是人類歷史上的普遍現象。只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隨着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和完善，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崇拜就已發生質的變化。所以在民主和法治社會，崇拜只意味着尊重、敬仰、愛慕、懷念之類的意思，已經失去了盲從和迷信成分。例如毛澤東幾次談到個人崇拜時提及的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就是在總統的位置上依法行政，並不越權；不當總統了，就和普遍公民一樣，而不是變相的終身制和垂簾聽政。這和我們上面列舉的個人崇拜的標誌，有根本的不同。用人們對華盛頓的紀念為個人崇拜辯解，是有些混淆事實。所以，我們這裏談的國際影響，雖然並不排除其他有關因素，但主要是指國際共運的影響，特別是斯大林的影響。

延安整風是在斯大林已經完全穩固地建立起個人崇拜之後。此前一些先進的左派人士如法國作家紀德、羅曼·羅蘭等都有了深切的感受。但中國還是一切要學習蘇聯，特別是學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以更快的速度樹立起中國的斯大林。不但「毛主席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99] 而且其他主要領導人也很快轉變思想，要擁立毛澤東為中國的斯大林。例如劉少奇，幾年前還説，「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

9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

成」。[100]可是到延安整風時就完全變了，似乎把毛澤東說成只是中國的斯大林還有點不夠了。[101]所以蘇聯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忙（指定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也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延安整風中得以迅速確立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形勢的發展也需要黨推出自己的領袖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前，突出黨的領袖並不十分緊迫。但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中共就很需要推出自己的領袖、讓他走向公開的政治舞台。因為合作的對手國民黨，有一個總裁蔣介石，可以對一切問題拍板定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應有一個相應的人物，使對方以及各界了解誰代表共產黨，誰說話算數。從黨內來說，在黨擺脫秘密狀態後，領袖的公開出現，也有利於全黨認識和行動的統一，加強黨的凝聚力，使分散的根據地和各地黨組織能聽到一個聲音說話。所以在前面對延安整風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時，就已經指出，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增進和加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成為迅速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推而廣之，經受百年外敵欺凌的中華民族，也亟須一位能夠團結全民、洗雪國恥的民族英雄。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會使志士仁人激動得熱淚盈眶。時代需要英雄，毛澤東就應運而出。

但這裏必須說明，一個政黨或國家需要一個領袖、一個核心、一個英雄人物，並不等於一定要搞個人崇拜。領袖或代表人物和個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和政黨，也必須有它的領袖或代表人物，但他們沒有得到公眾的盲從和迷信，既由選舉產生，又可以按期改選或隨時撤換。而個人崇拜卻是和民主絕對不相容

10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101 如〈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論黨〉，均載《劉少奇選集》上卷。

的。例如被稱為二戰英雄的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戰爭勝利後的大選中竟然落選，變成普通公民，只能去寫他的回憶錄。在他退位時，議會擬通過提案，塑一尊他的銅像，置於公園，令眾人景仰。他卻一笑回絕：「多謝大家的好意，我怕鳥兒喜歡在我的銅像上拉屎，還是請免了吧。」搞個人崇拜的斯大林就全然不同，不管選舉不選舉，蘇共和蘇聯領袖都是他，直到逝世。而且不用最高蘇維埃通過什麼決議，已經是塑像遍全國，敢說一句不滿話的人，當會被以現行反革命論處。在作戰中，沒聽說過有英國士兵喊「為邱吉爾而戰」；但紅軍衝鋒時卻普遍高呼「為祖國，為斯大林，烏啦！」從這些細節中也可以看出個人崇拜和非個人崇拜的區別。

五、皇權專制傳統壓倒了「五四」傳統

既然經過延安整風形成中國黨的個人崇拜帶有一定的必然性，那為什麼在這之前的二十年卻沒有搞對什麼人的崇拜呢？這說明除歷史傳統、社會根源等客觀因素外，人的作用也是重要的，而那些客觀因素也需要一分為二。中國雖然有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主義傳統，但也受近代西風東漸的巨大影響，特別是黨的廣大知識分子幹部還或多或少地繼承了「五四」傳統。例如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無論在政策上會犯什麼錯誤，但在他們主持黨中央工作時還是講民主的，沒有也不會搞個人崇拜。在他們身上，「五四」傳統的影響超過了皇權專制的影響。毛澤東等人則相反，主要繼承了中國的舊有傳統。這從他們的學問範圍和閱讀興趣這樣一類事情中也可以看出來。由此可見，個人崇拜在中國黨內的形成說明了兩點，一是皇權專制主義舊傳統體現出來的力量、作用和影響，絕對大於「五四」新傳統；二是事在人為，個人崇拜終究是由人創造起來的，不能完全歸之於客觀。而在對待個人崇拜上，黨的面前，過去和現在都始終存在着兩條路線。這也是兩種力量的較量。

個人崇拜是怎樣形成的

一、在樹立個人崇拜中毛澤東本人的作用

(1) 毛澤東的抱負和追求

毛澤東從小就胸懷壯志，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他受老師楊昌濟傾向於宋明理學陸王學派的影響，比較強調主觀能動性和具有一定英雄史觀的色彩。[102] 李銳在〈毛澤東早年的道路〉一文中也說，毛青年時「十分強調個人主觀意志的能動作用，即『個人精神主義』」，「具有救國救民『舍我其誰』這樣一種英雄氣概」，以及「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他對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毛澤東還有如下評語：「他的性格特別倔強，我行我素，好鬥好勝，以鬥為樂，決不服輸；他意志堅強，吃苦耐勞，具有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異舉。」「他對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於獨立思考，多謀善斷，決斷專行，尤好自行其是。」[103]

實際上，毛澤東青年時代所受影響和所具有的特性，大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了一輩子。而且由於他始終鍾情於中國古籍，所以還不斷加深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即使接受馬克思主義後以至終其一生，他也很少讀馬克思而大量讀中國古籍。在被稱為「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的延安整風的緊張歲月，他所讀的書也主要是古書。當時管理圖書館的人員回憶說，單是1943年3、4月間毛澤東就派通訊員借過四、五次書，「主要是宋元明清的短篇話本、章節小說等線

102 參閱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一第三節，內蒙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3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頁。

裝書。每次借四、五函或五、六函，每函8–12冊。」[104] 毛澤東可以把《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讀上好幾遍，卻沒有一次讀過《資本論》和《剩餘價值學說史》(後譯《剩餘價值理論》)。所以李銳說，「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證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限於哲學，斯大林著作稍多幾處。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即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歷史小說、名家章節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105] 中國傳統和小農社會對毛澤東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可說帶有決定性，因此在他思想上對個人崇拜的認同和追求就是很自然的了。

毛澤東一走上社會，特別是參加革命、創建紅軍和蘇區之後，就立即顯示出他卓爾不群，頑強奮鬥的英雄本色和「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個性特點。「八七會議」上，瞿秋白曾建議毛澤東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表示願去艱苦的農村，「不願去跟你們住高樓大廈」。而到農村創立根據地後，1929年即有「農民黨」[106] 和「書記獨裁」[107] 之說，已露出個人崇拜的端倪。後來朱毛的分歧(朱德反對「黨管一切」、「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和毛澤東的前委書記在紅四軍七大落選，都與不少人反對毛澤東「書記專政」和「大權獨攬」有關。周恩來代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中也指出，「黨管一切這

104 徐亮、楊瑩：〈我們的圖書館〉，〈毛主席派人來借書〉，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105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27–28頁。

106 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1929年2月25日給省委的報告，提到「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

107 一度擔任過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楊開慧的堂兄)也說，「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病。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的荷包裏……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認得黨的組織。」楊克敏報告，同上注。

口號，在原則上事實上都是不通，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108] 被毛澤東和黨史界一直批為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贛南會議(1931年11月蘇區中央局第一次黨代會)，在政治決議中不指名地批評毛的四條「罪狀」中，有些固然是錯誤的，如「富農路線」、「狹隘經驗」等；但也有並不錯的內容，如「肅反擴大化」和「以黨治國」。

遵義會議後，得到總書記張聞天的大力支持，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就已取代周恩來成為紅軍統帥(張認為毛的軍事指揮比周強[109])。而在戰爭時期，軍事領袖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上張聞天不願出頭和不爭權的素質，對毛澤東又特別尊重，所以在許多場合都把作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央革軍委(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推到前面。毛也感到他的地位和在蘇區時大不相同了，連對賀子珍都説，「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有發言權了。以後不會讓你再像過去那樣，跟着我受那麼多苦了。」[110] 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才在實際上逐漸形成，因此，他在指揮黨政軍的同時，也更加注意領袖地位的鞏固和領袖形象的塑造。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對毛澤東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內聖外王」，就是以自己的思想去改造別人，實現「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111] 現在，在毛澤東看來，「立功」、「立德」的問題似已不大，而作為黨的領袖，尤應重視的是「立言」的問題了。在中央進駐延安後，毛澤東就利用機會如饑似渴地讀起馬列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並寫出了大量著作，創造出他

108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頁。

109 張聞天:《反省章節》(1943年5月)。

110 李敏:〈我的童年與領袖父親〉，轉引自《書摘》2004年第3期，第33頁。

111 毛澤東從小就有「君子救小人」和「聖人教育小人」的觀點。1917年他曾給黎錦熙寫信説，「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9頁)。從事後發展看，毛終其一生都沒完全改變這些影響，如認定民主是手段等。

一生中的理論高峰。而且他還是有意識地把這和當領袖相聯繫的。例如他説，「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12] 這就是説，他認為要做黨的領袖，必須「有些著作」，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過等到自以為這些目的已經達到，並得到公認(有了毛澤東思想)後，他就很少再去讀枯燥的馬恩著作，而又大讀其感興趣的中國古籍了。

(2) 做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工作

毛澤東對於樹立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實際上也就是培養個人崇拜)，向來就很注意，長征結束後已從多方面加緊進行。這裏首要的就是打通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節，提高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1937年王稼祥(化名張烈)去莫斯科治病，就負有「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介紹中國革命情況，包括他個人對中國黨的領導的看法」[113] 的使命。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又決定派任弼時(化名陳林)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書面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是在國內準備的。雖然這個報告大綱至今不能公開，但他們兩人蘇聯之行的作用很快就顯示了出來。除共產國際主席團通過兩個支持中共路線的文件外，蘇共《真理報》1938年7月6日還刊登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王稼祥回國後在9月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包括中共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等內容的《國際指示報告》。[114] 不僅從這兩位大員的赴蘇成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工作，而且毛澤東對其他機會也不輕易放過。例如劉亞樓1938年4月下旬要被

112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113 胡耀邦:〈深切地紀念王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

114 《任弼時年譜》，第370–372頁；《王稼祥年譜》，第182、184、189、196頁；《王稼祥傳》，第296頁。

派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毛澤東就讓他將中國黨「左」傾路線的危害直接向季米特洛夫彙報，並要他多帶幾本《實踐論》、《矛盾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面交季米特洛夫，請其轉交斯大林。「劉亞樓認真穩妥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他的任務。」[115]

（3）發揮輿論的作用

當然，真正重要的還是動員輿論。中國黨歷來就重視宣傳，而在這方面毛澤東更是行家裏手。1940年後先是將《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參考消息）合併為《解放日報》，停止張聞天主編的《解放》週刊和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等的出版。要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負責向全國宣傳黨的一切政策，內容上減少國際國內新聞（我在抗大工作時每天看《今日新聞》，覺得國際消息很多，後來《解放日報》一出，這方面的信息量就大減），增加我黨我軍及根據地的消息和資料。毛澤東還對報紙抓得很緊，曾向總編輯楊松提出，要厚今薄古，多宣傳遵義會議後黨如何挽救危局，「讓大家知道正確路線是怎樣把革命引向勝利的」，[116]意在要求多宣傳他和他的政策。改版後的《解放日報》，更進一步成了黨的喉舌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工具，陸定一也代替了楊松。雖然毛澤東1943年4月22日覆信凱豐，其中提到，「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117]似乎顯得很謙虛。但與此同時，卻在佈置「鼓吹」毛澤東思想的重量級文章。此前一個多月，中央機構調整時成立了宣傳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副書記王稼祥。

115 楊萬青，齊春元：《劉亞樓將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頁。

116 杜青（楊松夫人）：〈回憶楊松同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5頁；《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頁。

同年6月下旬，毛澤東親到王稼祥住處，佈置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文章，並指點要旨為：從總結二十二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再針對目前黨內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寫」，[118]「你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寫好後又「反復修改，直到7月5日才最後定稿」，當即派人「呈主席親閱」（所署日期可能是草稿擬成的6月26日）。毛「沒有多加修改」就送《解放日報》發表在7月8日頭版上。[119]這就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那篇文章。其實，在這之前的7月6日，劉少奇已發表了號召全黨「應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孟什維主義思想」的文章。[120]總之，以紀念黨的二十二周年生日為契機，幾乎黨的所有領導人和報刊都撰文談論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而按規定，政治局委員以及其他主要負責人的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事前都必須經過毛澤東審定。這就是說，兩個月前還不成熟和不宜當作體系宣傳的毛澤東思想，竟然一下遍地開花地成熟而且可以「作為體系鼓吹」了。正統的黨史學著作，為了宣揚毛澤東的謙虛，總喜歡引證那封致凱豐的信，但卻回避不了這個不能自圓其說的怪問題。

要掌握輿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得有一批秀才，而毛澤東一直就很注意網羅人才。條件是，第一忠心擁護他；第二，有文才，能為所用。辦法是找到合適人才就調來身邊做秘書或安以其他名義，有些也可以不調來而作通訊秘書，或分配其他可直接指揮的工作。合適的長期使用，不合適的隨時調換，另行分配。初到陝北，選才餘地不多，連李一氓也被調去做了一陣毛澤東的秘書。另外，李六如、周小舟、郭化若等也在毛身邊工作過。隨着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

118 《王稼祥年譜》，第334–335頁；徐則浩：《王稼祥傳》，第374–375頁。

119 朱仲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3頁。

120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00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7頁。

到達陝北，挑選的餘地就大得多了。此後毛澤東選用的一批秀才，在協助毛澤東「立言」和製造個人崇拜上起了巨大作用。這些人包括張如心、和培元、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他們，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人如何幹之、艾思奇、何思敬、周揚，在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上，對廣大幹部和群眾起了極為重要的教育作用，也增強了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對毛澤東思想的信服和皈依。例如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在整風中學了陳伯達的《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關於十年內戰》[121]等文章，對毛澤東及其理論與政策的崇敬和信仰就會油然而生，一些人也會把整風和搶救中受到的委屈以至摧殘和毛澤東分開，歸罪於那些直接抓整風和搶救的人。而且不但在宣傳上(即毛澤東說的「鼓吹」)，甚至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體系化)上，這批秀才也都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的陳伯達、胡喬木、周揚等，從延安時期起，就以毛澤東的理論和政策掌管中國黨的意識形態，直到「文化大革命」。後來胡喬木還重新崛起，再管到他逝世前。因此應該說，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在思想戰線和整個文教工作上的一貫「左」，是和他們以及這方面的其他負責人如陸定一、吳冷西等分不開的。

(4) 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

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對個人崇拜也起着極大作用。毛澤東在這方面有兩個問題，一是比較注意山頭，二是「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黃克誠自述》)。毛澤東常說，「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這話確有道理，他也確實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在實踐中卻總是對自己的山頭照顧得多一點，要縮小和消滅的卻首先是別的山頭。1938年我進抗大學習後就發現一個情況，即從支隊(相當於加強營)長、隊(相當於連)長到區隊(排)長、司務長、伙夫班

121 兩書均在共和國成立後重印過，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長以至一些伙夫，幾乎全是原四方面軍的官兵，例如原總後部長洪學智那時就只任我們的支隊長。後來的解放軍十大元帥，就有八個是一方面軍的，「照顧」到二、四方面軍各一個，賀龍和徐向前。實際上在長征結束時，一方面軍的人數反而是最少的。至於政治上，被擴大來參加六屆六中全會的和七大當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更絕大多數都是中央蘇區(一方面軍)，後加部分華北局系統的。三個方面軍中最大的一支紅軍四方面軍，除照顧到徐向前、李先念等幾個人外，其他高幹都沒能在七大選舉中當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總不能說他們是張國燾的人吧？甚至連老井岡山、當過軍團長和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而對反「AB團」有意見的蕭克，也都無緣。人們會說，這是考慮到了戰功和政績。但能不能出成績，除本人條件外，領導上給不給機會更是重要因素，所以古人很講究知遇之恩。這也是許多四方面軍幹部被留在抗大工作的一個原因。又如十大元帥中的賀龍和徐向前，就給的創業建功機會不多。抗戰初起，賀龍率部進入山西，打了幾個漂亮仗，後即被調回延安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徐向前進軍山東一年，也算打開了局面，同樣很快被調回充當賀龍副手，實際上是擔任抗大總校校長，參加整風。這類事例極多，其中奧妙不言自明。

這一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從延安整風起就一直延續下來。例如共和國成立後的八大選舉，竟以「三八式」人數太多為由，將「一二・九」以後的所有新生力量(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排斥在中央領導層之外，使領導建設的八屆中央委員會中正好缺乏懂建設的專門人才。毛澤東自己當時就承認，「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122]只要老幹部的八屆中委，絕大多數成分為農民出身的職業軍人，這是推行個人崇拜的天然土壤。因為「軍人出身的中央委員們，大多服從權威和迷信上級，」他們信任和

12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2頁。

服從毛澤東,「有時候到了迷信和盲從的地步」。[123] 這正是後來毛澤東一系列越來越「左」的理論和政策,能夠通行無阻、得到全面貫徹執行的重要原因,大概也是毛澤東作出如此安排的初衷。

至於毛澤東一貫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政見者遲早總要加以打擊,更是人所共見。要不然,像康生這樣的佞臣怎麼能被信賴一生,最後竟官居中央副主席,得以「善終」;而對他「扶上馬、送一程」的張聞天、多次保衛和救過他命的彭德懷、公開製造對他崇拜的劉少奇等,卻都落了個悲慘下場。事實表明,對毛澤東的態度,凡是絕對順從的,就必有升償;凡是有過違抗的,遲早會倒霉。先稍有違抗,後一貫順從的,還可以用;先一直順從,後竟懷疑者,多無好下場。在延安整風和搶救中,凡按毛澤東部署和指示辦的,不管搞得多麼過火或犯什麼錯誤,不但不會追究,而且還往往得到提升。有些在搶救運動中大搞逼供信甚至有嚴重人命案件的(逼死了高幹的、處決了好人的等等)不但連檢討都不用,還在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些還被安排為政治局委員。康生、高崗就不用說了,其他還有:把中央黨校搞成「搶救重災區」的負責人,「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叫楊述趕快坦白、把綏師一大批十幾歲的小孩打成「特務」還組團去延安到處做報告的綏德地委書記,[124] 一二九師、太行軍區和晉西北等地的領導人,[125] 等等。另一方面,1933年入黨的老幹部蔣南翔,卻因對搶救運動提了正確的反對意見,竟給做了個反對中央九條方針的結論,七大選舉,他自然沒份,抗戰後被派赴哈爾濱作基層工作,

123 黎見春:〈從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看八大路線的中斷〉,《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他有關八大的情況也參閱此文。

124 參閱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61–363頁;韋君宜:《思痛錄》第一章。

125 〈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1985年11月27日,中組部才予徹底平反。[126] 這就是說,對幹部的看法和安排,主要不在工作好壞和意見對錯,關鍵還在於是否緊跟領導。所以陳伯達早就認識到,「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127] 這樣的幹部政策大約只能培養出崇拜個人的馴服工具(其實,有的是真崇拜,也有的是假崇拜,只是以此作進身階)。

(5)搞個人崇拜也跟斯大林學

後來被人稱為「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的《聯共黨史》,[128] 翻譯出版後十多年,毛澤東一直讚不絕口。還在延安時就一次在幹部會上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奉勸各位也多讀幾遍。」[129] 他不但熟讀,而且照搬。奠定中共黨史編纂學基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決議》),基本上就是按《聯共黨史》照貓畫虎的。《聯共黨史》認為黨史就是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130] 在《歷史決議》中,連胡喬木也承認,「黨的歷史退到幕後去了,台上只有路線鬥爭」。[131]《聯共黨史》用一些不真實以至偽造的手法,着意突出斯大林,使之與列寧並列;全書提到列寧、斯大林名字有650餘次,引證二人著作上百頁,佔1/4左右的篇幅;最後三章70多頁,引斯大

126 2002年8月11日蔣南翔夫人吳學昭回答李慎之提問(是我所托)。另見吳學昭:〈韋君宜在「鮮花」中遠行〉,《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

127 葉永烈:《陳伯達傳》,第135頁。

128 (蘇聯)馬斯洛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原載《蘇共歷史問題》,1988年第11期;馬貴凡譯中文,載《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29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88頁。

130 (俄)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59頁;下冊,第1337頁。

13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林語錄60餘條。[132] 對《歷史決議》，胡喬木也說，「1945年決議的作用是把一切歸功於毛主席。那裏分析的歷史太簡單。」[133] 一個只有兩萬八千多字的文件，提到毛澤東的名字就有47次。有一頁還兩次同斯大林的名字連在一起：「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澤東同志詳細分析過的」；「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134] 有一點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兩者都在著作權上做手腳，先說審定後稱執筆，並要分別收進各自的文集中去。《聯共黨史》，先說是由斯大林領導和積極參加的「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著，後乾脆改為斯大林撰寫，並準備編為《斯大林全集》中的一卷。[135] 經斯大林親自修改、審定的《斯大林傳略》早已明確寫道，「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執筆並經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出版了。」[136]《歷史決議》，也先說是由任弼時、張聞天、胡喬木等起草了幾個月，毛澤東前後修改了上十次；可胡喬木直到1991年11月7日又說，「寫這篇文章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獻，證明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則，考證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這樣把材料擺出來才能使人信服。」[137] 其實在這之前四十年，毛澤東就已將《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了他的《選集》。

132 （俄）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59頁，下冊第1337頁。

13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頁。

134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71頁。

135 《斯大林全集》後因反對個人崇拜再未繼續出。

136 《斯大林傳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第135頁；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中冊，第460頁。

1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2頁，《初擬稿十一》。

（6）突出個人的一些做法

毛澤東在製造個人崇拜上的做法涉及各個方面，這裏再談幾點，或可收到以此類他，他可知矣之效。例如對自己和擁護者採取隱惡揚善的辦法，對批判對象則予以徹底揭發以至實行誇張和捏造。前者如編《六大以來》，胡喬木「客氣」地加了個「稍」字，說：「當時也稍有取捨，還是有一個界限的。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劉少奇的自我批評（……）。我問毛主席，這篇文章用不用，他說不用。可見《六大以來》並不是有聞必錄。」[138] 對擁護他的劉少奇尚且如此，對自己更是可想而知。他多次說，「黨書」一出，任弼時、張聞天就都繳械。這裏可以補充一句，如果把毛澤東親擬的對富田事變的《討逆佈告》、《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及其他有關肅「AB團」的文獻，把指揮西路軍的來往電報，把1936年12月13日討論西安事變的政治局會議記錄和1937年「十二月會議」的發言記錄，以及許多重要會議文獻等，編進「黨書」，毛澤東雖不一定有「繳械」問題，但起碼不會那樣「理直氣壯」了，在《歷史決議》中也很難以一貫正確自居。後者如1943年「九月會議」上說，「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139] 1941年六七月在約康生等人批判張聞天時，說張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還給張戴了「狹、高、空、怯、私」五個字的帽子，[140] 1958年5月在給張聞天的信上重提五個字，還批評張一直有「大少爺氣」，[141] 多是無限誇大甚至無中生有。有些還正好同公認的實際情況相反，如說張聞天「私」，誰會相信？張既非大少爺，更無大少爺氣。記恨和批評了幾乎一輩子的關於張聞天、彭德懷在會理會議上「唆使」林彪、劉少奇等反對他，早已

1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1–52頁。

1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14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95頁。

141 《張聞天年譜》，第109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212頁。

澄清並無此事，但他仍繼續堅持到底。至於捏造被打倒的許多人(如劉少奇、彭真、楊尚昆等)的「罪狀」，那就多不勝舉了。

再就是自我表彰與掠人之美。例如經過毛澤東增刪十次、後來乾脆說成主要是他起草的《歷史決議》，連胡喬木也說，「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一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把一切歸功於毛主席」。[142] 還說，對1945年3月26日的鉛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其中「重大改動」的一項為：「在結尾部分加寫了關於歷史證明毛主席的路線和方向是正確的，……從而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第七部分的主要內容。」[143] 這就是說，自己要「過分突出」自己，把「一切歸功於」自己，還要說成歷史證明自己一貫正確。《決議》把1933年春周恩來、朱德等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的空前大勝利，歸功於「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144] 的緣故，是明顯的掠人之美。這不是製造個人崇拜是什麼？而且後來還多次在審閱文件時加上自己的名字，以至提出喊自己「萬歲」的口號和加寫「偉大領袖」字樣。例如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就加寫了「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145] 這是後話。

對這些製造個人崇拜的做法美其名曰為了黨的利益。開始時毛澤東本人還稍有點謙虛精神，但對此也是承認的。例如1945年4月20日他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就說，「《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的缺點錯誤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146] 這樣一來，一個「為了黨的利益」，對毛就只能講功不能

14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頁。

14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5–316頁。

144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7頁。

145 《毛澤東大觀》，第688頁。

146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72頁。

講過，逐漸變成理所當然和不容置疑的了。毛澤東代表黨和人民的利益，誰反對他或不同意他的意見，那就可以上綱為反黨反人民。毛澤東也經常利用這一點，在黨內外推行以他劃線的政策，動不動提出黨有可能分裂，不跟他就是走反黨反人民的分裂道路。不少領導人也是在維護黨的團結和照顧大局的思想指導下，違心地放棄自己原來的意見，轉而支持和執行毛的主張。久而久之，盲目服從(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就變成了習慣和紀律。1959年廬山會議後，我參加了擴大的軍委會和外事會議聯席會，聽了毛澤東9月13日批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講話，其中就談到反對他就是反黨。大意是說，為什麼說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呢？比方說一個人，砍掉了他的腦袋，這個人還能活嗎？[147] 劉少奇也講了類似的話，並公開聲稱，他就是搞個人崇拜的。其實，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威信和主張，就是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照顧大局，這種個人崇拜的邏輯，正是經過延安整風奠定下基礎的。

人們也許會說，1957年前毛澤東還是反對個人崇拜的，在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制定了一些具體規定，如禁止祝壽、禁止送禮、禁止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企業名字等。確實，這幾點後來也真都得到遵守、完全做到了。這也從側面說明，毛澤東如果要真心實意反對個人崇拜，對他的個人崇拜是肯定鬧不起來的。其實，那幾條規定多屬形式，大概同那時不讓再提毛澤東思想一樣，有它的特殊的國際背景。而且由於不涉及個人崇拜的實質問題(歌頌、逢迎、盲從、迷信等)，結果還都保持下來了。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上述大量事實表明在延安整風時已開始大造個人崇拜，二中全會時怎麼又在少數表現形式上不准鬧了？如屬認識到是個人崇拜不應該鬧，那為什麼後

147 我在當時記有詳細章節，「文革」中被外交部黨委沒收未再發還，這裏僅憑記憶。對這次震動全軍和外交部的大會和毛的講話，新出的《毛澤東傳1949–1976》隻字未提。也查不到其他資料。

來又鬧得更厲害了？可見，現象和本質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要是對鬧個人崇拜的人不是重用和提升，而是批評和處分，個人崇拜就絕對鬧不起來。就像後來各地爭相建造別墅行宮一樣，說是下面抬轎子，責任不在上面。但是如果對抬轎子的，發現一個就批判和處分一個，恐怕絕不會再有什麼人願意來抬轎子了。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受到賞識和重用的，正是抬轎子、搞個人崇拜最賣力的。在延安整風時是如此，共和國成立後更是如此。胡喬木就說，在地方上，「他願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其中宣傳對毛澤東要迷信和盲從的，後來還得到提升。[148]這就是說，從延安整風起，毛澤東和他主持下的黨中央，一直執行一種鬧個人崇拜者獎(如林彪、康生、陳伯達)，反對者(如彭德懷、張聞天)罰的幹部政策。這也是個人崇拜之風在他生前愈演愈烈、後世也長盛不衰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參與制造個人崇拜的人們

毛澤東常說，「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149]要建立個人崇拜，光靠自己個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須得到許多人的追隨和扶持，並有群眾的信任。如同在封建社會的亂世中，要當上皇帝，除本人較有本領外，還得有一批文臣武將的輔佐，用「仁政」和迷信等辦法吸引群眾，否則是爭不到龍位，成不了天子的。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就是看到時機已經成熟。這除了出現有利的國際、國內形勢(蘇德戰爭使共產國際無暇東顧；太平洋戰起，日本兵力分散，敗局已定；國民黨再無投降妥協和全面反共的危險；我黨力量壯大，形勢相對穩定等)和內部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幾年的學習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反對

14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155頁。

149 如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30頁。

「兩個宗派」初戰告捷等)以外，還具備了以下幾個條件：毛本人在幹部群眾中的威信樹立起來了；擁護他的力量處於絕對優勢；被認定需要消滅的山頭(即所謂「兩個宗派」)完全分解或失勢。在這些主客觀條件下，通過整風，就出現了全黨要求(起碼已無人反對)樹立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局面，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就從此開始了。

以山頭而論，四方面軍已完全被分解，二方面軍和其他北方紅軍也都分別編入八路軍的三個師和留守兵團，皖南事變後新四軍也八路軍化了，因而全軍俱已聚集到了井岡山的紅旗下。[150]至於整風中受批判的兩個「宗派」，本來就不存在，何況所謂教條宗派的博古、王明、張聞天、王稼祥等只是幾個光杆司令，一批就倒；而所謂經驗宗派，其內涵和外延又很模糊，且早已分化，因其重要人物多有實力和影響，所以在批判後還分別得到不同的重用，如任弼時得到提升，周恩來、朱德保住了領導核心中的地位，彭德懷、陳毅稍經曲折仍可帶兵，其他沾邊的檢討後也就沒事了，只是影響不大的李維漢、鄧發沒能進入中央。

就思想認識來說，經過整風，黨內幹部絕大多數是真心實意地擁戴毛澤東為領袖，並且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個人崇拜的製造。正是馬克思主義水平普遍不高和受中國傳統與共產國際的影響，人們也並未明確分清擁護領袖和製造個人崇拜的區別。因此，許多人在主觀上是為樹領袖，客觀上卻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但要說他們對自己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的過頭頌揚，都是出於本人的真實認識和真實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別是對多數了解情況的上層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對他們來說，參與制造個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於對毛澤東的景仰、欽佩、尊崇外，也還摻雜有其他因素，如各種各樣的私心雜念。至於摻雜的

150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除一二〇師的賀龍、徐向前外，其餘師以上首長均為原一方面軍幹部。

多少和具體內容，則因人而異，純粹出於理性認識的人當然也有，但估計為數不多。下面就舉幾個人的例子加以說明。

在延安整風中製造個人崇拜出力最多影響最大的首推劉少奇。他是這方面的領軍人物。是他提出主席在書記處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樣帶有個人崇拜色彩的組織原則；是他不但大力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且建議將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在一篇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竟有105次之多；是他為維護個人崇拜奮鬥了後半輩子，不惜犧牲許多原則，直到最後獻出生命。是什麼原因使他這樣做的呢？分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點：一是基於共同的認識和類似的經歷，都反對過十年內戰時期的三次「左」傾，並受到「左」傾中央的排擠和打擊，可謂志同道合。二是都篤信斯大林的理論和政策，讀馬恩著作不多，又受中國傳統影響較深，因而思想上具有個人崇拜傾向。三是無論對敵鬥爭還是黨內鬥爭，都需要他們兩人及其所代表的兩大力量聯合作戰。對毛澤東來說，要牢固確立「中國的斯大林」的地位，必須借助原北方局系統的力量和劉少奇在華北和華中的影響；而對劉少奇來說，要維護自己的力量和影響，特別是爭取「進入中央領導核心」[151] 就只能依靠毛澤東。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幾年前才說過誰也不要妄想做中國的斯大林，而直到延安整風後所寫《論黨內鬥爭》也不引證毛澤東，[152] 1942年底回到延安後就一下來了個大轉變，大肆宣傳和抬高毛澤東，講了許多過頭話，如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153] 都是些無限的誇張。四是延安整風後劉少奇還一直為維護毛澤

151《劉少奇傳》上卷，第二十節的小標題。

152 在這之前寫就的長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無一處引證毛澤東，只是在1962年修訂時才增加了多處引證。

153〈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3、336頁。

東的個人崇拜而鬥爭，既有思想認識上的慣性作用，也由於形勢所迫而不能再走回頭路。這個問題帶有極大的普遍性，也是個人崇拜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需要多說幾句，並仍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為例。

個人崇拜是崇拜者和崇拜對象合力的結果，最後形成為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崇拜者情感寄託和權利讓渡的過程，使崇拜對象越來越具有絕對權威，崇拜者越來越只能服從。劉少奇在延安整風中提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讓出了自己在領導集體成員中的平等權利，退居幕僚地位，把黨組織中的同志關係引向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此後二十多年的毛劉關係，也就是循着這個線索逐步發展下來的。例如在1948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長篇發言，談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成分和基本矛盾等問題，並特別強調：「最後還要嚴格的說一句，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154] 可是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他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就遭到嚴厲批判，他也只能放棄己見，緊跟毛澤東「過早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也是《劉少奇傳》上所說，「劉少奇對毛澤東是尊重和依賴的，在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上，即使他的想法和毛澤東發生分歧，他也總是放棄自己的意見，轉而支持毛澤東。」[155] 這等於說，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可以犧牲原則。八大以後，毛澤東多次提出和宣佈他要退居「二線」，1959年還讓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在第一線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156] 實際上，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並沒有去研究什麼理論，黨和國家的事情反而管得更多更具體。處於「一線」的劉少奇

154 見《劉少奇傳》下卷，第613–614頁。

155《劉少奇傳》下卷，第916頁。

156 黃崢：〈劉少奇十大功德〉，《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

也加強了請示彙報和揣摩意圖，跟得更緊了。在同年的廬山會議上，他最後的長篇講話，「最重要的內容是進一步讚揚毛澤東」，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最正確的領導，也許比馬克思、列寧還要好些；並一再表白，「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這場顛倒是非、造成嚴重後果的黨內大鬥爭，竟然「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做出了新的貢獻」，而劉少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57]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他還大批彭德懷，硬是給彭戴上裏通外國的帽子。這樣做，不能說沒有表示效忠的成分。

個人崇拜要求崇拜者對崇拜對象忠貞不貳，永遠順從。但劉少奇終究是個政治家，而不是康生式的佞臣。例如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就做不出深得毛澤東賞識的林彪那種發言。所以他雖然一直設法緊跟，還是引起了崇拜對象的猜忌。七千人大會後他的處境就大為不妙了，因為毛澤東已決定要除掉他，還把這說成是樹立個人崇拜的理由。毛後來曾對斯諾說，「總要有點個人崇拜。」「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158] 毛澤東本來就尊崇法家，此後對劉就更藏而不露，使你無從摸到他的意圖。作為黨中央第二把手又處於「一線」的劉少奇，遇事不但沒有事前商量，而且還經常被招之即來，只讓你表態支持和事後去貫徹執行。「天意從來高難問」，弄得劉少奇經常曚頭轉向，疲於奔命。例如1965年12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劉少奇飛往上海出席打倒羅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到後才向別人打聽開會內容。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訪問亞洲三國後回到昆明，剛服下安眠藥準備休息，又接到立即去杭州開會的電話，到後才知道要通過發動「文化大

157 以上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1999年修訂版），第352–353頁。

158 1970年11月16日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轉引自馮建輝：〈關於個人崇拜的反思〉，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7期。

革命」的《中央通知》和對「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組織處理。這就是個人崇拜所要求的「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例證。

在個人崇拜體制下，多數中央領導同志和周圍工作人員都把揣摩領袖意圖當作一件重要的事，在這方面真是各顯神通。有些人摸得較准，並順着來，結果辦事順利，地位穩當，甚至還得到重用和提升，如康生之流。摸得不准，就很難工作，甚至經常挨批，直到撤職調離。這就使許多幹部往往不是以工作為重，而是看着領袖（下級又看着上級）的眼色和愛好行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大躍進中的假大空和其他各種運動的根子就都在此。不過揣摩領袖意圖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否則韓非子的學說也太簡單了。例如陳毅1958年前後曾在外交部黨委會上（我當時任黨委秘書）一再說過，領會毛主席的意圖不能只從表面上去理解，他說要反右實際上可能是反「左」，他說要反「左」倒可能反右。當時還以為陳老總得了毛主席的真諦，但後來證明還是大多摸不准，特別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了陳伯達「天才論」的當。[159] 又如陳雲有一著名口號叫「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160] 這是他在延安時就講的，「文革」後還給人題字、寫條幅。但實際上連他自己也做不到，在重要時刻還是首先「惟上」而不「惟實」。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初，陳雲仔細摸了一下計劃，算了一下賬，認為當年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向毛澤東作了反映。毛說，「那就拉倒，甚至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陳雲不摸底，誤以為毛是對他的意見不滿，於是就趕緊作檢討。「毛澤東後來多次談到：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些話的影響。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標，我希望陳雲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

159 參閱《陳毅年譜》下卷，第1216–1217頁。

160 《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頁。

批評。」[161] 這是薄一波的回憶。薄自己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也承認,「會議『一呼百應』,對主席發動批判彭德懷同志這一不正常、不正確的行動,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或從中緩解一下。為什麼這樣?」「在他受到嚴厲批評後,我『已全然沒有這個膽量』去如實發表自己的意見。事實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一道參加了對彭德懷等同志的錯誤批判……仍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過頭的話。」[162] 如果說這時候是迫於形勢,有「不得已」處,可為什麼散會不久卻「有膽量」主動地不如實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了?這就是廬山會議後不到兩個月,「反右傾運動」正在全國走向高潮時,薄一波於10月9日致信毛澤東。信中說,「我的家鄉—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韓生智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興奮;一、公社化後糧食大增產,工業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麥子(保證了國家徵購任務後),我的家鄉主糧是雜糧;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來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眾情緒高漲,等等。特將這封令人興奮的信打印送您一閱。」[163] 這時在不少農村中已有人餓死,他卻在這節骨眼上謊報軍情,這又是為什麼?由此可見,在製造個人崇拜上或為之推波助瀾上,個人得失和邀功請賞的考慮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上層領導多數人能堅持原則,「只惟實」,不隨風擺,個人崇拜是興不起來的。

當然,提倡和製造個人崇拜的人不一定都是遇事隨風擺、不堅持原則。只是他那個「原則」不合乎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是為了黨的利益。「文革」中和劉少奇一同被打倒的鄧小平,在延安整風期間和隨後,也同樣積極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不管他當

161 胡長水:〈對大躍進的深刻批評與總結──記薄一波廬山會議前關於大躍進問題的數次談話〉,《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另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910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828頁。

162 薄一波:《若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881、869頁。

16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12頁。

時主觀上怎麼想。這不但表現在他領導的反奸運動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164] 特別是反映在他當時提出的「兩個凡是」上。1947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野戰軍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說,「在思想上,我們要提倡兩個『主觀主義』──這是形容詞,加重語。」「第一,凡是自己思想與黨中央、毛主席相抵觸的時候,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準繩,歷史已經證明了毛主席沒有一點不對的……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了毛主席是絕對正確的……因此,遇到自己思想與黨中央、毛主席思想相抵觸的時候,首先承認自己錯了,這是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覺悟及學習毛主席思想的起點。」「第二,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研究,應當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都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165] 他提出的這「兩個凡是」竟如此絕對化,錯誤也如此明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自己也絕不會再把這種文章拿出來公開。這樣赤裸裸地提倡和製造個人崇拜,還十分明確地表明個人崇拜並非1957年後才逐漸發展起來。「文革」後,鄧小平最早旗幟鮮明地反對新的「兩個凡是」,道理很簡單,這就是他說的,「『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166] 這說明,鄧小平是先提倡(更加絕對)「兩個凡是」,後來又反對(並不徹底)「兩個凡是」,除了不同的時代背景外,也與個人考慮和設身處地有很大關係。

164 1944年5月13日《中央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中幾次點了太行軍區和一二九師司令部、晉冀豫,冀南等的名。鄧小平一直主持一二九師和太行地區的整風審幹工作。1943年9月後,彭德懷、劉伯承等領導人去延安,鄧於10月任北方局代理書記,直接領導轄區的整風搶救運動,直到1945年6月回延安(參閱薄一波任總顧向的《鄧小平著作學習大辭典》附錄:〈鄧小平傳略〉和〈鄧小平生平紀事〉,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

165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資料室:《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0冊,第394–395頁。另見李繼華:〈鄧小平最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根源〉一文。

16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8頁。

在提倡個人崇拜上，彭真所起作用大大超過鄧小平。這不只因為他第一個喊「萬歲」，而是由於他工作在中央，特別是主持包括多數七大代表和大批高幹的黨校整風。由於在製造個人崇拜上立了大功，彭真的地位也提升得特別快，而且犯了錯誤也可以得到諒解和寬恕。如在整風中把黨校整成「重災區」[167]既未受到批評，更未影響到對他的重用。在任東北局書記時，他同陳雲、高崗、張聞天、林彪、李富春等發生嚴重的政策分歧，官司打到中央，陳雲一方堅持彭真犯了路線錯誤，但毛澤東作了保護，將彭真調離東北局，改由林彪任書記。[168]共和國成立後彭真的工作仍一路順風，他也仍然宣揚個人崇拜。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在懷仁堂批判彭德懷、張聞天大會的發言中，我對其中有一點印象特別深刻，大意是說，我勸同志們一個「偷懶」的辦法，就是少動點腦子，因為一切毛主席都給我們想好了，我們照着辦就行，再胡思亂想就會犯錯誤。但是個人崇拜所要求遵守的一個原則是，對領袖除頌揚外，還不能批評、不能揭短，要為之掩過。而彭真又不完全是一個只愛吾師不愛真理的人。所以在因領

167 這不只薄一波說，彭真自己也承認。他的秘書就說，「他閒時和我們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延安整風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後來我與他們見面就道歉。』」(見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中華兒女》2001年第9期)。

168 我當時在東北工作，只感到東北局改組後東北局面大變，迅速走向勝利。後來聽七屆二中全會的傳達，說毛主席講，不要給彭真算成路線錯誤，可以算工作方針上的錯誤。「文革」後，這段歷史又翻騰出來。彭真認為他在東北執行的完全是毛主席的路線，並有一系列電報指示為證。陳雲則認為，應維持當年的結論。至於下面幹部，也存在爭論。官司打到鄧小平處，鄧說，毛主席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我怎麼能解決。於是陳雲倡議編輯的《遼沈決戰》就壓下來了。後經妥協，東北局1948年11月23日通過後上報中央，中央批示「完全同意」、含有批評彭真錯誤的《全東北共和國成立後的形勢與任務決議》，就從《遼沈決戰》一書中抽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張聞天文集》編輯組)1995年編輯出版的《張聞天選集》也沒能編入這份張聞天所起草的重要文件。1995年編輯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4卷，雖然收進了這一《決議》，但還是刪去了批評彭真的內容。

袖的唯意志論使全國人民遭受三年嚴重災難的時候，他就不完全不動腦子只是照辦了。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竟在大會小會上公然指名道姓地批評起毛澤東來了。劉少奇只不過含蓄地提了個「七分人禍」就已不得了(毛澤東認為，「人」者即他也)。可「彭真在一次會議上講，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重。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好像一檢討就會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錯。」[169]這真是太歲頭上動土！先劉少奇被打倒，陷入「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就事屬必然了。

在延安整風期間掀起個人崇拜浪潮的當然不只劉少奇等少數人，爭相推動和隨波逐流的可說人人有份，起碼在領導層是如此，包括受批判的兩大「宗派」。例如最早「繳械」的張聞天，不但過頭地頌揚毛澤東和鞭笞自己，把遵義會議後中央領導集體的為首地位拱手讓給周恩來軍事上的助手毛澤東，而且在起草《歷史決議》中對抬高毛澤東起了重要作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就說，他改寫的那份稿子「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思」，「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還一再強調他在評價毛澤東時加寫的「有分量的話」和「重要的結語」。[170]可見，對於連胡喬木自己都批評有「對毛主席過分突出」和「把一切都歸功於毛主席」的決議的「缺點」，[171]張聞天也是有相當責

169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中華兒女》2001年第9期。

17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312頁。

17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137頁。

任的。再如被安上「經驗宗派」領軍人物頭銜的周恩來，對製造和維護個人崇拜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延安整風可説是周恩來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他就以忠於毛澤東、「為毛主席分憂」作為終生奮鬥目標，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以毛澤東的好惡為好惡，最後做到了鞠躬盡瘁，「保持晚節」。他本人也是把整風作為政治生涯的分界線，並經常檢討的。1958年成都會議上，秘書范若愚為他起草的檢討稿上引了一句成語説，「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政治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他竟嚴厲批評范缺乏黨史知識，説自己和毛的關係，「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172] 確實，延安整風後，他對毛澤東只有盡力揣摩意圖、亦步亦趨。頭一陣有時還提點不同意見，批判「反冒進」後就更加謙恭謹慎，幾乎不再直接提不同意見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我曾長時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這方面可以舉出很多事例。周恩來的這種態度和做法，不但保護了自己及大批幹部和各界人士，而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也犧牲了原則，助長了個人崇拜，中國經濟文化發展遭到二十多年的「停滯」[173] 和人民由各種運動而受到的苦難，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

對於製造和發展個人崇拜，雖然所有黨政幹部特別是上層領導幾乎人人有份，但卻不能一概而論，各人的區別和變化還是很大的，這裏就無須多舉了。需要強調一下的是關於宣傳的作用。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又幾乎所有文化工作都屬宣傳，並為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嚴格控制。這就是林彪説的，「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就靠這兩杆子。」在這種體制下，只允許和提倡並獎勵推進個人崇拜的文化產品，禁止

172 范若愚：《歷史最終會把一切納入正軌》，轉引自《周恩來傳》（三），第1393頁。

173 鄧小平説過，我們犯了持續二十年的「左」的錯誤，「這20年中，中國處於停滯狀態，主要表現在生產不發展，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會見門格斯圖時的談話，見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報》。）

和懲罰不利於個人崇拜的產品。於是，偉人被修飾得越來越偉大，逐漸變成了神，而且是至高無上的尊神。造神必造假。造神者競相加工，廣大群眾跟着朝拜，假的也就變成了真的。例如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期間，一位朋友説他列席了一次上層討論宣傳工作的會議，會上提到某省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重新評價布哈林的文章，有為布平反之意。與會的一位老大姐即插話説，布哈林不是刺殺列寧的嗎，怎麼能給他翻案？當時大家就議論説，這是看了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留下的印象。近來有人寫了一篇題為〈斯大林是怎樣「偉大」起來的？——媒介形象與媒介策略札記〉的文章，[174] 就談了不少用文藝手段裝飾斯大林的事例。而且不只在形象上修飾，就連重大歷史事件也可改寫。十月革命的起義負責人原為托洛茨基，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已經是斯大林為首了。[175] 正史尚且如此，其他文藝作品只會更加誇張。

這是蘇聯當年的情況，我們中國何曾不是這樣，從延安整風起就已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且不説對毛澤東的隱惡揚善和戴上一貫正確等桂冠，而且所有當事人（更不用説毛周圍的那些「筆桿子」了）也都合作起來改寫歷史，包括重大事件。例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在整風中就已得到大家「公認」，並正式寫入了後世必須遵守的黨的決議中。[176] 於是，六十年來，一切官方和非官方的黨史著作、個人回憶錄、各種各樣文藝作品，就一直按這一口徑講了下來，以致成為無須證明的公理，連一些批判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中外專家學者也照抄照搬。我在接觸黨史後對這一現象百思不得其解，怎麼

174 見《書屋》2003年第7期。

175 章世鴻：〈重新審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炎黃春秋》2003年第4期。

176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

遵義會議後常委分工只任周恩來軍事指揮助手的毛澤東[177]卻成了黨的最高領導，那為什麼不讓周去做毛的助手（像後來那樣）呢？苦於找不到任何證據，就去請教一些黨史專家，多數人和我一樣茫然，只有個別權威人士給做了如下解釋：一是從此後三五年的會議記錄看，常委中水平最高的是毛；二是在當時軍事第一的情況下出主意的多是毛；因此，可以說遵義會議後實際上確立了毛的領導。但這種回答不解決問題。因為毛澤東就説過，「即使黨的一個小組，如果不舉出一個小組長，那麼這個小組就開不成會」。「為首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178]可遵義會議後並未以毛「為首」，而且那時還沒有實際領袖隱身幕後（如鄧小平）的先例。至於其他造神造假的運動和事例還可舉出許多，也都被視為常識。如所謂紅軍一到陝北的吳起鎮毛澤東就已得知陝甘紅軍領導人劉志丹等人被捕的消息，遂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這種毫無根據的事（只憑王首道的「順着來」的「回憶」），使謬種流傳，誤人子弟。[179]又如許多順着來的文藝作品和崇拜者的回憶錄，把毛澤東描寫和形容得生活如何樸素，如何與群眾同甘共苦。這也就成為公眾所了解的生活中的毛澤東。我自己雖然以前同中央領導多少有些接觸，但在很長時期對這些也有點相信。只是「文革」後看了《毛主席中南海故居》的電影（片名可能記憶有誤，但內容沒錯。此片放映了一個很短時間就收藏起來了，大約是考慮到會產生相反效果。因為後來開放讓參觀的故居，已作了與電影完全不同的改裝，

177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見《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178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人工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第625頁。

179 如最近上映的電視劇《延安頌》；毛澤東之孫毛新宇所著《爺爺毛澤東》書中一節的標題就叫〈刀下留人〉（見該書第270頁）。而時任陝晉（實為陝北）省委副書記、參與處理劉志丹一案的郭洪濤卻在我們（我和張培森、葉暉南）訪問時説，「刀下留人」和「挖好了活埋人的坑」是最大的兩個謊言。另見他所寫《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見《回憶張聞天》）。

顯得樸素多了），到外地參觀過一些毛主席別墅，看到那種令人驚歎的豪華（稱得上奢侈），還得知他擁有那麼多的私人稿費（上世紀五十年代已達百萬，當時在全國也是少有的），[180]這才改變了我的原有觀念，但仍了解不多。例如原來只知道他住在中南海並有專用游泳池，此外還留有釣魚台賓館12號樓。直到最近看了他孫子寫的《爺爺毛澤東》後，才知道玉泉山還有「他自己的住處」，在1953年就「發現新修了一個游泳池」，並「從自己的稿費中扣除了修游泳池的費用」。[181]（不知是毛新宇錯把中南海的游泳池也移到了玉泉山，還是真有兩個。）

總而言之，個人崇拜（亦即個人專制）説到底是權力的崇拜。當它成為一種政治體制的時候，是必然會有大批人參與的，造神造假也就變成了群眾性的運動。

三、個人崇拜的發展線路

延安整風中個人崇拜建立和盛行的證據如此確鑿，不可能作其他解釋。單一個唱《東方紅》就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馬克思、恩格斯能容許説他們是「人民大救星」嗎？但毛澤東所宗，並非馬、恩，而是斯大林。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還在斯大林造神初期，就一下看出了他的兩面性，説「他在所有行為和言論中都是一個純樸和嚴肅的人，討厭讚揚。」但他實際上卻欣賞個人崇拜（如過分的頌揚，「無數像房屋般的畫像」，偶像崇拜者的歡呼等）。「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推翻這種崇拜。」[182]自認為「中國的斯大林」在這方面可謂竭力模仿。即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對唱《東方紅》、喊「萬歲」和「過

180 見前引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毛澤東遺物事典》，內稱，毛澤東存款「在50年代即達100萬元」。

181 見該書第439–440頁。

182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頁。

分頌揚」之類個人崇拜的表現，也並沒感到惱火，更不用說以後了。只可惜當時延安還沒有條件印製「房屋般的畫像」。事實既然如此明顯，為什麼官方和民間的有關宣傳和著述，不但不承認，而且一直否定從延安整風開始了個人崇拜？這大概除了思想認識上的崇拜情結和毛澤東那時也表現有兩面外，還因為個人崇拜有個發展過程，走了一定的曲線，也迷惑了一些人。

事實上，延安整風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抗戰勝利後，經過整風的幹部就趕赴各地參加爭奪勝利果實的鬥爭。他們在整風中所學，特別是對毛澤東自覺或不自覺的崇拜也就帶往各地的實踐中去了。上引鄧小平早期「兩個凡是」的講話就是證明。而且在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也表現了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超群的預見和膽略，這又進一步提高了他的威信，加強了權力的更加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吳思說的「元規則」──權力最大者說了算（恕我改了兩個字）[183]的作用就很顯著了。所以整風以後的十多年，個人崇拜不但沒有中斷，而且得到了更大範圍和更深入實際的發展。例如這樣的事實總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第一，經過延安整風的幹部，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思想已得到徹底改造，無論是留下還是走出解放區，都是維護和擴展個人崇拜的基本力量。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一類小幹部）都繼續喊萬歲、唱《東方紅》，都認為毛主席精通馬列、一貫正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西安事變是毛主席主張和平解決的，延安整風是為了反對教條主義（共和國成立後又出來了個王明路線）和經驗主義，並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肅反（搶救）運動雖出現偏差但成績仍是基本的，因為抓出了王實味之類一大批托派、特務和取得了以群眾運動進行肅反的寶貴經驗，至於打「AB團」和西路軍失敗等問題，或者不知道，或者歸罪於「左」傾中央和張國燾，

183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的生存遊戲》，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等等，等等。這類事例還可舉出一大堆，我們都是相信無疑的。但所有這些卻都含有個人崇拜的成分和本來就是個人崇拜，都是突出個人和造神造假的結果，因而大多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第二，隨着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個人崇拜也就不斷向全國擴展開來，最後穩定地立足於除港台以外的全中國。對於新解放地區的廣大群眾來說，由於長期的封建皇權主義影響，喊萬歲、貼畫像、相信人民大救星等本來就是容易接受的，何況確實也得到了翻身解放的好處，所以參與和維護個人崇拜的情緒更高。就是包括專家學者在內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像陳寅恪那樣的人恐怕為數不多），也都逐漸習慣和參加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接受了他在文史哲上的「左」傾觀點。例如主動參加革命的吳晗，在1956年前後寫的《自傳》中就說，「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184]至於馮友蘭改寫他的《中國哲學史》（所謂「四十萬言寄所思，欲將腐朽化神奇」），曹禺讓《雷雨》裏的魯大海參加了革命，老舍修改《駱駝祥子》給它安了個光明尾巴等，就是較為普遍的事了。這都表現了思想改造的威力和個人崇拜的情愫，也說明了個人崇拜理念的普及和深入。

還應承認，在個人崇拜理念的普及和深入階段，個人崇拜的實質和造神造假的活動（如黨史教育）更是有增無減，只是並未出現後來那種狂熱現象，造成的後果也不嚴重不明顯，所以不為人們重視。而且緊接着還走了一段曲線，這就是共和國成立前後十多年對個人崇拜的某些收斂。由於蘇聯和國際共運對毛澤東思想及其某些突出個人的做法不以為然，還被懷疑為「東方鐵托」，加之我們自己又正在迎接全國的勝利，所以毛澤東認為需要對個人崇拜有所約束，注意表現出

184 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頁。轉引自《隨筆》2002年第4期，第19頁。

如同斯大林兩面中謙虛謹慎的一面，決定不再提毛澤東思想，做出不祝壽、不送禮、不以個人名字命名地名等規定。這在當時確實起了很好的作用，至今人們還在懷念解放初期那種被詩人柳亞子稱作「東征西怨」的光景。[185]但是實質上的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還在進一步深入和擴大，因此好景不長，很快就被不斷掀起的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運動所破壞。在這期間，蘇聯和全世界都在揭露和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中國黨也跟着批判了一陣。[186]其實這只是一時的表面的現象，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還是要維護斯大林這把刀子和個人崇拜的理念。而且這時中國黨的力量和聲望在國內外都已得到鞏固和提高，對蘇聯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在乎了，還進一步痛恨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和對斯大林的揭露，從而埋下了中蘇兩黨從分歧到破裂的根子。

胡喬木說：「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不說中國的列寧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187]因此，為了防止中國的大小赫魯曉夫以後冒頭，鞭他的屍，他決定先發制人、斬草除根，把那些反對個人崇拜的，「腦後長有反骨的」，反對過自己的，表現不夠馴服的，以至認為會「功高壓主」的和看來不順眼的，不論地位高低，都當作「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準備分期分批消滅之。從反右派到反「反冒進」，從成都會議上提倡有正確的個人崇拜到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張聞天和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已經日益顯露出這一計劃的實施，使個人崇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以至官方黨史也不能不承認開始了個人崇拜。及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更登上了頂峰，從走資派到學術權威，

185 柳亞子詩：「伫看篝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典出《孟子》引《商書》，說商湯征伐，各族人民希望早日解放自己，抱怨被放到後面。

186 如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和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等。

18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

從原有的一切「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到各種「現行反革命」，從人到物（包括各種文物古跡和被認為封資修的東西），全要踏碎。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是個人崇拜發展的必然結果。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188]這有一定道理。既然如此，除毛澤東本人應負主要的直接責任外，其他帶頭製造個人崇拜（胡喬木本人就是為此奮鬥終生）的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歷史責任。

延安整風開始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曾經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造成很大惡果，使中國在各方面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文革」後，特別是撥亂反正期間，這個問題曾引起全國人民的反思，也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由於個人崇拜的經濟特別是政治基礎並未消除，其思想和表現也沒受到認真清算，所以就又以稍有變化的形式被維護下來了。

「文革」後的毛澤東個人崇拜仍長盛不衰

為什麼能長盛不衰

這裏所說的長盛不衰及其根源，主要指以下幾種情況。

一、個人崇拜的社會政治基礎依然存在

我們說過，個人崇拜說到底是一種封建專制性質的政治體制。因此，只要這個政治體制不變，作為意識形態的個人崇拜也是不會消失的，即使小有改變，也屬形式而不影響本質。在封建王朝時代，駕崩後的老王和新登基的皇帝都會受到崇拜，且有「不改先王定制」之

18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7頁。

說。斯大林去世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還在維護個人崇拜。當然，他們在斯大林被揭露後的一個時期，起初還猶豫了一陣並小有收斂，但很快就恢復原狀，還痛恨起了反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赫魯曉夫。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堅持實行的是從蘇聯搬來的一黨專政下的整套專制主義體制，黨禁森嚴，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來一個釜底抽薪，棄專制而行民主，改人治為法治，開放黨禁，實踐馬克思特別強調的出版（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恩格斯直到晚年還說，「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避免批評、想要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189]），個人崇拜也一定會「紙船明燭照天燒」了。但是只要這種體制還存在，個人崇拜的存在和延續（傳宗接代）就成為必然的事。我們國家二十多年前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了對外開放，因此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使世人為之刮目。但必須承認，我們的政治體制依然如故，在有些環節上還有所強化。個人崇拜賴以生存和生長的社會基礎紋絲未動，這是它能夠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二、個人崇拜沒有得到認真清算

個人崇拜從延安整風起在中國盛行了幾十年，可謂根深葉茂，無所不在，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不可能揮之即去。但是「文革」後我們只是進行了短時間和一定範圍的撥亂反正，很快就剎了車。[190]馬克思主義自稱和公認是批判的學說。「辯證法……就它的本

189 1889年12月18日致格•特利爾信，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第471頁。

190 幾位主要領導人1982年6月匆忙做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此，研究和討論建黨以來的歷史問題、黨的領導和毛澤東的功過問題就只能以此為准（後來連決議中提到毛的過也不能講了），對個人崇拜的討論和清算也就嘎然而止。

質說，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191]但是我們對個人崇拜並未進行認真的批判，更不用說深入和徹底的清算了。因此，什麼是個人崇拜，長期以來恐怕人們大多是弄不清楚的。要不然，為什麼八大明確反對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反而越來越凶；十二大更在黨章上寫明「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192]但實際上十二大本身就沒有擺脱掉個人崇拜的陰影，如對毛澤東的繼續過頭歌頌，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等。十二大後維護和宣傳個人崇拜反而比前一陣撥亂反正時期更加興旺起來，黨史上對毛澤東的隱惡揚善、造神造假活動迄未停止。而支持和進行這些活動的，正是黨的前後領導人和掌管宣傳及黨史研究的部門。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們下面還要分別論及。

既然作為政治體制的個人崇拜實為個人專制或個人獨裁，因此維護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也就是爭取民主和維護專制兩種力量和兩大傾向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的性質可以是敵我鬥爭，也可以是人民內部鬥爭，但總是勢不兩立。當年我們同國民黨的鬥爭，口號就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反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在取得政權後，事情隨即翻了過來，我們變成壓制民主和限制自由（事實上而非口頭上），主張專制獨裁，[193]實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從個人崇拜形成之日的延安整風起，維護和反對的兩種傾向就一直存在，共和國成立後更是越來越明顯。1959年廬山會議的一場黨內鬥爭就具有這樣的性質。鬥爭的結果人皆盡知，是毛澤東威權的進一步提高和個人崇拜的走向頂峰，最後進入「文化大革命」。

191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的跋〉〉，《資本論》第一卷1963年版，第23頁。

192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過黨章第2章，《黨的組織制度》第十條第6款。

193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頁）中就把專政等同於獨裁，雖然指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但後來的事實表明卻是第二個《歷史決議》中說的「個人專斷」。

三、個人崇拜一直得到維護

「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又規定了「嚴禁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但實際並未解決維護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因為這是民主和專制的鬥爭，不可能說停就停。當然，某些表現形式會有點變化，如喊萬歲、到處掛像之類，但鬥爭仍在繼續，有時甚至比以前更為激烈。在「文革」末期，毛澤東健在的時候，反對個人崇拜和要求民主的鬥爭就已導致了以悼念周總理為由的群眾運動——天安門事件。維護個人崇拜的人把這說成是反對「四人幫」，恐怕並不盡然。那時群眾還不知道有個「四人幫」，實際上是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總指揮毛澤東。這只要把周毛二人逝世後的群眾反應作一個對比就會明白。盡人皆知，周恩來逝世後有十里長街送別和天安門事件，而毛澤東逝世後卻是比較冷清的(某些單位和少數農村也許例外)。北京除上層爭權顯得氣氛緊張外，在廣大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幾乎是若無其事。因我當時就住在東交民巷，那天直到晚上還去天安門廣場觀看。只見成堆的人在乘涼，聊天嬉戲如常，只有很少幾個人走上金水橋向毛澤東遺像鞠躬悼念。與「文革」初期那種狂熱，真是形同天壤。後來，毛澤東扶持起來的妻子和親信被逮捕法辦，全國城鄉反而是歡呼慶祝。經過三年困難和十年浩劫，人心向背已昭然若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與抓經濟建設的同時，也能清算個人崇拜，進行民主改革，徹底改變與馬克思主義所不容的封建專制體制，如黨管一切、一元化、委任制、等級制、特權制等，那中國就必然會更迅速、全面地走向現代文明，社會也會長期保持真正的穩定。可惜我們沒有抓這方面的工作，像共和國成立後幾十年耽誤了一場經濟發展的大好機會一樣，「文革」後又耽誤了一次政體改革的難得機會，不但恢復了上述舊體制，而且還不斷朝更差的方向發展，如擴張官僚機構、強化控制鎮壓、拉幫結派、親緣政治、腐敗成風等等(把不良風氣說成開放引起的外來影響，純屬藉口)，使今後的政治改革只能越來越困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清明政治，我們這老一代人是根本看不到了。

其實「文革」後，新領導班子執政，為了改弦更張，跳出「文革」的泥坑，大力發展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毛澤東作過一定程度的反思，公開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改變了毛澤東的大部分政策，使中國面貌為之一新，人民生活得到顯著和不斷的改善。但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而言，無論是原先在位的還是重新當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堅持個人崇拜的，因而使維護個人崇拜的潮流雖有波動，但一直佔據主流地位。反對個人崇拜和要求民主的運動固然不時興起，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這只要稍為回顧一下二三十年來的情況就可了然。「兩個凡是」的時期自不必說。而反對「兩個凡是」的力量也是複雜的，起碼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真正反對個人崇拜的，包括相當多的中下級幹部、廣大的知識界和一部分高級幹部。例如在1979年的務虛會議上，有的中央領導幹部就曾對毛澤東進行了尖銳的指責。但在上層中佔主導地位的力量卻主張維護個人崇拜，只是由於要解放領導幹部和改變毛的政策而反對「兩個凡是」。歷史傳統和現實政治形成的這種力量對比，就使中國黨不可能進行清算個人崇拜，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要求的政治民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反思，曾經出現過一個思想稍為解放、言論稍有自由的寬鬆環境，也產生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一些檔案的解禁、政治和歷史問題上不同意見的爭鳴、「傷痕文學」的興起等效應。但時間不是很長，更未真正着手政治改革。而且總的說來，要求民主、反對專制(亦即個人崇拜)的運動還是屢戰屢敗。經過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批判異化等，直到鎮壓1989年天安門的「反革命暴亂」，中國社會就進一步陷入近於萬馬齊暗和管制得越來越嚴的狀態。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大事，多少國家的群眾在用集會結社等各種形式表達自身的不滿和要求，但中國卻始終表面上平靜如水，哪怕是涉及本國和群眾自身利害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最安全」。

「文革」後個人崇拜的主要表現

一、維護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十種做法

「文革」後的撥亂反正，黨的領導人在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的着重點，不是清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是竭力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就是鄧小平、陳雲等主要領導人一再強調的必須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因此反對「兩個凡是」，也不可能是認真和徹底的。例如研究黨史必須遵守兩個《歷史決議》，就是維護在黨史領域的「兩個凡是」。而第一個《決議》連胡喬木都說，它的「作用是把一切歸功於毛主席」，「黨的歷史退到幕後去了，台上只有路線鬥爭」，[194]但對黨史研究和廣大公眾卻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急於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就是為了把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敲定」下來，把迫害到幾乎所有領導人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九個指頭中一個指頭[195]的「晚年錯誤」，從毛澤東思想中剔除掉。所以鄧小平還在復出前就已上書中央：「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196]復出後更是一再強調：「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197]還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198]雖然為了取得公眾輿論的認同，在第二個《歷史決議》及有關文獻和領導講話中，也指出毛澤東的某些錯誤，還專門發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合過去掛得太多……今後要逐漸減少到必要限度。」[199]但是中央主要領導人重視的還是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反映到體制上的特點正是領導說了算和第一把手拍板。因此才使「文革」後的個人崇拜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固然有所節制和減少，而實質上卻繼續受到尊重並有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強對毛澤東的持續宣傳和歌頌。「文革」後即使在撥亂反正(當時的正式解釋就是撥「四人幫」的亂和返回毛澤東思想的正)期間，官方輿論和傳媒主要的也還是正面宣傳毛澤東。當時的平反，不能說某人是堅持真理，反對個人崇拜，或對毛澤東的意見提得對，而是首先為他摘掉反對毛主席的帽子。我自己受命為張聞天起草有關平反文件和為人代筆或自撰紀念文章，都是要一再說明張聞天是衷心擁護而不是反對毛澤東的。許多領導幹部和老幹部找人寫回憶錄和紀念文章，也是表彰毛在各方面和各時期的功績，還夾雜大量誇張、拔高和編造，如我在前幾篇章節中提到的一些人的回憶錄。而且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起，實際上已停止了對毛澤東的反思和逐漸禁止討論毛澤東的錯誤及其造成的災難，使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成為事實上的禁區或變相禁區，如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困難以至「文革」。另一方面卻大大加強了對毛澤東的宣傳和歌頌，有關書籍至今已出版上千種，文藝作品如電視劇也連綿不斷。

二是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移花接木、改寫歷史。這方面的情況我在前面已多次提到。對此，連胡喬木也是承認的。他說，中共中央領導編寫黨史的工作，「到整風時才開始。缺點是實事求是不

194《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85–86頁。

195 鄧小平在1978年11月25日一次會上說，「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但與他的偉大功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外國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能不能像對斯大林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幹赫魯曉夫那樣的事。」(見于光遠：《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中國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頁)。

196《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6頁。

197 引自于光遠：《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第102頁。

198〈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8頁。

199《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內部發行)，第509頁。

夠」。[200] 關於為毛澤東隱惡、開脫和圓謊，還可以再看以下幾個例子。為什麼《毛澤東文集》八卷，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多是兩三年或三四年就編一本，而1959年起的十六年才編了一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共十三卷，1966年以前都是一年或兩年編一本，而1968年以後竟長達八年才編一本？這顯然是因為後來的許多言論實在不便公開，因此就不顧歷史真實而為尊者「諱」掉了。官方黨史著作和傳記年譜還有意隱瞞許多重要史實，如毛澤東向斯大林的一些重要請示彙報、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致毛的一封關係重大的密信等。再如毛澤東倡導黨的三大作風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自己卻並不執行，還說什麼他是不作自我批評、不下罪己詔的。他對同僚有了意見，也從不當面交換，多是選好時機算總賬，一旦提出，對方就有被打倒的危險。對於這些，官修黨史和傳記是並不反映的。延安整風初期，對張聞天就來了個突然襲擊。「文革」初期，對劉少奇則是一舉打倒。作為黨內第二把手的林彪，建議設國家主席，於理於法並無不妥。如果懷疑或肯定他是陰謀篡權，那完全可以面談或開會揭發批判以至通過決議撤職查辦、打倒關押，而不該採取毛澤東自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寫的「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的態度。[201] 至於移花接木，就是黨的領導和黨史界把別人的功績放到毛澤東的名下，把毛澤東的過錯放到別人的籮筐裏。例如在紀念劉少奇百年誕辰時，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一開頭就說劉少奇受林彪、「四人幫」迫害。[202] 這就有點太離譜了。又如說張聞天「完全擁護」毛澤東等「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203] 張聞天主持制定並寫成《瓦窯堡會議決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連毛澤東當時也一字不改地表示「完全同意」。[204] 可到了被稱為中共黨史學開拓者胡喬木的手裏，卻變成不是會議決議而是毛澤東的傳達報告，「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甚至「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205]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創建了十多個根據地、周恩來等人的軍事建樹，都一律被掛到了毛澤東的賬上。甚至連個釋放劉志丹這點好事，也都要歸功於毛澤東，並杜撰了一個「刀下留人」的傳說。上述這些顯然都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形象而改寫歷史。

三是對毛澤東繼續進行美化和拔高。這在「文革」後的黨史研究、各種回憶錄以及各種文藝創作中從來就沒停止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更加大了美化和歌頌的力度。直到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有些黨史著作還無視歷史事實而只憑某些言詞宣傳毛澤東的偉大。例如有的文章說，毛澤東在中共八大時就計劃廢除「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實際上的終身制」（這可能嗎？）；還說一個時期不提毛澤東思想，不是胡喬木說的「因為蘇聯的關係」等原因，而是我們黨已「有了高度的自信」（那1959年後的大提特提是否又失去了自信？還說「這是歷史的辯證法」）。[206] 有的文章說，中共黨內沒有人出來「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只有毛澤東「來倡導」。[207] 前面已經談過這是不合乎史實的。何況深諳毛澤東思想的胡喬木都說，「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208] 許多更重要的不合乎實際的說法竟被定為正式結論。如說，延安整風中康生掀起搶救運動，為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發現和糾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出於為黨為人民而防修反修，只是被林

20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54頁。

20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59、361頁。

202 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203 〈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20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4頁。

205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35頁。

206 見《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10頁。

207 見〈毛澤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載《解放日報》2003年12月22日。

20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7頁。

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了。[209]還有些美化的做法，如提出從1958年起直到廬山會議，毛澤東都在進行「糾『左』的努力」；廬山會議後一年多，毛澤東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人們不清楚「四人幫」是怎樣上台並取得顯赫地位的，卻只見毛澤東總是「批評『四人幫』」；[210]同偉大領袖毛澤東結婚相處40年、自稱為「毛主席一條狗」的江青，竟然早已是反革命。其他如最後改編只剩下七百餘人的秋收起義，被肯定為勝利；而開往井岡山時還有一萬二千人(其中二千主力，一萬農軍)的南昌起義，卻被說成失敗。[211]由於毛澤東參加李大釗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般會員，不出名，受到黨史界的冷落；「新民學會」為毛澤東創建，就被大講特講。

四是對推行個人崇拜的放行、獎勵，對不利於個人崇拜的查禁、處罰。二十年來，有許多美化和拔高領袖、宣傳個人崇拜的作品得到了各種表彰獎勵。而揭露真相、涉足禁區、有礙個人崇拜的作品，輕則查禁，重則處罰(作者被列入不得在報上發表文章的「黑名單」或找別的理由加以處罰；編輯出版部門有關人員可能受到批評、警告、調離、甚至判刑處分)。我們看到，在轉折時期任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甚至二十年擔任黨中央第二把手後兼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很少有電視劇，更不准提他們被批鬥和管制關押的悲慘遭遇。周恩來的電視劇倒不少，但不利於個人崇拜的，如癌變擴散前不准開刀，病入膏肓還要接受無端的嚴酷批判，身瘦僅剩六七十斤時還要躺在床上寫檢查等，就不能在作品中反映。連《潘漢年》的電視劇也歷經磨難，

209 以上兩項，幾乎所有官修黨史和得到官方支持(起碼許可)的論著、回憶錄都持此說。

210 以上引號內的話均為新出版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毛澤東傳(1949–1976)》中的分章標題。

211 李維民：〈南昌起義史實與評價斷想〉，《炎黃春秋》2002年第8期。

最後還被砍掉不少。[212]有些作品還長期被扣押，包括一些著名人物的回憶錄以及已拍好卻遭禁映的有關名人的電視劇等。因反映實際、被認為不利於個人崇拜(直接或間接有損於毛澤東形象)的作品遭到扼殺、槍斃和胎死腹中的數量之多，恐怕是無人能統計出來的。在這種輿論導向和環境所迫下，人們就自覺(可以名利雙收)或不自覺(認為應該如此)地競相創作起個人崇拜的東西來了。這就是為什麼有關毛澤東的而且有許多是不實事求是的論著和作品那麼多、還越來越多的原因。

五是為維護個人崇拜(毛澤東的威信)使歷史上不少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例如當年蘇區在肅清根本不存在的「AB團」等中，錯殺了十萬左右對革命忠心耿耿的優秀兒女(有名有姓的「AB團」七萬多，外加「改組派」兩萬多，「社民黨」六千二百多，[213]還有許多未查出名姓的冤死者未包括在內)，而毛澤東卻始終認為殺得對。共和國成立後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的注釋中還是說，「AB團是當時國民黨潛伏在紅色區域的反革命特務組織。」[214]「文革」後，經過調查研究徵求意見正準備平反，只因總書記胡耀邦下台，遂使問題長期擱了下來，直到現在仍未得到正式平反，有些冤死者家屬曾一直被當作反革命家屬，

212 據該劇發起人曾彥修和潘多年的熟人劉英講，由於個人崇拜思想的影響，或為求得送審時通過，已經刪改了大量史實，如潘的冤案形成，毛澤東不按法律程序的定性、逮捕和關押等，還對二十年的迫害、無端的牽連等，也有意回避掉了，並多少編造了一些不大合乎事實的情節(如潘回延安請示彙報是向張聞天被改為向毛澤東)，弄得本來就不夠真實，但後面幾集還是被完全刪去了。

213 景玉川：〈富田事變平反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0年第1期。文中說的富田事變得到平反是沒有根據的，只能說醞釀平反和在黨史研究中得到平反。文中所說，「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和紅二十軍處置後，『左』傾領導者」如何如何，顯是為毛澤東開脱。實際上，毛是屠殺「AB團」的始作俑者(起於1930年5月，而「左」傾中央上台於1931年1月)和富田事變的製造者。

214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1年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釋34(第242頁)。另見正文第210、217、218頁。

撥亂反正後也享受不到烈士家屬待遇。又如我們一再提到的西路軍遭殲卻被毛澤東說成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215] 這一重大冤案和根本違背事實的結論持續了四十五年，許多當事人如一直強調「不惟書，不惟上，只惟實」的陳雲以及徐向前、李先念等始終都不敢提，直到毛澤東去世八年後的1981年才談起，由李先念主持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3月22日鄧小平批：「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216] 後來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也專門做了說明。但這能算正式平反嗎？為了維護個人崇拜，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冤沉海底！還可舉蒙冤二十六載至死未得到平反的粟裕大將的例子。粟裕是著名的常勝將軍，在解放戰爭期間做出過卓越貢獻。他曾三次提出不同意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的建議，包括反對渡過長江的南進戰略，提出「進行淮海戰役」的建議。[217] 歷史證明，這些建議不僅完全正確，而且均為中央所採納。但是在1958年5–7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卻受到無端的殘酷鬥爭，毛澤東甚至在不久後的一次中央會議上點名說他是軍內的「壞人」，隨即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傳達到軍隊團級和地方地委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粟裕一再提出平反的強烈要求，但直到他含冤去世，中央的訃告中仍無一句提到對他的平反，只是後來軍隊領導人在署名的紀念文章中才說，1958年對他進行了「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218] 不知這算不算正式的平反。

六是不敢正視歷史錯誤，不願接受經驗教訓。民主革命階段在毛澤東當權後，雖然也有不少失誤，但總路線基本正確，因而取得革命

215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98頁。

216 陳鐵健：〈塵封了半個世紀的禁區——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澄清〉，《北京日報》，2002年12月2日，《報刊文摘》，2003年1月6日。

217 朱楹、熊錚彥：〈粟裕對中央戰略決策直陳異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218 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

勝利。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卻執行了一套「左」傾錯誤路線，而且愈陷愈深，使中國走了一大段彎路。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隱匿大家緊跟的責任，硬是要歪曲歷史，造成不少自相矛盾，即許多原來的錯誤，撥亂反正後已經改了，但還要說原來正確。如說，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完全正確」，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農業與手工業合作化又「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219]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現在又要走回頭路，改變「完全正確」的東西，如鼓勵私營工商業和農業包產到戶？而且也無法回答：中國經濟頭二十多年的停滯和改革後的加速發展，原因是什麼？把摧殘知識分子和踐踏科學、破壞生產力和生態環境、餓死數千萬人和製造階級鬥爭，稱作「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220] 這合適嗎？把這說成「開始」，是否表示繼之而來的就只能是「文化大革命」了！至於外交上的重大失誤自然也不少，鄧小平指出的閉關自守和關起門來搞建設總不能否認吧。對內搞「文化大革命」，竟「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221] 這在事實上和邏輯上都是不通的。用「兩個凡是」和「九評」[222] 的觀點寫的新中國外交史和有關問題的專著如《十年論戰》，[223] 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

七是保留個人崇拜的文物和遺跡。建設在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既是個人崇拜的產物，又完全違背毛澤東本人的意願(他曾帶頭簽名提倡火化)。鄧小平也說，「建是不妥當的。」既如此，理應知過必改，但為什麼不改，還要用來繼續製造個人崇拜呢？說是怕「人民

219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其他官修黨史和領袖傳記。

220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221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連胡喬木當時也承認並非如此。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當然對外關係的惡果也很厲害。」(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4頁)。

222 中蘇兩黨論戰中，我黨批判所謂「蘇聯修正主義」的九篇文章。

223 吳冷西著，得到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1999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以四號字印行。

就要議論紛紛」(其實，只能是少數領導人的議論)。那原來說天安門前的斯大林像「要保留」，[224] 後來不保留了，就不怕「人們議論紛紛」？看來還是要盡可能堅持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大約出於同一原因，各地的毛澤東紀念館和故居還在不斷擴大和修飾。韶山、西柏坡等都不斷擴建，成了學習瞻仰聖地和旅遊參觀景點。天安門城樓的畫像永遠要保留下去。[225] 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還把毛澤東的像印在百元鈔票上(許多國家的紙幣上都有人頭像，但不是只突出一個人，既有皇帝和領袖，也有其他歷史名人)。以前印的毛周劉朱，還有點集體領導之意，後來就只突出毛一個人了。還有引起學界不滿的一件事是，大力提倡具有明顯個人崇拜思想和江青「三突出」手法的某些樣板戲，大肆花錢恢復歌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藝作品和其他文物。

八是放縱和誤導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某些回潮。例如產生於1986年前後的一種被稱為「尋找毛澤東」的社會現象，[226] 其實多半是體現了部分青年對某些現實問題的迷惑與不滿，如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經濟波動，領導幹部的特權等，因而懷念毛澤東時代表面上的「公平和穩定」。一些人試圖通過理性的思考，從毛澤東那裏尋找到一種理論來解釋現實；一些人則借唱已往的革命歌曲包括毛澤東的語錄歌以抒發激情。有些「左」派人士，對此不是向前引導，而是拉向後退，誤以為這是人們希望恢復毛澤東體制的表現，因而乘機大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可事實的發展表明，並沒有出現一個他們希望的「毛澤東熱」。「尋找毛澤東」既未導致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高潮，還很快無結果而終，甚至有不少人走上了反腐敗要民主的道路。至於大唱歌

224 以上所引均見〈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0–351頁。

22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頁。

226 以一批青年作者撰寫的《尋找毛澤東》一書(吳方澤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代表，再加上一時盛行的吟唱老的革命歌曲和群眾中對毛澤東時代的某些懷念，曾被一些「左」派人士和宣傳部門喻為「毛澤東熱」。

頌毛澤東的歌曲，也是流行一時聲漸歇。而工農群眾中對毛澤東的懷念還表現為神化和迷信的行為，如為避免交通事故在汽車上掛領袖紀念章，為保四季平安在家中供奉領袖像，甚至傳說和相信毛澤東生日韶山曾發生「龍光射鬥牛之墟」的現象，等等。這既反映了群眾的懷舊感情，也是一種愚昧的表現，更重要的是說明個人崇拜的陰影還嚴重存在。我們的宣傳部門，雖然尊奉無神論和科學觀，但因這些社會現象涉及的是毛澤東，自然不容討論和解釋，客觀上是對個人崇拜的鼓勵。

九是繼續保持和增設有利於維護個人崇拜的禁區。不准批評領袖就是其中之一。對領袖以至所有領導人，一切黨員和公民都可進行監督和批評，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因此就是斯大林、毛澤東也從沒說過他們不能批評，相反，說可以批評和歡迎批評的話倒是更多些。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在世時，誰批評就會以反黨甚至反革命論處。現在對斯大林可以自由批評了，對毛澤東有一陣也允許以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決議》為限進行半自由的批評，只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限制越來越嚴。更重要的是，這一不許批評領袖的個人崇拜標誌還傳了下來，即後來的領袖更不容許批評。例如現在中國的傳媒，似乎對毛澤東還可稍作批評，因有《歷史決議》可循，但對其繼承者，就不准批評了。這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建黨學說，也違背黨章規定，而且不合乎鄧小平的言論。他就不止一次說過，毛澤東的一些錯誤他也有份，中央過去做錯了的事，他有責任，對他能作「六四開」他就滿意了，等等。他還說過，周恩來也做過違心的事，說過違心的話(這也應分清真偽，還歷史本來面目)。那為什麼對這「四成」錯誤就不能進行公開討論和分析批評呢？這種做法，必然妨礙接受經驗教訓，使一些錯誤得不到改正。如果當初毛澤東的錯誤一出現，就會受到批評和監督，中國也許不致吃大躍進、「文革」等那樣的大虧了。不准批評黨的領袖和一些領導人，正是個人崇拜得到維護的一個重要表現。

十是把有助於維護個人崇拜的規定寫進黨章、憲法及其他法定文件，只讓黨員和公民學習與遵守，不得討論和提不同意見。黨章規定黨員必須遵守黨綱黨章，但不是說不能對黨綱黨章進行討論和提不同意見。否則黨章(憲法也一樣)就只能是一次完成、永遠不能變更的了。這樣一來，以後的每次修改都失去了法理根據。總不能說，與時俱進地修改黨章、憲法和某些文件，只能是少數領導者的事，廣大黨員和公民只能接受和遵守而不得發表點不同意見。不允許討論黨章、憲法、某些文件以至「重要講話」，這是既不合理(馬克思主義和普遍的民主原則)，又不合法(剝奪黨員和公民應有權利)，因而不應列為禁區的。

二、鄧小平在「文革」後維護個人崇拜中的作用

(1) 鄧小平是撥正中國發展方向的歷史巨人

鄧小平自稱是繼毛澤東之後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因此他在處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上也起了主要作用，並帶有明顯的兩重性。他以大無畏的膽識和勇氣，糾正毛澤東的一系列嚴重錯誤，破除毛澤東許多違背潮流和脫離實際的烏托邦思想；但他又堅定不移地以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為名維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保持毛澤東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

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都是中國的偉人。毛澤東實現了中國的獨立統一，使「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鄧小平則扭轉了中國千年來停滯和落後的局面，使中國開始走上振興和崛起的道路。舉世公認，自漢唐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就一直在世界上領先，但封建專制制度卻使經濟發展長期停滯，在西方產業革命後，中國經濟所佔世界比重更迅速下降。新中國成立後，下降的速度反而大為加快，就是我們在前面一再說過的，從1955年經濟恢復時的4.7%降到1980年的2.5%。由於國力不強，無論當年我們怎樣自誇，國際影響終究有限。例如我們對美侵犯我領海領空曾警告過三千餘次，不但沒人理會，還變成了國際笑話。由此可見，單是「站立起來」，如果吃不飽飯，就直不起腰，甚至有摔倒危險(也確曾處於崩潰邊緣)。鄧小平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時代特徵，執政後立即決定以發展生產為中心，改革經濟體制，實行對外開放，使中國擺脫了兩千年的經濟停滯和大饑荒的週期輪回，也使我們告別了長達三十年購物靠票證和排長隊的短缺經濟，像我這類幹部也起碼不必如同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再為下放勞動時會成為餓殍而擔心了。雖然我們的綜合國力仍然有限，經濟總量的世界比重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前的水平，但世界上已談論起「中國威脅」，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也許應該說，鄧小平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確乎前無古人，實際上大大超過了毛澤東。

鄧小平的偉大倒不在於創造了被一些人歸結為完整體系的新理論，主要的還是能緊跟世界經濟發展潮流而不受教條主義束縛的實踐。他不管馬克思列寧怎麼說（這方面的著作，他也確實讀的不多），不管「兩個凡是」，不管「鳥籠經濟」，不管姓資姓社，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有利於經濟發展，就可借鑒，就可試行，從而拋棄了由斯大林創建、為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給中國找到了人類文明必由之路的經濟市場化。這也是中國志士仁人二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道路。單是作為促進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已足以名垂千古。但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不是沒有缺點錯誤和不允許黨和非黨群眾批評的。

(2) 鄧小平又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主要維護者

鄧小平推倒了毛澤東時代的僵化經濟體制和各項有關的清規戒律，使中國經濟得到空前大發展。但他又堅守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實際上成為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主要維護者，使中國失去了一個解決個人崇拜問題的好機會。

前面一再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個人崇拜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體制問題。所以解決個人崇拜問題也就是進行政體改革，實行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應該說，「文革」後，不但對經濟改革，而且對政治改革，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經過十年浩劫，廣大幹部群眾對個人崇拜體制可說已深惡痛絕，對毛澤東的崇拜也明顯下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四五」群眾運動就是證明。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同「兩個凡是」勢力的鬥爭中，鄧小平得到人民的普遍擁戴，對他寄予巨大希望，要求他出來工作，祝願「小平，你好！」那時他也和人民站在一起，提倡解放思想，強調實現民主，[227] 反對特權和特殊化，反對以黨代政和第一把手說了算[228] 等等。他不但為天安門「四五」群眾運動平反，而且開始時還支持西單民主牆，說是「群眾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229] 葉劍英甚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230] 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原有的特權和等級制尚未恢復，新獲「解放」的幹部要求還不太高，全國上下都在興高采烈、意氣風發地撥亂反正、重整乾坤。這時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中央領導，如能順應民意、開放黨禁、進行政改，不但不會影響穩定，而且可以實現大亂後的大治。在人心思定、群眾怕亂的情況下，既是進行政改的好機會，也容易恢復舊的政治秩序。可惜當時採取的是後一種方針，即維護毛澤東的政治體制和思想管理，當然也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是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就一直強調的，並

227 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說，「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4、146頁。

228 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1、329、332頁。

229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4–145頁。

230 引自胡績偉：〈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2004年2月23日）。文內稱，「可惜葉帥的這兩句話，在以後正式印發的三中全會文件中，被胡喬木刪掉了。」

為此作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決議》），二是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在「文革」後百廢待舉的情況下，要急於做出一個《歷史決議》，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個人崇拜，而維護個人崇拜又是為了恢復「文革」前的政治制度，包括以黨治國、領袖專政和接班人制、領導職務終身制和變相終身制、幹部委任制和變相委任制、等級制和特權制，以及由此滋生的特權階層。[231] 鄧小平一再明確指出，作這個決議的「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232]「闡述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233] 陳雲更直截了當地說明了急於作決議的原因：「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一錘子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234] 這個決議雖說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但還是按照中國政治體制的運行規矩——領導說了算，起主要作用的也就是鄧小平、陳雲等少數幾個人。鄧小平不同意，即使多數人的意見也會被推倒。據我所知，這種情況當時就不少。還在起草過程中，就得一切按他們的意見辦。例如鄧小平一次就說，「決議草

231 「文革」前中國就存在一個特權階層，這是連胡喬木也承認的。他說，「如果承認那些（指我們長期以來對蘇聯變修的批判）對蘇聯特殊階層的分析，那就要承認我們中國也有。」（《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4頁）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鄧小平還指示成立一個以胡喬木為組長、宦鄉為副組長，由有關機構借調二三十人組建的「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任務就是研究蘇聯是怎樣變修的，編寫一本《社會帝國主義論》（書名未定）。我也奉調參加了這一工作。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大家一致認為，這一任務無法完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如果斷定蘇聯變修是出了一個特權階層(許多同志認為確實存在)，那就得承認中國也有，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超過蘇聯。這樣寫出來的書等於變相批判自己。二是談蘇聯變修就必須算斯大林的賬，這又違背我們維護斯大林這把「刀子」的方針。所以最後只好寫報告建議解散這個小組。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23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7頁。

23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9頁。

234 轉引自《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5頁。

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235] 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就只能說，「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236] 這當然不是站在幾百萬含冤受屈者和幾千萬因人禍而餓死，以及因經濟落後和災荒而受苦受難的全國城鄉廣大群眾一邊，而是要竭力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以《歷史決議》為個人崇拜的長盛不衰打下了基礎，定下了準繩。

其次是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恢復和鞏固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體制。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237] 可胡喬木卻說，「實事求是來說，毛主席在八大以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怎麼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在黨內有時可以暫時地表面上得到多數的接受，但是實際上多數同志是不贊成的。」[238] 這就出了一個問題，「肯定」「文革」前的十年，是肯定毛澤東的思想呢，還是肯定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就一再說明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思想上來，為此還把對現代文明的重要價值觀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稱作「自由化」，而加以堅決鎮壓。[239] 原先所提四項原則中的「我們堅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顯然已經過時，沒人再談了。至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黨的領導」，[240] 問題就複雜到誰也說不清。在當代中國，連什麼是無產階級都無法界定，還談什麼專政？而且根據過去和現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

23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7頁。

23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2頁。

237《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0頁。

238《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4頁。

239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5頁。

240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8–171頁。

的實踐，正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哈諾夫、盧森堡、考茨基等已斷言的，蘇俄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的專政和黨的領袖的專政，是黨的領導者專無產階級的政。普列哈諾夫還進一步認為，「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分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他們又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而「工人就其教育、文化程度和世界觀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水平……時，馬克思本人也會立刻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241] 現在歷史又前進了八十多年，世界變化之快和之大，也是普列哈諾夫無法想像的。難道馬克思主義還只能限於百多年前的水平，而不應也不會再發展了？至於「共產黨的領導」，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歷來都是不清楚的。延安整風確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一直實行的都是一黨專政和黨管一切。而且「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就是要全體公民都得遵守，都得堅持。[242] 因為堅持就是服從，這樣一來，於是信仰、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實際上就都沒有了。宗教信徒也都得「堅持」無神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四個堅持」實質上就是堅持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領導正是抓這麼兩件事，一是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一是毫不鬆懈地抓反對「自由化」，[243] 而且兩手都要硬。於是就出現了兩個結果，一方面獲得經濟大發展，引起世界矚目，另一方面卻出現了政治改革（即民主化）的嚴重滯後，導致腐敗成

241〈普列哈諾夫的政治遺囑〉，俄《獨立報》1999年11月30日，中文譯載於中共中央編譯局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輯。編者按指出，此《遺囑》的真實性「尚有爭論」。

242 黨的原則按道理只能要求黨員遵守，寫進憲法，說明黨是凌駕於憲法之上的。

243 在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有的老領導同志（據說是陸定一）不同意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難道還有無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當即反駁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所以要「反自由化」。他沒有點那位老同志的名，但後來卻對外國人說，「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分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1–182、211頁）。

風和特權階層迅速發展。但是經濟和政治不協調發展狀況是不可能持久的。鄧小平自己就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244] 而且豈止難以貫徹,還為轉型期的權錢交易和掠奪國家資產提供了機會。

所以總起來看,鄧小平對中國歷史留下了兩份遺產:堅持改革開放,集中發展生產,實現經濟市場化;維護個人崇拜,禁止言論自由,扼殺政治民主化。

三、維護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表面理由和真正原因

這裏所說的維護個人崇拜,一直都是指實際上而不是名義上。在名義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個人崇拜就遭到批判,十二大以來的黨章更加以明文禁止。但實際上,個人崇拜卻至今不衰,主要表現為對個人崇拜不許認真批判和清算,對毛澤東只能隱惡揚善和盡情歌頌,以至繼續造神造假。一言蔽之,就是大力保全前面談過的那些標誌和表現,只是名之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

既然二十多年來的歷次黨章都明文禁止,那麼要在實際上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得講出道理來。歸納起來,表面上所提理由大概有以下幾條。

一是因為毛澤東的功大於過,所以要堅決維護。鄧小平就一再說,「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245] 對此絕對不能動搖。起草《歷史決議》應遵守諸如

24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頁。

245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6頁。

「宜粗不宜細」、「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基本方面還是對的」[246] 等這樣一些原則。這當然談不上實事求是。因為共和國成立後的總路線和許多重大事件都是事實證明根本錯誤的。再如寫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決議》,為什麼陳雲卻要建議加寫此前的二十八年?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向社會主義(1958年起更要向共產主義)過渡,合乎馬克思主義嗎?把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和響應號召「幫助整黨」肯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的猖狂進攻(錯誤只在擴大化),合乎歷史事實嗎?列寧說,「要辨明政黨鬥爭中的是非……主要不是研究各政黨關於自己所說的話,而是研究它們的行動。」[247] 以此衡量,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後的行動,就是反右派運動,以及不斷的階級鬥爭;在《論十大關係》(還是經過胡喬木等人的多次修改,直到毛去世後才公開發表)報告後則是大躍進引起的經濟全面比例失調,這能算作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理論貢獻和重要思想嗎?至於功過三七開或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量化或形象說法,其實在多數場合下只是為掩蓋錯誤和罪責的一種遁詞,是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和汲取不到什麼教訓的。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許多,其目的都是要盡量肯定和拔高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和功績,以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二是對毛澤東的錯誤(有些對人民的摧殘已不能以錯誤論)不能揭發更不能清算,否則就是否定毛主席。由於毛是我們黨的領袖,所以否定毛就是否定黨的歷史,就是給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抹黑。[248] 這種說法正好把毛澤東擺到了「朕即國家」的地位上。不然為什麼否定一個人就是否定歷史,就是給黨和國家抹黑?難道一個人就等於歷史、

24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2、295、297、296頁。

247 列寧:〈論俄國各政黨〉(1912年5月),《列寧全集》第18卷,第30頁。

248《鄧小平文選》,第二冊,第301–302、306、308頁。

等於黨和國家？秦始皇被批判(否定)了兩千多年，不但秦漢歷史沒有被否定，中國也沒有從此變「黑」。陳獨秀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並連任五屆總書記(稱呼也還有主席、委員長等)，後來被否定了，但卻既沒有否定歷史，也沒給黨抹多少黑。何況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對毛澤東都並不存在「否定」的問題。鑒於過去長期的個人崇拜及其留下的有害影響，對毛澤東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是極為必要的，特別是一貫的為尊者諱、隱惡揚善和造神造假，已經搞亂了歷史。為人民負責，為歷史負責，便於汲取教訓，以利教育後人，對歷史問題應該還其本來面目。該肯定的，堅決肯定，該否定的也不必怕揭瘡疤。既然講實事求是、光明正大，就完全不必隱瞞歷史(包括依法解密檔案)和暗設禁區。提出「否定」「抹黑」這樣的大帽子，實際上就是使人們不敢離開規定好的統一口徑，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評論。

三是「穩定壓倒一切」。這是長期以來一直在講的。對於這個提法的妥當與否，這裏不擬討論，而只是談一下，允許研究和評估包括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等在內的歷史問題，是否就會破壞穩定、影響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的大局。從中外歷史和長期效應看，情況倒是往往相反，在經過爭鳴弄清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後，局面可能會更加穩定，人民也會更加團結。遠的不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情況就是鮮明例證。當時並沒有怕「否定」毛澤東就會天下大亂，而是大膽地陸續否定了毛澤東一生中所幹兩件大事(推倒「三座大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和毛澤東思想兩大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後人將這部分從毛澤東思想中剝離出來，既違背毛澤東本人的意思，也不合乎有關的理論原則)，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後推行的路線(名義上的肯定是不真實的)，包括窮過渡和一公二純的改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右派(保留幾個以示正確，完全是人為的)和知識分子改造、反右傾和「四清」以及反修防修等等。所有這些不能說事情不大，但其結果卻是擺脱了「文革」造成的混亂和「內戰」，實現了政局的穩定和人民的大團結。

為了以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為名、實際上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提出的理由還有一些，也不能說都完全沒有道理。有些問題的討論，從表面上和短時間看，是會影響一定範圍的安定團結，但從實質和長遠看，結果卻並非如此。例如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爭論就很激烈，有些發言也很尖鋭，但影響所及也並未動搖全國抓經濟建設的大局。所以上面列舉的三條或其他類似的理由，都看似有道理，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而且勢必要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例如說，「1966年本來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年調整得到迅速發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幫』一鬧，經濟受到了嚴重破壞。」[249] 這合乎歷史事實嗎？沒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們能「鬧」得起來嗎？沒有毛澤東，又哪能出現什麼林副統帥和「四人幫」？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壞事都歸之於林彪、「四人幫」，毛澤東只負發動之責且有諸多糾偏之功，恐怕是當代中國最不實事求是的一個流行公式，根子就是一切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既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際上破除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極左路線，抓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是那樣大得人心，進行順利，為什麼不去趁勢穩步但徹底地清算個人崇拜，從政治體制到意識形態上完成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任務，而一定要百般設法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對這個問題，茲根據個人現在的認識，提出以下幾點想法。

第一，是為了維護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也就是維護黨的領導和聽黨的話。對此，除了上引鄧小平解釋撥亂反正的説法外，胡喬木也講得非常明確。他說，「在講到現在的時候，稿子着重地講，我們現在所執行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都是毛主

---

249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1頁。

席確定的。」[250] 鄧小平在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也提醒說，「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251] 其實，不論叫作體制、路線，還是四項基本原則，關鍵的關鍵就在於維護黨的領導。保證了黨的領導，其他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黨的專政。這是斯大林老早就已作了明確說明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工具。」「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252] 如果進一步看問題的實質，那麼黨的領導、黨的專政，實際上也就是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的領導和專政，並且從上一直貫徹到基層。例如車間、商店和村莊，就是支部書記對本單位黨員和廣大非黨群眾的領導或曰專政。所以，黨的領導就是掌權，而權又是哪個階層、哪些人(例外只能是個別)願意自動放棄的呢？

第二，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個集團行為。既然維護個人崇拜就是維護黨的領導，而維護黨的領導已不是個別人的意願，而是名為全黨、實為有一定權力的幹部們的要求。所以鄧小平說，「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253] 其實，前面兩個通不過，是說不清楚的。例如說老工人通不過，有何根據？那是否說新工人就可通過？至於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我倒有親身體會。我曾在不同地區做過三四年土改工作，看到在分得土地後，貧下中農確實高興、積極參軍支前的情況。但等毛澤東掀起「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搞全面合作化時，多數農民就只是服從，勞動積極性明顯下降。到人民公社化，那已屬強迫命令了。1960年我下放安徽六安縣蘇家埠勞動改造，每天每人的原糧供應只有老秤(16兩一斤)三兩，餓死人自然是普遍現象。當地的主要作物玉米已長到兩三尺高時，由於行距不合規定的「密植」(毛澤東倡導的「農業八字憲法」中的一項)標準，上級勒令一律鏟掉，重新播種。雖然那年風調雨順，施肥充足，卻因貽誤農時而顆粒無收。有些淳樸的貧下中農就暗地裏問我：「毛主席為什麼這樣心狠，就是不讓我們吃飽飯？」(問這類話的有當時就是黨員的貧農子弟，至今還和我有聯繫。)應當說，農村合作化後全體農民都已被折騰得夠嗆了。廢除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包產到戶，得到農民熱烈歡迎，就足以說明一切。連新老工人、新老農民的真實情況和意見的反映都遭到查禁，可見說他們「通不過」只是想當然而已。只有「一大批幹部通不過」，可能是實情。因為革命勝利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獲得或大或小的特權，而且上下相依，官官相護，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特權群體。他們反對民主改革，反對「自由化」，維護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和思想，應當看作是自然的事情。在這方面能夠集中反映他們意見、代表他們要求的領導人，就會得到他們的擁護和頌揚。而有所違背他們的利益，例如主張限制特權、搞點民主改革和輿論監督等的領導人，就會被他們設法推翻以至打倒。他們反對政治改革，但一般還支持經濟改革，使權力進入市場，可讓家屬接班或下海。所以他們及其代表，維護個人崇拜的專制體制是必然的。這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

第三，當個人崇拜成為政治制度的時候，就「改也難」了。鄧小平就幾次提到這點。例如他說，「單單講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54] 鄧小平在這裏沒有說明

250 胡喬木：〈關於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起草情況的說明〉，《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25頁。

25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5頁。

252 分別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43頁；第八卷，第27頁。

25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8頁。

254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7頁。

這個「制度」的含義，使人弄不清怎麼連毛澤東也被不好的制度推向了反面。但在另一地方，他暗示所說的制度就是個人崇拜制度。他說，「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255] 很明顯，對這個問題，鄧小平和以胡喬木、胡繩為代表的官方黨史編纂學派都有難言之隱，因此只能點到為止，不能深究，致使許多黨史專家至今沒有談清楚這個「制度問題」。看來主要就是延安整風開始形成的一套成文和不成文的體制和規矩。例如延安整風培植了一種說真話吃虧和說假話佔便宜的規矩和風氣，共和國成立後隨着個人崇拜（亦即獨斷專行）的迅速發展，這股風氣也就愈刮愈烈，從農業合作化和大躍進，說假話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已變成主流作風。所以在大躍進宣告破產、饑荒開始來臨的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一再呼籲、指示，以至以個人名義給從省委到小隊長級幹部寫信，提出要使「下情上達」，「要講真話」，承認「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256] 這些大概都算「好話」吧，但結果不僅絲毫沒有見效，而且到下半年的廬山會議已發展到整個中央委員會都說假話了。原因確是制度不容說真話，而執行這個制度最堅決的就是毛澤東本人。說了不多幾句真話的一大批人遭到了滅頂之災。先說了幾句真話，後來一看大事不好，很快改為說假話的許多人，也都轉禍為福。始終說假話的人，更是彈冠相慶，地位上升。不知鄧小平講的「制度」問題是否包括這一內容，但上面提到的黨領導一切（即全面專政）、一元化（簡化為黨的第一把手說了算）、終身制、接班制、委任制、保密制、輿論一律等等，當屬制度問題無疑。個人崇拜正是建立在諸如此類的制度的基礎上的。要保持和鞏固這些制度，就必須在實際上維護個人崇拜。

25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8–309頁。

256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29日），〈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167、237頁。

第四，有個責任分擔和榮損與共的問題。鄧小平、陳雲等在處理歷史問題時是把他們和毛澤東連在一起的。他們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作。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257] 這就是說，過去的「貢獻」除毛澤東外，也有他的戰友的份。那麼責任也自然一定共同承擔。他說，「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着又自相矛盾地說，「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258] 但不管是自覺或被迫，對過去的錯誤總是逃脱不了一定的責任。所以他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惟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1958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259] 這已經說得很明顯，因為我們大家都有責任，所以必須評論從寬，例如說反右派是正確的，只是錯誤在擴大化；大躍進，大家都頭腦發熱，因此在寫歷史時對這些就一定輕輕帶過，「宜粗不宜細」。至於「文化大革命」，由於後來的領導集體多是受過迫害和壓制的，所以可以全盤否定，責任都推給林彪、「四人幫」。殊不知大躍進、反右傾造成的經濟損失、生態破壞、死亡人數都大大超過「文化大革命」。這都說明，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實際上也就是保護自己。這同樣表現在關心對個人的歷史評價上。毛澤東晚年最擔心的就是怕出「赫魯曉夫」，如同否定斯大林那樣否定他。上引陳雲的話也說得明顯，否定了毛澤東，也會連我們這些人都給否定。所以說，還是領導人子弟接班比較好，起碼他們不會「挖祖墳」。可見，人們多是不願承擔錯誤責任、進行自我批評和放棄既得

25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2頁。

258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8–309頁。

259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7頁。

利益的。例如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定，除不畏高壓拒絕了投票的陳少敏一人外，與會者全都舉手同意。事後對此有所檢討的，似乎又只有胡耀邦一人，至今尚未見到其他與會者本「只惟實」的精神表示過悔過。

第五，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維持政權的正統和體制合法性的需要。毛澤東長期擔任黨的「一元化」領袖，又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不算先後給他加的其他桂冠，如黨的創始人、從建黨起即為一條正確路線的代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座里程碑等，單是頭兩項就足以說明，他是中國黨和國家正統的合法的代表。根據封建禮法，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要被他認為是反對和背叛他，那也就成了反對和背叛黨和國家；維護他的地位就是維護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永遠忠於他就是盡忠黨國，甚至是保持晚節的基本條件。在這種傳統信念和不斷加強的宣傳下，對所有部屬的要求就只能是「從一而終」。[260] 所以對毛澤東的態度涉及全體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晚節忠與不忠的問題。誰肯落個不忠之名？一些老的領導人在「文革」中受盡折磨，但後來一得到「解放」或恢復工作，就提出維護毛主席的歷史地位，表明他們是不記個人恩怨、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的。照他們的說法，這是為了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這倒是個值得很好反思和細加討論的問題。忠於人主是封建社會為臣之道的第一條，難道現在也應該這樣做嗎？似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國家人民的利益主要是過去追隨領袖東征西討的患難情誼和知遇之恩以及後來的地位和待遇，而不包括全中國經濟文化的落後、生態資源的破壞、幾百萬人的被錯整以至無數人的被錯殺、幾千萬人的被餓死等問題。那不是把代表人類理性、良知、美德等的共產黨看成舊社會的幫派了嗎？

260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8月5日陶鑄以老戰友的身份致書黃克誠，裏面提到，「我們作為一名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轉引自馮建輝：《走出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

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文革」後的新領導不能不推行雙重政策。一方面，為了集中搞建設、實行改革開放以及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不能不拋棄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和與之相關的各項具體政策，對毛澤東的錯誤也必須作適當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得借助鍾馗，用經過新解釋的毛澤東思想改正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同時反對任何被認為有損於毛澤東政治體制的所謂「自由化」。所以即使完全改變了毛澤東的做法，如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大鍋飯）已完全放棄，但歷史上還要堅持原來做法的正確、偉大。上世紀八十年代，維護毛澤東和反思毛澤東同時進行，既有歌頌，也有批判。第二個《歷史決議》就是主要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但又不得不對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工作缺點和錯誤，特別是所謂「晚年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作一定的交代和批判，並指出毛澤東的責任。進入九十年代，這種情況又發生重大變化，實際上成為：對毛澤東只能肯定和頌揚，而不許反思和批判了；共和國成立後的重大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討論，實際上被劃為禁區；主流宣傳工具經過長期工作逐漸建立起毛澤東一貫偉大正確的史論體系（如大學原來開設的稍為開放的《中國革命史》課程已為《毛澤東思想概論》所代替）；輿論控制越來越嚴；造神造假更加風行，等等。發生這一轉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雖然帶來客觀上有利於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一面，但也對現行體制帶來很多不利因素，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影響到局勢的穩定。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這一變化的轉折點和兩種情況的分界線。此後的發展，問題更是越來越多，如三農問題、下崗就業問題、貧富差距拉大、政治改革落後、幹群關係緊張、權錢交易和腐敗成風引起更多不滿，以及擔心全球化和「西化」的衝擊等。對待這些問題，在現行體制下，只能緊急收縮，加強控制，對歷史問題也只可正面宣傳而不許談論錯誤和總結教訓了。二是為了顯示現有政權和領導的正統與合法，必須強調道統和法統的繼承性。如果說，「文革」後的第一代領導及其核心還是開國元勳和功臣，因而有一定的「資格」對黨的歷史和毛澤東本人作些反思

和評論的話，那麼，後來的領導就沒這個「本錢」了，只能更加依靠權力的交接，因此就得對毛澤東多作正面宣傳。但對毛的宣傳和研究，肯定他的偉大和正確，重點主要放在民主革命時期，共和國成立後則盡量淡化。因為這個時期實在沒有太多可宣傳的。例如在提倡繼承毛澤東的偉大傳統時，一陣曾強調「兩個務必」(指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務必保持謙虛謹慎和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但共和國成立後破壞「兩個務必」影響最大的正是毛澤東。驕傲自滿、獨斷專行，這是上了《歷史決議》的；別墅遍全國，歸個人支配的稿費收入「文革」前已超過百萬(單是《毛選》，「文革」前印行二百多萬冊。「文革」十年印行三億多冊)。生活並不儉樸，例如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4月制定的西餐菜譜就有魚蝦十七種之多。[261]

最後，個人崇拜在中國可說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涉及社會各方面。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並非只有上層領導人，而是包括了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經過長期的宣傳和實踐，我們自己把毛澤東送上了神壇，而「請神容易送神難」，要使毛澤東離開神壇，沒有巨大的決心和堅決的措施是不行的。上列各條正是說明，領導不但缺乏這種決心和措施，而且還在設法維護。但是問題還有另一方面。不只上層領導，廣大幹部和群眾因長期受蒙蔽而產生的對毛澤東的崇拜和熱愛即使歷經磨難，也不容易改變。這就使維護個人崇拜容易，而禁止個人崇拜較難。何況在政治和思想界始終存在一個影響極大的「左派」，不僅堅持維護舊的政治體制，還極力阻撓經濟體制的改革。主流派既要在擴大開放和摒棄「鳥籠經濟」或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

261 由汪東興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載有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和廚師為毛制訂的西餐菜譜，內有鐵扒桂魚、莫斯科紅烤魚、烤蝦圭……(共17種)。內無豬肉，是保健醫生建議，因豬肉含膽固醇高。另見2003年8月1日《湘聲報》載李隆漢:《歷史切誠失真》，批李爾重著文說毛主席困難時期「拒絕吃豬肉」;還可參閱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編著:《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694–702頁。

改革開放問題上同他們鬥爭，又要在反對所謂「自由化」等問題上不能不借助他們的力量。這都說明，維護個人崇拜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傳統力量大大超過要求政體改革和言論自由的力量。這也是個人崇拜長盛不衰和造神造假繼續通行的根本原因。

四、個人崇拜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

(1) 從一篇〈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談起

2003年9月25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的文章，[262]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其中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是對毛澤東一些已有定論的缺點錯誤進行翻案，不顧史實地為個人崇拜加碼。例如文中批評了那種「認為毛澤東只重視生產關係的改變，不重視生產力的發展」的觀點，而認為「毛澤東是重視發展生產力的。他更重視依靠社會主義制度來發展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就把發展生產、實行工業化作為整個工作的中心，這就是常說的『一化三改』。」還強調「毛澤東始終認為」，「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這實質上是批駁和推翻鄧小平的以下論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263]而且作為過來人，歷史上並沒有見到把發展生產力定為根本任務這回事，否則共和國成立後我國經濟佔世界比重怎麼會一直大幅度下降，

262 是馬列所課題組在《人文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篇)》欄發表的第二篇文章。

26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6頁。

如同鄧小平所說，被周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大大超過了。[264]還有，既然毛澤東早就把「發展生產力、實行工業化作為整個工作的中心」，那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還談得上「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265]嗎？文中其他有些論斷也是頗令四五十歲以上的人感到吃驚的。例如：「毛澤東探索出的這條工農業同時並舉的工業化道路……不僅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還開創了世界上第三條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先驅。」「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主要表現在，他提出過保存和發展一些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事實上，1956年後正是從「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急速向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轉變，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哪來的什麼「新經濟政策」？不過文中指出，「多數學者認為，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理論，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沒有能在毛澤東時代開花結果。」該文沒有說明這些錯綜複雜的原因是什麼，是不是因為大家沒有照毛的理論去做？如同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得到毛澤東高度讚賞的林彪講話中所說，「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266]

264 他說，「拿中國來說，50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我們封閉了20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時候變成了經濟大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4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直到195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仍超過日本，但到1979年前，中國經濟就已不到日本的1/4。「從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看，1957年中國分別為日本的140.85%和20.13%。到1965年中國僅分別為日本的78.32%和10.83%。在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比日本低7.3%，人均收入的增長比日本低50%。」（見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73頁。）

265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5頁。

266 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97頁。

提出這篇文章和引證這麼多，是因為覺得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作為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最高學府的一個研究理論的課題組（不是個人發表意見），提出這樣的研究報告，究竟意味着什麼？要把中國的理論研究引向何方？對國家人民有何益處？是理論研究的進步還是大倒退？都是發人深思的。而且這篇文章還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說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確實長盛不衰，造神造假運動還在向高層次發展。二是現在提倡的正是搞個人崇拜和造神造假研究，否則不會被批准為課題、領到課題費和得到公開發表權。因此我們決不能懷疑參與課題的許多學者的理論水平和史學良知，重要的恐怕是只能在規定的框架內研究和寫作。見一葉而知秋，從這篇高級科研成果中就可窺視到當前理論研究甚至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是怎麼回事了。當然也會有些例外，如考古學等。

（2）個人崇拜種種

上面所談個人崇拜長盛不衰的原因，着重的是指當權者的需要和引導。這也確是很重要的，因為正如我們曾經引證過馬克思的名言：「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系統治階級的思想。」[267]但是作為一個統治思想，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普遍的信仰。個人崇拜之在中國，不但毛澤東在世時得到普遍的追隨，保持清醒的智者是極少數；就是毛澤東去世後一直到現在，仍然還得到相當多幹部和群眾的崇拜。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各人參與個人崇拜，都是既有共同根源，如歷史傳統、宣傳教育、紀律約束、習以為常等等；又有特殊情況和不同的動因，如有人純屬思想認識，有人是隨大溜成為習慣，有人為了保官，有人為了升遷，有人為報知遇之恩，有人則因已無退路，有人出於自願，有人帶有勉強，有人真有感情，有人虛與委蛇，等等。當

267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0頁。

然，對每個人來說，往往各種因素混為一體，並不完全單純。所有這一切，就匯合出一種「熱愛領袖」的個人崇拜氛圍，和政治體制緊密結合，並且進入法制化。例如開會喊毛主席萬歲，屬人人必須遵守的禮儀；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過去即可法辦以至處決，現在也會受到一定的懲罰。在這種近似「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即使內心不贊成個人崇拜，也很難公開反對。這種情況大約無人不曉，只是各有各的看法。下面隨便舉幾個例子，稍為說明一下問題的複雜性。

先從中央領導人說起。是否中央領導同志像他們表現出來的那樣，真心誠意崇拜（迷信）毛澤東，我看不見得。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經驗，會認為毛澤東一切都正確，應當亦步亦趨，大概這是誰都不會相信的。「文革」中，誣劉少奇是內奸，連許多普通黨員都不以為然，作為民主人士的宋慶齡、章士釗還上書毛澤東為劉少奇辯誣說情，而中共的高層人士像周恩來、朱德、陳雲、陳毅等竟然相信無疑、投票贊成，這能是真的嗎？大約毛澤東和林彪也是佯裝相信。鄧小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268]我看絕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恐怕從延安整風後就已接受了過去的教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特別是從1956年反「反冒進」以後，對毛澤東就只有服從和檢討。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過，已看到許多當時不大理解的現象。例如作為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對宴請某些外國元首的國宴應請哪些人作陪和上些什麼菜，都要「請主席批示」。「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到這種程度還要經常挨批評。現在才知道這是個人崇拜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什麼許多開國元勳和久經征戰的統帥會幾十年如一日地在一些（不是一切）問題上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呢？這就是延安整風開始創立的一種不成文法：不但說真話

268 〈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8頁。

吃虧，而且不說假話不行。例如張聞天和彭德懷是以反對個人崇拜聞名的，但是如前所述，他們都曾不同程度地參與過製造個人崇拜，也跟着說過不少假話。廬山會議後的多次檢討就可肯定不是真心實話。推廣開來看，大約中央領導同志沒有一個不說假話的，特別是在「文革」期間。以我本人親自參加和聽到的而言，我就不信周恩來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呼的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說江青與魯迅同為三十年代文藝界在上海的兩面紅旗，這些會是發自內心的真情。恐怕連在座的毛澤東和江青也是不會相信的。被許多人認為豪爽率直的陳毅，1968年2月28日以親筆書寫的大字報，批判外交部耿飆、黃鎮等聯名保他的「91人大字報」，說這「是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對我改正錯誤毫無幫助……我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不同意」云，能是真話嗎？毛澤東本人也不例外。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他明明是由於在所謂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懷疑和反對林彪的，但又不明講，表面上還裝作同林彪一致，背地裏卻指名和不指名地向高級幹部和外國人大講林彪有篡黨奪權的野心與活動。[269]又如所謂「1966年7月8日在滴水洞」給江青寫的著名長信（內容有表示不滿林彪的許多言行，林彪叛逃後才在黨內傳達），到底是什麼時候寫的，什麼意思，一直是個謎，連楊尚昆到死也弄不清楚。[270]後來官方和黨史編纂學還說，此信當時就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還委託周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271]這是否說毛對周的信任超過林彪？那為什麼還選定林做接班人，卻不斷地整周？而極為精明的林彪此後怎麼竟敢對抗最高指示，反而進一步大搞其對毛的個人崇拜？這恐怕是製造出來的千古之謎。

269 參閱《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三十章「林彪事件」。

270 見〈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1997年3月22日）〉，原載《百年潮》1998年第6期，後收入《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271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19頁。

這裏還可再舉葉劍英的例子。1967年初他在群眾大會上幾次提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説，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説林副統帥除因槍傷使神經稍受損傷外，身體也非常健康。還説，毛林作為馬恩、列斯後的國際共運中第三代搭配，是最合適的，水平也達到最高峰。這都是在全國傳達了的。但這是真心話嗎？誰會相信毛主席能活150歲？在「文革」前他的詩中就有「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後來整理葉的詩稿時問他劉亭長指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曰：毛主席。熟悉中國典籍的葉帥，當然知道中國文人歷來看不起劉邦，晉人阮籍就説過，「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272] 把毛澤東比做劉邦，大概不是出於崇拜。葉劍英第一個稱呼華國鋒為「英明領袖」，同樣不會是出於崇拜。至於他傳達1966年批判羅瑞卿的三月軍委擴大會議時套用辛棄疾的《賀新郎》：「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對此，羅瑞卿女兒點點曾不指名地罵他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愉悦」和「縱欲後的滿足」。[273] 其實，除兩人關係原有點疙瘩[274] 外，看來主要還是為了劃清界限和表白自己而「詩意大發」地説假話。行文至此，使我想起1943年在軍委駐地延安王家坪桃林開搶救運動大會（因我的所在單位編譯局屬軍委系統），葉劍英主持會議時的講話和呼口號，現在看來也是虛應故事，因為這時連他

272 毛澤東在滴水洞給江青的信中就引過這句話。不過毛本人倒是賞識劉邦、朱元璋這類遊民出身的皇帝的。

273 見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15—216頁。我也親自聽過葉劍英作批鬥羅瑞卿傳達報告時引用這句詞。按辛詞原句為「將軍百戰身名裂」（指漢李陵）。葉改「百戰」為「一跳」，指羅瑞卿在挨鬥期間跳樓自殺未遂。當時説這是「自絕於黨」，故曰「身名裂」。

274 例如據《黨史文苑》2004年3月載文稱，葉劍英主政廣州時，公安部逮捕了省市公安局千餘人，葉向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羅答：「那是你的想法，我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後經周恩來説明，也無濟於事，「那位公安部長放下電話更為震怒。」此事自然會對葉留下不大好的印象。可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

自己也被懷疑有問題。[275] 可見延安整風創建和普及起來的這種説假話之風多麼嚴重，以致發展到帶有全國性。特別是「文革」期間，雖然不能説全國上下都不説真話，但假話確實極為普遍，連鄧小平「永不翻案」的檢討也完全是假的。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個人崇拜體制造成的某種上下都説謊，恐怕也是國之大害。

這種不説真話的風氣，並不是人們願意這樣，而是鄧小平説的制度問題，對許多人講是出於不得已。在大躍進期間謊報產量、「放衛星」就不能完全歸之於各級幹部的品質和簡單説成頭腦發熱，主要是當時形勢逼出來的。例如黨內多數幹部並不同意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但還得跟着走。[276] 不但黨的領導人，就是許多同情和支持黨的著名民主人士，在個人崇拜的體制下，也不得不繼續跟着黨（也就是毛澤東）走。例如宋慶齡，從肅反、反右派、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她都有不同意見，但除了內部慎重提點意見外，既不能公開反對，更不能出走。另如柳亞子，原來可説抱負非凡，在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時竟唱出，「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共和國成立後認為對他安排不當，開始還發點牢騷，後來連詩文都懶得寫了，但也只能和黨同舟共進，沉默以終。

延安整風造成的假話成風，絕不是説它掀起的個人崇拜也是假的，沒有得到領導層和廣大幹部群眾的響應和追隨。恰恰相反，要真是這樣，個人崇拜也搞不起來。對多數人來説，對毛澤東的崇拜確是真實的。我自己和像我這樣的所謂「三八式」幹部，在延安整風後多已把「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當成了天經地義，把毛澤東的指示奉為圭臬，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和共和國成立後頭幾年。八大以後一些人

275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頁。

276 胡喬木也承認，八大以後毛澤東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實際上多數同志是不贊成的」，「只是表面上得到多數的接受」。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4頁。

思想上雖有變化，但由於全國造神運動的不斷高漲，所以就整體而言，毛澤東的權力和威望反而越來越高，越來越變成神。有些高級領導人，不管受到多大委屈，但對毛澤東的崇拜卻至死不變。為了說明個人崇拜思想的根深蒂固，下面還可舉文武各一的兩位名人為例。

一位是被他女兒稱為「共和國元勳」[277]的羅瑞卿，1938和1939年在延安時曾是我們抗大總校的副校長。在我看來，那時他對毛澤東並沒有個人崇拜。例如每次會上(那時的晚會、紀念會、報告會特多)，他對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稱呼都一視同仁，如果要請毛澤東講話，就介紹說，「現在請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講話。」對其他幾位書記也一律如此。所以恐怕還不能說羅瑞卿在參加長征「以後的日子裏逐漸成為毛澤東的忠實朋友」。[278]但延安整風時他已跟得很緊。在1945年二三月批判彭德懷的華北工作座談會上，他是表現特別積極的一個。他七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6年八大當選中央委員)，解放戰爭時任兵團政委，共和國成立後出任公安部部長，並負責毛澤東的保衛工作。他緊跟和堅決執行毛澤東在肅反問題上的「左」傾路線，曾秉承毛的旨意，親手處理潘漢年和胡風兩案。對潘案，周恩來(未直接出面)、李克農、羅青長等都認為是冤案，並由李、羅等具名提出五條「反證」。但羅瑞卿還是積極按毛的意志辦，而且連累了不少人。至於株連2100多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更是個人崇拜體制下一個「惟上」的典型。毛澤東以言定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後，惟有公安部和中宣部堅決緊跟。例如1956年下半年開過一次三長(公安部部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聯席會議，後兩個單位的領導認為，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定性的法律根據不足。經中宣部文

277 見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封底的「簡介」。不知羅能否用此稱號。

278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第19頁。按毛澤東在世時，朋友、戰友稱號只能用於林彪，連周恩來都絕對不能用。

教處副處長王康反映，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陸定一已同意開次領導小組會再談談，時間定了，通知也發了，可周揚說，「胡風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麼能夠討論？」結果會就沒開成。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展後，公安部領導又一次召開「三長」會議，討論如何審判問題。時任中央領導小組副組長的羅瑞卿在會上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有密切聯繫的反革命集團是勉強一些，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因此最後說，「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吧。」[279]在共和國成立後的肅反運動中，羅瑞卿緊跟毛澤東製造的冤假錯案，恐怕要以百萬計。他在八大發言中就承認，1951年肅反「在若干地方發生過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錯誤」，「1955年下半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也發生了缺點和錯誤」，如某些單位鬥爭面過寬，鬥了少數不該鬥的人。[280]朱正根據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所提供的有關數字，說明這次肅反肅錯的達130餘萬人。[281]

羅瑞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更重要的還是表現為對毛的至死不變的無限忠誠。他為隨時隨地保衛毛，50歲學會了游泳。對毛的親屬在安排工作和照顧生活上也做到無微不至。毛也完全把他當家臣看待。例如1960年12月25日，毛曾對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說，「今天在座的，受過我批評最厲害的是汪東興同志，除他之外，還有羅瑞卿同志。我罵過他們，要他們從房子裏滾出去。」「但是他們從來不恨我。聽羅瑞卿說，這些批評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這樣能使他謹慎

279 夏永安：〈胡風事件留下的思考〉，《炎黃春秋》，2003年第8期。該文據李輝所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另見馮東書：〈「犯正確」與「緊跟錯」〉，《同舟共進》2004年第6期。

280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283頁。

281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9頁。

小心一些。」[282] 但是這位不大講情面的毛澤東，卻為了籠絡林彪，在1965年把他打倒了，後來製造出了一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羅瑞卿不管怎樣受批鬥遭關押，對毛的忠心毫髮不變。就在那次自殺未遂寫給妻子的遺書中還鄭重叮囑：「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在坐牢五年後，當得知彭德懷和他住在同一排病房時，竟頗不以為然地對探視他的女兒說，「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做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麼來和他比？」[283] 1973年底，羅瑞卿獲得釋放。毛澤東去世後，他從外地「心急如焚」地趕回北京，在向遺體告別時「泣不成聲」，在天安門舉行的葬禮上又「傷心欲絕地站立了一個多小時」。他女兒評論說，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爸爸對毛澤東的信任和愛戴從未動搖過」。羅瑞卿復出後，在擔任了軍委秘書長的同時，「還擔任了毛澤東紀念堂管理委員會的主任。」[284] 羅瑞卿對毛澤東的忠誠和崇拜，實在可以稱得上「從一而終」。至於對潘漢年、胡風等案以及肅反中肅錯的成千上萬的人民，倒沒聽到過他有什麼反思。

另一位是在領導崗位上影響中國文藝以至文化整半個世紀的周揚。周揚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闡釋者，是最早將毛澤東文藝思想解說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的組成部分並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列的人，因此得到毛澤東的重視與重用，逐漸走上文藝的領導崗位。延安整風中，他可算得領導幹部中的積極分子，在魯藝搶救的「特務」據說超過教員學生的半數。1944年春節鬧秧歌中有不少人是戴着「特務」帽子參加演出的，其中就包括演《兄妹開荒》的王大化。抗戰勝利後在去東北的行軍路上他曾同我一起打過「前站」。

282 黃瑤：〈1965年：羅瑞卿挨整內情〉，《縱橫》2003年第10期。

283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第203頁。

284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第314頁。

共和國成立後，周揚成為全國文藝戰線的具體領導人，一直推行毛澤東的歧視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以文藝為黨的宣傳手段的「左」傾政策，影響文藝界出大師級的人物和原有大師級人物沒寫出大師級的作品，再加上他的派性，不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錯整過好多人，還造成文藝界長期的不團結。文壇宿將李一氓，[285] 不止一次地向我談到，中國文藝界的不團結，周揚、夏衍一幫人有重大責任。他們把派性從三十年代的上海帶到抗戰時的延安（分為以周揚為首的魯藝派和以丁玲、艾青、蕭軍等為代表的文抗派）、重慶。共和國成立後他們又處於全國文藝和文化界的領導地位，就使這種派系鬥爭一直延續下來。例如馮雪峰被錯打成右派，就只是因為夏衍提出上海灘三十年代的老賬。周揚自稱在文藝領導崗位上經過五十年，「沒有一個人的時間比我長」。[286]

他深得毛澤東器重，對毛也極有感情。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在駐蘇使館工作，他出國訪問期間曾來使館做過一次報告，其中提到毛澤東對他的批評（記不清是在《武訓傳》還是什麼問題上）。他檢討說自己沒站穩立場。毛說，我看你的資產階級立場站得很穩。對這一連我當時也認為是很重的批評，他卻講得輕鬆愉快，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讓人感到他同毛的關係非比尋常。後在十年浩劫中受了九年多批判、審訊與關押的殘酷折磨，也未動搖他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1975年5月林默涵解除監護分配江西豐城縣鋼鐵廠，6月24日寫感謝信給毛澤東。幾近失明的毛於7月2日聽秘書讀後，即摸索着寫道，「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治病。久關不是辦

285 李一氓，1925年入黨，曾參加北伐和南昌起義，和周恩來一起介紹郭沫若入黨。上世紀20和30年代受黨派遣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為創造社成員，1930年同潘漢年等組成文委，曾負責同魯迅聯繫。後進入中央蘇區在紅軍中工作。去世前為中顧委常委、古籍整理小組組長。為夏衍好友，夏的《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即由他題簽。

286 郝懷明：〈了猶未了的《周揚文集》〉，《百年潮》2004年第4期，第22頁。

法。」[287] 最高指示一下，「文藝黑線」上的主要人物都獲得釋放。同獄的夏衍和周揚同時得到通知。夏衍後來談到這一情況時說，「周揚這個人，對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我接到通知，當天就辦手續出獄。我問周揚，他說，我等幾天，給毛主席寫封信。」周揚經過此劫，在整人等問題上確有點大徹大悟，出獄後提的第一個建議就是為馮雪峰恢復黨籍，後來又親自去探視馮，真誠道歉，以致兩人抱頭痛哭(但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仍耿耿於馮雪峰奉中央指示從陜北到上海遲遲不見他們)。他不但見到一些被整的文藝工作者當面道歉，而且在大會上也明確地說，「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對不起大家……」因此，人們「都同情了周揚，諒解了說真話的周揚。」[288](其實也不儘然，丁玲就沒有諒解。)而周揚雖然對於執行「左」的文藝政策和傷害過很多好人感到內疚和懺悔，但他對毛澤東無意見，「還多次對人談起，不能事事推給毛主席，自己是文藝戰線的一個指揮員，有自己的過錯與應負的責任。」[289] 1981年1月一次談話中還說，「現在有種傾向，懺悔，他上了當了，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算了。」[290] 在1980年編《周揚文集》的一次談話中，他「還深情地回顧說，自己的相當一些文章都是毛主席看過的，他看過的，我有一種特別的感情，要特別尊重他。」[291]

周揚還真有點「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精神。1983年紀念馬克思百年誕辰時，他竟涉足理論這個「雷區」，侵入胡喬木自認是他的領地，結果被打下馬來。(據李銳說，夏衍曾親口對他講，周揚那篇談異化的報告，如果署上胡喬木的名字，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在製造和維護個人崇拜上，胡喬木的作用更大，但對毛主席的忠誠即內心崇拜，卻遠不如周揚。據我個人和一些友人同胡的接觸，以及他發表的談話(特別是收集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二集和《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中的一些談話，更不用說許多私下談話了)，他對毛存在明顯的兩面性，內心並不真誠崇拜，但由於始終以維護毛澤東個人崇拜安身立命，所以還取得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闡釋者之名，研究毛澤東和中共黨史的多數人更是以他為宗。

現在周胡兩人都已作古，但卻分別應驗了中國一句老話:「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1980年周揚應大家要求找了幾個人編《文集》。1983年的異化問題風波後，《文集》的編輯出版就「波詭雲譎，命運多戾」。「中宣部有關領導指令出版社必須從書中撤下(那份談到異化的報告)，方可出版」。結果，編好壓了十年的《文集》第五卷，總還是在周揚逝世近六年後的1994年8月出版了，印數只300冊！[292] 至於有關他的其他文史資料以後還會不會有單位搜集整理，就不得而知了。但胡喬木逝世後卻是另一番光景。中央批示成立了專門的「《胡喬木文集》編輯組」和「《胡喬木傳》編寫組」，長駐玉泉山，除三卷文集外，已編輯出版《喬木文叢》六種和《回憶胡喬木》等書。周揚、胡喬木都是至死致力於個人崇拜的人，死後待遇迥然不同，正好說明了個人崇拜體制的規矩和威力。

以上所舉羅瑞卿和周揚的例子，絕不是說至死忠於毛澤東的就他們兩人。實際上這種典型可說成千上萬，有的是。例如著名詩人蕭三，1967年在獄中《敬呈毛主席》的三首絕筆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我以一死謝主席，九泉盼得紅太陽。」「毛主席萬歲，獄中喚千

28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第441頁。

288 韋君宜:〈十六、記周揚〉，《思痛錄》。

289 榮天璵:〈周揚與郭沫若的交往〉，《百年潮》2002年第11期。

290 郝懷明:〈了猶未了的《周揚文集》〉，《百年潮》2004年第4期。

291 郝懷明:〈了猶未了的《周揚文集》〉。

292 郝懷明:〈了猶未了的《周揚文集》〉。

遍。」[293] 這都是說明個人崇拜作為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頑強以及至今長盛不衰的原因。

結束語

關於個人崇拜的章節，寫到這裏已經很長了，因此原先計劃寫的「六，禁止個人崇拜任重道遠」，就不準備寫下去了，但有些話還想再着重一提，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一、如何看待個人崇拜的長盛不衰

個人崇拜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非法的。因為自十二大以來，歷次黨代會通過的黨章，都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但是如同我們上面所講，十二大以後直到現在，單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仍然長盛不衰。至於新的個人崇拜，不屬本文所談範圍，因而不擬論列。只是可以肯定，它還會以不同形式繼續存在着，並且作為體制還得到不斷的加強與鞏固。

對於十二大至今是否還存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人們的看法也有根本的分歧。黨的領導和宣教部門以及正統的史學界，大概認為並不存在，因為上述對毛澤東的隱惡揚善、弄虛作假，就是在他們的指導下或者直接由他們製造出來的。一些有關毛澤東的影視片和書籍，只能由他們策劃和審定，否則根本出不來。例如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紀念攝製放映的電視劇《延安頌》，肯定是經過中央批准和由有關部門（如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還有專設的「重大歷史題材審查小組」）策劃並審定的，因此其中許多違背史實的造神造假情節自

293 蔣力：〈噩夢中的蕭三〉，《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

然是故意那麼做的。這不是宣傳個人崇拜又是什麼呢？[294] 這樣做會受到批評還是表揚，就無須深究了。如果把我們前面列舉的個人崇拜現象，解釋為屬群眾對領袖的熱愛，因而不算個人崇拜，那「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廣大群眾對毛澤東的狂熱，更是出自對領袖的熱愛，而且要比現在搞個人崇拜的一些文人虔誠得多。這樣一來，世界上也就沒有個人崇拜了。《建國以來歷史決議》的批評和黨章的明文禁止，豈不都成了無的放矢？其實，分清是不是個人崇拜並不難，只要同中央的批評和我們上面列舉的標準一對照就可一目了然。在實踐中宣傳個人崇拜卻不認為是個人崇拜，不但說明個人崇拜思想意識的根深蒂固，而且也證明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已被改造成個人崇拜體制下的馴服工具和螺絲釘。

二、關於判斷一些史實的是非問題

毛澤東生前所做的許多事，即使把至今還不願解密和有意只公開對個人崇拜有利部分而諱去不利部分的大批事件除外，就是真相已經基本弄清的歷史事實，也還有個是非判斷問題，即評估當時的政策和做法是對還是錯。對這些問題，持個人崇拜觀點的人也會和其他人有根本的不同，並得出相反的結論。例如「窮過渡」，歷史事實證明，不但廣大幹部和群眾是始終不同意的，就是許多中央領導也有不

294 早在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就已指出，「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歌頌仍有一些過於突出個人，不夠實事求是；紀念文章多了一些」等。並批評說，「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掃除封建主義遺毒。」（見《三中全會以來》（上），第507頁。）而電視劇《延安頌》以及此前的《長征》等，恰巧同中央這一指示的精神背道而馳，不但刻意突出毛主席，而且在一些眾所周知的著名史實問題上有意弄虛作假（我曾在《同舟共進》2004年第2期上發表過一篇〈釋放劉志丹與痛說三門峽〉，對這種現象有所批評）。《延安頌》之類的文藝作品和理論著述（像我們上面提到的那篇〈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顯然是在對抗中央上述指示，繼續宣傳個人崇拜和「封建主義遺毒」。

同看法，如上面引證過的劉少奇、張聞天、彭真、楊尚昆等。從實際效果看，「窮過渡」(大鍋飯)阻礙中國經濟、科技、文化發展二十多年，影響還應以百年計。因此，這是犯了「左」的嚴重錯誤，應當無庸置疑。但是中央決議和正統史學的結論卻完全相反，肯定為：「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295] 這樣一來，毛澤東主觀主義搞的私營工商業改造、農業合作化、消滅個體經營(包括小攤小販)，就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和應用，或曰「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296] 但三十年後，鄧小平卻說，什麼叫社會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現在才解決。」[297] 這不是太明顯的自相矛盾嗎？這種歷史證明錯了的事，後來多已得到改正(如取消了農業合作化，鼓勵個體經營，私營工商業也獲得合法等等)，但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就只能把錯誤說成正確。為此，毛澤東還發明了一個理論，即不能以現在的政策反對我們過去的政策。換句話說，現在看來是錯的也要承認當時是對的。這樣一來，當然就一貫正確了。而且由於這妨礙汲取教訓，遂使同樣的錯誤以同樣的形式不斷重犯(如肅反)。這種明明歷史和實踐已證明是錯了的，還要想辦法把它們說成是對的甚至是偉大的創造和貢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可以說俯拾皆是。不但對內政策如此，對外關係也並無兩樣。例如在毛澤東思想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指導下，使我國實行閉關鎖國二十餘年，喪失了世界經濟科技大發展的好機會(鄧小平多次談到)。但這一原則至今仍被抬得很高，被稱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中「三個基本方面之一」，全黨和全國人民還得認真學習和運用。[298] 許多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事，在這一原則下都可以變成正確的。毛澤東對內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豪。其實，在國際關係中又何嘗不是這樣，許多做法和說法都是不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的。特別表現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上，並成為導致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例如1958年炮擊金門，不但事先沒同軍事盟國蘇聯協商，而且連招呼也不打(沒通知)，但又要借重人家的影響，有意給外界造成一種似乎炮擊金門是中蘇協商結果的印象，事後在就此事進行的中蘇會談中又一再辯解，還故意把事情說混。[299] 這當然不合乎受軍事同盟條約約束的國際關係，更不用說當時中蘇還是所謂「兄弟國家」。可以肯定，斯大林在世時這類事情是絕對不敢做的。問題在於，這樣做不但不被認為是在盟國關係中不守信義，反而被加以肯定、強調為毛澤東「獨立自主」方針的體現。

三、關於黨章規定和實際執行問題

既然黨章上明文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那麼，每個黨員不管思想言論上是否同意，行動上對這一規定都必須加以遵守了。然而實際上卻正如我們上面所列舉，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仍然長盛不衰。按道理，違反就要追究，就要依情節輕重進行處理。但是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有誰見到和聽到過這種事情？有什麼人因為過頭地歌頌、拔高毛澤東或吹捧其他領導和上司而受到批評，更不用說處分了？實際情況難道不是恰巧相反？凡是「過於突出個人」的理論文章、文藝作品及其他形式的崇拜，大多得到表彰獎賞，起碼發表出來是通行無阻的；而實事求是地研究領袖的優缺點和反對個人崇拜的產品，不說挨整，連發表的機會也很難得。事實告訴人們，絕對不要

295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3頁。

296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3頁。

29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261頁。

29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47，49–51頁。

299 沈志華：〈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5頁；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第二節〈四方的盤算〉。

以為黨章有規定，就會在實際上得到執行。而應該估計到，在個人崇拜的體制下，除了有關紀律約束和專政鎮壓的典章外，不但黨章，連憲法許多條文都不過是一紙具文。例如黨章規定的選舉制度，得到認真執行的有多少？有時還走點形式，更多場合連形式也不顧。過去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任命某人任某職。現在改為「中央決定」某人不再任某省（市）委書記，改由某人擔任。有時在開會選舉前，一些領導人已奉調上任了，哪裏管什麼黨章。又如《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可是誰能享受到？淩駕於《憲法》之上的執政黨宣傳部卻可以隨時規定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以至履行司法職務，查封報刊、處理從業人員等，這又是根據什麼法制？

四、破除個人崇拜的主要障礙是一元化的人治

我們一再重複，個人崇拜主要是個體制問題，也就是鄧小平說的「制度問題」。

所謂個人崇拜體制，就是一黨專政下一元化的人治，誰或哪些人權力最大，他或他們就說了算，所訂黨章、憲法及其他規章制度主要是為了對付下面的，最高領導人和領導層可以不遵守，即毛澤東說的「和尚打傘」。有什麼法律在什麼時候能限制毛澤東呢？延安整風和召開七大，沒有遵守黨章，那麼七大和八大以後的黨章是否得到遵守了呢？沒有任何人敢於做出肯定的答覆。而且直到現在，黨章許多規定仍等同具文。請問，誰能享受十六大黨章上規定的黨員的權利，譬如在「黨報黨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討論」？[300] 對中央某項政策有不同意見並提出改正建議（更不用說批評了）的文章，在黨報《人民日報》和黨刊《求是》上能得到發表嗎？（列寧時期的《真理報》不但允許

300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條(二)。

而且提倡）。連反映真實情況的《中國農民調查》都遭禁，[301] 遑論對黨的政策提不同意見！不但黨章（也有憲法）如此，在個人崇拜體制下，許多對領導有限制的規章制度和重要講話，都是沒有甚至不準備兑現的。例如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經政治局同月31日討論通過）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302] 其中所提「着手」解決的問題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和「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少宣傳個人」，「搞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等等，有哪些着手解決和認真落實了？事實是大多數問題此後倒是越來越嚴重。1982年1月13日，鄧小平提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303] 結果又如何？後來吃「皇糧」的人反而越來越多，許多農村多到農民實在養活不起的程度。有些部的兼職領導人還利用職權設法不斷大量製造可以享受終身待遇的副部長，使官多成災。至於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正式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看來也是基本上沒有執行的。如果黨章黨規得到遵守，怎麼可能發生由中央全會選出的總書記，會被一些退休老人參加的生活會或通過幾個政治局常委就給撤掉？因此，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黨和國家實現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也就是鄧小平批評的第一把手說了算。個人崇拜的盛行不衰，就是以這一制度為基礎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本身正是人治的必然產物和表現之一。人治不但要治現實，而且要治歷史。黨史不可能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例如七大以後的二十多年裏，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一直明確定為第二把手和領袖的接班人，名次也一直排在周恩來之前，但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

301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曾在《大河報》上連載，不料中途（2004年2月25日）該報聲明：「接上級通知此書連載不再繼續。」2004年1月該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而且既不公開，也不講道理）。據說起因於某離職大員批評該書「以偏概全」，有些事與事實不符云。

30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0–343頁。

30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96–401頁。

中，卻不知經過什麼手續和出於什麼原因，在一切正式文件和講話，以至印鈔票中，都把劉少奇排在了周恩來之後，並成了不知出自哪個部門但卻必須遵守的規定。這也是人治大於法治的表現，是主要領導人可以以感情代政策、以個人恩怨處理歷史的又一證明。

五、解決個人崇拜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民主和法治

前面一再說過，個人崇拜是封建專制政治制度的產物，因此，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解決。否則只是在黨章上寫一句「禁止」，不但是緣木求魚，而且黨章本身實際上還是在提倡和鼓勵。例如在寫有「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黨章，卻堅持聯共過去搞個人崇拜的一種做法，在黨章前加寫名曰「總綱」的序言（起始於延安整風後的七大。劉少奇當時就說，這也是「吸收了世界工人運動中最好的經驗」[304]）。把《序言》的權威放在正式條文之上，就是為了便於實行人治。由於這個《序言》並非條文的東西，因此可以任意發揮，講一些同黨章相抵觸的內容也可以。例如其中對毛澤東思想的描述就不夠實事求是，含有明顯的個人崇拜因素。如說它是中國「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在它的指引下，「建國以後，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等。此外還增加了新的個人崇拜內容。根據現行黨章，黨員只有服從（個人服從組織等），而無任何自由可言。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沒有自由也就談不上什麼民主。我們黨從列寧那裏搬來了黨處於秘密狀態下特別強調集中的民主集中制。連胡喬木也承認，那樣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集權制，秘密狀態下和執政後黨的活動原則，「這應該是有非常大的原則的不同」。[305] 何況中國黨在延安整風中又作了「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306] 的發揮。實

304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22頁。

305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2頁。

306 見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8頁。

際上「在集中指導下」，也就沒有民主了。所以在提倡解放思想、進行撥亂反正期間召開的十二大，曾認真慎重地取消了這句話。[307] 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又恢復了這一提法。[308] 這不只是一點文字變動，而是意味着本來就不多的黨和國家民主生活的升降和泯滅。沒有民主，當然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法治。

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即胡喬木所謂的特殊階層），是維護集權制和個人崇拜的主要力量。他們掌握黨和國家的實權，上下一體，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組成一個嚴密和穩固的統治網絡。馬克思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變成他們對工農和知識分子的統治。而他們的利益則是同民主與法制相抵觸的。例如他們就不允許有馬克思特別強調的新聞自由，不願意制定公開官員及其家屬財產的立法。當初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們，曾經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流血犧牲，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爭取自由和民主。但是奮鬥的結果，在取得勝利的一切地方，最後都變成了取消自由民主的斯大林模式，培育出了一個維護這一模式的特殊階層。這就使社會主義運動從蓬勃興起到走向衰落、從高潮進入低潮，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重大特點。沒人能否認得了，中國是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大概也沒人能否認得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至今並無重大突破，不少方面反而比過去更嚴重了，致使一些工農群眾頓生懷舊之情。在這種情況下，要禁止和消除個人崇拜（包括政治體制和指導思想），其困難之大，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誠可謂任重道遠。起碼我們這一代不可能看到問題的解決。

但是，社會總是要發展，歷史總是在前進，中國也總不能老是用改經濟不改政治的一條腿走路，政治體制改革不論是遲是早、是快

307 見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總綱」。

308 見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11月12日）。

是慢，總是勢在必行。而且政治民主化已成時代潮流，和經濟市場化一樣，都是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的主要內容與必由之路。要把中國建成現代化的文明大國，就必須破除以高度集權制為主要特徵的個人崇拜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至於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失去的將只是它所佔的統治地位，作為一種信仰還會和宗教一樣一直存在下去。例如對待斯大林，總還有人認為這把「刀子」不能丟，要為他辯護和「平反」，以及對他保持懷念和個人崇拜。這類現象大約一百年以後也不可能完全除掉。但是可以肯定，無論蘇聯解體後的變化多麼詭異，在俄羅斯決不會再恢復斯大林模式，也不會讓《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再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指導思想。產生於二十世紀的斯大林個人崇拜在二十世紀就已基本結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再喚回了。

中國必將在二十一世紀內或遲或早地趕上時代潮流，成為具有現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被馬克思主義稱為自由人聯合體的民主大國。開始於延安整風的毛澤東個人崇拜，也必將在國家現代化的長期過程中得到解決，只是由於封建專制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悠久，所以解決的時間也會拖得更長一些。

第十六章

延安整風與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建立



什麼是一元化領導

從延安整風起，中國共產黨就一直實行着一元化領導。除台港澳外的全國人民，也已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以下簡稱一元化)下生活了五六十年，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還要更早一些。我們幾代人在一元化下度過，但不一定了解一元化的來龍去脈及其得失利弊，所以有簡單一談的必要。我個人不能説對一元化有研究，但可以根據六十多年來的經歷和理論上的一知半解，對什麼是一元化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元化是「黨的領導」的具體化

在中國，實行黨對各方面的全面領導，這是作為四項基本原則中最主要的一條寫進了憲法的，全國人民都必須遵守。毛澤東早就説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 黨的領導，無論是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是指一黨執政或曰一黨專政。這是一元化體制存在的先決條件和基礎。但通常意義下的黨的領導並不就是一元化。一元化是黨的領導的具體化，是在高度集中形式下的具體化。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都一律由黨領導。名義上我們實行的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2] 實際上，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只不過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具體管理下的吃大鍋飯的(他們的經費也和共產黨一樣，仰之稅收撥款)附屬單位，因此我們嚴禁使用「多黨制」的名稱。它們提建議和參加政府工作只能稱「參政」，而不得用執政。就是這樣，也還是斯大林干預的結果。這是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説過了的，即1947年毛澤東在

1 毛澤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9月15日)。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3月14日通過)，「序言」。

向斯大林請示彙報時曾提出取消一切民主黨派，斯大林沒有同意。[3] 在這點上，我國各民主黨派倒是應該感謝斯大林。

但是，一黨專政也不一定採取一元化的方式。一元化的真諦就是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最後變成了書記或實際上的第一把手説了算。連鄧小平也批評説，「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我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變成了個人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必然要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4] 應當補充的是，特別要犯獨斷專行的錯誤、瞎指揮和盲目決策的錯誤，以至走向腐敗墮落。正像適用於人類多數的下述規律一樣：無權或權小時向別人(掌權者)要民主，一旦大權在握後卻不願給別人民主。可惜鄧小平在後來的實踐中，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強化了一元化領導。據李鋭説，「第三代領導接班的時候，小平講了這樣三句話：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5] 他自封全黨核心，以實際上第一把手的身份，一連扳倒了三個總書記——名義上的第一把手和他的上級，一次就指定了兩代接班人。其「拍板」之重，單就此而論，實在超過了斯大林和毛澤東。

遺憾的是，官方黨史學和一些黨史研究者，談人論事，既不看言論和實踐的區別，也不看人和事的歷史發展變化，而只知摘章引句，

3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頁。

4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頁。

5 王永治專訪李鋭，見《21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第21版。

只聽言不觀行，還以早先的言論來說明此後的事實。例如有一篇署名辛岩的文章，[6]批評別人說《新民主主義論》「對民主問題『採取了回避的態度』」是「毫無根據的」，理由是，毛澤東以前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1939年12月13日）提過新文化的口號中就包括有民主化。按照作者的意思，以前提過的，以後就不用再提了。那為什麼那次會上所提口號中也包括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後來《新民主主義論》還重複提呢？如果不看實踐，不管歷史，那斯大林也是很講民主的了。他接見德國作家艾・路德維希時，後者問蘇聯的一切事情是由集體還是由個人決定的，他明確回答，「個人的決定總是或者幾乎總是片面的。」[7]說斯大林獨裁、獨斷專行，不是冤枉人了嗎？

一元化是個人崇拜在政治體制上的體現

我們在前一章[8]中已證明，個人崇拜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和含義外，主要是在政治體制上表現為上面是個人說了算，下面是緊跟和服從。在這種體制下，個人崇拜不只限於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及其繼承人，而且還廣泛適用於黨的各級領導，直到基層組織的支部書記。毛澤東就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9]對毛澤東的崇拜，世所公認，可以不論，只是應提一下，就是現在還在對他作進一步的美化和拔高，例如第二個《歷史決議》提到的「晚年錯誤」，現在實際上已「不准」再多講了。各級領導也常被神化，不僅受到下級的

6 見《高校理論戰線》，2002年第4期。

7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95頁。

8 見前一章〈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4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113頁，談到個人崇拜分正確和不正確兩種，因是提綱，沒這句話，但意思是有的。

歌頌和奉承，本人也常以一貫正確和黨的化身自詡。在過去許多政治運動中，對領導有意見就可被定為反黨，受到懲罰。1957年反右派時，有許多人就因為在「鳴放」期間對支書以上的某級領導提了點較尖銳的意見，而被劃成了右派。特別是一些小學教員，因得罪支書或校長竟斷送一生前程，被長期專政。不要以為這是基層幹部，由於政策水平低。其實不然，一些身居中央領導地位的高級幹部也並不例外，不僅從來不作自我批評，還常以黨的化身自居。被稱為大理論家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的胡喬木，大約就是其中的一個。這裏只舉一例。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紀念會上，周揚做了一篇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涉及人道主義、異化等問題，發表在3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中宣部見報後，當即向書記處呈報了一份處理意見，對《人民日報》和周揚都做了嚴厲批評，並逼周揚公開檢討。在後來舉行的核對事實的會議上，只見周揚看了處理意見的報告怒不可遏，據與會的《人民日報》社長秦川描述，「突然，他舉起那份報告擲在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對面的喬木震驚了：『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還「聲色俱厲地喝斥道：『你是反中央！』我從來沒有見過喬木這樣失態。只聽周揚應聲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10]後來的結果人所盡知，周揚不久變成了植物人，又過了兩年即告別人世。

較早認識個人崇拜（也稱個人迷信）嚴重危害的胡耀邦，1978年12月28日在中央黨校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就着重講了反對新老個人迷信問題。「他說，我們黨的生活還有一條很重要，就是我們黨內不能再製造迷信，不能搞特權，不要突出宣傳個人。……我們吃

10 秦川：〈1983年風雲中的胡耀邦〉，見張黎群等主編：《懷念耀邦》第一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頁。

了製造迷信的虧太多太大了。……我們多年習以為常，甚至我們現在的宣傳還在搞那個突出宣傳個人。這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東西。我們黨內，縣委製造縣委書記的迷信，説我們這裏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艱苦奮鬥幾十年，英明呀，偉大呀！同志們，這樣搞下去，就不得了呀!」[11] 單是這一小段，已經可以看到胡耀邦講得多麼深刻、多麼透徹！可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精神沒能得到貫徹。後來，而且直到現在，新老個人迷信(崇拜)不但沒有減弱，搞特權、製造迷信、突出宣傳個人，反而愈演愈烈，早已到了胡耀邦說的「不得了」的程度。

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實施和表現

我們黨和我們黨執政的國家政權都執行民主集中制。什麼是中國黨所説的民主集中制呢？十六大通過的黨章仍堅持當年的一貫提法：「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12] 鑒於集中指導下實際上沒有了民主，所以在胡耀邦主持下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正式刪去了「集中指導下」的提法。[13] 十四大恢復十二大以前的提法，表明了對集中的強調。其實，後來恢復的這一提法，還是延安整風的創造，是一種強調集中但卻顯得模糊的用語。因為至今我還沒有看到過對這一問題能夠做出理論的而又實際的説明的材料，雖然它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制度。整風之前的提法，也是至今仍在適用的，就是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的四大服從，説這是「我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

11 沈寶祥：〈直面反對新的個人迷信〉，《學習時報》，總第239期，2004年6月14日。

12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第65頁。

13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第82頁。

原則」。[14] 此前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已提出，「在這裏，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15] 延安整風中改為上述提法，可能是感到「四大服從」顯得太不民主，才想了個「民主基礎」「集中指導」這種不大容易搞清楚的提法，並且實際上改變了六大黨章關於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則的規定。因此，劉少奇在七大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民主集中制的解釋就顯得空而不實，很難弄懂，更難執行。例如，「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由黨員群眾所授予的」，[16] 是怎麼個授予法？後來的實踐不是證明正好相反，從窮過渡、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直到發動「文革」(更不用說日常的重要決策、人事任免等項了)，這些權力有哪些是黨員群眾授予的？又是通過什麼組織手續授予的？不都是黨的領袖及其支持者強加於黨員群眾和全國人民的嗎？劉少奇解釋的真諦，只是在貫徹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民主是手段」的觀點。在運用到民主和集中的關係上，就變成了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劉少奇説，「黨內民主的實質，就是要發揚黨員的自動性與積極性……」[17] 積極性發揚起來幹什麼呢？大概只是執行領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就是積極發表意見，也是為了「使領導機關的領導工作臻於正確」。在這樣的民主集中制下，黨的主體自然不是黨員群眾，而是淩駕於黨組織之上的領袖，黨員只能是盲目跟着領袖走的馴服工具。

1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69頁。

15 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1頁。

16 見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9頁。

17 〈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65頁。參閱毛澤東：〈論新階段〉第7章第10節「黨的民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2–653頁。

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期間(1943年3月)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躍居黨內第二把手的中央領導機構調整中，提出作為主席的毛澤東在書記處討論的一切問題上擁有最後的決定之權，就使他關於黨內民主的解釋只能空洞化，特別是使「四大服從」中唯一講點民主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正式失效，最後成為全黨服從一個領袖，一切權力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從延安整風以來，我們黨就一直實行着這種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作為第二把手的劉少奇和領導的多數(更不用說其他黨員了)一般本應擁有的權利，也被一元化給化掉了，只剩下緊跟和服從領袖的一條路。例如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就特別提出，「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黑體字是原有)[18] 在這裏，四大服從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又一次被廢除了(上引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規定是:「凡用書記處名義發出的訓令、電文、文件，須經過半數以上的書記同意後，方得發出。」[19])其實，在一元化體制下即使是多數同意以至全體一致通過，也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甚至是虛假的，例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等。所以，中國黨執行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就是黨內的獨裁專制體制，而且往往是並不掩飾的，像許多「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任免包括總理等在內的政府主要官員等。

民主集中制本來是列寧創立的建黨學說和組織原則，在1904年出版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有詳細敍述。這一原理當時就被普列哈諾夫等人批評為領袖獨裁，要在黨內建立「農奴制」等。對於根據這一原理建立的共產國際，連胡喬木也批評說，「第三國際一成立，就強調民主集中制，就是國際範圍裏面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國際

18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頁。

19 《六大以來》(下)，第208頁。

範圍的集權制加上黨內的集權制。」[20] 他認為這是列寧犯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21] 但是，他卻為中國黨的民主集中制辯護，表現了他在理論上和性格上一貫的兩重性和自相矛盾。實際上，一元化的集中程度要比列寧的民主集中制高得多，兩者有許多重大的甚至原則的區別，下面我們還會作進一步的討論。說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實施和表現，只是按一般的表面的理解而言，論其實質，一元化已經沒有了民主，只剩下了集中，而且是高度集中。

一元化是織成嚴密治理黨和國家的一張網

一元化既是黨和國家的基本制度，自然從上到下都要實行，而且以自下而上逐級絕對服從(「下級服從上級」)的鐵的紀律為保證。加之由於推行的是事實上的各級幹部委派制或變相委派制(即使選舉，也多流於形式，既沒有競選制度，還受上級指定和審定選舉人、提名候選人、採取等額或極小的差額方式、選後須經上級批准等規定和做法的限制)，上級對下級又擁有任免、升降、獎懲等巨大權力，這就造成了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以揣摩上面意圖為第一要務。即使有少數具有獻身精神和不願奉承的幹部，往往也使不上勁和站不住腳。不過，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下級惟上級的馬首是瞻，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就總體(不是個別)而言，上級對下級也存在巨大依賴，不只上面的號令和任務靠下面執行和完成，而且上級領導者的名、位、權、利，除須得到更上一級的保護外，還離不開下級黨委特別是主要負責幹部的支持和擁戴。至於同級領導幹部的互相保護就更不用說了。這就使官官相護在無形中制度化，形成一個事實上相互依存的特殊階層或利益集團，也是一張籠罩在廣大群眾頭上的嚴密的網，使他們無其他路可走，只能聽從上面擺佈。於是「綱舉目張」，

2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2頁。

2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1頁。

只要最高領導者一聲號令，全黨和全國就會迅速行動起來。例如一句「人民公社好」，三兩個月內就全國公社化了。

而且一元化領導還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只允許上下存在一條線。有時也講「條條塊塊」，但都必須貫串在各級黨委領導和第一書記掛帥這條壟斷一切的主線上。上面靠這條線傳達指示、佈置工作和了解下情、俯察全局；下面則按這條線接受任務和反映情況。由於只准有一條線，所以就可以做到一呼百應，一竿子插到底。但因為它有壟斷性和不透明，也必然會經常發生中間梗阻，對上應付(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虛報隱瞞，造假成風，使上面無法了解真實情況(他們也喜歡聽順着來的話)，而靠虛假情況決策(想想以前大躍進的故事和幾年前的糧棉流通改革)。特別是阻塞言路，使下情無法上達。正像鄧小平開始恢復工作後所說，加強一元化領導導致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22]這兩個「必然」，在他生前就未能改變且有所發展，現在的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更嚴重到了危險的程度。因為一元化本身排除了有效的監督機制，遂使兩個「必然」愈演愈烈。既然黨的各級紀委和政府的公檢法部門均受同級黨委領導，它們對下就會受到節制和干擾，更不能對上。一元化還使輿論監督很難實施。因為這種體制本身缺乏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報刊等傳媒又受各級宣傳部門的嚴格控制，不許真正實事求是，如有冒犯，不管有理無理都是三扁擔，總會找個藉口加以懲處。所謂群眾監督，更是一句空話。連上訪陳情、求人伸冤和仗義執言、揭露真相，都阻力重重，經常遭到禁止和打擊，哪還談得上監督？而權力不受監督又必然導致腐敗。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特權和特殊化，到經濟轉軌時期就變成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公行、真正的「上下交征利」了。這就是腐敗迅速氾濫，並成為不治之症的主要原因。

22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集》第二卷，第329頁。

一元化探源

一元化源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影響

鄧小平在談及一元化導致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時就已指出，「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23]鄧小平此時之所以提出封建專制主義問題，據說是由於接受了李維漢的建議。李維漢在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期間曾表現為鐵面無私和冷酷無情，在中央蘇區又成為博古「一言堂」的主要支持者，對不讓瞿秋白、何叔衡隨軍長征負有一定責任，[24]但「文革」後已大為覺醒，臨終前還建議鄧小平狠抓反封建。他認為，發生「文化大革命」是個人崇拜的結果，而個人崇拜則是由於有封建主義的思想遺毒和社會基礎。他說，「毛澤東對我國封建主義傳統的嚴重性是認識不足的……然而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宰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長達幾千年，封建遺毒的危害和影響比教條主義其深度和廣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25]其實，毛澤東豈止是認識不足，而是明確要繼承封建專制主義傳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他理解的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就是證明。至於鄧小平對反封建的建議，事後看來，也只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了一次，實際上並沒怎麼反，無論是反特權和特殊化，還是個人說了算和指定接班人。這就使封建專制遺毒在這方面至今絲毫未減。

23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集》第二卷，第329頁。

24 據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政府系統人員在長征時的去留由李維漢擬定名單。張曾建議帶瞿秋白走，遭博古否決。李維漢附和說，帶上是累贅。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沒說話。(1999年1月28日採訪劉英的談話)。

25 參見余煥春：〈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說一元化是受封建影響和繼承封建傳統，是因為封建社會實行的正是一元化。從君權神授、君為臣綱，到孫中山建黨時規定的摁手印和絕對服從，再到陶鑄給黃克誠信上所提「從一而終」和周恩來等多數領導人強調的顧全大局、保持晚節，這些都說明雖然社會性質在發生變化，但一元化的精神和體制幾乎是一脈相承。區別只在於過去全國是皇帝說了算，地方是諸侯和欽差大臣說了算；現在是黨的實際最高領袖說了算，地方是各級第一把手和上級派來的領導人說了算。中國由於封建專制統治的時間長，又沒經過徹底的反封建和啟蒙運動，所以正像李維漢所說，封建的遺毒和影響特別深廣。蘇聯的封建傳統和影響也很大，所以才能產生斯大林的獨裁和個人崇拜(這在西方民主國家就行不通)，但同中國比仍相差甚遠。例如斯大林死後就沒有幾個「大臣」保護他(倒是中國領導人竭力維護他)，而且首先提出揭發和批判他的竟是他培養的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編按：Georgy Malenkov，1953–1955年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等人。中國就大為不同。以「中國的斯大林」自況的毛澤東，在他死後，不僅他的親信，如曾任黨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等人，始終忠於他，而且一些被他打翻在地的領導幹部，如鄧小平、彭真、黃克誠等，一站出來也首先以保護他為己任。鄧小平就處處為毛評功擺好和開脫罪責，還提出了「宜粗不宜細」和「一切向前看」等必須遵守的原則，而不顧口頭上常談的實事求是了。例如談到打AB團，他說的毛澤東「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26]就完全違背史實。打AB團是毛推廣起來的，而且一直不認錯(七大前後為了給搶救運動辯護也曾提過，但無像樣的自我批評)，直到1965年9月23日動員彭德懷去三線「工作」時還說「反革命的富田事變」。[27]可見不是覺悟早晚的問題，而是始終未覺悟。十多年後的搶救運動正是打AB團的翻版，不能以提「一個不殺」為之開脫。至

26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1頁。

27 見《彭德懷年譜》，第790頁。

於所謂毛澤東覺悟比別人早中的「別人」，如先後對打AB團進行糾偏的項英、周恩來等多數人，反倒早有覺悟。有些人還以此為訓，抵制了毛澤東後來發動的搶救運動，如羅榮桓。

正是由於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頑強存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不但至今保持不變，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還在不斷加強。為了與此相適應，也就需要在黨史上特別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繼續推進造神造假運動，對群眾繼續實行愚昧主義和壓制言論的政策。

一元化也源於共產國際高度集權的傳統

這也是鄧小平說的。有人追根溯源，一直追到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固然帶有巨大的時代局限性，但同二十世紀國際共運對此的解釋和實踐仍存在一些原則性的區別。例如：第一，他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絕大多數人(那時英國工人已佔人口的大多數)對極少數剝削者的專政，而不是像後來俄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以極少數工人名義實施專政。第二，他認為民主是工人革命的兩大目的之一(另一目的為取得統治權)，[28]而不是毛澤東說的民主「只是一種手段」。[29]第三，他主張共產黨人在各國以至全世界都應同其他工人政黨和民主政黨團結與合作，[30]而不是列

28 《共產黨宣言》的原話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2頁。

29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第761頁。

30 《共產黨宣言》中就說，「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政黨。」又說，「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4頁和第285頁。

寧、斯大林後來所實行的一黨專政。[31]第四，他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爭取和維護自由平等，堅決反對專制獨裁，主張黨的領導人員必須由選舉產生並可隨時撤換，[32]而不是列寧、斯大林所主張並實行的黨的領袖專政，以至於連胡喬木都批評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關於「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間的相互關係」的論述，説「這段話確實是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33]

列寧在建黨學説中強調集權和紀律，也同黨處於沙皇恐怖統治下的客觀條件有關。但後來他就不分各國的具體情況，把它運用到全世界了。馬克思創立第一國際時強調的自由民主和寬容並蓄被徹底改造了。所以胡喬木在一篇《共產國際犯了兩大錯誤》的談話中，一開頭就説，「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其結果一方面是「全世界都要建立蘇維埃」，「俄國要變成全世界的統治者」；另一方面對各國來説，就是黨的「領袖專政」。[34]後來共產國際確實按照列寧建黨學説執行，幫助各國建立起俄國式的共產黨，並由共產國際直接指揮這些黨，不聽指揮即予解散(如原波蘭和朝鮮共產黨)或開除(如情報局對南斯拉夫黨)。對此，中國黨不僅絕對服從，而且實際做的還大大超過列寧。胡喬木為製造和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緊接着批評列寧之後竟然毫無根據地説，「毛澤東思想在這方面，是對列寧斯大林的一個否定，不承認共產國際的集中制，不承認這種集中制是正確的。」[35]關於毛澤東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

31 列寧十月革命後就取締了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政黨，只留下布爾什維克執政。斯大林更在理論上提出，「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見《斯大林選集》上卷，第267頁)。

32 像巴黎公社那樣。見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年版，第375頁。

3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3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1、82、84頁。

3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1頁。

的幾乎百依百順，我在上面已列舉了許多例子，下面為了反駁黨史界把延安整風説成是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編造，還會專門再談一下。這裏只想説明的是，毛澤東不但嚴格執行列寧提出的集中制(前後有數十次提倡和規定學習《「左」派幼稚病》的有關章節就是證明)，而且作了更進一步的重大發展。列寧實行的民主集中制還有相當程度的民主，毛澤東的一元化實際上卻取消了黨內外的幾乎一切民主。為了作點對比，下面試舉幾例(列寧為十月革命後到逝世的六年半時間，毛澤東則為建立一元化領導體制後的幾十年)。

第一，列寧完全遵守黨章規定按期開會(即使在殘酷的內戰時期)，六年共開全國代表大會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五次，中央全會四十五次。中國黨(整風後的會基本由毛決定，包括相對安定與完全和平時期也可不開)從1928年到1956年二十八年，共開代表大會兩次(按黨章規定應開二十次)，代表會議(算上蘇區代表會議)兩次，中央全會十四次。

第二，列寧時期的代表大會充分發揚民主，代表可以遞條子、插話、質詢和批評領袖，黨也允許和鼓勵不同意見的爭論，並向全黨甚至全民公開，大會上還可以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並予公佈。中國黨從延安整風後開的會，都是沒有(實為不許)爭論的團結的大會，歌頌和擁護領袖的大會，實際上常流為形式。

第三，列寧時期，黨員及其代表，可以在黨的會議和「爭論俱樂部」(俄共設的一種機構)以及《爭論專頁》等黨的報刊上，批評黨的領袖，反對他的意見，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就是在黨的會議上，列寧的提議也曾多次被否決，如列寧因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起義和洩密，主張將他們開除出黨，但遭到中央委員會否決。中國黨在延安整風後，已無人敢公開批評毛澤東，連黨外人士梁漱溟都因提不同意見倒了霉。受批判的人更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一切均以領袖的意志為轉移。

第四，俄共(布)十大《關於監察委員會的決定》，規定監委與黨委「平等地行使職權」，互不隸屬，而且監委決議同級黨委「必須執行不得取消」。十一大又賦予監委以檢查權和質詢權。[36] 中國黨長期不重視黨內的檢查和監督，後來在不同時期設立的監委或紀委，都是同級黨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它怎麼可能對同級黨委及其成員進行監督？後來乾脆把黨的紀委和政府監察部門合併，這樣就更便於黨委領導和第一書記掛帥了、實行黨政一元化了。

關於一元化同列寧民主集中制的差異，還可舉出一些，不過上述幾條已經可以略窺一斑，證明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進一步向極權化的發展。當然，斯大林專權後，就已從很多方面改變了列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變成了他的個人獨裁，但是同我們黨的一元化相比，還仍然有點不同。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曾在蘇聯工作，對此略有體會。例如黨政分開就比中國明確一些，政府部門的具體行政工作黨委一般不管；不像我們一切由黨委決定、第一書記一把抓。最高蘇維埃開會或在黨的報刊上，可以公開批評部長會議、點名批評一些部長(我的印象是財政部長茲維廖夫經常挨批，但他的部長也一直未動)；不像我們，領導幹部不能公開批評，或者一批就要打倒。那時蘇聯黨政幹部的待遇也有別，黨的領導人寫文件和文章稿費較低，黨機關比政府工資低。如著名哲學家亞歷山德羅夫由政府文化部長調任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長，來參加使館宴會時改乘汽車為坐地鐵，我問緣故，他說改做黨的工作工資照減一半。我們則是地位越高稿酬越高，黨機關工資並不比政府低，有些部門還要高一些，「文革」前中央調查部的待遇就高於外交部。由此可見，如果不算斯大林的殘暴手段，單就權力集中和特殊化而言，從各級黨委直到支部書記，我黨的一元化不僅大大超過列寧時期，也超過斯大林時期。

36 以上有關俄共的情況，參閱尹彥：《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書摘》2004年4月號曾予摘要發表。

一元化是毛澤東對列寧、斯大林民主集中制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

前面一再說過，共產國際及其領導下的各國共產黨，都是按列寧的建黨學說建立起來的。這一學說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做什麼》、《進一步，退兩步》和《「左」派幼稚病》中，後來被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歸納為五條。毛澤東提出的一元化就來源於此，特別是其中的第三條「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聯共(布)黨史》上講得更明確，說黨是「超出於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最高形式』，其使命是要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37]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以下簡稱關於一元化的決定)[38] 也標明是據此作出的。而毛澤東按其性格、抱負和所受中國傳統的影響，也正好最容易接受建黨中集權的一面，最不容易接受(事實上也一直沒有接受)實行黨內民主的一面。這是他入黨後的整個歷史所證明了的。

正如我們在以上幾章中一再說過的，毛澤東追求的就是權力集中於他一身。所以，「八七會議」後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他表示不願去住高樓大廈，願繼續他所謂的「擔任土匪工作」，做「農民運動的王」(瞿秋白語)。[39] 在秋收暴動後上井岡山路上的三灣改編中，毛澤東就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創議，後來又相繼提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群眾工作是紅軍一項重要任務，以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槍桿子可以造黨、甚至造一切的一系列理論。這就使上面的一元化領導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為一元化體制從基層起打好基礎，

37 分別見《斯大林選集》上卷，第265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83頁。

3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426頁。

39 見《八七會議記錄》和瞿秋白：《湖南農民革命(一)》序言。轉引自葉永烈《毛澤東之初》，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頁。

使一元化從上到下結成了一張嚴密的網；更使這種體制分別得到武裝保護，可以用軍事手段對付一切敢於反對或不同意一元化領導意志、甚至只是被懷疑對領導懷有二心的人。這就是為什麼軍事問題在中國被賦予特殊意義，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幾乎是「槍」指揮一切；毛澤東及其後繼者可以讓出其他一切職務，甚至在黨內也可處於「二線」和幕後，但對軍隊的控制權(如軍委主席之職)卻是不會輕易放鬆的。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際上就是把黨的和軍隊的領導合二為一，使黨的一元化領導得到武裝保障。所以不但在戰爭時期，就是在和平時期，掌握對軍隊的控制，都是領導黨和政府的最重要條件。事實上，毛澤東從創建根據地起，也就是這樣做的。那時，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又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於是出現了楊開明向上級報告中所說的，「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40] 而且，當時的黨中央也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要毛澤東「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41] 1929年6月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因一些人批評他「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在這些問題上他又同朱德、陳毅等發生矛盾，於是前委書記被選掉了，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42] 這次會議雖有缺點錯誤，但也說明毛澤東主張「黨管一切」和軍黨合一的一貫性。直到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還批評他以總前委書記的名義發號施令，不管紅軍各部隊、地方黨、蘇維埃政府、各群眾團體都可指揮調動，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43] 如果說，這次會上批評他「狹隘經驗論」和「富農路線」是錯誤的，可是批

40　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41　〈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

42　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201–202頁。

43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新訂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61–362頁。

評他「肅反擴大化」卻完全正確，就是批評這條「以黨治國」論也有一定道理。但不管經受多少挫折和批評，毛澤東關於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黨管一切的思想以及乾綱獨斷的作風，既無絲毫改變，還不斷有所發展。深受中國封建專制傳統影響的毛澤東，對於列寧、斯大林強調集權和「領袖專政」(胡喬木語)的民主集中制，可說一拍即合，貫穿終生。即使行封建之實，也可冠以馬列之名。這是可以舉出許多人所盡知的事例來的。因此，當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一經確定並趨於鞏固時，提出一元化領導體制，就是事屬必然的了。

一元化在中國的形成和實踐

中國黨內兩種傳統的較量

中共誕生於封建和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深受皇權專制主義的影響。它又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所以一開始就強調「厲行中央集權制」。[44] 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也規定，黨內要進行「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個個黨員都要在行動上受黨中軍隊式的訓練」。[45] 但是，中共終究是宣揚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五四運動的產物，它的主要創始人和五屆總書記又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旗手，建黨初期的活動分子和黨員也多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不能不帶進科學民主的精神。陳獨秀固然個性倔強(李達就是由於和他合不來而退黨的)、有家長制作風，但

44　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3頁。

4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91頁。

還是竭力發揚民主、盡量控制自己，而且在他號召和領導下，開創了後來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46]基於這樣的時代背景，從一開始黨內就存在強調集權與強調民主兩種傾向，往往一個人同時具有兩者，區別只在於哪種傾向多些，還隨着地位的變化而變化。陳獨秀在總書記任內被説成有「家長制作風」，「八七會議」失掉權力又被説成表現出某種「極端民主化」偏向。[47]這也有點符合前面説的潛規則：無權或權小時要民主，獨攬權柄時搞專制。但從建黨到延安整風的二十年裏，大致可以看出，更多保留五四精神和更多傾向民主的代表人物有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繼承中國傳統和國際精神而力主專權的，除毛澤東外還可算上劉少奇等人。前者頗具書生氣，社會基礎也薄弱。後者注重實踐、長於謀略，又有雄厚的社會基礎。這就決定了民主傾向和專制傾向在黨內權力較量中的結局：民主傾向可能一時略佔上風，但終究成不了氣候；專制傾向也會遇到某種挫折，但從長遠看總是佔據統治地位。在延安整風後，我們黨就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個人崇拜和不講民主的傳統，「文革」後撥亂反正曾一度有所鬆動，但很快就恢復了原狀。足見專制傳統在中國的頑強，也説明一元化領導體制為什麼會在中國經久不衰。

一元化體制的逐步形成

一元化體制的醞釀和露出苗頭，大約應該從1938年的六中全會算起。因為在這之前，雖然在黨的建設中一直強調中央集權和鐵的紀

46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2頁。

47 見陳獨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共中央信》有關黨內民主生活部分。參閱湯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353頁。

律，但由於在國民黨殘酷統治下，黨組織既分散又不穩定，很難實行集中領導，更談不上一元化。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層還有不少具有民主意識的人，例如「八七會議」後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瞿秋白，在他主持發佈的中央通告中就特別提出擴大黨內民主生活問題：「在秘密條件下，黨內要盡可能的實行民主主義，其意義是：一、要全體黨員參加黨的生活與了解黨的策略，盡可能的經過黨員群眾討論黨的各種實際鬥爭的策略；二、盡可能的實行指導機關由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48]他起草的六大文件中，還正式規定，黨必須「實行集體地討論和集體地決定主要問題」。[49]六大通過的黨章也專門增加如下內容：「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50]張聞天雖然一度主要在宣傳工作方面犯過「左」的錯誤，但他主張民主，在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就嚴厲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的獨斷專行和家長制作風，説他們「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51]而且他們都能以身作則，在他們主持工作期間，都盡可能地發揚了民主。當然，有民主傾向的領導同志決不只他們兩位。正是由於客觀上各地組織和各根據地的分散局面，主觀上有許多同志主張民主，傾向於集權和獨斷的同志還沒有在中央擁有穩定的絕對權力，因此以個人決斷和第一把手拍板為主要特徵的一元化體制在全黨一時還行不通。

但是六屆六中全會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情況，一方面在反對分散主義時過分強調了集中和紀律，實際上削弱了黨內民主；另一方面，

48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關於組織問題》（1928年1月30日）。

49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瞿秋白選集》，第436頁。

50 《六大以來》（下），第7頁。

51 《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頁。

從1937年12月會議到這次會議，由於上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得到一批領導幹部的擁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已成事實，強調集中和加強紀律的力量迅速佔據絕對優勢。建立一元化體制的條件趨於成熟，以後的問題就是逐步落實並使其制度化。六中全會關於組織和紀律問題的決定，規定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等，主要精神顯然就是中央集權。事實上，六中全會後，中央對各地和各方面問題的具體指示，比以前有顯著增加。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關於鞏固黨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必須在黨內開展正確的思想鬥爭，保證黨內思想上的一致，提高黨的鐵的紀律，保證黨的行動上的一致。」[52]

在走向一元化的道路上，有兩個中央決定具有重要意義。一是1941年1月15日《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是在皖南事變戰鬥結束後的第二天倉促作出的(成文也許在這以前)，無論當時還是事後，都看不出事情本身的緊迫性，可見是另有原因。現在許多當事人和史學工作者已指出《決定》對項英的指責不但過火，而且不公正，把毛澤東對形勢估計的失誤和前後指示不一的責任一股腦推在項英身上，指責項英和張國燾一樣是「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還懷疑可能有「內奸陰謀存在」。這顯然都是為了「殺雞儆猴」和給即將開始的整風和搶救運動作鋪墊，當然是很難服人的。因此不但中央一直沒像《決定》上說的，「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而且還在黨史編纂學上搞點小動作。例如，1941年12月以書記處名義在延安編印的《六大以來》中收有這一《決定》，時間卻含糊地只寫「一月」，而不像其他文件那樣寫明具體日期。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收了這一《決定》，注明是「根據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來》刊印，也沒注明日期，還故意放在皖南事變的一組文件的最後(即使1941年原版如此，也應據實改過來)，以掩蓋《決定》是倉促做出。[53] 這一《決定》的中心用意就是警告各路「封疆大吏」必須絕對服從中央，實現中央的一元化領導。

第二是在毛澤東發出整風號召、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因帶有試探性質，當時沒發表)之後一個多月做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1日政治局通過)。目的是進一步強調服從中央與上級領導和嚴格紀律。批判那種在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決定」，組織上「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等現象，提出「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以及「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等「必須採取的辦法」。在文件的編纂和發佈上也出現了一點怪現象，就是《決定》正文第二段在「叛徒張國燾的結局」後面緊接着是「與項英反抗中央的機會主義所引起的皖南失敗」，但作為普遍學習的《整風文獻》中這後半句卻未作説明地被刪掉了，致使一個決定至今還存在兩種版本。[54] 這既説明對項英的處理大概由於把握不大所以規定不普遍傳達和要提交七大議處，也説明中共黨史編纂學存在的任意性。

經過一年的延安整風，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時機和條件已完全成熟，於是1942年9月1日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55] 其基本原則和精神直到現在還執行着，有些方面還有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因此值得稍作介紹。

5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第158頁。

53 以上情況見《六大以來》1980年版的「出版説明」和目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31–34頁，「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另見有關皖南事變的各種研究資料和回憶錄，如李一氓：〈血染着我們的姓名——皖南事變的前前後後〉(《人物》1992年第4、5、6期)；房列曙：《皖南1941》，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等。

54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六大以來》(下)，第241–242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144–147頁；《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1950年版，第131–134頁。

5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426–436頁；《整風文獻》，第135–144頁。以下引語，未注明的，均出自該決定。

一元化體制的規定和實踐

一元化的要點可歸納為：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其他一切組織」。由於黨是執政黨，所以黨委就成了各級的最高領導機構，它的決定和指示，同級一切組織的黨員(領導人自然是執政黨黨員)，「均須無條件的執行」。這就是說，黨委凌駕於同級其他一切組織之上。二、規定各級黨委書記人選由上一級黨委提名，經再上一級的黨委(或中央指定的代表機關)批准。這就必然導致書記在黨委中居於特殊地位、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最後拍板和個人說了算。三、「黨的領導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又一方面表現在上下級關係上。在這裏，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的嚴格之執行，對於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這就是規定從上到下的一條線領導，例如黨的領袖不但橫向領導中央級黨政軍所有機構，還垂直領導各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這樣，黨的領袖專政和各級第一把手拍板，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證，因而也就一直堅持和鞏固下來了。

至於延安整風後幾十年來對一元化領導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加強，我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表現在黨對政權的管理和控制更加強更直接了。作決定的時候，黨對政權的政策還是「三三制」，即「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大體佔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56] 因此還強調，「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黨委及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

56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91頁；另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年5月，經政治局批准)，《六大以來》(上)，第1169頁。

而且「萬一」黨委的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也「必須少數服從多數」。[57] 但抗戰勝利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後，我們黨已成為惟一的執政黨，還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中就已放棄了「三三制」政策。許多跟我們合作過的地方民主人士和開明士紳紛紛遭到鬥爭，哪還有什麼「三三制」，於是黨管一切和以黨代政就事屬必然了。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後，為了加強黨對政府工作的直接管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還在中央成立了財經等若干小組，實際上也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架空國務院。對此，毛澤東於6月8日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58] 可見，這時的一元化就是黨政不分，就是黨要包攬一切。所以「文革」後，我們喊黨政分開喊了幾十年，可就總是分不開，根子就在一元化。既然黨領導一切，主要不管經濟建設、社會穩定等這些政府應管的重中之重的事，還管什麼？有關重要一點的政治、經濟、社會、文教問題，以至司法案件，還不都得黨委書記拍板？而且直到現在還經常以黨政聯署發號施令，有些機構乾脆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這樣，怎麼可能解決黨政不分的問題呢？所以近一個時期已乾脆不再多提黨政分開的問題了。

二是一元化深入到了基層。延安整風時關於一元化的決定還只管到地委一級，但後來，一直到現在，卻已發展和深入到了基層，特別是農村。一個村子，不管有幾個黨員，佔居民比例多大，支部都是這個村一切事務的最高領導和管理機構。支書不管是真選的，還是指定的、委派的和傳承的，都是這個村的第一把手，無論黨員還是非黨員都得服從他的領導。書記如果是好人並且能幹，全村人都會受惠。可

57 〈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整風文獻》，第140頁。

5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268–269頁；《周恩來傳》(三)，第1396頁。

惜許多書記表現平庸，而且不少是壞人，欺壓群眾，稱霸一方。我當了十年全國政協委員，曾隨「視察團」去過陝、甘、寧、內蒙、雲、貴等地，發現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各村住房最好的多為支書家。而且書記確實在指揮一切，在人群中顯得很威風。最近看到一本叫《中國農民調查》的書，[59] 描寫了一些農村幹部特別是區、鄉、村的書記，如何稱王稱霸、貪贓枉法、殘害群眾，也印證了我看到和所了解的一些農村情況。如此村鄉幹部，確實比我小時見過的國民黨保甲長還厲害得多。對於這些，即使嚴格管制下的報紙和廣播也經常有所揭發，看來誰都無法否認。但是過去和現任的某些官員，不但不思己過，不願面對事實，還把這種揭露稱之為「以偏概全」，連這本書都不能再公開發售了。他們也不想一下，為什麼當年提出「三農」問題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後來竟工作不下去了？真是「人以群分」，官官相護！當然，一元化深入基層並不限於農村。工礦企業，也在中心(業務以廠長為中心)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核心(政治上黨的書記是核心)。甚至一些科研機關，為了體現「黨的領導」(原本就是在以黨組形式領導)，都派來了專職黨委書記。其實，這只是有利於安插和提升幹部，擴大編制，對實際工作並無多大好處，反而增加了不少矛盾。例如中心和核心之爭，就吵了好些年，誰也說不清。

三是一元化使軍隊幹部長期當權，成為我國經濟社會文化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一元化決定是在戰時作出的，規定「『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所以第一把手即書記一般都由軍隊幹部擔任。共和國成立後仍然堅持這一傳統，不但出任各部門和各地區主要領導的多是軍隊幹部特別是一方面軍出來的老戰士，而且新解放區(佔全國大部分)的地、縣、區也基本是軍隊轉業幹部。他們長於打仗，習慣於服從命令聽指揮，但對於和平建設中的問題卻大多

59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並不內行，其中許多人還輕視科學和知識分子，喜歡蠻幹，這就不能不對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再加上毛澤東多數情況下唯意志論的領導和指揮，各級領導按軍事慣例緊跟，並層層加碼，使中國人民吃了不少苦頭，國家經濟和科技發展落後了一個時代。例如井岡山老戰士譚震林，共和國成立後長期主管農業，在農業大躍進、虛報浮誇、大放衛星，以及後來的反右傾和推動「第二個回合」的大躍進[60]上，都是衝鋒在前，對造成三年困難和餓死數千萬人負有一定責任。(只是由於中國黨的一元化體制，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得到升遷，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主要依靠這樣一些老幹部管理中國二十多年，中國怎麼能趕上時代潮流？

當然，一元化的發展和深入並不限於這些。它是隨着主客觀情況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61] 這一基本精神是絕不會變的。事實上也是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解放初期還有一批民主人士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如副總理、部長等，後來就一個也沒有了。

關於一元化的幾點評價

在談了一元化的來龍去脈之後，對實行了六十年、今後還會繼續堅持的這一領導體制也可以談一些個人的粗淺看法。由於這個問題太大，而且現在還在執行着，所以討論起來就有很大的難度。但也正因

60 這是薄一波的分法。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09頁。同書第719頁上承認，「『大躍進』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並在第688–689頁中講了譚震林的浮誇。

6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為如此，這個問題反而更值得研究，並且極為迫切。這是適應時代潮流、改進黨的領導、「加強執政能力」，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下面提出的幾點看法也許完全錯誤，但只要能引起批評，展開討論，我就很滿意了。

一元化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元化是在戰爭時期提出並開始實行的，而為了進行戰爭和取得勝利，集中領導和嚴格紀律無疑是最為重要的。那時軍事第一，地方工作也主要是為戰爭服務，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親自體驗過的。由於統一思想、統一指揮，使我們在這兩場戰爭中力量得到迅速壯大，最後勝利的到來竟超出我們自己的預期。這也是歷史所證明了的。

其次，在戰爭時期，我們實行的是戰時經濟，共和國成立後又完全照搬了蘇聯的計劃經濟。戰時經濟保證了戰爭的勝利。計劃經濟雖然毛病百出，在總體上是妨礙生產力發展的，但在一定時期和需要集中力量辦幾件事上，還是會起很大作用的。例如我國的「兩彈一星」就是採取了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軍事化辦法，而且也歸之於軍事編制。不到十個月建起雄偉的人民大會堂也是令世人吃驚的。無論是戰時經濟還是計劃經濟，主要特點都是要求高度集中，這都適宜於領導上的一元化。

但是，這不是說戰爭和計劃經濟都必須實行一元化，而是說一元化比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更簡單更省事，但有時造成的損失也會更大。例如列寧遇到布列斯特和約，費了很大勁說服中央委員會，才取得了7:4票的多數，還要在一周後黨的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上爭取到黨和政權機構的支持。[62] 中國在決定抗美援

62 (蘇)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中譯本第一卷，第87頁。

朝時就比這簡單多了，只要毛澤東決定，即使書記處和政治局多數人不同意，最後還是通過和照辦了。[63] 這種過度集中和一個人說了算，即使在軍事問題上也會造成嚴重損失。例如對朝鮮戰爭，1951年1月拒絕聯合國的停火建議和否定彭德懷停止進攻的正確意見，就使中國失掉一個極為有利的機會和受到很大損失。[64] 又如蘇聯在衛星發射與原子能發電方面走到了美國的前面，中國在短時期製成兩彈一星，看來是大勝利。但由於把主要科技力量和緊缺的資金用在了這些上面，實行「單打一」(更不用說困難時期北京的人大會堂等十大建築，特別是各地大造別墅的浪費了)，就使整個生產和管理技術落後了。而這正是國家強盛和發展的基礎，一個時期的耽誤，會使國家多用半個世紀也趕不上世界水平。

一元化有助於政權鞏固和社會穩定

前面已經說過，一元化就是從中央到基層，「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一律納入黨的各級組織特別是它的第一把手領導和管理之下。這樣，就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網，國家和人民的一切活動都在這個網下而不能出圈，因此顯得平靜而有序。只要這個網張開着，也就是說保持着從上到下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那麼，無論國內發生什麼嚴重問題，不管多大的天災和人禍，都不會影響到政權和社會的基本穩定，就是發生局部動盪也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到解決。這就是為什麼五十多年來，我們國家經過那麼多的重大事件，例如強迫命令下的大躍進、人為的三年困難、領導人一手製造的十年浩劫等，都沒能從根本上動搖黨領導下的政權，也沒能使整個社會秩序完全失控。就是現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遊行示威、各種集會和衝突，但實行一元化領導的中國，卻可以頂住這種浪潮，表現得安靜和平穩。

63 《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7–119頁。

64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85頁。

當然這不是說一元化緩解或消除了社會矛盾，而是說由於這張「籠罩四野」的網可以把衝突控制在最小範圍或消滅在萌芽狀態，把矛盾掩蓋住而不能暴露和激化。由於一元化是從上一直「化」到基層的，而毛澤東關於「支部建在連上」的原理就起了巨大作用。它使黨的組織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而發揮下面一元化領導的支部書記就有責任保證所管那一方土的穩定。即使某個基層沒有管好，出了問題，但由於層層負責，上一級或更上一級還是會控制住的。至於對這種體制的評價，那倒是見仁見智，意見不一。但不管怎樣，它還是保證了「穩定壓倒一切」的要求，所有機構照常運轉，各級領導也都做到了安然無恙。

一元化是和民主化不相容的

一元化雖然可以一時或在一定問題上發揮點積極作用，但總的看來它卻是同時代發展背道而馳的。這也是鄧小平說的，「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65] 因為作為人類發展的普遍規律，都要走向文明，其必經之路則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兩者如同一個車子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只用市場化一個輪子是無法持久的。何況民主化已成世界潮流，可以躲過一時，但遲早會被捲進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去長期說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民主，高出資產階級民主千百倍。其實這只是不顧事實的一句空話。因為如前所述，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的專政和黨的領袖的專政。他們以無產階級以至全體人民的代表自居，並無實施程序和客觀標準衡量。連一切資產階級國家的政黨和領導人不是也都說他們代表全體國民的利益嗎？無論當時還是事後，誰也舉不出充足理由來說明列寧實行一黨專政、取締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是無產階級利

6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益和多數人的要求。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就更不用說了。以中國而論，無論是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反右派和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人能說這是得到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授權？作為過來人，我們可以肯定這都是領袖個人的號召，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只是被迫響應。[66] 而且據了解內情的胡喬木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逐漸形成的思想，在黨內，甚至在領導層，「實際上多數同志是不贊成的」。[67] 可以說，凡是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是領袖(個人或少數人)以黨的領導為名通過黨的各級組織，實行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專政。一元化只是使這種專政變得更加明顯，更談不上什麼民主！

不但從黨的領袖到支部書記的個人一元化專政，完全違背民主原則，於理於法毫無根據，就是各級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也是民主政治所講不通的。關於民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特別指出，「『民主的』這個詞在德文裏的意思是『人民當權的』。」[68] 如果沒有人民的真正選舉和監督(恩格斯說，「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的標尺。」[69])，那麼，黨領導下的一切組織如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銀行以至人民幣等等，都只是假人民之名以行，而並未由人民經過一定程序的授權。就算我們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是完全和真正民主的，那他們選的最高領導也只是省長、縣長、村長等，怎麼在他們上頭又憑空來了一個管他們的第一把手——黨委書記？這不等於

66 曾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田紀雲就說，農業合作化，「實際上是入社並非自願，退社更不自由。」「這是對農民的第一次剝奪。」中國的合作化「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裏搬來的」，只是我們的辦法「比蘇聯把農民挖得更苦」。見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6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4頁。

6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9頁。

69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9頁。

民主又被剝奪了？我們在延安整風前學《黨的建設》，還說黨的領導靠它的政綱和具體政策、靠黨員的宣傳工作和模範作用。後來一元化了，黨的領導似乎變成天經地義，無須人民授權。有些代表一元化的各級第一把手，也只靠關係而不必管群眾是否擁護。否則，胡作非為的程維高怎麼能在京畿咫尺之近的河北稱霸十年之久？

因此，在一元化的體制下，實現黨的領導可以不通過民主程序取得人民支持，主要依靠掌握幹部的任免權就行。你不服從領導，就撤消職務或調動工作，換上聽話的和順從的。如屬黨外，要通過一定形式，那就先「代」後「選」。黨內更好辦些，或以上級黨委名義決定任免，或會前先調來再實行等額選舉。有人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主要就表現在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而黨的領導又主要體現在控制幹部的任免和使用上。這也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但不管怎麼講，我們把人事機密列為國家重大機密卻是事實，而這恰好是違反列寧所提公開性原則的。

這裏附帶談一下公開性問題。人們有個誤會，以為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提的，是個壞東西。其實這是列寧提的，而且他首先指的就是幹部問題上的公開性，即幹部的工作和品德等都應向群眾公開。例如他在《做什麼》中說，「大家大概都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是很可笑的，而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只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公開。」又說，「完全的公開性、選舉制和普遍監督的『自然選擇』作用，使每個活動家最後都能『各得其所』，擔負最適合於他的能力的工作，親自嘗到自己的錯誤的一切後果，並在大家面前證明自己能夠認識錯誤和避免錯誤。」[70] 所以列寧認為，沒有公開性就沒有民主。在

70 〈做什麼〉「四，經濟派的手工業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列寧選集》第一卷，1972年第2版，第347–348頁。

秘密條件下，不能完全實行民主而強調集中，就是因為公開性受到限制。有人統計，《列寧全集》上使用公開性一詞多達46次。可見這並非戈爾巴喬夫的發明。更重要的是，講社會主義民主而排斥公開性(即透明度或群眾的知情權)，那確實是「很可笑的」。

一元化和實行法治相衝突

一元化既然源於「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其使命是要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這就在實際上使黨居於國家政權、軍隊及其他所有組織之上，從理論上說有權領導和指揮它們，往往也就使口頭上說的法治變成了黨治。憲法上雖然規定一切政黨和社團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但是既然制憲和立法的機構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憲法也明文規定堅持黨的領導)，那黨也就實際上淩駕於憲法之上，更不用說其他法律了。如果再進一步考察，一元化既然使「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把手」，因此法治不但變成了黨治，而且實際上變成了領導者個人的人治，領導者的話往往重於法律。由於一元化是從上到下，人治也就同樣從上到下。毛澤東在世時自不用說，就是「文革」後，許多重要決策也不是先在什麼會議上提出，經過討論通過再定下了來。而往往是最高領導人先有個談話，其中不少還是先同外賓談，就自然成為國家的政策。立法和行政機構的任務只是在組織上貫徹並使之法制化，成為國家的制度、計劃或法規。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同樣可以在管轄的範圍內實行人治，一切又是他說了算。品質差的更是欺上瞞下、貪贓枉法，胡作非為。連一些基層組織的支部書記，也可以自定政策、任意攤派、私設公堂、侵犯人權。這就是為什麼老百姓至今還把希望寄託在「清官」的身上。事實上，一個地區，從省市到村鎮，出一個好的領導(第一把手)，經濟發展和社會風氣都會很快上去；如果派來的是壞的領導，大家都會跟着倒霉。這已成為各地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元化導致的人治，也是憲法關於「人民法院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71]在實際上行不通的根本原因。法院既然歸黨委領導，黨委特別是主要負責人干預定案就是正常的事。於是人們看到，刑法實施和量刑標準在各地，甚至同一地方的前後，都有很大差別，同罪不同刑、重罪輕判或輕罪重判甚至無罪也判等情況不一而足。

黨的一元化領導超越法治並壓倒法治，這表現在各個方面。憲法規定的一些條款在實際上並未兌現，似乎也沒準備兌現，如「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裏最後連限詞都沒設(當年國民黨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類的話)，從字面上看，所有公民都可無條件地享受這些權利。但實際情況如何，人們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一些通行無阻的現象，卻於法無據。例如我們黨的宣傳部門，可以管理和控制全國輿論，有權規定新聞出版業哪些必須講和哪些不准講，具體到各種歷史問題、司法案件、一本書、一個戲等等，以致越是群眾關心的問題越是不准講。而且不事聲張，一個電話，全國照辦。這已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事，但我卻沒能查到法律根據。憲法上沒有這個授權的規定。中國目前還沒有政黨法。那麼我們黨分工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可以一言九鼎，黨內黨外都得服從，而且適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這能說是法治嗎？

一元化排斥監督

一元化本身就是不允許有監督的，這是個制度問題。一元化領導的《決定》，只規定了黨委對同級一切組織和下級的領導，以及它們對黨委領導的服從，並沒有規定對黨委領導如何監督，對黨委權力如何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

約束。這就自然形成上面引述過的鄧小平說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72]共和國成立前夕召開了新政協，制定了被稱為「國家臨時性的根本大法」或「中國人民的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為政府的施政方針」。[73]但是過了不到三年，「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74]既沒有經過制定《共同綱領》的原機構人民政協，也沒有通過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甚至中央全會(倒是沒有忽略向斯大林請示)，《共同綱領》就被「過渡時期總路線」代替了，原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一下子變成社會主義；有些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人士，想對這類問題提意見，進行監督，結果被打成右派。反右後，來自民主黨派等黨外的監督基本上是名存實亡了。口頭上常講的群眾監督，其實多半是句空話，大概誰也說不清是怎麼個監督法。我們這裏舉個上下都是一元化領導的例子，看看下面能不能「監督」上面。安徽臨泉縣政協副主席于廣軒對縣委書記張西德的惡貫滿盈實在看不下去，就偷跑到河南上蔡縣，用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化名給江澤民總書記發了一封長電報告狀，後又從上層層批轉到張西德手裏，結果竟是一些無辜者幾被打死，還大整了大批上訪上告的群眾。欲知詳情，請看前面提到過的《中國農民調查》，第106–108頁。

至於黨內監督、輿論監督，前面已經講過，連監察機構都在同級黨委領導之下，報刊等傳媒也由黨的宣傳部直接控制，它們怎麼個監督法？例如，中央紀委如何監督政治局常委？實際上，任何傳媒都不敢和

7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73 鄧力群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序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9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66頁；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第944頁。

7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頁。

不能談論與某一常委有關的任何問題。省、地、縣各級的情況同例。因此，對許多領導同志，就只能靠「自律」和「慎獨」了。他要不自律怎麼辦？所以說，一元化必然導致特權和特殊化，沒有監督機制則必然產生腐敗。光靠上面查出幾個貪污犯（後台硬的還不准講）加以嚴懲，是不解決問題的。事實上反而越抓越多，因為這是個制度問題。

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必須改變一元化

根據以上所述，一元化領導體制在共和國成立後的和平時期，基本上是沒有起過積極作用的。現在要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能力，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元化。這是中國黨要保持政權，更不用說提高執政水平了，不能不首先解決的問題。如果黨自己沒解決，客觀形勢的發展也終究會使它得到解決，問題只在遲早和方式的不同。存在於二十世紀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進入二十一世紀必然還會延續一段時間，但決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它是同時代的發展不相容的。

改變和解決一元化問題，無論採取什麼方式和經歷什麼過程，以下幾點恐怕是起碼應該做到的。

一、真正實行黨政分開，採取有效措施取消一元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就提出並經政治局通過，要「着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75]但實際上並沒有實行。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而且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因為「我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是脫胎於革命戰爭年代而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基本確立的，是在大規模群眾運動和不斷強化指令性計劃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不適應在和平條件下

7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0-321頁。

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現代化建設，不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做法，如明確取消基層組織企業的「一元化」領導。[76]這是鄧小平一再聲明一個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報告上所說的。可是在不久發生的「八九風波」（也稱「天安門事件」）後，黨政反而更加不分，企業又加強了一元化領導，增派了「核心」。現在情況如何呢？實事求是地說，全國上下都沒有解決黨政分開的問題，還是全面實行着一元化領導，還是權力集中在黨委特別是常委，還是第一把手說了算。只要保持一元化領導，「黨政分開」無論喊得多麼響亮，都只能是空話。三番五次提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的弊端太明顯了，太不得人心了。但為什麼又五次三番地行不通，空喊幾十年始終得不到解決？道理很簡單，就是黨委第一把手不願放權，因而沒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對於絕大多數當權者來說，大概都是願意擴權，不願放權。在這個潛規則的作用下，長時以來，黨內就從上到下、在思想認識和政治活動上，形成了一個護權的群體。他們依靠一元化領導體制保持和進一步擴充權力，黨也依靠他們得以實現領導。這就是老講黨政分開卻老是分不開的原因。

因此，要真正和徹底解決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的問題，就要下決心公開放棄一元化領導體制。從理論上講，不能認為黨天然有權領導其他一切組織。「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這一命題本身就具有壟斷性，違背馬克思主義政黨平等的民主精神，[77]更是完全過時的了。而且既然說是無產階級的領導，那麼誰來代表他們實現領導，也應該由無產階級選擇和決定。如果即使有一部分無產階級不支持黨來代表，那也不能對他們以反黨反革命的罪行進行鎮壓。同理，

76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彙編》，第34-57頁。

77 例如《共產黨宣言》中就説，「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政黨。」「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1888年英文版為宗派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64頁。

人民也有權選擇自己信任和擁護的領導，而不能往他們頭上強加。這些都應當視為政治民主的起碼原則，而不能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總不能說，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導是資產階級民主，必須服從共產黨(從中央到各級黨委)的領導才是無產階級民主。即使黨犯了路線錯誤，比如大躍進、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之類，人民都得無條件地跟着黨走，否則就是反革命，就要遭到鎮壓。這恐怕就根本談不上民主了。在實際上，要改變一元化領導體制，就必須公開宣佈廢除黨委書記當然是第一把手的規定，明令禁止黨委及其下屬部門直接插手行政、司法等工作，還應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使其落實。總之，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一最根本的老大難問題，就必須從理論上到實踐上完全取消一元化。

二、實行民主選舉，堅決取消幹部的終身制和變相終身制、委任制和變相委任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實行了幹部的離退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幹部的終身制問題，這確實是一個重大進步。但現行制度並不完善，所以只能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而不能說完全解決終身制問題。因為第一，仍然允許少數人不依法退休，為其製造各種理由留任掌權。另外是名義上退休了，實際上繼續把持着重大問題和重要幹部任免的決定權。這就容易造成幹部問題上的任人唯親和世襲繼承等返古(封建)現象。第二，仍然保持着嚴格的封建等級和官民界限。幹部離退休後繼續保留原有待遇和不同等級的發言權，使幹部晉升和擴編加快，增加群眾負擔。而且退休後也並未離開幹部這個特殊群體，在老百姓看來，官民界限依然明顯。第三，現行制度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鐵飯碗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當了幹部就一輩子是幹部，起碼可以幹到退休年齡，中途淘汰和自行轉業的是極少數。這在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終身制。

至於幹部的委派制和變相委派制，這是體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手段，因而得到一貫堅持和不斷加強。例如，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代表大會，其民主性和透明度(公開性)就越來越薄弱了；上級對下級幹部的任免和調動也更加直接和更少顧及黨章或憲法的規定了。即使通過選舉的形式，各級代表及當選人員也是事先由同級組織部門提出、經同級或上級黨委批准。這一適用於黨內外的做法，就是變相的委派制。這一制度的危害是無須多說的。我們以前曾引證過，連宋慶齡也早已認為，不改變幹部委派制，現代化就會失敗。[78]

要解決終身制和委派制問題，只能靠政治民主化，即列寧說的「公開性、選舉制和普遍監督」。聲稱為人民服務的黨，卻不願和不敢實行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的真正民主的普選制，實在使人難以理解。

三、增加透明度，還給人民知情權

相信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也是我們黨所提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觀點。何況中國人民在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下已經過五、六十年，按理應該是有高度覺悟的了。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理由對人民不實行列寧所提公開性(即所謂透明度)呢？總不能老是「葉公好龍」吧！實際上，從我們黨執政時起，人民的知情權就越來越少了。而且豈止人民，連黨員對黨的活動也越來越感到神秘。例如十六大就比八大神秘得多。會是怎麼開的，領導人是怎麼產生的，都屬最高黨國機密。人們不妨反躬自問，為什麼連許多實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無論大的和小的，發達的和不發達的)，都敢實行普選和直選；而實行比它們更加民主百倍的「無產階級專

78 宋慶齡1979年2月寫給美國友人的信。轉引自《南方週末》2002年6月13日，童懷明：〈也談宋慶齡為何不葬中山陵〉。

政」國家，不管經過多長時間的治理和教育(訓政)，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普選制的條件就是成熟不了？大概誰也不知道政治民主化何時才能實現，「軍政」和「訓政」還要延長多少年。社會主義國家總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更怕自由、平等、民主等這些以人為本的起碼訴求吧？

沒有公開性就沒有民主。公開性是民主化的前提。而且根據我們自己的理論，人民群眾是主人，各級幹部，包括黨和國家的領袖，都是人民的公僕。哪有僕人可以瞞着主人包辦代替、操縱一切的道理？所以實行公開性、增加透明度、讓人們擁有本來就屬他們的知情權，應該是天經地義、無可爭辯的事。為此，應該爭取儘快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政務公開。所有國家事務，除國防、安全、外交等國際上通行的保密範圍外，都應公開。例如納稅人就有權知道他們交的稅都花到了什麼地方。如果每年的預算收支只講框架，不談細目，那就無異於向主人隱瞞了一多半。我們提倡黨政分開，但在現在的財政預算中黨政經費卻混在一起，人們怎麼才能了解到國家幹部中有多少是專業黨務工作者和撥給黨多少活動經費？

二是黨務公開。這裏主要指改變以至取消一些黨務部門的暗箱作業，特別是組織部門在黨內外選舉和幹部安排上的包攬；宣傳部門在輿論管理上代行立法(規定不准講什麼等)、司法(處分編輯、作者和單位)和行政(審批新聞出版和幹部任免等)職能的內部操持。

三是人事公開。這既指選舉制度的公開化，也指各級領導幹部個人財產和親屬情況(個人隱私除外)的公開化。所有黨員和幹部，既已許身為人民服務，不惜一切犧牲，還有什麼不敢對人民公開的？而人民又怎麼能選舉和擁護根本不了解的人來領導自己？

四是輿論公開。既然我們一貫提倡實事求是、言行一致，那起碼也應使自己制定的憲法落到實處，如明文規定的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允許公民有權公開發表意見，進行輿論監督。這裏也包括開放

歷史和現實研究中的各種禁區，根據政治民主原則和世界各國通例實行檔案的分期解密等。

實行公開性和增加透明度的內容很多，上列幾條只是舉例而言。

四、結束人治，實行法治

延安整風造成的深遠影響之一就是「無法無天」(以前蘇區雖然也如此，但那時地盤小、知識幹部少、對全國和後世影響有限)。經過整風和搶救，幾乎全體幹部的人性、人權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獨立思考、只知服從的黨性。問題還在於，這種「無法無天」竟成為長期以來佔統治地位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也許同馬克思關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79]的思想有關，特別是同列寧一再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80]等論斷有關。延安整風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發展還在於，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制定憲法和某些法律本來就是做樣子。例如憲法上規定的人民的自由權利，從開始到後來都是沒打算執行的。1941年5月1日，黨中央曾經批准和發佈了適用於全國各根據地的著名《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81]規定實行「三三制」(第五條)，「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等，可是過了不久，整風運動一來，這一切就作廢了。搶救運動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無言(緣)無故也可被任何單位搶救關押、刑訊逼供。慢說地主、資本家，其實遭難的多是共產黨員。共和國成立後，我們黨在全國執了政，但仍然執行的是「無法無天」政策。毛澤東親自領導和主持制定

79 見《法蘭西內戰》和《共產黨宣言》。

80 見《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三卷，第643頁)等書。

8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90-96頁。

了他自己稱之為國家臨時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綱領》和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擅自廢棄《共同綱領》和帶頭破壞憲法的正是毛澤東自己。他從來不把法放在眼裏，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辦，直到最後和林彪一起製造了個「國家主席」事件，就來自他要擅自取消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現在報刊上經常批評老百姓是法盲，我看主要原因就在於法不兑現，上面首先不守法，了解法的用處不大。實際上，我們國家直到現在仍然是人治高於法治，而且不只上層，一些基層幹部都可以無視法律和自行立法、自設公堂。所以我們不僅談不上法治，而且也談不上法制。

有鑑於此，我以為要談法治，談依法治國，必須立即着手解決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徹底清算延安整風以來提倡和推行的「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的精神。不可死守「為尊者諱」的封建原則，為毛澤東破壞法紀開脱、掩蓋和設禁區。第二，完善立法。從憲法到各項具體法規，已有的該修改的修改，使之真正體現民主、更臻完善。凡是所缺的法，如政黨法、新聞法等，應當儘快制定。黨、政府和各級幹部，既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不應害怕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約束，例如宣傳部門就不應由於害怕「新聞自由」四字而阻撓新聞法的討論和出台。總不能説社會主義實現人民享受自由權利的條件反而成熟無期。第三，立法執法都應公開，取消暗箱作業。關係人民自己的憲法修改和各項重要立法，人民反而不准談論，只能接受既成事實，這是在民主問題上的大倒退，因為第一部憲法制定時還允許人民討論、廣泛徵求意見。第四，嚴格遵紀守法，使法制不能流於形式和空談。越是高層領導越應以身作則，並要嚴防把領導人的個人意志通過某種操作變成國家或政府的立法。

關於建設法治國家，現在談論很多，無須在此多講外行話。以上所提，只是從延安整風聯想到的一點個人看法，談不上有什麼研究。

第十七章

延安整風創建了中共黨史編纂學



上層整風就是研究和清算黨的歷史

關於整風前的中共黨史研究

現在談到中共黨史研究，一般都從延安整風開始算起。當時毛澤東就説，「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過去不但沒有關於黨史的研究，甚至「整個黨的歷史卻沒哪個人去考慮過」。[1]其實，還在1926年，早期黨的一位重要領導人和理論家蔡和森，就已有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一書問世，[2]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共黨史學的開山之作。一年多以後，蔡和森又在直隸省委改組會上作了《黨的機會主義史》的報告。[3]此外，還有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作於1927年2月)、《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作於1929年的一個報告提綱)，以及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作於1930年2月)，等等。這些都是在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以其親身經歷所作，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不可視為稗官野史，更不能説他們沒有去考慮整個黨的歷史。

上述這些有關中共黨史的文獻和其他一些相關論述，頗具百家爭鳴的性質。作者完全根據自己的體會和認識，直抒己見，自成體系，自行分期，既無師承，更無抄襲，個性鮮明，極少雷同，批評公開進行，不為尊者諱，沒有清規戒律的限制，沒有審查制度的約束。雖然對問題有不同看法，錯誤在所難免，有些史實也記述不確，但基本上都還是秉筆直書，繼承了中國史傳的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錄的優

1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99頁。

2 這是蔡和森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在中山大學所作的報告，經向警予整理成冊，油印出版。

3 這一報告作於1927年9月，後來刊登在北方局辦的《順直通訊》上。

良傳統。我個人由於改行學習黨史不久，黨史文獻，特別是早期的材料看得極少，多數還是得之於間接轉述，但仍然感慨良多。把大革命時期同延安整風後的黨史研究及其著述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事實上，整風前不但有黨史研究，甚至可以説還相當興旺，只是大多數放在現代革命史的研究中，沒能形成一門單獨的學科。例如張聞天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4]就曾廣泛流傳。所以著名史學家胡華説，「洛甫同志是我黨在革命根據地幹部教育方面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編寫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一位開山祖。」[5]另外還有華崗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曾作為附錄編入1942年出版的《六大以前》。更重要的是，整風前延安各種學校如抗大、陝公等，就都設有《中國問題》的課程，內容也包括黨史。我在抗大三分校當助教時就曾輔導過這門課，後來在訓練部還參加過集體研究。像毛澤東作為個人意見提出的黨史分為大革命、十年內戰、抗日戰爭三個階段，[6]1938年抗大就已普遍講授了。

整風為什麼要從研究黨史着手

前面一再説過，整風的目的就是要牢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為此，就必須仿照《聯共黨史》對斯大林那樣，肯定毛澤東的一貫正確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並以毛劃線，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見及其

4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這是張聞天1936年在紅軍大學的講義，是受中央委託編寫的，第二年即鉛印出版。曾經是共和國成立前各解放區各類學校通用的重要教材，為好幾代革命幹部所學。

5 胡華:〈讀張聞天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第419頁，附介紹文章二。

6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00頁。

代表人物，這就不能不從研究黨史着手。而黨史上的頭幾任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早已受到嚴厲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都作了結論和處理，他們在黨內也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了。但此後的黨史卻沒有總結過，而且認識還不一致。所以上層整風，開始時就集中清算內戰時期的第三次「左」傾，先是從1931年九一八算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定性為「左」傾機會主義，主要負責者是博古，故稱博古路線。[7]但由於王明既無檢討，反倒批評中央的抗戰政策，所以毛澤東決定也要清算王明在武漢長江局時期「許多原則性錯誤」（還說明不是路線錯誤）。[8]後來隨着整風的不斷深入，對這一長一短兩段黨史的評估也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始終採取的都是研究黨史的方式。

在抗日戰爭緊張和困難的歲月，集中那麼多領導幹部，用那麼長的時間作歷史總結，中外人士都有些難以理解。共產國際就曾一再告誡，「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9]「國民黨的王世傑曾經問周恩來，你們怎麼拿那麼長的時間來做歷史總結？」[10]就是因為整風的目的是以「打碎兩個宗派」為名，一舉掃清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所有障礙。如此龐大的工程，非在全黨首先是高級幹部中進行長時間的工作不可。當時的主客觀條件，特別是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正好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胡喬木說的由於抗戰處於相持階段，我們處於困難時期，這一理由恐怕很難成立。

7 毛澤東為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223–232頁。

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9–201頁。

9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彙編本；《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26頁。

1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73頁。

從編「黨書」到作《決議》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收集資料編輯《六大以來》起，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1]特別是歷時三年多的延安整風，在表現形態上確實都一直貫穿着研究黨史。但它也說明，整風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而不是流傳的一些說法，諸如：開始時還是為了肅清教條主義餘毒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風氣，後來由於王明的干擾才不斷升級；或說，起初是想利用群眾運動燒一燒高中級幹部的官僚主義和鬧獨立性的山頭主義，王實味事件改變了運動的性質，使普遍整風中的矛頭指向了知識分子；還有的說，是由於1940年秋冬在對付蔣介石的態度上中蘇發生分歧，[12]整風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等等。應該說，這些看法也許多少有點道理，但基本上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整風的部署在進行過程中確在不斷調整，對批判對象的定性和處理也一再發生變化。但「打碎兩個宗派」、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這從一開始就定下的目標，卻是貫徹始終並未改變的。這從《六大以來》的編輯上就可以看出來。

關於什麼時候開始編《六大以來》，按胡喬木的說法是，「我去毛主席那裏工作時，《六大以來》這本文獻已經在編。」[13]這已是1941年

11 當時說明是「原則通過」；七屆一中全會1945年6月19日討論決定繼續修改，8月9日一致通過，但共和國成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時又作了重要修改。

12 指1940年10月前後毛澤東斷定蔣介石「直接準備投降」，有「日蔣聯合夾擊我軍」的危險，因此計劃先發制人，抽調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的後方河南、甘肅等地去。經請示，莫斯科不同意。隨後的皖南事變更加深了這一分歧。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章〈政策分歧的由來〉；郭德宏主編：《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關係研究述評》第223，225–226、237頁；（德）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中譯本2001年版，第54–56頁。

1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3頁。

2月。[14] 他又說，「《六大以來》的資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15] 這就是說，編《六大以來》應始於1940年，而這時，既未發生中蘇兩黨在維護還是準備破裂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分歧，也還沒發生王實味事件，[16] 整風尚未開始，更談不上王明的干擾。可見上述流傳說法的不確。

至於為什麼編《六大以來》，也是眾說紛紜。連胡喬木都先後說法不一。他先說，「編《六大以來》，我想是為七大作準備。」[17] 看來這一說法恐怕站不住。確實，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有關七大的決定，議程建議中是有一項「十年奮鬥的基本總結」。但由於共產國際不同意，所以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決議中就已不再提總結了。[18] 此後，政治局和書記處曾多次決定儘快召開七大，都沒有見到要搜集材料準備總結的事。1940年4月，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弼時負責七大籌備工作。4月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周恩來：「任已到達延安，中央決定快點召開七大。」[19] 這時仍沒有開始搜集材料，準備編《六大以來》。任弼時主持召開的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小委員會，開到1941年2月14日第19次會後再沒開，[20] 因為不久毛澤東就以《改造我們學習的報告》開始動員整風了。同年七八月，毛澤東建議並經中央同意出版《六大以來》。9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政治局學習小組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並將該書中的政治部分加印一千份，

14 葉永烈：《胡喬木》，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頁，記谷羽的回憶。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75頁。這雖屬別人的代擬稿，但經他本人審過。

16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表於1942年3月，4月被毛澤東指為「托派」後，才遭到圍攻批鬥。見黃昌勇：《王實味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7、175頁。

18 分別見《六大以來》（下），第147、210頁。

19 《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頁。

20 見《任弼時年譜》和《陳雲年譜》（上）。

發給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進行研究。[21] 從這些情況中就可看出，說編《六大以來》是為七大作準備，實在說不過去。

胡喬木的另一種說法是，編《六大以來》是為了反擊王明的挑戰。他說，「王明在延安時，重印了他1930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樣一來，王明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搞的一套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了。這就要算歷史賬，才能搞清楚。這樣才開始編《六大以來》。」[22]《毛澤東傳》上也說，「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後，毛澤東就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23] 這些說法（照抄照搬的更多），其實都是事後諸葛亮，是假設延安整風從一開始就為清算王明的教條主義（其後台又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作前提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第一，我在以前的章節中曾論證過，高層整風是張聞天首當其衝。這從1941年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和蘇德戰爭爆發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整風會議，在當時就已看得很清楚。直到1943年上半年也還沒有以王明為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對他的批判以及先提的王明路線，都只限於武漢時期的右傾。第二，王明的小冊子1940年在延安再版後並沒引起多大反響，不但像我這類從事理論教育工作的幹部沒把它當作一回事，而且根據現在能看到的材料，中央領導人似乎在1943年九月會議中間康生發言前都沒看過這本小冊子。連康生也只是說，「我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可見他以前是沒有看過這本書的。其他人如劉少奇等提到這本書，又都是在康生發言之後。[24] 第三，更重要的是，跡象表明，毛澤東本人

21 《任弼時年譜》，第406–407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76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5頁。

23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26頁。

24 康生在1943年9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4頁。劉少奇9月21日才閱讀王明小冊子並寫閱後感。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31頁。

此前沒看過這本書。否則他不會在康生發言前的兩年多整風中只批王明武漢時期的右傾。而且他還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25] 胡喬木證實,「關於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原來只寫了博古同志,後來修改時加上了王明的名字」。[26] 到1945年3月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時,毛澤東才強調《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提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全部綱領。從此就在黨內產生了一條錯誤的新的左傾路線」。[27] 所以他還把發現四中全會的錯誤歸功於康生。由此可見,說毛澤東編《六大以來》是由於王明在1940年再版了他的小冊子,實在太牽強。而且,許多老延安在整風中及此後相當時間,都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類說法。這顯然是為了把延安整風說成從開始就是以清算王明路線為目標而在多年後想出來的。

誰也不能否認,編《六大以來》是為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服務的。因此《六大以來》的編輯方針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即盡量收有利於整風目的的文獻,否則不收。具體說來,就是按照斯大林編寫《聯共黨史》的辦法,先設定黨內一直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毛澤東代表了一條正確路線,另有一條錯誤路線。選材就要選證明毛澤東正確的材料,並盡量選證明另一條路線錯誤的材料。如果有證明毛澤東錯誤的材料,則捨棄。所以胡喬木說,「可見編輯《六大以來》也並不是有文必錄」,「主要是把兩條路線點明」。「從《六大以來》,引起整風運動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對黨的歷史決議的起草。《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28] 正是根據這種精神,1943年又乾脆選編了一本《兩條路線》。

25 毛澤東:《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1941年九月會議前),另見1942年2月21日致周恩來電;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232頁。

2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6頁。

27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六大以來》,第1183–1184頁。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2、49、48頁。

我在以前的章節中曾經提到,如果說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29] 中央蘇區在軍事上存在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博古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那是很明顯的;但是說黨內在政治上也存在兩條路線,就很難分清了。查閱六大以來的文件,可以容易地看出博古中央執行了一條「左」傾路線,但要找到與之對立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文獻證據,卻就大不易了。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編《六大以來》在篩選文獻時採取了以下幾種辦法。

一是時間跨度不限於第三次「左」傾的三年零四個月,而是一直選到整風前的1941年。這是為了說明,即使在那三年多時間內找不出代表正確路線的重要文獻,但遵義會議後的中央文件卻已代表正確路線了,而且還認定這時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因此用不着對兩條路線作同一時期的橫向比較,而只要作前後的縱向對比就解決問題了。對這一辦法,連胡喬木也是承認的。他說,「毛主席怎樣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黑體係我所加)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30]

二是不收六大以來毛澤東(也包括劉少奇)有錯誤的文獻,例如反AB團的《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提出「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根本改造贛西南黨」給中央的信(1930年10月4日)、《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等。收了《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1929年1月),卻不收討伐紅二十軍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佈告》(1930年12月),並用收進《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3月28日)的辦法轉移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責任。一概不

29 這是1965年5月毛澤東為他「九篇文章」定稿時確定的時限,標題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4頁。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

收因中央軍委戰略指導和戰役指揮上的錯誤導致佔紅軍三大主力五分之二兵力的西路軍遭到覆滅的有關文電，如執行為打通蘇聯通道的寧夏戰役計劃的《十月份作戰綱領》(1936年10月10日)，放棄寧夏戰役計劃、組成西路軍、創立河西根據地的《作戰新計劃》(1936年11月8日)，以及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一些重要指示電等。[31] 在為清算歷史而編的《六大以來》中竟抹掉了這段重要歷史，後來還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推給了張國燾。[32] 沒有編入為瓦窯堡會議起草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因其在《戰略方針》中「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置於「鞏固擴大現有蘇區」之上，事後曾受到總書記張聞天的批評[33])，共和國成立後的再版本卻補收了不知何時整理的瓦窯堡會議傳達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三是在材料取捨上採取一定程度上的雙重標準，即與盡量不收自己方面有錯誤的文獻的同時，盡量少收以至不收對方正確的文件而多收一些證明對方錯誤的細小材料。如果將反AB團和富田事變同博古、羅邁、洛甫的反鄧、毛、謝、古江西的羅明路線相比，前者的性質和影響都要比後者嚴重得多。前者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錯殺了成千上萬的忠貞幹部和革命戰士，一度造成蘇區的危機，也使毛澤東的威望下降。連陸定一直到1988年4月30日還在中顧委常委會上說，「毛澤東在革命時期，除了『富田事變』李文林一件事以外，沒有犯過什麼錯誤。」[34] 而鄧、毛、謝、古的羅明路線卻一直被定性為黨內鬥爭，

31 有關文電，參閱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4章〈血戰河西走廊〉，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

32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1951年版，第197頁和240頁「注19」，1991年版，第198頁。

33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97頁。

34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3頁。所提李文林，原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後被當作AB團遭捕殺。

受到錯誤批判的人，並未被開除黨籍，只是受到撤職與處分，調走做了別的工作。例如鄧小平就被撤銷了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不久被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兩三個月後又出任《紅星報》主編，直到遵義會議。[35] 但是反映在《六大以來》上，前者已如上述，全都付之闕如；後者則盡量多收，單是反對鄧、毛、謝、古就收了四篇，包括與《六大以來》內容和體例(只選中央文件和主要領導人文章)相去甚遠的〈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1933年3月31日)、〈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1933年5月4日)，以及所收惟一的一篇羅邁的文章，但卻不收第一次提出北上方針的張聞天所寫〈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1935年6月24日)等文件。僅從這一對比中就可看出《六大以來》篩選文獻的不同標準，也可看出長年宣傳的「左」傾中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毛澤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算上以後四十年歷次運動中的消滅異己，那對比就更明顯)，原來如此！

既然黨書的傾向性這樣明顯，為什麼被批判的兩大宗派成員竟會紛紛繳械呢？首先因為這有個前提，就是黨書的多數文件證實，「左」傾中央及其支持者執行的路線顯然是錯誤的，他們看到這些文件後，就只能作自我批評而不會去批評別人。毛澤東雖無代表正確路線的綱領性文獻，但他確實一直處於「左」傾中央的對立面；雖然對他並未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黨內地位還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五中全會上升為正式委員，可以參加按規定應參加的一切會議，發表任何不同的意見，更沒像後來他對一些中央領導人那樣一擼到底、立案審查、限制自由)，但卻被奪去了實際上的黨權和軍權；既然整他的人證明犯了路線錯誤，那麼被整者也自然會被看作是正確的。所以整風中繳械的人張聞天、博古等，檢討自己錯誤和承認毛澤

3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第315、323頁。

東正確，也是出於真心實意。他們當然也知道在肅反問題上毛澤東比「左」傾中央更「左」，但他們都支持和參加過，所以沒什麼可說的。另外，有些事情，甚至一些高層領導也不十分清楚。例如西路軍問題，來往電報恐怕只有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少數人知道，他們又是參與者，很難出來主持公道，更不會為張國燾辯誣。還由於長期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既有中國傳統，又受蘇共影響)和延安整風時的嚴峻氣氛(加上搶救運動這一持久激烈的敵我鬥爭環境，矛盾在隨時轉化)，就無形中形成了這樣幾個潛在規矩和傳統：第一，凡屬被列為犯錯誤者，就只有檢討交代和挨批的份，不得進行辯解(態度不好)和反駁(對抗)，更不容許對批評者作反批評，特別是不能找正確領導的碴。而在延安的中央整風中，除毛澤東、劉少奇外，多數人主要是檢查自己和批評那些犯有更嚴重錯誤的人。所以延安整風以來，還沒聽說過除王明外有人當時曾批評過毛澤東。第二，隨大溜以自保，何必為辨明是非去捋虎鬚。這就是為什麼西路軍問題的當事人陳雲、徐向前、李先念等，寧可沉默四十五年，直到已再無風險的1982年，才站出來揭露事實真相。李維漢和溫濟澤也是在四十年後才為王實味平反起來盡力的。第三是為了過關，盡量上綱上線，直到被迫說違心的話甚至瞎編亂造。

這裏附帶再談一個問題，就是《六大以來》1941年版和1952年版所收毛澤東文章的差別問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1941年版收毛文少，「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當時的謹慎與對自己要求的嚴格了。」[36]這種為毛澤東說的好話顯得實在勉強。第一，「當時」謹慎和要求嚴格，是否表明到1952年就完全變了。這不是自相矛盾，好話反而變成貶語了嗎？第二，事實也並非如此。按我的理解，毛的許多文章沒收入1941年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六大以來》印數極少，只供高幹學習，且嚴格保密，而毛有些文章不但公開發表過，且已

3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81–182頁。

先後發給個人，如《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即使當時未公開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也都人手一冊，再印純屬重複，反而會使大家不理解。二是當時許多文章還未整理修改好，甚至很不成熟。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強調的《矛盾論》、《實踐論》來說，1937年的講稿就同斯大林派尤金(編按：Pavel Fedorovich Yudin，1953–1959年任蘇聯駐中國大使)來參與修改過的定稿有不少重大差別。我現在手頭還保存有一本延安時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後來的《矛盾論》只是原提綱中第三章〈唯物辯證法〉中的第一個問題，標題為〈矛盾統一法則〉。其中第二節〈形式論理的同一律與辯證法的矛盾律〉，錯誤地把形式邏輯同形而上學混為一談，批評說，「資產階級的形式論理學有三條根本規律」，「全部形式論理學只有一個中心，就是反動的同一律。全部辯證法也只有一個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修改結果是，從原文的二萬五千字中刪去近七千字，增加約六千字。這樣一篇受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哲學著作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嚴重影響、很不成熟的文章，在修改前怎麼能拿出來給中央整風小組學習？那不是要弄出笑話來嗎？《實踐論》也有較大的補充、刪節和修改。[37]又如〈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3月27日才在《解放日報》加按語「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1941年編《六大以來》時還沒整理出來，怎麼可能收入？其他如瓦窯堡會議的傳達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我一直懷疑是編《毛選》時才整理成文的，因為此前從未講過原來在何處發表過或成文根據。總之，對這個問題要說這麼多，是想表明，胡喬木等人即使在談《六大以來》版本這樣不大的問題時，也會流露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情結。

整風中，人們在學習了這種精神指導下編寫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以後，對中共二十多年的黨史，特別是對

37 參閱許全興：《為毛澤東辯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199頁。

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這段歷史的了解，就有了一個鮮明的輪廓。何況早在1941年，為準備政治局九月整風會議，毛澤東已經起草了一個《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問題結論草案》，其中就涵蓋了這一時期的主要問題。後來由於整風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和毛澤東想法的變化，這一《草案》才被長期擱置下來。通過1943年政治局九月會議對歷史問題的檢討，毛澤東認為他的那個《草案》已經不夠，需要重新起草一份歷史決議。於是就決定從1944年5月21日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專門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討論歷史決議草案。這次會開了11個月，「是我黨歷史上時間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38] 在全會期間，「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對《歷史決議》曾七易其稿，每次都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由全會「原則通過」。此後又經過三次修改，終於在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最後通過」。但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對《歷史決議》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經多數政治局委員圈閱同意，最後作為《附錄》編入《毛選》第三卷。

《歷史決議》為中共黨史編纂學奠定了基礎

《歷史決議》為黨史學確定了原則和規範

《歷史決議》不僅為研究中共黨史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而且也為黨史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了基本框架，使黨史研究有所遵循和制約，成為官方黨史學的經典。《決議》雖然重點是總結第三次「左」傾時期的問題，但實際上已對建黨二十四年來的歷史作了概括，只是抗日戰爭階段涉及不多。所以，《決議》的出現也就標誌着建立中共黨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6頁。

史编纂學的開始。此前的黨史已經有了定論，以後的黨史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延伸和發展。

當然，《歷史決議》並不是單為了開創一門學科而作。它主要的還是給三年多的延安整風作總結，體現出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雖然由於蘇聯的關係，《決議》發表時去掉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但實質上並沒有變，所以在中蘇分歧加劇時反而提得更高了。總之，應該説，六屆七中全會和它通過的《歷史決議》，完成了它們的重要歷史任務，實現了全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緊接着舉行的七大，只是將全會及其決議的精神以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加以體現並在組織上固定下來，因此象徵意義更大些。

延安整風所取得的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當然也適用於對黨史的認識和研究。因此，有了《歷史決議》，作為一門正式的亦即官方的黨史學就已呼之欲出了。但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央還顧不上黨史學科這一領域。共和國成立後，胡喬木完全根據《決議》精神寫出、並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表了，這就標誌着中共黨史學的形成。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徵集黨史資料的通知》，並規定「編印黨史資料」。隨着高等院校的調整，都先後開設了「中國革命史」課程，其中就包括有黨史的內容。所有這些，就把黨史的學習和研究推上了一個高潮，使以《歷史決議》為基礎建立起的中共黨史學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正式出台了。[39]

39 張靜如、唐曼珍主編的《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也把共和國成立後稱做中共黨史學的「成型期」。不過它把這個時期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就不免太長了些。所提「主要標誌」也顯得散亂，特別是對被視為「新中國第一本開創性的黨史簡明讀本」(《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編後記〉)和「公認的中共黨史的奠基之作」(《喬木文叢》編輯組:〈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和拓展〉,《光明日報》1999年10月15日)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重視不夠。

《歷史決議》的三大缺陷

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曾規定以《聯共黨史》為中心學習材料。作為整風總結的《歷史決議》，按照《聯共黨史》的路數寫，當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聯共黨史》的毛病(那時並不認為有毛病，還被毛澤東說成是全世界惟一的典範)，必然會反映到《決議》中來。《聯共黨史》的根本毛病是為突出斯大林而編造和歪曲歷史。這也影響到延安整風和所作《歷史決議》。所以連胡喬木都說，由中共中央領導編寫黨史，「這個工作，到整風時才開始。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40]綜合他的說法，《決議》不夠實事求是的缺點，可以歸納為三大問題。

一、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用我們前面引證過的胡喬木的說法就是，「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一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41]「1945年決議的作用是把一切歸功於毛主席。那裏分析的歷史太簡單。」[42]《聯共黨史》已被蘇聯和俄國一些學者稱為「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決議》也完全是以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中心內容。下面茲簡單舉例作點說明。

過度頌揚　《決議》全文約28,800字，提到毛澤東的名字就有四十七次，出現的頻率超過了《聯共黨史》中的斯大林。而且似乎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在單槍匹馬打天下，除稱讚劉少奇的白區工作外，其他領導人不但無功可提，還大多受到不指名的批評，不是教條主義就是經驗主義。而對毛澤東的許多頌揚，也屬「不夠實事求是」的拔高。例如《決議》的第一句話說，從黨誕生時起毛澤東就是馬列主義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54頁。

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4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頁。

和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似乎成了天生的聖人，這不正是個人崇拜的語言？周恩來就說過，對農民運動，毛澤東的認識也是有個發展過程的，他在給惲代英的回信中還說，「我們現在做城市工人工作還忙不過來，那有空去做鄉村工作。」1925年後才開始注意農民問題。[43]胡喬木也說，「好像一講農民運動，首先就是毛澤東，其實，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從事農民運動……這些歷史在《決議》中敍述得不大周到。」不過他接着又說，「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也不可能，我的這些話是事後諸葛亮。」[44]可見當時爭先恐後製造個人崇拜的氣氛。

掠人之美　《決議》把別人的成績用各種直接間接的辦法掛在毛澤東的賬上。例如把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就歸功於「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遵義會議明明建立了以當選總書記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決議上卻改寫成「以毛澤東同志為首」，這也有悖於他對「為首」即召集和主持會議的解釋。[45]張聞天、周恩來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決議》中含糊地歸之於毛。

諉己之過　把毛澤東犯的許多錯誤用有時明確有時含糊的辦法推給對立面或別人。如「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是毛執行了一輩子的，1926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識分子劃歸反革命陣營(收入《毛選》時作了刪改)，在反AB團中懷疑和捕殺了不少知識分子，但《決議》中卻被算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一條罪狀。把對「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錯誤的處理和被誣告，造成了極可痛心的損失」的「錯誤的肅反政策」，也推給「左」傾路線。

43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9頁。

4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4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第625頁。

為尊者諱 不但對毛澤東思想、工作、作風上的缺點一律諱掉，而且為了樹立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他的許多重大失誤也被諱掉了，使黨史在不少時期和不少問題上的真實情況逐漸消失或被篡改了。這不但使黨史與科學漸行漸遠，而且對總的政策和實際工作遺患無窮，後來長期犯嚴重的「左」傾錯誤都可從這裏找到根子。

二、黨史只是路線鬥爭史

又是胡喬木所說，「歷史變成就是路線鬥爭史。可以說是從那個決議開端。」[46] 這也是從斯大林關於「黨的歷史是黨內鬥爭的歷史」那裏搬來的，[47] 使人在路線鬥爭中看出毛澤東是一貫和惟一正確路線的代表。而且《決議》發表後確實也沒停地進行着黨內鬥爭。無怪乎連胡喬木也哀歎，「黨的歷史決不能簡單化為路線鬥爭史。路線錯誤、路線鬥爭兩個詞，不知害了多少同志。」[48] 不過到了鄧小平，不但把十次路線鬥爭給砍掉了一大半，還乾脆不再提路線鬥爭了，連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空前災難的行徑都不算路線錯誤，而從輕定為失誤或悲劇。[49]

把黨史變為路線鬥爭史還出於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主觀決定論。根據《決議》的說法，過去的幾次失敗，如大革命、放棄中央蘇區等，主要都是由於領導上犯了路線錯誤。這實在是一個長期以來困擾人們的問題。客觀歷史的發展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決議》說，大革命的失敗特別是由於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

4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7 參閱(俄)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下冊，第1336–1338頁。

4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40頁。

49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遂使「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這種論斷是根本站不住的。陳獨秀即使執行斯大林的指示，也接受毛澤東等的意見，甚至換成毛澤東當總書記，大革命大約仍然勝利不了。把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退出中央蘇區，完全看成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最大惡果」，同樣值得考慮。在當時的條件下，用前幾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恐怕已很難奏效，保持根據地原貌的可能性也不大。二、四方面軍被迫長征就是證明。遵義會議後，路線和指揮不是都已正確了嗎？怎麼就在雲貴川陝等地駐不下來，建立不了新的根據地？如果不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紅軍也許不得不實行毛澤東的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最後很可能是留一部分人堅持陝北等地的分散游擊戰，主要幹部和機關暫時撤到蒙古以至蘇聯(如同東北抗聯)。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後來一再在內部和對外賓表示「感謝」日本人的侵略。可見，為抗日發動的西安事變在客觀上起了挽救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的作用。這也是周恩來至死和我們黨始終不忘記張學良將軍的原因。

三、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

《決議》明確指出，「我黨歷史上各次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即是黨外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表演。」在這之前，劉少奇就一再強調「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毛澤東更是經常講右傾機會主義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或應聲蟲。[50] 不過《決議》上倒是說，「『左』傾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社會根源，都是小資產階級。所以在延安整風中和以後很長時期，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幹部在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時，都要主動戴上小資產階級的帽子。沒

50 例如劉少奇的〈論黨內鬥爭〉，《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6頁；毛澤東1943年1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想到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小資產階級就被升格為資產階級，反右派與反右傾受批鬥的人，就不敢再檢討小資產階級思想，而承認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了。參與起草《決議》的胡喬木也很快改變思想，後來提到《決議》時還氣憤地說，「我特別反對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那個概念用得太濫了……這種說法不但是簡單化，而且是向壁虛構。」「至於說黨內鬥爭一定都是（不是說都不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本身就顯然不符合我們黨和各國黨內歷史的大量事實。」[51] 胡喬木的這些話是在1981年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說的，因為這時要談的是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再說路線錯誤、什麼主義（但卻並未忘記寫上「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反映」，那帽子不是就戴到毛澤東及其一些戰友的頭上了？大約因此才決定不再用。可見，這些名詞和提法不是能不能用，而是看什麼時候和對什麼人用。

當然，《歷史決議》的缺陷決不只這三項，其他如把陳獨秀說成「墮落為反革命」，把瞿秋白主張的發揚民主說成是「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主義狀態」，以及對許多被列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領導人的無限上綱和過頭批判等，這裏就不多列舉了。

略談第二個《歷史決議》

一、為什麼要談一下第二個《決議》

在談延安整風結果產生的第一個《決議》（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需要提一下將近四十年後又制訂的第二個《決議》（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因為兩者緊密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146頁。

聯繫，一脈相承。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延續。為了表明這點，第二個《決議》還特意在前面加寫了一段對第一個《決議》的概括和複述，這也使兩者一起成為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基礎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兩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實際上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區別只在於前者是製造，後者是維護。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主要領導人急於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當時就把原因說得很清楚，是為了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實質上也就是為了恢復「文革」前的政治和領導體制。這就使中國錯過了一個極為有利的政治改革機會，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缺了一條腿。如果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能夠抓住機會，像實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一樣，穩步推行政治改革，應該說是不會遇到很大困難的，幹部退休制的實現就是證明。可惜鄧小平只是開始時說說，實際上並不想看到政治民主化，所以既未採取重大落實步驟，到後來乾脆連提都不大提了。在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時，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就說，「我個人認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52]

其實，事後看來，鄧小平並沒有一個實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張。只是他重新執政後，總結過去經驗，面對世界潮流特別是全國人民的殷切期待，認識到原來的一套已不能再照舊維持下去了，必須穩中求變，首先是對瀕臨崩潰的經濟實行改革開放。這雖遭到堅持計劃經濟的「左」派干擾，但因他們太不得人心和違背潮流，只能落得個節節敗退。加之實行改革開放仍強調以公有制為主，不傷害既得利益者，所以阻力較小，成果顯著，得到全國擁護和世界讚揚。政治改革可就大不同了，實行民主定會傷筋動骨，不但削弱各級幹部的權和利，而且也約束最高領導的說了算，連黨的整個領導體制都會

52 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改革開放〉，《同舟共進》2004年第8期。

受到影響。所以，在提「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批評權力過分集中、以黨代政、封建遺毒、搞特權和特殊化等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強調「四個堅持」，以便保證一元化政治體制。[53] 在既要進行撥亂反正和穩定領導格局，又不得不面對時代潮流和人民訴求的情況下，就使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前半期，出現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輿論稍有開放，人文社會科學呈現一定繁榮，一些政治問題允許討論，還先後公佈了一批黨史材料。在這種較為寬鬆的氣氛下，輿論界要求民主的呼聲漸高，並涉及對毛澤東錯誤的批判和對共和國成立後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為了防止發展下去影響到政治體制(集中表現為對毛澤東的評價)，黨的主要領導人改變初衷，[54] 要急於做第二個《歷史決議》。鄧小平說，「這個決議，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55] 陳雲說得更乾脆，對毛主席的評價要「一錘子敲定」，否則我們這些人也會被否定。[56] 可見，趕緊做出這個《決議》，就是要及早給黨史劃個圈子，做出定論，然後禁止出圈或「不搞爭論」，這樣來維護毛澤東，也保護自己，歸根結底是保持一元化領導體制。因此，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通過和實施，也標誌着政治改革醞釀的終結。由於不搞政治改革，缺乏監督機制，就自然產生了兩個孿生的惡果，一個是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增長水平超過了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是官場和社會腐敗程度很快處於世界前列。這就孕育着很大的風險。所以連鄧小平也承認，「不搞

53 分別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0–343、158–184頁。

54 鄧小平在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還說，「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頁。

5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5–306頁。

56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5頁。

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57] 但可惜他一直到病逝也沒能付諸實施，結果積重難返，使政治改革以後更難啟動，也更不容易刹住日益嚴重的腐敗之風。

二、對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一些看法

做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復「文革」前的領導體制和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雖然文字上還在批判個人崇拜，但從它的中心思想和客觀效果看，實際上還是要維護個人崇拜。這只要看下面舉的幾個例子就會清楚。

(1) 主持和領導制定《決議》的鄧小平開宗明義就說，「我最早提出寫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位的任務，是樹立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可不寫。」[58] 並且一再強調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59] 的一條。在起草過程中，胡耀邦曾提出，「可考慮改變一種寫法，着重聯繫歷史經驗，寫當前的任務和今後做法。」據此改定的稿子，鄧小平看後對鄧力群說，「胡耀邦的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60] 一句話就給否定了。這說明，作《決議》的重點並不在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所以經過八個多月反復修改仍然達不到要求，就是因為「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志的有些問題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

5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7頁。

5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21頁，同鄧力群、吳冷西的談話。

59 《鄧小平文選》，第293頁。

6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8頁。

改過來。」[61] 從胡喬木的話中也可看出當時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情緒:「毛主席的錯誤非常嚴重，引起大家的憤懣，這是不奇怪的。」[62] 但是不管大家有多少意見，按照延安整風確立下來的領導體制，還是領導上說了算，第二個《決議》終於這樣定了下來，其間的四千人討論看來並沒起太大作用。

(2) 《決議》本身以及有關《決議》指導思想的一些談話，反映了不少個人崇拜的做法，如為尊者諱、隱惡揚善、攬功諉過等。例如在算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損失中有「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少到三萬人左右」，[63] 可就是沒提西路軍的兩萬多人和肅反中被錯殺的少說也有七八萬人。既然「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性質的分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64] 那為什麼對過去的錯誤繼續寫成「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而對毛澤東，既不算路線錯誤，也不提什麼主義？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還「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並不合乎事實。連胡喬木也承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對外關係的惡果也很厲害」。[65] 當時我曾在討論中提出不同意見，結果和史學家李新(他說《決議》五十年後還得重做)一起在小範圍內被通報了。《決議》中還有一些其他不夠實事求是的地方，如說對私人工商業的改造、農業和手工業的合

6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9、751頁。

6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3頁。

63 凡出自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引語，均不作注。

64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8頁。

6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4頁。

作化，「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那後來的改革不是在開倒車嗎？[66] 說個體農業向高級社發展「遵循自願互利」的原則，說大躍進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願望，這合乎歷史真實嗎？說1956年後，「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說1960年冬以後，「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五六十歲以上的過來人能相信嗎？對成績列了那麼多數字，為什麼就偏諱掉了大躍進對經濟和生態造成的損失以及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多少人？等等。

(3) 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但要「集中講正確的東西」，而且還要誇大成績。在「建國三十二年的基本估計」中羅列了一大堆數字，其實即使這些數字經過審計、核實，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只要「面向世界」(鄧小平為景山學校題詞)，稍作比較，就不能不承認，我國是這三十年世界發展的最大掉隊落伍者。不說政治文明和科教發展，單以經濟而論，我們也從1955年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的4.7%，降到1980年的2.5%。如果和日本比，那就落後得更為驚人。國內生產總值及其人均，1957年我國分別為日本的140.85%和20.13%，1965年已分別降到78.32%和10.83%。[67] 由此可見，正是在《決議》所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裏，我們卻大踏步地同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拉大了距離。因為日本，還有「四小龍」，都是這個時

66 鄧小平就把農業單幹稱之為「飛躍」。他說，「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

67 轉引自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頁。原注出處為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綱要》。

期先後實現經濟起飛的，我們則由於個人崇拜的體制而不受任何約束地在瞎折騰。因此，一再強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就只能理解為沒有體驗到這十年中普通老百姓的受苦挨餓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的受批挨整，只考慮到為毛澤東和參與其事的其他領導人開脫。

(4) 《決議》及其指導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個人崇拜的思維和邏輯。例如說，「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鬥。」或者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68]這就有點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味道。那是否也可作相反的假設？即沒有毛澤東，很可能就沒有大躍進和反右傾，就不會有人為的三年困難，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反而在經濟上一直把日本甩在我們的老後面。又如說，只能承認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否則，就是給毛澤東抹黑，也就是給黨和國家抹黑。不管怎樣說，把毛澤東同黨和國家劃等號總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其實在世人眼裏，真正給黨和國家抹黑的，在更大程度上還是過去的大躍進、餓死人、「文化大革命」等，以及至今在制度上的封建專制、日益猖獗的貪污腐敗、長盛不衰的偷渡外逃等等。這些才是真正丟中國人的。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其實，這也屬誇張。在延安整風提出毛澤東思想前，難道我們黨就沒有光輝的歷史？從共和國成立前夕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包括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都不再提毛澤東思想，是否這段歷史就不光輝了？「文革」

68 《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42頁；《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8頁。

十年舉得更高，那段歷史就特別光輝？按寫到《決議》上的話講，毛澤東思想只「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但實踐同樣也證明，將它用到現代化建設上，就使中國遭到一系列失敗，延緩經濟社會發展幾十年。（按鄧小平設計，中國要用一百年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可戰後日本雖然起點不同卻用了二三十年就已成為發達國家。「四小龍」也大致如此。）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參加討論的許多人不贊成再提毛澤東思想，主張只提馬克思主義就行了。

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鄧小平敢於從根本上改變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即胡喬木所說多數同志不贊成的思想），大力抓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老百姓中流行着許多頌揚和感謝鄧小平的話：「鄧小平讓我們吃上了飯」，「能過上現在的好日子都是托鄧大人的福」，等等。具有如此膽略和氣派的一代偉人，為什麼到撥亂反正時就是衝不破個人崇拜的陰影，還要力排眾議、堅持作一個仍然帶有個人崇拜色彩的《歷史決議》？分析起來，大約是出於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信守列寧關於「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和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69]（黑體字是原有的）的信條，進而堅持一元化領導體制。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是維護這一根本問題。二是要借助鍾馗。鄧小平復出時並不具備毛澤東的權威，因此就要依靠高層老幹部的支持和借助毛澤東的影響。而這兩者實際又是一回事。長期養成的個人崇拜，確實有點根深蒂固，像陳雲所說，「即使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幹部整得那麼厲害，可是大家仍然

69 列寧：〈論兩個政權〉，《列寧全集》第24卷，第18頁；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頁。

相信他。」[70] 所以鄧小平在實際上改變毛澤東的路線和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時，還得打着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三是怕亂求穩。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不僅把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邊沿，使廣大幹部和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情況之下，要維護黨領導的政權，就必須改變總路線和許多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對此，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已經發出了警告。鄧小平正是順應人民要求，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而實行改革開放。但在政治改革上，他對形勢和幹部群眾水平有點估計不足，以為對毛澤東缺點錯誤的清算會影響穩定、搞亂大局。因此不如把問題包起來，趕快做出《決議》，就天下太平了。這就妨礙對歷史的正確認識和解決專制體制問題，並為以後埋下了隱患。其實情況和這種估計並不相同。當時幹部群眾都是人心思定。只要實事求是、講清道理、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群眾需要，即使有些幹部由於思想不通或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叫嚷，但也如同一些反對改革開放、堅持計劃經濟的「左」派掀不起大浪一樣，中國當時是決不會被搞亂的。所以問題還在第四，即為了保護自己。「文革」前的許多事都是大家緊跟毛澤東一起幹的，批判毛澤東的錯誤也就等於批判自己。而且如果真的改變了個人崇拜體制(也就是一元化)，那就會直接影響到領導人本身的權和利。這不但是上層，而且也是許多中下層幹部都不容易做到的。正是由於上面這些，第二個《歷史決議》才要求盡快做出來。

70 《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85頁。

中共黨史研究中的喬木胡繩學派

胡喬木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

中共黨史作為一門學科，無論是它的創建還是發展，可以說都是和胡喬木分不開的。中共黨史學創建於延安整風。而正是在這期間，他開始進入了中共黨史領域，不但參與了黨史資料的編輯和《歷史決議》的起草，還以毛澤東秘書的身份列席了高層有關黨史的清算，為史料的積累和對毛澤東觀點的領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六年以後，胡喬木奉命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經毛澤東審定和批准署名發表。[71]「從此，胡喬木的名字同中共黨史研究聯繫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被公認為中共黨史的奠基之作，對黨史教育和黨史研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72] 這也標誌着中共黨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正式形成。

中共黨史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革」前，黨和國家還沒有設專門的研究和管理機構，高等院校也是到1959年4月才提出開設單獨的中共黨史課。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規定，高等學校共同政治理論課要設置中共黨史課。[73] 但未及展開就開始了「文革」。在十年「文革」中，雖然毛澤東不斷講黨史，還提出十次路線鬥爭之說，不過在那個動亂時期是談不上什麼研究的。後來隨着撥亂反正的推行，黨史工作才受到黨中央的空前重視。這

71 原為劉少奇「七一」報告起草，毛澤東審閱後批示以胡喬木本人名義發表。

72 《喬木文叢》編輯組：〈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與拓展〉，《光明日報》1999年10月15日；另見李鐵映：〈在《喬木文叢》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00年5月22日；《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的〈編後記〉。

73 見張靜如、廖曼珍主編的《中共黨史學史》。

時，胡喬木有了發揮重要作用的機會，在事隔三十年後重新擔負起黨史工作的重任，直到生命的結束。

應該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十多年，胡喬木在黨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的黨史編纂學體系更臻成熟，還在他生前就已形成胡喬木學派。他不僅為中央主持起草了包括第二個《歷史決議》在內的許多重要文件，寫出了在其門生中著稱的所謂「黨史三會」(《黨的「八大」的基本精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十二大的重要成就》)和《黨史三論》(《中國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在組織上和行政上領導全國的黨史工作，出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為楊尚昆兼)，主管幾個中央一級的專業黨史部門如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和存在過幾年的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特別是最後幾年，他更抱病指導、主持和修改出版了兩部教科書式的正式黨史著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還指導編寫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有這些，就為中共黨史這門學科的開拓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使胡喬木成為中共黨史學史上可以超越卻不能繞開的人物。

談到中共黨史研究中的胡喬木學派，也不能不提到胡繩。這是因為他們在學術思想上保持着傳承關係。胡繩也自覺接受喬木的指導，自稱是喬木的學生。[74]他還長期參與黨史工作的領導，出任黨史研究室主任，後來又被提為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成為喬木的接班人。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喬木就曾稱讚說，「這一本書是黨史工作的空前獨一無二的成就」，並主動提出為之寫《題記》。所以鄭惠說，「胡繩和喬木在這件事情上真是珠聯璧合、交相輝映。」[75]兩人不但是黨史研究界公認的權威，也是受到重視的著名學者。胡繩稱胡喬木為「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這樣的學者至少在我們黨內是不多見的」。[76]胡繩也被他的學生稱為「思想理論界一代宗師」。「在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和鄧小平理論等方面，胡繩的研究是出類拔萃的，其成就即使與著名的理論家胡喬木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對現實和理論的影響要深遠得多。」[77]不管對他們別的方面如何評價，兩人都是中共黨史主流學派的一代宗師和領袖，恐怕是不會有什麼爭論的。

對作為黨史學家胡喬木的一些看法

我和胡喬木很少接觸，[78]又沒研究，所以談不上對他的什麼評論。但是由於要談黨史，就不能繞開他，所以我在前面章節中已多次引證他和對他有所議論。下面再談一下學習過程中對他幾點比較突出的感受。

一、胡喬木是創建中共黨史主流學派的主要參與者

在我們國家和我們黨領導的現行體制下，意識形態是由黨直接和統一管理的，政治性特別強的黨史研究就更是如此。所以嚴格地講，黨史研究在國內也就只有一個學派，即胡喬木學派。它有專業的行政

74　胡繩:〈紀念胡喬木同志〉、〈胡喬木同志談黨史工作〉，載《回憶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

75　以上見鄭惠:《程門立雪憶胡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54頁。

76　胡繩:《紀念胡喬木同志》。

77　鄭惠:《程門立雪憶胡繩》，第189、208頁。

78　我同胡喬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有一些接觸。一是他在莫斯科養病時常找我這個使館研究室主任談點國際問題和蘇聯情況，後來還通過信。二是我回外交部工作後曾有幾次被找去起草有關外交的文件。另外，1979年我還是他所領導的「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的成員。

單位，有從上到下的業務指導系統，不僅這些單位自己從事黨史的研究編纂，也還配合黨的宣教部門，管理和審查全國的黨史研究和涉及黨史事件與人物的其他文化、文藝創作，規定全國必須遵守的原則和不得逾越的範圍，如堅持兩個《歷史決議》、壟斷重要史料、設置一些禁區等。當然，屬這個學派，自認是喬木、胡繩學生的人，在一些問題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各自的見解，但是既屬官方學派、又是公職人員，所以在大的方面還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而所謂同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就是同中央領導保持一致，毛澤東在世同毛澤東保持一致，毛澤東之後同鄧小平保持一致。連學派領袖胡喬木也只能如此。下面我們就舉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為例。

胡喬木主持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本來就是「為了達到鄧小平提出的要求」和「貫徹鄧小平、陳雲等中央常委的意圖」。[79]但從現已公佈的鄧小平、胡喬木二人關於起草《決議》的談話記錄看（更不用說沒有公佈的了，我在當時就曾看到過一些），兩人的看法開始時還有些不同。主要原因和表現可能在兩方面。一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的了解要遠比鄧小平深得多，理論上的評價也沒有鄧小平高。例如他說，「我們不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也「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為毛主席也好，中國黨也好，實踐的範圍，涉及的理論問題，都是很有限的。那樣說是妄自尊大。」[80]對此，鄧小平也只能說，「這些都對」。[81]至於胡喬木提到毛澤東的哲學著作說的：「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矛盾論》中的多數論點，是馬恩列或三十年代蘇聯哲

79 《喬木文叢》編輯組：《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與拓展》。

8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7、79頁。

8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9頁。

學界已經提出過的，不能輕易說是他的創見。」[82]經濟學，毛澤東沒有研究更是公認的事實。對這些，鄧小平當然無法涉及，只是在談到經濟改革時說過毛澤東「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83]二是對於毛澤東的錯誤，胡喬木起初還多少受當時的氛圍特別是思想界的影響，因而提得比較重些。像鄧小平把「文革」前十年說成「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胡喬木的認識就一時跟不上。連鄧力群也曾批評他，「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第一個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後的稿子對毛病、錯誤寫的分量較重，成績估計得不夠，不充分。我曾經給他提過這個意見。他當時很不以為然。他說就是有這麼多錯誤，不能隱晦。」[84]另外，兩人在民主、法制、國家體制等問題上，提法也不盡相同。例如胡喬木主張「國家只能搞代議制」，反對「黨領導一切」的論斷，[85]鄧小平恐怕就不一定同意。但是不管胡喬木如何認識，他都嚴守承上啟下的原則，所以最後形成的《歷史決議》還是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求」。

這樣看來，說胡喬木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並不確切，所以這裏稱他為「主要參與者」。因為真正給現行中共黨史開拓和奠基的，實際上是毛澤東。被稱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在學術上可以說談不上有多少獨立創見，是完全按第一個《歷史決議》寫的，而這個決議又是經過毛澤東增刪修改十餘次，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所以收進了《毛選》。[86]至於共和國成立後的黨史，又是主要按鄧小平的意見。不過應特別指出，這裏提到的

8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47頁。

8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6頁。

84 鄧力群：〈向胡喬木同志學習〉，《回憶胡喬木》，第3頁。

8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05、109頁。

8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2頁。

所謂胡喬木學派，只是想說明有此客觀存在，並不是也不可能評論這個學派，更不會談論它的專家學者，否則就是太不自量力了。

二、胡喬木對中共黨史學的重大貢獻

胡喬木對中共黨史學的貢獻已經有大量的權威性論述，這裏只想根據個人學習中的體會，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胡喬木使中共黨史成為一門完整的獨立學科。雖然中共黨史主要由兩個《決議》(特別是第一個)奠定基礎，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其次是鄧小平。但使黨史系統化，解決兩個《決議》未涉及的大量史實和理論問題，並根據形勢的變化對原有論述作必要的修正和進一步發展，都是在胡喬木的指導和領導下進行的。單就此而論，也可以把胡喬木稱為中共黨史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第二，胡喬木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貴史料。由於黨史檔案的嚴格保密(撥亂反正時期稍為寬鬆了些，後來就更嚴了)和為尊者諱等原則的嚴格執行，黨史中許多問題都是若明若暗或完全處於封閉狀態，因此一般人學習黨史就只能讀有權看一定範圍資料的人的複述，而後者又受到許多規定的限制。胡喬木由於他的特殊處境和經歷，對黨史的熟悉程度超過了毛澤東(後段)和鄧小平(前段)。所以他有關黨史的隨便談話都是很珍貴的資料。例如我是從頭至尾參加了延安普遍整風的，但在這次改行學黨史後，對延安整風還是一片茫然。因為整風的重點是上層，而對上層整風如果不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等材料，許多情況還是弄不清楚。這就是為什麼他的這本書和《胡喬木談中共黨史》，成為我寫學習章節時引證頻率最高的兩部著作。

第三，胡喬木在不少黨史問題上揭開了蓋子，這就比提供資料的意義更為重大。對此，前面已經作過多次引證。例如他對1945年的歷史決議就作了嚴厲的批評，說它的缺陷「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決

議的作用是把一切歸功於毛主席」，而且「對歷史事實說得很少……台上只有路線鬥爭」，等等。[87] 又如評論延安整風時說，「要我給整風打分，我不會打100分」，「實際上以後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88]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黨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他也提出了不少問題，有的地方還揭開了蓋子。但是應該承認，在這方面他起的作用可以說很小，不但沒有動搖原有定論，甚至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和討論。以第一個歷史決議而言，既然有那麼大的缺陷，為什麼還要被定為研究黨史不可逾越的雷池，連提出質問和討論都不行？原因可能在於：第一，胡喬木的揭蓋子極不徹底，何況他的主要傾向還不是揭，而是捂；第二，黨的主要領導人和領導集體需要的是保持延安整風以來的道統和法統，不容對歷史決議有所動搖，而官方學派的專家學者又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作為中共黨史學官方學派的領袖，在胡喬木的指導和影響下，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黨史專業隊伍，成立了遍佈全國的黨史工作機構，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發掘和積累了大量史料，還培養出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把中共黨史這門學科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但由於它是官方學派，有統一的領導，遵循統一的口徑，要求基本觀點完全一致，還有權對史料實行全面壟斷和對研究進行嚴格管理，所以使中共黨史研究只此一家，別無流派，實際上不允許自由研究和百家爭鳴。

三、胡喬木治學和作風上的兩重性

胡喬木無論是在黨史(也包括其他領域)研究還是思想作風以至性格上都表現出明顯的矛盾，有人把這稱之為士和仕的矛盾。一方面他還

87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85-86頁。

88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0頁；《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多少保存着知識分子的本性，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禮賢下士和團結愛護文化人的善意。另一方面，長期的經歷和所處地位又使他成為思想理論界的官方權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軌的意識形態監護人，甚至在政治路線、思想作風上被中外部分輿論稱為「左」傾的主要代表。其實，胡喬木還是有一定的耿直，在某些問題上也敢於和毛澤東、鄧小平爭論。遇到適當氣候，他還會表現出相當的理論勇氣。例如「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期間，毛澤東的許多錯誤論斷，包括民主只是手段、文藝為政治服務等，就是他首先站出來批判和推翻的。他也敢於指出列寧在理論和實踐中的缺陷，曾批評列寧建立共產國際是錯誤的和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只能導致領袖專政。他尊重知識，具有一定的正義感，也幫助過一些專家學者。他在包括黨史在內的理論問題上，那種敢於提出問題和撥亂反正的精神，以他為領軍的這個學派內至今尚無出其右者。但這只是他的一個方面，而且是不佔主要地位的一面。

另一方面，連對他第一個立傳的葉永烈都說，「他畢竟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日益嚴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響了他。即在毛澤東去世後，『左』的影子也不時困擾着他。」[89] 其實在我看來，毛澤東的「左」並不始於1957年，而是早得多（連胡喬木也說，「就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也不能說毛主席沒有犯過『左』的錯誤」[90]）。從1940年出任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教務長起，胡喬木就對毛澤東亦步亦趨地全面學習，從思想到作風可說都學得相當到家。例如毛澤東聲言不下「罪己詔」，胡喬木也從來不作自我批評。1959年廬山會議，他先反「左」，後又反戈一擊，發言痛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誣衊》，說：「斯大林晚年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91] 後來還寫了一篇〈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內部文章，我在當時接受批鬥時也曾學過。對這些他從無檢討，但後來卻特意聲明：「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沒有參加。」[92] 又如他在肯定第一個決議時就說，「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獻，證明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93] 但當批決議時，又無端申明：「毛主席對決議沒有做很多的修改。」[94] 兩種迥然不同的說法，叫人相信哪一種？再如1977年他根據鄧小平的命題和要求，主持撰寫了《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982年在起草「十二大」文件期間又對李慎之說，「不要相信那個，全是胡說八道。」[95] 他在1980年5月28日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會上講話時，曾大為讚揚托派理論家比利時人曼德爾寫的《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將十五至十七章印成大字本分送中央負責同志參考。但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卻於2月20日和3月6日嚴厲批評人民出版社，說：「我想像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書，走得太遠了！」[96] 他把周揚批成了植物人，卻寫出深情懷念友誼的詩。還有一件怪事是胡耀邦說的，「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着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

89 葉永烈：《胡喬木》，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頁。

9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2頁。

91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287頁；葉永烈：《胡喬木》，第141頁。後來他在〈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一文中又批評毛澤東1957年後，「不可避免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可避免地要求助於個人作風和個人威信，最後導致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68頁。）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6頁。

93 1991年11月7日的談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2頁。

94 1980年7月18日的談話，《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95 分別見程中原：〈鄧小平一錘定音 胡喬木再度復出〉，《中華兒女》2004年第7期；李慎之：〈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

96 吳江：《十年的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7頁。

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感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97]現在恐怕也很少人能解其故。

類似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如果說這都只是些「小事」，那麼下面再就胡喬木對黨史研究影響比較大的問題談些個人看法。

參與制造和積極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一、胡喬木的毛澤東情結

胡喬木任毛澤東秘書二十五年，朝夕相處十年，思想相通，感情融洽，一直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和重用，產生和保持「毛澤東情結」是很自然的。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七一抒情》一詩中就曾寫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直到1982年6月1日他70歲生日所寫《有所思》中，仍感念於「紅牆有幸親風雨」。1992年他決定出三卷本《胡喬木文集》，在第一卷的〈序言〉中還特別交代，書中絕大多數評論都經過毛澤東修改，現在「編輯成書，既有助於研究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文章和工作作風，也是對他的一種紀念」。接着深情地寫道，「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我的寫作能力也很難像在書裏所表現的逐漸有所進步。」[98]其實，毛澤東對胡喬木的恩惠豈止指導作文，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發揮。還在延安整風中，胡喬木才做毛澤東的秘書兩年，就已被毛派去代替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所擔任的中宣部長，共和國成立後更成為掌管全黨和全國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了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保持黨的一貫文統(文件起草和把關)、把輿論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作為著名的

97 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頁。

98 《胡喬木文集》第一卷，第1頁。

一枝筆，[99]胡喬木更進一步得到重用。不但全面掌管意識形態，在黨國大事中也發揮着巨大作用。即使在逝世後，他的影響依然很大，例如專門設有整理他文稿的班子，這在政治局委員一級領導人中就很少見。所有這些，自然都與毛澤東有關。所以，只要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大樹毛澤東，胡喬木的地位和影響也就必然會持續下去。

胡喬木把宣傳和維護毛澤東當作了他的終身任務，確實也做到了鞠躬盡瘁。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出於中國傳統的報知遇之恩。由於他對毛澤東了解深，有時也有所議論，但絕不允許別人對毛澤東表現不敬和尖銳批評。遇見這種情況，他會大動肝火，堅決起而捍衛。他崇拜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二人的思想一致。現在想來，從他到延安直至去世，概括對他的印象，主要還是一個「左」字，而且是越來越「左」。所以在他主管下的黨史研究，也就只能在延安整風時規定的框架內活動，實際上仍然離不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二、胡喬木治黨史更多地是在為個人崇拜服務

像胡喬木這樣的理論家，說他搞個人崇拜(迷信)，人們也許不容易理解。其實個人崇拜倒真的往往是理論家們鼓吹起來的。積極搞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日丹諾夫，理論水平大概要比胡喬木高得多。一再說自己就是要搞個人崇拜的劉少奇，水平也不見得比胡喬木低。是否搞個人崇拜，也不能只看表面，主要還是看他的實際言行是否合乎我們在上一篇章節〈延安整風開始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列舉的那幾條標誌。而且要掂量其主要傾向，因為誰也不可能同每一條都完全相合。胡喬木有時批評毛澤東就很厲害，在某些問題上還有點看不大

99 據李銳轉述胡耀邦的話說，他在中組部工作任上時，中央要撤換張平化的中宣部長，讓他推薦人，他就提了胡喬木。「小平不同意，說無行政能力，是一枝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頁)但後來有些人把胡喬木說成「中共第一枝筆」，恐怕講不通，因為還有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等。

起。但他的主要傾向是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的。對此，上述篇章中已經有多處提到，下面再舉幾個較明顯的例子加以說明。

(1)《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宣傳個人崇拜的標本

至今仍被稱作「公認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100]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基本上甚至完全是仿照被稱為「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撰寫的，還真有點「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一篇四五萬字的文章，提毛澤東的名字竟有124次，其頻率和比例大大超過《聯共黨史》(約33萬字)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共提列寧斯大林650餘次，還以列寧為多)。《聯共黨史》還不同次數地提到十餘名其他中央領導人如莫洛托夫、基洛夫、加里寧等。而《三十年》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除作為反面人物的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外，其他人基本不提。對於長期擔任中央領導工作的周恩來和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的張聞天，還一再進行不指名的批評。如暗示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抗戰時期又「在他們所負責的工作中擅自執行他們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他個人崇拜的表現，包括對毛澤東的神化和誇張(如說黨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已能夠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說1930年前，毛澤東不僅制定了黨在十年內戰時期的總路線，還對各項具體政策都做出了重要創造等)；竊功諉過(如說反四次「圍剿」的勝利是根據毛的戰略，說瓦窯堡會議後毛一次傳達報告就「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和「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卻隻字不提富田事變和西路軍問題，把紅軍人數的減少完全歸於「黨內的錯誤的領導」等)，各種過分頌揚可說舉不勝舉。另外，《三十年》也沒有忽略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恩與歌頌(文中提到斯大林15次，僅次於毛澤東，說

100 1999年10月15日《光明日報》，載《喬木文叢》編輯組：〈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和拓展〉。

的是他對中國革命指導的正確和具有決定意義的援助，強調必須「學習蘇聯的榜樣」)。

這裏應當稍作說明的是，胡喬木以《聯共黨史》為樣本寫《三十年》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01]所以胡喬木也就按《聯共黨史》寫斯大林的辦法寫毛澤東。在學習《聯共黨史》和學蘇聯上，胡喬木的積極性絲毫不亞於毛澤東。延安整風中毛澤東主張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材料，胡喬木就提出報紙也要像《聯共黨史》那樣辦成人民的教科書。他說，「一本好的教科書，就像《聯共黨史》一樣，應該是章章都好，都經過仔細的研究。」[102]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提出，「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103]提倡全面學習蘇聯，胡喬木就要把「學蘇聯」定為中宣部的工作重點，並同主張重點「抓思想」的陸定一發生爭論。[104]他在蘇聯養病時，找我談話也多是有關學蘇聯，一次只是專門了解一下五一和十月革命節莫斯科參加集會和狂歡的群眾是如何解決上廁所問題的。回國後還寫信，要我和使館研究室多給《人民日報》寫介紹蘇聯建設經驗的文稿。(這些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延安整風並沒有反對「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教條主義」。)

(2) 胡喬木在「文革」後仍積極維護個人崇拜

「文革」結束不久，胡喬木即處於黨史界的統帥地位，他抓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宣傳和維護。

101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頁。

102 胡喬木：〈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載1943年1月26日《解放日報》，收入《胡喬木文集》第三卷時標題改為〈報紙是教科書〉。

103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64頁。

104 見鄭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10頁。按：當時陸定一任部長，胡喬木任常務副部長。但據于光遠說，常常是喬木主持會議，定一參加。

胡喬木在「文革」中也曾一度遭到「四人幫」半點名地批判，但他同毛澤東的思想感情還是相通的。在「文革」前夕，毛澤東在積極提倡階級鬥爭和奪回「失掉了的政權」的時候，胡喬木就填詞呼應：「領袖語，牢記起，百年大計爭基礎……」（1965年3月，《梅花引・奪印》）。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他也顯得與眾不同，更多地以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己任。當他「看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時，曾憤憤然地說：這是『分裂黨中央』」。「他也是較早地公開提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異議的人。」「1979年1月2日，華國鋒找耀邦和喬木談『注意當前社會上的政治動向問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宣部顧問胡喬木，在中宣部『例會』上，傳達了華國鋒談話的內容。」之後，他談到一段個人的想法時說：「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或引起一種趨勢，就是對毛主席全盤否定的傾向或否定的情緒。」「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擺在宣傳工作的第一位」，否則就會「犯很大的錯誤」。[105] 他在此後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還想維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106]

胡喬木為了維護毛澤東，對他主管的宣傳抓得非常緊，做到了有「偏」必糾。例如1980年11月5日寫給胡績偉的信說，「近來常看到這樣一種反映，即毛主席的論點在報紙上一點一點地批判否定掉了。」他列舉了三種原因，一是批判稍顯頻繁；二是批判多用否定式，只講不正確的一面，「如從正面論述，說得較為周到，印象就可能不一樣」；三是「沒有或很少正面宣傳毛澤東同志的一些現在仍應宣傳的正確觀點，無論這些觀點後來是否被他本人的言行所推翻」。他認為，「這是我們宣傳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深思熟慮。」[107] 這就是要正面

105 鄭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01、235–237頁。

106 于光遠：〈評胡喬木《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見《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國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107 《胡喬木通信集》，第293頁。

宣傳毛澤東，包括那些已被推翻的觀點。如第二個《歷史決議》雖明確指出，毛「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但還是要多宣傳他如何謙虛謹慎、關心群眾、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等。連毛澤東最明顯的錯誤，胡喬木也為之辯護。例如把造成1959年廬山會議不幸的責任想方設法推給彭德懷，說：「因為毛澤東同志的自尊心過於強烈……如果彭德懷注意提意見的方式，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108] 又如毛澤東1953年9月對梁漱溟從內容（毛的農村政策是造成現在稱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到形式都是錯誤的批判，胡喬木也「在這個問題上要為毛主席說幾句公道話」。[109] 諸如此類的辯護實在顯得太過分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日益興起的新一輪個人崇拜宣傳和造神造假運動，黨史研究的禁區越設越多，控制越來越嚴，都是同胡喬木及其學派分不開的。這裏再談一件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小事。1985年，為紀念張聞天八十五誕辰，「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經請示批准，籌備出版一本紀念文集。為此，張聞天夫人劉英特約同在廬山受難的李銳寫篇文章。李在初稿中除肯定張聞天發言的內容和精神外，還批評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的無情打擊和挖苦諷刺。[110] 文章送給胡喬木審閱，胡看後找編輯組同志談話，聲淚俱下地大批李銳的文章是「攻擊毛主席」。說他「一看之後，一夜都沒有睡好覺，一直做噩夢，頸椎麻木」。說李銳和王若水、黎澍是一夥的，「李銳比王若水還要王若水。」還批評編輯組的同志：「你們不能成為張聞天的信徒、張聞天派。不要把張聞天

108 〈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214頁。

10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頁。

110 李銳的文章題為〈重讀張聞天同志的《廬山發言》〉，登在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憶張聞天》一書中，發表時作者照顧到胡喬木的意見不能不略有修改。

神化了，把他捧那麼高，他是犯過錯誤的。」[111] 這裏表達出來的思想感情，同打壓和迫害張聞天三十多年的毛澤東可說是完全相通的。

總之，由於中共黨史研究長期受胡喬木的領導和影響，竭力適應領導上的政治需要，所以至今仍未走出個人崇拜的陰影。在喬木胡繩學派的主持和控制下，中共黨史學要進一步成為一門科學，將是很困難的。

三、胡喬木治黨史主要還在為當前政治服務和緊跟領導

(1) 關於黨史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問題

以黨史學這樣政治性強的學科，為當前政治服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這樣做的結果，不只是胡喬木所承認的：「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過分強調某個人犯了錯誤，而對這個犯錯誤的人的功勞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筆抹殺」，[112] 而且還會把黨史變成一塊麵團，捏來捏去和翻燒餅，一些歷史人物，也是今天捧上天，明天踩入地。胡喬木在一篇題為〈如何寫好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這段歷史〉的談話中強調「要好好寫一寫人物」，提到：「李大釗在黨內有特殊地位，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寫。」「周恩來對黨的歷史關係太重要了，要寫。毛澤東也可在大革命失敗後寫。他在前邊沒有發揮特別大的作用。」[113] 那為什麼作為中共黨史「奠基作」的《三十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只顧寫毛澤東，連李大釗一次也不提。如果說這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能超出第一個《歷史決議》，那麼「文革」後思想提高了，認識改變

111 胡喬木1985年5月6日在南長街家中接見「張聞天選集編輯組」張培森、施松寒的談話。原有錄音，他看到後發了脾氣才關掉錄音機。

11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54頁。

11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48頁。

了，為什麼不能對先前這種不正常的作法進行點檢討和修改呢？還要把充滿個人崇拜精神的《決議》定為研究黨史的「準繩」，把《三十年》封為「奠基作」？胡喬木在另一個地方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當然要實事求是，同時也不能不顧全大局。」[114] 這就是說，實事求是和顧全大局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時為了顧全大局就不能實事求是了。因此，明知隱瞞事實、為尊者諱、設置禁區、偽造歷史等製造和維護個人崇拜的做法違背實事求是，但為了顧全大局（也就是保持黨領導體制的道統和法統），還得那麼做。

更重要的是，「當前政治」又經常在變化，那麼為其服務的黨史也就不能不跟着變，寫好的黨史著作和作過的報告也只有不斷增刪修訂，結果就使黨史這門學科真的成了胡適說的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還得過一陣換裝一次。例如斯大林在世時，我們錯誤地跟着蘇聯反托派，因此在很長時間裏反對漢奸、托派、特務，就成為那時的重要政治。延安整風開始，王實味被當作托派、國民黨探子揪了出來，引發出一場遍及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不知造成多少托派冤案。共和國成立後的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生日），曾一舉逮捕約五百名大小托派，不少人冤死獄中，倖存者也坐牢近三十年才在蘇聯為托派平反後得到釋放。但是我們黨在對托派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卻從來沒有作過自我批評和明確表態，弄得很被動，對有關的問題和人物大多含糊其詞，實在不行，就偷偷摸摸作點修改。例如毛澤東1937年在陝北公學作《論魯迅》的講演，其中談到，「托派為漢奸組織，直接拿日本特務的津貼，已經是明顯的事情了。」[115] 此句因過於荒謬，重新發表時竟被後人不加說明地擅自刪掉了。其實這還不算什麼大事。共和

11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5頁。

115 原載1938年《七月》第10期。1981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時竟將此句刪掉。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時也只說「根據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報》刊印」，隱瞞了作者去世後擅自刪改他公開發表過的文章的作法。

國成立後大的政治變化就更多了。單是毛澤東當政的二十六年就有：先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很快變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然後是反胡風、反右派、反「反冒進」、大躍進和公社化、廬山會議、反右傾、「四清」整「走資派」、反修防修和備戰，直到「文化大革命」。黨史為這些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政治怎麼個服務法？跟着這種政治跑怎能成為信史？第二個《歷史決議》為毛澤東評功擺好中的一項──「頂住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的提法能站得住嗎？三個世界劃分的問題，不是已被胡喬木自己否定了？另外，把「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算作產生「文革」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太牽強了，照此寫黨史也只能是胡喬木說的「實事求是不夠」。

（2）關於「惟上」還是「惟實」的問題

惟上和惟實不一定矛盾。領導意見不見得都不實事求是。所以「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的提法並不十分準確。問題是，「上」和「實」之間發生矛盾時，黨史學應該如何面對。中國黨的規矩和胡喬木及其學派的以往做法，都是以惟上為主。延安整風時就是黨史跟着毛澤東的思想走。他的想法變了，黨史也就跟着變了。例如毛澤東一直是肯定四中全會的。直到1943年「九月會議」中間，他聽了康生的發言後才一改過去的說法，認定四中全會起「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碼頭。[116] 於是大家就隨即跟上。劉少奇也說，「四中全會對黨是不獨無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惡。」[117]（但劉少奇、任弼時正是在這次會上才被新選進政治局的。）從此以後，胡喬木及其學派就一直按毛澤東的定調寫黨史，而且越走越遠。對四中全會，毛澤東的結論只是說，由於「經過國際與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

11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225、294頁。

117《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31頁。

好的」。[118] 而胡喬木卻直到1990年還說，「四中全會是奪權。」[119] 這不等於說國際和中央在奪下級和自己的權。毛澤東發明和提出了「兩大宗派」（但為留有餘地還未將「宗派」寫進《歷史決議》），因此胡喬木在談那段黨史時就總是講「兩大宗派」、「王明中央」、「王明小組織」、「王明一派人」等。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黨史（包括領導人傳記和回憶錄等）也就照貓畫虎一路寫了下來。

胡喬木及其學派的「只惟上」、「不惟實」，還可以舉一個修改黨史的有名案例，就是我在前邊一章中所談過的關於張聞天的總書記問題。胡喬木參加過延安上層整風，對1931年後的黨史了如指掌，所以張聞天的悼詞送審時他親自加了遵義會議上「被選為總書記」。此後他在答覆夏衍的信中引證《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費侃如的文章，進一步肯定了張聞天的總書記職務。[120] 但是到了1982年，中央檔案館從1955年蘇聯交來的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黨的部分檔案中翻出一份陳雲認為是他傳達遵義會議的《提綱》，裏面提到會後常委分工確定張聞天「負總的責任」。對這一前後矛盾、改寫黨史的問題，[121] 胡喬木很快就改變態度，緊跟上去，還特意寫信給陳雲，表示經過他「考證」，明確了陳雲傳達的時間。[122] 從此，在喬木胡繩學派的領導和影響下，黨史著作中張聞天的總書記就一律變成了「總負責」，否則難免受到嚴

118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421頁。

11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9頁。

120《胡喬木書信集》第311頁。按費文不但指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總書記為「歷史本來面目」，而且批駁了張只是名義上的負責人、還是根據毛澤東提議的說法。

121 詳見本書第二章。另見《遵義會議文件》，第73–74頁。

122 胡喬木：《胡喬木書信集》，第608–609頁。喬木緊跟陳雲，事例很多，如陳雲1989年提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我看，沒有過時」（《陳雲文選》第三卷，第370頁）。胡喬木隨即響應說，《帝國主義論》「對帝國主義五大特徵和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的基本論斷，至今仍然適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670頁）。

厲指責。例如上引胡喬木斥責李銳的談話中就提到，「還說張聞天是總書記。中央文件都說得很清楚，沒有什麼總書記嘛！這不是混淆視聽嗎？」雖然不知道胡喬木說的中央文件何所指，肯定張聞天是總書記的鄧小平代表中央的《悼詞》和中央批准的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等算不算中央文件，反正李銳文章發表時已不得不將總書記改成了「負總責」。這也是「輿論一律」的一例。

修史上的「惟上」，也是皇權專制主義傳統的表現。延安整風以後的毛澤東，不但可以為黨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定性，而且可以進行修改和增刪，使一些事件和人物或者變了樣，或者消失了。不但毛澤東時代，黨史只能按他的指示精神編撰，就是在毛澤東後，由於仍然要維護個人崇拜，所以從前的精神還在繼續發揮作用。例如在中國近代史一個轉折時期起過重要作用的張聞天，在延安整風後的黨史上就消失了，即使在平反昭雪後也還是受到輕視。有關事例很多，除前引胡喬木的指責外，自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胡繩，也竟在紀念遵義會議的長文中，隻字不提作「反報告」、起草決議、當選總書記的張聞天。無怪乎也是老延安的曾彥修批評說，「有學者型的大人物胡繩寫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的大論文，全文未見張聞天三字，這叫什麼實事求是呢？」[123] 不但黨史，而且個人崇拜的威力也影響到古代史。被批判了兩千多年的秦始皇，自毛澤東為之翻案後，已不只是「千古一帝」，還被捧為「英雄」！

四、胡喬木與黨史中的延安文風

延安整風中批判了黨八股，卻形成了一種延安文風，影響深遠，至今不衰。胡喬木緊跟毛澤東參與了這種文風的創建，自然也就把這

123 嚴秀：〈依然是「論中出史」還是「史中出論」的老問題〉，見《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頁。

種文風帶到了黨史中來。這裏不準備也無能力談論整個延安文風，只想就反映在黨史材料中較突出的現象列舉幾件事例，中心意思仍如胡喬木所說，「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124]（其實豈止不夠）。

一是只下結論，不講根據。這種事，前面已提過不少。例如學習黨史時最令我困惑的是，遵義會議後怎麼一個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硬是被說成了全黨全軍的領導？三人軍事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卻要說是「毛澤東為首」？無論什麼場合，只要有毛澤東出場，他的名字總是排在第一。所有這些，我始終未看到根據，而且我相信永遠也提不出什麼根據。在繼續維護個人崇拜的條件下，這種缺乏根據的史實論斷還會不斷製造出來。上述胡喬木所引費侃如1980年的文章就已批判過的毛澤東提議讓張聞天代替博古職務之說，2002年經中央批准的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就又原封不動地加以重複。[125] 又如胡喬木斷言「四中全會上王明實際上做了總書記。」[126] 其實，當時王明只是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另外還有任弼時、陳郁），連個候補常委都沒撈到（被周恩來阻止，只讓他做江蘇省委書記）。官修黨史一直肯定他控制中央領導達四年之久，卻就是不講事實，不提根據。

二是模糊史實，隱蔽真像。這類事例更多。如近幾年要恢復北京古城牆，動員大家獻舊磚，但絕口不提城牆是誰決定拆的。人們長期錯怪彭真。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一個材料，得知原來是毛澤東。理由倒不是為便利交通，而是由於它系統治階級為對付農民起義而修。在這種「革命精神」下，全國的大小城牆很快就所餘無幾了。又如1938年政治局的「三月會議」明明是長江局的集體建議，卻被寫成王明

124《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54頁。

12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2002年版，第491頁。有的書上說是根據周恩來的兩次談話。但是若相信這種個人崇拜高潮時期的說法，那也應承認江青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和魯迅相提並論的兩大旗手之一了。

12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6頁。

「以通知性的口吻，單獨決定下一次會議的議程並規定會期不超過兩天。」[127] 沒有專門研究黨史和不熟悉當時情況的人，只能信以為真。特別是我們多次提到的篡改黨史的最大冤案之一的西路軍問題，至今仍是隱瞞真相、故意攪混，曾引起原國家主席李先念的憤怒和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無情揭露和嚴厲批評。此事頗有代表性，不能不多說幾句。

1937年3月，與兩萬多西路軍全軍覆沒的同時，延安正在開會批判張國燾並連及許世友等一批四方面軍將官。同年12月，毛澤東接見原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談到，「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陳雲、徐向前、李先念都一直不敢申辯，直到1982年才提出澄清，證明西路軍始終都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領導和指揮。但1991年7月在喬木、胡繩直接指導下寫出的黨史，仍有意含糊其詞，因此激起李先念的憤怒，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其中提到，「建國以後第一部由中央黨史部門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為什麼對西路軍西渡黃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這個十分明確了的問題，都不肯明確說出來呢?」「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命令西渡黃河的』……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將士嗎?」在指出黨研室既存有澄清問題的檔案又可看到有關的公開材料後質問道，「難道中央黨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聞，甚或是有意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還說，「把三十軍過河放到張國燾對中央懷有二心的後面說，我實在鬧不明白是為什麼!」[128] 在李先念嚴正批評後，該書只好改為「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於24日夜渡過黃河」。但總還要在後面一段加上一句不大連氣的話:「這時，

12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519頁。

128 馬長虹:〈李先念關於西路軍的一封信〉,《北京日報》,2004年8月23日。

張國燾仍對黨中央的領導懷有貳心」。[129] 2002年新修訂的黨史第一卷仍沿此寫法。這當然會使後人弄不清楚導致兩萬多紅軍被殲的主要責任，是毛澤東早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的「張國燾路線的破產」，還是徐向前等人後來描述的由於中央軍委給的任務「飄忽不定」，戰略指導和戰術指揮失誤。[130] 這還會使西路軍問題成為黨史上長期解不開的一個謎。

按上述精神和文風寫出的黨史，許多事都只能是真像不明、真假難分。

三是與時俱進，修改舊作。胡喬木被譽為中共一枝筆，起草和修改文件尤為特長。他也以此自詡。胡耀邦任總書記後，他就對耀邦說，「你是小學文化程度，思想很開闊，以後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131] 無論這些話說得是深是淺，延安整風後許多中央文件和毛澤東文稿不少是他起草和整理修改確是事實。他起草的文件，自然得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領導意圖，但也具有一定的個人因素。這最明顯地表現在我們前面談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上。又如他起草的處理華國鋒的決議就過分嚴峻，經胡耀邦改後才緩和了些。決定耀邦下台的1987年「第19號文件」，耀邦就認為對他是「羞辱」，說，「其中許多話並不是我說的，有的是造謠」。還說，「歷史不公平。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希望有個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新的結論。」李銳認為，這個要求帶有遺囑的性質，因此在1989年4月19日的中顧會支部會上正式提出要求轉告中央。[132] 由此可見，在中央文件中也是可以弄虛作假的。

12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219頁。

13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血戰河西走廊〉。

131 李鋭:〈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頁。

132 〈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78、303、274頁。

毛澤東的文稿，不少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整理修改。他們的做法是，對毛的舊稿、發言提綱、談話記錄等，按毛的現在思想認識加以修改或鋪敍成文，再送毛審定。有的文章還會發表一次改一次。例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時還未提及「特務文藝」和「日本黨、汪精衛黨……」之類，搶救運動後變成《整風文獻》就加了這兩段。等編《毛選》時大概覺得不雅，又刪掉了。其他文字意思上的修改也還很多。胡喬木自己就説，「收入《毛選》的文章，幾乎都改過。」[133] 只是有的改得多，有的改得少，有的乾脆從新整理、近乎新作，目的都是要顯示一貫正確。所以有些黨史專家著文講述「编毛」或「编鄧」，這個「编」字就用得非常恰當。而胡喬木等人確也能妙筆生花，不僅可以把一個只有簡單提綱的談話整理成一篇正規文章，既完全表達出毛澤東的意思，又保留毛的一定文風。但也難免體現他自己的因素，減弱毛的風格。例如《毛選》上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雖有刪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貌；放在前面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經過大砍大改重新整理，就有點面目半非。正如有的領導同志所説，喬木的短處是沒做過實際工作，不懂經濟(加上毛澤東也正好不懂經濟)，所以他整理的有關經濟問題的文章就不大內行了。例如一直被評價極高的《論十大關係》，前後整理過好多遍，歷時二十多年，卻既未起到實際作用(此後並未重視農輕和沿海，反而演變為反「反冒進」和建三綫)，而且文章本身也缺乏定性定量分析和可行性措施。《毛選》第五卷本來也由胡喬木主持編輯，並且「一篇一篇地改定後，送鄧小平最後定稿」。[134] 但因中途出了個反擊右傾翻案風，被李鑫奪了權，還批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結果歪打正着，李鑫主持編的《毛選》五卷倒還保存和公佈了一批寶貴資料。如果仍由胡喬木主持，那麼像批梁漱溟的那篇文章，就會或者不收，或者改得面目

13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8頁。

134 此處及以下情況，參閱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第182–184頁。

全非。現在的官方黨史和《毛澤東傳》等對此事採取「諱」的辦法，就是證明。其他還有些材料如批劉少奇、楊尚昆，定胡風為反革命，甚至某些反右派文件，都可能被棄置。這也是後來對第五卷造成既不願意承認(已絕版)，又不敢否認的尷尬局面的原因。

胡喬木後，這種風氣絲毫未減。他的門生們整理編輯《鄧小平文選》就是依様畫葫蘆，而且刪改得更快，見報不久的談話，收進《文選》時就作了修改，使原來寫文章引證過的人必須跟着改，才算合法(因國家規定引文根據新版)。這還不算，更不應該的是，不加説明地擅自刪改已去世者的文稿。例如編輯出版毛澤東的文集，不僅按維護個人崇拜的原則，大加棄捨，還對一些收進的文稿進行刪改。[135] 而且不只對毛澤東，對其他人就更放手了。例如我們前面説過的，楊尚昆去世後三年用他的名義編出來的《回憶錄》，不少事就和他生前説的不同，甚至相反。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對修改發表過的文獻極不以為然。至於刪改已去世者的文章，更可能是世界少有。

四是永遠正確，不留餘地。延安整風創建了一條必須遵守的不成文規矩，就是批評者掌握着真理，不容被批評者辯解和反駁。胡喬木當時寫的《解放日報》社論《教條和褲子》，就有這種味道。由於先使大家產生原罪感，所以對來自領導和積極分子的批評就只有檢討而無由答辯了。例如決定對某人進行批評或鬥爭時，先就預設了前提和結論，而且相信大家只會跟上來，不會有不同意見，更不會有反駁，否則他們必定犯「眾怒」，遭圍攻，還可能加重處分，甚至丟掉飯碗。藺

135 對此，上引于光遠書中也説，胡喬木整理時「加工可能多了些」。再舉一個小例子，《關於模特兒問題的指示》。《黨史資料》原先所載，有對齊白石、陳半丁、徐悲鴻、劉海粟的評語(説齊陳「就花木而論，還不如清末某些畫家」，而且「沒有一個能畫人物的」。只有徐悲鴻、劉海粟「學過西洋畫法」。見《毛澤東大觀》，第666頁)。在收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05頁，還注明「根據手稿刊印」)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19頁)時卻把這些給刪掉了，弄成了兩個版本，一看就會感到後者可能是造假。

軍就曾因主張王實味有答辯權和持有一些不同意見而下鄉種地當了老百姓，兩年沒吃公糧。另外，延安整風還開創了一個傳統，就是把事後的想法說成是先前的認識，還理直氣壯，使之成為定論。例如毛澤東說他在遵義會議上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為了分化兩個「宗派」，就屬這類。後來這類事後諸葛亮的論斷越編越多，而且不斷宣講，不容深究，久而久之，人們也就信以為真了。突出的事例，也許要算多年後提出的延安整風實際上是整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風。這是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才開始講，後來不斷重複和強調的。胡喬木也就聞風而動，一改從前一切學蘇聯的主張，強調中國黨和毛主席同共產國際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尖銳的鬥爭。[136]「文革」後正式出版的黨史，又都據此給延安整風追加上了一條新的內容，即「破除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137]

五是權威自居，專橫武斷。喬木胡繩學派對中共黨史研究、論述、資料管理等的壟斷，是在黨中央決定和領導下進行的。單就此而論，以權威自居既是事實，似乎也說得過去。但這樣一來，就等於真理受到壟斷，學術完全變成政治。我自學習黨史以來，感觸最深的可能就是這種壟斷和武斷。這在上述各章節中都曾談到，例子也舉過不少。因為這種權威的面孔和武斷的定論，實在不能令人心悅誠服。所以這裏還要舉幾個小例子。胡喬木說的，王明中央「跑到中央蘇區，把原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統統拿下來」，[138]就屬極端的誇大和武斷，因為他舉不出拿下了哪些人，更不用說「統統」了。又如他還對白修德拍着胸脯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他們（指毛澤東和江青）只有很短一段時間住在一起，長時間不住在一起，甚至很長時間

136《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7頁。

137 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5頁。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第70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88頁。

138《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7頁。

不見面。」毛江結婚近四十年，據我研究（頭二十年多少有所了解，後頭不到二十年有諸多材料證明），情況正好相反，即相對而言，只有短時間不在一起，長時間反倒在一起。他又說，「總之，毛澤東在很長時間裏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質。」[139]照他這樣說，江青怎麼能進政治局，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始終沒有像陳伯達、王關戚之流被拉下馬來，還幾乎當上了黨的主席？胡喬木還斷言，彭德懷住在醫院裏和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受摧殘，藏在什麼地方，毛澤東都不知道，甚至「周恩來也不知道」。[140]這又是極端的武斷。有些連毛澤東自己也是公開承認的。例如對賀龍，他就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141]周恩來也說，「我沒有保住賀龍啊！」因感內疚（是他把賀從西花廳送去西山的），連向賀龍遺骨鞠了七個躬。[142]胡喬木肯定毛澤東不知道，就不禁令人想起惠施和莊子的辯論：「子非魚，焉知魚之樂？」這類武斷的例子確實俯拾可得。例如前一陣看到一篇文章，說毛澤東「是一般不叫別人為他擬好現成的文稿和講稿的。他總是自寫文稿，自擬講話提綱」。針對有些傳言「說毛澤東哪篇哪篇著作是誰誰寫的」，於是斷然下結論說：「這全屬無稽之談。」[143]我雖初學黨史，知之甚少，但我就知道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八大開幕詞是田家英寫的。還看到胡喬木說，「當時以毛主席名義發表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不能說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稿子是李富春寫的。」[144]我在延安也還知道寫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有個起草和討論的班子，其中就有張聞天。這些大約

139 以上見《胡喬木談中央黨史》，第217–218頁。

140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4–215頁。

141《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76頁。

142《周恩來傳》（四），第2139–2140頁。

143 見《百年潮》2003年第12期，第4頁。

14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6頁。

起碼不「全屬無稽之談」。另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收的許多外交禮儀性的文書，特別是宴會致詞和賀電之類，多是外交部起草，毛極少修改，大多圈閱同意、採用原件。這類文書，我就經手不少。可見毛澤東署名的文稿不一定「他總是自己寫」。

六是絕對化和籮筐主義。所謂絕對化，就是對人和事的看法和定論只憑一時一事，太不客觀，被認為好的人就一切都好，錯誤隱掉或變成好的；被列為壞的人就生來壞，沒做過好事，即使做過也屬用心不良搞投機。林彪以前，曾經桂冠滿頭，到處奉承；出逃後，歷史一下變黑，連打仗也不行了。還有些人，不算壞人，但又不宜宣傳，就設法把他從歷史上抹掉，以免影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胡耀邦在幹群中威望極高，但就是不准編輯出版他的文集和別人寫的紀念集。趙紫陽就更是誰提誰犯錯誤，弄得似乎歷史上沒有這個人。黨史上的所謂籮筐主義，就是機械分類、各有籮筐、好壞分明。好人的籮筐，盡給放好的東西；壞人的籮筐，有壞的東西都往裏面裝，兩者都是多多益善。例如康生，以前總還做過些好事，還頗有才華，但定為壞人後就一件好事都沒做過了，即使不是他做的壞事也都扔到他的籮筐裏。這類事例太多，人們也見過不少。只是這種不實事求是的做法還在進一步發展。

以上列舉體現在黨史學中的延安文風，描述的不一定準確，也不能說主要內容就只有這些。其他如有些人提到延安文風的表現：自設邏輯，把話說死，盛氣凌人，強詞奪理等，在黨史研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最後必須強調說明的是，喬木胡繩學派的學者，並不都是如此。對黨史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學者就不在少數，多數黨史工作者也是在埋頭苦幹、做出了成績。但總的說來，作為這個學派，始終沒有跳出個人崇拜的羈絆，也不能不遵守歷來規定的許多清規戒律，因此不會身由自主地採取歷史主義的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只能在那個固定的圈子裏轉，這就必然要或多或少具有延安整風的精神和文風。

黨史學中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以上各章節表明，延安整風創建的中共黨史編纂學(簡稱黨史)確實存在問題不少，最根本的正如胡喬木所說「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只是他說得輕巧了點，實際上就是違背「求真」這一史學根本原則。「文革」後，黨史在喬木胡繩學派的主持下仍然保持了這種精神。根據個人體會，比較突出的問題，可以舉出以下幾點。

個人崇拜精神貫徹始終

黨史從延安整風起就一直貫穿着個人崇拜精神，至今不衰。這既是整風當時所要達到的目的(樹立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神聖地位)，也是後來保持黨的領導的需要(維護政權的道統和法統，即意識形態的壟斷和行使權力的合法性)。隨着主客觀情況的變化，個人崇拜自然會出現起伏和表現形態的不同，但本質不會改變，而且往往是一個高潮過後，會出現表面上的隱蔽和形式上的收斂，但繼之而來的又是一個持續時間更長的高潮。這幾乎成了黨史發展的一條規律。如前所述，延安整風期間曾經掀起個人崇拜的高潮，出現言必稱毛，集會必喊萬歲、唱《東方紅》，請示報告必將主席與中央並列，並以主席為先等。此後由於遭到蘇聯的抵制和慮及奪取政權的需要，曾主動降調，如十年不提毛澤東思想，規定不祝壽、不以個人名字命名城市、企業等。及至斯大林逝世，特別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個人崇拜就掀起了更大的高潮，其規模和聲勢遠遠超過當年的斯大林。例如據統計，被稱為「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前後十六年用各種文字也只出了三百多版，印行4,300餘萬冊。而《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冊，單是最後十年(1966–1976)就出了一千多版，印數37,581萬餘冊；《毛澤東語錄》三千餘版，印101,060餘萬冊。至於對毛澤東評價之高、崇拜的宗教化程度，更是斯大林所望塵莫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了低潮，可以對毛澤東進行一些求真的研究和嚴

肅的評論了，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仍得到堅決維護。上世紀八十年代，又湧現出一個新形式下的新高潮，並在不斷發展，看來還會持續相當時期。歷史不會重複，這次高潮也有它的顯著特點，就是形式和做法變了，但個人崇拜的實質不僅沒有變，還做得更堅決、更深入和更普及了。這表現在：第一，輿論管制趨於嚴緊，對黨史和毛澤東的研究受到更多限制，連《歷史決議》中的有限批評，如被徹底否定的十年浩劫，實際上已不允許多說了，這意味着還在不斷增設事實上的新禁區。第二，利用各種形式加大宣傳力度，特別是大量編寫和發行歌頌與拔高毛澤東的書籍、材料、文藝作品。而且作法翻新，增強了人情味和生活化，使群眾更容易接受。像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友誼啦，毛如何關心愛護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啦，毛的生活是怎樣地儉樸啦等等。電視連續劇《長征》和《延安頌》可算得個人崇拜的經典作。我同有些老延安議論，《延安頌》真可同歌頌斯大林的電影《攻克柏林》之類相媲美。第三，用更加隱晦、含糊的手法為毛澤東開脱罪責和增添光輝。不但上述李先念干預後改寫的黨史文稿仍然讓人看不出毛澤東的錯誤，而且在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還將開創共運史上(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前)大規模自己人殺自己人先例的反「AB團」，隱約地歸罪於「左」傾中央。先説起因是根據中央的多次指示，後歸結為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指導有關。只點糾偏的項英、周恩來之名，卻絕口不提當事人毛澤東及其所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等有關文獻。[145] 其「為尊者諱」的用意，再明顯不過。

個人崇拜陰影籠罩下的黨史學，不可能「求真」，不會成為「實錄」，也很難稱為科學。

145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2002年版，第402–403頁。

重「實用」而輕「求真」

古今中外的史學家都強調史學求真實錄的原則和經世致用的功能。古希臘的盧奇安説過，「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求真。」(《論撰史》)當代中國的周谷城也説，「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周谷城學術精華錄》)[146] 求真是史學的生命和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揮它的實際效用和社會功能。所以孟子説，「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果對史實進行掩蓋和造假，那就會使史學喪失生命，給實踐帶來危害。我們的黨史學卻在這方面由於受到限制而有意(多數情況)無意(對少數人來説)地犯「曲筆」、「失真」的毛病，從而妨礙正確汲取經驗教訓，使不少錯誤(如歷次肅反中的極左)一再重演。而且我們特別重視的「實用」和社會功能，除考慮到當前的實際利益，更多地還是為了維護黨的偉大光榮及其領導人一貫正確的形象。採取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捂蓋子，凡是不利的史實、資料就加以掩蓋、保密甚至銷毀，使你無法「求真」。例如，為了證明毛澤東一貫正確並同抗戰後的王明右傾投降路線進行鬥爭和劃清界線，就説「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是王明提的，毛表態雖委婉但不同意，因此對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記錄和統一收繳與會者的章節本就得加以絕密保藏，連章節本主人都不得查閱。[147] 與此有關，如1938年政治局三月會議記錄、任弼時隨後向共產國際提交的書面報告和補充説明、中央和長江局的來往電報等，都長期保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因當時即公開印行，無法收回，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均未收，更未再出單行本)。有趣的是毛澤東後

146 轉引自瞿東林：〈論史學的求真與經世〉，載《光明日報》2003年3月25日。

147 章節本一事，《王明評傳》等材料均有披露。因為對王明，中央一直不予放過。七屆二中全會決定要他寫一個歷史錯誤的聲明書，他拖着沒寫。1950年三中全會又作出專門決定，批評他的態度和重申要他寫聲明書。8月17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發還章節本，未果，10月即去蘇聯治病。

來召開的許多小範圍重要會議，竟不讓作記錄，更不得錄音(「文革」前楊尚昆即為所謂「竊聽器」事件被打成特務[148])，使得有關大事無法查清，可以由他事後作各種解釋。「文革」十年，他留下的書面指示和談話就不多。

在黨史研究上遍設實際上的禁區，更是公開禁止「求真」，這是人們已習以為常了的。其他注重實用(所謂照顧影響，大局為重、保持穩定等)所採取的辦法和涉及的方面還很多，前面也提到一些例證，無須再多講。這都説明，不同程度且多為有意地違背「求真」原則，不夠實事求是，本是中共黨史學創建以來所具有的特色，而且還會和個人崇拜一起繼續保持下去。

黨史研究中的「人治」

延安整風以後，我們黨一直實行的是人治，也就是領導説了算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人治會滲透到各個方面，特別是「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149]黨史更不例外。延安整風中對一些重大黨史問題的定性和重要人物的臧否，最後都是毛澤東説了算，寫《歷史決議》和後來寫黨史，也只能以此為准，不得超越。例如他説，「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碼頭」，[150]主要根據就是王明寫了一本《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於是一切黨史讀本一直到現在也還得遵循這一論斷。[151]

148 據説，實因毛講話聲音小，為使大家聽清，中辦給開會處安了個小擴音器。另一説法是，為了事後查閱和保存檔案，放了錄音器。

149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見《紅旗》1967年第9期社論的引證。

1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

151 如《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31頁；《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08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295頁；《中國共產黨簡史》，第38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392頁；等等。

毛澤東的看法如果發生變化，黨史界也就跟着變化。如從延安整風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特別是蘇共二十大)，毛澤東主張一切「以俄為師」，而且重大問題隨時向斯大林請示彙報，誰要説蘇聯、斯大林的怪話就可能以反蘇反共反革命論處。後來斯大林受到揭發批判，中蘇關係鬧翻了，毛澤東隨即改口説他對斯大林一直有氣，連有的紀念文章都是「違心」之作，延安整風實際上也是整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風。一切黨史書自然緊跟，如説毛澤東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進行了長期的激烈的鬥爭(胡喬木語)，説延安整風破除了「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各種新版黨史教本)等。毛澤東之後，黨史仍然實行人治。毛曾把黨史歸結為十次路線鬥爭，黨史書也就照此寫去，我現在還保存有好幾本。後來鄧小平説不要濫用路線鬥爭，於是由中央指導編寫出版的大型和簡要的黨史教科書上，路線和路線鬥爭就被一筆勾銷了(只是共產國際定的「立三路線」名詞還有時出現)。全黨上下講了幾十年的毛澤東之前有六朝領袖，鄧小平的三代核心説一出，又都不算了。至於歷史人物的臧否褒貶，更得領袖説了算或拍板認可。如七大以來的所謂第一代領導集體排名，除開始一陣有所變化外，後來一直固定為毛劉周朱。但在劉少奇平反後，不知從何時起和根據什麼，排名順序一律變成了毛周劉朱，還印上了鈔票。這一周升劉降的排名法，必然是最高領導意見，非黨史工作者所敢隨意變動，更不能號令全國執行。

對黨史研究的人治，就使研究者不是先去求真(了解實際情況)，而是先查説了算的領導言論；不是從史實研究得出結論，而是先有結論，然後找材料編理由進行説明和闡釋。所以我們的黨史研究總是先出了個什麼「論」(論斷、論點、理論)，然後就是大批論述、發揮這個「論」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而不許有研究這個「論」能否站住和合不合乎實際的課題。這不但是所謂史從論出，而且勢必導致黨史研究的僵化，變成八股。

關於三代核心說

既然提到了三代核心之論，這裏就適當展開作點說明。因為這一說法，不但在黨史研究上被奉為圭臬，而且遍及政治理論以至整個社會輿論。於是有關第一代領導集體、第二和第三代核心的研究和談論，一直長盛不衰。不僅被當作建黨理論、黨史準繩，而且還是政治與組織原則。其實這一說法是很難成立的。第一，我們黨在毛澤東以前，既無正確政治路線，又無組織領導核心，豈不成了烏合之眾，那一段黨史算什麼？實際上即以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而論，其思想、學識與人格魅力，在黨內外均享有崇高威望，即使公開批評他的瞿秋白對他也一直非常尊重。一貫連任五屆的總書記（稱呼前後不同，實際完全一樣），在其任內怎麼竟能不算核心？第二，如果說只有執行正確路線的領袖才算核心，那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五十年代下半期直到「文革」，毛澤東已不能算，中共豈不是又長期無核心了？第三，核心的傳宗接代從在實踐中形成變為實際指定，不是把我們黨的領導地位變成封建時代秦始皇設想的那樣世代相傳，事實上取消了黨內民主，使選舉變成形式了嗎？總之，這種核心說，既不是建黨理論，也並非組織原則，提出來只是由於一時的政治需要，為使瞬息間產生的領袖有法統依據，要使大家特別是領導層認可和擁護，實行順利的過渡和領導體制的長期穩定。因此，對於這一適應一時政治需要的說法，不宜作為黨史中的一個原則大肆宣傳，更不可把核心的代代相傳制度化。

其次，對每代核心也不必都搞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和新階段。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學說，當然會不斷發展，但說全面發展和新階段並安個新的名詞卻要慎重。因為馬克思主義包羅範圍較廣，一些人涉獵有限（讀的很少），怎麼可能全面發展，還提高到新階段！那只能靠許多人幫助編織、發揮、勉強系統化。連胡喬木也只得說，「我們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解釋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那樣是妄自尊大。」[152]毛基本上沒讀過馬克思的主要政治經濟學著作（更不用說魁奈、斯密、李嘉圖了），怎麼能談得上對他的經濟理論的發展。哲學也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勉強湊起來的體系，其實說不清楚，人們也不容易理解。而且一代領導要有一套學說，長此下去，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不也得搞一大串嗎？

黨史中的公式化和片面性

關於黨史研究中的絕對化和籠筐主義，前面已有說明和評論，這裏就不再多說，而只談以下幾點。

一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公式。創造和長期使用此公式的用意，就是不管定量、不談實際，都要肯定成績是主要，政策是正確的（也許執行上有缺點）。其實套用這一公式的，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更多的恐怕還是隨大溜，做應付。例如在大躍進和公社化遭到慘重失敗後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在信中先肯定路線正確、成績偉大，張聞天在發言中更直接套用了缺點和成績的關係，說「我認為是一比九的關係」，[153]結果還是引來滅頂之災。後來乾脆把說缺點稱為刮「黑暗風」，致使用擔架抬的饑餓病人還要對人說「吃得飽，吃得好」。這可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事。「文革」後不大講九個指頭了，但實質未變，仍然是誇大成績、掩蓋錯誤。例如一本正式黨史小冊子，[154]也要大講「文革」前的「十年建設成就」，寫上十年修鐵路八千公里、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但大躍進造成的三年困難、生產和生態的大破壞、餓死

152《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79頁。

153《張聞天選集》，第509頁。

154 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簡史》。

幾千萬人，就不提了(只見到有一本書提到劉少奇對毛澤東說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55])，因為這也只是「一個指頭」。而且在談到原因時還兩次不忘提到「蘇聯撕毀合同」(我親自聽過傳達的周恩來說，三年困難與蘇聯撕毀合同關係不大)。正是這種片面性和公式化，使我們在官方黨史著作中看到的不是中國人民經受過並將遺禍百年的十年災難，而是(以標題為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糾『左』的努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等。[156]

二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的公式。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用形象量化的說法，是不科學也毫無道理的，對某些人用此公式，目的就是企圖以功掩過，逃避歷史批判。各人應功過分明，功是功，過是過，但不應功過相抵，因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所以從沒聽說有人提過托洛茨基的功大還是過大，林彪的功大還是過大。提的只是斯大林、毛澤東這些要保護的人。至於三七開、四六開之類的比喻，實際上只是數字遊戲，並非科學計算。例如一個人殲滅了成十上百的敵人，挽救了自己的部隊，立了許多功勞，但卻錯殺了自己一個同志，如在延安時的黃克功，你說他功大還是過大，應該怎麼開，結果還不是經過審判被槍斃了，什麼功勞也不算。[157]因為任何功勞都不能說明殺人也可以功抵罪。同樣，認為立有蓋世功勳的人，用各種方法迫害大量無辜、整死無數好人，做了不少貽害子孫後代的事，仍然無損於他的光輝與正確，恐怕也是說不過去的。

155 〈王光美談話記錄〉，1994年，見《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31頁。編按：《鄧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356頁，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在鄧力群參加的一個會上也說過，「人吃人，歷史上發生這樣的事是要在史書上記載的。」

156 以上分章標題分別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簡史》以及《毛澤東傳1949-1976》。

157 毛澤東：〈致雷經天〉，《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0-111頁。

三是人皆「完人」。前面已經談過黨史對人物的處理就是「好人全面好，一輩子好；壞人完全壞，生來就壞」。這已成為多年的八股，其片面性和不夠實事求是，人們已習以為常。這裏要特別一談的是現在盛行的為領導人立傳和寫回憶錄的問題，寫到誰，誰就是完人。連胡喬木也說，「現在寫回憶文章，好像回憶誰，誰就都是正確的，形象非常高大。」[158]但是這已成為必須遵守和越拔越高的潛在法則。比如胡喬木本人，將來必定會被寫成極為高大的完人，至於人們都知道的缺點(更不用說一些人不大知道的，如他在兒子成為中央所抓大案要案中的責任等)，只能一筆帶過，或根本不提。組織班子給領導人寫的《回憶錄》，也大多是以現在的觀點編織過去的故事，誇張的成分多，檢討的成分少，遇到黨和領袖的一些陰暗面也往往設法繞過，以維護黨和領袖的偉大正確，以保持回憶者的「晚節」。而這種《回憶錄》又被大量用於領導人傳記，使虛假因素相互影響。胡繩提的「兩頭真」，[159]其實也是很難做到的。他晚年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就距「求真」甚遠。有些同志晚年思想已經很解放，談了許多以往的真實情況，但要整理成文，他們仍顧慮多端，涉及對領導人某些缺陷的議論，則堅決要求刪去。

關於如何對待黨史文獻和資料的問題

有關研究整風資料問題，在前面《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一)》中已作過專門說明。這裏只着重談一個如何對待黨史文獻特別是兩個《歷史決議》的問題。

15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43-244頁。

159 見張勁夫：〈我也是個「兩頭真」〉(《炎黃春秋》2004年第11期)；鄭惠：《程門立雪憶胡繩》中之一節，〈從「惑而不解」到「粗知天命」〉

至今把兩個決議定為研究黨史不得逾越的準繩和規範，實際上就是對黨史研究的禁錮，使之在當年的歷史條件下原地踏步，不得有重大發展和突破，研究也就變成了復述原則和補充點零星細節，談不上科學研究了。這當然不能説是合理的。因為作決議有當時的歷史背景、政治需要和認識水平，不可能一錘定音，窮盡真理。必須根據歷史和時代的發展，研究的深入和認識的提高，及時更新觀念，改變違背歷史事實的過時看法。這應是唯物史觀的起碼要求。我們既然早已放棄把《聯共黨史》看作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理論聯繫實際的典範等論斷，按道理也不應再堅持以《聯共黨史》為榜樣作出的《歷史決議》。而且事實上，後來的官方黨史也並沒完全按這個路子寫，許多提法也改變了。那為什麼對民間研究卻要強調必須以此為基礎而不得超越呢？這就使《歷史決議》成了限制黨史研究的工具，提出不同意見就可以給你戴上違反決議的帽子。

至於黨章上規定的「執行黨的決議」(有不同意見還可保留)，那是指實現當前任務的決議，絕不是指幾十年前的決議，更不是指建黨以來的歷次決議。否則我們黨就只能一直向後看和開倒車。這同樣適用於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隨着新資料的發掘和認識的提高，對於原來不實事求是的判斷和結論必須推翻，還歷史本來面目，並進行應有的檢討和批判，而且光明正大，不護短不掩過，也不必偷偷摸摸地進行修改。

其次，關於檔案解密問題，前面也曾多次提到，這裏還要作點補充。1987年9月5日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就已規定要開放1949年以前的中共檔案。八十年代也確實公佈了一部分，可惜實在太少。根據1990年10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方法》，國家檔案局1991年第28號文件對開放檔案作了具體限定，即從檔案形成之日起已滿五十年但仍有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可繼續延期開放。這就為不按期解密設下了前提條件，可以由當權者自由決定。另外，對繼續保密的還有些具體規定，包括對各級領導人的

政治評價，「開放會影響其個人形象、聲譽的檔案」；「涉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重大政治事件還未做出結論的，開放會影響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檔案」；以及其他共有數十項。這些限制雖然規定得很嚴，但也不一定能做到。例如經過延安整風，對王明等人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徹底清算，問題是應該算有結論了。那麼有關的檔案，如當時提到的洛川會議、1937年十二月會議、1938年三月會議和六中全會，以及長江局，任弼時、王稼祥、陳雲等人向共產國際的彙報等檔案為什麼還不解密呢？難道為了領導人的形象和聲譽，黨和國家的重要檔案就要永遠密藏下去？那歷史怎麼研究？教訓怎麼汲取？設一門黨史學科只是為了宣傳黨和領袖的偉大、光榮、正確？還有個問題值得在此稍為一提的，就是檔案的保管和處理也體現了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而且這種體制大概還要長期保持下去。無怪乎中國的國史和黨史分不清，一部黨史可以涵蓋近現代史的一切主要方面，國史變成了黨史的一張皮。在黨管一切和一元化體制下，國史有無存在的必要也都成問題了。

最後，連帶再談一點，就是關於在思想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對此，雖然黨章中黨員一章並無明確規定，但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曾多次提到並一再強調，當成重要的黨內紀律。如果這是指執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包括政改)開放、實現現代化的政治路線，在當前的情況下自然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指在一切思想和政治問題上都必須和中央以至中央領導同志的口徑保持一致，那就很不合理，是嚴重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長時期同中央在思想政治上不保持一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也沒和中央保持一致，但都是作為典範載入史冊的。在那時和中央保持一致反而是犯了錯誤。至於對中央領導人個人的言行更不能有此要求。例如「文革」後同副主席汪東興保持一致，那就只能遵守「兩個凡是」。因此，在思想政治問題上，共產黨員應首先服從真理，而實踐又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此不合的其他要求和限制，都可能成為壓制民主自由和欲加之罪的藉口。

高華、王若水在延安整風研究中的誤區

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除主流黨史學外，獨立的研究成果我看到的很少，只讀過高華、王若水、楊奎松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散篇文章。他們都能另闢蹊徑，提出獨到見解，給人以啟迪。特別是高華和楊奎松，蒐集和提供了大量材料，我就從中得益不小，也作了不少引證。我關於延安整風的學習章節，主要是對主流學說提些不同意見。但最後也想對高、王兩位的整風研究代表作提點個人看法，其實是班門弄斧。而且有些意見前面已經談過。這裏還要特別提出來，主要是為了說明，多年來的宣傳教育，連一些有獨到見解的著名學者都難免受其影響，更不用說一般人了。依我的管見，他們的研究各有千秋，但有個共同點，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從一個不真實的前提出發，即認為延安整風主要是針對王明及其後台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而且取得了勝利，掃清了蘇聯影響，實現了獨立自主。這說明他們不但沒能完全從幾十年來關於延安整風的主流宣傳和相關資料中「獨立」出來，而且帶有相當成分的主觀臆測。

而有關延安整風有意無意設的誤區也着實不少，在談過高、王二位的著作後還要談其中兩個主要的誤區。

關於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60]

《紅太陽》是在這樣一個不合乎歷史事實的命題下展開的：「毛在延安領導開展了一場以肅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為目標的思想和組建的工程。在那幾年，毛並不那麼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黨掃清了積存多年的蘇聯崇拜情結，並把黨內的『國際主義』代表

160 全名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為省事，文中一律簡稱《紅太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人物趕下了台。」[161] 從這一結論出發，再加上情緒化，就使該書對延安整風的脈絡描述難免差之毫釐。這裏只舉數例。

其一，《紅太陽》主要討論的是毛在黨內鬥爭中「複雜詭奇的政治謀略」，大量資料都是用來為這一主題服務，使得許多標題也變成了臆測。談論頗為詳細的《從毛張聯盟到毛劉聯盟》，不少描述就是出於作者的想像。把1937年的12月會議，說成毛的「讓步與等待」，把毛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論新階段》說成毛的「兩面策略」等，同樣遠離了當年的事實。至於《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毛澤東與王明的公開交鋒》以及什麼「處境尷尬的軍方」、「進退失據的周恩來」等標題，也多是虛張聲勢。延安整風是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層包括多數高級幹部在內的共同襄舉，不能只歸結為毛澤東個人「爐火純青」的「政治謀略」。我認為，對延安整風也適用「一分為二」，[162] 其所以在行文中對積極方面着墨很少，是因為主流黨史對此不但已經講得過多，而且有許多掩蓋和誇張不實之詞，需要加以澄清，不是說延安整風就一無是處。

其二，把黨的領導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廣闊胸懷的爭權奪利之徒。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爾虞我詐，就是勾心鬥角；這個人是那個人的「班底」，那個人是這個人的對頭；幾乎看不到什麼團結互助、患難與共的同志情誼。書中說的：「毛澤東對王明素無好感」，只有「憤恨」與「嫉恨」，對張聞天「是出於本能的排斥」，「鄙夷」和「反感」；說任弼時、陳雲、李富春都是毛的「內管家」；項英則是王明的唯一支持者，等等，[163] 都是些沒有根據的主觀判斷。其實，那時的延安人，總的說來，從上到下都是抱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和歷史樂觀精神的，即使受到委屈，也並無動搖。這是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了的。抗戰勝利後，我在東北曾陪同和接觸過一批領導人如陳雲、高崗、張

161 高華：〈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百年潮》總第4期，1999年7月號。

162 見本書第七章《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163 見《紅太陽》第135、91、229、146頁。

聞天、李富春等，看到他們確實是親密合作、團結對敵，相處也很融洽。而那時正是才經過延安整風。

其三，沒有完全根據事實臧否歷史人物。以對張聞天的評論為例，多次強調張的地位觀念，說他怕王明回國奪取他的總書記，「本能地」將路線錯誤和「自己的政治前途」聯繫在一起。還把中共黨史上少有的一個政治學習高潮和理論繁榮時期，說成是張聞天在六中全會後「一手掀起延安學習馬列原著的熱潮，言不及義，紙上談兵，竟給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實質，純粹是對『學習運動』別有用心的誤導，目的是讓張聞天、王明等這批『學閥』、『黨閥』繼續霸佔黨的文宣陣地。」[164] 對張聞天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會同意作者的評說。特別是發生在張聞天平反昭雪後，已有大量史料披露和對他已有公正評價的今天，這些論述着實令人吃驚。至於把任弼時說成是配合毛「借洋師助剿」王明的「高級說客」，[165] 同樣是沒什麼根據的。須知，任弼時在延安整風中並不是隨便緊跟毛澤東跑的人。胡耀邦就說，「弼時善於獨立思考，不盲從」，在延安時毛為勸說他參加清算「左」傾路線「寫有十封信」，任也「曾不同意『王明路線』的說法」。[166] 單從這兩個例子已可看到一斑。

王若水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

王若水是我崇敬的哲學家。他對延安整風的論著我只看到兩篇，一是前面評論過的《整風代替了啟蒙》，二是《新發現的毛澤東》的頭兩章。單就這兩篇而言，對延安整風，作者在許多問題上還限於人

164 對張聞天上述評論，見《紅太陽》，第91、92、143、194等頁。

165 見《紅太陽》，第164、167頁。

166 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懷念耀邦》第四集，第294頁。

云亦云(主要是長期以來的官方宣傳)加上個人感想的水平。這裏只就新出的這本遺作舉幾個例子。

對王明的估計大多不合乎史實。如說他在四中全會爬上了中共的「最高寶座」；說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通過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王明是「共產國際的寵兒」；說彭德懷和項英都聽命於長江局，「毛幾乎喪失了對新四軍的影響」；說毛澤東編《六大以來》是針對王明的小冊子[167] 等等，都並非什麼「新發現」，主要還是抄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68] 除高華、王若水兩位外，對王明的作用和影響作過高估計的頗為普遍，下面還須專門一談。

王若水其他違背史實的判斷還很多。如說遵義會議後張聞天「實際上已不太管事」，就恰恰弄顛倒了。事實是，長征出發前張聞天已被博古架空，沒什麼事可管，所以才有可能和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的「三人團」，而當選總書記後反而真管起全黨的事了。這是我在第一章中就已談過的。又如說，「搶救運動的剎車，應當歸功於周恩來。」[169] 這表明，王若水太不了解延安搶救運動了。如果只憑溫濟澤和師哲等人的「回憶」，那搶救就完全是康生搞起來，經毛澤東發現並制止的。實際上，搶救期間周恩來處境已很困難，對運動只能旁觀，他對幹部所寫的證明都被置之不理(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穆欣)。在搶救中處於旁觀地位、實際上失去發言權的還有張聞天。他一開始就向康生反映，碰了釘子，後來實在看不下去才找任弼時談。對延安搶救真正起剎車作用的首推前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給毛澤東的信，其次應歸功於任弼時，再次是劉少奇。實際情況是，運動也搞不下去了，只好轉入內部甄別，停止群眾運動。

167 分別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三版，第36、35、39、56頁。

168 參閱該書的《談話錄》部分，第46、47、49、75、27、45頁等。

169 上述引文分別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43、77、97頁。

由於許多事實沒弄清，王若水所做出的一些判斷也不可能準確。例如他說，「毛的主要策略，就是以王明為主要對象，同時盡可能把周恩來牽涉進去。」這也缺乏根據。因為直到1943年上半年，整風都並未以王明為主要對象，對周恩來更不是盡可能牽涉進去，他本來就是整風的一個重要目標。説毛澤東在七大講兒子勝過老子，「後來居上」「這句話的時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170] 也純屬主觀臆測，實際上當時正處在對斯大林崇拜的高潮中。其他例證就不用多舉了。

在王明問題上的誤區

中共黨史上人為製造的誤區很多，長期的公開宣傳和真情保密，使許多假説已得到人們普遍承認。例如包括高華、王若水在內，都相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等。有些問題前面已作了些辨析，這裏只就高、王二位在延安整風研究中陷入的兩大誤區：對王明的看法和中共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關係，談點個人意見。先談王明。

主流黨史學為了強調延安整風主要是反對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所以就要把王明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作無限的拔高和誇張。高、王兩位由於不了解具體情況，也跟着進入誤區。例如《紅太陽》中説王明「四處報告」，被「普遍認為是天才」，「公認為活馬列主義」，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等等，就多屬虛構。1938年，王明在延安的時間不多，不可能到處報告和寫文章。六中全會後由於政治地位的下降，他的活動已比其他一些領導人要少，更不能和毛澤東相提並論。我當時作為抗大的學員和隨後的理論教學人員，就從無《紅太陽》描述的這種感覺。近年同幾十位老延安一再談起，都認為王明

170 見王若水同書，第42、112–113頁。

是共和國成立後硬被作為反面教員吹起來的。但影響所及，連舒蕪在他的《口述自傳》中也説，「老實説，在這(指《論持久戰》出版)之前，王明(陳紹禹)對知識界的影響，要比毛澤東大得多」，[171] 這更是天方夜譚了。延安的知識界絕不會把王明放在毛澤東之上，多數人還是1938年後才知道王明這個名字的。就是國統區的知識界，從郭沫若、茅盾等著名文人到多數救亡知青，也不會對兩人的情況有如舒蕪這樣的了解。例如柳亞子早在1929年就已把毛澤東和孫中山並列為中國兩列寧。[172]

關於王明，還可再連帶談兩個問題。

一是不能説王明1931年後一直執行「左」傾冒險路線，抗戰初期又完全執行右傾投降路線。實際上，隨着共產國際策略的逐漸改變，王明在批評博古的某些「左」傾政策，後來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變「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等問題上，都走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前面，做出了重要貢獻。1937年十二月會議專門通過一項肯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決定是真誠的，決非虛應故事。因此，國際派王明、康生、陳雲等回來，確實是為了幫助中共，而不是要改換領導。王明等人回來傳達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共同領導」等策略口號，也是國際精神，並為全黨接受。我們當時唱的歌子中就不但有：「國共合作中國就興旺，兩黨分裂中國就滅亡」，而且還有：「同志們，請記着：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論新階段》的報告，仍然是這個精神。至於説「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當然不對，但那是假設問題。同樣，反

171 《舒蕪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172 1929年柳亞子在《存歿口號》一詩中寫的「並世支那兩列寧」，原注：「為孫中山、毛潤之」。1932年得知反「圍剿」勝利後，他又寫《懷人四截》一詩，內「登壇旗鼓看毛郎」，自注也是「毛潤之」。

過來說成是經過我們黨，恐怕也不行。關於「共同負責，共同領導」，《論新階段》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如：「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又以國民黨為主幹，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所以要「號召全國，全體一致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合作……」[173] 其他與此相反的事後說法，恐怕不能算數。如果閉着眼睛講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但不策略，也不合乎事實。否則抗日戰爭就不是起於盧溝橋事變，而應始於我們黨領導的抗日義勇軍了。

二是關於王明和毛澤東的關係，也並非一些人說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是烏眼雞。兩人在延安之前從未謀面，更談不上個人恩怨。《紅太陽》中說的「山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那是把任弼時三十年代初的話安到了1928年王明的頭上。[174] 李維漢就說，他在蘇聯學習期間沒聽王明說過毛主席搞右傾機會主義。[175] 相反，正像《紅太陽》和《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描述的，[176] 王明對毛澤東倒是大力宣傳和盡量支持的。這方面的情況，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他對王明回國的熱烈歡迎，據當時在場並和毛澤東有較多接觸的一些老同志講，確實是真誠的。後來兩人在政策和組織上(王明和長江局不尊重中央)發生分歧，毛澤東當然生氣，但對王明仍持爭取和諒解態度。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彭德懷等不少人批評王明，毛澤東還為他講了情，要大家「原諒之」。政策上的分歧也不是王明一個人的事，在他回國前的洛川會議上就已發生。王明後來只是更加深了這些分歧。在和長江局的爭論中，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可能甚於對王明。何況六中全會上王明即

173 毛澤東：〈論新階段〉，《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21、595、606頁。

174 見《紅太陽》，第104頁。有關這個問題，延安整風就已搞清楚了，任弼時也為此作了檢討。《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還特別對此作了交代(該書第70頁)。

17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5頁。

176 見《紅太陽》，第105–108頁；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2–25頁。

已明確表態尊毛澤東為領袖，在中央領導人中他第一個出來號召「學習毛澤東」和封毛為「偉大的理論家」。作為整風訊號的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延安人當時就都知道是針對張聞天的，並不是王若水說的，當着面「剝奪王明的最後資本即『言必稱希臘』」。[177] 直到1943年政治局九月會議第一階段，清算「左」傾教條主義都沒有以王明為主要對象，只着重批他抗戰初期的右傾。導致王明問題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是他不但不檢討，反而乘機(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初對中共一封措辭嚴厲的質詢電)反攻倒算，批判毛澤東的政策太左，還進行一些私下活動。這就惹怒了毛澤東，也招致大家的公憤，於是王明就終於升為整風的主要對象。後來他雖然也作點檢討，希圖蒙混過去，無奈毛澤東、劉少奇等卻抓住不放，直到共和國成立後的三中全會還做出要他檢討交代的專門決定。他可能覺得實在不好混，就以治病為由去蘇聯常住了。

在延安整風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係上的誤區

毛澤東說的延安整風是整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風，是批判他們的教條主義和亂干涉的錯誤。其實這如同他常說的遵義會議上不提政治問題是他的三打祝家莊之計、有關斯大林的兩篇文章是違心之作、長期不提王明路線是等待大家覺悟等一樣，也是事後的話，並不是當時實際情況。喬木胡繩學派按此路數寫黨史，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高華、王若水兩位由於不知實情，比他們走得更遠。高華說，延安整風是為肅清斯大林的代理人，也的確掃清了對蘇聯多年崇拜的情結。[178] 王若水也竟相信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通過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

177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55頁。

178 見上引高華：〈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

共，國際解散後王明的後台只剩下了斯大林。[179] 這實在都是些不合事實的話。關於延安整風中斯大林與共產國際不但沒有受到批評和反對，而且還被用作整風的主要武器，這是前面已多次講過的。事實和高華說的正好相反。經過整風，熟讀了《聯共黨史》，人們大為增加了對斯大林的崇拜和對蘇聯的景仰，把學蘇聯定為奮鬥目標。「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絕非普遍喊的空話。至於王若水所說，就更加離譜了。中共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歷來就直接受其控制。連毛澤東成為中共領袖，也是國際指定的(王稼祥的傳達報告等於任命書)。這是毛澤東也承認的。他一再說六中全會是個關鍵，沒有六中全會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就是指此而言。說王明的後台有兩個，更加不通。怎麼能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分開呢？而且也很難說斯大林和國際是王明的後台。因為他們支持的是毛澤東，且對王明的印象不好，認為王明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斯大林早先還懷疑他是個「挑釁者」[180])、缺乏工作經驗等，並告誡他不要爭權。這是整風開始時任弼時、王稼祥就在會上揭發了的，毛澤東當然了解。即從後來對王明的批判看，毛也沒有完全投鼠忌器，像一些人說的那樣顧慮王明和國際的關係。當年的實際情況和主觀認識，同人們多年後的說法並不是一回事。

把整風說成是整斯大林、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和擺脱他們的束縛(黨史書上定義為破除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也被列為形成毛澤東思想重點之一的獨立自主的表現)，不但與整風的實際不相符合，而且也無法解釋整風後十多年的許多重大問題。例如，在共產國際解散後，我們仍堅持經常向斯大林和蘇共作詳細的彙報與具體的請示。這只要看一下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

179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35、66頁。

180 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日記。見〈《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時間的記述〉，《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

林的電報全文就會明白。[181] 不僅如此，在解放戰爭緊張進行的1947年和1948年，毛澤東曾一再要求秘密訪蘇，單1948年4–9月，就有五次電報懇求訪蘇，向聯共中央和斯大林當面彙報請示，但均被斯大林婉拒。直到1948年9月還提出，「務必就一系列問題當面向蘇共中央和大老闆(斯大林)親自彙報……真心希望給予我們指示」，[182] 最後導致米高揚(編按：Anastas Mikoyan，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訪問西柏坡。不僅中國黨要向蘇共和斯大林請示，而且斯大林的指示(對方稱「建議」)我們也一定執行。例如成立政府、抗美援朝、制定憲法、出版《毛選》等，就都是在斯大林建議下實現的，其中建國和制憲還經過再三督催。1949年6月劉少奇率團訪蘇，7月4日向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一份報告，在談到兩黨關係時表明：「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為的，即聯共(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服從聯共(布)的決定，儘管共產國際已不存在，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布)出現分歧，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定。」[183]「儘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從聯共(布)領導的提法，但對於中共真誠的態度，斯大林顯然是頗有感觸的。」[184]

在這之前幾天，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一邊倒」。後人把這只歸結為共和國的一項外交政策，恐怕多出於誤會。從深層次看，「一邊倒」實際上鎖定的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只要讀完全文，特別是聯繫此後多年的實踐，就會理解。文章提的是倒向

181 中文譯文見《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82 毛澤東1948年9月28日給莫斯科的電報。見《環球》雜誌2002年第24期姜長斌文。

183 《劉少奇給聯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報告》。原為蘇共檔案，中譯文見《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2期。

184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社會主義，而不是倒向蘇聯。後面還特別點出，「他們（指蘇聯共產黨人）已經建設起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185] 共和國成立後，從經濟基礎（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經請示並得到斯大林同意後實行的，開始的五年計劃制訂就更典型了）、政治體制（人民代表會制實為蘇維埃的中國化，更不用說黨的一元化領導了）到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特別是宣傳教育，如院系調整等），幾乎完全是照搬蘇聯模式。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掀起向蘇聯學習的高潮，並且很快實現了「全盤蘇化」。在那種情況下，誰敢說不滿和反對蘇聯、斯大林的話，就可能被打成反蘇反共反革命。我在解放戰爭中的警衛員趙守先（後為遼陽縣離休幹部），因為說日本投降後蘇聯在東北表現的「壞話」，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不僅政治上如此，教育科研也得以蘇為師。1955年胡先驌由於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批評李森科（斯大林欣賞的「生物學家」），結果被扣上了反蘇反共的帽子，未賣出的著作全部銷毀。[186] 外交上就更不用說了。抗戰期間，我們在國際共運中率先支持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罵英國首相張伯倫是全世界的反動頭子；後來又支持蘇日中立條約，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不解與不滿。共和國成立後在對南斯拉夫的態度上，仍跟着蘇聯翻燒餅。（但在二戰期間，我們卻是非常讚揚鐵托的。據友人也是老延安的曾彥修考證，「解放區」、「解放軍」就是從南斯拉夫學來的。[187]）蘇聯先說南變修了，我們不但跟着猛烈批判，還對它的承認共和國長期不予置理。後來赫魯曉夫說南共沒變修，於是中南建立了外交關係，南成為中國的兄弟國家。波匈事件後，蘇南關係一度惡化，我們則走得更遠，直到1963年9月26日還發表了「九評」

18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81頁。

186 有關胡先驌事件，見《同舟共進》2002年第7期。

187 嚴秀：《半杯水集》，第6頁。

中的「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大罵鐵托叛徒集團。中蘇關係徹底破裂後，中南關係又言歸於好。這已是後話。

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主流黨史學，說延安整風是擺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批判斯大林、共產國際及其代理人王明的，經過整風中共已走上了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顯然是個誤區。而高華和王若水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也顯然陷進了這個誤區，由此出發觀察問題和做出判斷，只能誤入歧途。他們的研究確有獨到之處，對中共黨史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但也確實存在着不足，這裏只是隨便點到，深談太費篇幅。我的這些議論也是一家言，還求作者和讀者指正。

漫談「信史」和「良史」

一個對史學完全外行的人，也竟然談起信史和良史，連自己都覺得有點滑稽。其實只是想借這個題目對我的「黨史學習章節」做個小結。本來，我在學習過程中也還發現其他許多問題並有個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見。但由於自己不善於寫作，討論問題太囉嗦，一提起就收不住，回頭一看，字數已太多，所以決定就此打住。如果天假以年，以後還可繼續寫。

以「信史」與「良史」為題告一段落，倒不是故意冒充內行，實因深有所感，總想一吐為快、表而出之。

現行主流黨史很難算得上信史

信史，顧名思義，就是可信的史書。《詞源》上稱之為「紀事翔實的史籍」，並舉《春秋》為例。總之，只有不虛美、不隱惡、不編造和

追求實錄的史傳，才稱得上信史。這些，也就是成為我們六十多年口頭禪的實事求是。以此為標準，衡量延安整風創立的黨史學和按此精神的所有著述，恐怕都不能貿然稱為信史。我的《學習章節》，就是為此而發，所舉例證也已不少。為了進一步揭示現行黨史與信史的差距，再列舉以下幾項。

一、很多歷史事件稀裏糊塗，得不到澄清

例如：第一，睡在偉大領袖身邊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江青竟然是個反革命，這個蛻變過程就說不清。既然知道她曾叛變，為什麼還大為重用，為她創造篡黨條件？滴水洞的信到底是怎麼回事，黨史也不為之解惑。第二，關於新四軍「項袁錯誤」的決定，既然至今還堅持是對的，[188]那為什麼不公佈來往電報等有關文件？第三，1946年東北局一場嚴重爭論，雙方誰對誰錯以及毛澤東的責任，似乎只能和稀泥。第四，講了六十年的「王明路線」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路線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卻只有大帽子，始終不能具體化。究竟何時何地「無情打擊」了誰，總應列舉幾個著名人物出來。延安整風以來又「治病救人」救了哪些？總不能說指的是大批被搶救成「特務」的知青吧！如果是中央領導人，那也只「救」下了一個周恩來。現在還繼續講這些空話有何意義？

二、隱、諱了許多重大問題

例如，毛澤東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內部交往幾乎全被從史書中抹去，包括大量重要來往電報（如我方的請示彙報和對方的批評指示）、多次接見蘇方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的長談等。事實證明，抗戰期間，在處理國共關係和黨內建設等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倒多半正確，糾正和制止了毛澤東的一些錯誤估計（如蔣必降）和

188 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6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79頁。

冒險方針（如皖南事變前後的準備國共分裂，打到國統區去，延安整風的偏激過火和搶救運動等）。對這些，現在不但不提，卻要歸功於己。[189]又如，我們歷來對被俘和失散的革命軍人（西路軍、援朝志願軍等）的歧視和虐待，不作自我批評（更不能追究責任），反而長期隱瞞，以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蒙冤。第三，特別是對自己製造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幾千萬人，一直隱瞞不講。

三、大量冤假錯案在黨史上沒有得到平反和公正對待

遠的先不提，「文革」中，在毛澤東、林彪支持下由周恩來發動和領導的抓「五一六」運動，涉及數千萬人，逼死致殘的成千上萬，後來竟不了了之。不少被抓因不承認而倒霉者至今受影響，亂說一氣的反而沒事甚至成為積極分子。這一大案，一直沒有得到平反。再如，正式黨史認為，反右派「要肯定」，說當時確有右派向黨猖狂進攻。這恐怕屬例行的說法：「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個別人講了些反共的話，甚至有某種串聯，那也是常有的事，何用發動一次製造大量冤案且影響很壞的群眾運動。如果說，「實際上，章、羅之間也不存在什麼『聯盟』。」[190]那實際上就更不存在什麼「高饒聯盟」，由於太缺乏證據，當時周恩來傳達時就用了「合而謀也罷，不合而謀也罷」的話。我那時有條件對此案有較多的了解，一直認為饒漱石充其量只是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問題。即使鄧小平、陳毅的審查報告都準確無誤，對他從軟禁到坐牢也是沒道理、更不合法的。鄧小平後來說「高饒問題沒有錯」，也只談了高崗，未涉及饒漱石。[191]以現在處理幹部的標準看，饒可能連開除黨籍的處分都不夠。這個案件難道不應重新

189 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新版）說，「皖南事變的恰當處理，再次證明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的策略方針是正確的。」（見該書第一卷下冊，第729頁）其實，我們當時在延安已作了打出去的動員。

190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11頁。

19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審查？還有，共和國成立後公安部門領導人在毛澤東指示和支持下，歷次肅反中肅錯的人當以百萬計，恐怕也都只能冤沉海底。黨史對諸如此類的事也是一概不提。

四、違背史實，是非不明

共和國成立後有三次大冒險，妨礙和破壞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是從基本的農業社會緊急向社會主義過渡，竟被黨史稱之為取得歷史性的輝煌勝利。[192] 對因毛澤東堅持而造成嚴重後果的大躍進、公社化、總路線「三面紅旗」，被説成「糾『左』的努力」。「糾」出的三年困難，被贊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3] 至於「文化大革命」，雖不能不提到毛澤東的責任，但重點在維護他的地位和強調他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和對他們的批判。其他這類混淆是非、推卸責任的事還不少，也表現在對外關係上。

為什麼黨史在許多問題上做不到實事求是

根本原因就在於個人崇拜的體制(表現為專制和蒙昧並存)，妨礙和禁止史學「求真」。其表現試列舉以下幾點。

一、「為尊者諱」

這是不言自明的，上面已舉過不少例子。這個「諱」，不只是對領導者的缺陷和短處要隱瞞、保密，而且還要造假。口説「人無完人」，還是要從上到下塑造大批「完人」。

192《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的分章標題，另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二、反對和禁止公開性與透明度

不但實行從上到下的人事保密，而且對形勢和工作也必須隱惡揚善，宣傳太平盛世、鶯歌燕舞。我們歷來就把天災人禍和群眾苦難作為國家機密，不允許統一發佈新聞外的據實報道。因為在延安整風中就提倡主要歌頌光明，批判暴露黑暗的主張，認為缺點錯誤講多了就會亡黨亡國。所以還主張「內外有別」，外面來了代表團考察或訪問，就得用一定的弄虛作假來應付。這個傳統就一直傳了下來並得到「發揚光大」。結果只能是群眾不了解真情，長期受蒙蔽，而且形成內外兩套。這既妨礙啟蒙，也無法實行民主(前引列寧的話，「沒有公開性就沒有民主」)。

三、言行不一，做的和説的兩樣

我們在延安整風時就一直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194] 也強調「獎勵自由研究」(《解放日報》標題)和「科學無禁區」。然而不僅當時，六十年來什麼時候實現過？從延安時的王實味、丁玲和我等犯「自由主義」錯誤的大小知識分子們，到共和國成立後的胡風、右派、右傾、「文革」中眾多被打倒者、近年來的「自由化」分子等，以言獲罪者決不下數千萬，為之獻身者也當以百萬計。被定為毛澤東思想重要原則的「實事求是」，一提出來就被自己發動的搶救運動給破壞了。共和國成立後的一貫「左」傾，也很難和實事求是掛上鉤。至於作為我們思想路線另一句的「解放思想」，恐怕也同樣很難做到。以黨史研究來説，怎麼可能從兩個《歷史決議》、「和領導保持一致」中「解放」出來？説「百家爭鳴」，實際上只有一家，即便在這一家裏能爭鳴得起來嗎？還不是家長説了算。

194 毛澤東:〈1945年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42頁。文中還説，「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

四、黨史中既然實行「人治」，就只能領導意見第一，求真務實其次

中國有個隔代修史的傳統，本是為了逃脱當代政治的干擾，但仍避免不了新王朝的干預。例如清朝修明史，就只能貫徹康熙宣揚綱常名教、鞏固清朝政權的指導思想。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評價，皇帝還親自過問。這自然難以做到客觀真實。黨史中的政治干預和人治，更加明顯。一會兒説六屆四中全會是篡權，一會兒又説是合法的，致使中共黨史至今兩種説法並存，表現自相矛盾。有些問題大家講了許多年或經史學家皓首窮究，但領導者只要「一錘敲定」(陳雲語)，就給全盤推翻了。這類例子可説不勝枚舉。只有人治對黨史研究鬆綁，才能談得上求真和實錄。現在盛行的各種黨史「實錄」(取名不知是否受李鋭的《廬山會議實錄》的影響)，往往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有些乾脆是拼湊和抄錄，實在不足為訓。

也談「良史」

一、中國有良史傳統

良史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至於何謂良史，説法很多。寫《史通》的劉知幾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可見良史就是能寫出信史的學者。唐詩説，「莫負美名書信史，清風掃地更無遺。」對於我們研究和編纂黨史的學者來説，當然應該繼承中國史學家的優良傳統，把中共黨史寫成信史。這不但要求研究工作者有齊太史和晉董狐的精神，做到毛主席説的「五不怕」，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比較寬鬆的環境。例如司馬遷之所以能成為良史，漢武帝審查不嚴也有很大關係。否則設一個審讀小組，送審一章(一大堆竹板)給推倒和焚毀一章，甚至來個秦始皇的「以古諷今者族」，哪裏還有《史記》？還談什麼「藏之名山」？古之不少皇帝，要看有關他日常活動言談的記載如《起居注》，遭史官

拒絕，他們也就算了。這在連一些重要會議記錄都不准做的毛澤東時代，有可能嗎？

二、在現行體制下很難成為良史

中國的黨史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機關幹部(史官)，都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有關決議和堅決執行領導上過去和現在的指示，這就失去獨立思考的條件，哪兒還談得上秉筆直書？而且所有重要檔案資料都由專門機關壟斷，想獨立研究又只能更多依靠專業機關和專業人員寫出的成果，以及許多用現代認識組織人編寫當年故事的各種領導人《傳記》和《回憶錄》，這又怎麼能輕易做到求真務實？前面談到的高華、王若水陷入延安整風研究的誤區，沒有逃出這批第二手材料的影響當是個重要原因。求真務實和秉筆直書的條件既然受到最嚴格的限制，良史的傳統在黨史研究中就很難得到繼承了。因此就整體而言，喬木胡繩學派是不能稱為良史的。在這個學派中，確有一些具有淵博知識和才華出眾的學者。他們有「史才」、「史學」，但不能發揚「史識」，做不到「實錄直書」。至今我看到的可稱「實錄直書」的黨史著作，實在寥若晨星。有的作者本意在澄清一些事實，批駁那種事後諸葛亮的説法，但也得稍為用點「曲筆」，説成「實際情況遠比後來的解釋要複雜得多」。連古代史都要輿論一律，和領導保持一致(著名史學家尚鉞因在封建社會的起點上持魏晉説，不同於毛澤東的「自周秦以來」，就被批鬥了二十年)，在黨史上更容不得有不同的聲音了。

三、對黨史工作者不能一概而論

黨史工作者不能成為求真務實、秉筆直書的良史寫作者，有不同的情況。一些人屬思想認識問題，也不夠「實事求是」，但不完全錯，因認為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個人崇拜或維持專制統治。例如我們初到東北就有這種經歷。1945年離開延安到東北工作，親眼看到蘇聯搬走機器和紅軍的紀律敗壞，但我們還是真心實意地做中蘇友好工作，

想出各種理由給群眾作解釋。然而情況不同的是，有些寫史傳的人，他們並不是着眼於革命的需要和還歷史本來面目，也不是不了解歷史真相和傳主的陰暗面，而只是為了維護所寫領導者的形象和威信，仍自覺地隱惡揚善，甚至弄虛作假。也許他們以為只有這樣才合乎黨的利益，其實效果往往相反。例如我們看到許多領導人的傳記，基本上都是政治化或學術化的，只有優點，沒有缺點，只有工作，沒有生活，個個都堪稱全面模範。也看不到他們的家庭，非常僵化，不像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的子弟，如為烈士或普通勞動者，還會大書特書；如果是靠傳主的扶持和影響而當了大官或大款，甚至成了罪犯，傳記上肯定避而不提。這樣的史傳作品，怎麼能稱得上良史？對大部分史學工作者來說，只是隨大溜，按時上班，照章辦事，從事組織上分配的工作。對於事情的真相，有些清楚，有些也許不清楚，但並不深究，不想有什麼創新和突破，只滿足於完成任務。這是做工作，有別於做學問。還有不少人，確有自己的看法，也明知歷史的真假，但是在官不由己，不能不按官定的路數編撰史傳，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準備一旦有條件時再說。不過也有些人到後來已近乎大徹大悟，談了許多歷史真相和新的認識，卻不願意落筆成文，即使別人幫他整理出來，他也會刪掉不發，原因就是愛惜羽毛，要保護他一生完整的形象。情況是複雜的，人是複雜的，決不可一概而論。何況我了解的情況不多，還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使自認良史者扼腕。

為黨史進一步成為信史而努力

要使黨史有可能成為信史，有兩個客觀條件是需要的：一是實現列寧提出的公開性，讓黨的活動和各級領導人的情況為黨內外群眾所了解，黨的歷史檔案也在事過後就公佈，使研究黨史的人有條件去求真務實。本來重要的國防、外交、經濟、科技等機密是屬國家的。在民主制度、黨政分開的情況下，政黨也不會擁有多少機密。除非黨處

於秘密環境，那時入黨宣誓「保守黨的秘密」，也還不是國家機密。像我們這樣，紅軍時代和延安時期的黨史資料，都一直作為絕密材料保存，恐怕不能說是正常的。二是做到馬克思強調的為一切自由基礎的言論自由，解除對黨史研究和解釋權的壟斷，以便在自由討論、百家爭鳴中接近和求得真理。而這兩個前提條件，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有可能實現，所以必然會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

要出信史，單有客觀條件是不夠的，主觀因素也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在封建專制時代也會出良史和寫出信史。可見，史學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境界和學術操守，也是極為重要的。當代的許多學者也常講到，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或者要有史學良知，即使不能說真話，但也決不說假話。這些看來簡單，但完全做到也很不容易。我自己在過去的兩次政治運動（延安搶救和1959年反右傾）中，就沒能守住這道防線，成為終生之恥。

但是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進步，無論經過多少困難和曲折，我們的黨史終能成為信史，許多問題也終會大白於天下。至於迄今的黨史工作者有無良史寫作者，哪些人寫的算得上良史，哪些人寫的不能算，哪些人屬螺絲釘和馴服工具，哪些人是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讓以後的研究工作者去評說吧！相信是一定會有歷史結論的。

作為一個初學黨史的耄耋老人，這一切是看不到了，但我有這個信心，而且還要繼續學習，按周恩來說的，「活到老，學到老」。現在只是暫告一段落，先奉獻一批章節，向方家和讀者請教。



附錄

對初版《黨史筆記》的評議

宋以敏輯錄

何方1999年離休後不再繼續長達五十年的國際和外交研究，開始改行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逐篇寫出《黨史學習筆記》(何方一開始寫作時這樣冠名，直到成書時才由編輯去掉學習兩字)。他每完成一篇都打印多份，除專請幾位老友閱改，也寄送其他友人徵求意見。在2005年初版成書前後，曾得到多位友人的評議。下面是何方幾位已逝老友和其他友人發表的評議選編，包括海外學者的幾則。《黨史筆記》是研究性著作。他本來的計劃是寫完《黨史筆記》後接着就寫他對毛澤東外交的反思。但在作家邢小群對何方進行二三十次口述訪談並整理出二十多萬字文稿的激發下，他放下了原計劃，決定在口述稿基礎上改寫成書——《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明報出版社，2007年出版)。這本書根據個人經歷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思考，可說是《黨史筆記》的姐妹篇。因此，有些友人的評議針對的是後一本書，在此也一併收入。2011年10月19日，在丁東和崔衛平組織下開了個座談會，請多位朋友從學術思想角度談談對何方的認識。2018年3月《記憶》電子刊物出了兩期《紀念何方專輯》。友人在兩次場合中的發言和所寫悼文中涉及《黨史筆記》的，也作了些摘引，都收進本文。

已去世友人

曾彥修先生

曾彥修是一位延安老革命，何方的摯友兼諍友，2015年3月3日去世。何方稱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當代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鬥

士，共和國新聞出版事業的領軍人物之一」。曾老還是一位著名雜文家。何方每寫完一篇學習筆記，都必定送請曾老審閱修改。曾老提意見直截了當，有些篇章還引出他對相關問題的長篇議論，見解深刻、犀利。何方說過，《黨史筆記》「含有曾老（還有蕭揚）的大量勞動」。曾老和何方同時期在延安，他們的結識始於一起受命起草張聞天悼詞。兩人對張聞天、對延安人和延安事有着許多類似的認識。他對何方的黨史寫作提的意見最多最細，還往往借題發揮，發表了他自己的真知灼見。

何方一直說曾老對他「一再謬獎有加」。例如讀何方延安整風諸篇後，曾老竟然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下面是曾老相關信函摘錄。

一、毛澤東和個人崇拜

（一）曾老2004年7月13日信：

> 個人崇拜章極好，可單獨成書。我因所知甚少，故極感興趣……沒有你這樣去研究他，說明他，一般論文解決不了問題。此稿似丟了腦袋也要能公開存世才行。你這是菩薩心腸，菩薩行為，為國為民做了好事……我之所以如此用力（宋以敏注：指閱改這一章），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因此，我用至多是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時間來拜讀和寫意見，是十分值得的。糊塗近七十年，讀尊文後明白些了。在我火化之前，能讀到搶救及個人崇拜二文，也算幸福了。

（二）何方在《黨史筆記》中寫的〈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一章中，提到在延安整風時學習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的情形。曾老2002年8月31日來信：

> 我意，整風中陳伯達在建立個人崇拜方面是立了汗馬功勞的。陳的兩篇文章〈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整風中受到極大重視，學的時間很長。這二文提出了，黨中央內部歷來就有正確和錯誤路線兩條路線在鬥爭着。正確路線的代表，始終是毛澤東，從黨成立的那天起。〈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更明確指明，此文奠定了中國革命要走農村武裝鬥爭的道路的理論基礎。我覺得在延安整風中，除毛自己的文章外，最重要的就是陳伯達的幾篇文章了。我對毛的個人崇拜，就主要來自陳的上述二文。至於劉少奇的《修養》、《黨內鬥爭》，則主要是強調必須消滅個性，人人都必須成為「馴服工具」的教科書，尤其是《修養》，沒有起好作用，只要人成為工具，而不要人有思想，是啟蒙主義的尖銳對立面。此文的消極作用至今在一些同志頭腦中仍佔統治地位，我們要建的是蘇式黨，大大不利於鄧小平的一些正確思想的貫徹。

（三）曾老在讀到《黨史筆記》中有關毛澤東給毛岸英找老師這段文字後，2003年5月10日來信：

> 我等不想以此沾光，同時，這任務不是毛直接指定的，是陳伯達、胡喬木分別指定的，刪去為好。我過去所以說明此事，是有人不知凌雲時間最長，我離東柏坡去西柏坡後，又改由于光遠與之聯繫。毛岸英則只承認田家英一人，一因田以後在毛處工作，又是第一個，二是學中國文史，小毛最缺乏此方面知識。故此數句務必刪去好，以免我們有沾光之嫌。

【何方2010年2月25日致曾老的信中說：

我以為在你的寶藏中，最有價值者有三。其一是身列少保之職，前後經歷。現從各方材料證實，毛確有變黨天下為家天下之考慮，如東鄰做法（不但金，蔣也如此）。原定對象為岸英，所以全面培養。一回來就讓他向吳滿有學習，中跟康生學政治，後跟彭老總學軍事

（可惜失事）。岸青不可能。最後只好交給極不理想的江青（按陳雲說法，起碼不會挖祖墳。毛後來極重視身後評價，所以對鄧小平極不放心），並火箭式地提拔毛遠新。故有關計劃傳岸英的材料極有價值。而且獨此一家。】

（四）曾老得到李銳作於2003年11月13日的〈如何看待毛澤東〉一文的打印稿後，在稿子上加批註寄給何方：

> 第三頁上，指出1950年5.1口號末句，毛主席萬歲，是毛自己加的。此事想來你也知道。我過去聽說過原中宣部宣傳處長王宗一在文革中自殺，聽說與口號有關。王初擬稿中無毛萬歲，毛加上後，王似乎表示過驚異，文革中遂被定為反毛，不得不自殺。

（五）2004年5月26日來信：

> 毛澤東深悉此中（指喊不喊萬歲）竅訣，所以他在1950年由黨中央發佈的慶祝口號中，迫不及待地自己加了個「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上去。此點，他同斯大林正好是一模一樣的。同在1949年12月斯大林70壽辰之前趕出來的《斯大林傳略》一樣，「斯大林——今天的列寧」，就是斯大林自己加的，現在俄羅斯有檔案為證……毛的推行個人崇拜運動，絕不是出自簡單的個人虛榮心理，而根本上是他的歷史總結的結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個人絕對獨裁統治，使它不能受到萬分之一的動搖。
>
> 宣傳畝產數萬斤糧食的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毛本人出自農家，不會真相信的，但他堅持如此宣傳甚久，就是純屬政治需要了。凡是毛不同意的，他當時就要大發作。1945年8月上旬，美國在日本投擲第一顆原子彈，解放日報把消息登到第一版，標題也較大。毛立即發作，大加批評。第二天或第三天，有些單位就聽了這個尖銳批評的傳達了。（我在中宣部就聽過陸定一的傳達。那時陸剛離開報社，挨批的可能是博古、余光生等，陸那天傳達時明顯地更加口吃。）

對於搶救運動章節中談「積極分子」這一段，他說：

> 當然，多數人是被迫服從，所謂「黨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一年到頭就希望作「政治運動」，因為這是這類人的唯一本事，這是至今還很突出的問題。即吃「運動」飯問題，而上級黨組織往往以此為所謂「黨性」是否堅強的標準。

（六）2004年7月13日來信：

> 其實，各地負責人的所謂「頭腦發熱」，也全是假話。這熱源來自農民，來自自己？全不是，完全是來自毛的要求。所以，這種檢討也全是在做戲。把幾十畝田的稻子割下來堆在一塊田裏，誰會看不出來，除非死人。所以，這些全都是一人騙大家，大家騙人人。
>
> 中國自己沒有做大國主義的條件，卻偏偏要在斯大林死後，一下子大翹特翹尾巴。對這些事，至今還被不少人自鳴得意地大吹特吹，興奮地追憶往日的「光榮」，這能總結出什麼歷史教訓來呢？
>
> 事實上為斯（大林）平反的大小文章這兩年已如雨後春筍；它們的特點大體上都不用任何資料，而只重覆過去的論點或過去蘇官方宣傳資料。
>
> 去掉了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就去掉了一切專制制度的基礎和核心。這是古今中外一切專制制度的命根子。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最後還是立在對天皇的神似的崇拜上。一個沒有徹底脫離個人崇拜的社會，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相反，流行個人崇拜的社會，則必然是一個專制野蠻和落後的社會。

共產黨不是邪教，不是黑社會幫派，他們應該是人類理性、良知、美德等等的代表者，而決不能是只忠於個人的愚氓。那樣，就是把共產黨員變成一個沒有人民利益立場的狂熱邪教信徒或黑社會組織的堅定分子了。

忠於人主是封建道德的第一條，移孝於忠下，孝是第二位的。現代還要這樣做嗎？定制一套瓷器為毛氏王國專用，這是遠過於明清兩代帝王的奢侈；煙是從四川什邡縣配備專廠搬到北京來的，還要配備一套黨政保衛工作人員，而且至今還把這些事情作為正面事情反復宣傳。至於毛的專列幾十年在中國橫衝直撞，開停無時，全國一切列車到時全部讓路，就是「秦皇掃六合，俯視何雄哉」也沒有鬧到這麼個程度吧！張良在博浪沙刺秦，可中「副車」。證明秦皇這個警衛範圍也不太大。

我以為鄧小平的全部理論是四個字:「人要吃飯」。毛的理論複雜一點，是「整人重於吃飯」。人死光了，還嫌鬥爭不夠:「八億人，不鬥行嗎？」哪個秦始皇有這麼殘暴的理論？鄧要把人變成會勞動的機器；毛則是要人變成永遠自相殺伐的殺人機器。當然，鄧要人道得多。但在人們不要有任何思想一點上，二人並無區別。他們二人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標，其遙遠程度並無區別。手段上的大區別，是在「文革」以後。

我覺得「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即是單純的集中，那民主是集中施捨的，而不是民主了。又，「接班人」問題更荒唐，同皇帝找繼任人是一回事，即終身制的領導人尋找另一個終身制的領導人，與世襲君主制無異。

中國還有個港台問題的牽制，更不敢搞民主，怕一搞就垮，非長期維持專制不可。我認為中國自動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也缺乏這個人民基礎，所以我一點也不樂觀，不

相信當權者會推行民主法治。現在是越來越緊。胡溫似已成純粹的技術官僚，一切大權均已轉入江曾手中了，胡溫像是兩個抬轎子的。

針對何方在書稿裏提到周恩來在群眾大會上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這件事，說：

你既已指鹿為馬，遞了降書，你的人格就已經受到對方的絕對控制了。你已經當眾吻了她的腳了，今後還有什麼說的？至於真假問題，那是無所謂的——對方並不希望要什麼真的，要的就是這個假的，因為這個假的就很管用了。

有人放出話來，如去了斯大林那張大像，他「就一輩子不經過天安門大街了」。後來是否真的這麼實行了不得而知，但這個人在反對改革開放後造的孽確也是夠多的了。在中國，像這個人這樣倚老賣老堅決反對改革開放的人，其實很多，不過大多不像他那麼放肆，是因為他確是有他的「群眾基礎」的。(宋以敏注：此人指王震。)

中共的前途究竟是前進還是應該大退特退，在一些人中，主張退的人還是強大有力的。這些明顯的推翻1978年冬扭轉中國大逆流的那次大轉變，能不能就已經很鞏固，以後就不會有逆轉了，還難說的很。歷史上大倒退，在人類歷史上頻頻發生，一個回合就鞏固下歷史大勝利的，歷史上很少見，或幾乎沒有。中國的情況可以說這種復辟危險更大得多，因為人民無權，歷來一切均由上層幾個人或一個人決定。盲目樂觀在中國可說毫無根據，而且明明白白是一種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慄的事情。

（七）讀《黨史筆記》談黨史編纂學這一章後來信：

希(特勒)在大小組織均以「領袖」決定一切，英語似叫「leader」，譯為中文，以「首長」為好。它不是委員會的「主

席」之類，就是一個大小「領袖」、大小「首長」決定一切。我們的一把手決定一切，不是希特勒的leader是什麼？

二、張聞天和黨史

（一）2003年3月30日來信：

其實，「實事求是」是常識，中外自古有之，本與馬克思主義無大關係。現在忽然上升成為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稀有的寶物了，正好說明不實事求是，是久已成風習了，這才顯出了實事求是的珍貴。

（二）2003年5月來信：

說整個「文革」前後十多年的時間，前段是林彪在指揮一切，後段又是江青在指揮一切了。如此，毛澤東則始終在一旁觀戰了。但毛本人根本不同意這個說法，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打垮蔣介石，二是幹了一場「文化大革命」，他絲毫不說這是林彪、江青幹的。

（三）在讀了何方所寫〈張聞天的民主與實踐〉一文後2003年6月1日來信：

遵囑仔細拜讀張聞天與民主文，虛實結合，很感動人。所云諸事，至今不為外人所知。上面所關注者，唯在怕下面的人給他加「偉大」二字，聽說沒有，就放心了。你此文發表後，人們觀感又將大升一步，提出中共領導者中一個真正傑出人物，一枝被折斷了的紅梅。

現在偉大似乎只限於用在陳（雲）彭（真）二人身上，周（恩來）朱（德）不知行不行？毛時偉大只用在日丹諾夫與康生身上過，所以還是不偉大好。

全文無意見。只第5頁第一行「較少談法治」，可否改為「不能談法治，萬不得已以法制代充。其實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有的極端者，其法制多如牛毛。真的法治必須是民主的表現形式。

此文看來並無犯忌諱處，反「主旋律」處，我看是不容易處分它的，一加處分，處分者的真面目不就更明白了麼。

（四）曾老讀何方2005年10月28日所寫〈從陳獨秀、張聞天到胡耀邦〉一文兩天後回信：

此文極好，如能發表，我預計必將（宋以敏注：曾老原信在這兩個字下面加了重點號）成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對文內談到在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造成黨內……理論繁榮的最大高潮」提法，曾老旁批：

是否估計過高？我覺得，好像過去是根本未接觸過理論，只幾個人通過外文讀了一點，如瞿（秋白）、蔡（和森）等幾個人，抗戰前後才有較多的人接觸了馬恩的書。這時期，繁榮似有些過，普及則做了不少工作。我們都是在被「普及」的範圍之內。

（五）2011年5月6日致何方、蕭揚、程中原信：

我上次所舉五個例子尚甚不完全，未及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歌特反關門主義，凡張（聞天）所涉及者，幾無一不是創造性、現實性的大理論問題的正確解決。黨的歷史上，陳獨秀、李大釗，功在建黨，他二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新青年時期有些重要理論，但那是民主主義理論，西方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民主、人權理論，也很偉大。但在分析中國問題上，就顯得淺。不強調反帝，還談什麼？不大能解決問題。自黨成立以來，黨內可稱理論家者，確是毛公。二十、三十年代以來，瞿秋白、惲代英諸先輩，都未能顯出他們理論結合實踐的大成績。而張

聞天一出馬就有社會性質、歌特反關門主義二大結合中國實際的巨大理論貢獻。當然，同時張在「九一八」後，也首當其衝，大寫反對非馬克思主義諸流派的文章，那是堅決執行斯大林的理論。其他諸關鍵時期的理論活動則是正確或很正確而且是很傑出的(如西安事變)。黨內其他諸人，除毛有不少重要理論貢獻外，可謂並無他人。

（六）2011年6月9日致蕭揚轉何方、程中原信：

對張的讚譽，言辭上我建議以穩重為好。第一次讓位，我前已表示過幾次意見，張提議自己出去恢復白區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客觀上當然就意味着離去總書記職。當時回白區就意味着只是重建白區工作，只有上海租界可以藏身，當然就談不到要在上海租界來指揮紅軍了。因此，這件事可以說客觀上是意味着離開總書記的崗位，但，形式上則還不是那麼明白地讓位。

用中國咬文嚼字說，第一次可以說「辭位」。第二次是「讓位」。第三次是「棄位」。當然文字上決不能講這些，可否只具體説明情況，把第一次說成是「實質上的交位」，避免說我們也在「造神」，造一個「謙遜之神」。

我的總意見是不必具體説明是不是「三次讓位」，讓讀者去評價：是兩次、兩次半、三次。

我建議，我們要特別注意歷史上兩次過分的吹噓，均效果不好。一次是毛對劉的吹噓，在延安硬樹劉；二是林對毛的吹噓。

千萬不要讓讀者、黨史界有一個印象：何方、程中原、蕭揚等亦在「造神」，造一個「謙遜之神」。以此，我們可以意到而言有所不到，不宜言滿而意尚不夠清晰，有待解釋，這就後者不如前者了。

實質問題我們要談清楚，表達方式則寧可贊而不夠，有所保留，不可令人感到贊而浮誇。

（七）2012年11月和12月兩次來信，談他收看北京電視科技台播放金一南少將專題後的感想，他說專題題目似應叫「長征」。現把兩信抄錄如下。

11月24日信：

近若干日北京科技台九時後在播金一南少將的長征全史。前兩集我沒有看到。我看到的，是從準備離境開始。集中批評的李德、博古。對周(恩來)是保護，對毛(澤東)還是傳統的盛讚，對張(聞天)批評的輕。讚美有一些，但用詞輕微。過金沙江後，即未提及林(彪)。最突出的是讚美劉伯承。對劉少奇、鄧小平似未怎麼提起。

前日晚，於飛奪瀘定橋勝利後，離主題大講了一段，對江西路彭(德懷)、楊尚昆，江東劉伯承、聶榮臻大讚了一番，未及林彪一字(恐不大對)。此外，我特別注意到兩事：

一，對「四渡赤水」問題未怎麼講，更未大吹。

二，為陳昌浩徹底平了反，而且客觀上大加歌頌。謂徐(向前)、陳同一方面軍在一起，接張國燾令，武力解決，消滅毛部。徐可能已多次電話陳昌浩，這次畫面上強調的是陳接電話，回答徐，是「不能打」。對方可能還有懷疑，陳作色，只兩個字：「不打！」略過一二秒又十分嚴重(肅？)的補兩句：「不能打，組織服從！」(政委最後決定權)如此，則陳昌浩才是個大偉人，臨亂鎮靜，不准內耗。與過去相傳的，是百分之百的相反。此事我最感動。陳是我在馬(列學)院的老師，講西方近代革命史。竟敢從英國、荷蘭講起，其口才哪裏是王明、博古趕得上的？

12月16日信：

我是從湘江大敗以後聽起的。若干要點轉介於下。1，大轉移事只白崇禧一人全估計到，時間也很準：在1934年秋冬之間秋收以後。蔣未怎麼重視。2，紅軍被逼走的路線，唯蔣手下一參議之類的楊永泰一人提到，要在改線設防。蔣説是否石達開老路，未予重視。3，特別挖苦了博古。説李德只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剛畢業生。去蘇區原因似不明。博古利用之。從此，即由博古、李德二人決定一切。4，對張聞天，比前尊重很有限。不過是稱為「總書記」。對楊尚昆、林彪，渡金沙江前甚重視，以後即未提及。（當然這也是歪曲歷史），在人物中特重提彭德懷；於周，也不怎麼重視。5，「四渡赤水」，略提及，未予誇張，視為軍事上的應急行動，不再講過去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若干年前，有一校級軍官專門講演，認為「四渡赤水」是平常事，即把這件大吹特吹的事情的偉大性全否定了。）6，根本未提及葉劍英發現密電一字。7，對陳昌浩未徹底平，卻客觀上大加歌頌。仍是暗示，多數觀眾恐怕看不出來。謂徐（向前）、陳同一方面軍在一起，接張國燾令武力解決，消滅毛部。徐可能已多次電話陳昌浩，這次畫面上強調的是陳接電話，回答徐，是「不能打。」對方可能還有懷疑，陳作色，只兩個字：「不打！」略過一二秒鐘又十分嚴重的補兩句：「不能打，組織服從！」顯係對徐説話，最後拿出司令員要服從政委的金牌來壓服徐向前。如此，則陳昌浩才是個大偉人，臨亂鎮靜，不准內耗。與過去相傳的，是百分之百相反。此事我最感動。可見以前對陳昌浩全是污蔑的。你接觸過陳昌浩沒有？他1938年下學期，時剛逃出寧夏、輾轉回延安幾個月，竟然教我們近代西方近代革命史，竟敢從英國、荷蘭講起。從文藝復興講起，不知他的學問從哪裏得到？何時得來？其口才之絕佳，勝王明、博古十倍。8，最後兩次，先是評蔣方人才，謂手下武人、習慣名次，依資歷為何應欽、顧祝同、劉峙、陳誠……等。但以陳誠為有真本事。造成江西紅區最大損失的，也是陳誠。陳誠能與士卒共甘苦，行軍時，有馬不騎，有轎不坐，有美食不吃，後在台灣和平土改成功，是蔣方一人物。

看來，講演者是把西安事變及西路軍有意回避了，或被迫不能講，一講，毛又要減分了。

這個講演已半跳出個人崇拜，因將要點呈上一閱。

【何方的回信：

我實在佩服你老兄越老越精神，不但看書作文，還旁及各種雜務，竟看到金一南來了。而我乍一看到金一南的名字，還以為是參加東北抗聯的朝鮮人呢。至於陳昌浩同志，確實是個人才。他的慘死於文革中，固然有毛的幫派主義影響，但個人也有失誤。河西失敗後，四方面軍被圍困的幾個領導人各自逃生。總指揮徐向前隻身潛走延安，政委陳昌浩逃回湖北老家，同舊式婚姻的妻子同居生子，居家經年才去陝北找到中央，經批鬥後安排在馬列學院教書，建國後任編譯局長。他的妻子是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被馬回子俘虜，西安事變後經周恩來交涉要回，解放後任紡織部副部長，也慘死於文革中。

來信提到長征中一些情況，實屬平常。一，四渡赤水，是毛自己吹起來的。後經蕭華的長征頌歌，才在歷史輿論中大大出了名。其實，在此之前記述長征的著作中，對四渡赤水並未大吹，而且其中一次還是打了敗仗的。二，長征主要是軍事行動，所以作為文職人員的劉少奇，雖然當選六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軍內職務卻在楊尚昆領導之下。楊為方面軍政委，劉只是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三，林彪雖任一

方面軍總指揮，但是在中央軍委（先為周毛，到川北後改毛周）直接領導下，所以就顯不出林彪來。四，所聞葉劍英密電事，史學界多持懷疑態度。兩邊譯電員在世時均稱不知此事。但毛堅持有，誰也不敢否認，而毛和葉的說法又不一致，所以就一直成為歷史疑案。一些專家私下談，按情況分析，此電不可能有，毛說的歷史假話也實在不少。五，劉伯承的確值得讚美。我認為他是十大元帥中第一人，不但會打仗（也許稍遜於林、彭），而且品德絕對第一，超過朱老總。在全軍上下極有威信。1959年，毛強令他在軍委擴大會上做檢討時，他已幾近失明，連稿子都看不清，出席的近千將軍無不為之動容，我就聽到抽泣聲（我因參加張聞天「反黨」，獲得與會資格），從此劉帥也就從政壇上消失，直到去世。】

三、知識分子和胡喬木

（一）曾老讀《黨史筆記》中〈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一章後於2002年8月31日給何方寫了一封長信，談「抗日初期進入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大小知識分子問題」：

> 建議對此歷史事件大加議論歌頌一番。這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中共黨史上異常光輝的一頁，也是對歷史上中共烈士們拋灑鮮血的一種回報。以我本人而論，我並不知道多少紅軍奮鬥的情況，是無數烈士的鮮血推動我走向延安的，包括我所知瞿秋白犧牲的大略經過及其遺作「多餘的話」。當時只是對他詩句的末句「黃昏已近夕陽紅」感到不解。
>
> 事實上，應該承認1938年前後這批人，包括我們二人這種小知青，都是那個偉大時代最先進的中國人和知識分子。這些人都是社會和學校的大小知識海洋中浮在表面上的那層油花，即真正的社會精英。這個現象，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這麼一次，所以值得大書特書。南宋、

南明出現過一批知識分子南渡，當然也值得讚美，但他們是避難，而不是北上拒敵，所以它的歷史光輝就小多了。1939年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指示時，高潮已過，該來的已經來了，再來便只能是零星的了。由於37–38年這麼多大小知識分子完全自動湧向延安，才使黨成為真正群眾性的黨。這批人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瞞着父母走的，可謂孝於國，孝於黨，而不孝於父母。我也至今提到母親即要流淚，哽咽難語。一個人對母親不孝，能說不終身痛苦？正由於其成員來自各階層，而很少是工農，因此，就大大影響到中國中上階層很多人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殺人放火，共產共妻」之謠，不辟自破；共產黨、紅軍究竟是「匪」還是全國人民的燈塔的問題，在全國豁然而解。

必須明確辨明，幾萬知識分子到延安，是去了一大批財寶，而不是去了一大批負擔、一大批「偽裝」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整風開始後，對這個問題的說法便似乎往往有些顛倒了。先說是「半條心」，即投機；後說是「兩條心」，即特務。此項估計，相當時期內已經成為基本估計，可謂差之千里，謬之無限萬里矣！

「三八式」問題。此段我認為很好，但覺得還不夠些。我不但與你同感，而且認為這是黨的一個重大的不幸。你這段文章的意見，我多次與人談過。黨始終掌握在1921–25年的第一代中，至多加上幾個蘇維埃前期，即1927–30年的一些前輩手中，而且都是終身制。但中共湧現的人才，最多、自覺性最強（有些人從南洋、歐美跑回來）、最有生氣的是「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後這段中。可是這一段中的人物，竟始終沒有一個人在黨、政、軍的中央以及省部決策層中起過作用，終其一生始終在「低幹」中度過，真正可稱為「高幹」者也無。我曾一一算過，前後（兩代緊接，時常合而計之），任職最高者之中不過蔣南翔、黃華二人，教

育部長與外交部長而已，又都是很後來的事。這與操持國政，在中央黨政軍決策毫無關係。此外，有一個姚依林，晚年入了常委，僅為對付經濟危局，但更似彭真、陳雲的代表，起安慰賽作用，難説已算進入決策核心。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看，不行了，於是人皆可以上凌煙閣，入軍機處。這是中國也是黨的一個大悲劇，斷層了三十年、四十年(從1956年八大算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才不繼、優良傳統斷裂、腐敗與壞人用事、揀到籃子就是菜等一系列難治之症的種因。像地質史上玄古紀、太古紀之後，一下就跳到了白堊紀，中間的都沒有了。類似現象，蔣似乎也多少有過，即在軍事上，他始終是以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劉峙等一批保定系出來的老人作方面總司令，而不敢大用較有能力的孫立人、黃維這些人。(上面關於蔣的説法可能錯誤，因為他只給何應欽、陳誠等人以高位，帶兵實權還是掌握在他的黃埔學生中。)

從「一二・九」到「三八式」的人物中，在中共史上根本未能成為舉足輕重的一代，這不僅是中共的一個大悲劇，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大不幸。在中國有一個相反的比較成功的經驗，這就是自然科學、文史界以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為代表的若干大學，自二十年代起，經三十、四十年代，整整三十年間，出了好幾代大學者，以至解放後還是靠這幾代學者在為新中國撐門面。文革初毛罵的「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正好説明那裏濟濟多士，所以遭痛罵。到圖書館一看，今年仍站得住有參考價值的仍是二、三、四十年代的書及這時代人的著作。此專指史方面。而我們自己培養出來的人，由於不斷改造思想，不斷地挨整，不斷地當牛鬼蛇神及專政對象等，使得這些人很多也中途凋謝了，甚至非正常地死亡了。故此就沒有使解放後留下的老專家們培養出多少大名家來，尤其在文史方面，幾乎有一刀兩斷的現象。

我想，如果「一二・九」、「三八式」真當權了，也跑不出馬恩列斯一套。因為黨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最高決策人是終身制便什麼大改革都不可能了。世界各國共產黨要打破黃炎培説的那個週期律，首先必須嚴格執行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何人一生只能任兩屆。不然，哪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終身制？又有哪個終身制不把事情完全弄糟，或把一些極重要的事情弄糟的？「三八式」即使有一些人參與了決策，但於長期大局恐也無大補，蓋斯大林黨已成型，各黨均不能不照搬。「三八式」當權，原則上也不會例外，只是反右派、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類問題，或不至於如此嚴重。不過歷史難作推測，那時，中共黨史或又將成為第二部《聯共黨史》，即黨內屠殺史也説不定。個人終身制賢明如胡(志明)伯伯，唯未亂殺人而已，他也無大政績；地球那面(指古巴)那個終身制似也未大亂殺同黨，但天天開十萬人、百萬人大會，不亦世界史上之怪跡乎？

「知識分子沒幾個人敢起來爭鳴」。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知識分子敢爭鳴。多少可以算「爭鳴」的，我以為只有一個半人，一個是梁漱溟，爭鳴的問題確很大，很重要，梁的意見也是對的。即我們實際上比斯大林下手更辣、更徹底地把農村當作殖民地來掠奪，來發展重工業。梁講的「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不大好聽，但呼籲是正確的，是有遠見的。後來的事情越來越證明他意見的重要。另外半個是胡風。胡三十萬言書我至今未看過，但他反對庸俗社會學(即庸俗的階級分析論)、反對五把刀子的提法，原則上是對的。其實他就是反對公式主義、教條主義、片面歌頌、圖解政策、演繹口號、歪曲真相等。胡的語言是怪一些，名詞也特別一些。他的要改造人們「精神奴役的創傷」，其實即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問題的怪裏怪氣的提法。字眼怪些，但意思是深刻的，怎麼是反革命？如看其實質，胡即反對文藝上

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片面歌頌主義等。至於馬寅初，提出一極正確但又是常識性之建議耳，談不到爭鳴。不聽他的話，便是堅持教條，不顧中國的實際需要。我的意思是實際上並沒什麼人敢起來爭鳴。以陳獨秀問題論，「日特」問題，有誰同意？但誰敢爭鳴(康生自己也不會相信，跟着説，迫於向斯大林交賬耳)。西路軍問題，連徐向前也不敢起來説明史實。「外蒙」問題，毛本人可以同斯大林爭，但陳嘉庚一到解放區就提出這個問題，則説他是「反蘇」。我1949年夏即得知此説。

（二）2004年5月26日來信：

(延安)哪一個天天吃小米飯的青年想過要改吃白麵、大米，那裏根本不生產這些東西，誰個去做這種可笑的所謂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夢？王實味的話是有些憤激，其實並沒有哪個青年起來、關心過、反對過什麼衣分幾色、食分幾等之類的事情。照上面那類「絕對平均主義的」怪論，那麼，拼着性命到延安去的，倒不是全國青年中最先進的部分，而是全國青年中最落後的部分了，簡直令人笑掉牙齒。現在某些寫黨史的先生們，請問：你們這不是對中國當時最先進的那部分革命青年，對中國共產黨這段時期的歷史最大的污蔑是什麼呢？你們把當時全國最革命的這部分革命青年，寫成落後不堪的分子，這不是污蔑是什麼呢？其實在延安的青年生活已較優越了，在前方的同志們更苦得多。

（三）2004年7月13日來信：

胡喬木、鄧力群二人就是在1982年「十二大」後取得緊握黨中央宣傳最高控制權力的最嚴厲和最嚴密的司令官。從來都是內行整內行最為厲害可怕。

（四）讀《黨史筆記》中談黨史編纂學一章後來信：

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於自己被某個人君格外施恩選拔重用過，即所謂人主以國士待我，我必以國士報之。這其實也是一種不堅持人民本位到底的立場，這叫「曾經聖人手，字字變黃金」，並不是那麼正確的。

胡(錦濤)甚追求(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均酸氣十足，文理不通，不是味道。總像些高中生或大一學生替他拼湊似的。而且文氣酸腐，語體文不通。什麼叫「權為民所用」？狗屁！比清末新政説還酸腐。這種權是神授的！

胡喬木、毛思想一致問題。我覺得胡受到的教育，使他不大可能同毛思想一致。胡究竟是個書生，本來深受民主與自由主義影響。田家英和我二人在其領導下編語文教科書一年，深知胡極佩服俞平伯、朱自清、聞一多等。胡因是秉筆太監，再加上毛拔胡於諸文人之首，胡「於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我看胡根本上是個二重人格與利害問題。他自己已上了神壇，下不來了。(軟骨頭是本質)

胡陸(定一)關係問題：據于光遠較詳地告知我，進城後一直是胡領導陸。于云，有一次陸不在場，胡對幾個人説，「可叫陸當北大校長去」，即公開表示胡可分配陸的工作了。此項權力，當然來自毛處。

拿日丹諾夫與胡喬木作比較，難説得很。日公一直抓一市一區的全面工作，他還在軍事委員會中代表斯大林、黨中央……在文化思想理論中，則其位遠在少奇之上。《莫洛托夫訪談錄》也盛讚日氏自學努力，學問好。但：日公的文化基礎知識比胡似差得遠。從日的著作看，他的知識面比胡也差得遠。日確有一樣是內行，即音樂與音樂史。這是他的強項，所以做了兩次報告。他罵文藝界名人時，就成潑婦罵街，有失體統了。

（五）2014年7月30日來信，附有《環球時報》同日第14版王海運〈中國對「顏色革命」的警惕性不足〉文的複印件，說此文「是泛指的，事實上等於宣佈一切知識分子都是反革命，比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左的多。」

四、延安生活

（一）2004年5月9日來信：

延安各大小單位、學校等，原來都是在大路邊或大路邊很近的山上窯洞中的，除了毛在楊家嶺等各處住地築有小圍牆，邊區保安處的監獄築有大圍牆，康生的肅反情報部門設在棗園裏面的深山溝裏外，其餘一切機關，都並無圍牆，原則上是開放式的，而且都在大路邊。例如，原中央書記處所在的藍家坪住址，就在通往榆林的主要公路的西側矮山坡上，是無任何屏障的。黨中央機關比較集中的楊家嶺，溝口也在大路旁，並無任何屏障。可是自1943春初起，即在康生《搶救失腳(足)者》報告之前四五個月起，土地還在半凍結時，各大小機關、單位、學校，即無例外地開始大建土圍牆了，施工費了幾個月，有個別人還開玩笑說，這真叫「圈地運動」(這四字似來自《資本論》)。這種施工，長達幾個月，不管圍牆有幾百米長，都要修建。從此，到撤出延安為止，各機關、學校均只有一個警衛嚴格的大門了，彼此之間的來往就完全停止了。延安各機關、學校之間已停止任何交往，往來的只有機要交通員，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此種狀況，竟被保持到延安撤退，即1947年的春天，均無改變。

（二）2004年5月26日來信：

1941年起，就大種鴉片……1942年春，我隨張聞天到晉西北，即在農家見到家家户户大量積存去年存下的鴉片秸稈與籽殼，幾乎家家都有。究竟是何年開始種，我弄不清，會不會是1940年？

整風運動形成一個單位內部小組之間不能自由往來，個人之間更不能自由來往，而且人與人之間往往還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這還成什麼體統？延安有幾年幾乎就是一個死城，但是從來沒有餓過飯。

（三）2004年7月13日來信：

延安整風，名義上打垮了一個並不存在的、早已潰不成軍的所謂教條主義宗派。實際上徹底打垮了周恩來為最高代表的全黨的老幹部「派」。同時，建立了一個以前多少有點影子的劉少奇派。這派是毛製造成的，用以打倒以上二派。這派看來是以劉為首，彭真為副，薄一波為再副。整風以後，無人不在被整之列與是否再用之列，唯獨劉、彭二人是在毛手下專門整人的人(林彪休息讀書，成了隱士)。唯有任弼時在此時期特別，任也是專門整人的人，好像是毛樹起來的。毛之樹他，看來是要調整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而硬行扶植起來。任一直不是擁毛鐵杆分子，樹此人看來是為了打通共產國際這道門了。

（四）2013年11月22日致蕭揚(抄送何方)的信：

楊松，湖南人，可能是與王明、康生、陳雲同機返延的，住在中宣部，同張聞天在一起，時在1937年12月。1938年5月馬列學院開辦，我從延公「考」(其實是「調」)進馬列學院的。第一學期兩個骨幹教師就是吳亮平與楊松。楊松講中國近代革命史，約四五個月(據張聞天藍本。何方注：張聞天本其實也有藍本，即1936年上海光明書局的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史》)，始終未涉及東北抗日軍一字。楊頗有口才，也有些學問。1941年5月即調去籌辦《解放日報》

並任第一屆總編。其時我們這些青年頗莫名其妙，因才堪此任者尚大有人在，為何落入此人手中(一個長期在蘇聯的人)，頗為不解。楊，湖南人，是否前與毛早相熟。大概1942年春楊即因肺結核病故。這時正是毛在延內部集中權力的時候，取消延安一切報刊，改辦一家解放日報，張聞天旋即在內部解除總書記。因此，楊松在此時一人高升，令人不解(這個新職務，非毛最相信的人不可)。

（五）曾老2013年11月27日覆蕭揚(抄送何方)信，談對東北瀋陽一研究人員來文的意見：

> 敵佔東北後，東北抗日軍隊事似由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在管。1938年已回延安的楊xx(已忘其名)(宋以敏注：實即上封信所說的楊松)，似即常住東北境外的蘇聯，領導此項事業。
>
> 1938年上半年，他住在中宣部，給我們講中國近代革命史一課，還不錯。《解放》雜誌38或39年有他一篇〈悼王德林將軍〉，王即抗聯第x軍軍長。
>
> 據知，我義勇軍前兩三年路線完全錯誤，採取土地革命政策，將地方紳士及商人等趕入敵營，一致對我。我方已完全無法立足。後與蘇方交涉，得蘇方協助，兵員可全撤蘇境，另編為三個團或四個團，其中團長之一即金日成(但以中國軍隊名義)。另，馮仲雲也是團長之一(解放後不久調京，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
> 據傳云，在全國抗日戰爭開始時，事實上東北已無打抗日招牌的義勇軍了。此前，號稱兩個軍長的謝文東、李華堂均已降日了。趙尚志被自己的軍隊誘殺了。總之，內部真相，似至今無一可靠材料。

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是何方的知交，兩人結識於1954年日內瓦會議，改革開放後無話不談，凡寫文必互相交換意見。李慎之最早大力鼓勵和支持何方轉治黨史。多次說何方：你早就該改行了，現在才改行，太晚了！讓何方能及時讀到高華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的是李慎之。李慎之在老中青三代中都交遊較廣，親和力強，得到不少有為青年學子的欽慕。高華帶着他剛剛出版的新著去看望李慎之並贈書。李慎之知道何方正在寫黨史，自己只翻了一下，還沒來得及全讀，看出此書對何方寫黨史有用，就把書借給何方，讓他先讀。何方讀後發現在延安整風問題上和高華有點不同的意見，高華這本書(還有何方已經讀到的王若水著《新發現的毛澤東》)為他寫《黨史筆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素材，還進一步激發他要寫出自己對延安整風的不同了解和看法。

李慎之不光把自己所寫的文章及時提供給各個年齡段的朋友們參考，還向他們推薦其他人所寫、他認為寫得不錯的文章。他剛讀到何方所寫的頭幾篇《黨史學習筆記》就大加讚揚並複印多份轉給友人閱讀，使之得以迅速得到流傳。

李慎之是改革開放時期的自由主義倡導者，著有《風雨蒼黃五十年》等諸多名篇。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撤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職務。李慎之給何方寫這封信時，《黨史筆記》已完成大部。這封信寫於2003年李病逝前不到三個月，彌足珍貴。

> 何方：
>
> 捧誦專著，不勝欽佩。老兄衰年變法，改治黨史，以八十之年用功之勤，讀書之博，搜羅之廣，論證之精，在中國學者中可謂創記錄。而探微發隱，糾謬正誤，在舉世滔滔之中，獨成一代信史。相信將來此書必傳，必可與毛澤東同其「不朽」，則又可以為賀者也。

我到延安時，向我談到整風搶救之荒謬錯誤者為數不少，然而又都只是輕描淡寫，還遠不如今天人們談到文革之憤慨。這當然可以以中國文化傳統之專制主義解釋，但又畢竟太粗疏。我意此書，最後應有一章講被整者之心理。這對中國人將來的民主建設，個人的人格建設有重大意義。

老兄要我提意見，我現在關於整風的知識，主要來自老兄，哪裏提得出什麼意見。要是核對老兄所用材料，發現誤引、誤用之處，又絕非我的精力所能及。為了應命，只得挑幾個文字上的錯誤如下，供你參考。(具體修改的字詞從略)

最後要說的是，老兄研究能力之大遠遠超出我以前所知。老兄晚年這條路絕對是走對了。從老兄現已掌握的材料看，獨立寫一部黨史，已無大問題。我只希望老兄以司馬遷的氣魄和精神，繼續努力，在今生完成一部中國共產黨全史。為完成這一任務，第一要求是能健康地活到90歲。所以一定要保重身體，這就算是我春節給你的賀年辭吧！

李慎之 2003.1.29

陳樂民先生

陳樂民是何方的摯友，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於2008年12月去世。他曾給何方發過短簡：

方翁治史，功德無量。張宗子重寫明史時嘗謂「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云云爾爾。方翁閱歷既深，所見者廣，筆之於書，以匡誣妄，豈非功德無量乎。聞將付梓。因綴數語以賀。

2007年何方85歲，陳樂民又送贈扇面，寫詩曰：「山上一老松，人間一仙翁，手持董狐筆，筆底八面風」。

李普先生

李普是「三八式」老革命，原新華社副社長，2010年去世。他就《黨史筆記》給何方寫過幾次信。

(一) 2001年12月13日信：

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粗粗拜讀一遍，大開眼界，但只有欽佩的份兒。材料多且實，用得也好。我沒有到過延安，沒學過黨史，更無研究，唯欽歎耳。

但是總得說點另一面，亦感想而已。恰如大文最後一句：「仍然可能脫不掉延安整風以來給史學界立下的種種陋規」。我感覺確有此可能，所以，可否請你考慮：站得更遠些，乾脆站到體制外，如何？冒叫這一聲，以達雅命。乞恕大膽亂說。

(二) (？年) 8月25日信：

大作〈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拜讀了，極好文章。建議先在《炎黃春秋》發表，理由是：一，有高明見解，且不止一處。我就深受教益。如：國際共運就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中國黨又富有封建歷史傳統，知(識)分(子)黨員不發黨證。大反教條主義之後，基本上沒人再讀馬列。我以前不知，也未想到這層。延安整風開創了輕視知識的風氣與傳統，加深了對知分的輕視與蔑視，壓制了他們的長處而助長了他們的短處。又如指出「大躍進」其實不只是「頭腦發熱」，而主要是文化太低。整個「三八式」一代沒能在中國歷史上起到應有的作用，尤屬高論。沒想到這一點的必不僅我一人而已。此等高見甚多，不備舉了。

二，發表這篇大作，就是向某些黨史學者與大人物(老革命家)的傳記作者大喝一聲，不要再想當然，不要再胡寫了。「三八式」也所賸無幾了，趁他們之中還有一些人活着，發表此文也正是時候。

（三）2005年12月29日信：

我曾經希望何方兄專治黨史。兩卷《黨史筆記》，已奠定何方兄黨史專家的地位，「黨史編撰學」那些學者莫能望其項背！獨樹一幟或另樹一幟乃黨史研究的福音。不僅此也，而且是思想界的福音。我翹首以望，期盼甚深。現在覺得，這想法太狹隘，反映了我思想上的無知，古今中外許多學者，不是專治一行的，而是許多行，至少兩三行的大家，何方兄有這個基礎和學力，有這個研究能力且已有成就，所以我熱望何方兄千萬不要過謙，至少可以把黨史和國際問題這兩行兼起來。問題是不要太謙虛，不要太客氣！

你這樣的大專家，國際問題專家特別是黨史大專家，太少太少。何以特別強調黨史呢？因為大多數所謂專家除了唱讚歌之外，並無真本事！可悲可歎也夫！他們製造對黨對毛的迷信，實乃害人精！

趙寶煦先生

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是何方的老友，2012年去世。他看重《黨史筆記》，有途徑找人印出幾乎可以亂真的複製版。友人包括何方凡有所求，他就聯繫代辦。他某年8月23日給何方來信說：

答應過你，要把對你《黨史筆記》的反映，都告訴你。今得友人來信，現即複印寄你。因未得友人同意，故我把名字塗掉了。大作洛陽紙貴，我也頗願為友人代勞，出去複印（一笑）。

下面是友人給他的信：

何方的書快看完了，這部書實在不錯，收集了許多材料，將當時延安的許多情況寫出來了。所做的分析評論也很深刻，為將來黨史研究提供必讀材料，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基本看法，他還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我知道現在香港已經買不到這部書，所以想麻煩你再給我複印兩部，我要送人。你那裏複印的真是既好又便宜。

許良英先生

許良英2013年去世前同何方有過幾次書信往來。他2010年11月20日在收到何方寄給他的《何方自述》後來信，說：

你對我前信中所涉及的一些問題的論點都表示贊同，令人無比欣慰。你信中提出，「對於建立新中國也應重新認識，這不是一場民主革命，而是以暴易暴……建立了更加嚴酷的專制制度，和個人獨裁……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看，『新中國』的建立，不是進步，而是倒退。」出乎朋友的心聲，這樣激烈的言辭還是第一次聽到，心中立即引起強烈共鳴。這不是什麼理論問題，只要看看海峽兩岸的現實，就一目了然。自從八十年代後期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以來，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國民的精神素質，都為大陸望塵莫及。例如前不久上海世博會上所展示的台北市處理垃圾措施，令人歎為觀止。

由於這一重新認識，我覺得應進一步溯源到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我1974年才從對毛澤東的迷信中醒悟，認識到毛是大暴君、大騙子，但仍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直至1987–88年才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1988年在「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民間自發組織)上，我提出：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否定民主。坐在我旁邊的李銳很不高興，責問我「為什麼要批評馬克思？」可是十

幾年後他一次見到我，熱情地握着我的手，說：「現在我和你一樣，我的文章不讓發表，書不讓出！」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惡果到1989年終於靈驗了，這就是，東歐和蘇聯政權的垮台。有人（蘇聯前駐澳大利亞大使）說，是鄧小平「六・四」大屠殺葬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一點也不差。但也要看到：馬克思主義造成了二十世紀歷時72年的世界性大災難。」

趙復三先生

趙復三是何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結識的好友，曾任副院長，2015年去世。他在1989年「六・四」後去國定居美國後，同何方書信不斷，其中多封涉及何方的黨史著作，這裏摘選三封。

（一）2002年8月28日信，從何方提出的黨史學派談到他對胡喬木的看法（趙和胡的關係較深）：

> 讀到的兩篇大作，深感比王若水〈整風壓倒啟蒙〉一文對歷史挖掘得深，也分析得深。這是真正研究性的著作……記得，1989年春陪胡喬木訪美，有一次閒談，胡感歎說，「許多事情是非，誰活的長，誰就有理。」我體會，他的意思是說，許多事情，本不是原則問題，卻硬上綱上線，說成是原則問題，路線問題，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等等；扣大帽子整人，被整的不服，就長期爭執，解決不了。老兄提到黨史研究中，有「胡喬木學派」；我不知是否還有別的學派？這句話引我思想，它有什麼特徵呢？就我糊塗膽大的觀察，胡從上海到延安後，先在青委工作；1941年開始整風到建國後毛選四卷出版這一時期，在幫毛樹立自己領袖地位期間，是毛的忠實助手。但以毛的帝王思想，不會接受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為輔佐。胡或許比「上書房行走」稍多一點？也不可能多多少……胡曾說過，57年莫斯科會議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方面。1962年胡開始長期生病，那正是你文中指出，7,000人大會，毛開始處心積慮要除掉劉少奇之時。據我看，此時之後，胡似乎有意與毛及高層權力鬥爭拉開距離；直到文革開始，陳伯達成為中央文革組長，而胡則淪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如果說那是陳伯達從中搞鬼，看1975年，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風時，胡也成為被鬥對象。毛的秘書，如田家英，被迫自殺，大秀才陳伯達被打下去。在黨史研究中，胡似乎守三條界限：維護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正統，維護中國共產黨形象，維護毛在主要方面的形象。這是他的政治信念，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成為他所考慮的政治「大局」。為此，他不惜篡改美化歷史。我覺得馬克思派歷史學家常常不堅持真理，而以「顧大局」做政治擋箭牌。結果，歷史在馬克思主義學者手中，只不過是政治工具，而不是科學。史書在中國，歷來是最重要的史籍，史官本來是上通天庭的；現在，官書在廣大讀者心目中，似乎已失去信任，只令人倒胃口；只有當官的才必須讀官書、官史，以求對上口徑。胡喬木與延安整風的關係，我不了解具體情況，從外面看，胡喬木以列寧在1904年（或1905年？）所寫，《論黨的文學》為藍本，幫毛起草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的文化水平寫不出這樣一篇東西），這是毛扼殺文化的重炮。胡說，延安整風後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和抗戰初期的理論學術文藝著作比較一下，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出現這種文字獄興，萬馬齊喑的局面，恰恰是胡的思想助成的。我覺得，無論是蘇聯70年的經驗或中國從蔣介石到毛澤東以至今天70多年的經驗都表明，政治干預文化，對文化來說乃是「致死的一吻」……毛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不僅政治專制超過歷代皇帝，而且還以不斷發動思想改造運動來實現對人民大眾的思想專政（延安整風是其濫觴，49年後推行全國），自己取消了革命的初衷，也於是否定了自己、最後打倒了自己。喬木在毛的這方面活動他是有份的，評價胡喬木的歷史功

過，這是掛在他頭頸上的大磨石。胡對此有沒有感覺呢？毛死後，胡在1977年倡導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自任院長，還在社科院第一次黨代會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它的問題，需要科學地進行研究；科研無禁區；馬克思主義不是結束真理，而是開闢探討真理的道路。這為毛死後，文化學術界的思想解放是起了推動作用的。但另一方面，胡又影響鄧作出四項基本原則、兩次清除精神污染的決定；王若水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問題，胡否定王的觀點；周揚提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胡又加以否定；似乎認為這是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純潔性的問題，卻離開了「從實際出發」這個存在決定意識的基本原則。1989年春，胡訪問美國，在密歇根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為什麼屢犯左傾錯誤?」，提出這個問題，說明胡晚年思想活動的傾向，但要求他這樣一個人否定自己過去，恐怕是不切實際的。胡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正如十七世紀中葉法國數學家、哲學家(也是神學家)巴斯葛在《思想錄》中所說，「人們常以為，有矛盾就說明不真實，其實，正因為有矛盾，所以它是真實的。」如果要給胡一個統一的形象，他大概是一個社會主義改良派，放大小腳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想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思想界限，生怕踩了線，還怕踩上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線，而他自己的思想腳步又是經常搖擺的。

（二）2002年10月29日信是他手寫（不久之後就不再能手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讀《延安整風再思考》筆記五篇引起的思考：

1，過去胡適說，「歷史像一個姑娘，任憑人打扮」，引起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批判。對照六十年來從毛澤東起的各級黨領導人，到理論界、黨史界廣大人士的所作所為，誰對誰錯？

2，六十年來，從毛澤東起的各級黨領導人到追隨他們的理論界、黨史研究界廣大人士，對黨史的歪曲，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所主張的對待歷史的態度？

3，從延安整風運動起到49年建國以後的所有政治運動，要求全民必須對黨忠誠老實地交代歷史。而黨對人民卻一貫地歪曲隱瞞黨史重大事件，還說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相信人民……從六十年(即建立毛澤東思想絕對領導以來)實踐看，黨的面貌體質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腐化？

4，歪曲隱瞞黨史重大事件，還以嚴格的組織紀律進行監督，從理論上到政治路線上(推行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由歷次政治運動到文革和以三面紅旗大躍進為代表的建設路線)到組織上，用一個政黨的全部力量，長期歪曲隱瞞自身歷史上重大事件，這樣一個政黨，怎樣能取信於人民大眾？

5，在戰爭與革命時期以及取得政權，進行和平建設時期，一貫歪曲隱瞞黨史上重大事件的，首先是黨的高級領導集團。這樣一個高級領導集團「寧犯政治路線錯誤，不能犯組織路線錯誤」；這個組織路線和青紅幫的堂規如何區別？孫中山於1905年重組革命黨時吸收會黨做法，蔣介石在軍、黨、特三方面建立忠於他個人的獨立機構，毛也一樣。

6，鄧小平在1975年再出前，向毛寫認罪書，並表示「絕不翻案」，毛一死，立即翻案；胡喬木在毛澤東去世後就批評「文學服從於政治這種話是不通的」。政治上作違心之論是否黨的高級領導政治成熟的表現？

7，歷史是一門科學，稱它是一門科學，因為他首先是「求真」。歷史的特點是人民創造歷史。因此，求歷史之

真相，必須依靠民主。「五四」運動提出了科學與民主不久，運動左翼在聯共促成下結合成中國共產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送到中國來的是斯大林主義。延安整風運動中所依據的本本是斯大林主義著作；運動的結果是學習聯共，建立起毛澤東在中共的一人統治。隨着革命形勢開展，到49年後，逐步建立起毛澤東思想的統治。這個「思想」內容就是「以黨治國」，由「一個領袖」造出「一個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孕育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律貼上「為人民，屬人民，代表人民」標簽，直至如今，還貫徹推行這個「革命優秀傳統」。

8，研究中共黨史，本來是研究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中國現代革命史，本是為了中國的前進作鏡鑒。但是「五四」後八十年，其中六十年，黨的高級領導層內，以毛澤東為首，用政治力量、組織手段、編造偽歷史，「中共黨史」成為偽科學的一個典型。這個偽科學，有三個特徵：(1)封鎖資料，不為求真，不許圈外人闖入禁區。(2)兩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是由執政當局根據政治需要作歷史的描述，並以組織決議來封殺科學研究。(3)現在黨史研究的狀況，從局外人看，一是抽象化，已經形成一套「套話」，除中央決議說的「套話」外，沒有東西了。二是專業化，把黨史送入廟堂供養起來，研究則成為日益冷辟的「專門行當」。

偽科學怎樣成為真科學？關鍵無他，只在戳穿真偽，所謂「去偽存真」，這就是科學研究的無量功德。

（三）2006年1月3日信：

我以為《黨史筆記》的最大功勳，是衝破了以歷史為官書的兩千年中國傳統。書裏講了別人隱晦不講的真實歷史，寫下了親身經歷者歷六十年後對歷史的看法：這些都是《筆記》對二十世紀中國史的貢獻。但是，我覺得，比這更為重要的是，從《漢書》起，兩千年來，中國歷史從來都是「官書」，進入毛澤東時代，黨史更成為官書中的「秘笈」，非黎民百姓所敢接觸，更不要說「置喙」了。歷來都聽見講，「現代政黨是群眾性的黨」，唯獨在「最先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最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其黨史對黨員也要「保密」(如《六大以前》，不要說老百姓，連一般黨員也不知道有這本書。我只因在一位長征老幹部書架上見有此書，也假作沒看見，知道這是我不該知道的「聖諱」)，官書聖諱，只准耳聽。有一個官方頒發的文本，也只准背誦，不准議論。但我(以及像我這樣的許多人)是順民出身，慣於服從權威，服從革命傳統，決不多嘴。如今，老兄轟隆一聲，把「官書」之最捅了個大窟窿(故此看完書稿，立即打電話，問老兄是否不要命啦！)。「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老兄電話裏說，有人把老兄比為王船山。我體會這心情，但船山先生只是說了點個人意見。我看，打破史官飯碗的，從前有個司馬遷，他「立了一家之言」。在當代，突破兩千年傳統、敢冒本朝之大不諱者，其有第二人乎？前兩年曾就寫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發一點小議論說，看來這方面史家恐還要以陳寅恪先生追思王觀堂先生所說：「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為依歸。如有史家，以此為然：老兄小心，恐要提提褲帶，準備進入史書了。

2011年10月9日座談會發言摘錄

蕭揚先生

蕭揚和何方的友誼始於駐蘇聯使館研究室。張聞天發現了蕭揚的研究寫作能力和認真、細緻、低調的工作作風，一回外交部當常務副

部長就讓蕭揚當了政治秘書。在五年多時間裏，蕭、何兩人白天跟張聞天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晚上同住在張聞天家為張辦事。1979年後，兩人又同在張聞天文集編輯組工作。何方開始寫作時，每寫完一篇，必立即送請蕭揚提意見。蕭揚讀稿仔細，意見中肯。只有經蕭揚閱提意見後何方才放心，並最後修改定稿。

蕭揚在座談會上說：

> 何方同志屬於老八路，但是他的思想跟老八路的有些傳統不一樣。老八路的傳統中有很多好東西，但是許多老八路也有落後的東西。比方說，什麼都講究按官階、按地位、按級別，這樣的觀念、傳統很深。但是何方同志對此是抵觸的，從我認識他一開始就感覺到他是看不慣這些的。再比方，他的獨立思考精神、懷疑精神，同我們黨內的傳統，至少是我入黨後感覺到的傳統，是恰恰相反的。他敢於懷疑，他認為不對的東西，敢於保留自己的見解。當然，身處領導機關，辦事情，起草文稿，都要遵守紀律，不能逾矩。他自嘲是「膽小」，雖然膽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私底下，他還是流露了許多看法，所以我才知道他有自己的見解和好惡。何方同志身上的這些品質，不知道是從哪兒繼承來的。不像是老八路的傳統，也不是毛澤東培育的黨內生活傳統，倒是同講平等，講民主，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是相通的。這些東西在他身上早就有了，這點非常可貴，也非常重要。資中筠剛才講他的思想有變化，確實有變化，但是我覺得，他之所以能夠一步步變化發展到今天這樣，跟他的這個老底子有關。
>
> 具體講他這一生的貢獻，我覺得主要是要講他在學術界思想界的貢獻……要說何方的獨立貢獻，還是要說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及其後在學術界思想界的貢獻。

> 在黨史研究領域，何方的主要貢獻是他那本《黨史筆記》。對構成傳統黨史基礎的一些觀念，或何方所說中共黨史編纂學，這是一本顛覆性的著作。我最感受益的是他對延安整風的敘述。我說敘述，是說這裏既有回憶(事件的回憶、情緒和氛圍的回憶)，又有梳理(考證、分析)和辨析(否定既有結論，提出新結論)。黨內有一些壞的傳統，例如個人迷信、運動整人等等，我們感覺到是源遠流長的，但是源頭何在，還是模模糊糊。何方的敘述就讓我們追根溯源，最後追到延安整風了。而延安整風原來是絕對不能觸動的，是所有不能批評的聖物中最最不能批評的聖中之聖。1959年外交部批判張聞天大會上最厲害的棍子之一就是說張聞天否定延安整風。毛澤東對(「文革」時期)所謂「二月逆流」中老帥們的牢騷起初還不在意，一聽到陳毅的批評涉及延安整風，頓時就變臉了，可見這是多大的痛處。何方的敘述就撼動了黨內壞傳統的這個命根子。在何方之前也有過一些涉及延安整風的回憶錄，例如韋君宜的，很真實，很珍貴，但是畢竟只是一些片斷，比較零碎。也有一些優秀的研究著作，例如高華的，但是畢竟單憑文字材料，不能苛求像親歷者那樣入木三分，於細微處準確地體味和表達要害之所在。延安整風的親歷者中有水準有志氣做這件事的，肯定大有人在，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還沒有見到類似的著作。何方的敘述不僅超越了前人，至今也還無人能出其右。
>
> 在張聞天研究方面講何方的貢獻……他的黨史研究(《黨史筆記》)就是從張聞天研究切入的。他的研究題目，包括遵義會議確立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張聞天、毛澤東關係的演變和兩人的比較、延安整風與張聞天等，都是張聞天這個人物最核心的問題。這些問題前人沒有研究，或至少沒有深入地系統研究，沒有按照秉筆直書的原則實事求是地研究，因而留下了許多錯誤認識和糊塗

觀念。何方直面這些問題。他不受傳統黨史束縛，敢於挑戰幾十年來已被奉為不易之論的錯誤說法，撥開為個人迷信製造的霧靄，還張聞天這個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何方的研究因而也達到了前人未曾達到的深度。

在何方釐清的諸多問題中，我覺得有一個最為重要，即張聞天是否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是否真正起了總書記的作用。中央為張聞天平反以後，張聞天已經從黨史中被遺忘、被醜化的角色重新作為「我黨在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而被肯定，鄧小平肯定他是黨中央總書記(雖然有人堅持說是「負總責」)。但是，還是有許多人認為，張聞天不過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實際上出主意、起領導作用的是毛澤東。持這種看法的人，實際上是受了傳統說法的約束或影響，即認為遵義會議確立的是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許多人，包括一些為張聞天講話的人，也邁不過這道坎。例如，鄧力群就有一個看法，認為張聞天擔任總書記以後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使毛澤東同志正確的策略、方針通行無阻，貫徹到底」，也就是說，張聞天不過是推行毛澤東的主張而已。對於這種說法，何方用了八個方面的事實加以辯駁，說明遵義會議確立的全黨領導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領導集體。這就解決了張聞天評價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他在黨內數十年，對於黨內政治生活中的消極現象有切膚之痛，批判的衝動最後化為那本《黨史筆記》。他同張聞天有着難以割捨的關係，這自然是他研究張聞天的動力。他研究的問題，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而且是帶有全局意義的問題。時代問題不僅是國際問題，而且是據以決定治國方略的根據的問題。黨史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而且是現實問題。正因如此，他的學術活動並不是純學術活動，他的幾本著作都有強烈的政治意義。

丁東先生

丁東是斷定何方的黨史研究有成書出版價值的第一人。他才讀到李慎之轉給何家棟的頭幾篇《黨史學習筆記》，就判定何方是位「高人」，接着就到家裏和何方談寫書出版的事，還很快帶朋友來聯繫出版事宜。兩人從此成為忘年交。何方開始進入研究和寫作時，是寫到哪兒算哪兒，並無最後結集成書的打算。丁東的出現促使何方進入更佳寫作狀態。何方在改寫《何方自述》的過程中，丁東多次分篇編撰，投送給不同的刊物發表。他進入《炎黃春秋》後，輪到他當責任編輯的各期，幾乎都收有何方的文章。這就使何方的一些著述能及時在內地為廣大讀者所知。

(一) 丁東在發言中說：

> 何老集歷史當事人和歷史研究者於一身，這樣的人特別少。有的人是歷史當事人，但是沒有能力研究，反思，有的人是歷史研究者，但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何老集二者於一身，他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親歷者，對中共高層有近距離感受，他的反思，我覺得特別有意義。在《黨史筆記》裏，對黨史編纂學的反思我覺得份量很重。黨史編纂學怎麼形成的，有什麼特點，有什麼問題，毛澤東起什麼作用，胡喬木、胡繩起什麼作用，他都作了精湛的分析和中肯的論述。他不光是集中了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的智慧，而且達到獨到的深度……何老對於黨史編纂學的反思，不光是對某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新見解。他可以說是一個思想策源地。和他年齡相近的一批被稱為兩頭真的老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色。其中有幾位，思想家的氣質特別突出。去年去世的朱厚澤是一位，前幾年去世的李慎之是一位，何老也是一位。他們既有政壇高層的經歷，又有世界眼光，博覽群書，貫通古今中外，理論抽象和概括能力很強，他們提出的命題，特別能扎到穴位，啟動別人的思

考，推動公共領域的思想深化。何老對個人崇拜反思、一元化體制形成的反思，對黨史編纂學的反思，對和平與發展時代的反思，都體現了他的思想家氣質。

(二) 丁東還寫了一段話：

《黨史筆記》是何方先生晚年治史的扛鼎之作，開創了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家之言。何方先生既是延安生活的親歷者，也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嚴謹學者。他在劉英等前輩的啟發和李慎之等好友的推動下，耄耋之年從國際問題轉入中共黨史研究，寫成此書。此著史料詳實，邏輯周密，高屋建瓴，大面積突破成見，還原了中共1930到1940年代的諸多重要的歷史真相。此著還從根本上反思了中共個人崇拜的歷史淵源、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和中共黨史編纂學的積弊，振聾發聵的思想見解觸目可見，具有深刻的啟蒙意義。

邢小群女士

為何方做口述歷史的邢小群在發言中說：

何老的研究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有很大關係。我在何老自述成稿前做了一些口述整理工作，通過對他的了解，我覺得他的觀念的提出，跟他個人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比如關於延安，他分為延安整風前期、延安整風後期，也就是張聞天時期和毛澤東時期。他有非常清晰的親身經歷，結合自己的親身感受研究黨史，所以我覺得他把握得更準確。

因為要寫《黨史筆記》，他看了大量的回憶錄，看了各種各樣的歷史檔案，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回憶錄是靠不住的，官方組織寫作和出版的回憶錄尤其靠不住。他舉了很多例子，有些高級領導人的回憶錄，組織了幾十個人的班子，家屬也要干預，什麼東西可說，什麼東西不可說，

什麼事要按什麼口徑說，所以官修的歷史絕對不可靠。這一點對我的啟發很大，我寫過一篇有關口述歷史問題的論文，曾經把初稿給何老，何老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錢理群先生

錢先生與何方因互贈所著和在《炎黃春秋》一起開會而結緣。他2007年4月10日給何方的信中說：

承蒙惠贈大作《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我認真拜讀了，並且和《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一起讀，產生了很多想法，就寫了這篇讀書筆記，文章很長，也很囉嗦，現呈上，請批評指正。

錢先生所說的長文是他所著《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一書(香港星克兒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6月出版)中的〈中國改革向何處去〉一章。文內把「何方們」稱為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另一種類型的老共產黨人，介紹了他們的「中國改革新思維」，說這是「非權威的，在討論、質疑中不斷拓展的開放性思維」。

錢先生在發言中說：

蕭老談到了何老的貢獻，我認為，除了黨史研究之外，還有兩方面的貢獻特別值得注意。剛才丁東提到我寫的長文，題目是〈中國改革向何處去〉，文章談到了這些年黨內民主派的老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批判現實，在中國改革已經走到死胡同，面臨「向何處去」的選擇的關鍵時刻，提出了一個「改革新思維」。我認為，這樣的改革新思維，是以謝韜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和宗鳳鳴整理出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作為標誌的。但我強調，這樣的改革新思維是這批「老共產黨人的集體思想的結晶」。這其中就包括了何方先生的貢獻。我在具體討論這樣的「新思

維」時，大量地引用了何老的《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裏的論述，特別是書的最後一部分，關於「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如何看待共產黨的領導」、「關於中國發展的前景」，不僅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而且有理論的含量，是為在總結「中國經驗教訓」基礎上的批判性理論的建構奠定基礎的。我一直認為，建構這樣的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的中國自己的「批判性」理論，是中國知識分子，學術界的歷史與現實的責任，也是對世界思想、學術應有的貢獻：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付出了這麼多血的代價，理應作出總結，產生創造性的理論成果。在這方面，朱厚澤、何方、謝韜，還有許多的老前輩，都作出了表率。但我覺得，學術界對他們的努力，特別是在理論上的貢獻，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這是十分遺憾的。而這樣的認識不足，更是反映了我們這些後輩缺乏他們這樣的理論創造的自覺性，這更讓我們——至少是我，感到慚愧。

這裏，我還要談到何老的另一個理論貢獻。這就是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關於「時代」的新思維。那時的中國，也正處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走向改革開放之路」的歷史轉變的關口。何老和幾位老前輩，也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提出了如何看待「我們所處的時代」的問題，挑戰所謂「革命和戰爭時代」論，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新思維。這就抓住了要害：所謂「革命和戰爭」論，其理論基礎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這其實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從他四十年代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到六十年代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發動「文革」，「文革」中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無一不是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對時代的分析為其理論前提的。如果不突破這一列寧主義的時代論，就根本談不上改革開放。幸而經過複雜的黨內鬥爭，鄧小平最後接受了「和平與發展」新思維，這才有可能理直氣壯

地推行改革開放的新路線。因此，完全可以說，何方先生和黨內的幾位老前輩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新思維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的。可惜我們對何老這一理論的貢獻和意義，依然認識不足。我今天所以要強調何老的這兩大貢獻，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變的關口。我有一個感覺：現在的中國很有點文革後期的氣氛，許多人(當然不會是所有的人)都感到「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中國向何處去」再一次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而中國的問題又是和世界問題聯繫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今年以來，世界上不同體制、不同發展模式的國家，從阿拉伯國家，到美國，歐洲，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出現了危機和變革要求，這些性質並不相同的危機和變革卻都會從不同方面影響中國。面對這些世界歷史的新變化，我們如何在理論上作出新的分析，新的概括，這是讓我感到非常困惑的。在這全球大變革的時代，中國發展的新的轉捩點，更需要全球性的戰略眼光，我正是帶着這樣的問題，來向何老求教的。

吳思先生

吳思和何方因《炎黃春秋》相熟。他在發言中說：

在我們雜誌的顧問、編委和作者裏面，有一批何老師這樣的「兩頭真」，他們至今發揮着重要的影響。《炎黃春秋》能夠存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這些老先生撐着、頂着，不斷拿出精彩的觀點，既影響了現在的一批讀者，也影響了我們這些編者。

在這些人裏，何老師有一點與眾不同之處，就是眼界特別寬。他關注的是對整個時代性質的判斷，國際大形勢的判斷：二戰之後，究竟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還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是很多老先生不碰的話題。李慎之老師

也談一些，但是何老師談得更集中、更透徹，把問題提到最高處，這是何老師獨有的東西。

第二點不同之處。很多人談張聞天，但是何方老師選擇了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角度，就是在第一點的基礎上，在對時代性質判斷的基礎上，認識張聞天的外交路綫。從這個角度看，確實存在兩條外交路綫，而且有高下對錯之分。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張聞天及其歷史地位。

第三就是延安經驗。延安整風有很多人研究，但是何方老師做得更精彩。我們私下議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代表了我們這代學者中研究延安整風的最高成就。但是，比較而言，何老師的《黨史筆記》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這兩本書更有血肉和體溫。讀了這兩本書，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去延安，為什麼挨了那麼多整，還跟着延安跑，一直跑到七十年代。看了何老師的書，就能夠充分理解「兩頭真」的之字形人生的三個階段。批「左」，最好「左」過。沒「左」過，批判起來不容易把各個方面分寸拿捏妥當。這種拿捏妥當的批判，有體溫的批判，如果那代人自己不做，後來的歷史學家替代不了。後人很難有血有肉地寫出那種分寸感。

楊繼繩先生

楊繼繩和何方因《炎黃春秋》相熟，他在發言中說：

何老明年90歲，按照中國「過九不過十」的習俗，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何老90歲生日。這90年的中國歷史是曲折的。何老親身經歷了這個曲折。

人類本來是要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從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學發展。

而我們中國的近代史卻有一段時間脱離了人類這個發展軌道，直到改革開放又轉了回來。這好像象徵中華文明的黃河一樣。黃河本來是向東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但是流到甘肅以後被拉向了北邊，向蘇聯的方向流動，後來又拐回來，轉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個河套。中國近代也有這樣一個河套，歷史的河套。

上面説的是一個抽象的輪廓描述。在這個歷史河套中，有千百萬人的活動：理想和抱負，犧牲和貢獻，生離與死別，喜悦與悲傷。每一個活生生的親歷者，他們製造了中國歷史的河套，他們個人的思想歷程也是一個小的歷史的河套。他們的小河套是有血有肉的。何老就是中國歷史河套的製造者之一，他自己也有一個小河套。

何方老16歲參加革命，不久就到了「革命聖地」延安。「黃河之濱聚集了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正是這群優秀子孫，正是千百萬個像何方這樣的有志之士，懷着美好的理想，在陝甘寧地區，把流向大海的「黃河」扭向了北方，扭向了蘇聯的方向。當然，中國進入歷史的河套不僅是他們這一群人的力量，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一點，我後面再説。

歷史河套造就的中國是一個專制的中國，貧困的中國。這種結果不僅背離了何方他們參加革命時的初衷和願望，也使中國人蒙受了災難。

何老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説出了他個人的歷史的河套。他寫道：當年參加革命時懷抱的崇高理想就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喊的口號中有「不自由，毋寧死！」唱的歌也是「我們為了博愛、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價，甚到我們的頭顱。」可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這個理想竟然漸漸地淡忘了。而且回頭一想，反而越奮鬥，離民主、自由、博愛、平等越遠，甚至走到了它們的對立面。是當年

選的理想錯了(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反動的)，還是後來背叛了當年的理想(因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這些東西屬於人類共同理想，不分什麼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難道這些問題不值得認真反思？何老從「個人的歷史河套」引出了「何方之問」。「何方之問」比所謂「錢學森之問」更恢宏，更深刻。「何方之問」抓住了時代的關鍵，不僅是一代革命者晚年的反思，也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期待回答的問題，是中國人的「世紀之問」。

改革開放應當是走出歷史河套、回歸人類文明主流的行動。但由於「何方之問」還沒有答案，或者說還沒有認識一致的答案，人們還在彷徨，兩種思想還在繼續拉鋸：你要回歸人類文明主流，他要批判普世價值；你要民主憲政，他說你背離「核心價值」。中國走進了歷史的河套，不是何方這一代人不明智，也不是某幾位主要領導人的過錯，更不是某些人的陰謀，而是有着深刻的歷史邏輯。站在歷史大視野的高度看是彎路，身處當時的人覺得是光明的坦途。

何方在革命隊伍裏奮鬥了六十多年，1999年離休。為了解答「何方之問」，他離休後開始學習中共黨史。這一學習非同小可，學出了譽滿中外的《黨史筆記》。還有《何方自述》、《何方雜談》，厚厚兩大本，沉甸甸的。何老的著作我沒有讀完。如果讀完了，也許能找到「何方之問」的答案。

傅國湧先生

傅國湧因丁東結識何方，何方喜歡讀他的著述。他在錄影發言中說：

在那篇題為《何方顛覆了「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小文中，我對他的著作做了客觀的評述，有比較多的正面評價。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說法，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最初目標並不是像以往所說是為了消除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謀求中國黨的獨立，更不是針對王明的，而是針對張聞天的。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只有他作為延安走來的當事人才有的真實體會。我覺得這部書對中共黨史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研究有新的拓展，至少帶入了一個新的視角，他有自己生命體驗在裏面，研究者事過境遷之後在書齋裏對材料做出的判斷和當事人在現場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其中我特別提了一個觀點，雖然他對那一段歷史有深入的反省，卻沒有因此滑入全盤否定的思維定式，而是客觀地描述了整風運動的起源、過程，每個階段的變化，把一切不良、嚴峻的後果更多地歸於當時的客觀情勢、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毛個人的陰暗心理、狂妄野心上。他曾在延安生活過，曾親歷過整風運動，是歷史的當事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並且他在寫書之前重新走訪了當年在延安抗大的同學同事，有着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備的特殊視角。

以後，我們斷續通過一些郵件，何方先生出了新書都寄來，有了新文章也會發過來。他的口述自傳《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出來後，就送了我一套。那是一部非常札實的回憶錄，他自己是搞文字出身的，對文字很講究，不光是口述，而且有些是親自寫的，所以很縝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大饑荒時代的回憶。那時他從外交部下放到安徽農村，也得了浮腫病。他清楚地記得，儘管那麼多人餓死，不光是沒有人反抗，甚至沒有人提出質疑，那是一個餓死也不敢質疑的時代，一個荒謬的時代，包括他本人當時其實也沒有提出質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唯一例外的是，有個老太太偷偷對他說的一句話：「毛主席為什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他把這些都如實的記錄下來了，我覺得很好。

還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就是毛澤東的生物鐘跟別人不一樣，晝夜顛倒，經常半夜三更把劉少奇、周恩來這些人提溜起來。他曾一度在外交部代替張聞天值夜班。劉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藥，有一次吃了安眠藥，剛剛睡下，毛澤東那裏電話來了，不去又不行，急得下面這些辦事的人，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這個細節就非常震撼，讓人看到毛個人竟然可以像君王一樣，對他的下屬如此頤指氣使，而且不顧時間，沒有任何的顧忌，透過這一點，後人就可以看清這是一個什麼社會，包括饑餓這些細節都是不可替代的。還有他年輕時代的革命經歷，特別是參與東北的土改，他也提供了許多以前沒有的記錄。我曾看過他同時代很多人包括打天下那一代的將軍、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他的自述都顯得獨特，從口述史的角度來說，這本書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我在《開放》月刊發表過一篇評論〈餓死也無人公開說話〉，說：「有時候，一個小小的細節便能擊穿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便能把多少年來維護、捍衛的神話砸得粉碎。」

我覺得何方先生越是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成熟、越絢爛。中國有個獨特的現象，也可以稱為「80後」現象，許多知識份子往往要等到80歲以後，他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現出來，他的創造性完全的彰顯出來，李慎之先生如此，何方先生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如此，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是開放，他走過的道路，他的人生閱歷都給他提供了足夠的支撐，使他晚年更加能把這些經驗、教訓做出深刻的歸納，並通過適當的文本表達出來。何方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而不是所謂「革命」的時代，或者「三個世界」，為這個時代定了調子，實際上對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真正的傳世之作還是他的《黨史筆記》與口述自傳，這都是他晚年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生涯或學術生涯，也都是到了晚年才真正開始的，這是個獨特的現象，尤其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大轉型時代裏。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作為「一二・九」一代人，他生於1922年，跟李慎之、許良英他們，包括歲數稍微大一點的顧準、李鋭、胡績偉、韋君宜等同屬一代人，也就是在抗戰時期，出於追求民族獨立、民主平等自由的強烈意願，參加了共產黨，誤入這條紅色烏托邦歧途的這一代人，他們當中顧準反省得比較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醒過來了，其他人要晚一點，有的是1980年代，有的是1990年代，韋君宜在1990年代已經完成她的《思痛錄》。他們中間能活到80歲的，往往都回到了最初追求自由民主的起點。

李慎之先生醒悟也不算早，直到1995年以後才真正開始寫出內心的反思，到1999年發表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大體上完成了他蜕變的過程。應該說，《黨史筆記》這部著作的完成，代表何方先生回到了當初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軌道，對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有了比較清楚、徹底的反省。這一代人最後有這樣的歸回，能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留下來，有這樣的自我反省意識，放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當中也是有獨特價值的，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有很大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缺乏反省的民族，中國缺乏懺悔錄，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面，他們的知識份子留下了很多的懺悔錄，奧古斯丁(編按：Saint Augustine of Hippo，曾任大公教會在阿爾及利亞城市希波〔現稱安納巴〕的主教。他的著作《懺悔錄》被稱為西方歷史上「第一部」自傳。)有《懺悔錄》，盧梭(編按：Jean-Jacques Rousseau，是啟蒙時代的瑞士裔法國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作曲家。他的作品《懺悔錄》是現代自傳的開端。)有《懺悔錄》，許多人都有懺悔錄，有些人的著作雖不叫懺悔錄，但實際上都是懺悔錄，對自己走過的道路，對一個民族走過的道路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每個

人都有原罪，自我反省是每天的功課，而我們一切都是從人性本善出發，所以反省很少，老認為人是可以變得完美的，人是可以變成完人的，這是我們文化中的一個嚴重缺陷。跟隨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這代人，後來吃的苦也是最多，從1950年代，有的是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這一段都是煉獄。實際上1980年代以後，又有很多的波折，哪怕在身體上沒有傷害，生活上沒有傷害，但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傷害仍然存在，整個1980年代也是起起伏伏的。1989年之後，起伏就更多了，而且仍然是一個禁錮的、封閉的、非常態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他們最終能夠告別自己的革命，這不是李澤厚意義上的「告別革命」，而是一種自我洞察、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的結果，其實已深入到人性層面。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要論價值，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我倒認為，何方先生最有價值的還是他的口述自傳，這是他個人的經歷。

去年中國最有影響的一本著作是《巨流河》，齊邦媛寫她一生的經歷，她經歷了一個動盪的時代，經歷了海峽兩岸的歷史變遷，對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對峙，齊邦媛作為一個世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後在台灣安身立命，成為一個著名的教授，她把自己一生的道路用行雲流水般的文字記錄下來，既是一部中國的個人史，更是她個人的一部中國史，實際上比有些人寫的通史好多了，更有生命力。當然大陸出的是閹割版，如果你看原本，是兩條線展開，一條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成長的線索，另一條是一個基督徒成長的線索，這兩個線索齊頭並進，充滿了內在的張力，一直有內心的反省，就是基督教文化給她的那種內在的支撐，所以她不怨天尤人，不憤怒，也不沮喪。

何方先生的口述自傳，我覺得也應該從這個意義上看待他，這也是一個人提供的一部二十世紀的見證。見證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視的一個詞。作為一個個體，他從參與紅色革命，到最後對紅色革命做出比較深入的反思。他把一生的親歷記錄下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證，而且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見證。

崔衛平女士

何方晚年同崔衛平交流較多，她在發言中說：

出於理解的要求，在閱讀的過程中，每當發現何方先生的觀點啟發了我，能夠與自己產生完全的共鳴，就覺得特別愉快。比如他在這本自述《從延安一路走過來的反思》中，何方先生辨析「救亡壓倒啟蒙」的這個後來出現的提法，何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他認為實際上「救亡運動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大覺醒」。「在這之前，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連東北四省都不知道。但是經過救亡運動，人們就都知道了中國有多麼大，知道了日本長期侵略中國，也知道了民族危機和救亡圖存的一些道理。」因此，「救亡運動本身即是啟蒙」。這個描述既符合那一代人的實際經驗，符合小時候父親對我所講的，而且在理論上也完全站得住腳。

這個看法有一個理論上的支持：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民族國家，自然是回應現代性要求的一個部分，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對外而言，即在國與國之間，這個民族國家要求平等的成員身份，同樣對內，它也提供一個普遍而平等的成員身份，稱之為「國民、公民、人民」也好，而不是臣民或者僅僅是家族成員的身份。當然，除了這個現代性的形式，民族國家也有一個前現代的實質，它需要一個天然的、歷史的、或者文化的「超越建構，作為民族的集體身份所寄」。（錢永祥《現代性業已耗盡批判意義

了嗎》）但是無論如何，民族國家擁有一個屬於現代形式，不能把它與啟蒙對立起來。

恢復張聞天的歷史原貌，給這位被掩埋的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以客觀的評價和描述，這是何方先生最初動筆的一個動力，所作出的成果也令人信服。用今天的眼光看來，何方所描繪的張聞天，更像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而他與毛澤東的種種分歧，正好像是中國共產黨內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主義的分歧。這個分歧最簡單地說就是——毛所提倡的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哲學；而張聞天的路線則是着眼於和平建設、平行共存。

最初這個分歧的突出表現就是如何處理西安事變。何方先生在書中告訴我們，西安事變的第二天12月13日，張聞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主張「除蔣」、「審蔣」，提出「以西安為中心領導全國，控制南京」。張聞天的意見是「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統一戰線」。這個轉變，也是從「內戰」轉變為槍口一致對外的抗日聯合陣線。最終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中，體現了張聞天的這個立場。毛澤東事後也提到自己「審蔣」的口號不對。這其中張聞天比毛澤東多一個考慮，就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重，而不僅僅是壓倒和消滅對方。

何方先生還向我們描繪了一系列的分歧，都可以看做中國革命中的斯大林路線和社會民主黨路線的區別：「張聞天主張解放後黨的工作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要搞一個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並在取得政權之後即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張聞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設，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則致力於反帝和搞世界革命，並爭着當頭。張聞天一貫強調民主，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反對突出個人（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和搞個人崇拜。毛澤東強調高度集中，實行獨斷專性，以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大搞個人崇拜。張聞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倡獨立思考和相容並蓄，總是盡其所能幫助和保護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讀書越多越愚蠢」等等。

這些分歧有個人性格、修養的因素，但本質上是一個政治路線的分歧、視野立場的分歧。是跟上時代的潮流，以世界的眼光看問題，還是閉關自守，搞封建帝王的那一套，不能僅僅用個人性格來得到說明。應該說，張聞天的這一套東西在黨內，也許還是有一定的基礎和影響力。比如我小時候就經常聽父親說起張聞天這個名字，肯定是在廬山會議之後了。這是在我們的課堂上和別的地方聽不到的生疏偏僻的名字，因為我不理解所以將他記得非常牢。父親說起這個名字的時候，是飽含熱情的。

從當時整個大的背景來說，張聞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得不到貫徹執行，他本人因最終被打入冷宮，大體上還是能夠理解的，儘管這非常遺憾。而不理解在於，偏偏這麼一個人，幾近完美，卻在延安整風時，1941年9月的會議上，面對明明不切實際的過火批評，不僅做了關於自己的過頭檢討，而且還參與了製造毛澤東神話，何方先生在書中寫到他是「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檢討自己的錯誤」，參與製造了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而且在延安形成的那份《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張聞天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的有份量的話」，「一段重要的結語」，終於將毛澤東神話編織圓滿。也就是說，毛澤東一邊將張聞天打下去，認為他一錢不值，一邊卻認為張聞天吹捧自己的那些話還是有用的，僅僅是這部分可以拿出來寫進黨的決議裏面。

何方先生還談到在他的反省筆記中，張聞天不止一處使用《我在這個時期所作的罪惡》這個標題。這個對於張聞天來說，肯定是非常羞辱的。接受這樣的羞辱，從他的個人性格中可以得到解釋，軟弱、不爭論，「反求諸己而已」矣。何方先生分析的理由也令人信服——除了信服毛還希望自保，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這裏面還有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當然這是今天才可能有的想法，在當時不可能。

我想説的是，毛澤東與張聞天之間，既不應該是君臣關係，也不應該是個人關係。應該同時也是一種政治關係，是政治對手的關係。政治的維度一方面涉及信念、理念，這些東西即使不在敵人面前，當它們遭受打壓時，也同樣需要堅持和堅守；另一方面政治的維度還具有公開性和客觀性的性質。張聞天不僅是張聞天本人，而且是他工作的脈絡，工作的軌道、工作的局面，工作的業績，這其中涉及許多人和事情，他必須對自己做過的事情負責，堅持這些事情的真理性也是承擔這些事情的責任感，承擔它們的延續性。它們所關乎的客觀脈絡，不能因為他這個人「能伸能縮」的性格而隨之一筆勾銷，變得萎縮和坍塌。你所做的事情，不可能是你一個人做的。正因為關乎許多人而是你主持，所以你不能把它們説成是「罪惡」。政治關係的客觀性，要求人們，不能將政治關係折換成個人關係，以個人性格來處理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需要挑戰更需要能夠迎接挑戰，需要有超越個人的東西，這對人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不適合的。

從我的角度來看，張聞天的檢討認罪和頌揚毛澤東，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從他的角度來説，僅僅是懦弱和謙讓，其中不乏包含美德的成分，但是在一個體制當中，在一個系統當中，這類行為會得到放大和強化，成為一種標誌性的東西，亦從未有過的方式，製造了這個體制，鞏固和強化了這個體制。這是當事人萬萬沒有想到的。也就是説，儘管個人在這個體制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當體制在利用個人時，當體制有這個需要時，個人的一舉一動就變成十分重要，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原先的個人本身。在體制中個人的小惡會造成非常大的後果，某種快速發酵就像加速度。在某種意義上，張聞天很有代表性，在許多人身上包括我父親身上，都能夠找到他的某些影子。

坦率地説，閱讀有關我們自己歷史的書，讓人感到很氣悶。在所有真相被披露的地方，都是讓人產生困惑和無力感的地方。真相到哪裏，迷惑不解到哪裏，感到從前人們走過來的歷史是如此沉重和混亂，難以承受。為什麼事情會這樣？那個年代的人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那麼多的聰明人、傑出的人為什麼都失去理智？如果前面的人們是這樣，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可能性呢？如果他們很少有東西留下來，我們從什麼地方開始呢？我體會到了我的學生在課堂上、在我自己課上感到的困惑。

有些細節想了許多天，許多個晚上。比如何方先生説他自己，「我在延安整風和搶救中是倒了霉的，情緒上的不滿一直存在。但説也奇怪，經過延安整風，我反而對黨中央特別是毛主席更加尊重和信仰了，成為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忠實信徒」。何方先生提到最初到延安的幾年有過一陣自由活潑的生活，那為什麼體驗過自由滋味的人，後來怎麼會變得樂意接受思想禁錮呢？再比如他説批王實味時，「不光是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延安大的知識分子像丁玲呀、艾青等等，比我們轉的還快，不到一個月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對王實味口誅筆伐，上綱上得很高。」同樣，這些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已經從自己的工作中不僅體驗而且創造了更多自由，為什麼他們也會束手就擒、走向自己的反面呢？

這樣的認識與寫檢討不一樣，為了過關寫檢討可以是違心的，但這是真心誠意的。包括張聞天本人。何方先生說他對毛是有心悅誠服的成分。為什麼大家都對毛心悅誠服呢？為什麼會弄出一個個人迷信這種東西呢？對所有當事人來說，一定有一些超出個人的大的東西在背後支配和支持他們，而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心雜念。

超出個人的東西，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大框架，指的是大的思想框架。這樣大的框架很能夠幫助我們說明，甚至今天的中國處在什麼階段。一個框架就是在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理性與權威的問題，在權威面前，個人會放棄他自己的理性、自己的頭腦。這就是資中筠和陳樂民先生反復強調的啟蒙的問題。到今天還是如此。人們願意札根在體制當中，而不願意札根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當中。體制是一切，體制外是nothing。

第二個大的框架是對於革命的理解。延安整風最終所實現的是一元化領導，統一思想，何方先生在書中把這一點說的很清楚。許多人為什麼接受這一點，是因為要維護革命隊伍。為什麼要維護革命隊伍呢？因為要取得革命的勝利。為什麼要取得革命的全國性勝利呢？這聽起來是一個笑話，但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偽問題。

何方先生在《黨史筆記》中提到了「如果沒有延安整風確立起來的毛澤東崇高威望和統一指揮，解放戰爭也可能還要多花一段時間，不會那樣乾脆利索」。但是從我今天的觀點看來，解放戰爭時間長一點又怎麼樣？甚至假如不是共產黨贏得這場戰爭呢？為什麼一定要共產黨打贏這場戰爭？為什麼一定要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如果革命的問題僅僅變成了政權問題，這樣的革命又是什麼革命？

說到底，共產黨的這場革命，最終變成了照亮自己的革命，照亮革命者自己，把自己(或者少數人)推到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但是沒有能夠照亮廣大人民群眾，沒有能夠照亮中國社會，照亮民族的前景和道路。一場僅僅是為了自己的革命，也許還不如讓它輸掉，輸給社會，輸給人人平等的權利，輸給每個人吃飽肚子和能夠說話的權利。

徐友漁先生

徐友漁在書面發言中說：

我一直關注和認真閱讀何老的著述，每次都感到很有收穫與心得，這次從衛平處得到何老贈送的《何方自述》與《何方雜談》兩本書，基本上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一氣呵成地讀完。當然，其中一些篇章是以前早已拜讀過的。我想簡要、隨意地談一點我的讀後感。

第一，讀了何老的書，我對我黨根深蒂固、危害深遠的左傾路線的危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性認識。比如，何老小小年紀就到了延安，怎麼會有歷史方面的問題呢？但主持整風的人秉持的宗旨是「抓出的壞人越多，整風成績就越大」，用勸、逼、騙等手法硬叫人承認自己是特務、有問題，承認自己是壞人還可以上「光榮席」，這麼荒唐的事情，簡直是匪夷所思。

第二，讀了何老的書，對張聞天的成就、為人、風格有了了解。以前看過涉及到張聞天的相關黨史材料，得到的印象是扭曲的、醜化的，後來情況有所改變，但最好的情況下，得到的印象也是不準確、不全面的、矮化的。張聞天其實很正派、對人民的事業很負責任，學問很大，搞工作和從事研究很能抓住要害，而且能在黨內高層被歧視、誤解的情況下任勞任怨地工作，真是了不起！如果沒有何老的言說，我們，以及後世的人們就不可能了解到張聞天的真實情況，何老的工作是無可替代的。

第三，讀了何老的書，對於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了解比以前更準確和全面了。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知道外交部的文革歷程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但不清楚關於外交部的文革情況以前的敍述有那麼嚴重的歪曲。我看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馬繼森所寫的《外交部文革紀實》，得到了許多有用的資訊，但何老的表述更坦率，眼光更深刻，把所謂「陳姬喬問題」在外交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説清楚了。我認為，沒有何老這種直面真相的勇氣和品格，外交部文革的歷史敍述只會是一團亂麻。

第四，何老以經驗事實為根據，把所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一貫正確」的神話還原為有分析、有批判、有反思的評述。長久以來，甚至直到現在，不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都在神化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似乎在內政和經濟建設方面，毛的錯誤、危害可以談，也隱瞞不了，但外交方面是例外，毛的外交思想簡直是高明得不得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麼嚴重錯誤的情況下，外交領域是一個例外。我以前對這種論調不太以為然，但因為了解事實不夠，也沒有何老這樣的深入分析，多多少少還是覺得説毛在外交方面確實有獨特的智慧、技高一籌，大致上是不錯的。我現在不這麼看了，這完全是得益於何老的賜教。我相信，何老的分析、評價，構成了他在總結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經驗方面的獨特貢獻。

摘自2008年3月31日出版的第6、7期(總第216、217期)《記憶》電子刊物

杜光先生

在《何方同志生平》概括的何老晚年三大貢獻中，我認為最有社會價值、最有歷史意義的，是他對黨史研究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從遵義會議到整風運動的黨史……何老説：「由於始終沒有允許並組織深入研究和探討，至今有關延安整風的著述與教學，總顯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亂，不少問題上還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現象。」他精闢地指出：「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括歷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去。」何老在這裏認為：延安整風的傳統「還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真是擲地有聲，足以驚世駭俗！我們幾十年來的折騰，從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革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六四鎮壓、三個代表，以至五不搞、七不講、不許妄議等等，「都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這就告訴我們，要檢查反思歷史上的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研究和探討」延安整風入手。我認為，何老的這個真知灼見，是他留給後人的重要財富。

朱正先生

朱先生在讀書寫作問題上同何方有過多次書信來往，下面是涉及《黨史筆記》的三段話。第四段摘自他在何方去世後所寫的悼文。

(一) 2005年5月31日信：

這幾天裏，我把大著狼吞虎嚥拜讀一過。獲益良多。我還要細細咀嚼，慢慢消化。現將拜讀中的一些零星意見寫呈請教……(提到書中所引斯大林關於武裝鬥爭談話時説)《毛選》第二卷第543頁倒6行也引了，並説這一論斷是對於北伐、土地革命戰爭和今天的抗日戰爭都是正確的。以為這是斯大林的一項一般化的原則的論述。前不久，我在王凡西著的《毛澤東思想論稿》中看到他的論述。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講的這篇話是十分具體的。他説的武裝的

反革命指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而武裝的革命，指的是蔣介石統率的北伐軍。

談二十八個半。大著中未見引用盛岳著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當事人的回憶錄難免失實之病，此冊似亦不無參考價值。這書不久前東方出版社放在「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中，重印了（同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放在一起），很容易得到。

（二）2005年6月9日信：

日前，我同龔育之同志談及大著（指《黨史筆記》），我以為是黨史工作者的必讀書，如果你不接受書中的意見，就得駁倒它。龔說他曾在一個紀念張聞天的會上得到大著中有關張的幾篇，未見過全書……我看他大約也是屬喬木學派的，不過既希望盡量不違背史實，又希望盡量不違背統一的口徑，這也真是一個兩難的處境。

（三）2005年6月18日信：

黨史界的名人，石（仲泉）、逄（先知）、金（沖及）諸公，我都不認識，只同龔育之有一點往來。我上次信中說的，「希望盡量不違背史實」，卻是不對的。似乎應該說，喬木胡繩學派的黨史著作不是研究而是宣傳，宣傳一個既定的結論。在宣傳這一結論的時候，希望多少有一點史實作旁證。凡是有利於宣傳的，即採作證據，如以陳雲的一份傳達提綱作為否定張聞天曾任總書記。而不利於宣傳意圖的證據則視而不見了。黨史上蓄意掩飾、粉飾和淡化的，除了富田事變、西路軍、搶救運動外，即以我身歷的1955年肅反（我是130,000隻錯鬥的老虎之一）而言，在胡繩主編的《七十年》中竟不著一字！由此可見民間修史之重要。

（四）2017年10月寫的悼文：

我第一次拜見何方先生是2005年5月的一天，和丁東、邢小群夫婦一同去的。那天何方先生送給我兩本書，是他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的《黨史筆記》上下冊，副題「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我細讀了一遍，覺得十分精彩，以為後世必將認為它屬二十世紀史學名著之列。許多事情，例如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擔任的職務，一直都是沒有說清楚的，在這書中都有根有據地說得一清二楚了。又如延安整風，許多人都以為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寫得不錯，而何書就指出高書中的多處與事實不符的想像之詞。我想，喝過和沒有喝過延河水的畢竟不同，根據親身經歷寫的和查考文獻資料寫的畢竟不同……馬克思說的，思考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考。何方在受到折騰的漫長歲月裏不斷在思考，難怪有這樣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就跟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中煉出了火眼金睛一般。

杜導正先生

父親（指杜導正）對何方的評價極高，說他有膽識，求真求實，個人獨立研究黨史成一大家。他寫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釐清了一大段歷史的真實情況，糾正了延安整風期間製造的兩大錯誤觀點。一個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實際上，遵義會議確立是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集體領導，這一體制至少延續了三年。另一個：延安整風是整教條主義的根源共產國際的風。何方指出，延安整風是毛澤東以算歷史賬的方式，批倒了以前的領導人。以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和個人崇拜。何方指出，延安整風開創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運動方式，影響至少當以百年計。2015年，當父親決定

從老幹部中選幾個參加社委會決策的顧問時，社裏就對何方有些不同意見，也許因為何方説話陝西口音實在太濃重而且不太善於演講，一般聽眾只能知道個大概。面對這些疑惑，父親説：「你們去仔細讀讀他的書，了解一下他的經歷，你們就知道這個人多麼的了不起了。」可以説他是當代的思想家、黨史家、一個獨立思考並有見解的大家，大家談黨史繞不過何方寫的《黨史筆記》。他這是研究張聞天獨一無二的唯一的專家，是堅定徹底的改革派求實派實幹派。

李昕先生

李昕先生是在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任內安排出版《黨史筆記》的。何方因堅持在體制內出書，已推掉香港另一家出版社的出版稿約。經過李昕的運作，此書才得以按何方意願成功出版。他在悼念文中說：

> 老實説，在我以往的閱讀經驗中，很少有讀此書稿時被震撼的感覺，稱作醍醐灌頂毫不誇張，因為發現自己原本熟知的一系列黨史概念和觀點，竟被這本書輕而易舉地瓦解和顛覆了。作者對史料可謂純熟，他如數家珍地列舉事實，條分縷析，提出諸多無可辯駁的見解，將這一段黨史做了全面刷新的闡述。特別是關於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關於延安整風本身的分析和總結，關於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形成和發展，關於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建立以及對於黨史編纂學的影響，本書的分析和論述嚴謹也雄辯，有如撥雲見日，令人豁然開朗，耳目一新。讀罷書稿，掩卷遐思，令我非常感慨。我一向自以為熟悉理論動態，也知道理論界藏龍臥虎，但卻想像不到中共黨內有這樣橫空出世的理論家！我對三聯書店的同事，談了自己的讀後感。簡單説就是八個字：「振聾發聵，石破天驚。」……《黨史筆記》面世以來，不出我的預料，它在中國現代史學界引起強烈震動，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從此，有關如何評價張聞天、延安整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等學術界長期爭論不斷、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和符合邏輯的闡釋，即使這個闡釋仍然是一家之言，也已然贏得了眾多讀者的信服。有學者説，《黨史筆記》是一個里程碑，這部著作出版以後，後人著述黨史，便不可能繞過它了。而何老的摯友，與他一起經歷過延安整風的老一代作家、出版社家曾彥修，對《黨史筆記》的評價，竟然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張弘先生

何方先生曾一再説，「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這兩次烙在靈魂深處的恥辱，前者發生於他20歲的時候，因為在搶救運動中被圍攻、熬鷹，他一時扛不住壓力，屈打成招，過後又反悔；後者發生於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期間，37歲的他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被迫在毛澤東和張聞天之間選擇。因為何方崇拜毛澤東，相信毛澤東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因而選擇了揭發張聞天。這兩件讓他耿耿於懷的錯事，一個發生於青年時代，一個發生於中年時代，兩者的發生邏輯和內在機理基本一致：激烈和沒有中間道路的政治運動，讓人們不得不選擇非此即彼地「站隊」。在組織的強大壓力之下，個人沒有能力辨識真相，並缺乏堅持真理的勇氣，不得不做違心之論。事情發生之後，何方先生又一直為之懊悔不已，視之為個人人生經歷中的污點。因此，從他精神人格的成長和發育來看，他的青年時代和中年時代均有一定程度的迷失。直到晚年，才回歸自我，反

省此前的功過得失。而他在學術界聲名鵲起和飽受讚譽，恰恰是因為他的反省沉痛而真誠。由於既是經歷者又是研究者，他的黨史研究既有去偽存真的董狐直筆，更有過來人的經驗和教訓。同樣是反省，無論是在格局、視野，還是在直面歷史的勇氣以及思想的深度上，何方先生已經超越了大多數人。

前半生投身革命，迷失自我且歷經坎坷；晚年反思經歷過的道路，檢討功過得失。敢於承受切膚之痛的何方先生無疑值得敬重。他留下的外交著作，以及《何方自述》、《何方雜談》、《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何方談史憶人：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等等著作，都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遺產。作為史料，人們能夠看到我國過去幾十年的外交得失，政治運動的殘酷和危害；作為思想史著作，人們更能看到一位老人洞明世事的犀利眼光，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開放寬容的政治心態，直面歷史的責任擔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晚年一頭真的何方先生賡續了司馬遷的史家傳統，歷經坎坷求索中國道路的他縱身一躍，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壯麗的一章。

葉維麗女士

我格外敬重曾彥修和何方兩位，是因為在我看來，在通常被稱為「兩頭真」的老共產黨員群體中，他倆又與眾不同，赫然並立。他們都是衰年開始「治學」，以老病之軀、一己之力，獨闢蹊徑，「自學成才」，在同代人中下力最大，用功最深，跋涉最遠。前者鑽研蘇俄歷史，後者爬梳中共黨史，各自花了一二十年時間，著書立說，發人所未見，申自家之言。他們的學問，不是書齋裏的，他們的問題，不是書本上的，他們不僅帶着個體的生命經歷，也背負着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英文有個詞，叫"insider"(裏面的人)。曾、何自青年時代起即為中國革命的"insider"，到了晚年，他們從「裏面」跳將出來，離得遠了些，站得高了些，看得廣了些，以"insider out"的身份審視個人走過的道路，審視國家走過的道路，也審視二十世紀的「革命」，其視野，其勇氣，其毅力，何其可貴；其用心，又何其良苦。

我注意到，何方叔叔決心研究黨史，有一層非常重要的個人原因，即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不得不參與對張聞天的揭發批判，這成為他「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包袱」；文革結束後再見到張聞天夫人劉英時，他當面「謝罪」，一向很少哭的他，那天竟「失去控制」。此後他就從釐清張聞天在中共歷史上真實領導地位開始，一頭扎進黨史研究，一發而不可收拾。

鄭仲兵先生

世紀初，朱厚澤、張思之——兩位我過從甚密的亦師亦友和何老已有較深交情，都和我講到何老在黨史以及外交、國際關係問題上的真知卓見，讚揚他在時政問題上的敏銳清醒。特別是當我讀了《黨史筆記》後，我不能不為何老的窺史眼光所折服。以前讀過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覺得對中共黨史的突破不啻有翻天覆地之慨。而何老的《筆記》不僅對高華的書中的認識有昇華，而且還訂正了其中的史實和史識上的錯誤……哲學家王若水有一種感悟，叫作「智慧的痛苦」，也是他的名篇。在我看來，能因智慧而痛苦者皆非凡人。何方和厚澤皆以天賦的智慧直面痛苦——以執著的探索、犀利的洞悉、透徹的感悟、深邃的思想去面對這個國家、這個體制的愚昧、醜惡、專橫、野蠻、殘忍……終於，在身心極度痛苦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身上結合着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智慧與痛苦，是智慧與痛苦的化身。他們堪稱聖人！

葉芳女士

在何方《黨史筆記》中記錄的黨史，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共產黨建立的權力中心是由一群與普通人一樣充滿缺點但更具野心、某個時期也可能具有個人魅力的人掌控着。隨着權力地位的攀升，這些人的魅力轉化成了惡魔的翅膀，可以遮天蓋地，排斥一切異己分子。何方先生是在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中理解了黨的執政進程既是最高權力者個人歷史也是黨的演變歷史：只要他們還有信奉者、追隨者，就必須打擊一切對絕對權威質疑的任何個人。這也是絕對權力超越一切個人權力的過程，是永無休止的對任何個人可能發生的迫害。在這個行程中，任何對此心存疑慮的個人都無法全身而退。追隨共產主義的人並非自然把更高的權力當成了真理加以服從。是共產黨政治機器的運作迫使他們捲入其中，並明白無誤地以殺人滅口的方式告訴他們，這裏沒有思想獨立的空間。

何方先生對張聞天事件中自己承擔責任的反思，是對人性價值的回歸。事實上，每一個進入絞肉機中的人同時也可能成為其他人進入黑暗的推手，沒有人可以逃脫。毋容置疑，何方先生晚年的生活每時每刻都與他關心的事實真相有關，與他年輕時的理想有關。但他走了一條處處是禁忌的研究道路，為的是給後人留下清醒的歷史告誡和記錄。

像何方先生這樣聰明的人，投身革命後不可能完全消滅內心的質疑。但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政權。他們確信如果不違背共產主義的初衷，為這個政權付出一些個人犧牲的代價，將換來一個更為優越的社會。這是共產主義者中令人感動的那部分內容。他們不清楚的是，在這個新的政權集權並全面獲得社會控制權的過程中，靠的就是舊社會的裂縫和無論十分有限但足以生存的自由空間。何方先生自身的資質使得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思想、質疑和比照。因此他對黨史的研究成為他對集權主義過程教訓及根源的探索。他本身也成為一個極富價值的人性樣板，他的個人的歷史成為大歷史中最生動的一部分。

信仰是無罪的，但將一種被隱藏了真面貌的信仰付之於邪惡實踐並造成社會恐怖的人是有罪的。有罪不僅在於他們對其他人的迫害，也在於他們葬送了一代人及幾代人的理想。他們把邪惡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視為必要的革命手段，至今如此。

人們懷念何方先生，敬佩他至死保持了對真理的追求精神；他把他所知的歷史盡可能還原於真相；他的人生保持着豐富的人性、感情和知識體系。

其他友人和海外學者

章詒和女士

章詒和因何方的《黨史筆記》和《何方自述》、何因章的《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等多部著作而互相欽佩，開始長達十來年的友誼。她在認識的朋友中大力推介何著，包括購買多部送人，其中還有她在海外的友人，從而擴大了何著的影響。她近日寫道：

> 準確地說，何方的寫作叫「私人敘事」，任何一個組織都可以將它覆蓋，他的文集至今不能在大陸公開出版。但何方一直在說，在寫。當下，任何「私人敘事」，幾乎都是對官方書寫的糾正。因為官府老是在製造錯誤歷史和虛假真相，千萬別指望能從官方的宏大敘事裏得到什麼！而《黨史筆記》、《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談毛澤東外交》等一系列個人記憶與陳述，卻有着驚人的真實，勇氣非凡，見地精微。這才是記錄中國當代歷史的主體。

邵燕祥先生

邵燕祥是何方的好友。邵曾贈何方一首詩作，征得先生同意發表於此。邵先生說，「拙作的賀詩雖是即興，但屬掬誠，能被大作附錄，深感榮幸，謝謝！」

人們常問
爾是何方神聖
我今答道
此是神聖何方
倚馬萬言如有神
斯之謂神
一身萃集智仁勇
斯之為聖
神筆兼聖者
九二老何方
九旬乃初老
百歲尤健康
先行有榜樣
楊絳周有光
今來金寶路
友朋聚一堂
舉觴同賀壽
興嘆稱望洋
真相並真理
椽筆出文章
一掃狂與妄
五毛無處藏

二〇一三年十月寫呈
何方老一哂
燕翔拜

張思之先生

（一）張思之有共和國「第一大律師」之稱，和何方在《炎黃春秋》活動中相識相交。2007年12月11日給何方來信：

何老的巨著，上下兩冊(指《何方自述》)，方才收到，書名極好，既貼切又耐人尋味，不是大家，得不出這樣的書名。詒和先生幾次對這部書讚不絕口，應非偶然。

（二）2009年7月26日來信：

事有湊巧，收到二老快件賜寄的新作，正擬公出南粵。抵達廣州，連夜讀完何老文章，寫陳的那篇，特別為之感動，不禁淚下。前幾天，我曾寫過兩句話，是：「共產黨收拾共產黨人，手從不軟，心更顯色」。從毛殺AB團開始，死在他手裏的何止萬千！幾十年中幹盡了自己人「毀」自己英才的蠢事！何老對他，有的地方「高抬貴手」了。這也許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我還是盼着，人們對他，終能有「徹底的」「改正」。

李澤厚先生

何方和李先生只有一面之緣。他2007年12月21日請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丁偉志轉告何方：他對《何方自述》一書的評價極高，此書寫得真實細緻，現在的研究（指何方的黨史研究）比過去的研究（指何方長達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對社會的貢獻要大得多。

尹振環先生

貴州省委黨校教授尹振環先生在撰寫《中國皇權專制主義——剖析〈秦家店〉》和《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兩書時曾同何方有書信往來。2008年3月，他在前一本書多處引用《黨史筆記》的一章後寫道：

一個偶然的機會，得讀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茅塞頓開。這絕非何先生所謂「門外史談」，「對黨史一竅不通」，而是才華橫溢的當今黨史司馬遷。這是史學界一顆重量級的精神原子彈。親身的經歷，無所畏懼，加之對大量佔有史料的條分縷析，深入淺出的論述，驅散了層層迷霧，深入內幕解答了七十多年的重重懸案。何為信史，良史？《黨史筆記》是也。由於何老在延安時，與一些高層人物共事過（宋以敏注：此說不確），所以避免了出於想像的主觀判斷，加之超人的膽識，一切都無飾非，無掩過，無虛美，無溢惡，無所畏懼，無人云亦云。所以「莫負美名書信史，清風掃地更無遺」，完全可用於此。更令人嘆服的是：期頤高齡，思路如此敏捷、直率可愛可敬。黨國之大幸也。拙文有關延安的史料，大多出於此書。僅致由衷的謝忱。

傅高義教授

（一）傅高義是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由於傅教授漢語說得好，同何方交流沒有語言障礙，曾兩次來家同何方長談。他2008年3月2日發給何方一封電子郵件，說：

> 我剛才收到您的兩本書，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我非常感謝您。您努力揭示中共歷史的本來面目。非常佩服。我想您關於延安時期歷史的貢獻是很大。我想您對張聞天、陸定一等的介紹是很有價值。

（二）盛平告訴傅高義教授何方去世的消息後，傅教授給他回的郵件說：

> 聽到何方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很難過！我非常懷念何方先生，也非常敬佩何方先生！請轉告何方先生的夫人，表示我的懷念和慰問！我非常敬佩何方先生！

2017年10月8日

陳永發先生

（一）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陳先生2006年11月28日致友人姚監復先生信，內稱：

> ……何方老先生很了不起，他的《黨史札（筆）記》應該是反省延安經驗最有深度的一本書，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請他來台灣一趟……

（二）陳先生2007年4月10日致姚監復信，內稱：

> ……何方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不過毛澤東念馬克思原著，是六經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所以他關於馬克思的理解經常奇奇怪怪。馬克思怎會根據有錢沒錢來定義階級呢？毛澤東最初對階級的定義就是有錢沒錢，而不是生產關係。毛澤東念馬列經典也是看它有用沒用，所以資本論連一遍也沒看完，聯共黨史卻念了九次，而且在黨內鬥爭中運用得可妙……

余英時先生

在網上讀到余先生2009年11月22日的一篇題為〈談黨內退休高幹民主追求〉（新世紀）一文，內稱：

> ……最近我還看到了何方寫的一本書（宋以敏注：應指《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這個何方也是1922年出生的，也是跟杜導正差不多。杜導正是1937年參加抗日的，何方是1938年參加抗日的，然後都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後就受共產黨訓練，然後當然就接受了共產主義、馬列這一套。接受以後當然就把它當作宗教一樣，非得完全服從、完全盲目地跟隨，也不敢對黨提出任何懷疑的。他們是忠心耿耿地相信共產黨最後領導抗日成功，一定可以走上民主的道路。當時誤認為共產黨是代表民主自

由的，因為毛澤東所提倡的對象叫「新民主主義」，並不是共產主義，所以是很有迷惑性……

（李慎之等）這些人讀書差不多同一背景、同一年齡層同時找到了民族主義抗日這個關係，參加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抗日的。他們嚮往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社會，這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每天鼓吹着民主自由、甚至是美國式的民主自由。那套方式也迷惑了很多美國人。

但是，這一批人在共產黨裏面工作，越工作到後來越發現有問題了。從「反右」一直到文革。「反右」已經是知識分子一個大的劫難，像李慎之就被打成「右派」。何方也差不多，因為他跟張聞天工作的關係，最後被打成「反革命」（宋以敏注：何方倒是一直未被打成「反革命」，對他所犯「錯誤」的定性，始終是屬「人民內部矛盾」，但所受處分比不少被劃為敵我性質的黨內挨整者更加嚴重）。總而言之，他們經歷了苦難以後，慢慢發現共產黨所追求的東西並不是它所承諾的那些東西，而只是奪取政權。所以奪取政權以後好像不再有別的想法。於是這些人都慢慢走向追求民主這條路，這是共產黨內的一個新發展。但是，下面有沒有人接替，我們就不敢說了。

後記

《黨史筆記》增訂版說明

何方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了張聞天，一直心懷內疚，不能自諒。他抱着還債心情，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參與為張聞天錯案撥亂反正的工作，一面就張聞天的生平事蹟撰寫文章，一面開始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1998年年底離休後，何方決心放下長達五十年的國際和外交問題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中共黨史。對他來說，這是一門新的學問。因此，1999年進入系列寫作後，他把所寫各篇定名為《黨史學習筆記》。2005年結集成書時，香港利文出版社把書名改為《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2008年利文出版社出了修訂版。當時出版社承諾，書一賣完就會再印。但只過了短短幾年，就不能再印了。

因為是邊學邊寫，何方一開始並沒有多大把握，更談不上最後成書。他每寫出一篇，都先廣泛徵求意見。第一讀者是張聞天的政治秘書蕭揚。他對每篇都提出了一些意見。曾彥修是又一位熱心的批閱者。他提的意見質量最高，也最多最細，有點像批改學生文章：此句應刪，彼句應補充。何方是在吸收了各位友人意見的基礎上最後定稿的。

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初期的篇章就開始流傳，受到關注。這得首先感謝交遊廣泛的李慎之。李慎之不僅自己寫的文章必發何方和他的其他友人，也常給何方轉發他認為寫得不錯的別人文章。何方的《黨史學習筆記》，正是由他首先向公共領域擴散的。長期對何方的寫作、著作出版和推介起到重要作用的丁東，就是讀到李慎之給何家棟的頭幾篇稿子後立即來家和何方聯繫的。書成之後，受到讀者歡迎的

程度，出乎何方的意料，使他深受鼓舞。事後在時不時地重讀這一篇或那一篇時，他會流露出一種滿意感。

由於書在香港出版，內地一些讀者不易購買，只好用翻印的方式獲得。連我們自己也多次購買這種版本送人。翻印書曾暢銷多年。但這種傳播方式遭到越來越嚴厲的管制和取締。現在無論正版還是翻印版，均已絕跡多年。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決定重印這部書，擴充內容而成增訂版。再次衷心感謝出版社！

增訂版附加的內容，主要是經過補充修訂的《劉英與何方談中共黨史》。劉英1925年參加共產黨。在江西蘇區，就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熟悉。從長征到延安整風運動之初，她曾在黨的核心部門工作。因此，她是這段時期黨內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1978年後的二十多年間，劉英對何方無話不談，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重要關節，對於毛澤東等人的言談舉止，也有生動具體的描述。何方學習和研究黨史，劉英成為他的良師。《黨史筆記》的內容中就含有劉英的親身經歷以及她對許多人和事的觀察。

「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支持下，劉英全力推動和組織張聞天著作、年譜和傳記的編輯、撰寫和出版，以及召開專題研討會議、參與影視宣傳等各項紀念活動。劉英在黨內資歷深，熟人多，加上她直率開朗，由她親自出面聯繫有關單位和領導人，就使張聞天文集編輯組的工作人員得到了許多有利的工作條件。他們去中央和外交部檔案館查閱檔案、拜訪有關的領導人，都收效較大。他們所做的這些工作，給何方的黨史研究提供了札實的資料基礎。在張聞天文集編輯組中，何方同曾彥修、蕭揚和張培森共事多年。他們對張聞天的研究，給何方不少思想啟發。

增訂版由資中筠和雷頤兩位先生分別寫序，由何方為他的黨史研究接受的兩次訪談記錄為本版的代前言。

本版加了個附件：對初版《黨史筆記》的評議輯錄。裏面收入的主要是何方已逝和在世友人對本書的議論。

何方從一開始就非常注意收集外界對他所寫黨史的各種反應，我們收到的信件和讀到的文章數量可觀。附件只輯錄了其中一部分。李銳老、朱厚澤和南通的丁弘、山東的李昌玉和北京的胡甫臣也在不同場合多次對何方黨史研究表示讚賞。何方去世後，李銳老給何方寫的挽聯是：「黨史專家書實事　後人求是感何方」。李老的忘年交韓磊曾來信，說他（2010年12月25日）和李老談起《黨史筆記》，李老說「何方人非常好，寫的東西很嚴謹，很有見地，有新東西，了不起！」朱厚澤曾建議他的友人讀顧準、李慎之和何方的書。後三位先生都曾多次給何方寫信，不僅給他以鼓勵，還對相關問題不時提出切磋意見。在網上讀到的評論中也有多篇很有份量的分析。何方聽到和讀到的各種意見，都使他很受鼓舞。

增訂版正文依據2008年修訂版，只有兩處稍有訂正。一處是朱正先生指出的引用差錯。另一處是何方在書中說，「王明還捏造中央領導通過金茂岳醫生對他進行毒害，更是荒誕不經。」何方後來先後讀到王明夫人孟慶樹編著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和郭德宏（中央黨校教授）主編《王明1904–1974年譜》這兩本書，才知道他所寫的這句話站不住。這次通過加注作了說明。

離休前，在國際和外交問題上寫準備發表的書籍或文章，何方不能不遵守外事紀律。寫《黨史筆記》，是他生平第一次以自由的心態公開表達自己的思考，時已年近八十。這本書通過大量閱讀和認真考證，大幅度還原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一時期的真實黨史，和盤托出他對這段歷史的全新認識。他認為，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他先在黨內後在全國的個人專制獨裁地位，創造了一整套治黨治國的戰略策略。其結果，就是在國家運行、社會改造和做人規範上，打造出一種和普世價值相對立的模式。延安整風對國家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回顧一下共和國成立後的大小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豈不都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大小翻版嗎？「文革」中的大抓「五一六分子」，更和搶救運動中的大抓「特務」一模一樣。延安整風運動種種，在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中不斷重演。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也只表現為在命題和用詞上的不斷翻新。大概這正是何方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和在他身後值得增訂再版的緣由。

宋以敏
2019年1月30日



《黨史筆記》使何方先生成為公認的中共黨史問題專家。2008年修訂以來首次增訂再版。增訂版由內地學者資中筠及雷頤撰序，收入何方友人對初版發表的評議，以及兩篇有關黨史研究的何方訪談紀錄。隨書另附首次結集的《劉英與何方談中共黨史》。

我今生犯了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一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不管是什麼場合，人應該說真話，不能說假話。不能把好人說成壞人。

何方 (1922–2017)

何方先生2005年稱，在一些中共老黨員老幹部老知識分子中普遍出現一種被稱為「兩頭真」的現象：「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頭一個「真」，是指當年幹革命或做學問，都是真心實意、自覺自願、勇往直前的。中間的「失」，主要指失去獨立思考，受到束縛，只有盲目緊跟或被迫追隨。後頭的「真」，是說自認為思想得到解放，能提出自己的真實看法。反思時感到沉重，原因是從小就為之奮鬥的民主憲政至今還望不到邊；幾十年來一直盛行造神造假運動，還有進一步加強和發展的趨勢。但願當年曾為自由民主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也能做到「兩頭真」。

《黨史筆記》(增訂版) 經重新編排，正文共十七章。何方先生根據親身經歷，剖析大量史實，比較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5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官方撰寫的中共黨史與歷史真相之間存在的差別，從根本上反思了個人崇拜的歷史淵源、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和黨史編纂學的積弊，認為一切源自延安整風為中國確立了沿用至今的治黨治國模式，迄未出現放棄前景。本書創一家之言，值得一讀再讀。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